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性别平等与发展

世界各地妇女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改善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哪怕在 25 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妇女在获得各种权利、教育、医疗、就业和生计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现在，保障妇女在财产、婚姻和其他领域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很多国家已经消除了初级教育中的性别差距，三分之一的国家里中学女生人数超过男生，有 60 个国家上大学的女性多于男性。妇女也利用她们所获得的教育更多地参与劳动就业：她们占了全球劳动力总数的 40%，农业劳动力的 43%。而且，现在世界上所有地区妇女的平均寿命都超过了男性。虽然取得了这些进步，但性别差距在很多领域依然存在。在很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妇女相对于男性的死亡率仍然高于富裕国家，这在婴幼儿时期和生育期尤为突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南亚一些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弱势人口中，女孩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仍然大大低于男孩。与男性相比，妇女更可能在家庭经营中从事不拿报酬的工作或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耕种的田地往往面积较小且种植的作物利润较低，经营的公司规模较小且处于低利润产业——总的来说她们的收入比男性要低。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对家庭资源的发言权和控制权低于男性。大多数国家参政的妇女人数都少于男性，在政府高层代表人数不足。

《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指出，缩小和消除这些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是十分重要的。性别平等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核心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因为性别平等是聪明的经济学。推动性别平等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改善下一代的发展结果，并使各种制度更具代表性。这份报告以性别平等与发展的经济学的广泛研究为基础，提出了性别差距最突出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们本身很重要，而且缩小这些差距可以带来巨大的发展收益，同时这些差距只靠经济增长无法得到解决。报告随后提出了公共行动的四个优先领域：

* 降低女性的过高死亡率，在仍存在教育性别差距的地区消除这种差距
* 改善妇女的经济机会
* 扩大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发言权和能动性
* 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复制。

每个优先领域的政策需要重点针对那些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在有些优先领域——如降低女童和育龄妇女的死亡率——最重要的是要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特别是清洁用水和孕产妇保健）。而对另外一些优先领域——如缩小收入和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距——有关政策就需要解决市场和制度运行中影响性别平等进步的多重制约。决策者需要分析这些制约的优先次序，对它们同时加以解决或是依次逐个解决。

虽然国内政策是减少性别不平等的关键，但发展机构也应当在上述四个优先领域中对各国的国内行动加以配合和补充，同时通过更好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项目和政策评估和学习来支持基于证据的公共行动。这就需要增加资金支持、加强创新和学习、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资金支持应当重点针对贫困国家，用于降低女性死亡率和缩小教育性别差距。也需要增加投入来改善分性别数据的收集、支持更多的政策试验和系统性评估。各种伙伴关系应当将私营部门、发展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都包括进来。

ISBN 978-7-302-29916-5
9 787302 299165 >
定价：185.00元

世界银行

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 性别平等与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

61697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

性别平等与发展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世界银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

性别平等与发展

世界银行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11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r The World Bank
ISBN：978-0-8213-8810-5
ISSN：0163—5085
eISBN：978-0-8213-8812-9
DOI：10. 1596/978-0-8213-8810-5

This volume is a product of the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The findings, interpretations, and conclusions expressed in this volume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of The World Bank or the governments they represent.
The World Bank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cluded in this work. The boundaries, colors, denominatio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hown on any map in this work do not imply any judg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 Bank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territory or the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of such boundaries.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
2011 年，版权所有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地址：1818H Street，NW，Washington，DC 20433，USA

本书原版由世界银行以英文出版，书名为《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中文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中文版与英文版在内容上如有任何差异，以英文版内容为准。本报告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成果。本报告的见解、观点和结论未必反映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

世界银行不保证本报告数据的准确无误性。本报告所附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信息并不表示世界银行对任何地区的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和接受。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TI 671203070342

权利和许可

本报告的材料具有版权。未经许可复印和/或转载本作品的全部或部分材料可能违反相关法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鼓励传播其作品，通常会迅速准许有关复印和转载的请求。

如欲影印或复印本报告，请填妥资料提交版权许可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Inc.），地址：222 Rosewood Drive，Danvers，MA 01923，USA；电话：978-750-8400；传真：978-750-4470；网址：www. copyright. com.

其他任何关于版权和许可证的询问，包括各项附属权利，请和世界银行版权部联系。地址：1818 H Street NW，Washington，DC 20433，USA，传真：202-522-2422；e-mail：pubrights@ worldbank. org.

封面照片：Arne Hoel，世界银行
照片版权：概述/世界银行，第一部分/国家地理，第二部分/Kiet Vo，第三部分/国家地理
封面设计：Critical Stages
图表设计和信息图表：Design Symphony，Cymetrics，Harkness Design 和 Naylor Design。

第一次，世界银行在发布世界发展报告的同时推出了适用于 IPAD 平板电脑的移动计算机应用程序。主要特征包括：获取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内容的多种途经；通过关键信息浏览，通过主题、区域和键盘浏览和搜索，可以获得七种语言版本的报告概述和主要信息文件；共享专题，保存专题；浏览报告的图表数据。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 bit. ly/wdr2012app.

世界银行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

性别平等与发展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当今，世界各地妇女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妇女在获得各种权利、教育、医疗、就业和生计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特别的差距在很多的领域依然存在。例如：在很多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妇女相对于男性的死亡率仍然高于富裕国家；女孩的入学率低于男孩；妇女收入低，对于家庭的发言权和控制权低于男性；大多数国家的参政的妇女人数少于男性。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缩小和消除这些差距十分重要，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目标，同时，推动性别平等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改善下一代的发展结果，并使得各种制度更具代表性。本报告以性别的平等与发展经济学的广泛研究为基础，提出性别差距最突出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依赖经济增长无法得到解决，需要公共行动领域进行推动。报告提出四个优先的领域，包括降低女性的死亡率、改善妇女的经济机会、扩大妇女的发言权和能动性以及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复制。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世界银行著；胡光宇，赵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书名原文：*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BN 978-7-302-29916-5

Ⅰ．①2…　Ⅱ．①世…　②胡…　③赵…　Ⅲ．①男女平等—研究报告—世界—2012　Ⅳ．①D4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661 号

责任编辑：周　菁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 tup. com. cn，http：//www. wqbook. 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 tup. tsinghua. edu. 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 tup. tsinghua. edu. 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02mm × 266mm　　**印　　张**：27. 75　　**字　　数**：579 千字
版　　次：2012 年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月第1 次印刷
印　　数：1 ~ 0 000
定　　价：00. 00 元

产品编号：

目　　录

序　Ⅸ
致谢　Ⅹ
译校出版与致谢　Ⅻ
缩略语和数据注释　XIII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主要内容　XVI

概述　2
为什么性别平等与发展密切相关？　2
本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7
性别平等在哪些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　8
在哪些方面性别不平等仍持续存在？原因是什么？　14
该做些什么？　24
性别平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38
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议程　39
注释　41
参考文献　42

引言：报告导读　48
为何性别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48
本报告采取了哪些行动　51
报告导读：路线图　53
注释　53
参考文献　53

第一部分　评估性别平等现状　56

第 1 章　性别平等的进展　58
时代在改变吗？　58
女性权利全球共识日益增强　59
女性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更好的成果　61

变化催生新的变化 69
注释 71
参考文献 72

第 2 章 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 74
处于严重弱势地位的人口 75
经济进步未能拉动的“滞缓”领域 78
倒退 88
“滞缓领域”更加“滞缓” 90
注释 91
参考文献 92
延伸阅读 1 女性赋权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96
注释 98
参考文献 99

第二部分 性别平等的促进因素有哪些？阻碍因素又有哪些？ 100
框架阐述 101
框架应用 103
注释 104
参考文献 104

第 3 章 教育和健康：性别差异对哪些领域产生实际影响？ 106
禀赋至关重要 108
教育 109
健康 120
技术附件 3. 1 142
本章小结 145
注释 145
参考文献 147

第 4 章 提高女性能动性 154
女性的能动性非常重要 155
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女性的能动性，但是影响有限 156
权利及其有效贯彻实施塑造女性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161
社会规范阻碍或促进女性能动性的提高 173
女性的集体能动性可以塑造制度、市场和社会规范 181
本章小结 186

注释 187
参考文献 189
延伸阅读 2 养家糊口者的衰落：21 世纪的男性 198
注释 200

第 5 章 就业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 202
理解生产和收入的性别差异 205
第一印象：如何以性别因素解释就业领域的分割现象 214
性别、时间使用和就业分割 219
获得生产性投入的性别差异和就业分割 228
“综合”市场和制度失灵的性别影响 235
突破生产性陷阱：如何突破？为什么要突破？ 240
本章小结 243
注释 243
参考文献 246

第 6 章 全球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已产生的效果及所需采取的措施 258
世界日益一体化：近期趋势与事实 259
贸易开放度和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拓宽了女性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 259
适应还是坐失良机？ 268
全球化也可以促进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平等化 272
老问题，新风险 273
玻璃杯是半满还是半空？世界需要采取公共行动 275
本章小结 276
注释 276
参考文献 278
延伸阅读 3 年龄在增加，身体在发育，时代在发展：青少年男孩和女孩 284
注释 287

第三部分 公共行动的作用和潜力 288
选择正确的政策 289
使政策得以贯彻 289
全球行动议程 290

第 7 章 采取公共行动促进性别平等 292
缩小健康和教育性别差异的政策 293

增加经济机会的政策 301
提高女性能动性的政策 310
避免性别不平等在青少年中跨代延续 321
制定“性别智能”政策：强调“性别主流化” 324
缺乏有力的证据 327
注释 328
参考文献 330

第 8 章 性别平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338
非正规制度——作为变革推动力的社会网络 340
无性别歧视的市场 348
将性别问题纳入正规的制度和政策 353
抓住机遇之窗 357
改革之路 359
注释 363
参考文献 364

第 9 章 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议程 370
全球议程的必要性与重点 370
采取哪些行动及如何行动 372
注释 380
参考文献 380

文献注释 381

背景文件和注释 385

部分指标 389

2012 年部分世界发展指标 397

专栏

专栏 1 我们所说的社会性别平等是什么意思？ 4
专栏 2 “千年发展目标”认识到性别平等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对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 4
专栏 3 21 世纪女性和男性是如何认识性别这个问题的 8
专栏 4 我们所说的市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社会制度各是什么意思？ 9
专栏 5 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哪些措施行之有效？考察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经验 27
专栏 6 催化约旦的女性就业 32
专栏 7 早期干预，克服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失灵——“青少年女孩倡议” 36
专栏 0.1 预测性别平等对发展的影响时所面临的问题 51
专栏 1.1 性别与千年发展目标 60
专栏 2.1 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 88
专栏 3.1 成人死亡风险：谁的死亡率异常？ 122
专栏 3.2 四个非洲 137
专栏 4.1 退休金的覆盖率、数量和未亡人利益对女性的自主能力很重要 160
专栏 4.2 婚姻持续期间（和离婚时）的财产 166
专栏 4.3 寡妇面临着丧失资产的风险，但是可能获得一些自由 167
专栏 4.4 法律多元主义及其普遍性 169
专栏 4.5 做一个“好妻子”和“好丈夫”意味着什么？ 176
专栏 4.6 男子气概及其对责任、偏好和行为的影响 177
专栏 4.7 社会规范为什么持续存在？ 178
专栏 4.8 模式化观念是如何对表现产生影响的？ 180
专栏 5.1 消除获得差距：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近期进展 203
专栏 5.2 董事会中的女性 208
专栏 5.3 雇佣性别歧视？来自就业审计学研究的证据 209
专栏 5.4 就业性别分割的含义是什么？ 210
专栏 5.5 好工作与坏工作：是什么？谁来做？ 215
专栏 5.6 分割的种子早已种下：教育经历的性别差异如何决定就业分割 220
专栏 5.7 对在分析时间利用模式性别差异时所使用数据的概述 222
专栏 5.8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关于异性时间利用模式的看法 225
专栏 5.9 户主性别和家庭组成：对政策最重要的因素 229
专栏 5.10 埃及的家庭组建和公共领域就业 236
专栏 5.11 性别平等和企业案例 242
专栏 6.1 经济机遇增加对女性人力资本的影响：今天的工作或明天更好的工作 262
专栏 6.2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男性（和女性）的影响 263
专栏 6.3 行业任务和技能要求：正确理解术语 263
专栏 6.4 利用移动和信息通信技术改善服务提供 268
专栏 6.5 全球化和工作条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更需要进一步的行动 271
专栏 7.1 改善水供给：达喀尔和金边 296
专栏 7.2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经验 299
专栏 7.3 保护成年男女与未成年男女免受收入冲击的影响 301
专栏 7.4 促进约旦女性就业 306
专栏 7.5 拓宽女性与企业家融资渠道的创新手段 308
专栏 7.6 增强女性在和平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中的话语权 313
专栏 8.1 格鲁吉亚——在新社会中发展性别角色 340
专栏 8.2 女性主义视角 342
专栏 8.3 利益角逐——特权阶级、少数民族、宗教政治与性别 343
专栏 8.4 在公共机关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纳米比亚女性宣言网络 343
专栏 8.5 女性对于投票权的观点差异——以瑞士为案例 344
专栏 8.6 巴西的家政工人 345
专栏 8.7 流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态度 348
专栏 8.8 提高性别多样化的四个成功经验 350
专栏 8.9 秘鲁的土地权属：运用性别透镜的性别中立性计划 354
专栏 8.10 实践中的性别机制 355
专栏 8.11 乌干达离婚法中的法院和宪法挑战 356

专栏 8.12 斐济：家庭法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国际规范 358
专栏 8.13 自下而上改革社会规范 360
专栏 8.14 突尼斯：女性的话语权和权利 361
专栏 8.15 瑞典：鼓励参与式父亲角色 362

图

图 1 家庭、市场与制度的互动带来的性别结果 9
图 2 全世界的女性生育率都在降低 10
图 3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初、中级教育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但高等教育入学率较低，且女性居于相对有利地位 10
图 4 用这个分析框架解释教育领域的进步 12
图 5 所有收入水平上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有所提高 12
图 6 低收入国家在提高女性入学率方面落后 14
图 7 女性的性别劣势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明显 15
图 8 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产业工作 17
图 9 解释持续的男女职业分隔和收入差距 19
图 10 世界各地女性每天用于照料家人和家务的时间多于男性 20
图 11 如果把男女获得和使用生产投入的差异考虑在内，农业生产率的性别差异不再存在 21
专栏图 0.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性别平等呈正相关关系 51
图 1.1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初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而高等教育方面女性还要更胜一筹 63
图 1.2 性别对 12～15 岁儿童教育参与率不平等问题的解释力很小 65
图 1.3 女性寿命高于男性 66
图 1.4 印度只用了 40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只用了 10 年就做完了美国 100 年做到的事情 66
图 1.5 性别对享受免疫服务的不平等解释力很小 67
图 1.6 1980 年至 2008 年期间，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降低了 68
图 1.7 1980 年至 2008 年间，各国各收入水平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所上升 68
图 1.8 谁说大学教育对男性比对女性更重要？ 71
图 1.9 谁说工作机会缺乏时男性比女性更有权获得工作？ 71
图 2.1 在部分国家，女性入学率仍然非常低 75
图 2.2 在某些国家，低收入女性的不平等地位被强化了…… 76
图 2.3 ……但在其他国家，贫困女孩的在校时间高于男孩 77
图 2.4 在低收入国家，生育率仍然很高——而且越是贫困的国家，贫富之间的生育率差异就越大 78
图 2.5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与 1900 年前瑞典的死亡率相当 80
图 2.6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81
图 2.7 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部门（和职业）中工作 82
图 2.8 世界范围内，女性每天用于家务和照料工作的时间多于男性……男性用于市场活动的时间较多 83
图 2.9 谁控制了女性的自有收入？ 85
图 2.10 不同国家中女性对“殴打妻子是正当的”这一观点的看法 86
图 2.11 各国家庭暴力发生率差别很大 86
图 2.12 男性被认为是比女性更好的政治领导者 87
延伸阅读图 1.1 导致地位上升的主要因素 96
延伸阅读图 1.2 坦桑尼亚布科巴（市区）现在和 10 年前的阶梯构成 98
延伸阅读图 1.3 也门共和国扎玛尔（农村）现在和 10 年前的阶梯构成 98
图 3.1 世界上许多地区已经在低层次入学率上实现了性别平等，然而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很低，而且女性占优势 110
图 3.2 在大多数教育成果存在中度或高度总体不平等问题的国家中，因性别造成的不平等不超过 1/5 111
图 3.3 促进学校入学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112
图 3.4 免费初等义务教育降低了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异 113
图 3.5 2009 年 PISA 项目各国平均分数的差异超过了国家内部的性别差异 117
图 3.6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人和儿童死亡率 121
图 3.7 不同时期和不同性别的成人死亡率 122
图 3.8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中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增长并没有降低女性超额死亡率 126
图 3.9 为什么如此多的新生女婴会失踪？ 127
图 3.10 疫苗接种、营养指标或孩子生病时所接受的医疗服务中的性别劣势微不足道或不存在 129

图 3.11 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在医疗机构会得到同样的治疗 130
图 3.12 高收入国家在 20 世纪早期的超额女性儿童死亡率和当今的中低收入国家大体相当 131
图 3.13 1930—1960 年期间，部分国家的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 132
图 3.14 今天的高收入国家在 20 世纪前半期面临着育龄期女性超额死亡的问题 133
图 3.15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女孩和成年女性育龄期的超额死亡 134
图 3.16 在艾滋病感染率很高的四国中根据年龄分组的超额女性死亡率 135
图 3.17 某些国家存在男性超额死亡问题 138
图 3A.1 特定年龄的死亡率性别比率，2008 年 143
图 3A.2 使用不同参照群体得出的 2008 年世界各年龄段超额女性死亡人数 144
图 4.1 目睹暴力活动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实施暴力活动 156
图 4.2 市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限制因素的互相加强是女性能动性进展有限的原因 157
图 4.3 富裕女性结婚较晚 158
图 4.4 家庭越富裕，女性的控制力也越强 159
图 4.5 拉美六国基于性别的土地获得形式 159
图 4.6 出外工作（几乎）平等地拓宽了男性和女性的社交网络 161
图 4.7 在大多数国家中，相对于知识缺少和反对避孕，避孕工具可得性的限制作用较小 162
图 4.8 女孩在继承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快于寡妇取得的进展 164
图 4.9 遭遇家暴的女性很少寻求服务 172
图 4.10 和收入相比较，教育更能抑制规范性限制因素 173
图 4.11 尽管结婚年龄存在差异，许多女孩仍然在 18 岁之前结婚 174
图 4.12 暴力受害者不寻求帮助的原因 175
图 4.13 即使到 2010 年，女性部长具有社会性档案的可能是经济性档案的两倍 182
图 4.14 女性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受到关于女性角色和能力的社会规范与正式制度的限制 183
图 4.15 关于领导力的观念依然盛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偏见更大 183
图 4.16 女性加入政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男性 184
专栏图 4.1 2005 年中国老人的收入来源 160
专栏图 4.3.1 老年女性独居的可能性更大，老年男性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 167
专栏图 4.3.2 在大多数国家中，丈夫的家庭获得他的大部分遗产 167
延伸阅读图 2.1 获得权力的解释因素 199
延伸阅读图 2.2 丧失权力的解释因素 199
图 5.1 收入方面存在系统的性别差异 206
图 5.2 女性在工资工人和无酬家庭工人中的比例很高 211
图 5.3 如果将获得和使用生产性投入纳入考虑范围，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异就会大大降低 212
图 5.4 与正规和非正规领域企业家的生产率差异相比，女性和男性企业家的生产率差异反倒显得小了 212
图 5.5 经济发展与工资就业女性工人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与女性在无酬工作、自就业和创业活动中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216
图 5.6 坦桑尼亚和巴西阐释了就业性别模式如何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改变 217
图 5.7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领域就业分布差异很大的国家中，产业和行业分割模式很普遍 218
图 5.8 经济机遇获得及由此引起的就业分割是家庭、市场和制度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 221
图 5.9 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工作和照料工作，而男性主要从事市场工作 223
图 5.10 市场工作性别时间使用模式的趋同强于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性别时间使用模式的趋同 224
图 5.11 在墨西哥和泰国，与男性和单身女性相比，已婚女性更有可能在不工作或非正规自就业中转换 226
图 5.12 和男性户主家庭相比，女性户主家庭拥有和经营土地的可能性较小 230
图 5.13 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农村地区的女性户主家庭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比男性户主家庭小 230
图 5.14 和男性户主家庭相比，女性户主家庭获得的生产性投入和进入市场的机会较低 232
图 5.15 互相加强的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是女性落入生产性陷阱的主要原因 241
专栏图 5.1.1 参与率：趋同 204
专栏图 5.8.1 低估异性用于非传统男性/女性活动和休闲的时间长度 225
图 6.1 1990 年以来全球贸易迅速增长 259

图 6.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手机与因特网使用都增加了 260
图 6.3 经济机遇发生了变化 261
图 6.3a 发展中国家女性（和男性）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迅速增长，这反映了生产和劳动力在全球分布中更广义领域内的变化 261
图 6.3b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女性（而非男性）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增长相关 261
图 6.4 1950 年至 2005 年期间，美国对脑力劳动的需求大幅度上升，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下降 264
图 6.5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度的男性和女性，尤其是女性经历了对脑力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对体力劳动需求的降低 265
图 6.6 在非洲，女性拥有或使用手机的可能性低于男性 266
图 6.7 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因特网准入与使用的差异仍然很大，而且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性别差异仍然很大 267
图 6.8 近年来远程工作，尤其是女性工人的远程工作迅速增长 269
图 6.9 不同行业中女性就业比例的差别很大 270
图 6.10 2011 年，所有地区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的国家的数量都增加了，在 193 个国家中，187 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270
延伸阅读图 3.1 好女孩/男孩和坏女孩/男孩的特征 285
延伸阅读图 3.2 青少年对女性角色的观点 287
图 7.1 缩小禀赋差异 294
图 7.2 改善经济机会 301
图 7.3 增强女性的社会话语权 311
图 8.1 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中，社会行为者及其互动决定了市场、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作用 339
图 8.2 社会网络能够引起公共舆论、调动支持力量并推动改革 341
图 8.3 全球范围内的男性支持女性的权利和有利于女性的政策 346
图 8.4 经济考虑和政治经济考虑刺激公司提倡性别平等的政策 349
图 8.5 就制定和采纳性别进步性政策而言，国家行动是核心 354
图 8.6 扩大女性权利的进展是重大国际人权会议的中心议题 359

地图

地图 1 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相对于男性 1 美元收入的女性收入） 18
地图 0.1 已经进行了定性评估的经济体 52
地图 3.1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在中国和印度，新生女婴失踪的数量仍然很高，而在非洲部分地区，超额女性死亡大幅度增长 125
地图 4.1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正式承认惯例法，这些法律有时带有歧视性 170
专栏地图 4.2.1 世界各地女性具有不同的财产支配权，对女性而言，这是离婚时或丈夫死亡时事关重大的事情 166
地图 5.1 在考虑个体特征后，就业的行业和产业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性别差异 213
专栏地图 5.1.1 女性劳动力参与：有些国家和地区较高，有些国家和地区较低 203

表

表 1 每年几乎有 400 万名女性“失踪” 16
表 2 全球行动议程概览 40
表 2.1 1990 年至 2008 年间，印度和中国的女婴出生时失踪数量增长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年女性死亡率也增长了 79
表 3.1 学习领域的性别分割：在大多数国家中，女性在医学和教育领域居主导地位，男性在工程学和科学领域居主导地位 118
表 3.2 偏重男孩的新生婴儿性别比和超额女性死亡是世界性顽疾，导致新生女婴失踪、儿童期和生育期女性超额死亡 124
表 5.1 和男性农民相比，女性农民的平均生产率较低 206
表 9.1 全球行动议程一览表 371

序

在过去的 1/4 世纪里，女孩和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识字的女孩和妇女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在 1/3 的发展中国家里，学校里的女生人数多于男生。女性现在占全球劳动力的 40%。而且，在全世界所有地区，女性的平均寿命都超过了男性。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是惊人的——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变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实现同等变化的速度：比如，美国花了 40 年在女童入学率方面取得的进展，而摩洛哥只用了 10 年。

但在某些领域，性别平等所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那些贫困、住在偏远地区、身有残疾或属于少数族群的女孩和女性继续在各方面落后，女孩和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死亡率仍然很高。女性的收入和生产率仍然低于男性，她们在社会上的话语权也相对较弱。而在教育等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男性和男孩处于劣势的性别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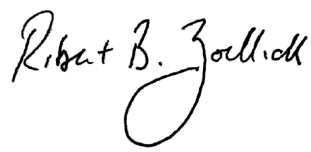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性别平等的进步和性别差异的持续存在对发展结果和政策制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核心发展目标。同时，增强性别平等也是智能型经济学，因为它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改善其他发展结果，包括下一代的发展结果和社会政策和制度的质量。只靠经济发展本身不足以缩减所有的性别差异——采取重点针对那些顽固的性别差异的纠正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这份报告指出了未来政策的四个优先领域。首先，要减少人力资本方面的性别差异，特别要采取措施降低女性死亡率，减少教育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因素。第二，缩小经济机会、收入和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异。第三，减少男女在话语权和能动性方面的差距。第四，限制性别不平等的跨代复制。在所有这些领域，收入的提高对减少性别差异的作用不大，需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在上述每个优先领域都需要采取公共行动来解决导致性别差异的深层原因——对有的问题，需要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尤其是清洁用水、卫生设施和孕产妇保健）；对另一些问题（如收入和生产率的性别差异），则需要解决市场和制度中妨碍性别平等进步的制约因素。

发展伙伴们可以对各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加以补充。在上述四个优先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资金（尤其是帮助最贫困的国家降低女性死亡率和教育的性别差异）；需要更好的分性别数据；需要进行更多试验并进行系统性评估；需要建立更广泛的包括私营部门、发展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在内的伙伴关系。

性别平等是发展的中心议题。它是一个正确的发展目标，也是智能型经济政策。《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有助于各国和国际发展伙伴们认真思考性别平等问题，并将性别平等纳入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项目的规划。



罗伯特·B.佐利克
行长
世界银行集团

致　　谢

本报告由 Ana Revenga 和 Sudhir Shetty 领导的核心团队编写，成员包括 Luis Benveniste，Aline Coudouel，Jishnu Das，Markus Goldstein，Ana Maria Muñoz Boudet 和 Carolina Sanchez-Paramo。Rabia Ali，Maria Ines Berniell，Rita Costa，Nina Rosas 和 Lucia Solbes Castro 为研究提供了帮助。多国量化评估由 Patti L. Petesch 和 Carolyn Turk 协调组织。Andre Croppenstedt，Malcolm Ehrenpreis，Rebekka Grun，Mary Hallward-Driemeier，Tazeen Hasan，Karla Hoff，Ghazala Mansuri，Claudio E. Montenegro 和 Bob Rijkers 也为报告的编写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由发展经济学局（DEC）和减贫与经济管理局（PREM）共同主持完成。这项工作是在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林毅夫和负责减贫与经济管理的副行长 Otaviano Canuto dos Santos Filho 的指导下进行的。Ann E.Harrison 和发展经济学局的团队以及 Mayra Buvinic 和减贫管理与性别处（PRMGE）的团队在报告编写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 Bina Agarwal，Ragui Assad，Anne Case，Alison Evans，Raquel Fernandez，Naila Kabeer，Ravi Kanbur，Santiago Levy 和 Germano Mwabu 组成的顾问小组对报告提出了有益建议。Kathleen Beegle，Laura Chioda，Louise Cord，Maria Correia，Monica Das Gupta，Shantayanan Devarajan，Marianne Fay，Francisco H.G. Ferreira，Ariel Fiszbein，Indermit Gill，Alejandro Hoyos，Emmanuel Jimenez，Elizabeth King，Andrew Mason，William Maloney，Ambar Narayan，Pierella Paci，Tara Vishwanath 和 Michael Walton 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很多世界银行以外的人士也提出了宝贵建议，为报告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名字列在文献注释中）。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和常务副行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Mahmoud Mohieldin 及 Ngozi Okonjo-Iweala 为报告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WDR 编组从诸多磋商、会议和区域研讨中受益良多。与我们进行讨论的包括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代表、学术界人士和发展机构的伙伴，他们分别来自贝宁、波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加勒比地区各国、中非共和国、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格鲁基亚、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马里、墨西哥、摩洛哥、巴拿马、巴拉圭、卢旺达、塞内加尔、斯洛伐克、南非、苏丹、坦桑尼亚、泰国、多哥、土耳其、乌干达、

乌拉圭、越南、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在报告编写的不同阶段我们还与许多多边和双边机构的代表进行了磋商，包括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美洲国家组织—泛美妇女委员会（CIM-OAS）、丹麦国际发展署（DANIDA）、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国际劳工组织（ILO）、芬兰外交部、千年挑战公司（MCC）、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性别网络（OECD-DAC Gendernet）、瑞士发展合作署（SDC）、瑞典国际开发署（SIDA）、联合国妇女署（UN-WOMEN）、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 55 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与会代表。

WDR 编组要对以下机构的慷慨支持表示感谢：挪威政府（通过挪威外交部）、瑞士发展合作署（SDC）、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瑞典政府（通过瑞典外交部）、多个援助机构出资的知识创新项目（KCP）、耐克基金会、世界银行北欧信托基金和“全民教育快行道倡议”非洲发展基金；还有以下提供实物支持的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和经合组织（OECD）。

WDR 编组也要对由 Rebecca Sugui、Cecile Wodon 和 Mihaela Stangu 组成的世界发展报告制作团队和由 Sonia Joseph 和 Evangeline Santo Domingo 组成的资源管理团队提供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我们还要感谢 Ivar Cederholm、Vivian Hon、JimmyOlazo 和 Irina Sergeyeva 对我们的不懈支持。此外我们还收到了来自 Gytis Kanchas 和 Nacer Mohamed Megherbi 的宝贵支持。Vamsee Krishna Kanchi、Swati P.Mishra、Merrell Tuck-Primdahl 和 Roula Yazigi 提供了网站和宣传方面的帮助。

Bruce Ross-Larson 是报告的主要文字编辑。发展数据部门为数据附录做出了贡献，并负责“部分世界发展指标”的内容。Design Symphony 公司为报告的设计做出了贡献。

译校出版与致谢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孵化企业：道纪忠华公共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出版社经过 5 个月的共同努力合作完成的。本书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胡光宇博士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签约并负责译校工作。

本书翻译工作由胡鞍钢教授主持，是继世界银行 2004 年《中国国家经济备忘录　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2005 年世界发展报告　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　公平与发展》、《2007 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与下一代》、《2008 年世界发展报告　以农业促发展》、《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2010 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与气候变化》、《2011 年世界发展报告　冲突、安全与发展》等著作之后，又一重要的学术翻译成果。

在本书的译校工作中赵冰、陈若愚、程喆、董颖霞等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校人员为本书的如期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缩略语和数据注释

缩略语

AIDS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LMPs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ANC	非洲国民大会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RT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TM	自动取款机
AUSAID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机构
BPO	业务流程外包
CARICOM	加勒比共同体
CCT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
CGAP	援助贫穷者磋商小组
CIDA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CIM-OAS	美洲妇女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
CWDI	国际企业妇女领袖
DANIDA	丹麦国际发展署
DFCU	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
DFID	英国国际发展署
EAP	东亚太平洋地区
ECA	欧洲与中亚地区
ECD	儿童早期发展
ECOSOC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
EdAttain	全球教育程度和入学率数据库
EFM	超额女性死亡率
EU	欧盟
EU-SILC	欧盟收入与生活状况统计数据
FAO	粮农组织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ENATRAD	全国家政工人联盟
FGC	女性割礼

FHHH	女性户主家庭
FINCA	国际社区援助基金会
FLFPR	女性劳动参与率
FPE	免费初等教育
GBA	全球银行业女性联盟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ME	埃及性别平等模式
HDI	人类发展指数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2D2	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
ICRW	国际女性研究中心
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TES	信息技术外包
ITU	国际电信联盟
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KCP	知识转换项目
LABORSTA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数据库
LAC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LFPRs	劳动参与率
MCC	世纪挑战账户集团
MDGs	世纪发展目标
MNA	中东与北非地区
MHHH	男性户主家庭
MMR	产妇死亡率
MTUS	多国时间使用研究
NAALC	北美劳工合作协定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GO	非政府组织
NHO	挪威工商联合会
NORAD	挪威发展合作署
NSS	国家统计制度
OECD	经合组织
OECD-DAC Gendernet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性别平等网络
PEKKA	女性户主家庭赋权项目
PETT	专用土地资格项目
PISA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ROBECAT	劳工再培训奖学金项目
REFLEX	就业和职业弹性研究数据库
RIGA	乡村创收活动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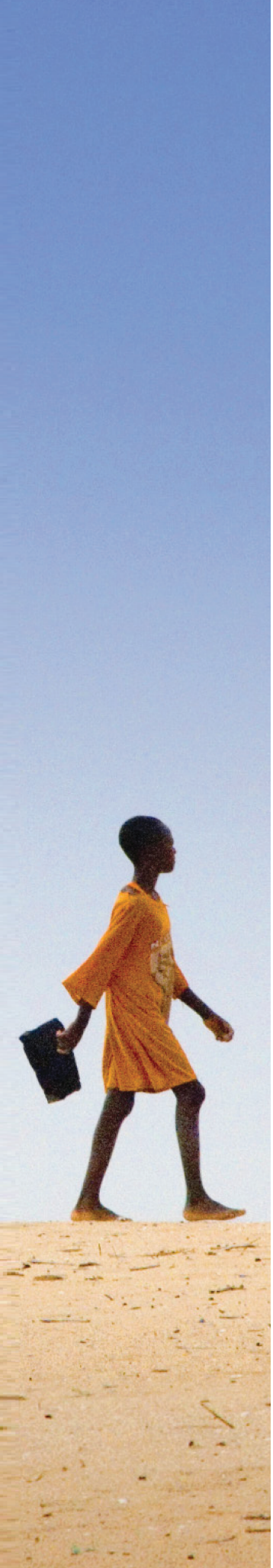
ROSCAs	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R	南亚地区
SDC	瑞士发展合作署
SERNAM	国家妇女服务局
SEWA	印度自就业女性协会
SIDA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
SMEs	中小企业
SSA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UI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HABITAT	联合国人居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FEM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UNRISD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UN WOMEN	联合国妇女署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NGOs	妇女国际非政府组织

数据注释

本报告中各个地区和收入组别中所包含的国家，都列在报告末尾“部分世界发展指标”中的经济体分类表中。收入是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进行分类的，本报告《部分世界发展指标·前言》记录了本报告收入分类的阈值。除非另有说明，以数字和表格表述的各组平均值都是该组各国的未加权平均值。

这里所使用的“国家”一词系其经济含义，并不代表世界银行对某领土的法律或其他地位的看法。“发展中国家”一词系指中低收入经济体，为方便起见，也可能包括那些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同样为方便起见，“发达国家”一词指那些高收入经济体。

注：除非另有说明，美元指现值美元。10 亿（billion）为 1 000 百万，1 万亿（trillion）为 1 000 十亿。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主要内容

性别平等影响发展

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核心发展目标。它也是一种智能经济学。增强性别平等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改善下一代发展成果，扩大制度的代表性。

- **生产率效益。**目前，女性在全球劳动力中的比例是 40%，在全球农业劳动力中的比例是 43%。在全世界的大学生中，一半以上是女性。充分发挥女性的技能和才干，生产率将得到提升。例如，如果女性具有和男性同等的获得肥料和其他投入的机会，马拉维和加纳的玉米产量将增长近六分之一。在某些国家，消除某些领域或行业歧视女性工作的障碍因素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25%。
- **改善下一代发展成果。**增强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力，可以使支出模式朝着有利于儿童发展的方向转变，从而改善经济增长前景。在巴西、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塞内加尔等国情迥然相异的国家，改善女性教育和健康状况都有助于改善孩子的发展成果。
- **决策更具代表性。**性别平等对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赋予女性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可以改变政策选择，使制度更具代表性，更多体现民意。印度对地方层面女性的赋权，增加了洁净水、卫生设施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而女性更需要这些公共物品。

发展已经消除了某些性别差异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女孩和成年女性面临的劣势以最快的速度缩小。其中包括：

- **教育入学率。**就初等教育而言，几乎所有国家都消除了性别差异。在中等教育领域，性别差异在迅速消除，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东亚国家，性别差异甚至发生了逆转，现在是男孩和男人处于劣势。在发展中国家，中学里女生人数超过男生的国家有 45 个，大学里女生人数超过男生的国家有 60 个。
- **平均寿命。**自 1980 年以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女性寿命都超过了男性。而且在低收入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比 1960 年长 20 年。
- **劳动力参与程度。**在过去的 30 年中，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与有偿工作女性人数的增加，5 亿多女性加入了世界劳动大军。虽然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但这些

国家生育率前所未有的降低是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之一。

但是其他差异依然存在

性别不平等仍然盘踞在某些领域，即使富裕国家也未能幸免。最顽固、最具破坏性的差异包括：

- **女孩和成年女性的超额死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死亡。和富裕国家的女性相比，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更容易死亡。据估计，每年不足 60 岁的女性和女孩死亡人数约为 390 万。约 2/5 是未生婴儿，约 1/6 死于垂髫之年，超过 1/3 死于生育期。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数字，尤其是儿童和生育期、受到艾滋病流行最沉重打击的国家的死亡数字，呈上升趋势。
- **女孩就学不平等。**尽管女孩就学在整体上取得了进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许多国家的弱势群体中，女孩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仍然远远低于男孩。
- **经济机会获得不平等。**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是无偿的家庭劳动者或非正规领域的工作者。女性农民耕种的土地规模通常较小，种植的作物收益较小。女性企业家经营的公司规模较小，所从事的行业盈利也较低。结果，世界各地的女性收入低于男性。
- **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差异。**在许多国家，女性，尤其是贫穷女性，对家庭决定的影响较低，可以支配的家庭资源较少。和男性相比，大多数国家的女性较少参与正规的政治活动，在上层机构中代表性不足。

理解性别平等的进展和性别差异的持续

收入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性别平等的全面进展。千真万确，规范或不规范的市场和制度的作用和演变方式、增长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决策互相作用的方式是一些地方性别差异迅速消除的原因。以教育为例。在许多国家中，收入增长（通过减轻预算限制）、市场（通过为女性创造就业机会）和正规制度（通过扩大办学和降低成本）共同对家庭产生影响，促使家庭做出有利于女性和女青年教育的家庭决策。

在女孩和女性面临其他不利条件的地方，性别差异仍在持续。对贫穷地区的贫穷女性而言，巨大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当贫穷和地处偏远、种族和伤残等其他排斥形式交织在一起时，这种不平等问题也就更加严重。以越南的少数民族女性为例。60%的孕妇得不到产前护理，是大民族京族女性的 2 倍。

市场、制度和家庭也可能一起阻碍性别平等的进程。例如，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非常普遍。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时间使用方式、所有权、对土地和资产的支配权以及市场和非正规制度等方面，它们的运作方式都不利于女性。

全球化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贸易开放和信息通信技术成本的降低及其推广通过将女性和市场、经济机会联系起来、重塑性别关系中关于对待男女两性的态度和社会规范、鼓励国家推行性别平等政策，从而有助于降低性别不平等的程度。

国内政策议程优先事项

高收入本身并不能大幅度缩减性别差异。但是政策导向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将重点放在最具发展收益潜力的性

别差异上。这些优先事项包括：

- 在性别差异根深蒂固的地方，应对女孩和女性超额死亡和消除教育领域性别劣势因素的政策议程。
- 消弭经济机会性别差异及由此产生的男女两性收入和生产效率差异的政策议程。
- 缩减在家庭中和社会中话语权性别差异的政策议程。
- 限制性别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政策议程。

针对性的、持续性的国内政策议程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基本条件。这类政策需要针对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这是保证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所在。在母亲死亡率是问题症结所在的地方，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应对阻碍性别平等进展的单一重要约束因素（薄弱的服务提供制度）。在经济机会获得差异是问题症结所在的其他地方，政府需要采取应对多重限制因素的政策，这些限制性别平等的因素可能来自市场机制或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这些限制因素的优先顺序，同时应对它们或按次序应对它们。

- **降低**婴儿期、儿童期和生育期**女孩和女性的超额死亡率**，改善服务提供状况（尤其是洁净水、卫生设施和母亲保健）的政策行动是第一要务。通过扩大洁净水和卫生设施的供给，越南降低了女性青年的超额死亡率。通过改善卫生健康服务、重点关照孕产妇妈妈，土耳其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
- 当贫穷、种族或地理将女孩和青年女性排斥在外时，**为缩减持续存在的教育差异**，政策需要拓宽女孩和青年女性的机会渠道。在性别劣势已经发生逆转的地方，政策要促进实现男孩女孩的性别平等。以入校就读作为现金转移的条件，通常是政策惠及这些群体的有效手段。巴基斯坦已经采用这类转移措施促使贫穷家庭的女孩到学校就读，牙买加则采用这类转移保证濒于辍学的男孩继续留在学校读书。
- **为缩减男女两性在收入和生产率方面的不平等**，就需要采取一揽子政策应对严重影响女性经济机会获得的众多因素。根据环境，应当包括针对以下方面的措施：
  - 消除女性的时间限制，如哥伦比亚为工作妈妈提供儿童看护服务的补贴性日间托儿所计划，或改善基础设施，如南非的乡村电气化计划。
  - 拓宽女性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渠道，尤其是拓宽女性获得土地和信贷的渠道。例如埃塞俄比亚赋予夫妻双方土地共有权，孟加拉国拓宽女性获得信贷的渠道。
  - 解决歧视女性的信息问题和制度偏见问题。如约旦实行定额计划或工作安置计划，如印度奥里萨邦在扩大农业生产时通过女性自助组改革服务提供体制中的性别偏见。
- **为降低在家庭或社会话语权方面的性别差异**，政策需要应对社会规范和信仰、女性经济机会获得、法律框架、女性教育和技能等方面的联合影响：
  - 为实现家庭内部发言权的平等，增强女性对家庭资源控制力的措施和有利于女性提高资产积累能力、特别是增强女性财产权的法律非常重要。摩洛哥近期进行的家庭法改革实现了夫妻双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平等所有权，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之一。
  - 增加女性在社会发言权中的政策包括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实行的政治代表配额制，培养、培训未来女性领导并引导女性更多参与工会和职业

协会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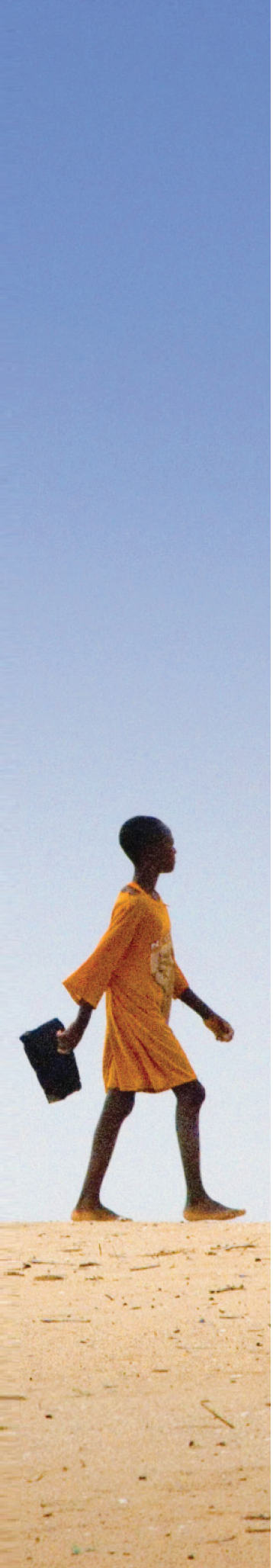
- **为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和青少年、青年成人的沟通弥足重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所做的决定关系到他们的技能获得、未来健康、经济前景和理想实现。因此，干预措施应当重点强调：
  - 建立人力和社会资本（如马拉维的现金转移计划），完善有关教育和健康教育计划回报的信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是让男孩留在学校读书的有效方法）。
  - 以就业和生活技能培训计划促进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比如乌干达）。
  - 宣扬角色模式，实现理想转变。如印度宣传敢于挑战势力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女性政治领袖。

国际社会的作用

国内政策议程至关重要，但是国际社会也可以在这四个优先领域发挥补充作用，它可以通过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效果评估和知识为基于证据的公共行动提供更广泛的支持。

- 某些领域要求调整当前的支持行动，如在教育性别差异方面，确保全民教育快行道倡议覆盖处于劣势的女孩和男孩，或再如在以少女为重点的伙伴关系方面，持续已有的行动。
- 其他领域将需要全方位的新行动或额外行动，如将更多基金、培育创新和知识的一致努力、更有效的伙伴关系等联合在一起的行动。
- 资金尤其应当用于支持最贫穷国家减少女孩和成年女性超额死亡的行动（通过对洁净水、卫生设施和孕妇护理服务进行投资）及消除教育领域持续性性别差异的行动。
- 对提高分性别数据的可得性，培育更多改善女性获得市场机会、服务和公正待遇的机制的试点及其系统性评估，给予更多的支持。
- 伙伴关系应当超越政府和发展机构，包括私营领域，民间社团及发展中和富裕国家的学术机构。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



概　　述

巴鲁阿尼在思考过去十年间伊聚哈尼扬都——坦桑尼亚的一个村庄里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十年前情况真是糟糕，”她回忆说。“女性的状况非常落后，她们只是在家里料理家务。而现在，女性不仅经商，而且还从政。”其他人也有类似看法。“我们不像以前那样依赖男人了，”阿格尼莎说。“我们自己有一些钱，这使我们可以独立于男人，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自主权。”现在不仅有女性经营自己的生意，而且村里的街道委员会成员有一半是女性。

尽管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女性的日常生活还是面临着很多挑战。村里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自来水。更困难的是，唐吉丝和村里其他一些女性仍然对来自生活伴侣的暴力提心吊胆。“他们喝醉酒时就可能对家里的女人和孩子拳打脚踢。最糟糕的事是强迫与你性交。”尽管从法律上来说女性可以继承土地和房产，但传统习俗的力量还是占了上风。街道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弗劳拉说：“没错，妇女可以继承财产。事实上，父亲的遗嘱按理应该给每个儿子和女儿都留点什么，而且现在的法律也严格规定儿女平等。但是，父亲依然会把财产全部留给儿子，认为女儿可以在结婚后获得丈夫家的财产。”

多多玛农村社区报告，摘自“21 世纪性别定义：与世界各地女人和男人的对话——一项关于社会性别与经济选择的多国定性研究”（世界银行 2011）

为什么性别平等与发展密切相关？

坦桑尼亚伊聚哈尼扬都村的故事反映了性别平等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的演进。尽管很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仍继续面临性别带来的劣势，但总的来说情况有所好转——而且改善的速度之快在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女性在权利、教育、健康、获得就业机会和生计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国家从法律上保障女性在拥有财产、继承财产和婚姻等方面具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现在，全世界有 136 个国家在宪法中明确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不得进行性别歧视。

这些进步来之不易。但是，对每个国家、每个女性来说，性别平等所取得的进步有很大差异，而性别平等的各个具体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各不相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女性死于分娩的可能性仍然很高，相当于北欧 19 世纪的水平。尼日利亚一个富裕的城市家庭的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平均获得 10 年学校教育，而贫困农村地区的豪萨女孩平均受教育时间不到 6 个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女性对男性的相对死亡率也高于高收入国家，这在婴幼儿时期和生育期尤为明显。离婚或丧偶使很多女性失去土地和其他财产。女性就业继续集中在那些所谓“女性”职业，其中很多都是报酬很低的职业。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遭受的伤害也更加严重。而且，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女性在政治和商业高级管理层的人数远远低于男性。

这些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禀赋、经济机会、为实现目标而作出选择的能力（能动性）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尤其是那些并不随经济发展而改变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是否重要？本《世界发展报告》（WDR）认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性别不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首先，性别平等本身有其内在的重要意义，因为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选择去生活、免于绝对匮乏是一项基本人权，不管是男是女，对每个人都应当平等。第二，性别平等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其他重要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它作为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一种工具也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平等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沿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将发展视为所有人平等地扩大各种自由的过程。[1] 按照这种对发展的理解，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核心发展目标（见专栏 1）。因此，正如发展意味着减少收入贫困或是使人们获得更为公正的待遇，它也应当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福利差距的缩小。这一观点在国际发展领域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发展机构普遍将妇女的赋权和性别平等本身作为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的目标之三和目标之五对此有明确表述（见专栏 2）。各国对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CEDAW）的广泛签署和批准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公约在 1979 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为提高妇女地位、保障妇女权益建立了一个综合框架。迄今已有 187 个国家批准了这个公约。

性别平等对推动发展很重要——它是智能型经济学

性别平等作为一种发展工具也非常重要。本报告指出，性别平等是智能型经济学：它可以从三个途径提高经济效率，改善发展结果。首先，消除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经济机会及生产投入品的障碍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这在竞争日益加剧、全球化日益发展的环境中格外重要。第二，改善妇女的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有利于其他发展目标的实现，包括可以使其子女有更好的未来。第三，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女性和男性拥有同样的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作出决定、影响政策的机会，这会使发展制度和政策选择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从而走上更好的发展路径。下面将对这几个方面逐一阐述。

女性技能和才能的错配产生很高（且日益上升）的经济代价

性别平等可以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现在，女性约占全球劳动力总

专栏 1 我们所说的社会性别平等是什么意思?

社会性别（gender）指的是与女人和男人分别相关的社会、行为、文化的特点、预期和规范。社会性别平等指的是这些因素如何决定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差异。

本报告重点讨论三个方面的社会性别平等，这三个方面是世界各地——从阿富汗到波兰到南非——的男性和女性所看重的，也是研究人员认为最重要的。它们是：禀赋（教育、健康和物质资产）的积累；通过这些禀赋获得经济机会和创造收入；运用这些禀赋来采取行动，即具备能力/能动性，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福祉。在这些方面缺乏选择机会就会导致福利的差距。每个方面本身都很重要，同时它们之间又密切相关。

性别不平等与基于其他原因——如种族或民族的不平等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其中三个方面的差异对分析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女人和男人的福利状况很难分别进行衡量，由于家庭状况的数据极为缺乏，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第二，由于生物性因素和“习得”社会行为的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偏好、需求及面临的制约可能有系统性差异。第三，性别差异存在于各种收入水平和阶层。这些特殊性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衡量性别平等应当考察结果平等还是机会平等。经济学和哲学文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

那些坚持性别平等应当是机会平等的人认为，这样做可以将那些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的不平等和那些由于偏好和选择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区别开来。很多研究文献都记录了男女在风险规避、社会偏好和对竞争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按照这种思路，如果男女在态度、偏好和选择上有所不同，那么结果的不同就不能全部归结于男女面临的机会差异。

那些坚持性别平等应当是结果平等的人认为，男女在偏好和态度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中是后天习得的，而并不是由于两性有内在的不同。这就是说，这种差异是文化和环境造成的，男性和女性将社会的规范和预期内化，从而导致了两性之间的差别。长期以来男女在权力和地位上的差别可能内化于他们的抱负、行为和偏好，从而使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延续下去。因此，要想定义机会平等而不考虑实际结果是否平等是很困难的。只有试图实现结果的平等才能打破女性缺乏抱负——缺乏机会的恶性循环。

不管理论上的辩论如何，实践中很难把对机会的衡量和对结果的衡量分开。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从理论上和实际衡量中都是密切联系的。正因如此，本报告采取一种实用的方式，既关注与禀赋、能动性和经济活动的机会，也关注这些方面的结果。沿用森的理论，我们也认为人们可能对到底什么是公正公平有不同见解，但他们对消除那些“极不公正的安排”是有共识的。换句话说，虽然人们对性别平等应当定义为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不能达成一致，但他们都同意那些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应当消除。

资料来源：Booth 和 Nolen 2009；Croson 和 Gneezy 2009；Gneezy，Leonard 和 List 2009；Kabeer 1996；Sen 1999；世界银行 2011。

专栏 2 “千年发展目标”认识到性别平等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对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

2010 年举行的“千年发展目标”（MDG）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为在 2015 年前实现八个发展目标而采取的全球行动计划。首脑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采取行动，通过社会性别在发展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主流化确保教育、健康、经济机会和决策方面的性别平等。上述决议和行动计划反映出国际发展领域认为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本身就是发展目标（MDG 之三及之五），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发展目标、减少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的重要渠道。性别平等和对妇女的赋权有助于实现普遍基础教育（MDG 之二），降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MDG 之四），改善孕产妇健康（MDG 之五），减少感染 HIV 病毒/艾滋病的机会（MDG 之六）。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数的 40%，农业劳动力的 43%，全世界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果一国经济要充分发挥其潜力，那么女性的技术和才能就应当用于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的经济活动。但是，很多女性的经历都表明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如果对女性劳动力未能充分利用或出现错配——因为她们在劳动市场

上面临歧视，或是社会习俗使她们无法完成教育、阻碍她们从事某些职业或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报酬——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损失。如果女性农民缺乏土地所有权保障——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特别是非洲国家——她们就很难获得信贷和生产投入品，从而导致土地的使用效率低下，产量很低。信贷和生产投入品等方面的性别歧视也使那些女性领导的企业难以达到男性为首的企业那样的生产效率和利润。还有，如果有能力的女性仅是因为性别原因被排除在管理职位之外，管理层的总体管理技能就会降低，从而减缓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步伐。[2]

这些问题中有很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和制度的运作，而纠正这些问题可以带来很大的直接收益：例如，研究表明，如果确保女性农民可以与男性一样获得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品，马拉维的玉米产量将可提高11%~16%，加纳的玉米产量将可提高 17%。[3] 布基纳法索，仅靠改善女性的产权就可使家庭农业生产增长 6%——这些都不需要增加其他资源投入，而只是将现有生产资源（化肥和劳动力）的管理从男性转给女性。[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实现女性和男性农民获取生产资源的平等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出增加 2.5%~4%。[5] 消除女性从事某些职业或进入某些行业的障碍也会产生类似的积极效果，可将男性和女性劳动者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减小三分之一到一半（见第 5 章），在很多国家，这可以使劳动者的人均产出提高 3%~25%。[6] 但这些益处并不会随着国家逐渐富裕就自动产生：实现性别平等面临的多重且往往相互强化的障碍常常会阻止这些益处的实现。

在当前日益融合的世界经济中，对资源的有效使用对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和推动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加强性别平等提高生产率的益处就更加突出。实际上，最近有研究表明，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开放贸易的全球环境中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损失比封闭的经济环境中所造成的损失更大。[7] 性别不平等损害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女性和男性同样胜任生产这种出口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女性地位更加平等的国家，那些更多依赖女性劳动力的产业往往获得更大发展。[8] 这个关系反过来也成立：那些在更多依赖女性劳动力的产业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中，两性平等的程度也较高。[9] 在那些人口快速老化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欧洲和中亚，鼓励女性进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有助于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缩减的影响。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那些降低性别不平等程度、尤其是降低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及经济参与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的国家，与那些迟迟不采取行动的国家相比将拥有明显的发展优势（见第 6 章）。

女性的禀赋、能动性和机会影响到下一代人

如果女性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力较大，她们就会提高对孩子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积极作用。来自一系列国家（如孟加拉国、巴西、科特迪瓦、墨西哥、南非和英国）的证据显示，如果家庭收入中由妇女控制的份额提高——不管是她们自己的收入还是外来的现金补贴，家庭支出模式所发生的变化将有利于孩子。[10] 在加纳，家庭财产和土地中由女性拥有的份额越高，家庭食品支出就越高。[11] 在巴西，女性自己的非劳动收入对女儿的身高有正面影响。[12] 在中国，成年女性的收入每提高 10%，家中女孩儿的存活率就提

高 1 个百分点，同时男孩和女孩的学校教育时间都会延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家中男性收入提高 10%，女孩的成活率和受教育时间都会下降，对男孩则没有影响。[13] 在印度，女性劳动收入的提高也会增加其子女的受教育年限。[14]

女性自身教育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对其子女的教育、健康等诸多方面也有积极影响。母亲的营养状况与孩子的健康状况和存活率有关联。[15] 女性的教育水平也与孩子的一系列健康指标有正相关——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的疫苗接种率就越高，营养状况越好，死亡率越低。在各种类型的国家，母亲（及父亲）所受教育的年限与孩子在教育上的成就都呈正相关关系；在巴基斯坦，哪怕母亲只上过一年学，她们的孩子与完全没上过学的女性的孩子相比每天会在家多学习一个小时，学习成绩也更好。[16] 女性缺乏能动性——如家庭暴力的情况——会对孩子成年以后的认知行为和健康产生影响。对发达国家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了儿童时期接触家庭暴力与成年后健康状况的联系：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如果小时候经历过家庭暴力，成年后患癌症、中风和心血管病的风险比常人高出 2 到 3 倍，他们酗酒和使用毒品的可能性比常人高出 5 到 10 倍。[17] 无数研究都显示，如果儿童时期经历过父母之间的暴力，成年后女性遭受来自配偶的暴力的风险就会增大，而男性对配偶施加暴力的风险也会增大。[18]

增加女性的个人及集体能动性可以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制度和政策选择

能动性（agency）事关一个人作出选择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实现目标的能力。在所有国家和文化中，男性和女性作选择的能力都是不同的，往往是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性别差异不仅影响女性的福利，而且对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很多方面都有影响。女性的能动性影响她们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本和利用经济机会的能力。例如，在孟加拉国，那些对医疗保健和家庭购买决定有更大控制权的女性营养状况也会更好。女性的能动性也影响着子女的福利。在墨西哥，女性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越大，其女儿做家务的时间就更少（对儿子则没有影响）。

女性的集体能动性可以促进社会的转型。它可以重塑那些限制女性个人能动性和机会的制度、市场和社会规范。赋予女性权力使之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可以改变政府的政策选择，使国家各种制度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反映更多人的呼声。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以后迫使决策者将注意力转向儿童和孕产妇保健等议题，从而使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 8%~15%。[19] 在印度，通过赋予女性地方政治权力（通过政治性的配额制）使公共产品的提供（既包括女性特别重视的供水和卫生设施，也包括男性重视的灌溉设施和学校等）有所增加，同时还减少了腐败现象。[20] 在由女性担任村长的村子里，男性和女性村民支付的贿赂都要低于由男性担任村长的村子，平均低 2.7 至 3.2 个百分点。[21] 在尼泊尔，通过提高女性在森林管理事务上的发言权，大大改善了森林保护工作。[22] 女性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不仅使女性和儿童受益，而且男人也会从中受益。在很多富裕国家，女性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很高，同时也有很多女性活跃在政治领导层，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塑造了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寻求平衡的社会观念，推动了更为“家庭友好”的劳动立法的颁

布实施。

反之，如果女性和男性没有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影响法律、政治和决策的平等机会，那么各种制度和政策就可能系统性地偏向那些影响力更大的人群的利益。这样，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机构制约和市场失灵就不太可能得到解决和纠正，从而使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下去。《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平等与发展》强调指出，可能出现一种“不平等陷阱”，阻碍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获得教育，不能与男性平等获得经济机会，从而降低了她们作出良好选择、实现其个人潜力的能力。[23]

本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本报告的重点是性别平等与发展的经济学。它利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两性福利主要差别的原因——教育和健康，经济机会，对生产资源的获取，以及作出有效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它使用同样的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什么样的政策干预和社会行动可以减少这些性别差异，改善发展结果。本报告的讨论不限于经济方面的结果——实际上，它对人的禀赋、经济机会和女性能动性这三个方面给予同等关注，表明所有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对人的福利的重要性。它并不忽视社会和政治制度——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对性别结果的核心作用。但是，本报告对所有问题的分析角度和支持性别平等的证据主要来自有关社会性别的经济学文献。

我们采取这种做法是出于四个原因。首先，这种方法对发展进程中主要性别结果的出现和演化以及有关政策影响这些结果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些真知灼见。第二，它是建立在世界银行对社会性别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最值得一提的是《将性别纳入发展》报告[24]）和最强专长之上。第三，我们可以填补这个领域中欠缺的重要数据和知识。第四，虽然本报告对问题的分析结论常与其他方法得出的结论类似，但它对可用来支持性别平等的政策手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本报告主要考虑那些影响女性的不平等问题，特别强调那些可能反复出现并传递给下一代的问题。但它也考虑到对男性的不平等影响，不过这些不平等问题对福利的影响范围相对要小一些。

我们采取实证的方法，倾向于进行严谨、基于证据的分析，在可行的情况下分析有关的因果关系。为此，我们参阅了大量关于性别的定量研究，同时用新的分析加以补充，特别是在两性的时间利用、家庭暴力、死亡风险以及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创业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分析。我们也利用了对 19 个发展中国家的 98 个社区中 4 000 多名男性和女性的定性研究，探讨性别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抱负、教育、职业选择、决策及福利的其他方面（见专栏 3）。[25]

像这样一份全球性报告不可能对单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出深入分析，也不可能一应俱全地涵盖性别平等的所有相关方面。本报告提出了一个解释性别不平等的概念框架，就实现性别平等的公共行动提出了建议，而这些行动可根据具体国家、具体问题、具体部门作出必要调整。报告随后阐述了如何使用这个概念框架，重点放在就全球而言性别平等取得最大进展的领域（教育、生育率、平均寿命、劳动参与率和法律权利的扩大）以及那些进展很小或十分缓慢的领域（女性/女童的超额死亡、经济活动的性别分化、收入差距、料理家务和照顾家人的责任、拥有资产的情况以及女性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能动性）。

专栏 3 21 世纪女性和男性是如何认识性别这个问题的

为撰写本报告，世界银行在世界各地的 19 个国家进行了新的实地调查，以便获得对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体验的第一手材料。

所有年龄段、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女性和男性都将接受教育、拥有资产、获得经济机会和有获得收入的机会视为改善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福利的关键。研究人员组织了对 500 个焦点小组的访谈，总结出在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女性和男性扮演的不同角色和职责：妇女的职责大多与照顾家庭和家庭生产相关，而男性则与收入和决策相关。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这清楚地表明在当前这个男性和女性都有新机会、面临新需求的世界里，人们正在重新定义性别角色。

调查结果也显示虽然在新的环境下出现了新挑战，但老问题也依然存在。很多团体面临各种不利条件，对他们来说，变化只是对未来几代人的希望，而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可以发生的现实。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1。

注：这项调查针对 98 个社区（约 4 000 名个体）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这些社区分别位于拉丁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秘鲁），欧洲和中亚（摩尔多瓦、波兰、塞尔维亚），非洲（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苏丹、南非和坦桑尼亚），南亚（阿富汗、不丹和印度），中东（西岸和加沙、也门），东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 “我认为一个女人必须受教育，必须工作，这样才能向社会证明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
>
> ——位于西岸和加沙的拉法市的一名年轻女性

> “女性应当工作。如果我能到外面工作，我为什么要待在家里？我也应当挣钱，我家人和我自己应该可以享受我挣的钱。以前，我们的母亲一辈子只能向丈夫要钱，哪怕是买内衣这样的小事。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钱，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工作。”
>
> ——坦桑尼亚布可巴市的一名年轻女性

以世界银行[26]和其他机构过去和最近在性别与发展方面的工作为基础，报告提出可以将性别结果看作家庭对市场和制度的运行和结构所作出的反应。这里所说的市场和制度既包括正式的市场和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市场和制度。每个家庭都要决定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要孩子，在女儿和儿子的教育和健康上花多少钱，如何分配家庭内外的各种任务，以及其他影响性别结果的事务。

> “我认为女人也应该出去找一份工作，因为现在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找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她们的选择更多。”
>
> ——南非冈尼亚美尼农村的一名年轻男性

他们所作的选择是基于各个家庭成员的偏好、面临的激励和制约，也基于不同家庭成员在这些事务上的相对发言权和讨价还价的权利。一个人的偏好受到性别角色、社会习俗和社会网络的影响（这些我们统称为非正式制度）。一个人面临的激励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土地市场和商品市场），市场决定了家庭所作出的决策和投资得到的回报。而制约是由正式制度（包括所有与政府运作相关的制度）和市场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不过也反映出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见专栏 4）。家庭成员的话语权和讨价还价能力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包括他们对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他们离开家庭的能力（退出选择）和社会规范等。这样，家庭决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与性别有关的各种结果（见图 1）。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服务提供制度）对性别结果的影响显然可以通过这一框架来理解：这种影响通过家庭、市场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而体现出来。图 1 解释了这个过程。“增长”箭头使齿轮向性别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动，而“性别平等”箭头又导致经济增长的齿轮转动，即性别平等的改善反过来又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性别平等在哪些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

对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和女童来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她们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以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例，发展中国家女性出生时的

专栏 4　我们所说的市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社会制度各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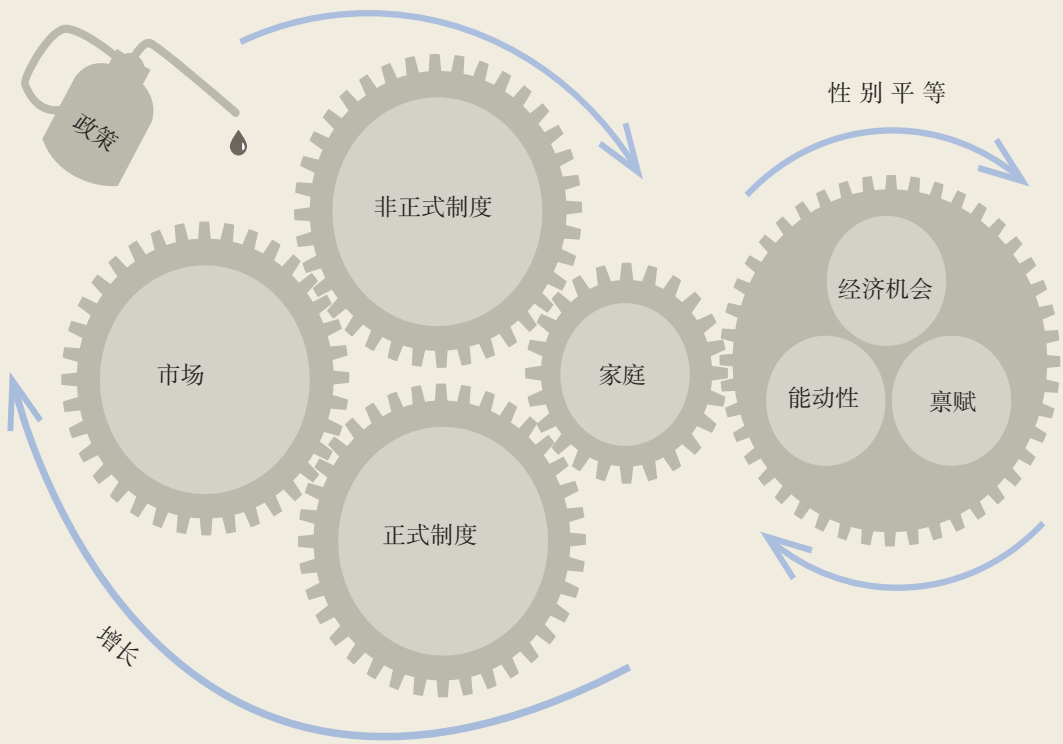
市场是使卖方和买方可以在一系列规则约束下交换任何产品和服务（的控制权）的各种安排。市场使被交换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得到评估并形成价格。

正式制度是指所有与国家职能有关的方面，包括与国家提供的各种服务（如司法服务、政策服务、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有关的法律、监管框架和机制。

非正式社会制度是指影响社会互动但与国家的职能无关的机制、规则和程序。本报告关注的非正式制度是性别角色、观念、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性别角色为男性和女性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行为规范提供了指南。人通过社会化进程习得性别角色，同时这种角色通过文化产品得到阐释，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贯彻，从而产生很大影响。扮演性别角色的反复经验影响着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特性的看法以及人们对自我身份的感知。社会规范指的是那些来自社会上有普遍共识的观念、由非正式的社会力量实施的行为模式。这些规范可以从很多方面影响家庭内部的谈判力：它们限制着对哪些问题可以磋商谈判；磋商谈判可以决定或限制各方的谈判；它们可以影响磋商谈判如何进行；对这些社会规范本身也可以进行磋商谈判，它们也可能发生变化。社会网络指的是那些影响一个人的机会、信息、社会规范和观念的社会关系和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纽带。

资料来源：Agarwal 1994，1997；Fehr，Fischbacher 和 Gätcher 2002；Kabeer 1999；Sen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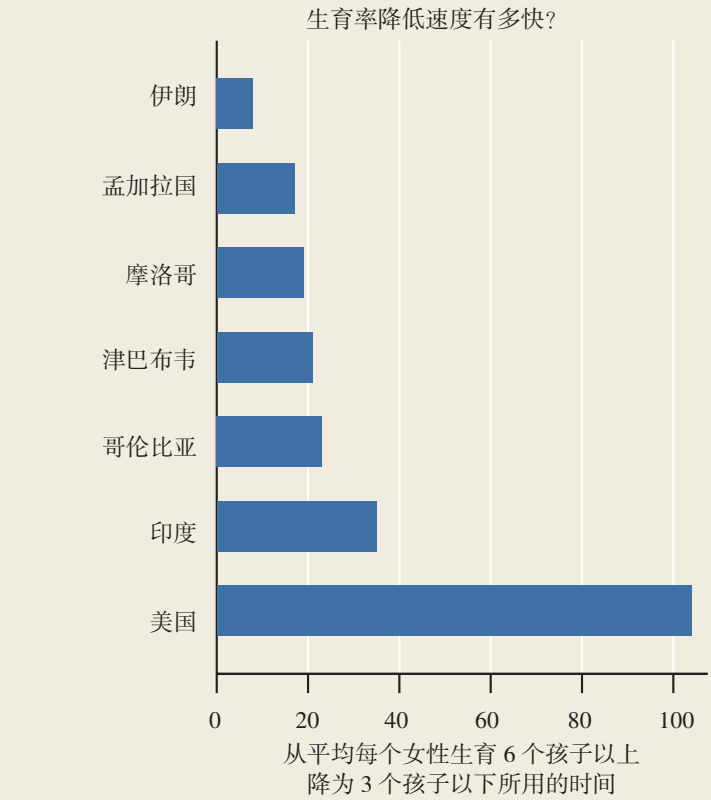
图 1　家庭、市场与制度的互动带来的性别结果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预期寿命大大增加（多数地区过去 50 年里增加了 20~25 年），到 2007 年全球女性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71 岁（而男性只有 67 岁），现在世界所有地区女性的预期寿命都要长于男性。与现在的富裕国家当年的改善速度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改善速度要快得多。比如，美国女性从人均生育 6 个孩子降低到 3 个孩子用了 100 年时间，而印度只用了 35 年，伊朗用了不到 20 年（见

图 2 全世界的女性生育率都在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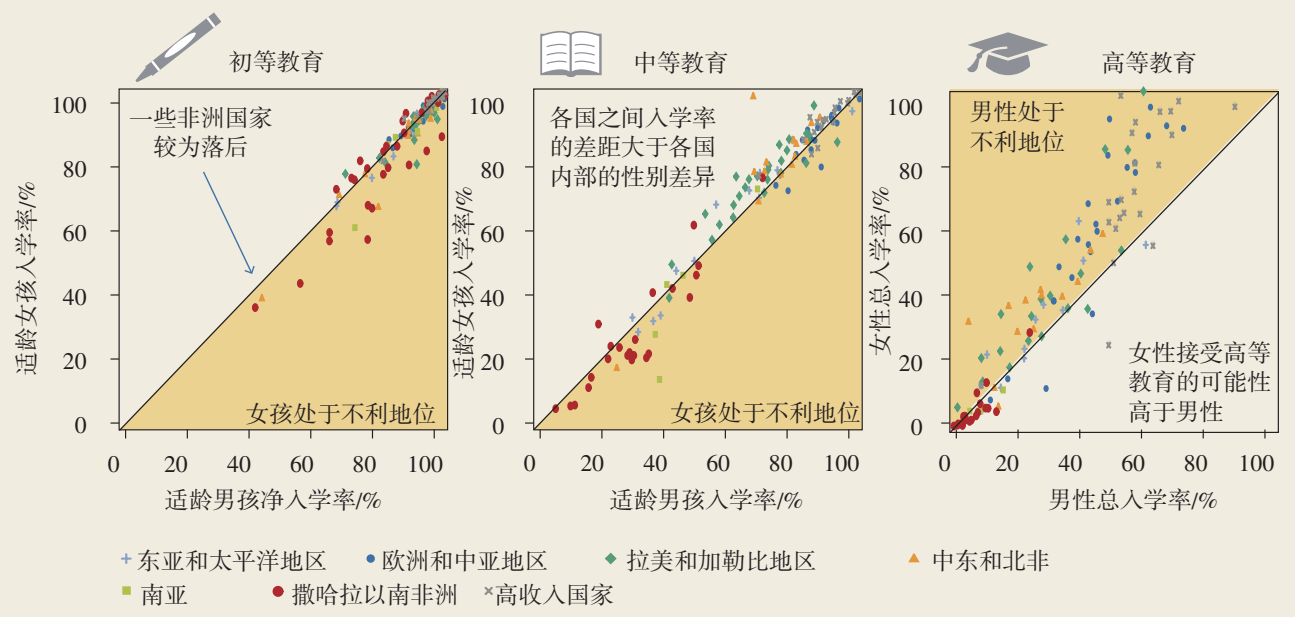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www.gapminder.org。

图2)。初级教育也是同样。美国用了40 年时间(1870—1910) 才使 6~12 岁女童入学率从 57%提高至 88%，而摩洛哥实现类似的提高只用了10 余年(从 1997 年的 58%升至 2008 年的 88%)。

女童教育

全球在消除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教育的性别差异方面取得了持续稳步的进展。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出现了反向的性别差异，即男孩和男青年处于劣势。这在高等教育上尤其突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实现了初等教育入学率的男女平衡，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接受中等教育的女孩人数超过男孩（见图 3)。即使在那些仍存在较大性别差异的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西非)，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现在，上大学的女性超过男性，这是传统模式的一个重大逆转。自 1970 年以

图 3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初、中级教育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但高等教育入学率较低，且女性居于相对有利地位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的数据估算。
注：以上每个图中的 45°线显示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异，高于这条 45°线意味着女性入学率比男性高。

来，全球女性大学入学率增长了 7 倍多（而男性只增长了 4 倍）。尽管男孩的劣势慢慢地在一些地区出现，但存在女孩劣势的地方，这种劣势往往在她们年龄更小的时候出现，而且程度更深。

女性的市场就业

在过去的 30 年里，经济机会的日益扩大吸引了很多女性到市场上就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而有所提高。从 1980 年到 2008 年，男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 32 个百分点缩小到 26 个百分点。到 2008 年，女性占在全球劳动力中的比例是 40%。有些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起点很低但增长幅度很大（主要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中东北非地区），另一些国家的起点很高但这段时间出现了小幅度下降（主要是东欧和中亚），这样不同地区的参与率逐渐趋同，不过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地区差异。中东北非和南亚的妇女劳动参与率最低（分别是 26%和 35%），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高（分别是 64%和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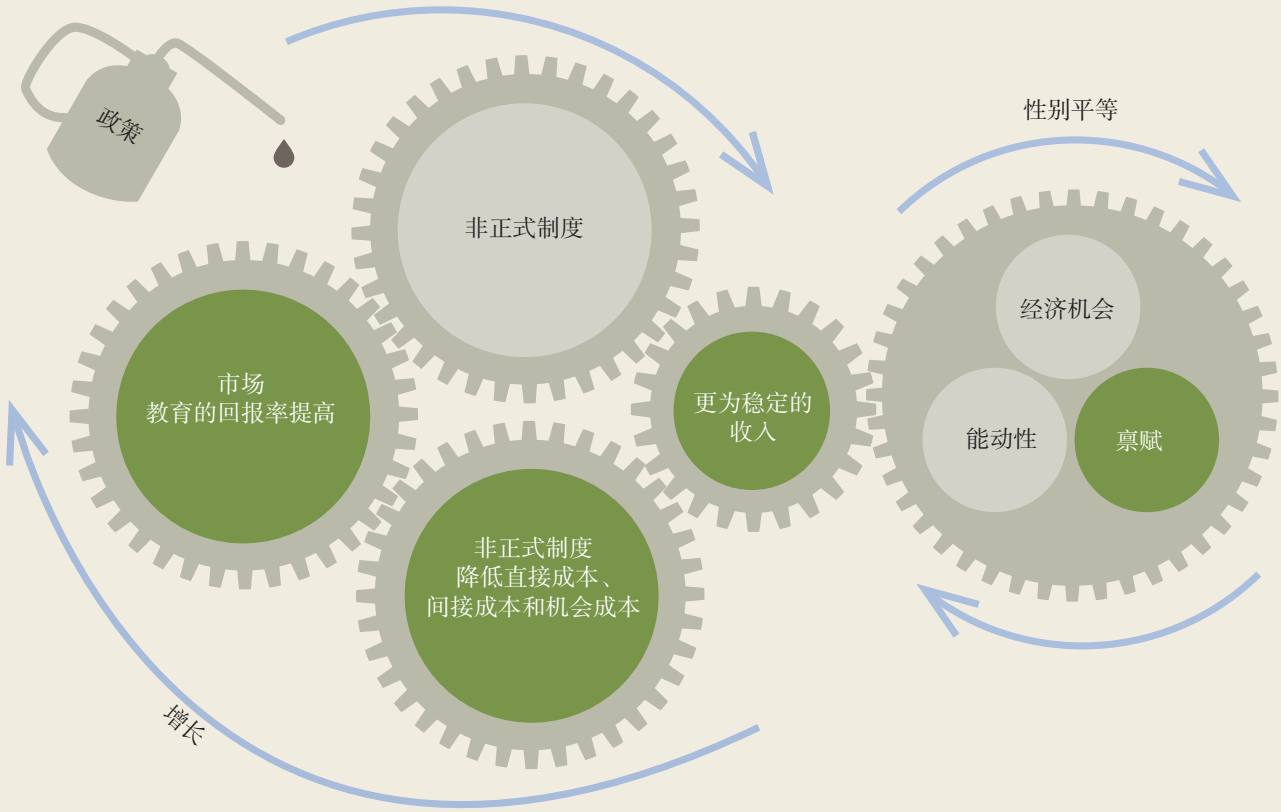
如何来解释至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

性别差异的迅速缩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和制度的运作和演变，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又体现在家庭所作的各种决定里。以教育为例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一考虑。随着收入的提高，那些原来只能送儿子上学的家庭也可以让女儿去上学了。随着国家日益富裕，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那些男性并不享有优势的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转变为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机会，每个家庭都会对这些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让女孩接受更多教育。国家变得富裕之后，也会增加对教育体系的投入，建造学校，聘请教师，使孩子们可以更方便地就学。如果激励和问责机制再有所改善，这些投入就更有助于提供更好、价格更低的教育服务，降低居民家庭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成本，增加教育服务的利用。有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教育的性别差异就会迅速降低。摩洛哥就是这种情况。

即使上述这些渠道中出现了个别的瓶颈——比如家庭中更偏爱男孩，或是教育服务不足，或是经济增长缓慢，或是女性的就业机会有限，其他的渠道依然可能对女孩的教育产生推动作用。鼓励儿童上学的专门政策也可以发挥作用，例如，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对送孩子上学的家庭进行现金补贴（很多国家专门针对女童上学进行补贴，如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图 4 说明了上述因素之间的互动，代表家庭、正式制度和市场的绿色齿轮转动都推动了教育性别差异的缩小（而有关的扶持政策则发挥了“润滑油”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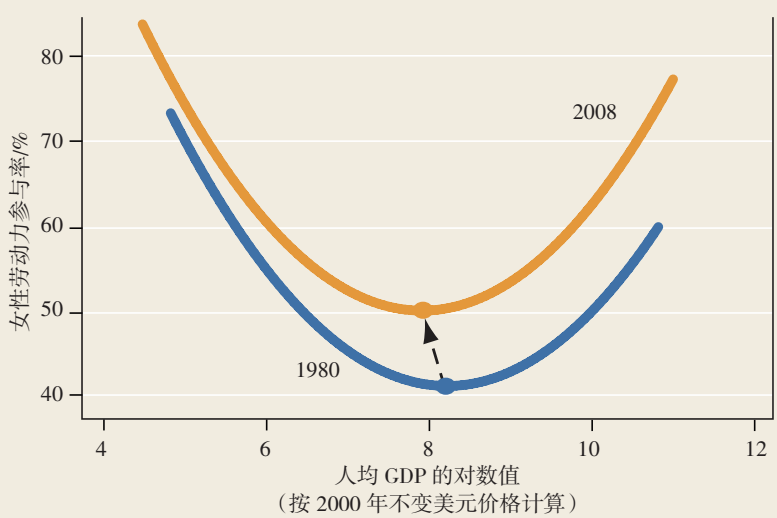
家庭、市场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也可以解释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模式及其变化速度。女性要决定是否在家庭以外工作，既与她自己可以挣得的工资有关，也与其家庭收入有关。随着低收入国家逐渐走向富裕，女性参与市场就业的比例会有所降低，因为她们的家庭收入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的富裕，正式制度也会有所变化——比如增加教育投入，女性的教育水平日益提高。收入的增加也会使她们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推后，孩子的数量减少。这些因素都会促使女性回到劳动力市场。在 10 个拉美国家，过去 20 年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几乎有 2/3 可以归功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组建家庭行为的变化（晚婚、低生育）。[27] 收入增长和女性工资提高的这

图 4 用这个分析框架解释教育领域的进步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图 5 所有收入水平上女性劳动参与率都有所提高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0））对 130 个国家的统计得出的计算值。

些不同影响导致各国妇女劳动参与率呈 U 形分布（见图 5）。但值得注意的是，自 1980 年以来，不管是哪种收入水平的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有所上升。因此，对任何人均收入水平来说，现在参与家庭以外经济活动的女性都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性别平等领域情况改善的速度快于今天的富裕国家在相当收入水平时期的改善速度，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速度比当年那些国家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自 1950 年以来，有 13 个发展中国家在 25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 7%的年平均增长率，这是 20 世纪后半期以前从未出现过的。[28] 第二，性别平等的诸多领域

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个领域的进步会促进其他领域的进步。例如，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也减少了孕产妇死亡率，而孩子减少使女性可以有更多时间来获得人力资本，参与经济活动。着眼未来的父母会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作出反应，加大对女儿的教育投入。这些受到更好教育的女孩长大以后也更可能到家庭以外工作，生孩子较少，在家庭事务中有更大话语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因此，生育率的降低、教育的改善、女性能动性的提高以及女性的市场就业不仅相互关联，而且相互强化。公共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过去数十年里对全民教育的有力推动帮助所有的儿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我们从中获得的主要经验是：如果市场信号、正式制度和收入增长同时发挥作用，支持对女性的投入，性别平等就可以得到而且确实得到迅速改善。即使非正式制度（如关于女孩和男孩、女人和男人怎样行事才算“恰当”的社会规范）的调整和适应需要更长时间，改善依然可以发生。这并不是说社会规范在决定性别平等结果方面不重要。实际上，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在消除教育的性别差异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等方面表现出的不同，正说明了社会规范的影响。但是，几乎在所有地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都发生了迅速变化，这表现在女孩受教育和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经济回报率提高的情况下，社会规范可以很快地作出调整。我们来看看孟加拉国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情况迥异的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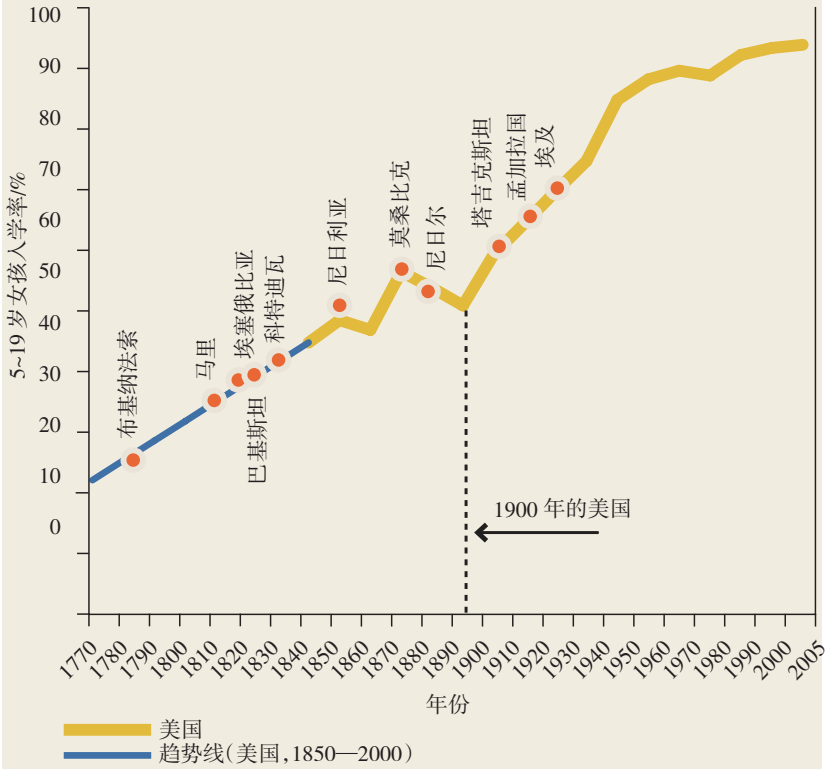
- 在孟加拉国获得独立以后的40年里，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从 7 个降为 2 个多。1991 年女童入学率只有 1/3，而 2005 年则升至 56%。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短短几年里，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就增长了一倍多。

- 在哥伦比亚，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05 年间，妇女从平均生育 3.2 个孩子降到 2.4 个。女性也扭转了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现在女性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完成率已经超过了男性。而且，哥伦比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长是该地区最快的，现已成为拉丁美洲女性参与率最高的国家。很多女性处于管理层的位置，也有很多从事金融业——打破了哪怕在很多富裕国家都依然难以打破的“无形的障碍”。

弱势人群的问题

市场、服务提供制度和收入增长这几方面共同作用，使教育、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等方面的性别差距缩小。但是，它们并没有惠及所有人。对贫困女性和生活在极端贫困地区的妇女来说，严重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如果除贫困之外再加上其他导致被排斥的因素——如民族、种姓、种族、位于边远地区、残疾或性取向等，这些差距就会更加严重。即使是在教育领域，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性别差异有所降低，但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南亚某些地区的小学和中学女童入学率却几乎没有什么提高。马里的女童入学率只相当于美国在 1810 年的水平，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见图 6）。在很多国家，现存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贫困人口中。比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收入最高的 1/5 人口中女孩和男孩的入学率已经相当，但对收入最低的 1/5 人口来说，女孩受教育的年限比男孩

图 6 低收入国家在提高女性入学率方面落后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国际收入分配数据库（I2D2）的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1760—1840 年的数据是根据 1850—2000 年女性入学率数据变化趋势推算的。

要少近 5 年（见图 7）。

除贫困人口以外，那些因为民族、地理距离和其他原因（如残疾或性取向）而处于劣势的群体，性别差异也非常大。全世界 2/3 不上学的女童是其所在国家的少数民族。[29] 危地马拉土著女性的文盲率为 60%，比土著男性高出 20 个百分点，是非土著女性的两倍。[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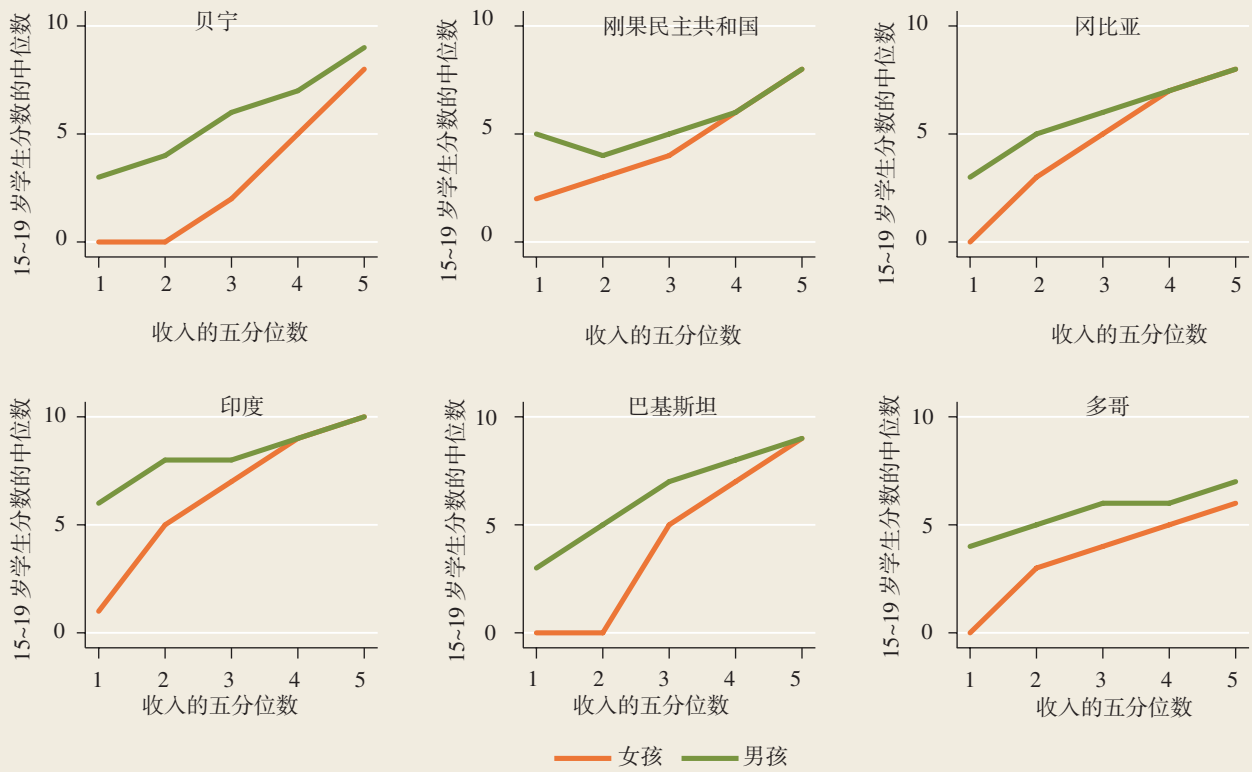
对这些处于严重劣势的群体来说——他们可能是零星的，也可能是整个国家或地区——那些有助于女童和年轻女性接受教育的推动力没有一项在发挥作用。收入增长可能不够普遍，贫困家庭无法从中受益。由于女性面临的经济机会不多或其他因素——如由于民族、种族或种姓制度妨碍她们获得这些机会，市场也没有发出鼓励女性接受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明确信号。由于贫困、位处偏远地区和存在的歧视，她们所在地区并没有增加学校和教师，教育服务的提供充满各种问题。这并不是说那些在其他地方有助于女孩接受教育的渠道在她们这里就不发挥作用；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为推动性别平等取得进步打下基础（广泛的收入增长、女性就业机会的扩大和有效的公共服务）。而且，可能还需要专门针对那些加剧性别不平等的各种劣势进行干预（见第 7 章）。

在哪些方面性别不平等仍持续存在？原因是什么？

与那些取得很大进步的领域相比，对很多女性和女孩来说，性别平等的其他很多方面进展十分缓慢甚至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女童和女性的过高相对死亡率所反映的女性在健康方面的劣势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性别不平等问题也持续存在，如经济活动中的性别隔离，男女收入差距，男女对家务和照料家人的不同负担，对资产的拥有，以及私营和公共领域女性能动性面临的制约。很多地方尽管经济繁荣发展，但在这些领域却鲜有进步。实际上，即使是那些最富裕的国家，上述性别不平等现象也依然存在。

性别不平等在这些困难领域之所以“滞缓”存在，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类问题可能只有唯一的制度和政策解决方法，但实行起来很困难，或是很容易受到阻碍。我们将用女性超额死亡率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二，如果相互强化的多重制约因素共同阻碍进步的产生，性别不平等就会长期持续。我们将用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男女收入差距和就业中的性别分隔）

图 7　女性的性别劣势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明显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EdAttain 数据估算。

和能动性（男女在社会话语权及家庭决策过程中的差异）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三，如果性别角色和社会规范有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异——比如谁应该照料家人、做家务，女性和男性学习哪些专业、从事哪些工作、对未来有什么抱负是“可接受的”，等等，那么这种差异就特别难以消除，而且往往会代代相传。下面我们对此逐个加以讨论。

女童和女性的高死亡率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女童和女性对男性的相对死亡率高于高收入国家。为对这种过高的女性死亡率（“失踪”的女童和女性）进行量化并找出死亡发生的主要年龄段，本报告对每个国家在 1990 年、2000 年和 2008 年每个年龄的女性超额死亡作出了估算。[31] 某个特定年份的女性超额死亡指的是前一年那些如果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就不会死去的女性的人数——事先已扣除了所在国综合医疗状况的影响。全球来说，60 岁以下的女性当中，每年出生时和出生后的超额死亡约有 390 万人，其中 2/5 是未能出生，1/5 是在幼儿和儿童时期死亡，剩下的 2/5 发生于 15~59 岁（见表 1）。

经济增长并未使这个问题消失。1990 年至 2008 年，未能出生的女婴和女性出生后的超额死亡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婴幼儿超额死亡的下降被撒哈拉以南非洲育龄女性超额死亡的的大幅增加所抵消。非洲育龄妇女超额死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但是，经过对人口调整后，尽管亚洲所有国家的女性超额死亡都有所下降（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

表 1 每年几乎有 400 万名女性“失踪”

世界各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超额死亡，1990 年和 2008 年（单位：千人）

	出生时的女婴		5 岁以下女童		5~14 岁女童		15~49 岁女性		50~59 岁女性		所有女性（60 岁以下）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中国	890	1 092	259	71	21	5	208	56	92	30	1 470	1 254
印度	265	257	428	251	94	45	388	228	81	75	1 255	85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53	183	203	61	77	302	751	50	99	639	1 182
HIV 病毒高发国家	0	0	6	39	5	18	38	328	4	31	53	416
HIV 病毒低发国家	42	53	177	163	57	59	264	423	46	68	586	766
南亚（印度除外）	0	1	99	72	32	20	176	161	37	51	346	305
东亚和太平洋（除中国以外）	3	4	14	7	14	9	137	113	48	46	216	179
中东和北非	5	6	13	7	4	1	43	24	15	15	80	52
欧洲和中亚	7	14	3	1	0	0	12	4	4	3	27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	0	11	5	3	1	20	10	17	17	51	33
总数	1 212	1 427	1 010	617	230	158	1 286	1 347	343	334	4 082	3 882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和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署 2009 年数据估算。

注：由于四舍五入，各地区相加所得之和不一定与总数一致。

越南有大幅下降），但新世纪以来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都没有什么变化。那些受 HIV/艾滋病冲击最大的国家情况跟以前相比反倒恶化了。

本报告所作的分析可以解释这种变化模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女童和女性死亡的原因不同。那些在出生时消失的女孩反映了家庭中明确的性别歧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儿子有强烈的偏好，同时也是由于生育率下降，而现代技术使父母可以在孩子出生前就知道其性别。[32] 这是中国和印度北部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现在正在向印度其他地区扩散），但在高加索的某些地方和巴尔干半岛西部也存在。

婴幼儿时期女童的死亡不能仅由人们对儿子的偏好来解释，不过对女孩的歧视可能加剧了这一问题。与其说这一时期的死亡是歧视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不良的制度迫使家庭没有更好的选择，尤其是在用水和卫生方面。单靠市场和家庭无法弥补这些公共服务的不足。

育龄女性的死亡主要来自两个因素。首先，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的部分地区。孕产妇的高死亡率是导致生育期女性超额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阿富汗、乍得、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尼日尔、塞拉利昂和索马里，每 25 名妇女中就有至少 1 人死于由怀孕或生产引起的并发症，由于生育而带来长期健康问题的比例更高。[33]

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收入的增长不相匹配。印度尽管近年来经济迅速增长，但其孕产妇死亡率几乎是斯里兰卡的 6 倍。在过去 20 年里，只有 90 个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40%或更多，而 23 个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不降反升。主要问题

还是人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这是一系列公共服务失败的结果。世界上很多地方还存在一些影响家庭行为的社会习俗，即使在那些有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地方，这些习俗也使女性很难尽快获得这些服务。而与低收入相关的高生育率也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更加恶化。

第二，HIV 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对很多东非和南非国家的女性死亡率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感染 HIV/艾滋病的比例比男性更大，这是因为她们更容易被感染，同时她们的性伴侣往往年纪更大，也比年轻男子更可能携带 HIV 病毒。此外，那些发生过低烈度冲突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失踪”的女性数量也有所增加。这与那些发生全面战争的国家（如厄里特里亚）的情况形成了对比，在那些国家，战争时期男性“失踪”的数量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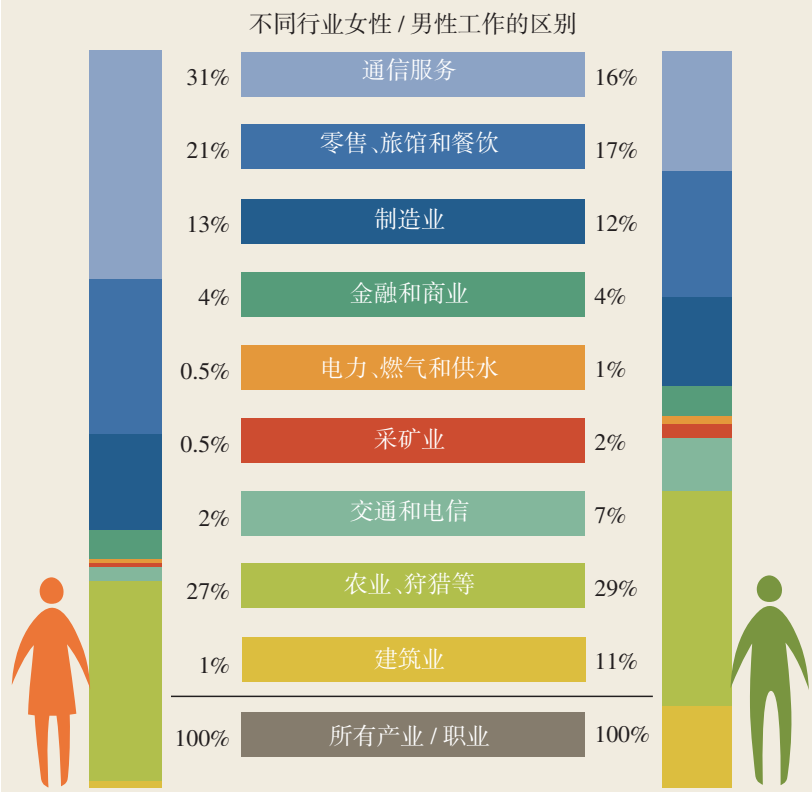
对西北欧国家和美国历史经验的考察显示它们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婴幼儿期和生育期女性死亡率很高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在 1900—1950 年间就消失了。这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质量有所改善——可以提供清洁用水、良好的卫生设施和孕产妇保健服务。因为解决女性死亡率问题只有改善制度这个唯一的切入点，问题的解决就十分困难——大大难于女童上学问题。但是，出于对人类公正的最基本考虑，全球发展机构必须把这一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经济活动的性别隔离和收入差距

虽然过去 1/4 世纪里发展中国家已经有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没有转化为男女之间就业机会的平等或收入的平等。女性和男性往在不同的“经济空间”工作，而这种模式并未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太大变化，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在几乎所有国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从事生产率较低的经济活动，她们也更可能在家庭经营中就业——拿工资或不拿工资，她们还更可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在农业生产中，特别是在非洲，女性比男性耕种的土地面积要小，种植的经济作物较少。作为企业家，女性经营的企业往往小于男性，而且经常集中在“不那么赚钱”的行业。在正式就业中，她们也集中在所谓的“女性”职业和部门中（见图8）。这些经济活动中的性别分隔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变化，但没有完全消失。

由于这些差异，各类经济活动中男女收入和生产率的差距持续存在——不管是从事农业、工资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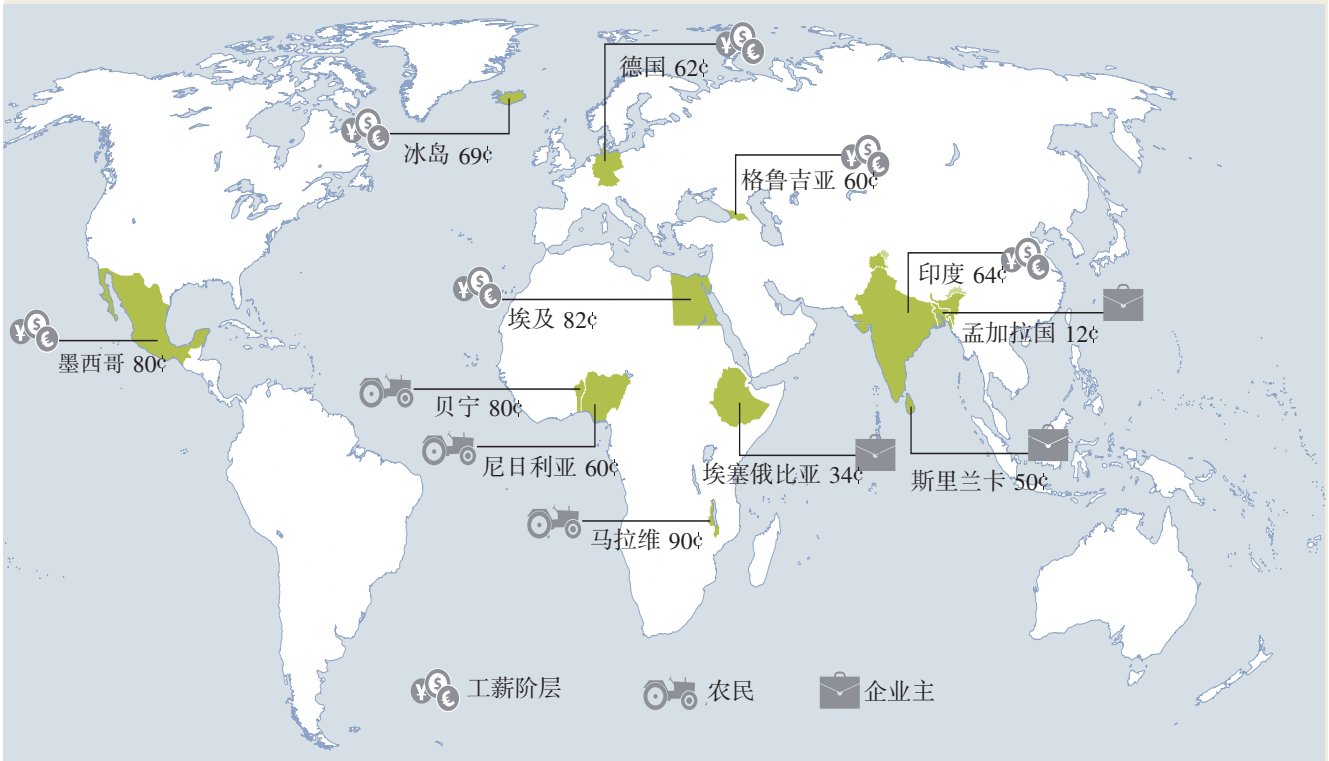
图 8　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产业工作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 77 个国家的统计数字得出的估算值。

注：由于四舍五入，各部门数据相加所得之和不一定与总数一致。

地图 1 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相对于男性 1 美元收入的女性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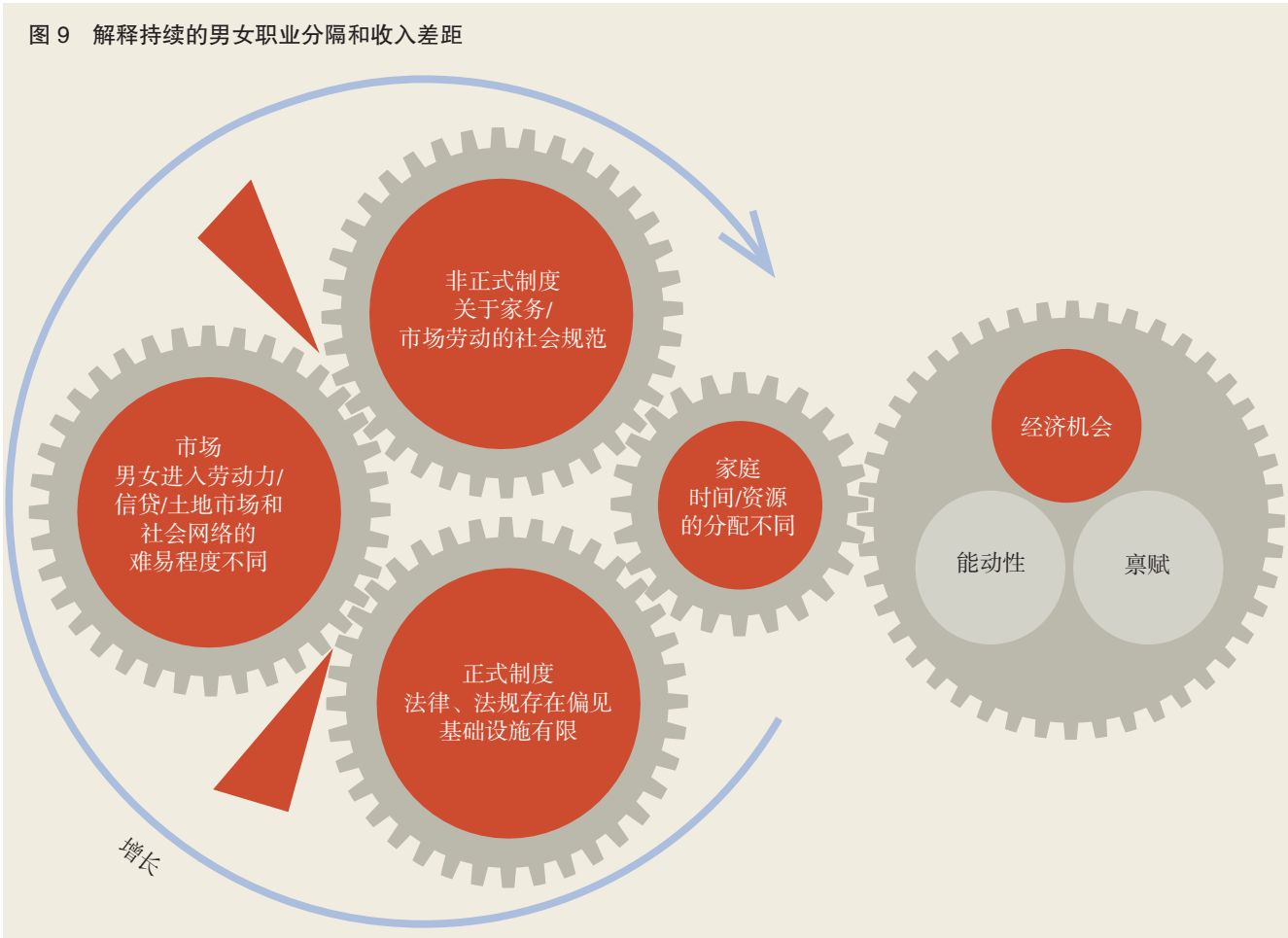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贝宁的数据来自 Kinkingninhoun-Mêdagbé 等（2010）；马拉维的数据来自 Gilbert，Sakala 和 Benson（2002）；尼日利亚的数据来自 Oladeebo 和 Fajuyigbe（2007）；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的数据来自 Costa 和 Rijkers（2011）；埃及、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和墨西哥的数据来自 LABORSTA，国际劳工组织。

还是自己经营企业（见地图 1）。几乎在所有国家里，在制造业就业的女性收入都要低于男性。在农业中，妇女耕种的农田平均产量低于男性耕种的农田，哪怕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或者种植相同的作物。[34] 女性企业家的生产率低于男性企业家。[35] 在东欧、中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地区，女性管理的企业每个工人所创造的增加值低于男性管理的企业。[36] 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农村地区，妇女经营的企业和男性经营的企业的利润差别也十分显著。[37]

那么，如何解释经济活动中这种持续的性别分隔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呢？本报告认为，不同性别在时间利用、对资产和信贷的获取等方面的差别以及市场和正式制度（包括法律和监管框架）对他们的区别对待都对女性可获得的机会产生了制约。这些制约由图 9 中的楔子代表，它们妨碍了性别平等的进步。收入增加对改变这些模式虽然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将其彻底消除。这些因素之间互相强化，使这种模式的打破变得格外困难。下面我们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一考虑。

男性和女性投入照料家人和其他家务的时间不同，这是导致经济活动中的性别分隔及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在大多数国家，不管收入高低，妇女承担的家务大大高于男性，而男性主要承担在外工作（见图 10）。如果把所有的活动都加起来，女性一般来说

图 9　解释持续的男女职业分隔和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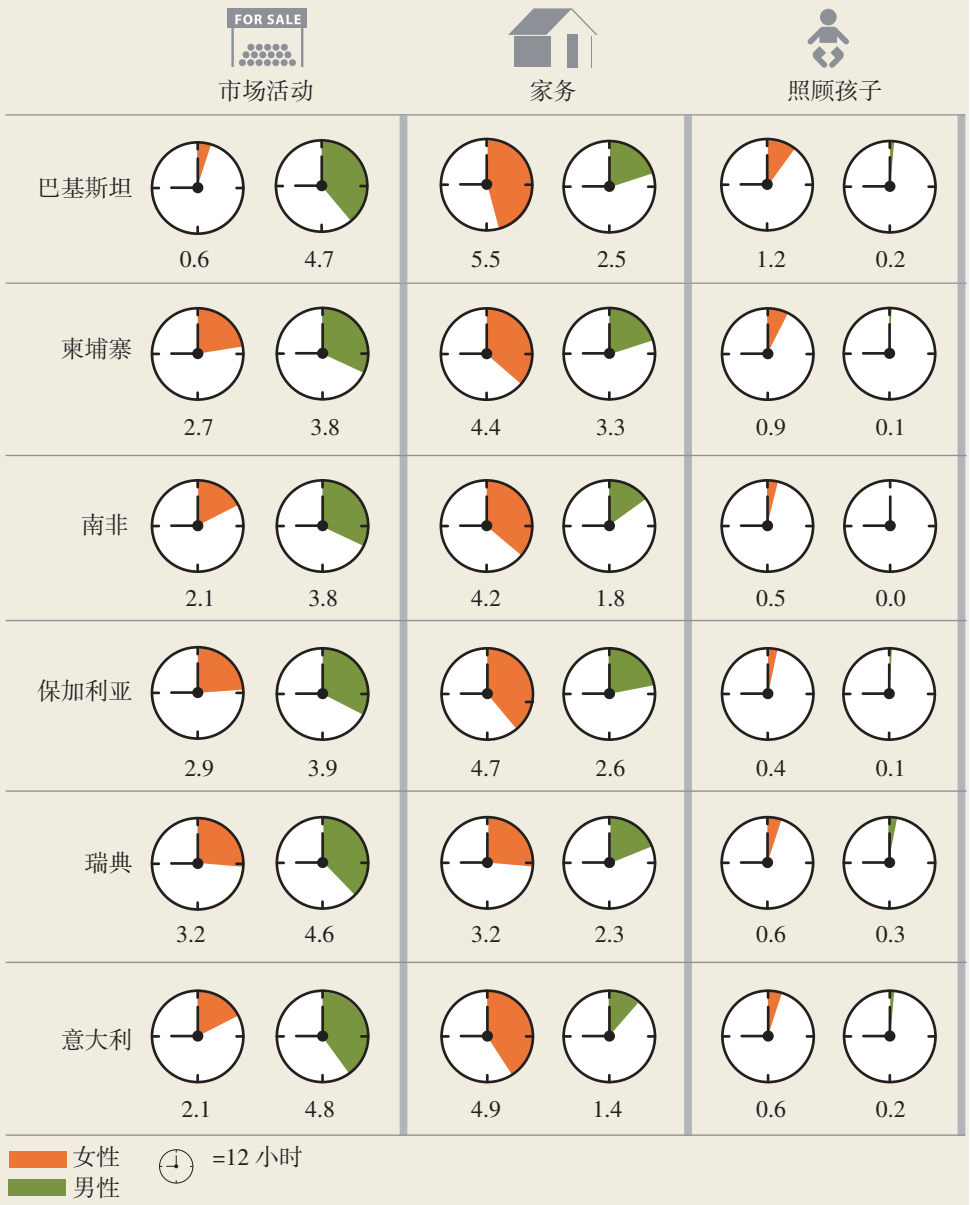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工作的时间要长于男性，这对她们的休闲和健康产生了影响。在所有地方，妇女用于照顾家人和家务的时间都多于其男性伴侣：她们做家务的时间要多出 1~3 小时，她们照料家人（孩子、老人和病人）的时间是其男性伴侣的 2~10 倍，而她们用于市场经济活动的时间则要少 1~4 小时。虽然现在女性从事的市场劳动份额有所上升，但她们仍对照顾家人和料理家务负主要责任。而这些模式在结婚和生育之后只会更加突出。

造成男女就业分隔和收入差距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在人力禀赋和物质禀赋（包括对资产和信贷的获取）的差异。尽管女性所受教育有所提高，但女性和男性的人力资本依然存在差异。年纪较大的女性所受的教育低于男性，而对较年轻的群体来说，女性和男性在选择学习哪些课程方面也有差别。这种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就业隔离，尤其是在那些大多数年轻人都上大学的国家。在农业和自我创业者中，男女在获取生产投入（包括土地和信贷）以及资产拥有方面存在的重要差异是导致生产率差异的根源。实际上，如果把男女获取农业投入的能力不同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女性农民和男性农民的产量差别就完全消失了（见图 11）。而上面提到的男女在“市场时间”上的不同可能也使他们在获取投入方面的差异更加

图 10 世界各地女性每天用于照料家人和家务的时间多于男性



资料来源：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

复杂，因为女性的“市场时间”相对较少，那么同样的投资给女性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就不如男性明显。这些制约因素综合起来，女性企业家和农民往往只能从事那些利润较低的经营活动，她们扩大生产和经营的可能性也较低。

在获取资产（特别是土地）、信贷和其他投入品方面的性别差异究竟有多大？各种来源的数据都表明这个差距很大。来自 5 个发展中地区的 16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与以男性为户主的家庭相比，其拥有和耕种土地的可能性要小。[38] 一般说来，如果一项数据里既包括男性农民也包括女性农民，女性农民很少对

她们耕种的土地有所有权。例如，在巴西，女性只拥有 11%的土地，而且每个女性拥有的土地数量普遍小于男性。在肯尼亚，女性在全国注册的土地持有者中只占 5%。[39] 在加纳，男性平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是女性的 3 倍。[40] 在农民对化肥和良种的使用以及企业家对信贷的使用上也存在类似的巨大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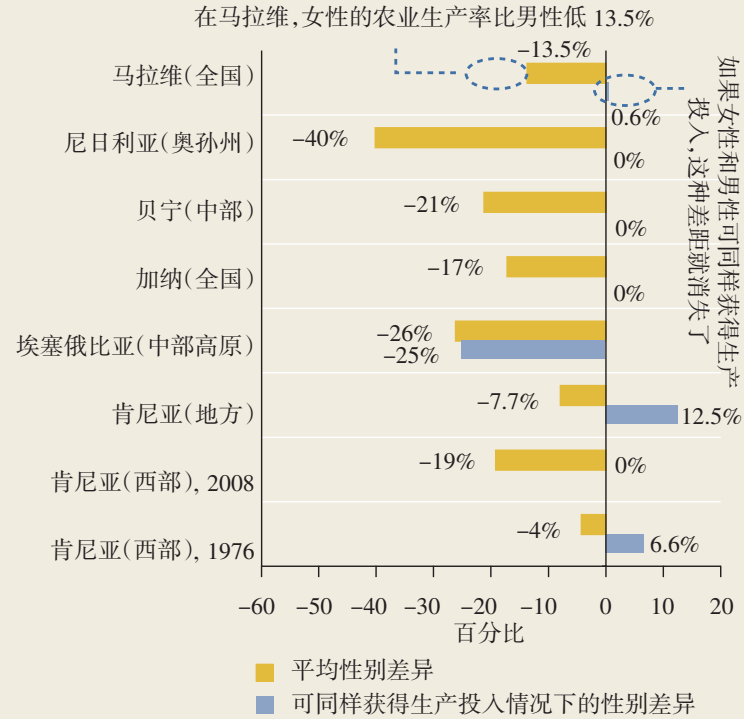
第三，市场失灵和制度制约也是造成男女就业分隔和收入差距的原因。对女性来说劳动力市场往往不能良好运行，尤其是在那些女性参与较少的行业和职业。如果一个行业或职业里只有很少的女性，那么雇主就可能对女性的生产率以及是否适于从事该工作抱有歧视；如果没有能修正这些观念的机制，它们就会长期存在。此外，获得就业信息、职场提升等所依靠的关系网络往往具有性别性，这使女性更难进入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同样也会使男性难以进入由女性主导的领域——如护理）。有些情况下，女性进入某些行业或职业还面临法律障碍，这些法律往往作为对女性的保护措施存在。

总的说来，女性无论是务农，经营企业，或是成为工人，很多人都陷入一种“生产率陷阱”：她们在不公平的条件下辛勤工作，且无法与男性平等地获取生产投入。这种陷阱给女性的福利和经济机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从而也严重阻碍了对未来女性的投资。

在社会和家庭决策中话语权较小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女性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小于男性。以女性在政治（特别是高层政府）的代表为例，政府部长级位置中女性的比例不足 1/5。女性的代表不足现象也存在于司法和工会系统。这些模式并没有随着国家的逐渐富裕而发生改变。从 1995 年到 2009 年，女性议员所占的份额只是从 10%增长到 17%。

图 11　如果把男女获得和使用生产投入的差异考虑在内，农业生产率的性别差异不再存在



资料来源：Alene 等 2008；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Kinkinninhoun-Mêdagbé 等 2010；Moock 1976；Oladeebo 和 Fajuyigbe 2007；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Vargas Hill 和 Vigneri 2009。

一名女性对家庭支出——包括用于孩子的支出——有多大话语权是其能动性的重要标志。马拉维 1/3、印度 1/5 的已婚妇女不参与家庭的支出决定，甚至不能决定对她们自己的收入如何支出。即使在土耳其这样一个收入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在收入最低的 1/5 人口中，1/4 的已婚妇女对她们自己挣得的收入缺乏控制。[41] 女性拥有、控制和处置财产的能力也与男性不同——有时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但更常见的是实际操作中的差异。像上面提到的问题一样，这些模式并不随着国家的富裕而迅速变化。

家庭暴力是女性缺乏能动性的一

个明显表现。暴力是自由的对立面，它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胁迫，而且从其定义本身就否定了能动性。女性遭受来自其生活伴侣或其他相识的人的暴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来自陌生人的暴力的可能性。女性被其伴侣杀害、严重伤害和施加性暴力的可能性也大于男性。[42] 不同国家家庭暴力的普遍程度差别很大，而且这与收入没有明确的关系；虽说社会经济条件越差，家庭暴力事件往往越多，但暴力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在某些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圣保罗和伯南布哥地区）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多达 25%的女性报告说曾遭受过来自其伴侣的身体暴力。[43] 在秘鲁（库斯科）几乎 50%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成为严重身体暴力的受害者，而在埃塞俄比亚（布塔基拉），54%的妇女报告在过去 12 个月里曾遭受过来自生活伴侣的身体伤害或性伤害。[44]

女性在各种事务中缺乏话语权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在社会生活中代表不足可以是一种自我持续的现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无法表现她们的领导能力。由于女性政治领导人很少，选民就无法对女性领导者的能力作出准确判断。女性参与政治的能力可能也受到“政治是男人的事”或“女人不能成为像男人那样有效的领导者”等普遍存在的社会观念的制约。这些观念很难打破，除非有相当多的女性成为政坛的领导者，从而达到改变现状所需的“临界点”。男女在照料家人方面所承担的不同责任也意味着女性参政不像男性有那么多时间和灵活性。此外，女性缺乏现有的支持网络，这使她们在政党或工会等组织中的晋升比男性更加困难。

决定女性在家庭事务中话语权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她的收入和她对家庭财产的控制。经济增长可以改善女性行使其能动性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较富裕的家庭里女性对家庭事务的话语权也更大。但家庭收入的提高本身不足以改善女性行使其能动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女性自己的收入和财产以及她离开家庭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她讨价还价、影响家庭决定的能力。在印度，女性如果拥有财产，那么她在各种家庭事务中的话语权就会大大提高，她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45] 同样，在哥伦比亚和南非，女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她们对重要家庭决定的控制力就越大。这两个国家也有证据表明女性的财产、收入以及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与家庭暴力存在关联。[46]

但是，如果由于市场运行不当，或其他性别障碍限制女性的经济机会，使她们难以拥有财产，那么女性在家庭的话语权就会长期被抑制。此外，那些主张应由男人——而非女人——来作重要家庭决定的社会规范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市场和法律方面的影响。

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性别结果里最具“滞缓”的方面可能就是性别不平等的模式会随着时间推移被不断复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规范以及它们对家庭的影响变化很慢。女性和男性都会将社会规范和期待内化，这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抱负、行为和偏好，而且也会影响其子女。“年轻人调查”项目考察了埃塞俄比亚、印度安德拉邦、秘鲁和越南的 12 000 名儿童（包括男孩和女孩）在 8 岁、12 岁和 15 岁时的教育期望和非认知技能。[47] 在孩子 12 岁时，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期望更大，而秘鲁和越南的父母对女孩期望更大。而到 15 岁

时，这种性别偏好就已经传给了孩子，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男孩对自己的教育有更高的期待，而越南对女孩的期望更高。而且，到 15 岁时，能动性指标显示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男孩有很强的优势，但在秘鲁和越南则没有这种差别。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显示，家庭和工作场所对女性的态度也代代相传。如果一名女性不在家庭以外工作，她的女儿成年后到外面工作的可能性就会相对较低，而她的儿子娶在外工作的女性为妻的可能性也会相对较低。[48] 年轻男性和女性往往倾向于学不同的专业——女性偏爱教育和人文学科，而男性则偏爱工程、农业和科学。这种模式与其能力并没有关系（见第3章），但却一代代地重复，而且并不因为收入的提高而改变。还有证据表明儿童时期看到的家庭暴力在长大后也会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重复。[49] 例如，在海地，那些曾经目睹过家庭暴力的女性自己也更可能报告说自己是身体暴力或性暴力的受害者。[50] 柬埔寨和墨西哥的情况也类似。[51] 在南非，那些表示目睹过父母之间暴力的男性自己施用暴力的可能性也大大高出其他人。[52]

社会规范可能是在家庭中习得的，但也常常被市场信号和制度加以强化，因为它们可能在很多方面带有性别偏见。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男女在家务和照料家人方面所负责任的差异，其根源是关于性别角色的社会观念，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以及托儿服务的缺乏也加剧了这种差异。男性和女性在学习专业方面的分化也是家庭决策（关于什么适于女孩、什么适于男孩的观念）、制度（性别化的教育体系）和市场（性别化关系网络和职业分隔）这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关于家庭暴力，实证研究也发现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因素都有重要的解释力，同时社会观念和制度失灵（包括保护性法律和服务的缺乏或是法律实施和服务提供的欠缺）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因素的影响。[53]

这些性别差异的持续存在告诉我们什么？

有些市场和制度（正式和非正式的）可能不利于性别平等——而且它们往往相互强化。有些时候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失灵，如医疗保健服务的缺乏往往影响女孩的健康，增加孕产妇死亡风险。另外一些时候市场不能良好运行，造成不利于女性的结果，如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对女性的歧视所表明的那样。不过，那些对男女区别对待的正式制度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失灵。法律、法规对女性能动性和机会的制约可能大于对男性的制约，比如女性和男性拥有财产的权利常常不同；有时法律、法规可能对女性的工作时间和行业进行限制，但不限制男性。在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已经歧视女性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的法律、法规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对男女的区别对待也可能通过不那么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使服务的提供产生偏见，比如农业推广服务：在这个领域，制度偏见和市场结构（女性从事非粮食作物的生产较少，而这类作物往往是技术推广服务的重点）会强化甚至加深性别不平等。

所有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有一定的惰性。它们往往反映那些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群体的利益，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集体能动性或发言权则很难改变。[54] 社会规范的改变可能尤其缓慢：这些规范可能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发挥了某种作用，现在虽然

已经没有用处，但它们会仅仅作为一种习惯而存在，或者第一个打破规范的人会受到某种惩罚，或者这些规范使社会上的某个团体从中受益（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个受益团体就是男性）。这些规范早已失去了当初存在的理由，但它们的继续存在可能导致性别不平等长期持续下去。

总之，对两性区别对待的市场失灵、制度制约和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范共同作用，强化了性别不平等，并使改善性别平等成为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如果存在多重制约，那么所有制约都需要解决。

该做些什么?

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不会自动地促进所有方面的性别平等。原因之一是收入提高和政府服务的改善只能减少某些领域的性别差异。即使在这些领域所能实现的改善也无法惠及所有女性。而在性别平等的其他领域，如职业的性别分隔及女性的能动性方面，收入增长和服务改善对消除那些导致持续性别差异的多重制约的效果要差得多。

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性别差异的缩减。首先，开放的贸易和信息技术的传播给女性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加强了她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加了她们的经济机会，有助于提高她们的经济力量。第二，城市化的发展和对更多信息的获取使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能够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和道德规范，包括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这可能会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第三，由于全球对加强女性经济、社会和政治赋权所形成的共识日益增强，性别平等状况会影响一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因此各国政府就性别平等采取行动的意愿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内措施来消除在禀赋、能动性和经济机会方面残存的性别差距，全球化推动性别平等的潜力就无法充分实现。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各国政府应当做些什么来促进性别平等呢？它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性别不平等领域？它们应该先从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干预措施着手，还是把重点放在扩大女性的经济机会和能动性方面？应当采取哪些政策组合，而且以什么样的顺序实施这些政策？乍看起来，这些问题可能显得太多太复杂，因为有多个优先领域，可用的政策工具也不少。这份报告说明，通过好的分析，可以减少政策选择和设计的复杂性。

制定性别平等政策，首先要确定哪些方面的性别不平等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评判标准：

- 首先，哪些性别差距对扩大福利和保持发展最为重要？也就是说，解决哪些性别不平等问题可以产生最大的收益？
- 第二，如果国家变得富裕起来，哪些差距会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在哪些领域收入增加本身对减少性别差距效果甚微？
- 第三，对这些优先领域中哪些领域过去未能给予充分重视或是采取的措施不当？也就是说，在哪些方面重新调整政策会产生最大的收益？

使用这些标准，我们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应当成为决策者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 减少人力资本禀赋的性别差异（解决女性超额死亡问题，消除部分地区在教育方面仍存在的性别劣势）
- 消除收入和生产率的性别差异
- 减少在发言权方面的性别差异
- 控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不管这种传递是由于禀赋差距、经济机会不平等还是能动性不同而形成的。

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优先领域都适用于所有国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将决定它应采取哪些纠正措施。

我们的分析也强调，在选择和设计政策时需要对准性别差异的成因而不是结果。本报告的第二部分所提出的框架突出了这些导致性别差异的原因，并解释了市场、制度、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家庭的交互作用如何导致了这些因素的形成。换句话说，这个框架指明了需要去解决哪些问题，干预行动是应该针对市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还是这三方面的某种结合。

找出了引起性别差异的原因之后，本报告援引来自很多不同类型国家的政策干预经验，对在不同情况下行之有效的具体干预措施提出指导。报告还探讨了改革涉及的政治经济问题，强调政策的设定和实施必须与本国的制度、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相适应。

减少人力资本禀赋（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政策

要解决人力资本禀赋方面的性别差异——即女性在生命周期中特定时期的超额死亡和教育中依然存在的性别劣势，就要建立和改善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制度。及时向孕妇提供基本保健服务、改善清洁用水的供应和家庭卫生设施，这些措施将对减少女性超额死亡产生很好效果。教育服务的改善需要重点针对那些当前由于贫困、民族、种性、种族或地理环境而处于劣势的群体。这将有助于解决贫困人口和被排斥的人群中的教育性别差异。

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来自需求一方，也可以来自供给一方，但无论如何，它们不能性别盲视。恰恰相反，措施的设计和实施需要明确考虑导致健康和教育结果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而且必须听取政策想要触及的那些人——被排斥的女性和女孩以及与她们共同生活的男性和男孩——的意见和呼声。

减少女性超额死亡

女性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超额死亡的主要原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快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超额死亡是由于家庭偏好或市场及制度运作的失灵造成的。因此政策的切入点就由在每个阶段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决定。

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是世界上某些特定地区的问题，包括中国，以及印度、高加索和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一些地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家庭对儿子的偏好，而一些地区收入的迅速增长更加剧了这种偏好，因为收入提高使人们可以更容易地使用超声技术来进行性别鉴定。因此，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应当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颁布实施禁止滥用性别选择技术的法律。印度和中国都已经这么做了，但经验显示，如果不采取在多数国家都不可行、会引发其他道德问题的严苛措施的话，这种法律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真正实施。而且，由于这一问题更多存在于这些国家相对富裕的群体，因此各种限制措施的实施就更加困难。

第二个方面——也是更可能取得成效的方法——是让每个家庭充分看到女儿的价值。扩大年轻女性的经济机会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途径，这有利于人们随着经济发展改变对儿子的偏好。韩国是为数不多的在很短时间内就扭转了女性在出生时的超额死亡的国家，它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55] 另外，还可以为生女孩的父母提供一些财务激励（如印度某些邦实行的“我的女儿，我的骄傲”项目），同时

支持媒体开展宣传，改变人们对性别的传统观念。

在婴幼儿时期女童超额死亡的根源不在家庭或市场——尽管这两方面可能使情况恶化。其根源是制度失灵，不能良好地提供清洁用水、卫生设备、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婴幼儿时间女性超额死亡率高的国家正是那些传染病负担仍然很高的国家。今天的富裕国家就是在 20 世纪早期通过改善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消除了女童的超额死亡。在过去 20 年里大幅度降低了女童超额死亡的国家，如孟加拉国、中国和越南，也是通过这一途径实现了其目标。因此，要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失踪”的女孩“重新出现”，有关国家必须投资建立必要的体系，向所有人而不只是富人提供充分的供水、卫生和垃圾处理服务。这些服务将惠及所有儿童，不过传染病的减少往往会使女童受益更多。

有关国家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如果用今天的富裕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那么，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管道将清洁的水输送到用水点。其他办法，如仅仅在源头进行水处理，对减少因腹泻造成的死亡效果欠佳，因为水有再次受到污染的可能。[56] 因此，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个制度框架，不仅有效扩大供水系统，而且保证贫困人口也可以获得并负担得起供水服务。

具体的解决方案将取决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但以下几个要素是至关重要的。

- 说明政府干预之必要性的恰当法规。
- 对服务提供者的充分激励，使其对决策者更加负责。
- 加强对服务提供者和决策者双方的问责的措施。

在城市地区提供清洁用水将要求把重点放在改善合同构架上，在某些情况下，还要加强私营部门的参与。在马尼拉，这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从 1997 年到 2009 年，自来水的覆盖率从 67%提高至 99%；同时，自来水流失量减少，运行成本降低，从而提高了服务效率。对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由于融资渠道和公共机构的能力可能非常有限，可以采取对服务收取少量费用、依靠独立的服务提供商、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服务商的问责等办法——柬埔寨就是这么做的。在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可以对社区的有关体系加以改进，乌干达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就是征收一个额外的小型税，将税收所得置于由区理事会管理的一个基金下，用于对供水系统的重大整修。

就城市的卫生设施来说，一般来说，只要个人和社区能够从对这些设施的投资中受益，就会有改善这些设施的充分需求。因此，解决办法是强化产权，承认非正式定居区的地位，从而激发社区改善卫生设施的需求，同时确保它们可以获得独立服务商所提供的服务。在农村和居住密度较小的城市城区，改善卫生设施的重点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提高卫生意识，增强人们对卫生设施的需求——这需要通过加强宣传和舆论压力来实现。比如，柬埔寨、印尼和越南的一些社区就提出，讲卫生是每个人对其社区所承担的义务。

提高自来水管和卫生设施覆盖率成本很高，因此贫困国家会需要大量资助，而且很可能是外来资金。根据近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一项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要实质性地改善清洁用水系统和卫生设施，所需的额外资金是当前资金投入水平——每年逾 110 亿美元——的 1.5

倍。[57] 不过，正如第 3 章所指出的，考虑到由此带来的死亡率降低，这类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生育期**孕产妇的超额死亡率仍然很高。主要原因是制度失灵，未能向孕产妇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有些地方的社会习俗阻止女性在生育时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而多产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要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和提供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一样，需要建立和完善提供孕产妇保健的制度。

这就要求一方面给予一线的服务提供者更多资源；另一方面确保整个孕产妇保健系统的良好运作：

首先，要提高提供各种孕产妇服务的人员的素质。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特别是增加熟练的专业助产士将是一个持续的需要，但同时也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层面的医疗服务机构和私人部门的提供者来扩大孕产妇服务的覆盖面。

第二，孕产妇服务提供者需要能更好回应孕妇的需求。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对这些服务提供者的问责。可以让服务的使用者了解服务提供者的充分信息，如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和改善服务的相关政策等，同时还要让服务使用者能够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必要行动。比如，在乌干达，以社区为基础的孕产妇服务监测使初级保健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改善。[58] 另一个加强问责的途径是确保公民可以要求其政治代表对问题负责，这样政治人物就会对服务提供者进行更有效的控制。这种机制的效力在秘鲁表现得很明显：要改善孕产妇健康，就需要扩大孕产妇保健服务的覆盖面，给予服务提供者恰当的激励，还要使公民的呼声能被决策者听到。[59] 利用这种机制，秘鲁的专业助产分娩率从 2000 年的 58%上升至 2004 年的 71%。

第三，要对贫困女性获得孕产保健服务面临的资金困难给予特别关注。一个解决办法是向她们提供现金补贴，条件是她们必须寻求专业孕产保健服务。一个例子是印度的 Janani Suraksha Yojana 项目，该补贴项目使专业助产分娩率提高了 36%。[60]

第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努力不能仅限于改善医疗体系和医疗服务，而需要采取跨部门的措施。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在其发展进程的早期减少孕产妇死亡的办法就说明了这一点（见专栏 5）。对基础设施（农村道路）和妇女教育的少量投资与孕产妇保健人员的培训、医院建设结合起来，推

专栏 5　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哪些措施行之有效？考察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经验

改善孕产妇保健服务虽然困难，但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也能做到，正如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20 世纪 30 年代，斯里兰卡每 10 万例分娩就有 2 000 例孕妇死亡，但到 1947 年，这一比例就降到了 1 000 例，而在随后三年里又降低了一半。到 1996 年已经降到了 24 例。马来西亚在 1950—1957 年这七年间就将孕妇死亡率从 534 例降低了一半。此后几乎每十年左右就降低一半，到 1997 年已经降到 19 例。

为克服阻碍医疗系统有效运作的一系列制度障碍，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都采取了综合性、分步骤的方法。而且它们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并不大——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平均支出水平为每年 GDP 的 1.8%。两个国家的医疗健康事业都充分发挥了与教育、供水和卫生设施、疟疾控制及农村综合发展的协同效应。比如，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包括修建农村道路，这大大有助于分娩出现紧急情况的处理。为解决孕产妇服务面临的财务、地理和文化障碍，它们确保在农村需要服务的最前沿设有专职接生人员，定期地向他们提供药品和器械，并将他们与后备服务联系起来，同时也努力改善通信和交通条件。与此同时，对有关设施进行了强化，以提供助产服务，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和并发症。更好的组织管理改善了对服务提供机构的监管和问责。通过监测体系将每个地区的死亡率数据统计出来，社区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要求政治领导人负责，国家和地方的有关部门终于认识到每一例孕妇死亡都是不可接受的。最后，这两个国家都非常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改善：女性在国家独立前或独立后不久就获得了选举权，而女性教育也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

资料来源：Pathmanathan and others 2003。

动了孕产妇死亡率的大幅降低。[61]

第五，要提高这一问题的政治地位。土耳其的经验说明了这样做的效果。2000 年土耳其的产妇死亡率是每 10 万活产分娩死亡 70 例。后来，新上台的政府充分利用了选举期间获得的政治支持，在 2003 年实施了“健康改革项目”，特别强调制度改革和对客户需求的回应，并且尤其重视落后地区医疗服务的改善。分配给落后地区的初级保健和疾病预防预算增长了 58%，为边远地区配备了急救飞机，对医疗人员也进行了重新分配以更好地服务贫困地区，同时还实施了一项补贴来鼓励孕妇住进“产前旅馆”并在公立医院分娩。到 2009 年，产妇死亡率下降至每 10 万例分娩中死亡 19.8 例。[62]

对弱势人群的教育服务

虽然从国家层面来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有所减轻，但在贫困人口以及由于其他情况——如地处偏远、民族、种姓、种族或残疾——造成的弱势人群中，教育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为帮助这些人，决策者可以从柬埔寨、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借鉴。这些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既包括增加供给的措施（如在偏远地区建造更多学校，雇用本地教师），也包括增加需求的措施（如以女童上学为条件向家长提供现金补助）。设计成本效益高的干预措施的关键之一是要有关于地方具体情况的信息。如果这类信息不足，那么更为一般性的措施，如以女童上学为条件提供补贴，可能比地方化政策更为有效。无论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这种补贴对提高入学率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尤其是对那些本来入学率很低的群体（如严重弱势人群）十分有效。[63] 这类措施由于其有效性而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可，现在已在 30 多个国家实行。

改善女性经济机会的政策

纵观全世界，女性和男性获得经济机会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不管他们是做职员、从事农业或是自己创业。女性往往占据与男性非常不同的经济空间，而且过多集中在生产率较低的经济活动、自雇职业和非正式部门。即使在正式的工资就业部门，她们也集中在某些职业和行业——往往是低工资的职业和行业。而且这些性别差异并不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而消失。

造成这种模式的原因有三。首先，女性和男性在照料家人和家务方面的责任非常不同，因此他们的时间利用就有很大差异，这直接影响了女性的就业选择和经济活动。第二，女性和男性获得生产投入的难异程度不同，市场和制度常常对他们区别对待。第三，这些相互强化的制约因素可能导致“女性生产率陷阱”。因此，政府需要瞄准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上述多重因素往往同时对女性的经济机会形成制约，因此有效的政策干预就需要解决多个问题——或是同时解决，或是逐个依次解决。

释放女性的时间

男女经济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时间的使用不同而造成的，而他们的时间使用模式来源于男女对照料家人和家务不同分工的社会习俗。要改变这些习俗，使女性释放出更多时间从事经济活动，就需要重视三方面政策：托儿服务和父母假期；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与市场活动相关的交易成本的政策。

对托儿费用提供补贴或是提供公

共托儿服务可以补偿女性由于参与市场就业而产生的照顾孩子的成本。托儿服务可直接或间接地由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提供，也可由私营部门提供，但政府进行补贴和监管。在发展中国家中，一些拉美中等收入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托儿政策，有关例子包括墨西哥的 Estancias Infantiles、哥伦比亚的 HogaresComunitarios 等由政府提供或补贴的托儿项目。阿根廷和巴西也有类似项目。来自这些国家以及有类似政策的富裕国家（多为西北欧国家）的证据显示，这些措施促进了女性工作时间的增加，也使她们在正式经济部门的就业增加。在低收入国家，在非正式部门和农村就业的女性尤其需要解决照顾孩子的问题。印度非政府组织“移动托儿所”（Mobile Creches）正在对为在农村非正式部门和公共工程就业的女性提供托儿服务进行各种尝试。印度古杰拉特邦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那里的“自雇妇女协会”为其成员建立了一个适于 0~6 岁儿童的托儿中心。其他通过政府来提供儿童照料服务的办法包括延长在校时间（尤其是那些只需上半天学的年级），或是降低孩子进入学校系统的年龄。

父母假期政策主要是在富裕国家实行，而且通常是以产假的形式。虽然这些政策的确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可能较为有限。首先，这些政策只能用于正式部门，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正式部门的就业一般只占总就业的很小一部分。第二，这类政策可能使雇主更不愿意雇用育龄女性，除非由政府来提供所需资金。那些规定父亲和母亲都可以休产假并规定父亲必须休产假的政策（如冰岛、挪威和瑞典的做法）不会造成对女性的歧视，同时有助于扭转社会上对照顾孩子是女性责任的传统观念，因此有很大的优越性。但这种做法可能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力。

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特别是供水和供电——有助于减少女性用于家务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例如，南非的农村电气化使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 9%；在孟加拉国，电气化使女性得到更多休闲时间。在巴基斯坦，使取水点更靠近居民住房使他们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有所增加。还有一些研究显示这类基础设施的改善虽然对女性的市场就业没什么影响，但却显著地增加了她们的休闲时间，这其实也改善了女性的福利（见第 7 章）。

也可以将政策干预的重点放在降低与参与市场活动相关的（时间）交易成本上。更好、更有效的交通方式可以减少到家庭以外工作所需的时间成本，使女性更容易同时负担家务、家人照料和市场就业这多项任务。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助于减少女性参与市场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束缚。如肯尼亚的 M-PESA 移动银行项目使妇女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小额金融和银行操作，增加了储蓄，而这对女性小企业家是特别有益的。在印度，由非政府组织“职业发展基金会”所运作的一个项目将女性组织起来开展营销活动，向她们提供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她们可以直接向客户推销产品，提高了利润水平。[64]

缩小在获得资产和生产投入方面的性别差异

女性农民和企业家往往比男性更难获得土地，她们对信贷的需求和使用也低于男性。这些差异的根源是市场失灵、制度失灵以及它们与家庭决策的相互影响。比如，要想获得信贷，

往往需要财产抵押，最好是土地或不动产。这样女性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她们往往没有或只有很少土地，而且主要是在服务业就业，而服务业的资本化较低，产品也往往是无形的，没有什么可作为抵押。如果家庭里存在性别偏好，导致男性和女性家庭成员对资源（如土地）的不平等分配，就更不利于女性获得信贷服务。

干预政策需要重点针对引起差异的深层原因——要强化女性拥有财产的权利，纠正公共服务中的偏见，改善信用市场的运作，从而为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加强女性的土地权和财产权可以对女性农民和企业家有所帮助。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是对女性拥有和继承财产以及控制资源能力的限制。印度和墨西哥的经验显示，继承法里关于男女平等的规定增加了女性拥有的财产。歧视性的土地法规是很多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性别差异的根源，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至少要规定婚姻关系中土地为夫妻共同拥有，以增强女性通过土地获得经济机会的能力。要真正保护已婚女性的土地权（尤其是在离婚或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更好的办法是实行强制性的夫妻联合土地产权。埃塞俄比亚有两个地区可以颁发夫妻联名的土地证，结果 80%的土地证上出现了妇女的名字。而在那些土地证只写户主名字的地区，只有20%的土地证上署的是女性的名字。[65]

纠正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中的偏见，如政府的土地分配注册制度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偏见，很多国家都可以纠正这类偏见改善女性对经济机会的获取。消除这些偏见要求在几方面采取行动。首先，服务提供者需要明确针对女性提供服务，而且可能要提供额外服务。例如，只针对户主的土地再分配项目往往对女性不利。那么，政府就可以对再分配的土地强制实行夫妻联名土地证，同时采取有助于加强性别敏感化的政策，并加强女性在地方土地管理委员会的代表。第二，可以加强女性在服务提供机构中的权利，包括确定工作重点的权利。例如对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可以让女性获得农业部的相关决策位置。第三，可采用各种技术来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如肯尼亚就是通过建立电话服务中心来扩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第四，加强监测可以使问题暴露得更明显。最后，应当向使用服务的女性用户提供她们应得服务的信息。在这个方面，可以通过发展她们对服务需求的群体效应来实现——比如支持女性自己的农民组织。

通过解决由于对女性贷款者缺乏了解而产生的信息问题来改善信贷市场的运作，这有助于减少农业和自行创业中生产率的性别差异。小额信贷是解决这类问题最常见的办法，它帮助妇女获得小额贷款，同时建立起贷款人的信用记录。小额信贷项目往往采用团体贷款的形式，如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和秘鲁的 FINCA。也有一些小额信贷项目已经不限于团体贷款，而是发放数额较大的个人贷款，依靠对还款的激励而非邻里监督来保障还款。开展金融创新、对信贷模式加以调整以适应小企业的需求，这也有助于克服女性难以获得信贷的问题。尼日利亚的 Access 银行、乌干达的 DFCU、坦桑尼亚的塞罗租赁与金融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些大型的商业银行认识到女性有信用记录的可能性比男性要小，她们能用来作为抵押物的资产也较少，于是它们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开发了支持向女性经营者和企业家提供贷款服务的新工具。采取

的干预措施包括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如可以用生产设备作抵押或基于现金流的贷款，对金融机构的工作成员进行相关培训，向银行提供战略支持以帮助它们扩大女性客户等。这些干预措施的初步经验显示，银行的女性客户有所增加，她们的贷款规模有所扩大，而且女性的还款率高于平均水平（见第 7 章）。

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

就工资就业来说，女性在某些行业和职业的就业人数很少，这使雇主形成了（或进一步加强了）女性不适于从事这些工作的观念。对找工作和升职很重要的关系网（常常是基于性别的）可能进一步加剧女性被排除在某些工作、职位、行业和职业之外。要打破这个信息问题并扩大女性的职业网络可采取三方面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项目；以及构建女性职业团体，推动对女性的提携。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培训、就业服务和其他支持措施结合起来，帮助女性进入或重回劳动力大军。尽管这些政策一般来说并不以减少工资的性别差异为目的，但来自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证据显示它们有助于向雇主展现女性的工作能力，从而增加了她们在正式部门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目前正在约旦实施和评估的项目也显示了成功的迹象（见专栏 6）。

反歧视行动是另一个克服信息失灵的办法。这种政策的目标是推动更多女性参与工资就业，以达到使信息失灵和网络效应不再成为制约因素的“临界点”（一般认为是 30%）。（主要来自富裕国家的）经验表明反歧视行动在强制实施时效果最好。反歧视行动也可以公共部门就业和政府合同的形式实行，但一定要有清晰的规则和认真的效果监测，对违反规定的情况要有可信的惩罚措施。[66] 在实施了这类项目的地方会明显地出现工资就业从男性转向女性的效果。虽然这类政策的经济效率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最为综合的证据（来自美国的长期经验）显示对效率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负面影响。[67]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显示，只要确保反歧视行动项目是暂时性的，一旦女性的参与超出了所需的临界点就会取消，那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就可以消除。如果没有明确的反歧视行动政策，也可在通过在公共部门大量雇用女性以产生示范效应。从富裕国家的经验来看，公共部门的扩大对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68]

如果性别化的职业网络阻碍了女性工人、农民或企业家的发展，支持女性网络的建立可能取得一定效果。如果将这类干预措施与社会资本和网络的建立以及对女性的培训、指导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专栏 6 中所介绍的约旦 NOW 项目。另一个更成熟的例子是印度的“自雇妇女联合会”，它已经成为代表大量非正式部门工人和企业家利益的一个有效组织，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信息、支持和培训服务。

消除劳动法规中的歧视性待遇可以扩大女性的经济机会。很多国家应当首先重新考虑限制（甚至禁止）非全日制工作的规定。因为妇女承担了主要的家务，这类限制对女性就业构成的制约可能远远大于男性。放松这些限制将给女性带来更多工资就业的机会。阿根廷取消了对正式经济部门里兼职工作的禁令，使很多原本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有孩子的女性转移到了正式部门从事非全日制工作。[69]

专栏 6 催化约旦的女性就业

尽管中东北非地区女性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很低。在约旦，20~45 岁的女性当中只有 17%的人工作，而男性是 77%。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在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同样存在：比如，社区大学的学生一毕业，男女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就出现很大差别。女性的低就业率使女性毕业生很难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只有很少女性在外面工作，年轻女性缺乏可以学习和效仿的偶像，也没有能帮助她们找到工作的关系网。而雇主们则缺少雇用女性的经验，如果他们认为女性对工作不重视、可能干不长的话，就会不愿意雇用女性。

约旦的“妇女的新机会”（NOW）项目是一个用来对两项政策的效力进行认真检验的试点项目。要检验的两项政策分别是短期工资补贴和可雇性技能培训。

短期工资补贴给企业提供了冒险雇用女性毕业生的激励，同时也是一个让它们通过直接观察年轻女性的工作情况扭转对女性成见的机会。这些补贴也使年轻女性在找工作、与雇主沟通时更有自信。

可雇性技能培训在社区大学毕业生在学校所学技能的基础上，提高了她们工作中所需的实际技能。很多雇主都说近年毕业的学生缺乏人际关系技巧和其他基本的职业技能。在这个试点项目中，毕业生获得 45 小时的技能培训，涉及内容包括团队关系、沟通、演讲、商务写作、客户服务、写简历、面试和正面思考等。

对这类政策的需求看起来很大。尽管就业率很低，大多数近年毕业的女大学生还是很希望参加工作的：她们当中有 93%表示打算毕业后参加工作，91%说她们希望在结婚后还能在外面工作。那些应邀参加培训课程的人当中，有 62%完成了全部课程，未婚女性的出勤率更高一些。参加课程的人对课程给予了积极评价，表示课程使她们对找工作更有信心。工资补贴实施 4 个月后，有 1/3 使用补贴券的女性找到了工作。

中期评估的初步结果显示，就业补贴券对就业产生了显著效果：只收到了补贴券和既有补贴券也获得培训的毕业生的就业率约在 55%~57%，而只接受了培训或没有培训也没有补贴券的就业率只有 17%~19%。在所有对照组中，干预措施的就业效果在未婚女性中更大。对所有那些收到补贴券或培训或两者兼有的人，财务赋权（以自己有钱而且可以决定如何花钱的女性比例衡量）也大大加强。后期的跟踪调查将分析就业补贴券的效果是否能长期保持，还将分析其他赋权指标和态度的变化。前期调查已经发现已婚女性参加培训、使用就业补贴券和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都低于未婚女性，因此后续调查还将进一步分析婚姻与工作的关系。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减少在话语权方面性别差异的政策

增加女性在社会上的话语权

女性一般来说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话语权都小于男性。从社会层面来说，收入增长并不能缩小这种差距。社会习俗常常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事；女性是糟糕的领导人，而女性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较低进一步深化了这些观念。关于女性应当负责家务和照料家人的传统限制了女性可用来正式参政的时间，而政治中的各种网络通常也是基于性别的，这也不利于女性。所有这些因素对女性社会话语权的影响都比收入增长更大。

这些制约与那些限制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因素相似，因此其解决措施也是相似的。规定女性名额和其他形式的反歧视行动有助于扩大女性在各个层次的政治代表性。这方面，可以由政党自愿在其选举名单人中包括一定数量的女性候选人，也可明确规定立法机构一定比例的席位必须是女性。哪种做法更好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政治制度。例如，在比例代表制下就无法为女性保留一定的席位；如果各个政党有很强的中心领导和内部纪律，就可以采取让政党自愿确定配额的做法。不管是哪种做法，它的设计和实施都是最为关键的。比如，西班牙参院竞选中由各政党提出的候选人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各个政党往往就会选择姓名字母排列靠后的女性参选，这样各政党表面上是遵守了参选政党都要包含一定数量的女性候选人的规定，但她们赢得席位的可能性却很低。[70]

如果用配额来增加女性的政治代表，那么也要充分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一些矛盾。强制性配额意味着国家绕过了一部分民主过程，所以要对纠正性别平等和对民主造成扭曲这两者之间加以平衡。一个办法是像印度所做的那样，采取滚动式的配额制——在不同的选举中规定不同数目的席位保留给女性。而且，和所有的反歧视行动一样，最好在一开始就确立明确的目标或政策实施的时间。给女性保留的席位的结构也很重要。如果把特定的席位留给女性，可能会有设立“象征性”女性席位的风险。

事实证明配额制度增加了女性在政治中的代表。在墨西哥，关于女性候选人配额的规定使女性议员的比例从 16%上升至 22%。摩洛哥在议会中为女性保留席位的做法使女性比例从 1%增加到近 11%。印度地方政府的经验显示配额规定也有助于改善选民对女性政治人物的看法——甚至在很短时间就能促成这种转变，而且在配额制中止后还继续推动女性当选。[71]

政治领域的反歧视行动还需要有提高女性在其他社会组织中话语权的措施来补充，如工会、企业、司法系统和专业协会等。既可以采取规定配额的做法，也可以建立对女性的指导提携计划、妇女网络以及在这些领域专门针对女性进行技能培训。女性团体的集体行动在这方面可能会非常有效，如印度的“自雇妇女联合会”所表明的那样。一般来说，因为女性对较不正式组织的参与好于正式组织，相关法律法规应当确保这些较不正式组织的应有地位。

增加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较小，这反映了女性经济机会有限、社会习俗、法律框架和法律实施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决定对家庭资源控制权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机会的大小和法律框架——特别是关于女性财产权的法律框架。而对生育决定来说，社会习俗、妇女的谈判力和有关服务的提供则十分关键。

增强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力

要增加女性在家庭里的话语权，最重要的政策是改革有关法律框架，使女性在控制家庭财产方面不再处于劣势，同时还要扩大她们的经济机会。就法律框架而言，土地法和家庭法当中关于结婚、离婚和财产处置的内容最为重要。许多国家同时存在多个法律体系，包括习惯法和宗教法体系，那么重点就应当是使不同体系的相关内容形成一致，特别是应当确保所有法律都符合国家的宪法。肯尼亚在最近的宪法改革中就作出了这方面的改革。

尽管这些领域从政治和社会上来说非常复杂，而且改革成效往往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经验表明取得改变还是可能的。埃塞俄比亚于 2000 年对其家庭法进行了改革，取消了丈夫禁止妻子在外工作的权利，并要求家庭财产的管理需夫妻双方达成一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女性的经济活动就开始转到家庭以外、对技能要求较高的全职工作。[72] 摩洛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对家庭法进行了改革，其 2004 年的新《家庭法》完全消除了将丈夫视作户主的说法。

还需要努力使这些权利得到切实落实，使司法体系更好回应女性的需求。需要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进行干预。要提高法律执行部门的能力，加强对司法系统的问责，采取措施使女性更容易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加强女性在司法机构的代表——这些是供给方面的重要措施。法律的实施

机制也很重要。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证据就说明了实行夫妻联合土地证在提高女性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提高女性对保障其合法权利的需求，可以通过提高识字率、扩大法律援助服务和降低法律程序的费用等办法来实现。还可以收集关于女性获得司法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数据并予以公开，提高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减少家庭暴力

减少家庭暴力要求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行动的目标是在暴力发生前予以预防。第一步是颁布法律，对各种针对女性的暴力进行定义，规定调查和执法责任，提高社会对家暴的认识，并表明政府的重视。那些目前缺乏此类法律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北非、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必须颁布这些法律。而那些已经有此类法律的国家需要使它们更加具体化、更具操作性。

第二步是改变造成家暴的风俗和行为，强调预防。像南非的“灵魂城市”之类的教育和宣传项目对改变男性和女性对家暴的观念会有所帮助。通过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提高她们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力以及脱离婚姻的能力来增加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也有助于促进行为的改变。但增强她们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她们遭受暴力的风险上升。对此可能需要具体的防范和解决措施。

第三，如果暴力真的发生了，受害者需要各种及时有效的帮助，从警察和司法体系的帮助到医疗和社会服务。马来西亚就在公立医院里设立了整合各种服务的一站式危机中心。各种服务的提供者——警察和司法系统、医疗和社会服务——需要有明确针对女性的服务并且提供对女性的额外服务。它们还应当尽量使服务接近女性，以克服女性的时间和流动性制约。例如，可以在把法律服务带到社区内，或是采取流动司法援助诊所的形式，使女性便于利用司法体系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使服务贴近女性也有助于这些提供服务的组织——特别是其管理层——提高对性别问题的意识。比如，印度尼西亚的“PEKKA 妇女法律赋权”组织就培训乡村法律助理，重点内容是家庭暴力和家庭法。有助于妇女通过司法体系获得公正的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司法和警察队伍里负责家暴问题的人员的女性比例。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建立了一个 188 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警察分队，分布在各个城乡地区，重点负责针对女性的犯罪。这些女警分队使女性可以较轻松地与警察打交道，包括报告家暴案件。[73]

加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

加强女性对生育的控制需要在若干领域采取行动。世界上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服务仍然有限。有些国家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人不能获得充足的服务，不过更多的情况是一个国家里只有生活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农村地区——和较为贫困的女性不能获得充分服务。对这些人口来说，改善计划生育服务是一个重点。

对生育决定的控制，即生几个孩子、每个孩子之间的时间间隔，不仅与生殖健康服务有关，而且与另外两个政策领域有关。首先，要提高女性在家庭中表达她们对生育决定的意见的能力。如上文提到的，扩大妇女的经济机会、加强她们对财产的控制以及恰当法律的实施会有所帮助。此外，对男性进行避孕益处和方法的教育也会有所帮助。孟加拉国 [74] 和埃塞俄比亚 [75] 的经验都表明，在计划生育教育中把丈夫也包括进来可以提高避孕措

施使用率。

其次，要改善计划生育服务的质量，要把重点放在三个领域。第一，要提供各种不同的避孕方法。第二，要向女性提供关于各种避孕方法的全面信息，包括其副作用、优点和不足，以便她们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第三，提供服务的方式要有助于保护个人或夫妻的隐私。这就需要对医疗保健人员进行关于如何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培训。赞比亚近年的经验显示，取决于服务人员是只与女性接触还是夫妻一起接触，避孕和生育结果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防止性别不平等代际传递的政策

某些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会跨代复制，这形成了“性别不平等陷阱”，它对社会上贫困和被排斥人口的影响最大。如果女性缺乏政治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导致性别不平等的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不太可能得到纠正。收入增长本身对解决导致这些性别差异持久存在的原因并没有多大帮助。上一节讨论中涉及解决跨代传递的三种性别差距的政策——提高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加强女性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并提高其话语权，增强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在这里，我们要讨论解决在人生早期形成的人力资本、机会和抱负的性别不平等的措施。

青少年时间所做的决定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对技能的获取、健康状况和经济机会。这个时期也是树立人生理想的时期，而关于男孩和女性的社会规范和观念也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女性的抱负空间常常会逐渐缩小，尤其是那些农村地区的贫困女孩。对她们来说，地处偏远、缺乏流动性是对其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限制。如果能让青少年作出好的选择，这会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大益处；而且，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劳动者和公民，这也有益于整个社会。干预措施要帮助他们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帮助他们实现从学校到就业的过渡；使他们有远大理想，增强能动性。同时，还要努力减少他们的危险行为。

奖学金和有附带条件的现金补贴可以提高学生的出勤率，降低青少年特别是女孩的退学率。拉美多个国家，如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76] 最近来自非洲的证据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在马拉维，给女孩提供少量现金补贴就增加了她们的入学率，减少了退学率。[77] 这些补贴虽然是以教育为目的的，但它们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益处，如降低了 HIV 病毒感染率。还有其他一些做法可以帮助让女孩留在学校受教育。向她们提供教育回报率的信息就是其中之一。例如，在马达加斯加，在男孩、女孩及其家长了解了小学毕业生的收入信息后，学校的出勤率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78] 多米尼加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向男孩提供了教育的实际回报率的准确信息，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79] 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各种激励（比如可能获得奖学金或在校表现好可获得直接奖励等）能够增加孩子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提高考试成绩。[80]

在哥伦比亚和秘鲁，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职业培训既增加了年轻女性的就业率，也提高了她们的收入。[81] 在肯尼亚，通过向年轻女性介绍男性主导职业与女性主导职业的职业培训的相对回报率，使女生学习技术课程的人数增加，这类课程使她们可以进入那些通常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使学习得到更高的回报。[82] “青少年女孩倡

专栏 7 早期干预，克服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失灵——“青少年女孩倡议”

“青少年女孩倡议”是一个公私伙伴关系，它通过创新性的干预措施帮助女孩实现从学校到就业的过渡，如果实践证明某些干预比较成功，就将它们推广和复制[a]。现在它正在阿富汗、约旦、老挝、利比里亚、尼泊尔和南苏丹实施（很快也要在卢旺达实施），项目目标是 2 万名左右 16~24 岁的青年女性。

干预措施多种多样，从商业开发技能培训和服务到技术和职业培训等，主要目的是针对市场需求大的技能进行培训。在所有国家的项目中，女孩们同时也接受生活技能培训，帮助她们克服获得经济独立面临的最大障碍。每个国家的干预措施都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女孩的具体需求量身定做。由于此前对哪些措施较为有效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认真的效果评估被作为“倡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技能培训旨在使女孩们获得当地劳动力市场上有显著需求的技术。在所有的试点项目中，培训的提供者都被要求先进行市场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进行培训的行业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重点是将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对应起来，但很多情况下这实际上要挑战人们对女性适合做什么工作的固有观念。

在利比里亚，参加项目的年轻女性接受了 6 个月关于油漆房屋、专业驾驶和保安服务的培训。在尼泊尔，学员们接受了 3 个月的职业技术，进行了考试，随后 3 个月为她们提供介绍工作的服务。项目的重点是找出对女性有吸引力但又不是典型女性化的职业：有些人被培训为电工，有些成为砖瓦匠，还有的成为手机修理技工。

这些项目的实施突出地说明女孩建立社会资本的需求与男性不同，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才能帮助那些往往处于脆弱、隔离状态的年轻女性获得经济机会。利比里亚试点项目中的培训人员将女孩们分成三到四组，每组都当众承诺要在培训当中和培训以外都互相支持。这种正面的同侪压力使培训课程保持了较高的出勤率，有 95%的参加者完成了培训；同时它也促使教育水平不同的学员之间互相帮助。

利比里亚的试点项目中另一项很被看好的创新做法是为所有参加培训的女孩在当地一家银行开立了正规的储蓄账户，起存 5 美元。这个储蓄账户不仅可以让女孩们在课堂以外实践她们学习的基本理财技能，而且建立了她们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女孩们对平生第一次与现代经济联系起来表示高兴。

试点中还组织了招聘市场，向潜在的雇主宣传项目活动，争取给学员提供实习或工作的机会。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和职业发展专家与学员单个见面，介绍不同行业的情况，指导她们如何表现出职业精神，同时对她们所展示的技能给予建设性的评价和反馈。这些一对一的会面给女孩们建立职业网络、获取行业信息提供了良好机会，而这对她们找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a. 当前这个倡议的捐助方除澳大利亚、丹麦、挪威、瑞典和英国政府以外还有耐克基金会。该基金会是项目的一个主要合作伙伴。世界银行的“性别行动计划”也为这项倡议在各国的项目提供支持。现在对这项倡议的承诺资金有 2 200 万美元。

议”旨在对包括技能培训和指导在内的各种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正在多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施（见专栏 7）。

事实证明，健康教育项目可以有效地减少危险行为。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实施的一个健康教育项目大大改善了男女青少年的性知识和对性活动的态度，提高了避孕套的使用率，也改善了男孩的性行为。[83] 对青少年来说，提倡避孕措施的使用，配合以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的干预，同时使有关措施适合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这样可有效减少意外怀孕的发生。[84] 在乌干达的这样一个针对女性青少年的项目使避孕套的使用大大增加，使项目参加者所生孩子数量减少。[85] 有时仅仅是经济赋权活动也可以产生显著影响。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少年职业培训项目既包括了学徒培训，也包括了生活技能培训，对它的效果评估显示，参加者的怀孕率大大降低。[86]

如果女孩能看到一些处于领袖和权力地位的女性偶像，来消除女性传统形象的影响，可有助于减少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关于印度对女性的政治保留制度的一项研究表明，十几岁的女孩如果反复见到女性领导者，就更可能怀有挑战传统观念的愿望，如希望晚些结婚，少生孩子，获得那些要求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工作等。[87] 年轻女性经济机会的增加也会改变她们

自己及其所在社区对女孩性别角色的看法。德里有一个把社区与高报酬的电话行业招工者联系起来的项目，对这个项目执行结果的研究发现，这些社区与其他社区相比对嫁妆的要求较低，而且更可能认为女性结婚前单独居住、结婚甚至生孩子后继续工作都是可以接受的。[88]

让其他政策具有“性别智慧”

即使改善性别平等不是主要的政策目标，了解性别因素在家庭、市场和制度中如何发挥作用也有益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于性别原因而出现的市场失灵、制度中的性别偏见以及家庭中的性别关系都影响（有些情况下制约）男性和女性的行为。这些行为模式可以影响男性和女性对政策所作出的反应。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意味着政策可能产生未预料到的后果，或者政策根本起不到预期作用。

以家庭中的性别关系为例。性别关系显然影响着一个家庭如何对政策作出反应——有时可能产生未预见的后果。比如，很多有附带条件的现金补贴项目最初是面向女性的，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女性花钱方式与男性不同，把补贴交给女性有助于把更多钱用在孩子身上。但是这种补贴改变了家庭里各方讨价还价的权力对比，在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一些国家，这导致了短期内家庭暴力的增加。虽然这种效应在更长时间里可能消失或是性质发生变化，但另外一些补贴项目就采取措施避免了这种问题的出现，比如含有遏制家暴的附加条件（巴西），就这类问题对母亲和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培训和警告（哥伦比亚、秘鲁），甚至安排专门的社工（智利）。

那么，如何将对性别不平等及其深层原因的考虑融入更广泛的政策和项目设计中呢？本报告的分析框架为此提供了一个指南。首先，家庭内部关系影响着政策的结果。这里说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在那里收获油棕榈时，根据传统的性别分工，男人要爬到树上摘果子，而女性则收集掉落到地上的果子。后来油棕榈企业发现掉到地上的果子有 60%~70%没有被捡起来。他们尝试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妇女捡果子可能面临的困难，包括给她们专门的网袋，灵活安排摘果子的时间以不妨碍女性照顾家务等，但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最后，有关方面实行了“捡果子妈妈”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女性会收到自己的收获量登记卡，而报酬则直接打入她们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这样做以后，参与油棕榈收获的女性人数大增，收获量也大为提高。

第二，很多不以性别为重点的政策和项目如果充分考虑女性在市场、行业或某些职业的代表不足问题，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代表不足的情况不仅会给女性带来信息问题，也会给那些可能想雇用她们、贷款给她们或向她们提供服务的人带来信息问题。解决女性代表不足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厄瓜多尔扩大信贷数据库、把小额信贷也包括进去的一个项目。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小额贷款机构作出更好的贷款决定，而不管是谁在借贷。由于小额贷款的客户大多为女性，这样做也可以帮助女性获得更多样的金融服务。

第三，政策设计应当努力为女性和男性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法律、法规对他们区别对待或是尽管名义上男女平等但法规的具体实施中仍然对他们区别对待的情况下。在对法律法规或其执行机制进行修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类歧视并加以纠

正，这样改善性别平等就可以成为一个额外的成果。以税收政策为例。如果女性和男性有同样收入却适用不同税率，这就是对女性的明显歧视。例如在摩洛哥，对孩子的税收减免算在男人头上，所以男性的税负较低。而女性要想获得这种减免，必须得证明她的丈夫和孩子在财务上依赖她。这种税收设计既没有效率，也不具有性别公平性。

如果能在一般的政策设计中考虑这些因素，政策就更可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而且也使决策者更便于利用这些政策改善性别平等。

性别平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设计良好的针对具体市场失灵、制度失灵或规范制约的公共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性别平等。但是政策的选择和实施不是发生在真空里。各项政策必须与各国的制度、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各有关方面的情况相协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性别平等改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哪些因素有助于改革的持续性，以便切实带来变革。

性别平等改革过程的两个特点值得指出。第一，和所有改革一样，它在社会上的不同群体之间——包括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进行权利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即使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很好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率，仍会有人从中蒙受损失。第二，这类改革常常挑战关于性别角色的强大社会规范和观念。这两个特点都意味着改革很可能遭到反对，妥善处理这些阻力将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很多国家——既有富裕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显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有几个方面对性别平等改革特别重要。第一，改革的支持面越广就越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一定要建立广泛的联盟，动员各种力量支持性别平等改革。这些联盟可以包括如政党、行业工会、民间组织和团体等非国家组织。妇女团体是推动劳动法和家庭法性别平等特别重要的力量。例如，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的女性曾通过印度的“自雇妇女联合会”和孟加拉国的“自力更生”等组织对其雇主甚至政府提出挑战。这些组织发出了女性的呼声，也为克服改革阻力提供了公共行动空间。

在改善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女性和男性是伙伴。虽然大多数呼吁男性支持性别平等的倡议目前规模都还较小，但有迹象表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男性对增强女性权利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支持。例如，卢旺达的“男性资源中心”动员男人和男孩与性别暴力作斗争。在巴西、智利、克罗地亚和墨西哥对男性关于性别平等态度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成年男子都表达了“女性权利的提高不会给男人带来损失”的观点。[89] 即使在印度，虽然在调查中男性对总体性别平等的支持度低于上述几个国家，但他们对一些具体政策仍表示强烈支持，如在大学和政府机构对女性设立配额等。

第二，公司企业，不管大小，都可以就支持性别平等提出令人信服的商业理由。在一个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企业对工人技能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鼓励企业尽量扩大其挑选员工的范围。不少企业不仅已经在努力吸引和招募有才能的女性，而且还通过各种平衡工作——生活的措施留住这些女性。企业也知道，意见的多样性有助于实现最佳决策，推动创新。此外，性别平等本身也是客户和投资者非常看重的企业特色。履行企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产品差异性扩大竞争力和保持忠实的

女性客户的一个渠道。

第三，意外冲击和外来变化可能给决策者带来开展改革、改善性别结果的机会。这种机会有时来自不可预见的情况，比如一场全国性灾难。1998年尼加拉瓜遭受了飓风“米奇”的袭击，但这场灾难促成了一场关于家庭暴力的对话，随后就开展了反对家暴的全国运动并颁布了有关法律。有时这种机会也可能来自国家政治或经济形势的重大转变。比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班牙民主过渡期间，家庭法和生育权方面就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还有一些机会来自跨国机构的倡导和全球议程中榜样的力量。例如，哥伦比亚地方妇女组织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倡导和监测促使1990年哥伦比亚宪法扩大了对生殖健康的保障，并使避孕服务更加便利。

最后，改革有多种路径。政府常常根据社会线索来决定改革的速度和步伐。如果按照市场和社会规范的变化来制定和实施政策，政策符合社会现实，就有助于带来可持续的变化。但是这种“渐进式”改革可能不足以克服导致长期性别不平等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僵化。要改变社会的动态发展趋势、实现性别更为平等的均衡状态，可能还需要大胆的政府行动和“转型性”改革。在选择是采用渐进式还是转型性的性别平等改革时，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在加快改革速度和降低改革倒退的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渐进式改革只能带来缓慢变化，但转型性政策面临强大阻力，改革成果被逆转的风险很大。一种推进改革的方式是有选择性地使用转型性政策，并确保它们得到切实实施。

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议程

各国的国内行动是减少性别不平等的核心。全球性行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民和组织以及国际机构的行动——不能代替公平有效的国内政策和制度，但它可以扩大国内政策的影响。此外，全球化以及它通过信息传播、人员流动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是否能为所有女性带来更大的性别平等和更好的生活，还是只对一部分人有利，这也受到全球性行动的影响。

全球性行动应当把重点放在那些性别差异不管从其本身来说还是作为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障碍来说都很重要的领域，以及那些单靠经济增长无法解决问题的领域。也就是说，国际行动应当根据本报告所提出的四个优先领域对各国的努力加以补充：

- 降低女性超额死亡，减少仍然存在的教育差距。
- 改善女性的经济机会。
- 增加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 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此外还有一个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任务：通过更好的数据、更好的知识生产与分享以及更好的学习来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行动。

制定一个全球性别议程是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一些领域要取得进展，就需要将更多资源从富裕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比如要促进人的禀赋的平等或是解决世界各地女性超额死亡的根源）。第二，行动是否有效有时取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生产，如新的（全球）信息或知识。第三，如果某项政策的影响是超越国境的，各国和各机构之间的协调可以使政策更为有效，至少这种协调可以为国内行动提供动力和压力。

基于这些标准，我们提出的全球行动议程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活动：

提供资金支持。更好地提供清洁用水，改善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如降低发展中国家女性超额死亡所需的那些服务，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这往往是超出单个国家政府财力的，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国家就更为困难。国际发展机构可以相互协调，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或设立专门基金向那些愿意并且有能力开展这些改革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以确保获得最大成效，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重复行动。

推动创新和学习。虽然我们对哪些做法对推动性别平等有用、哪些没用已经了解了很多，但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常常因为缺乏数据或是对那些最具“滞缓”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解决方案而进展缓慢。比如说对男女时间利用的不同模式以及造成这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我们就缺乏数据和解决方法。发展机构可以通过试验和评估来进行创新，增强对有关问题的了解。试验和评估活动需要既注重结果，也注重过程和有关背景，以便日后对成功经验进行有效推广。

建立和利用有效的伙伴关系。如第 8 章所明确指出的，成功的改革往往需要在国内外形成联盟和伙伴关系。国际发展领域可以围绕具体议题与学术界和智库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开展试验和总结经验；更广泛地来说，可以与私营部门形成伙伴关系，推动女性经济机会的扩大。这些伙伴关系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有关国家获得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成功推动性别平等所需的资源和信息。

上述这些活动的相对重要性显然在每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表 2 提供了全球行动议程的概览（第 9 章有更为详细的描述）。打钩的地方是需要采取新的或额外行动的领域，或是需要对现有倡议加以重新强调的领域。当然，那些没有打勾的领域目前也有很多重要的行动——例如围绕预防 HIV 感染/艾滋病所开展的创新以及关于青

表 2 全球行动议程概览

优先领域	需要支持的新的/额外行动	全球发展机构的行动方向		
		提供资金支持	推动创新和学习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
消除人的禀赋方面的性别差异	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	√		√
	改善清洁用水供应	√	√	
	改善孕产妇保健服务	√	√	√
	加强对 HIV/艾滋病防治的支持	√		√
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	增加和改善托儿服务和儿童早期教育	√	√	
	面向农村女性进行投资		√	√
缩小在话语权和能动性方面的性别差异	增强女性通过司法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		√	
	改变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观念		√	√
防止性别不平等的跨代复制	面向青少年男女进行投资		√	
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行动	获得新信息	√		√
	推动信息分享和学习		√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少年问题的伙伴关系等。在这些领域，重点是保持现有的努力和已形成的伙伴关系，实现已作出的承诺。

最后，本报告提出的框架和分析提供了政策和项目设计的四个一般性原则，它们有助于强化各优先领域的全球行动的影响和有效性。这四个原则是：

- 进行综合的性别平等诊断是政策和项目设计的前提条件。性别不平等的长期存在有多种原因：可能有某个制度或政策变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变化很难实现或很容易受阻；也可能在市场、正式制度和家庭各方面存在多重相互强化的制约，共同阻碍性别平等的进展；也可能是问题深深植根于传统的性别角色或社会习俗，而这些方面的变化非常缓慢。有效的政策设计要求清楚了解到底是上述哪种情形，制约因素在哪里。这种诊断必须全面分析家庭、市场和正式制度的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如何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
- 针对原因还是针对结果：在选择和设计政策时，需要针对造成现存性别差距的市场和制度约束，而不是针对性别不平等的结果。虽然结果是可以看到的，但造成这种结果的市场和制度约束却可能是多重的，不能明显看出来。
- “上游化”（upstreaming）和战略性主流化（mainstreaming）：“由于性别差异往往是相互强化的多重制约因素造成的，要使干预措施行之有效，可能就要有多部门的协调行动，或是对各项制约依次进行干预。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干预可以采取将性别议题融入一般性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的方式。因此，为扩大影响，需要将性别议题从具体部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提高到国家项目和部门项目的层面（“上游化”）。这有助于实现更具战略性的性别平等主流化。
- 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模式：各个国家市场和制度的性质、结构和运作相差很大，社会规范和文化也各不相同，因此，家庭和个人的行为也很不一样。这就意味着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或者，如第 8 章所说的，改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路径。

注释

1. Sen 1999。
2. Esteve-Volart 和 Bagües 2010。
3. 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Vargas Hill 和 Vigneri 2009。
4. Udry 1996。
5. FAO，IFAD 和 ILO 2010。
6. Cuberes 和 Teignier 2011；Hurst 等 2011。
7. 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8. 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9. 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10. Haddad，Hoddinott 和Alderman 1997；Katz 和 Chamorro 2003；Duflo 2003；Thomas 1990；Hoddinott 和 Haddad 1995；Lundberg，Pollak 和 Wales 1997；Quisumbing和 Maluccio 2000；Attanasio 和 Lechene 2002；Ruvalcaba，Teruel 和 Thomas 2009；Doss 2006；Schady 和 Rosero 2008。
11. Doss 2006。
12. Thomas 1990。
13. Qian 2008。
14. Luke 和 Munshi 2011。
15. Thomas，Strauss 和 Henriques 1990；Allendorf 2007。
16. Andrabi，Das 和Khwaja 2011；Dumas 和 Lambert 2011。
17. Felitti 等 1998；McEwen 1999。
18. Kishor 和 Johnson 2004；Jeyaseelan 等 2007；Hindin，Kishor 和Ansara 2008；Koening 等 2006；Martin 等 2002。
19. Miller 2008。
20. Beaman 等（待出版）；Chattopadhyay 和 Duflo 2004。
21. Beaman 等（待出版）。
22. Agarwal 2010a；Agarwal 2010b。

23. 世界银行 2005。

24. 世界银行 2001。

25. 世界银行 2011。

26. 见 世界银行 2001 和世界银行 2011b，我们的概念框架来自这两份文献。

27. Chioda，Garcia-Verdu 和 Muñoz Boudet 2011。

28. 世界银行 2008。

29. Lewis 和 Lockheed 2006。

30. Chioda，Garcia-Verdu 和 Muñoz Boudet 2011。

31. 计算方法以 Anderson 和 Ray（2010）为基础，详细介绍见第 3 章。

32. 女孩大量“失踪”的问题最早见于 Sen（1992），Coale（1984）和 Das Gupta（1987）。

33.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及世界银行 2010。

34. 粮农组织 2011。

35. 在本章讨论中，“企业家”（entrepreneur）包括那些不雇用其他人的自雇者和有雇员的雇主。

36. Sabarwal，Terrell 和 Bardasi 2009；Bruhn 2009；Hallward-Driemeier 2011。

37. Costa 和 Rijkers 2011。

38. 粮农组织 2011。

39. Nyamu-Musembi 2002。

40. Deere 和 Doss 2006。

41.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ICF Macro 2010 所作的估算。

42. Reed 等 2010。

43.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44.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2010。

45. Agarwal 和 Panda 2007。

46. Pranyk 等 2006；ICRW 2006；Swaminathan，Walker 和Rugadya 2006。

47. Dercon 和 Singh 2011。

48. Fernández 和 Fogli 2009；Fogli 和 Velkdkamp 2010；Farré 和 Vella 2007。

49. Agarwal 和 Panda 2007。

50. Gage 2005。

51. Yount 和 Carrera 2006; Castro, Casique 和Brindis 2008。

52. Abrahams 等2009。

53. Kishor 和 Johnson 2004。

54. 世界银行 2005。

55. Chung 和 Das Gupta 2007。

56. Waddington 等 2009。

57. Chioda，Garcia-Verdu 和 Muñoz Boudet。

58. Björkman 和 Svensson 2009。

59. Cotlear 2006。

60. Lim 等 2010，“Janani Suraksha Yojana”项目对围产期胎儿和新生儿死亡率也有很大影响，每千例怀孕的围产期胎儿死亡数下降了 3.7 个，每千例活产的新生儿死亡数下降了 2.5 个。这项研究未能发现对孕妇死亡率的影响；不过，这可能是由于孕妇死亡本身是一个相对少见的情况，而研究样本数量不够大，只能发现非常重大的影响。

61. Prata 等2010；世界卫生组织等2010。

62. Baris，Mollahaliloglu 和Sabahattin 2011。

63. Fiszbein 等2009。

64. 粮农组织 2003。

65. Deininger，Ali 和 Zevenbergen 2008。

66. Leonard 1989，Holzer 和 Neumark 2000。

67. Holzer 和 Neumark 2000。

68. Gornick 和 Jacobs1998；经合组织 1993；Schmidt 1993。

69. Bosch 和 Maloney 2010。

70. Esteve-Volart 和 Bagues 2010。

71. 配额在不同地区滚动式实施。

72. Gajig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11。

73. Natarajan 2005。

74. Barker 和 Ricardo 2005。

75. Terefe 和 Larson 1993。

76. 对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研究见 Rawlings 和Rubio（2003），对哥伦比亚的研究见 Barrera-Osorio 和 Linden（2009），对厄瓜多尔的研究见 Schady 和 Araujo（2006）。

77. Baird 等2009。

78. Nguyen 2008。

79. Jensen 2010。

80. Angrist 和 Lavy 2009；Kremer，Miguel 和 Thornton 2009。

81. Attanasio, Kugler 和 Meghir 2008; Ñopo, Robles 和 Saavedra 2007；Hjort 等 2010。

82. Hjort 等2010。

83. Ross 等2007。

84. Gilliam 2010；Bearinger 等2007。

85. Bandiera 等2011。

86. Martinez 等2011。

87. Beaman 等2009。

88. Jensen 2010。

89. Barker 等2011。

参考文献

“processed”一词表示通常在图书馆无法获取的非正式再版文献。

Abrahams, Naeemah, Rachel Jewkes, Lorna J. Martin, Shanaaz Mathews, Lisa Vetten, and Carl Lombard. 2009. "Mortality of Women from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A 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Violence and Victims* 24 (4): 546–56.

Agarwal, Bina. 1994. *A Field of One's Own: 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3 (1): 1–51.

———. 2010a. "Does Women's Proportional Strength Affect Their Participation? Governing Local Forests in South Asia." *World Development* 38 (1): 98–112.

———. 2010b. *Gender and Green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Presence Within and Beyond Community Fores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garwal, Bina, and Pradeep Panda. 2007. "Toward Freedom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glected Obviou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8 (3): 359–88.

Alene, Arega D., Victor M. Manyong, Gospel O. Omanya, Hodeba D. Mignouna, Mpoko Bokanga, and George D. Odhiambo. 2008.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upply Response of Women as Farm Managers: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Western Kenya." *World Development* 36 (7): 1247–60.

Allendorf, Keera. 2007. "Do Women's Land Rights Promote Empowerment and Child Health in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35 (11): 1975–88.

Anderson, Siwan, and Debraj Ray. 2010. "Missing Women: Age and Disea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 (4): 1262–300.

Andrabi, Tahir, Jishnu Das, and Asim Ijaz Khwaja. 2011. "Students Today, Teachers Tomorrow. Identifying Constraints on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67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ngrist, Joshua, and Victor Lavy. 2009. "The Effects of High Stakes High School Achievements Award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4): 1384–414.

Attanasio, Orazio, Adriana Kugler, and Costas Meghir. 2008. "Training Disadvantaged Youth in Latin America: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Working Paper Series 1393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ttanasio, Orazio, and Valérie Lechene. 2002. "Tests of Income Pooling in Household Decision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4): 720–48.

Baird, Sarah, Ephraim Chirwa, Craig McIntosh, and Berk Özler. 2009. "The Short-term Impacts of a School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on the Sexual Behavior of Young Wome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08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ndiera, Oriana, Niklas Buehren, Robin Burguess, Markus Goldstein, Selim Gulesci, Imran Rasul, and Munshi Sulaiman. 2011.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Female Adolescents: Evidence from Uganda." Presentation to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Pittsburgh, PA.

Baris, Enis, Salih Mollahaliloglu, and Aydin Sabahattin. 2011. "Healthcare in Turkey: From Laggard to Leader."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2 (c7456): 579–82.

Barker, Gary, Manuel Contreras, Brian Heilman, Ajay Singh, Ravi Verman, and Marcos Nascimento. 2011. "Evolving Men: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Survey (IMAG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Instituto Promundo, Washington, DC.

Barker, Gary, and Christine Ricardo. 2005. "Young M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HIV/AIDS, Conflict, and Violence."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rrera-Osorio, Felipe, and Leigh L. Linden. 2009. "The Use and Misuse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Colomb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83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eaman, Lori, Raghabendra Chattopadhyay,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2009. "Powerful Women: Does Exposure Reduce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497–540.

Beaman, Lori,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Forthcoming. "Political Reserv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In *India Policy Forum,* 2010, ed. Suman Bery, Barry Bosworth, and Arvind Panagariy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Washington, DC, and New Delhi.

Bearinger, Linda H., Renee E. Sieving, Jane Ferguson, and Vinit Sharma. 2007.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f Adolescents: Patterns, Prevention, and Potential." *Lancet* 369 (9568): 1220–31.

Berniell, Maria Inés, and Carolina Sánchez-Páramo. 2011. "Overview of Time Use Data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Patter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Björkman, Martina, and Jacob Svensson. 2009. "Power to the Peopl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on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in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2): 735–69.

Booth, Alison L., and Patrick J. Nolen.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Behaviour: Does Nurture Matter?" Centre for Economy Policy Research, London.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Using Markov Processes: An Application to Informality." *Labour Economics* 17 (4): 621–31.

Bruhn, Miriam. 2009. "Female-Owned Firms in Latin America. 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and Obstacles to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12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stro, Roberto, Irene. Casique, and Claire D. Brindis. 2008. "Empowerment and Physical Violence throughout Women's Reproductive Life in Mexico."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4 (6): 655–77.

Chattopadhyay, Raghabendra, and Esther Duflo. 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72 (5): 1409–43.

Chioda, Laura, with Rodrigo Garcia-Verdú, and Ana María Muñoz Boudet. 2011. *Work and Family: Latin American Women in Search of a New Balance.*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and Poverty Gender Group, LAC.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ung, Woojin, and Monica Das Gupta. 2007. "The Decline of Son Preference in South Korea: The Roles of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4): 757–83.

Coale, Ansley J. 1984.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Report 27,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ashington, DC.

Costa, Rita, and Bob Rijkers. 2011. "Gender and Rural Non-Farm Entrepreneurship."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otlear, Daniel, ed. 2006.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Peru: An Agenda for Improving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the Social Safety Net.*" Country Stud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roson, Rachel, and Uri Gneezy.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 (2): 448–74.

C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 Baqué. 2011.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as Gupta, Monica. 1987. "Selectiv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 Children in Rural Punjab, Ind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 (1): 77–100.

Deere, Carmen Diana, and Cheryl R. Doss. 2006.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6/115,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and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Deininger, Klaus, Daniel Ayalew Ali, Holden T. Stein, and Jaap Zevenbergen. 2008. "Rural Land Certification in Ethiopia: Process, Initial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6 (10): 1786–812.

Dercon, Stefan, and Abhijeet Singh. 2011. "From Nutrition to Aspirations and Self-Efficacy: Gender Bias over Time among Children in Four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U.K. Processed.

Do, Quy-Toan, Andrei Levchenko, and Claudio Raddatz. 2011. "Engendering Trad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oss, Cheryl R. 2006. "The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Property Ownership on Expenditure Patterns in Ghan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5 (1): 149–80.

Duflo, Esther. 2003. "Grandmothers and Granddaughters: Old-Age Pension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 (1): 1–25.

Dumas, Christelle, and Sylvie Lambert. 2011.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Causality and Mechanisms in Senegal."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 (1): 1–26.

Esteve-Volart, Berta, and Manuel F. Bagues. 2010. "Are Women Pawns in the Political Game? Evidence from Elections to the Spanish Senat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30, Fundación de Estudios de Economía Aplicada, Madrid.

Farré, Lídia, and Francis Vella. 2007.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80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Fehr, Ernst, Urs Fischbacher, and Simon Gächter. 2002. "Strong Reciprocity, Human Coopera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Social Norms." *Human Nature* 13 (2002): 1–25.

Felitti, Vincent D., Robert F. Anda, Dale D. Nordenberg, David F. Williamson, Alison M. Spitz, Valerie Edwards, Mary P. Koss, and James S. Marks.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 (4): 245–58.

Fernández, Raquel, and Alessandra Fogli. 2009. "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1): 146–77.

Fiszbein, Ariel, Norbert Schady, Francisco H. G. Ferreira, Margaret Grosch, Nial Kelleher, Pedro Olinto, and Emmanuel Skoufias. 2009.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ogli, Alessandra, and Laura Veldkamp. Forthcoming. "Nature or Nurture? Learning and the Geography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conometrica.*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03. "Revisiting the 'Magic Box.' " Case Studies in Local Appropri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AO, Rome.

———.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 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FAO, Rome.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IFA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0.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Status, Trends and Gaps." FAO, IFAD, and ILO, Rome.

Gage, Anastasia J. 2005. "Women's Experi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Haiti."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1 (2): 343–64.

Gajigo, Ousman, and Mary Hallward-Driemeier. 2011.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New Entrepreneurs in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ilbert, Robert A., Webster D. Sakala, and Todd D. Benson. 2002. "Gender Analysis of a Nationwide Cropping System Trial Survey in Malawi."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6 (1).

Gilliam, Melissa L. 2010. "Interventions for Preventing Unintended Pregnancies among Adolescent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15 (1): 171–72.

Gneezy, Uri, Kenneth L. Leonard, and John A. List.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 *Econometrica* 77 (5): 1637–64.

Gornick, Janet C., and Jerry A. Jacobs. 1998. "Gender, the Welfare State, and Public 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5): 688–710.

Haddad, Lawrence, John Hoddinott, and Harold Alderman. 1997.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s, Methods, and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11. "Improving the Legal Investment Climate for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indin, Michelle J., Sunita Kishor, and Donna L. Ansara. 2008.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Couples in 10 DHS Countries: Predictors and Health Outcomes." DHS Analytical Studies 18, U.S. Agency for I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Hjort, Jonas, Michael Kremer, Isaac Mbiti, and Edward Miguel. 2010. "Vocational Education Vouchers and Labor Market Returns: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among Kenyan Youth." Harvard University and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Berkeley, CA. Processed.

Hoddinott, John, and Lawrence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ô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1): 77–96.

Holzer, Harry J., and David Neumark. 2000. "Assessing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 (3): 483–568.

Hurst, Erik, Chang-Tai Hsieh, Charles Jones, and Peter Klenow. 2011.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Booth, Chicago. Processed.

ICF Macro. 2010.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Measure DHS, ICF Macro, Calverton, MD.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0.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ILO, Geneva.

ICRW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2006. *Property Ownership & Inheritance Rights of Women for Social Protection: The South Asia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ICRW.

Iyer, Lakshmi, Anandi Mani, Prachi Mishra, and Petia Topalova. 2010.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India's Panchayati Ra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Jensen, Robert. 2010.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eyaseelan, L., Shuba Kumar, Nithya Neelakantan, Abraham Peedicayil, Rajamohanam Pillai, and Nata Duvvury. 2007. "Physical Spous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India: Some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39 (5): 657–70.

Kabeer, Nalia. 1996. "Agency, Well-Being & Inequality: Reflections on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Poverty." *IDS Bulletin* 27 (1): 11–21.

———. 1999.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 (3): 35–64.

Katz, Elizabeth, and Juan Sebastian Chamorro. 2003. "Gender, Land Rights,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Rural Nicaragua and Hondur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Puebla, Mexico, October 9.

Kinkingninhoun-Mêdagbé, Florent M., Aliou Diagne, Franklin Simtowe, Afiavi R. Agboh-Noameshie, and Patrice Y. Adégbola. 2010.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Benin."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7 (1): 57–69.

Kishor, Sunita, and Kiersten Johnson. 2004. *Profiling Domestic Violence: A Multi-Country Study*. Calverton, MD: ORC Macro.

Koenig, Michael A., Rob Stephenson, Saifuddin Ahmed, Shireen J. Jejeebhoy, and Jacquelyn Campbell. 2006.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Northern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 (1): 132–38.

Kremer, Michael, Edward Miguel, and Rebecca Thornton. 2009. "Incentives to Lear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3): 437–56.

Leonard, Jonathan S. 1989. "Women and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1): 61–75.

Lewis, Maureen A., and Marlaine E. Lockheed. 2006. *Inexcusable Absence: Why 60 Million Girls Aren't in School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Lim, Stephen S., Lalit Dandona, Joseph A. Hoisington, Spencer L. James, Margaret C. Hogan, and Emmanuela Gakidou. 2010. "India's Janani Suraksha Yojana, A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 to Increase Births in Health Facilities: An Impact Evaluation." *Lancet* 375 (9730): 2009–23.

Luke, Nancy, and Kaivan Munshi. 2011. "Women as Agents of Change: Female Income and Mobility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1): 1–17.

Lundberg, Shelly J., Robert A. Pollak, and Terence J. Wales. 1997. "Do Husbands and Wives Pool Their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Child Benefi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3): 463–80.

Martin, Sandra L., Kathryn E. Moracco, Julian Garro, Amy Ong Tsui, Lawrence L. Kupper, Jennifer L. Chase, and Jacquelyn C. Campbell. 2002. "Domestic Violence across Generations: Findings from Northern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1 (3): 560–72.

Martinez, Sebastian, and others. 2011. "Hard Skills or Soft Skills." Presentation to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cEwen, Bruce S. 1999. "Stress and Hippocampal Plasticity."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2 (1): 105–22.

Miller, Grant. 2008. "Women's Suffrage,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and Child Survival in American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87–327.

Moock, Peter R. 1976. "The Efficiency of Women as Farm Managers: Keny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8 (5): 831–5.

Natarajan, Mangai. 2005. "Status of Women Police in Asia: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for Women and Policing* 17: 45–47.

Nguyen, Trang. 2008. "Information, Role Models and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Madagascar." Working Pap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Ñopo, Hugo, Miguel Robles, and Jaime Saavedra. 2007. "Occupational Training to Reduce Gender Segregation: The Impacts of ProJoven." Working Paper Series 62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Research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Nyamu-Musembi, Celestine. 2002. "Are Local Norms and Processes Fences or Pathways? The Example of Women's Property Rights." I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Africa,* ed. Abdullahi A. An-Na'im. London: Zed Books.

Oladeebo, J. O., and A. A. Fajuyigbe. 2007.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Men and Women Upland Rice Farmers in Osun State, Nigeria." *Journal of Human Ecology* 22 (2): 93–100.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 *Private Pay for Public Work. Performance-Related Pay for Public Sector Managers.* Paris: OECD.

Pathmanathan, Indra, Jerker Liljestrand, Jo M. Martins, Lalini C. Rajapaksa, Craig Lissner, Amalia de Silva, Swarna Selvaraju, and Prabha Joginder Singh. 2003. "Investing in Maternal Health Learning from Malaysia and Sri Lank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ata, Ndola, Paige Passano, Amita Sreenivas, and Caitlin Elisabeth Gerdts. 2010. "Maternal Mort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in Scaling Up Priority Interventions." *Women's Health* 6 (2): 311–27.

Pronyk, Paul M., James R. Hargreaves, Julia C. Kim, Linda A. Morison, Godfrey Phetla, Charlotte Watts, Joanna Busza, and John D. H. Porter. 2006. "Effect of a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Intimate-partner Violence and HIV in Rural South Africa: A Cluster Randomized Trial." *Lancet* 2368 (9551): 1973–83.

Qian, Nancy.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51–85.

Quisumbing, Agnes R., and John A. Maluccio. 2000.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and Gender Relation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84,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Rawlings, Laura, B., and Gloria M. Rubio. 2003.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11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eed, Elizabeth, Anita Raj, Elizabeth Miller, and Jay G. Silverman. 2010. "Losing the 'Gender' in Gender-Based Violence: The Missteps of Research on Dating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 (3): 348–54.

Ross, David A., John Changalucha, Angela I. N. Obasi, Jim Todd, Mary L. Plummer, Bernadette Cleophas-Mazige, Alessandra Anemona, Dean Everett, Helen A. Weiss, David C. Mabey, Heiner Grosskurth, and Richard J. Hayes. 2007. "Biological and Behavioural Impact of an Adolescent Sexual Health Intervention in Tanzania: A Community-Randomized Trial." *AIDS* 21 (14): 1943–55.

Rubalcava, Luis, Graciela Teruel, and Duncan Thomas. 2009. "Investments, Time Preferences, and Public Transfers Paid to Wom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7 (3): 507–38.

Sabarwal, Shwetlena, Katherine Terrell, and Elena Bardasi. 2009. "How Do Female Entrepreneurs Perform? Evidence from Three Developing Region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aito, Katrine A., Hailu Mekonnen, and Daphne Spurling. 1994. "Rai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Women Farmers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 Technical Depart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chady, Norbert, and Maria Caridad Araujo. 2006. "Cash Transfers, Conditions, School Enrollment, and Child Work: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Ecuad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9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chady, Norbert, and José Rosero. 2008. "Are Cash Transfers Made to Women Spent Lik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Economics Letters* 101 (3): 246–48.

Schmidt, Manfred G. 1993. "Gendered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Families of Nations: Patterns of Public Polic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 Frances G. Castles.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Aldershot, U.K., and Brookfield, VT.

Sen, Amartya. 1990.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Development,* ed. Irene Tink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Missing Wome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4: (6827): 587–8.

———.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

Swaminathan, Hema, Cherryl Walker, and Margaret A. Rugadya, eds. 2008. *Women's Property Rights, HIV and AIDS, and Domestic Violenc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wo Rural Districts in South Africa and Uganda.* Cape Town: HSRC Press.

Terefe, Almas, and Charles P. Larson. 1993. "Modern Contraception Use in Ethiopia: Does Involving

Husbands Make a Dif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3 (11): 1567–71.

Thomas, Duncan.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 (4): 635–64.

Thomas, Duncan, John Strauss, and Maria-Helena Henriques. 1990. "Child Survival, Height for Age,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in Brazi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3 (2): 197–234.

Udry, Christopher. 1996. "Gen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Househo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5): 1010–4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9."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2010. "The World's Women 2010: Trends and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Vargas Hill, Ruth, and Marcella Vigneri. 2009. "Mainstreaming Gender Sensitivity in Cash Crop Markets Supply Chains."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Waddington, Hugh, Birte Snilstveit, Howard White, and Lorna Fewtrell. 2009.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 to Combat Childhood Diarrhoe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1E, Synthetic Review, New Delhi,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itial Results on Prevalence, Health Outcomes and Women's Responses." WHO, Geneva.

WHO,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 Fund),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World Bank. 2010.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08." WHO, Washington, 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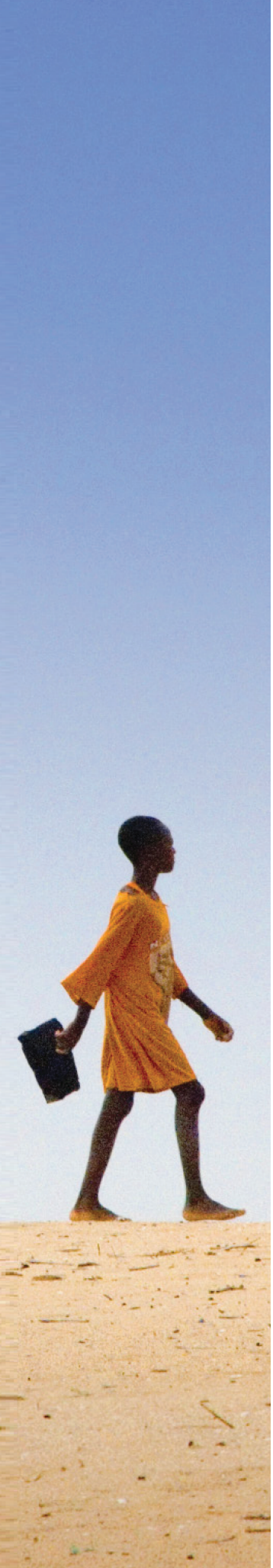
World Bank. 2001. "Engendering Development—Through Gender Equality, Resources, and Voice.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0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Equ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 "Defining Gender in the 21st Century: Talking with Women and Men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ountry Qualitative Study of Gender and Economic Choic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Yount, Kathryn M., and Jennifer S. Carrera. 2006.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Married Women in Cambodia." *Social Forces* 85 (1): 355–87.



引言：报告导读

性别一词系指由社会建构的、后天习成的男女两性的角色分工、行为差异及对两性关系的期望规范。在所有文化形态中，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均被阐释为何种行为方式、何种活动内容适合何种性别，以及两性的权利、资源和能力等观念。例如，大多数社会认为看护婴幼儿是成年女性和女孩的主要责任，兵役和国家安全则是男人的事情。这样，性别塑造了一个人在家庭、社会和经济体中一生的机会。

终其一生，个体的性别差异表现为两性在人力资本、经济机会、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不平等。通过决定男孩或女孩的教育差异或其工作场所差异，性别因素决定家庭在儿女之间分配资源的方式。儿子通常在农场或其他市场从事劳动，而女儿通常在家里从事看护活动。等到男孩和女孩长大成人并组建自己的家庭时，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通常低于男性（尽管这一状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女性劳动力人数较少、劳动时间较长、工资较低，而且在社区和社会中，女性话语权较弱。

为何性别平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为什么性别差异会对发展产生影响？随着国家的发展，性别差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报告认为，性别平等和发展的关系是双向的，而这一关系的任一方向都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收入增加和服务提供改善都有助于增强性别平等，广义上，二者均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全球财富的增加大大缩减了教育、健康成果以及劳动力市场机会等方面的性别差异，这正是原因所在。在世界范围内，在大学就读的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人数。在世界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超过了 40%。

但是，并非所有的性别差异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缩减或正在缩减。对贫穷女孩和居住在偏远地区或属于被排斥群体的女孩而言，在同等条件下，女孩到小学或中学就读的可能性远远低于男孩。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和女孩，尤其是婴儿期、儿童期或生育期的女性和女孩的死亡率要高于男性。一直以来，女性聚集在贴有“女性”标签的领域或行

业，这些领域或行业的报酬较低。女性更容易成为国内暴力活动的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也更大。女性在政治领域的代表性和在企业高级管理层的代表性远远低于男性，这在各地各业几乎无一例外。

了解哪些性别差异与经济发展相关及其原因与政策密切相关，因为这种了解有助于揭示需要予以关注的性别差异。和工资差异、农业生产力差异和社会话语权差异等更为顽固的性别差异相比，那些女性和男性或女孩和男孩之间随着国家日渐富裕而缩减的不平等问题（例如，教育获得差异）需要较少的基于性别透镜的政策关注。

反过来，性别平等对发展的作用，也会对政策产生影响。原因有二。首先，性别平等本身就很重要，这是因为每个人，无论男女，获得选择自我生活方式及免于绝对贫困的能力都是一项基本人权。由于发展是扩大自由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核心目标。正如减少收入贫困或扩大公正待遇是发展的组成部分，缩减两性的福利差异也是发展的组成部分。

其次，增强性别平等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其他发展成果。来自一组（缓慢）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论据提出了通过增强性别平等促进发展的三大渠道：

- 减少更有效地配比女性技能和才干的障碍因素，可以产生巨大的（而且是持续增加的）生产效益。
- 提升女性禀赋、增加女性机会并提高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下一代带来更积极的成果。
- 提高女性的个体或集体能动性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制度和政策选择。

女性技能和才干的不当配比将产生巨大的（不断增加的）经济成本

性别平等可以极大地影响生产率，特别是在女性在世界劳动力中和在世界大学生中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对那些正在挖掘本国潜力的国家而言，女性的技能和才干应该配比在可以让能力得到最佳使用的活动中。但是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女性的劳动力常常得不到充分使用，或者被不当配比，这是因为她们在市场上遭遇歧视，或者社会制度阻碍她们获得生产性投入和信贷，进入某些行业或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收入。结果只能是经济损失。

根据粮农组织的估测，如果女性和男性农民在获得生产资源方面实现了平等，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可以提高 2.5%~4.0%。[1] 消除阻碍女性进入某些领域或行业的障碍同样会产生相似的积极效果，每位工人的产出会增加 13%~25%。[2]

这些收益相当可观。在一体化日趋加强、充满激烈竞争的 21 世纪，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哪怕极其微小的提升都会对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成本更高，这是因为性别不平等降低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而对专门经营两性同样胜任的出口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3] 对女性劳动力依赖程度较高的工业在女性获得更多平等待遇的国家中扩张更快。[4] 此外，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降低了性别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尤其是降低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经济参与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和延迟行动的国家相比较，将具有明显的优势。

世界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除非今天劳动力数量较少的群体（主要是女性）大幅度提升其劳动力数量，照顾数量日益增加的老人群体的工人将减少。以欧洲为例，预计到 2040 年的工人缺口是

2 400 万，但如果女性参与率达到与男性相等的程度，那么该缺口会降低到 300 万。[5] 面临该问题的，不只是富裕国家。在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比如中国或东欧），鼓励女性加入或留在劳动力大军中，可以降低工作年龄人口缩减所造成的影响。

女性的禀赋、机会和能动性对下一代产生重大影响

赋予女性经济权利、提供女性对资源的控制力也将增加对儿童健康、教育和营养的投资，从而促进未来经济的增长。来自孟加拉国、巴西、科特迪瓦、墨西哥、南非和英国等众多国家的证据显示，增加由女性控制的家庭收入的份额，无论是通过增加女性自身的收入或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的方式，都会使家庭支出方式朝着有利于儿童的方向转变。[6]

女性健康状况的改善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样惠及下一代人的发展。从免疫率到营养再到儿童死亡率，妈妈的营养状况越好、教育程度越高，孩子的健康状况也越好。[7] 在众多国家中，妈妈的教育程度与儿童的教育获得呈正相关关系。在巴基斯坦，那些母亲接受过教育（即使只是一年）的孩子每天会在家里多学习一个小时，他们的考试成绩也比较高。[8]

如同家暴所示，女性缺乏能动性会对其孩子日后作为成人的认知行为和健康产生影响。发达国家的医学研究已经发现，儿童时期亲历过家暴的成人与其健康问题存在联系。众多研究同样证明，儿童时期亲眼看见父母间暴力行为的儿童成人后，女性忍受来自伴侣的家暴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而男性对自己伴侣实施家暴的可能性也更大。[9]

提升女性的个体和集体能动性将形成更好的结果、制度和政策选择

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男性和女性的能动性也不同。所谓能动性，就是作出选择实现期望结果的能力。而女性常常处于劣势地位。当女性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和政治选择，对法律、政治和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制度和政策的天平更容易有计划地倾向于影响力较大的群体的利益。这样，矫正制度限制和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制度限制和市场失灵滋长性别不平等，从而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的代际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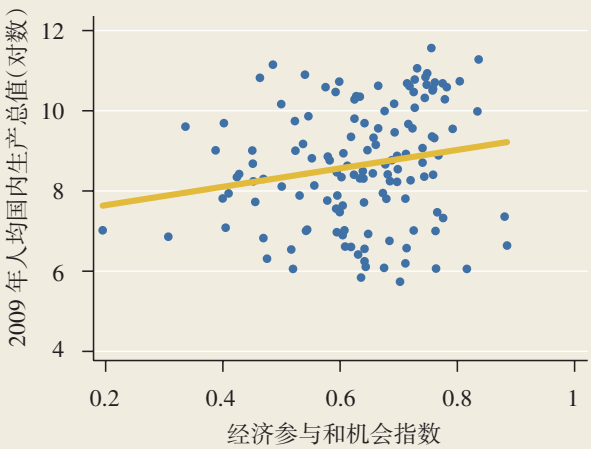
对社会整体而言，女性的集体能动性可以催化改革。赋予女性作为政治和社会行动者的权利可以改变政策选择，使制度体现更多人的意见。在美国，女性投票权促使决策者转而重视儿童和母亲健康问题，婴儿死亡率因此下降了 8%~15%。[10] 在印度，（通过政治配额制）赋予地方层面女性权利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既包括洁净水和卫生设施等女性偏爱的公共物品，也包括灌溉系统和学校等男性垂青的公共物品）。女性的集体能动性还减少了腐败行为，增加了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的报告率及罪犯逮捕率。[11]

几项使用跨国数据的研究已经发现，就总体水平而言，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关系。由于增长和性别平等的关系是双向的，和那些宏观经济研究相比较，研究的结果更难于解释（见专栏 0.1）。但是将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就为性别平等和增长密切相关、性别平等在许多方面对增长产生影响这一观点提供了相当多的论据。但正如我们在专栏里讨论的那样，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开展更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开展可以建构性

专栏 0.1　预测性别平等对发展的影响时所面临的问题

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收入和性别平等呈正相关关系。专栏图 0.1 以一种标准，即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参与和机会指数展示了这种相关性。该指数衡量了女性和男性在劳动力参与、工资、收入、政治参与以及技术工人数量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专栏图 0.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性别平等呈正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和 2010 年世界经济论坛。

这种相关性是关于增长对性别平等的影响还是关于性别平等对增长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事实上，它可能同时表现了两方面的关系（双向关系），只是从跨国数据中，我们尚不能明确那种关系更重要[a]。

性别平等和增长有充分的理由表现为双向关系。首先，随着技术变革的推进（技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步），手工技能的相对收益降低，认知技能的相对收益增加。其次，经济增长有助于服务提供的改善，这可以加强性别平等，如加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见第 3 章）。

其他因素持续发挥作用，同时促进性别平等和增长发生改变。以旨在改善教育状况的投资为例。对蠕虫除治和营养干预的研究显示这些措施对女孩的益处超过了对男孩的益处。每一种干预都有助于改善性别平等和提高人力资本，而性别平等和人力资本都可以独立对增长产生影响。现在以制度变革为例。制度可以促进增长，某些制度可以增强性别平等。假设一国正在通过扩大法庭和警察的覆盖范围并提高其效率完善自身的法律体系，这种扩大有助于促进增长（这是因为合同可以得到有效履行），有助于增强性别平等（这是因为女性可以较为容易地使用司法体系）。根据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性别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变革。所以实际上，性别平等和增长的相关性可能与第三个因素相关，这第三个因素可以同时引起性别平等和增长的变化。

这种关系并不强大。实证工作显示，性别平等与增长的相关程度与所处时期和所在国家息息相关。例如，对女性教育和增长关系的研究显示结果与分析方式密切相关。的确，改变对这种关系进行衡量的方式可以使女性教育对增长的影响从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

总之，性别平等与增长的关系不仅复杂，而且显而易见是双向的。宽泛的跨国研究不能确定这种研究的重要性，也不能就这种关系的驱动因素提供重要的见解。细致的微观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一些，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提供更多可靠的论据，这些论据不仅包括性别平等对增长重要性方面的论据，也包括那些需要采取政策干预的论据。

资料来源：Alesina，Giuliano 和 Nunn，待出版；Kremer，Miguel 和 Thornton 2004；Maluccio 等 2009；Munshi 和 Rosenzweig 2005；Qian 2008。
a.关于这些原因更详细的讨论，见 Bandiera 和 Natraj 2011，Cuberes 和 Teignier 2011。

别平等和增长因果关系的微观经济分析，从而突出强调可以降低性别差异、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渠道。

本报告采取了哪些行动

本报告强调性别平等与发展的经济意义。本报告通过经济学透镜理解导致性别福利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禀赋，经济机会和生产性要素的获得，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或能动性。它使用同一方法探究何种政策干预和广泛的社会行动可以降低性别差异，改善结果。本报告并不局限于经济成果，事实上，本报告同样重视人力资本禀赋、经济机会和能动性的作用，这表明，三者密切相关，都是决定福利程度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报告也没有忽视正规或非正规社会政治制度在决定性别成果时的核心作用。

在分析各国在不同时间段的性别差异及其模式时，本报告采用的实验

地图 0.1 已经进行了定性评估的经济体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主义方法强调基于证据的分析和具有可行性的因果关系。基此，本报告参考了大量的、不断增加的对性别的定量研究，并以新的分析对其进行补充，尤其是以时间使用、家暴、死亡风险、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和生产能力、农业和企业家能力等方面的分析进行补充。本报告也参考了新的定性分析，涉及来自 19 个发展中国家 98 个社区的 4 000多位男性和女性（见地图0.1），研究性别如何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愿望、教育、工作机会、决策和福利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详细情况请见概述部分专栏 3）。[12]

本报告这样的世界性报告不能以深刻分析具体国家的环境为己任。同样，本报告也不能涉及性别平等相关的方方面面。相反，本报告为诠释性别不平等和推介公共政策提供了概念性框架，必要时可以修改该框架以适应具体国家、问题和领域。在之前世界银行就性别和发展问题（最著名的就是《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开展的工作的基础上，该框架假设可以通过家庭对正规和非正规的市场与制度的功能和结构的响应来理解性别成果。然后，通过重点强调世界上性别平等进展最快的方面和鲜有进展或进展非常缓慢的方面，阐述框架的使用方法。其中，性别平等进展最快的方面包括教育、寿命、劳动力参与率和法律权利向女性的延伸，性别平等鲜有进展或进展非常缓慢的方面包括女性超额死亡，经济活动分割和女性在私营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能动性。

这种实证主义方法有助于建立分析和政策选择之间的联系。它强调旨在缩减具体性别差异的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家庭活动，市场和正规、非正规制度的功能与结构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替代性政策的分

析，它显示当这些因素得不到考虑时，政策干预的预期结果会大打折扣，甚至和预期结果相反。

报告导读：路线图

本报告由三个部分、九章内容组成。第一部分《评估性别平等现状》陈述的现实状况为本报告其他部分奠定了基础。它将现存数据和新数据结合在一起，记载了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各国各地区有关性别平等主要方面的变化。它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性别平等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非常迅速的、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进展（见第 1 章），但是，它并没有覆盖所有的女性，而且，性别平等各方面的进展是不均衡的（见第 2 章）。

本报告前两章所述的模式对比和趋势对比促使人们询问可以解释性别平等取得进展或缺乏进展的因素。第二部分《性别平等的促进因素有哪些？阻碍因素又有哪些？》构成了本报告分析的核心部分。第二部分提出了概念性框架，并应用该框架对促进变革的因素和阻碍进步的限制因素进行研究。本部分分析以教育和健康（见第 3 章）、能动性（见第 4 章）和经济机会获得（见第 5 章）等领域的性别差异为重点，讨论经济增长、家庭、市场和制度在决定上述领域成果时所发挥的作用。第二部分结尾部分讨论了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对新的经济与社会趋势所创造的机会和挑战予以关注（见第 6 章）。第二部分包括四章内容，这四章的分析确定了行动的四大优先领域：缩减人力资本禀赋的性别差异，拓宽女性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消除家庭和社会发言权方面的性别差异，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第三部分《公共行动的作用和潜力》提出了政策建议，对性别平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全球行动议程。讨论先对针对四大优先领域的政策选择进行了详细描述，接着对不同情景下的成功干预进行了详实的具体阐述（见第 7 章）。随后，本部分研究了性别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重点放在区分本领域改革与其他类型的再分配改革或增强平等的改革这一问题上（见第 8 章）。性别平等全球行动应当将重点放在配合国家在本报告确认的四大优先领域中的行动（见第 9 章）。

注释

1. 粮农组织，农业发展基金和国际劳工组织 2010。

2. Cuberes 和 Teignier Baqué 2011；Hurst 等 2011。

3. 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4. Ibid。

5. 麦肯锡 2007。

6. Haddad，Hoddinott 和 Alderman 1997；Katz 和 Chamorro 2003；Duflo 2003；Thomas 1990；Hoddinott 和 Haddad 1995；Lundberg，Pollak 和 Wales 1997；Quisumbing 和 Maluccio 2000；Attanasio 和 Lechene 2002；Rubalcava，Teruel 和 Thomas 2009；Doss 2006；Schady 和 Rosero 2008。

7. Thomas，Strauss 和 Henriques 1990；Allendorf 2007。

8. Andrabi，Das 和 Khwaja 2008；Dumas 和 Lambert 2010。

9. Kishor 和 Johnson 2004；Jeyaseelan 等 2007；Hindin，Kishor 和 Ansara 2008；Koenig 等 2006；Martin 等 2002。

10. Miller 2008。

11. Beaman 等，待出版；Chattopadhyay 和 Duflo 2004；Iyer 等 2010。

12. 世界银行 2011。

参考文献

“已处理”一词指的是那些经人复述、且图书馆里通常找不到的作品。

Alesina, Alberto, Paola Giuliano, and Nathan Nunn F. 2011. "Fertility and the Ploug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1 (3): 499–503.

Allendorf, Keera. 2007. "Do Women's Land Rights Promote Empowerment and Child Health in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35 (11): 1975–88.

Andrabi, Tahir, Jishnu Das, and Asim Ijaz Khwaja. 2008. "A Dime a Day: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Private Schooling in Pakist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2 (3): 329–55.

Attanasio, Orazio, and Valérie Lechene. 2002. "Tests of Income Pooling in Household Decision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4): 720–48.

Bandiera, Oriana, and Ashwini Natraj. 2011. "Does Gender Inequality Hinder Growth? The Eviden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Beaman, Lori,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Forthcoming. "Political Reserv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In *India Policy Forum, 2010,* ed. Suman Bery, Barry Bosworth, and Arvind Panagariy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search, Washington, DC, and New Delhi.

Chattopadhyay, Raghabendra, and Esther Duflo. 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72 (5): 1409–43.

C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 Baqué. 2011.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o, Quy-Toan, Andrei Levchenko, and Claudio Raddatz. 2011. "Engendering Trad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oss, Cheryl R. 2006. "The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Property Ownership on Expenditure Patterns in Ghan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5 (1): 149–80.

Duflo, Esther. 2003. "Grandmothers and Granddaughters: Old-Age Pension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 (1): 1–25.

Dumas, Christelle, and Sylvie Lambert. 2011.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Causality and Mechanisms in Senegal."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 (1): 1–26.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FA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0.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Status, Trends and Gaps." FAO, IFAD, and ILO, Rome.

Haddad, Lawrence, John Hoddinott, and Harold Alderman. 1997.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s, Methods, and Poli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indin, Michelle J., Sunita Kishor, and Donna L. Ansara. 2008.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Couples in 10 DHS Countries: Predictors and Health Outcomes." DHS Analytical Studies 18,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Hoddinott, John, and Lawrence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ô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1): 77–96.

Hurst, Erik, Chang-Tai Hsieh, Charles Jones, and Peter Klenow. 2011.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Booth, Chicago, IL. Processed.

Iyer, Lakshmi, Anandi Mani, Prachi Mishra, and Petia Topalova. 2010.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India's Panchayati Ra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Jeyaseelan, L., Shuba Kumar, Nithya Neelakantan, Abraham Peedicayil, Rajamohanam Pillai, and Nata Duvvury. 2007. "Physical Spous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India: Some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39 (5): 657–70.

Katz, Elizabeth G., and Juan Sebastian Chamorro. 2003. "Gender, Land Rights,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Rural Nicaragua and Hondur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Puebla, Mexico, October 9.

Kishor, Sunita, and Kiersten Johnson. 2004. *Profiling Domestic Violence—A Multi-Country Study*. Calverton, MD: ORC Macro.

Koenig, Michael A., Rob Stephenson, Saifuddin Ahmed, Shireen J. Jejeebhoy, and Jacquelyn Campbell. 2006.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Northern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6 (1): 132–38.

Kremer, Michael, Edward Miguel, and Rebecca Thornton. 2009. "Incentives to Lear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3): 437–56.

Lundberg, Shelly J., Robert A. Pollak, and Terence J. Wales. 1997. "Do Husbands and Wives Pool Their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Child Benefi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3): 463–80.

Maluccio, John A., John Hoddinott, Jere R. Behrman, Reynaldo Martorell, Agnes R. Quisumbing, and Aryeh D. Stein. 2009. "The Impact of Improving Nutrition during Early Childhood on Education among Guatemalan Adults." *Economic Journal* 119 (537): 734–63.

Martin, Sandra L., Kathryn E. Moracco, Julian Garro, Amy Ong Tsui, Lawrence L. Kupper, Jennifer L. Chase, and Jacquelyn C. Campbell. 2002. "Domestic Violence across Generations: Findings from Northern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1 (3): 560–72.

McKinsey & Company Inc. 2007. "Women Matter. Gender Diversity, A Corporate Performance Driver." McKinsey & Company Inc., London.

Miller, Grant. 2008. "Women's Suffrage,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and Child Survival in American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87–327.

Munshi, Kaivan, and Mark Rosenzweig. 2006.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Meet the Modern World:

Caste, Gender and Schooling Choice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4): 1225–52.

Qian, Nancy.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51–85.

Quisumbing, Agnes R., and John A. Maluccio. 2000.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and Gender Relation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84,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Rubalcava, Luis, Graciela Teruel, and Duncan Thomas. 2009. "Investments, Time Preferences, and Public Transfers Paid to Wom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7 (3): 507–38.

Schady, Norbert, and José Rosero. 2008. "Are Cash Transfers Made to Women Spent Lik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Economics Letters* 101 (3): 246–48.

Thomas, Duncan.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 (4): 635–64.

Thomas, Duncan, John Strauss, and Maria-Helena Henriques. 1990. "Child Survival, Height for Age,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in Brazi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3 (2): 197–234.

World Bank. 2011. "Defining Gender in the 21st Century: Talking with Women and Men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ountry Qualitative Study of Gender and Economic Choic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0.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0." World Economic Forum, Japan.

第一部分
评估性别平等现状

在过去几十年中，女性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通过享受高等教育，女性对她们的生活选择有了更大的控制力。运用这些选择，她们的劳动参与增加了；生育的子女减少了；在家务和子女看护时间之外有了更多样的生活；她们还参与到所在社区、经济体和社会的建设之中。对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女性来说，变革的脚步已经加速。

但是，进步并不是一致的。时至今日，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有一部分女性的生活没有发生突出的变化。她们仍然要在许多问题上继续抗争，这些问题是上代女性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部分女童仍然无法和男童一样平等地入学，她们可能无法继承父母的遗产，她们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即使在瑞典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生活和经济的许多方面，变化仍然步履维艰。女性报酬较低，且在护理和教师职业中的就业比例失调。例如，男性主导了工程和建筑行业。《财富》1 000 强企业中，只有 28%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为何性别平等在某些地区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而其他地区则步履维艰？第一部分通过汇总已有及最新的数据，描绘了性别平等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规律和趋势，为本报告的其他部分奠定了事实基础。该部分对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取得的性别成果的变化进行了评估。许多变化归功于已席卷大部分发展中世界的全球繁荣浪潮。但是，许多女性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一繁荣局面而改善，在某些方面甚至一点也没有改善。

本报告重点强调性别平等的三大领域：禀赋积累，使用这些禀赋获取经济机会并产生收入，以及使用这些禀赋采取行动（能动性）以提升个人和家庭的福祉。禀赋包括教育、健康、土地以及人们一生中积累的其他资产如资金等因素。其中许多因素，如基础教育，是在生命早期积累下来的，主要反映了父母的决定。其他如物质资产，则通过生产劳动和继承权等机制后天获取。

获取经济机会的途径决定了禀赋和时间如何产生收入和消费，这是决定福祉的关键因素。关于如何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生产活动和娱乐之间分配时间的决策是在家庭中做出的。这取决于女性对与家庭其他成员相关的家庭福祉做出的潜在贡献的价值，也取决于性别角色、女性偏好及需要等观念。能动性是女性和男性做出选择并将其转变为理想结果的过程。它有多个维度。本报告重点强调与女性选择能力密切相关的 5 个维度：对资源的控制力，组建家庭的决策权，对迁徙的控制权，免于暴力的自由，以及在社会上诉求意愿的能力。

在这三大领域中，选择权的缺失反映在福利的匮乏上。这三大领域不仅本身非常重要，而且相互紧密关联。能动性允许女性积累其禀赋，禀赋又决定了获得经济机会和收入的渠道。女性获得经济机会和收入的能力也会影响其能动性的发挥。以此类推。

第 1 章记录了女性在权利、人力资本禀赋及经济机会获得等方面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果。今天，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明确保障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并禁止性别歧视。情况在好转，而且和当今富裕国家贫穷的时期相比，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相比之下，第 2 章表明，并不是所有女性或性别平等的所有方面都经历了变化。首先，对于贫困女性和贫困地区的女性来说，巨大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即使是在教育和生育这样全球进展如此巨大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对于各国最富裕人群而言，性别差异已经微乎其微，但对于收入分布底层的弱势群体而言，性别差异仍然巨大。种族、距离、残疾、性取向等其他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第二，在性别平等的某些领域，进展非常微小——或非常缓慢——即使当国家变得富裕时也是如此。这些“滞缓”领域包括在生命周期关键时期过高的女性死亡率和经济领域的职业差异。即使在女性已经活跃了将近一个世纪、非常富裕的国家中，在能动性的许多领域（包括政治话语权和代表权），性别差异依然根深蒂固。第三，旱灾或经济低迷等普遍性冲击对男性和女性都有不利影响，其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冲击发生的具体环境及冲击本身。

第 1 章

1

性别平等的进展

尽管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还备受煎熬，但是情况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而且转变速度之快，是二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在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许多地方的女性在权利、教育、健康和劳动回报四大领域之中迅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部分中低收入国家仅仅用了 40 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富裕国家用了 100 年时间才取得的进步。而且，变革不断加速，每个十年中，性别平等都在上个十年的成果之上更进一步。

> “让我们的女儿去读书，让她们找到好工作。当她们在思想上和收入上都独立于男人的时候，她们就会有美满的生活。”
>
> ——成年女性，坦桑尼亚

时代在改变吗?

本章追溯了性别平等进步发生的地方及发生的方式。它始于女权的演进和依法争取平等的斗争。权利平等非常重要，因为权利的缺失会限制女性在生活中很多方面进行选择的权利。今天的高收入国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性别平等。相对而言，在支持女性合法权利和保障女性平等的全球共识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女性依法获得权利的进步要快得多。在取得这些合法权利的同时，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收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无论从绝对水平还是相对男性的相对水平都是如此。较之以往，更多女性开始识字并接受教育，男女之间的教育差异大大缩短。对于年青一代，初等教育的入学性别差异几乎消失了，而中等和高等教育取得的成果也是巨大的。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女性的寿命增加了，生活更健康了，这部分是因为低生育率降低了生育给她们带来的危险。她们参与市场中工作的程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经济增长提高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公共服务供给，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劳动市场机会，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但这并非实现进步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与女性收入增加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是均等地发生在所有国家。

性别平等在某一个领域的改变会推动其他领域的改变，从而影响下一代，强化整个过程。以孟加拉国和印

度为例，服务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这推动了女童入学率的上升，从而提高了下一代的劳动参与率和教育产出。[1]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或者实现进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事情的确如此，第 2 章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性别劣势仍在继续的国家和人群，以及生活中严重的性别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乃至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许多方面。对变化的领域进行描述是理解性别平等约束因素的基础，特别是在这些约束因素普遍且根深蒂固的地方。这种理解有助于确定政策和公共行动的优先事项。

女性权利全球共识日益增强

过去的三十年中，在确保女性合法权利及宪法保障的平等权利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CEDAW），为女性进步制定了综合性框架。十年后，各大洲约有 100 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一关于女性权利的国际法案。今天，该法案的签约国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了 187 个国家。

历经三十多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已经是国际人权条约中最受支持的人权法律文件，也是国际上监督和推动性别平等的首要工具。在对歧视女性的行为进行界定并制定国家行动议程时，公约对公民权利、女性法律地位、生育角色和权利，以及文化因素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和阻碍女性进步的作用予以了特别关注。它是唯一一项明确应对家庭计划和家庭组建的人权条约。公约签署国要确保国内法律与公约相一致，其进展要接受消除女性歧视委员会的独立监督。

> “我知道（女性）有许多权利：我能记得的有受教育的权利、禁止受割礼的权利，以及禁止强制婚姻的权利。”
>
> ——成年女性，布基纳法索

众所周知，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其语言含糊、监督制裁不力，《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一度沦为“灰姑娘条约”，但是，公约的确推动了立法和管理的变革。[2]1998 年，它推动通过了土耳其的《家庭暴力法案》（第 4320 号，《家庭保护法》）。土耳其宪法还废除了女性职业活动需经丈夫允许的要求，其中多处参照了公约[3]。澳大利亚 1984 年《反性别歧视法》采纳了公约的部分内容，禁止公共生活中基于性别、婚姻、怀孕或可能怀孕的歧视。

在 2003 年，非盟颁布了《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之《非洲女性权利协议》，即人们常说的《马普托协议》。它肯定了女性参与政治活动、享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权利，以及保障自身生育健康的权利。协议第 5 条提到了“消除不良行为”，包括终结一夫多妻制婚姻和女性外阴切除行为。在 53 个非洲国家中，46 个国家签署了该项协议，截至 2011 年 2 月，30 个国家已经批准生效。[4]

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下，1994 年，全体拉丁美洲国家签署了《贝伦杜帕拉公约》，即《美洲防止、惩罚和根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公约》。此后，28 个国家制定了制裁家庭暴力的法律。

这些不同的国际法律框架反映了两性权利平等全球共识的日益增强，该共识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漫长而缓慢的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斗争演变的结果，该斗争早在 18 世

专栏 1.1 性别与千年发展目标

2010 年千年发展目标峰会制订了到 2015 年实现 8 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行动计划。此次会议还颁布了一项决议，呼吁采取行动，通过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时的性别主流化措施，确保教育、健康、经济机会以及各级决策的性别平等。该决议和行动计划反映了国际发展共同体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本身就是发展目标的信念（MDG 3），同时也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关键途径。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有助于普及义务教育（MDG 2），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MDG 4），降低孕产妇死亡率（MDG 5），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MDG 6）。

2010 决议还强调，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采取针对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联合干预措施。

- 采取行动以提升女性参与所有政治经济决策的人数和参与程度，包括对地方决策结构中的女性领导力建设进行投资，创建两性在政治政府结构中公平竞争的平台。
- 拓宽为贫困人口特别是女性提供金融服务的通道。
- 对基础设施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行投资，特别是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行投资，以使成年女性和女童从减轻家务压力中受益。
- 促进并保护女性拥有平等的住房权、财产权、土地权，包括继承权。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纪就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中，20 世纪下半叶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而千年发展目标（MDG）对性别平等的强调进一步强化了性别平等全球共识（见专栏 1.1）。

先进经济体实现平等权利的漫漫长路

18 世纪的女性状况与今天迥然相异。1789 年，法国大革命宣称人类普遍生来享有且永远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但《人权宣言》却并不包括女性的权利。一年以后，国民大会决定不将市民和政治权利扩展到女性。另一个例子是基于英国惯例法建立起来的英国殖民地法律体系，正如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爵士 1765 年在其《英国法律评论》所总结的那样：

> 通过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人，也就是说，婚姻存续期间，女性的法律存在中止，或至少是融入并与丈夫的法律存在相结合，她的一切活动都将在他的保护之下完成，因此在我们的法律术语（law-french）中被称为一位女性配偶（femme-couvert）。因此，男性不能给妻子任何赠与，或与之签订契约，因为该赠与将会假定她的独立存在。

争取平等所有权和选举权的斗争滞缓而漫长。直到 1857 年，英国议会才通过了《婚姻诉讼法》，允许已婚女性继承财产并独立采取法律行动。直到 1882 年，《已婚女性财产法案》才确认丈夫和妻子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赋予妻子独立购买、占有、出售财产的权利。直到 1928 年，《人民代表法案》使得 21 岁以上的女性获得了和男性同样的投票权利，投票权才得到普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大体相同。以挪威为例，1888 年女性获得了完全的经济权利，1913 年女性获得了投票权。

1948 年，纽约通过《已婚女性财产法案》，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该类法案的州。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女性获得收入权和财产权逐渐扩展到其他各州。而获得政治话语权的过程则更加漫长。1878 年，一条确保女性投票权的宪法修正案提案被提交美国参议院，但是直到 1887 年才将该提案提交投票表决，而且还没有通过。直到三十多年后的 1920 年，确保普遍选举权的宪法第 19 修正案才获得通过。

而其他领域反歧视的斗争，如劳动和家庭法律方面，到 20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形成潮流。

在美国，直到 1864 年《人权法案》第 7 章通过之前，在工作晋升中跳过女性还是合法行为。已婚女性需要其丈夫允许才能获得贷款。婚内强

奸也不被视为犯罪行为。[5]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空乘人员被雇用时还被要求必须保持单身，而且如果她们结婚则有可能被解雇。

在德国，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女性结婚后还会被从公务员系统中除名。直到 1977 年，她们还需要其丈夫的正式批准才能工作。直到 1990 年与东德统一，单身母亲的子女还需要被另行指派一名合法监护人。[6]

日本 1985 年《平等雇佣机会法》规定，雇主的义务仅仅是努力在招聘、任命、提升过程中平等对待男女两性。直到 1997 年，平等对待才被作为一项强制要求被写入法律。第一部有关家庭暴力法直到 2001 年才获得通过。

中低收入国家的进步速度更快

与公民概念的变迁相连，政治权利的进步是最为突出的。国家选举权运动塑造了 20 世纪上半叶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形态，而直到那时，公民资格仍被理解为“男性”。在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扩大选举权范围，涉及地方社会运动和重新界定“公民资格”的社会网络，而这是在国内政治势力经过漫长的磋商之后才实现的。相比之下，新兴民族国家则直接融入了“世界新秩序”，国家和国际组织接受了公民身份的性别中立模式，将女性完全视为能够自主决策的人。[7] 在 20 世纪前十年独立的国家中只有三个（澳大利亚、爱尔兰、利比亚）将普遍选举权先赋予男性再赋予女性。瑞士没有摒弃其传统，直到 1971 年才赋予女性普遍选举权。不丹是近期赋予女性投票权的国家，2008 年，不丹改变了一户一票制，接受了女性的完全选举权。今天，只有沙特阿拉伯将投票权限制在男性范围内，而且市级选举已经在考虑废除这一限制。类似的进步也发生在完全选举权之外的其他女性权利中。在菲律宾，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法律巨变在多个领域确立了性别平等原则。1987 年宪法通过突出强调性别平等概念，进一步强化了早期宪法。1988 年《综合土地改革法》确保了两性拥有土地的平等权利。1989 年的一项法案修正了劳动法以保护女性在受雇用和获得报酬时不受到歧视。类似地，在 2004 年，摩洛哥彻底改革了其家庭法，以促进女性和男性在多个领域中实现更大的平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的签署建立了推动女性平等的综合性框架。这些条约有助于进一步确保女性在生活其他领域中的合法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促进新的立法或推动废除歧视性条款来实现的。2005 年，肯尼亚上诉法院宣布，在判定继承权时，区别对待儿子和女儿是没有合理性基础的。在 2011 年，坦桑尼亚最高法院宣判，一位遗孀有权代表其子女管理其不动产。在两个案例中，平等和非歧视原则都获得了胜利。

女性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更好的成果

无论是从绝对意义上讲还是相对于男性而言，为争取女性权利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已经为许多女性带来了好的结果。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许多国家的持续发展使得性别平等问题在许多方面的不平等状况降低了。和过去的高收入国家相比，当今中低收入国家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从生育率、女性教育和识字率、女性劳动参与率等多种指标上都显示了这一点。在大多数广泛的收入增长、针对女性的服务提供制度改进和经济机会增多同步发生的国家，这些指标的进步都是巨

大的，有时候，进步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社会动乱或重大制度变革的状况下，某些方面的进步还是发生了，比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孟加拉国起点低，但是 1980 年以来，孟加拉国的经济几乎增长为原来的 3 倍。1972 年颁布的孟加拉国宪法确保了所有公民，无论其性别、种族或其他社会划分的平等权利，并为女性预留了 15 个议会席位，此后席位增加到 30 个。1975 年，政府为女性预留了 10% 的公职，并成立了专门的女性事务部门。女性在各条战线上的各项产出指标都有了突出的改进。

- 从 1971 年到 2009 年，总生育率，即一位女性在其生育周期内预期生育的子女数量从 6.9 个下降到了 2.3 个。
- 从 1991 年到 2005 年，学校中的女童数量从 1 100 万上升到了 4 000 万。女性入学率从总数的 33%提升到了 56%，最贫困五分之二女童的入学率也有增长，只是增幅稍低。
- 年轻女性（20~24 岁）的劳动参与率在 1995—2000 年期间增长了几乎两倍半。尽管总体劳动参与率仍然不高，年轻女性就业机会（与服装制造产业、健康服务、社会工作的增长相关）的增加提高了女童入学率，放松了对女性的流动性限制，公共空间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女性化迹象（见第 6 章）。[8]

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的中高收入国家，1980 年以来，哥伦比亚的经济扩张了一倍半。随后在 1999 年，哥伦比亚发生了动乱和衰退，到 2002 年后趋于稳定。一直以来，哥伦比亚为暴力和毒品交易所困扰。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女性地位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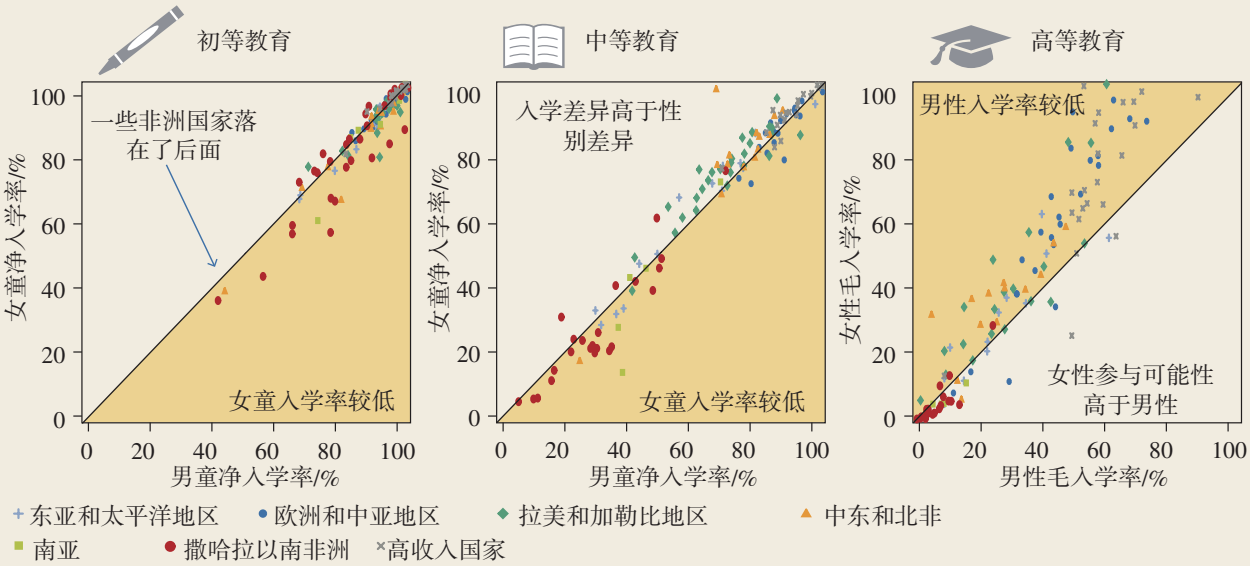
- 从 1986 年到 2005 年，总体生育率从 3.2 个孩子下降到了 2.4 个。
- 女性逆转了教育差异，现在女性的小学、中学甚至高等教育完成率都要高于男性。考虑到 1984 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几乎是女性的两倍，最后一点特别引人注目。
- 1980 年，哥伦比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本地区 13 大城市中的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哥斯达黎加），但到了 2004 年，它已经名列第二，仅次于乌拉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有 6 岁以下孩子的女性是增长最大的群体，在多数国家中，这是最不可能参加工作的女性群体。管理岗位上和金融部门的女性代表率较高——众所周知，这恰恰是许多发达国家难以打破的“玻璃天花板”。

1980 年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几乎翻了一番。在伊斯兰革命的余波之中，伊朗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某些关键维度上持续提升：

- 1979 年到 2009 年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世界上最快的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从 6.9 个孩子降低到 1.8 个（低于人口负增长临界值）。
- 小学中女性与男性的入学比例居世界首位，平均每录取 1.2 个女孩才会录取 1 个男孩。中学中的适龄女性比例翻了一番还多，从 30%提高到了 81%。到 2009 年，伊朗全体大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女生，68%的理科生和 28%的工科生是女生。伊朗劳动力的 30%是女性，活跃在经济领域的女性比例从 1986 年的 20%提高到了 2008 年的 31%。

上述三大人群都曾面对人们眼中性别平等的壁垒。但是对所有人群而言，收入增长、能提供更好服务的制度、适合女性的新的市场机会都有助于推动健康、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产出领域的性别平等，虽然这些国家的女

图 1.1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初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而高等教育方面女性还要更胜一筹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发展指标做出的估算值。
注：图中 45°线显示了入学率的性别平等状况。45°线上方的点意味着女性入学率高于男性。

性在其生活的其他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入学就读的女生数量增加

识字女性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在 1950 年到 2010 年之间，低收入国家 15 岁以上女性的平均就学年限从 1.5 年提高到了 6.5 年，相比之下，男性则从 2.6 年增长到了 7.6 年——而当前的高收入群体，成年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 10.9 年，男性为 11.2 年。[9] 因为成年人口中包括那些不再继续接受教育的年龄较大的人群，这些平均数字的上升实际反映了年青一代中更大的变化。从 1870 年到 1910 年，美国用了 40 年的时间将 6~12 岁女童的入学率从 57% 提高到 88%，而从 1997 年到 2008 年，摩洛哥仅用 11 年的时间做了同样的事情。

> “童婚时代已经终结。女孩会被送进学校读书。我们当中最穷的人也会把女儿送进学校读书。”
>
> ——成年男性，印度

世界各地更年轻的几代人都经历了初等教育性别平等方面的持续进步。在过去十年中，在中东、北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入学率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男性。数据表明，在 173 个国家中，117 个国家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见图 1.1）。即使在性别差异最大的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西非），性别平等的进步也非常大。2008 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学里每 100 个男童就对应有约 91 个女童，明显高于 1999 年的 85 个女童；南亚的比例是每 100 个男童对应 95 个女童。中学教育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突出的差别只有一个。2008 年，约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45 个）中学教育女孩子数量超过了男孩子（见图 1.1）。尽管在贫困国家中女性差异要更大，但是在包括孟加拉国、巴西、洪都拉斯、莱索托、马来西亚、蒙古、南非等在内的许多国家，男孩子的数量少于女孩。

从全球来看，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增长速度高于男性。在 1970 年到 2008 年间，男性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增长 4 倍多，从 1 770 万增长到了7 780 万。而女性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则增长 7 倍多，从 1 080 万增长到了8 090 万，超过了男性。数据表明，2008 年，在 96 个发展中国家中，女性高等教育录取率落在后面的发展中国家仅有 36 个（见图 1.1）。2008 年突尼斯录取的 351 000 名大学生中，有 59%是女性。如第 6 章所示，女性录取率的提高与全球化世界中对“脑力”岗位相对“体力”岗位的需求的上升是一致的。

尽管男孩比女孩的小学入学率要高，女孩的学业指标却更好。在发展中地区，她们的留级率和辍学率都较低。[10] 根据国际标准化学生成绩测试，女孩的语言能力超过男孩，而男孩则在数学方面稍有优势。2009 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显示，在阅读测试中，所有参与国的 15 岁女童的表现都超越了男童。

经济增长降低了全球数百万男孩和女孩的入学门槛，降低了学校教育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对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11] 首先，当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时候，政府或其他服务机构供给的服务上升。第二，收入增加使家庭的预算不再那么紧张，因此不必再按照性别、出生顺序或任何其他原因区别对待子女的教育投资。[12] 因为曾经辍学的女孩多于男孩，总体入学率的提高降低了性别差异。第三，当经济增长增加了女性在那些需要一定水平技能的部门的就业机会时，如增加了女性在轻工业或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由于教育投资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父母投资女儿教育的动力提高了。

免除学费对提升总体入学率及降低性别差异有类似的效果。撒哈拉以南非洲普遍实施的免费初等教育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项目实施的第一年，马拉维和乌干达学生入学率上升了 68 个百分点，肯尼亚上升了 22 个百分点。[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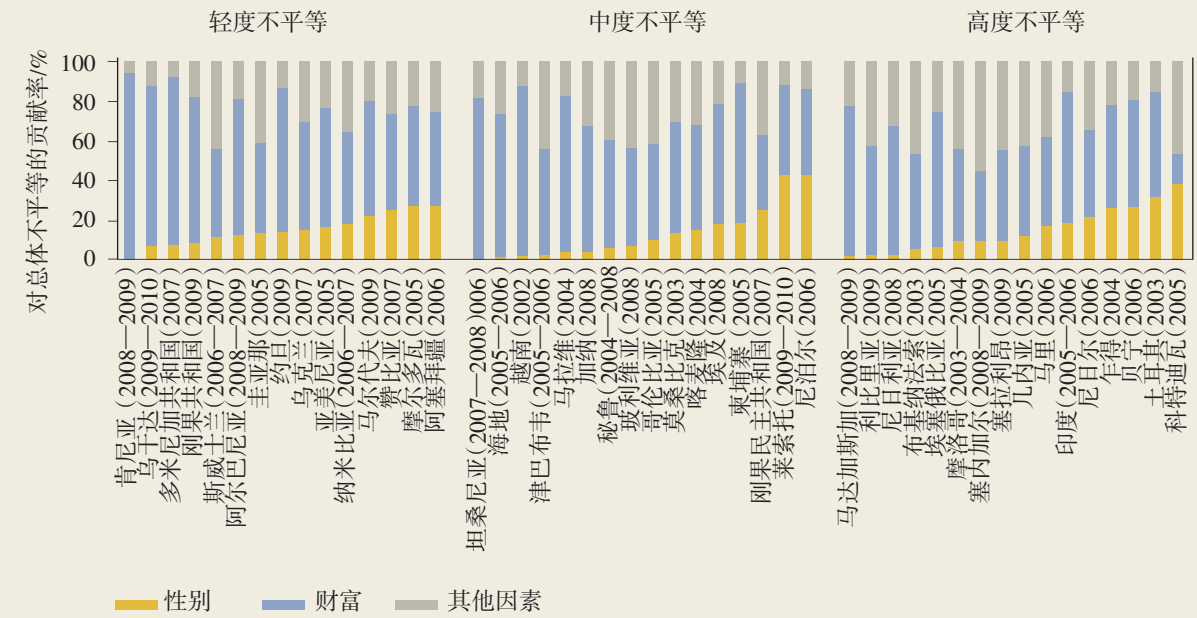
国家还通过义务教育法实施强制入学。大众教育系统在“二战”后迅速扩张，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颁布了普及教育的法律。[14] 此类法律通常与旨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大型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投资相结合。1997 年，土耳其尝试通过将义务教育从五年延长到 8 年，增加 11~13 岁的儿童特别是农村女孩的教育机会。基础教育项目启动后，入学人数迅速提高了 150 万。1991 年至 1997 年间曾一路下跌的净入学率从 1997 年的 86%跃升至 2002 年的 96%。农村女孩获益尤其引人注目，仅仅在该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性别最不平等的 9 省（全部 81 个省）就跃升了 160%。[15]

如今性别仅仅是造成剩余入学不平等问题的很小原因（见图 1.2），在许多国家，对学校入学登记的分析显示，财富是最重要的限制因子，单纯的性别因素（而不是贫困）进一步损害性别平等的情况很少（见第 3 章）。[16]

更健康的生活

20 世纪下半叶，男女两性的健康状况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善。出生时预期寿命最清晰地反映了全球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女性预期寿命从 1960 年的 54 岁（男性 51 岁）提升到了 2008 年的 71 岁（男性 67 岁）。这一时期，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生育率的最快下降，生育率从 1960 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 5 个子女降低到 2008 年的 2.5 个，降低了因生育而造成的死亡人数。生育行为的减少还提高了女性投资人力资本、参与市场工作的时间。

图 1.2　性别对 12~15 岁儿童教育参与率不平等问题的解释力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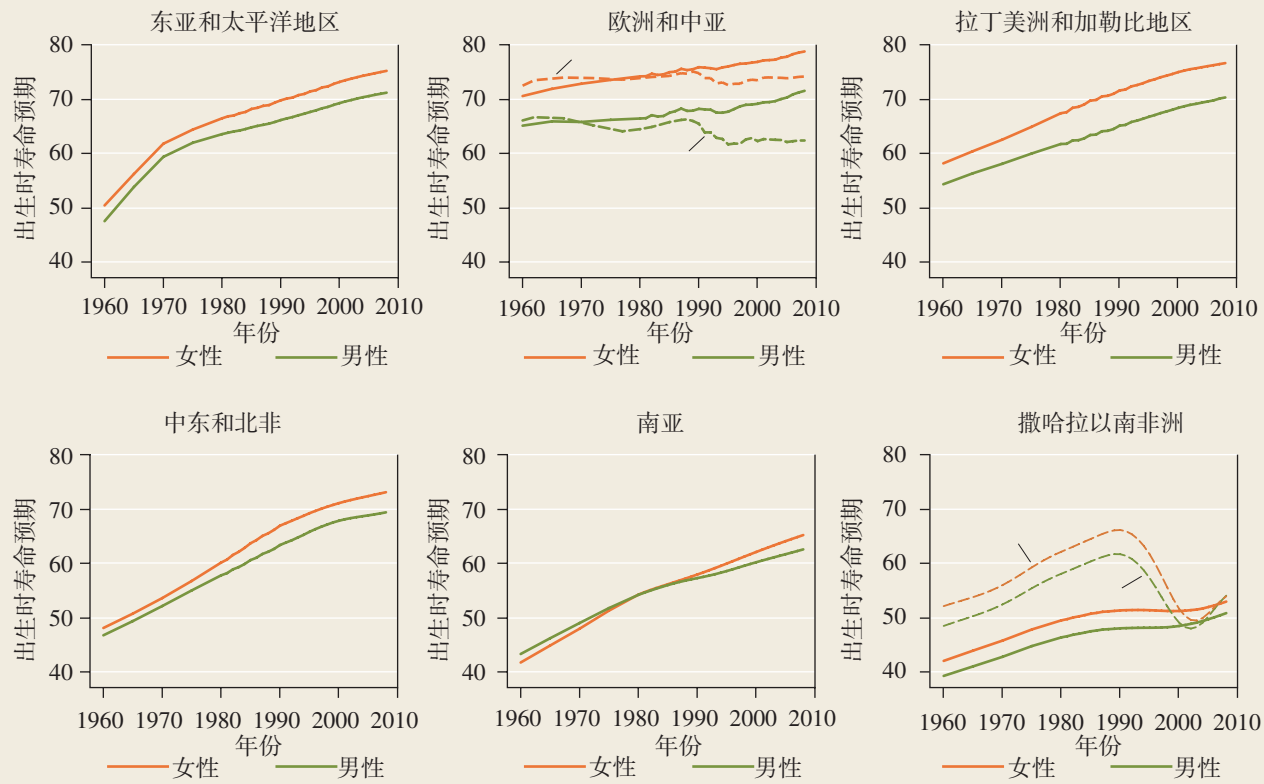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得出的估算值。
注：不平等程度系指为确保所有情况不同的小组获得均等的覆盖率而重新分配的总机会的百分比。轻度不平等介于 0.3%至 2.1%之间，中度不平等介于 2.3%到 6.4%之间，高度不平等介于 6.5%到 26.7%之间。这里按照性别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对结果进行分类。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在持续增长，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虽然在部分地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仍在增大，但在其他地区已经稳定。平均来看，低收入国家的女性预期寿命从 1960 年的 48 岁提升到了 2008 年的 69 岁。对男性来说，从 46 岁提升到了 65 岁。与全世界预期寿命的增长相一致，1960 年至今，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每个地区的预期寿命都提高了 20~25 岁（见图 1.3）。从 1980 年开始，每个地区的女性预期寿命都要高于男性。

但是某些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在东欧和中亚，女性预期寿命相对优势的增长部分归结于男性死亡率的急剧上升，而且差异明显还在逐年扩大（见图 1.3 中乌克兰的情况）。在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艾滋病的破坏性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从 1990 年开始，女性相对男性的预期寿命优势已经降低。（见图 1.3 中的博茨瓦纳）。女性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即生育早期和生育本身死亡率的降低是推动女性预期寿命增长的部分原因。首先，每次生育的死亡风险下降了。1990—2008 年，147 个国家经历了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其中九十个国家下降幅度达到或超过 40%。[17] 中东和北非的下降幅度最大（59%），其次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56%）以及南亚（53%）。第二，由于全世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死亡风险大大降低。选择少生孩子的女性，其一生中由生育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尽管每次生育期间的死亡风险变化很小。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生育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其下降速度比当今富裕国家同等发展水平时期的下降速度要快得多。19 世纪初到 1940 年期间，美国生育率逐渐下降，婴儿潮

图 1.3 女性寿命高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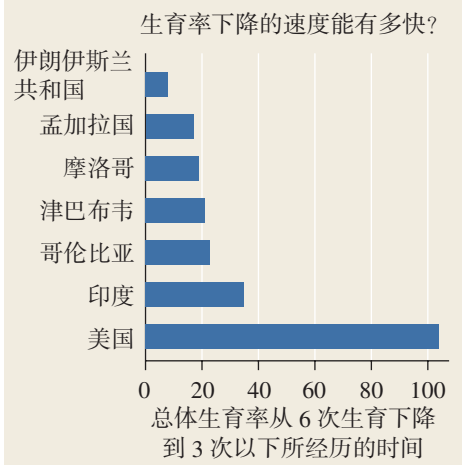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发展指数得出的估算值。

中再次上升，此后人口便稳定在稍稍高于零增长临界值的水平上。在印度，从 1960 年开始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且保持稳定，随后急剧下降，到 2009年，平均每位女性的 6 次生育下降到 2.3 次。美国用 100 年完成的过程，印度只用 40 年就完成了（见图 1.4）。同样，在摩洛哥，1992 年到 2004 年间，生育率从每位女性 4 个子女下降到了 2.5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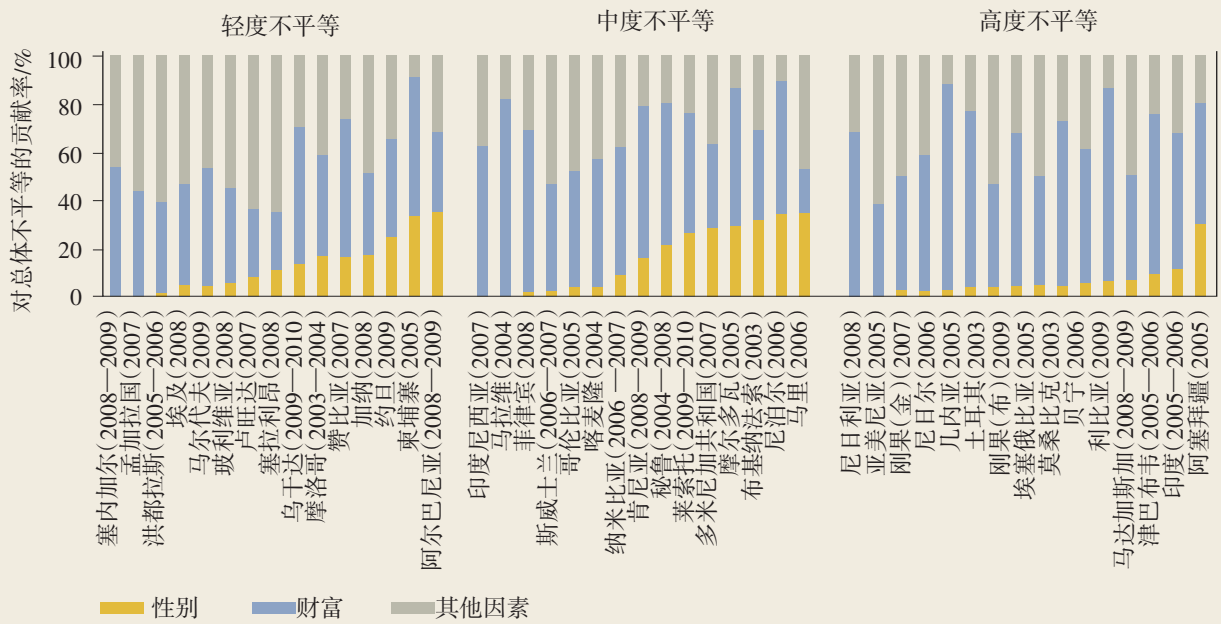
健康状态和保健医疗等其他方面的性别差异已经很小。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发育迟缓、残疾、或体重偏低的儿童比例仍然很高，但女孩和男孩的情况已经差不多。事实上，人口和健康统计（DHS）数据显示，男孩的状况还稍差一些。[18] 在巴西、科特迪瓦和越南，男性和女性的身高增长速度几乎完全一样，而在加纳，女性的身高增长速度比男性还要快一些。[19] 在许多国家，儿童和成人的人体测量

图 1.4 印度只用了 40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只用了 10 年就做完了美国 100 年做到的事情



资料来源：http：//www.gapminder.org。

图 1.5　性别对享受免疫服务的不平等解释力很小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得出的估算值。
注：不平等程度系指为确保所有情况不同的小组获得均等的覆盖率而重新分配的总机会的百分比。轻度不平等介于 1.0%至 3.2%之间，中度不平等介于 3.4%到 5.2%之间，高度不平等介于 5.2%到 22.0%之间。这里按照性别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对结果进行分类。

指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其潜力，但个体的性别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原因。印度北部各邦显然是个例外，女性身高增长的速度比男性要慢得多，而女孩的人体测量指标也比男孩要差——无论是从其总体水平还是随时间的变化来看都是如此。[20]

同样，保健服务利用和健康支出等方面的系统性性别歧视也已经不再明显。20 世纪 90 年代，在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圭和秘鲁，女性在保健方面的现金支出要高于男性。[21] 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一样，来自南非的证据也显示出了同样有利于女性的规律。[22] 在埃及，较之男性保健（58 埃及镑），更多开支被花费在女性的人均门诊服务上（每年 68 埃及镑），[23] 用于住院服务方面的支出性别差异同样对女性有利，但差别小得多。在加纳，女性获得的健康补贴高于男性（1992 年占全部健康支出的 56%）。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的证据也显示了类似的迹象。[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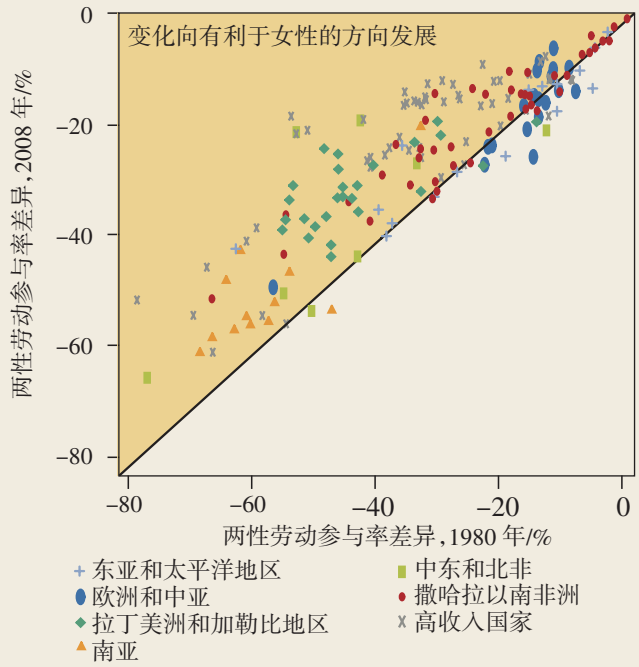
就疫苗接种等预防性健康服务而言，主要限制性因子似乎是贫困而不是性别因素（见图 1.5）。[25] 随着教育录取人数的上升，因素分解显示，在天花疫苗（其他疫苗更加普遍）接种方面存在较高不平等问题且主要原因是性别因素的国家只有几个。

更多女性参与市场工作

从 1960 年开始，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就在提高，而在某些地区特别迅猛。经济机会的扩展吸引了大量的新一代女性劳动者进入市场。在 1980 年到 2008 年之间，全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 50.2%提高到了 51.8%，而男性则有所下降，从 82.0%下降至 77.7%。因此，性别差异从 1980 年的 32%缩小到了 2008 年的 26%（见图 1.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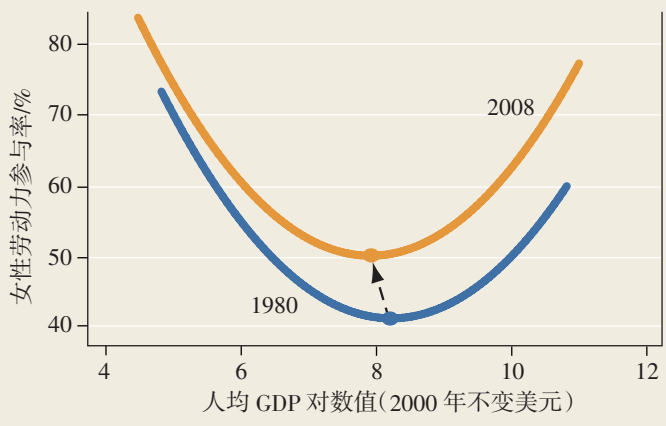
导致各国男女劳动参与率趋同的，

图 1.6 1980 年至 2008 年期间，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降低了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2010 年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上图中 45°线表示纵轴和横轴数值相等。

图 1.7 1980 年至 2008 年间，各国各收入水平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都有所上升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2010 年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是参与率非常低的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参与率非常高的国家的小幅度下降（主要是在东欧及中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参与率已经超过了 50%，而南亚、中东和北非则仍有超过 60%的女性在经济上处于不活跃状态。

1990 年以来，受过更多教育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明显上升，但 15~24 岁年龄段女性因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而下降，这放缓了总体参与率的增长。

从全世界来看，极端贫困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这反映了劳动力密集型农业部门的广泛存在和贫困家庭的大量存在。[27]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资相当低的工作女性也愿意接受，这是因为女性的自然收入也非常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自然收入也随之增长（通过更好的男性工资和其他收入），而收入提高通常与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相关。针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壁垒重新抬头，导致女性参与率下降。但是随着国家继续发展，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会将其重新拉回劳动力市场。

我们基于对 130 个国家从 1980 年到 2008 年的数据对经济发展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关系进行评估，显示出以下两大特点（见图 1.7）。首先，两个时期内，国家收入水平和劳动参与率之间都清晰地呈现出 U 形关系。第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对应参与率随时间而增长——U 形曲线随时间而上移。因此，对每一收入阶段而言，2008 年参与市场工作的女性人数高于 1980 年。

教育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推动了女性就业率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婚姻和生育的延迟以及生育率的降低让更多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该因素的贡献率在玻利维亚仅为 7%，在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为约 30%，在 10 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总的贡献率约为 21%。此外，还有 42%的拉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要归功于教育程度的

提高。在巴拿马，教育的贡献率高达 81%。相对而言，城镇化、家用技术、经济结构变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要小得多。[28]

变化催生新的变化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女性权利、教育获得、健康指标和劳动力参与方面都在发生巨大的进展。这些指标增长之间的正反馈环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会如此迅速。

一个领域的进步（教育水平）会推动其他领域的改变（如低生育率和高劳动力参与率）。同样，更好的劳动机会反过来会增加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和女性健康投资，而平等的权利则可以支撑各方面的进步。相反地，某个领域如缺乏权利进展会对女性获得市场工作构成阻碍，而如果对性别差异纠正不力，则女性的所有健康指标都可能被伤害。理解这些反馈环对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同样，理解约束进步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无论这些约束因素是植根于家庭、市场运作还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新的劳动力市场机会能够刺激对女孩教育和健康的投资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部分取决于教育回报。早期的研究显示，有助于女性提高生产率的新农业技术提升了女孩的入学率。[29] 新一代的研究将这些发现延伸到全球化经济中。

例如，印度外包服务业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收入机会，从而提升了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投资。[30] 招聘服务让家庭了解到了新雇佣机会，从而使 5~15 岁女孩的入学率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但对男孩却没有影响。[31] 女童的身高体重指数（一项健康程度的指标）也提高了，同时获得工薪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了 10%。获得工作可能性的明显提高引发了对女孩的人力资本投资，即使在贫困、费用或上学路途等其他可能限制因素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人们经常假设，文化和社会规范（或报告框架中的“非正式制度”）会妨碍人力资本投资。因此，许多政策努力都试图通过推动社会规范变化来改变当前状态。这里的结果则提出了一条替代性的路线——只要扩展经济机会，那么对女孩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增长。市场可以影响私人家庭决策，即使在社会规范变化非常慢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投资未来

类似的考虑——将父母的教育投资和直接回报联系在一起——支撑了健康与入学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是，降低死亡率会导致童年阶段更大的人力资本投资。简单地说，你获得投资回报的时间越长，进行那样的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如果儿童出生后的死亡风险很高，那么父母就会考虑该风险因素，并降低对女儿的投资。

或许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是对这一关系最清晰的阐释。在斯里兰卡，由于产妇死亡率从每千次生育中死亡 180 例下降到了 50 例，使寿命预期在 1946 年到 1953 年间急剧上升。假设女性平均生育 5 个孩子，那么在下降发生之前每 10 位女性中就有 1 位在生育中死亡——这是个巨大的风险。该国不同地区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各不相同，利用这个差异，一项研究显示，女性死亡率的总体下降推动女性寿命预期增加了 1.5 岁，女性识字率增长了 1 个百分点，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 0.17 年 [32]。

假设孕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也降低

了生育导致的疾病的发病率，那么这还会导致女性劳动参与能力的提升。来自美国的证据显示，1920 年，每 6 位女性中就有 1 位患有因生育导致的慢性病。由于 1936 年磺胺类药物的发现（及其迅速普及），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降低，随后女性产后健康状况得到了迅速的改善。生育环境的改善是美国在 1920 年至 1950 年间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最大推动力。[33]

谁能想到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提升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最快方法竟会是孕产妇死亡率的降低呢？家庭、市场、社会规范、正式制度等因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能够推动各个领域共同进步的方法。第 3 章会讲到，就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而言，收入或家庭行为不如有效的制度更有力——而公共投资至关重要。

不同的选择

最近的发现显示，女性权利和能动性在公共投资决策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在一个女性处处在意男性的世界（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在意孩子），或当女性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时，她们会推动有利于儿童的制度化投资。那么，当女性在政坛上获得更多权利时，公共投资的性质是否会发生变化呢？答案是肯定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美国女性在 19 世纪相继在各州赢得投票权，直至女性投票权被写入 1920 年宪法修正案的情形。女性获得投票权后，公共健康开支迅速增长。1921 年的 Sheppard-Towner 产妇及婴幼儿保护法案为产妇和儿童提供了联邦经费。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

> 的确，推动国会投票通过该法案的动力，似乎是对被美国女性在投票中惩罚的恐惧，而不是对法案必要性的确信。一位参议员对《女性家庭》杂志记者承认，如果国会成员能够在暗箱中投票的话，该提案可能会如同其在公开投票中坚决的通过那样被坚决地否决。[34]

公共开支的增长带来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密集的全民卫生运动，并使得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了 8%~15%。每年大约有 2 万名新生儿由于女性赢得选举权而免于死亡。瑞士也有类似结果的记载，并且还发现，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对健康和福利的开支越来越支持。[35] 在欧洲方面，结果显示女性选举权导致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的开支逐渐增长。[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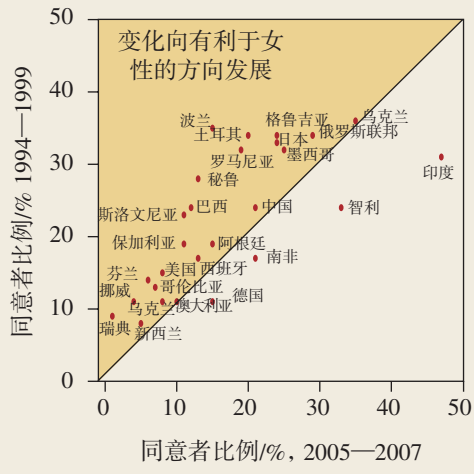
代际循环

不同领域的关联性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英国和美国，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善了儿童的状况，儿童会获得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健康。对 7~8 岁的儿童来说，母亲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其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数学成绩也会提高，同时其行为问题的发生率会降低。[37] 类似的结果记录了低收入国家母亲教育和儿童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即便母亲只接受 1 年的教育也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在巴基斯坦，母亲接受过一年教育的孩子每天在家多学习 1 个小时，其成绩也较高。[38]

女性教育的代际效应不仅限于家庭。在 1990 年后私立教育迅速兴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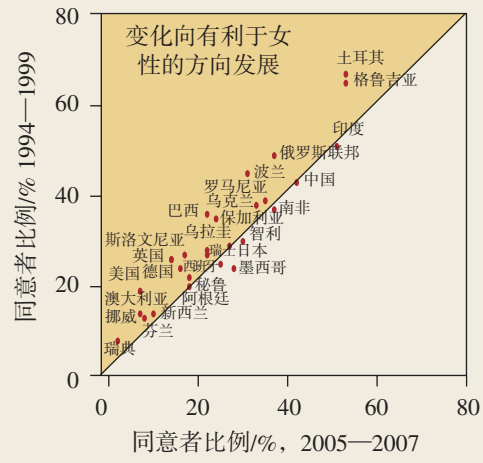
> “你对女儿未来的希望是什么？她必须非常聪明机智，受过教育，并照看好这个社区。而我的儿子们则需要通过教育来学会管理土地，盖好房子，并发展这个社区。”
>
> ——成年女性，巴布亚新几内亚

图 1.8　谁说大学教育对男性比对女性更重要？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 1994—1999 年和 2005—2007 年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上图中 45°线表示纵轴和横轴数值相等。

图 1.9　谁说工作机会缺乏时男性比女性更有权获得工作？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 1994—1999 年和 2005—2007 年数据做出的估算值。
注：上图中 45°线表示纵轴和横轴数值相等。

巴基斯坦[39]，同代关联和跨代关联同时显现。这轮扩张的一个奇怪特征是，这些私立学校高度集中在那些十年前曾存在过公立女子中学的村子。通过在农村地区建立女子中学，政府培养了一代能够为下一代儿童进行小学教学的教师。今天的学生成了明天的教师。一项制度改进（公立女子中学）引起了家庭的响应（更多的女童进入中等教育），并促成了一代人以后的市场变化（私立学校和更多的女性就业机会）。

态度的转变

投票权同样在社会道德和态度方面引起了连锁反应。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为我们了解社会观念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窗口。传统上，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是将女性的首要角色定位在如母亲和家庭主妇之类的家庭角色上。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有数据可查的许多国家，社会规范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能够接受作为社会活动者的女性——即使不同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劳动方面，女性越来越被认为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在有数据可查的大多数国家，相信“大学对男性来说比女性更重要”和“当工作机会稀少时男性应当拥有比女性更多的就业权”的人数比例明显减少（见图 1.8 和图 1.9）。在土耳其，同意高等教育应该向男性倾斜的人数比例在十年中从 34%降到了 20%。

注释

1. Kingdon 和 Theopold 2008；Pitt，Rosenzweig 和 Hassan 2010。
2. Chinkin 2010。
3. Acar 2000。
4. http：//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999Rights_of_Women.pdf。
5. Zaher 2002。
6. Bennhold 2010。
7. Ramirez，Soysal 和 Shanahan 1997。
8. Hossain 2011。
9. Barro 和 Lee 2010。
10. Grant 和 Behrman 2010。
11. Dollar 和 Gatti 1999。
12. Filmer 1999。
13. Avenstrup，Liang 和 Nelleman 2004。
14. Meyer，Ramirez 和 Soysal 1992。
15. Dulger 2004。
16. Hoyos 和 Narayan 2011。

17. 世界卫生组织等 2010。

18. 联合国 2010。

19. Schultz 2005。

20. Deaton 2008。

21. Casas，Dachs 和 Bambas 2001。

22. Irving 和 Kingdon 2008。

23. 埃及卫生部卫生规划署和哈佛公共卫生学院——1998 年决策数据。

24. Sen，Asha 和 Östlin 2002；Lee 2009；Demery 和 Gaddis 2009。

25. Hoyos 和 Narayan 2011。

26. 世界劳工组织 2010。

27. Goldin 1995；Mammen 和 Paxson 2000。

28. Chioda，Garcia-Verdú 和 Muñoz Boudet 2011。

29. Bardhan 1974；Rosenzweig 和 Schultz 1982；Foster 和 Rosenzweig 1999。

30. Oster 和 Millet 2010。

31. Jensen 2010。

32. Jayachandran 和 Lleras-Muney 2009。

33. Albanesi 和 Olivetti 2009；Albanesi 和 Olivetti 2010。

34. 引自 Miller 2008。

35. Funk 和 Gathmann 2007。

36. Aidt，Dutta 和 Loukoianova 2006。

37. Currie 和 Moretti 2003；Carneiro，Meghir 和 Parey 2007。

38. Andrabi，Das 和 Khwaja 2002。

39. Andrabi，Das 和 Khwaja 2011。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car, Feride. 2000. "Turkey." In *The First CEDAW Impact Study—Final Report,* ed. Marilou McPhedran, Susan Bazilli, Moana Erickson, and Andrew Byrnes. Toronto, Ontario: International Women's Right Project, Centre for Feminist Research, and York University.

Aidt, Toke S., Jayasri Dutta, and Elena Loukoianova. 2006. "Democracy Comes to Europe: Franchise Expansion and Fiscal Outcomes 1830–1938."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0 (2): 249–83.

Albanesi, Stefania, and Claudia Olivetti. 2009. "Gender Roles and Medical Progress." Working Paper Series 148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2010. "Maternal Health and the Baby Boo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aper Series 16146, Cambridge, MA.

Andrabi, Tahir, Jishnu Das, and Asim Ijaz Khwaja. 2002. "The Rise of Private Schooling in Pakistan: Catering to the Urban Elite or Educating the Rural Poo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Pakistan Poverty Assessmen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 2011. "Students Today, Teachers Tomorrow: Identifying Constraints on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67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enstrup, Roger, Xiaoyan Liang, and Soren Nellemann. 2004. *Kenya, Lesotho, Malawi and Uganda: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Report 3076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ardhan, Pranab K. 1974. "On Life and Death Questio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9 (32/34): 1293–304.

Barro, Robert J., and Jong-Wha Lee. 2010.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 Working Paper Series 1590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ennhold, Katrin. 2010. "20 Years after Fall of Wall, Women of Former East Germany Thrive."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6.

Carneiro, Pedro, Costas Meghir, and Matthias Parey. 2007. "Maternal Education, Home Environ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07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Casas, Antonio Juan, J. Norberto W. Dachs, and Alexandra Bambas. 2001. "Health Dispari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Rol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Equity and Health: Views from the Pan American Sanitary Bureau, Occasional Publication 8, Washington, DC.

Chinkin, Christine. 2010. "Thoughts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In *Without Prejudice: CEDAW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Women's Rights in a Legal and Cultural Context,* ed. Meena Shivdas and Sarah Coleman.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Chioda, Laura, with Rodrigo Garcia-Verdú, and Ana María Muñoz Boudet. 2011. *Work and Family: Latin American Women in Search of a New Bala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LCRCE) and the Poverty and Gender Group (LCSPP),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 (LAC).

Currie, Janet, and Enrico Moretti. 2003. "Mother'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ollege Opening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1495–532.

Deaton, Angus. 2008. "Height, Health, and Inequa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Adult Heights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2): 468–74.

Demery, Lionel, and Isis Gaddis. 2009. *Social Spending, Poverty and Gender Equality in Kenya: A 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 Nairobi: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TZ).

Dollar, David, and Roberta Gatti. 1999. "Gender Inequality, Income, and Growth: Are Good Times Good for Women?"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ulger, Ilhan. 2004. "Turkey: Rapid Coverage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The 1997 Basic Education Progra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aling Up Poverty Reduction: A Global Learning Process and Conference, Shanghai, China, May 25.

Egypt Ministry of Health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Data for Decision Making. 1998.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Expenditures in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Cairo and Boston: Egypt Ministry of Health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Data for Decision Making.

Filmer, Deon. 199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 Gender and Wealth."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oster, Andrew D., and Mark Rosenzweig. 1999. "Missing Wome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Series 49,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Funk, Patricia, and Christina Gathmann. 2007. "What Women Want: Suffrage, Gender Gaps in Voter Preferences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Barcelona;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Processed.

Goldin, Claudia. 1995. "The U-Shaped Female Labor Force Func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Investment in Women's Human Capital,* ed. T. Paul Schultz.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ant, Monica J., and Jere R. Behrman. 2010. "Gender Gap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 (1): 71–89.

Hossain, Naomi. 2011. "Exports, Equity and Empowerment: The Effects of Readymade Garment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Gender Equality in Banglades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Hoyos, Alejandro, and Ambar Narayan. 2011. "Inequalities of Opportunities among Children: How Much Does Gender Matter." Background note for the WDR 2012.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0.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ILO, Geneva.

Irving, Margaret, and Geeta Gandhi Kingdon. 2008. "Gender Patterns in Household Health Expenditure Allocation: A Study of South Africa." CSA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8–32,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U.K.

Jayachandran, Seema, and Adriana Lleras-Muney. 2009. "Life Expectanc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Maternal Mortality Declin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1): 349–97.

Jensen, Robert. 2010.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Kingdon, Geeta Gandhi, and Nicolas Theopold. 2008. "Do Returns to Education Matter to Schooling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 *Education Economics* 16 (4): 329–50.

Lee, Jinhyun. 2009. "Estimating Individual Nonlinear Health Expenditure and Income Relationships using Household Data: The Indonesian SUSENAS Cas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St. Andrews, Fife, U.K. Processed.

Mammen, Kristin, and Christina Paxson. 2000. "Women's 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4): 141–64.

Meyer, John W., Francisco O. Ramirez, and Yasemin Nuhoglu Soysal. 1992. "World Expansion of Mass Education, 1870–198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5 (2): 128–49.

Miller, Grant. 2008. "Women's Suffrage,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and Child Survival in American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87–327.

Oster, Emily, and M. Bryce Millet. 2010. "Do Call Centers Promote School Enrollment? Evidence from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59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Pitt, Mark M., Mark R. Rosenzweig, and Nazmul Hassan. 2010.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a Brawn-Based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989,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Ramirez, Francisco O., Yasemin Soysal, and Suzanne Shanahan. 1997. "The Changing Logic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Cross-National Acquisition of Women's Suffrage Rights, 1890 to 199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5): 735–45.

Rosenzweig, Mark R., and Theodore Paul Schultz. 1982. "Market Opportunities, Genetic Endowments and the Intrafamily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hild Survival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4): 803–15.

Schultz, T. Paul. 2005. "Productive Benefits of Health: Evidence from Low-income Countries." In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d. Guillem López-Casanovas, Berta Rivera, and Luis Currai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en, Gita, George Asha, and Piroska Östlin, eds. 2002. *Engender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The Challenge of Equ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United Nations 2010. *The World's Women 2010: Trends and Statistics.* New York: UN.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World Bank. 2010.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08.*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WHO, UNICEF, UNFPA, and World Bank.

Zaher, Claudia. 2002. "When a Woman's Marital Status Determined Her Legal Status: A Research Guide on the Common Law Doctrine of Coverture." *Law Library Journal* 94 (3): 459–87.

第 2 章

2

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

性别平等状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并不是对所有女性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在极端贫困的国家，性别平等的进展缓慢而有限。对于贫困甚至稍富有一些群体的女性以及遭遇种姓、残疾、居住地、民族、性取向等其他形式排斥的女性而言，尤其如此。无论在同一个国家内对男性和女性状况进行比较，还是对女性进行绝对状况的跨国比较，许多女性面临的冰冷现实告诉我们，性别平等的进步在某些方面仍然停滞不前。

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下性别平等的进步状况。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女性生育死亡率至今还相当于北欧 19 世纪时的水平。或者看一下尼日利亚的入学差别，在那里，富裕的城市儿童平均接受 10 年左右的学校教育，而贫困农村地区的豪撒族女孩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还不到 6 个月。[1] 或者看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源和家庭财富控制权方面，女性仍然处在严重不利的地位。或者看一下男女收入差异问题，男女收入差异的变化并不大。或者看一下政策制定方面，女性代表仍远远低于男性。或者看一下家庭暴力问题，全球女性仍然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无论个人或国家收入水平如何，女性仍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并承受着更加严重的伤害。

> “我们没有受过教育。我们没有知识，不知道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何获得力量和自由。”
>
> ——阿富汗农村地区成年女性

进步的盲区在哪里呢？

- 处于严重弱势地位的人口。无论是跨国还是一国内的比较，低收入

> 在这个社区里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平等可言。或许在城镇地区有平等，但这里没有！男人总是要比女人重要。
>
> ——南非农村地区成年男性
>
> 女性刚刚开始进入社会，因此男性仍然在试图保持他的控制力。
>
>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成年男性

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性别差异都扩大了。在社会的某些领域，经济增长的益处未能自然平等地惠及所有的男性和女性。国家发展的影响可以被家庭贫困所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如地理或民族等因素也经常进一步扩大性别差异。

- “滞缓”领域。性别平等在某些领域的进步——如在职业差异和参与决策方面的进步——受到一些无法随经济增长而改变的限制条件的束缚。即便是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虽然过去一个世纪中女性的经济和公民权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性别差异仍在持续。这些结果是制度变革缓慢以及深层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结果，单靠经济增长无法应对这些因素。
- 倒退。时而经济性的、时而政治性的、时而制度性的外部冲击能够使辛辛苦苦获得的进步毁于一旦。在某些情况下，突发式冲击导致或加剧市场或制度失灵，从而逆转性别平等化的趋势。这些冲击会同时影响到男性和女性，但多种因素导致其对不同性别的影响有所差异，这些因素包括震荡的来源和类型、经济和制度结构、社会规范等。即使外部冲击影响并不含有性别差异，男性（孩）和女性（孩）遭遇的绝对福利损失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生命早期阶段的不利环境，比如说最关键的前三年，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长期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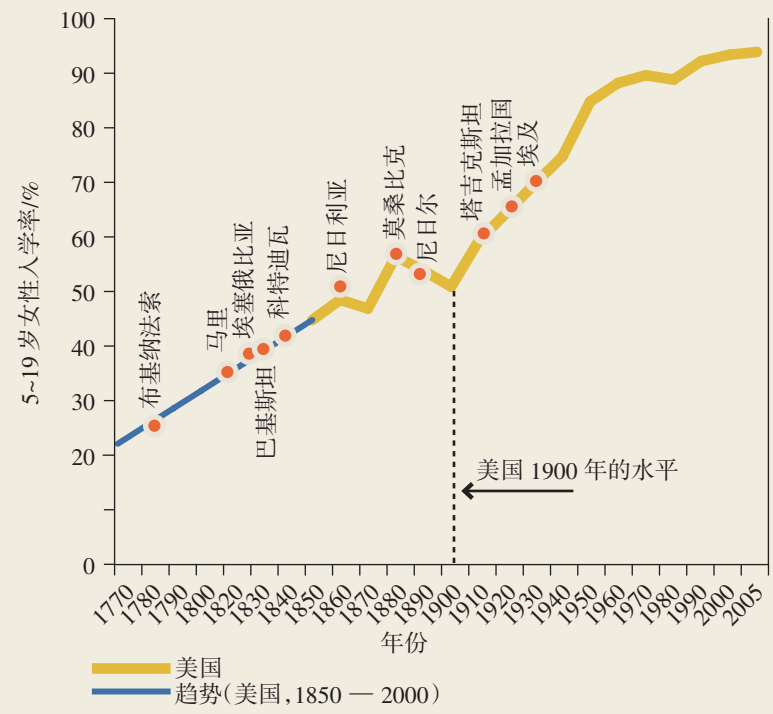
处于严重弱势地位的人口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缩小的时候，部分低收入国家的女性状况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改善。在许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孩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升幅很小。在厄立特里亚，女性小学净入学率从 1990 年的非常低的基数 16%升至 2008 年的 36%。在阿富汗、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小学里每 100 个男孩对应的女孩数不到 70。就净入学率而言，也门共和国是世界上性别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且其进步很难持续下去。[2] 马里 5~19 岁的女孩入学率和美国在 1810 年（见图 2.1）的情况相当。

> “钱。有人要能说服我爸爸让我继续上学的话……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会找个地方半工半读。每个考试都得交钱。”
>
> ——塞尔维亚年轻女性

性别不平等问题也持续存在于未从国内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群体：收入贫困扩大了性别差异。富裕家庭的男孩和女孩在教育获得方面差异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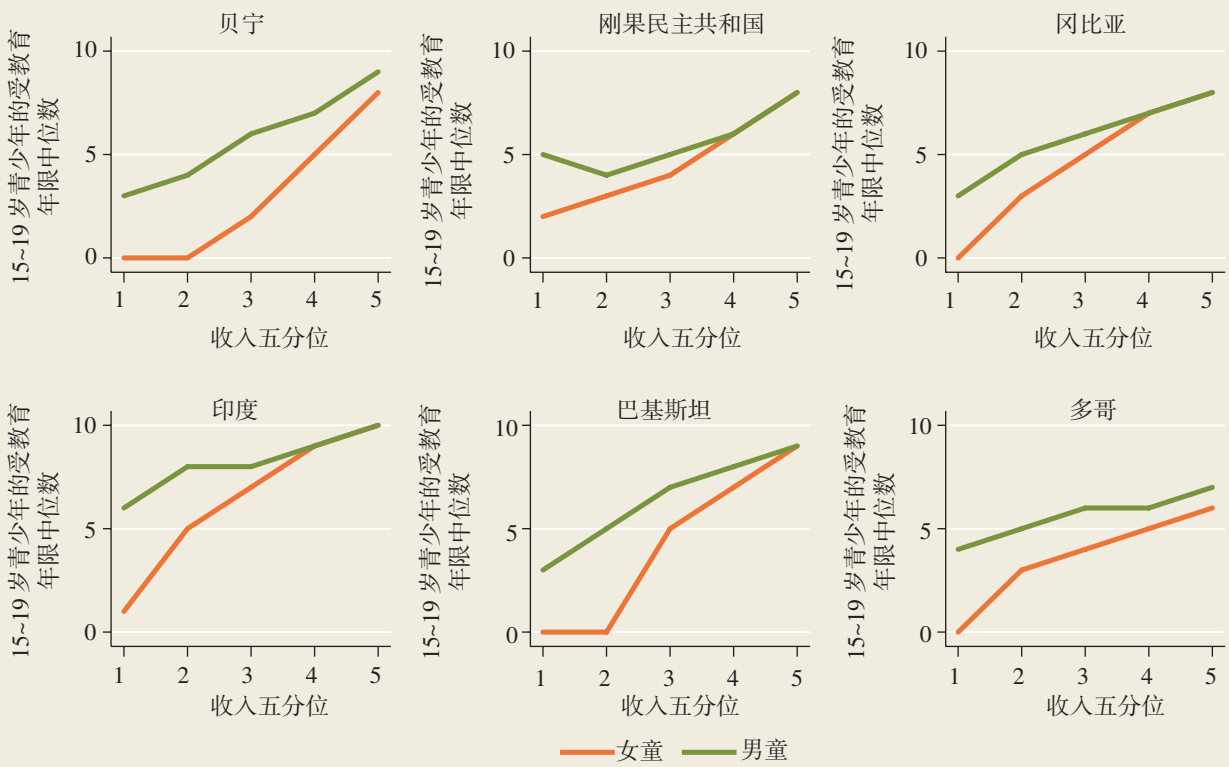
图 2.1　在部分国家，女性入学率仍然非常低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和国际收入分配数据库（I2D2）做出的估算。

注：1760—1840 年间的数值是根据女性在 1850—2000 年间的入学率趋势而推测出的数值。

图 2.2 在某些国家，低收入女性的不平等地位被强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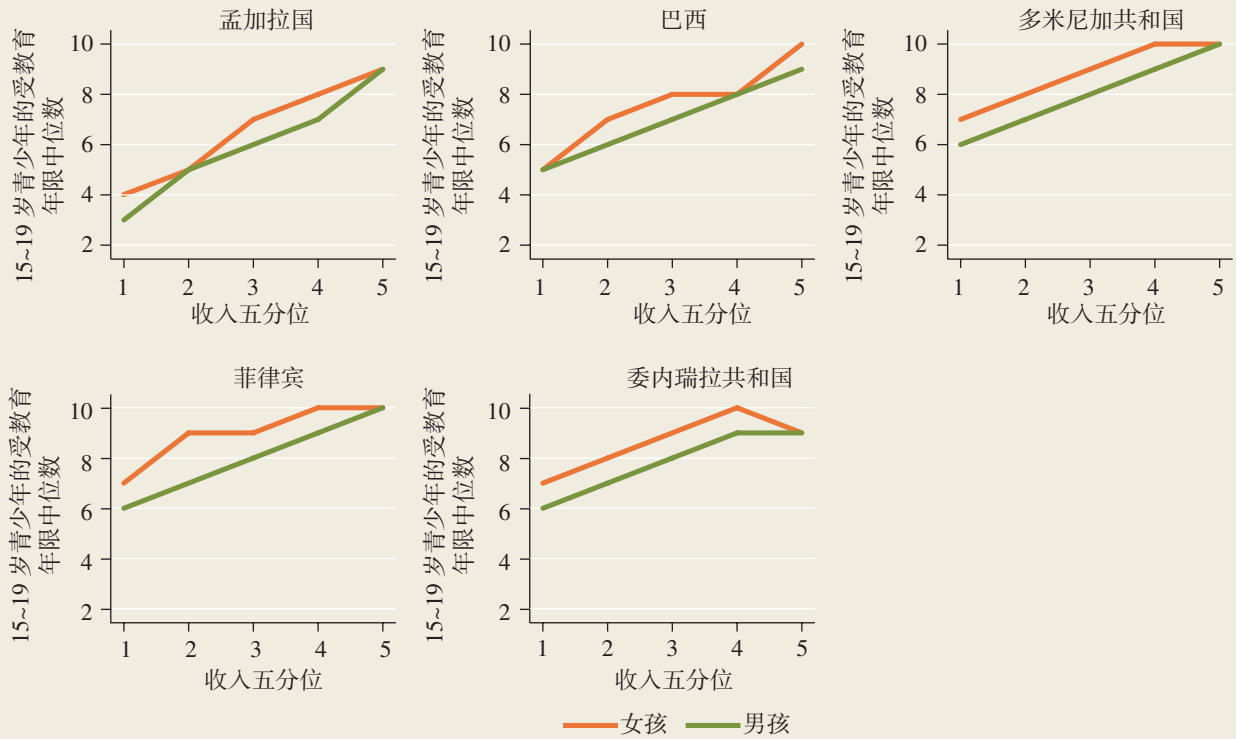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EdAttain 数据的估算值。

而在贫困人口中则非常突出。在印度，在最富有的 1/5 的人口中，15~19 岁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为 10 年级，但是在最贫困的 1/5 人口中，男孩的中位数达到了 6 年级，而女孩的中位数则只达到了 1 年级。在世界各国，最富有阶层的性别差异非常小，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的家庭在教育方面倾向于达到完全的性别平等。

在非洲和南亚的许多地区，贫困女孩面临着严重的教育劣势，这种劣势随收入的降低而加重，正如贝宁、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和多哥等国的状况（见图 2.2）。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地区，例如在孟加拉国、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和委内瑞拉共和国，贫困女孩倾向于比男孩在学校里待更长的时间（见图 2.3）。无论性别差异是否更偏向于低家庭收入的男孩或女孩，在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性别差异同样倾向于较小。

女孩的劣势比男孩更明显，且出现得更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贫困的 1/5 人口中，女孩的受教育年限比男孩要少三年。而且随着教育生命周期的推进，对女童的性别歧视是逐渐积累的。2008 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高等学校在校生中每 100 名男生只对应 66 名女生，南亚的这一数字也只有 76。[3]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唯一一个男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速度超过女性的地区，特别是在博士学位教育层次上。富裕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健康差异也是一样的。低生育率意味着面临生育风险的女性人数降低，以及分娩次数（女性的生育次数）的减少，生育的年龄结构能够解释相当一部分

图 2.3　……但在其他国家，贫困女孩的在校时间高于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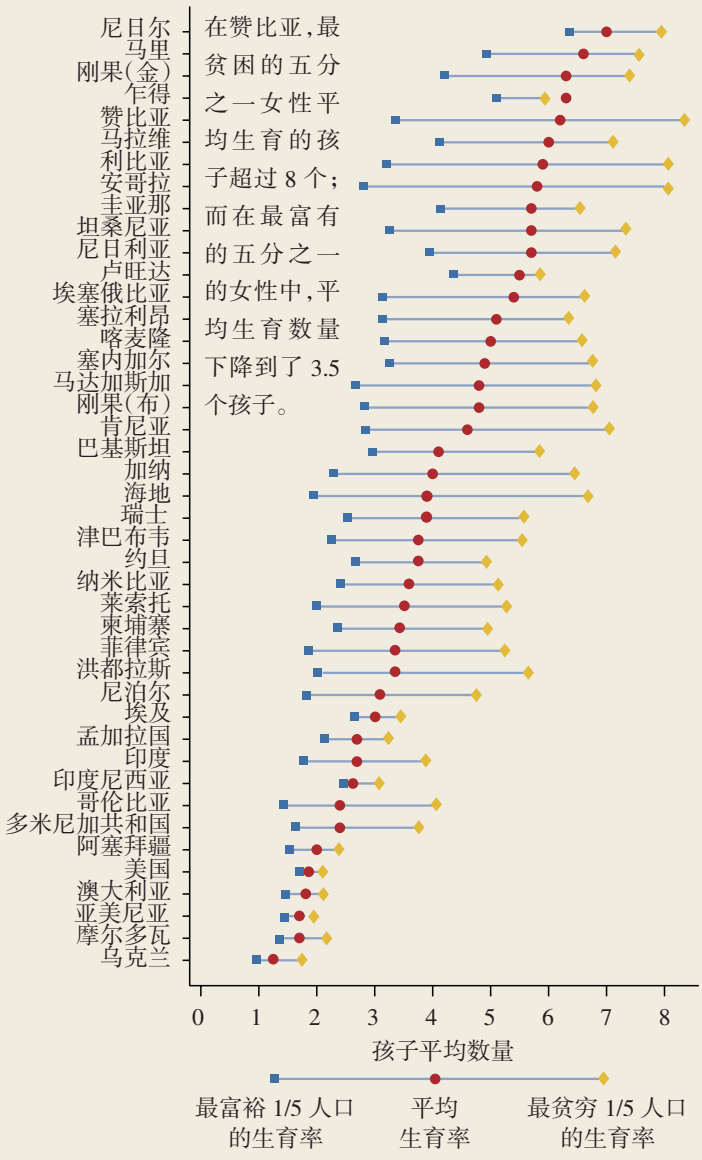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EdAttain 数据的估算值。

因生育而导致的终身死亡风险的下降。[4] 虽然 1960 年后，所有地区的生育率都在急剧下降，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生育率却在上升。在尼日利亚，总生育率从 1999 年的 4.7 个孩子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5.7 个。[5] 在教育方面，家庭财富会造成差别。在所有国家，贫困人口的生育率都要高于富裕人口（见图 2.4）。而在低生育率水平的国家（在富裕国家较为典型），最穷 1/5 和最富 1/5 的差别通常较小——在 0.5~1 次生育之间。而在高生育率水平的国家（在贫困国家较为典型），差别要大得多。在赞比亚，最贫困的 1/5 人口中的女性平均生育率是 8.5 个孩子（世界最高），但是在最富裕的 1/5 人口中，生育率刚刚超过 3 个。

除了家庭财富外，民族和地理区位对理解和应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即使是在高速发展的国家，贫困和少数民族女性所获得的利益也远远低于富裕人群和多数民族女性。因此，巨大的性别差异仍在持续。许多少数民族群体比总体人口的贫困程度高，城镇化程度低。据估计，2/3 的失学女童都属于所在国家的少数民族。[6] 在危地马拉，土著女性的文盲率高达 60%，比土著男性高 20%，且是非土著女性的两倍。[7] 对越南的少数民族来说，超过 60%的婴儿是在没有产前看护的情况下出生的，是多数民族京族（Kinh）的两倍。更多的城镇少数民族群体和贫困地区散居的人口与多数人群之间的差别通常较小。在中国，农村少数民族群体获得教育和健康的机会要少于城镇化程度更高的汉族、回族和满族，但是城镇地区的入学率和

图 2.4 在低收入国家，生育率仍然很高——而且越是贫困的国家，贫富之间的生育率差异就越大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得出的估算值。

健康保障差异更小。[8]

其他排斥因素，如种姓、残疾、性取向等，也常常以加剧劣势的方式对发展成果产生影响。要更好地理解这些关系，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

经济进步未能拉动的“滞缓”领域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女性死亡率和获得经济机会途径等性别平等的两个方面，收入增长仅仅带来了微小而缓慢的变化。在女性对资源的控制力、女性的政治话语权以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方面，性别差异也没有缩小。

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经济发展了，但个人偏好、市场失灵、制度约束，以及社会规范仍在继续强化性别差异。通过新的性别偏好，收入增长同样可能对性别平等产生出乎意料的不利影响。在另一些情况下，发展成果并不总是反映确保平等权利带来的广泛收益。将法律保障扩展到女性、使两性获得平等法律保障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是缓慢的执行阻碍了性别平等化的进程。在所有国家，社会规范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束缚着性别平等化进程，而理论和实践的断裂也依然存在。

在某些国家，经济增长甚至会使性别差异暂时恶化。在中国，农村工业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起初使得家庭偏向让男孩接受初中教育，从而大大拉大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性别差异。[9] 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女孩在 90 年代迅速赶上了男孩。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中等教育扩张最显著的地区之一。和在中国一样，1999 年和 2008 年之间进入中学就读的非洲男孩多于女孩，从而拉大了性别差异。在 2008 年，学校中每 100 个男孩对应 79 名女孩，较之 1999 年的 100 个男孩对应 83 个女孩的情况有所下降。的确，女孩在中学入学方面有显著的壁垒，整体的入学率也都非常低。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差异不利于男孩。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男孩的留级和辍学率都要高于女孩。在某些中高收入及发达经济体中，男性成绩不佳，这令人担忧——在学业方面，

女孩明显要强于男孩。在美国和以色列，女孩在所有学科中的分数要高于男孩，包括数学和科学。[10] 在法国，精英学校法国商业高等专业学院（商学院）中女性的录取状况明显好于男生。[11] 男性在高等教育中的不佳表现通常并不是由于社会排斥造成的，男性同样可能受到文化规范影响，从而无法取得好的学业成绩。将教育视为主要是“女性从事”的事情意味着，在某些加勒比国家，如多米尼加和牙买加，男孩会从学校退学。[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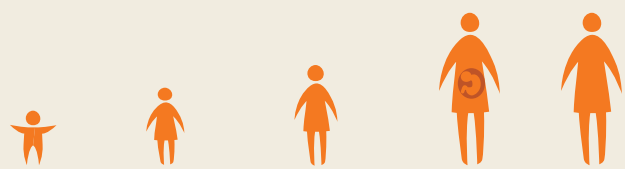
> “我的妹妹 14 岁生孩子的时候死了。”
>
> ——也门共和国年轻女性

出生时女婴失踪问题和过高的女性死亡率

1990 年、2000 年和 2008 年的出生性别比例和死亡率显示，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女性持续处于劣势（由于某些原因，也有某些地区男性处于不利地位）。首先是中国和印度（以及高加索山脉和西巴尔干的一些国家）扭曲的性别比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见表 2.1）。人口估计显示，如果这些国家的出生性别比与全球其他各国相似的话，女孩出生数量会增加 140 万名（主要是在中国和印度）。其次，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与发达经济体对比，中低收入国家中女性相对男性的死亡率更高。[13] 综上所述，2008 年，出生时女婴失踪问题和 60 岁以下女性过高的死亡叠加起来，共有 390 万女性殒命，其中 85%发生在中国、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在另一部分国家，

表 2.1　1990 年至 2008 年间，印度和中国的女婴出生时失踪数量增长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年女性死亡率也增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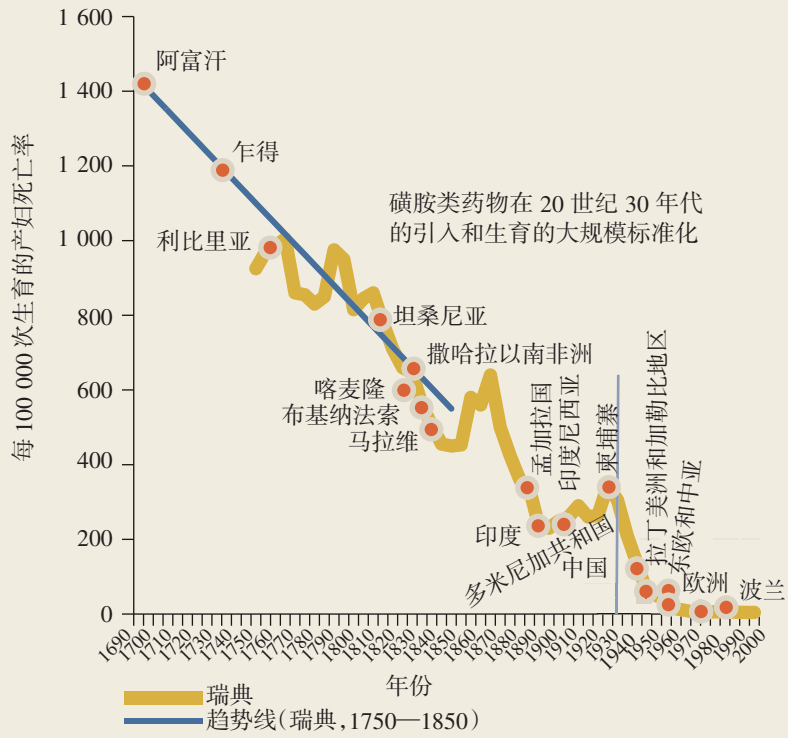
1990 年和 2008 年世界上过高的女性死亡状况，按年龄和地区划分（单位：千人）



	出生时的女婴		5 岁以下女孩		5~14 岁女孩		15~49 岁女性		50~59 岁女性		60 岁以下的女性总数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中国	890	1 092	259	71	21	5	208	56	92	30	1 470	1 254
印度	265	257	428	251	94	45	388	228	81	75	1 255	85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53	183	203	61	77	302	751	50	99	639	1 182
高艾滋病流行率国家	0	0	6	39	5	18	38	328	4	31	53	416
低艾滋病流行率国家	42	53	177	163	57	59	264	423	46	68	586	766
南亚（印度除外）	0	1	99	72	32	20	176	161	37	51	346	305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除外）	3	4	14	7	14	9	137	113	48	46	216	179
中东和北非	5	6	13	7	4	1	43	24	15	15	80	52
欧洲和中亚	7	14	3	1	0	0	12	4	4	3	27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	0	11	5	3	1	20	10	17	17	51	33
合计	1 212	1 427	1 010	617	230	158	1 286	1 347	343	334	4 082	3 882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年报告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9 年报告得出的估算值。
注：由于四舍五入，合计数不一定等于各项加总。

图 2.5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死亡率与 1900 年前瑞典的死亡率相当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等 2010 年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特别是在一些转型经济体中，过高的男性死亡率问题非常严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保持不变，而其他方面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发现了扭曲性出生性别比例问题，[14] 而且随着产前性别判定方法的普及和生育率的下降，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了。过高女性死亡率的发生地带和阶段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从南亚的早期儿童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年期。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女性死亡率都在下降（见第 3 章）。

这些规律说明了什么？第 3 章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但我们在这里将重点强调两个话题：孕产妇死亡率和儿子偏好。女性在生育年龄期间的死亡率偏高部分是由怀孕和生育期间的死亡风险和相关的长期残疾导致的。[15] 尽管从 1990 年开始孕产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 34%，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产妇死亡率仍然偏高：200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死亡率最高，每 100 000 次生育中就会发生 640 例产妇死亡，其次是南亚（280），大洋洲（230），以及东南亚（160）。[16] 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孕产妇死亡率与瑞典 20 世纪初的孕产妇死亡率相当，而阿富汗的孕产妇死亡率则与瑞典 17 世纪的孕产妇死亡率相近（见图 2.5）。

这些高死亡率导致了女性死亡绝对数量的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仍然非常高的地区。2008 年，印度有 63 000 例孕产妇死亡，撒哈拉以南非洲则有 203 000 例（超过总数的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富裕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的产妇死亡总数仅为 1 900。[17] 在阿富汗每 10 名女性中就有 1 名，在索马里和乍得每 14 名女性就有 1 名死于生育，更多的女性深受产中或产后并发症导致的长期健康问题之苦。

孕产妇死亡率的进步没有与 GDP 的增长同步。在 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乍得和坦桑尼亚的经济每年分别以 9.4%和 7%的高速增长，但是孕产妇死亡率在乍得只下降了 8%（降至每 100 000 次生育中发生 1 200 例），在坦桑尼亚只下降了 14%（降至每 100 000 次生育中发生 790 例）。同期南非在以每年 4%的中等速度增长，而孕产妇死亡率则上升了 8%，达到每 100 000 次生育中发生 410 例——表现出了艾滋病流行的后果。从 1990 年开始，印度和赤道几内亚的孕妇死亡率均下降了 41%，到 2008 年降至相当的水平，但两个国家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曲线：前者每年仅仅下降 3%，而后者每年足足下降 8%。许多国家的高孕产妇死亡率是由糟糕的产妇健康服务和高生育率造成的。单靠收入增长和家庭行为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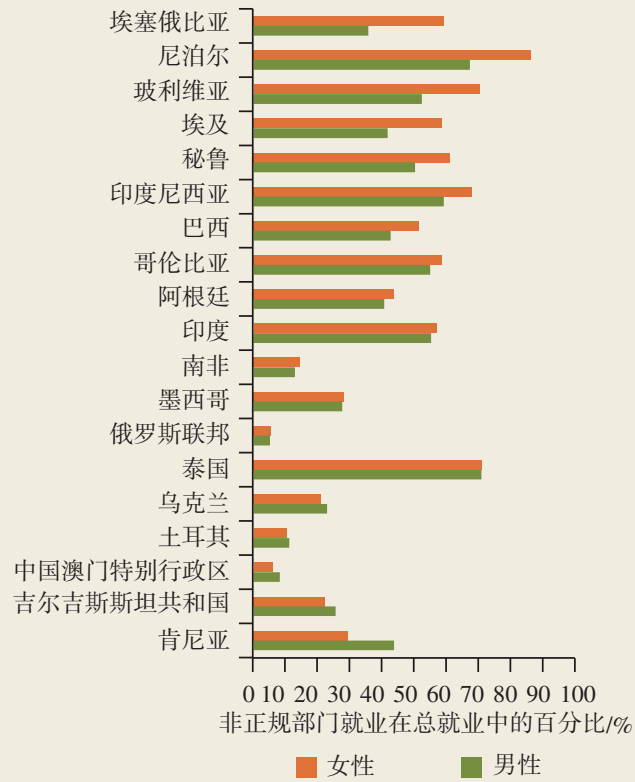
化似乎不足以降低产妇死亡率，公共投资是改进产妇健康看护服务的关键。

在亚洲和高加索山区（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许多地区，对未出生女婴的歧视行为非常普遍。在这些地区，儿子偏好、生育率的下降、新技术都加剧了出生时女婴的失踪问题。在中国和印度，性别比例严重偏重男童。在这些地方，父母仍然偏爱儿子胜过女儿。据悉，性别选择流产导致的性别偏差、杀害女婴和遗弃女婴行为，是导致数百万女婴出生时失踪的主要原因。仅仅在 2008 年，在中国就有大约 100 万女婴，在印度大约有 25 万女婴在出生时失踪。[18] 尽管许多国家，如印度和中国都禁止使用新技术实施性别选择性流产，但是，新技术的滥用，如廉价的移动超声波诊所仍要对这一现象负责。[19]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经济繁荣将使得羊水诊断和超声波技术服务进一步普及，从而可能会导致性别选择性流产在具有儿子偏好的地区继续扩散。[20]

这些偏好很难发生变化。即使在移民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南亚和东南亚人口后代中，男婴的比例都严重偏高。[21] 但这并不是说变化是不可能的：韩国曾经是亚洲 5 岁以下男女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该比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发生逆转，这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规范性价值观的社会变迁有关。[22]

在一小部分国家，同样有男性失踪的情况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厄立特里亚，大量的年轻男性在冲突中失踪。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暴力可能是造成年轻男性过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东欧和中亚，大量的男性在中年时期失踪。当地社会普遍认为，酗酒和其他有风险的行为对男性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这些行为与过高的男性死亡率是相关的。

图 2.6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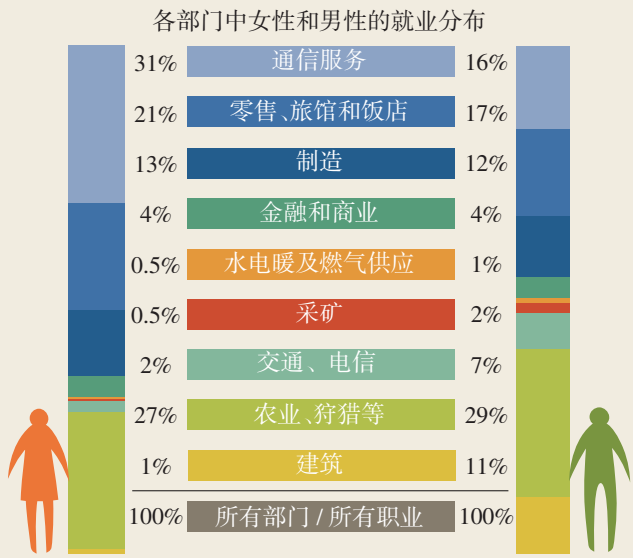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劳工组织 2010 年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1999—2006 年期间有数据可考的最近年度。

> “男人和女人的日工资不一样。如果男人拿到 200 努，女人做同样的工作只能拿到 150 努。这不公平，也不公正。”
>
> ——不丹成年女性

工作不同，工资更低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行业和岗位上工作。但正如第 1 章所示，尽管在几乎所有国家，出外工作的女性增加了，但她们却聚集在被选定的“经济空间”之中，且随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小，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工作场所分割的三个标志尤为明显。第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低生产率的活动所吸

图 2.7 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部门（和职业）中工作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 LABORSTA 劳动统计数据库得出的估算值。

注：由于四舍五入，合计数不一定等于各项加总。

引，并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见图 2.6）。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雇用工人或无工资的家庭作坊工人，她们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流动性较差，且更容易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失业状态之间转换。[23]

第二，农业领域之外的自就业女性更倾向于经营小而非正规的生意，经常是在家庭之外。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如智利和泰国，在家庭作坊中工作的工人中 80%为女性。[24] 由于这些企业的性质，女性业主更多集中在小企业中——雇员人数、销售额、成本和资产总值都很低。企业利润也比男性拥有的企业要低。在拉丁美洲，女性拥有的企业的平均利润比男性拥有的企业要低一个标准差的 15%~20%。[25]

第三，即使是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内部，女性和男性的职业选择也非常不同（见图 2.7）。女性更倾向于在公共服务、零售服务和贸易领域就业。男性则在危险职业如采矿、建筑、运输和重工业中比例过高——无论是在贫困国家还是在富裕国家，这些岗位的伤亡率都较高。国防和公共治安的担子也主要落在了男性的肩上。这些规律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非常类似，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在高收入国家更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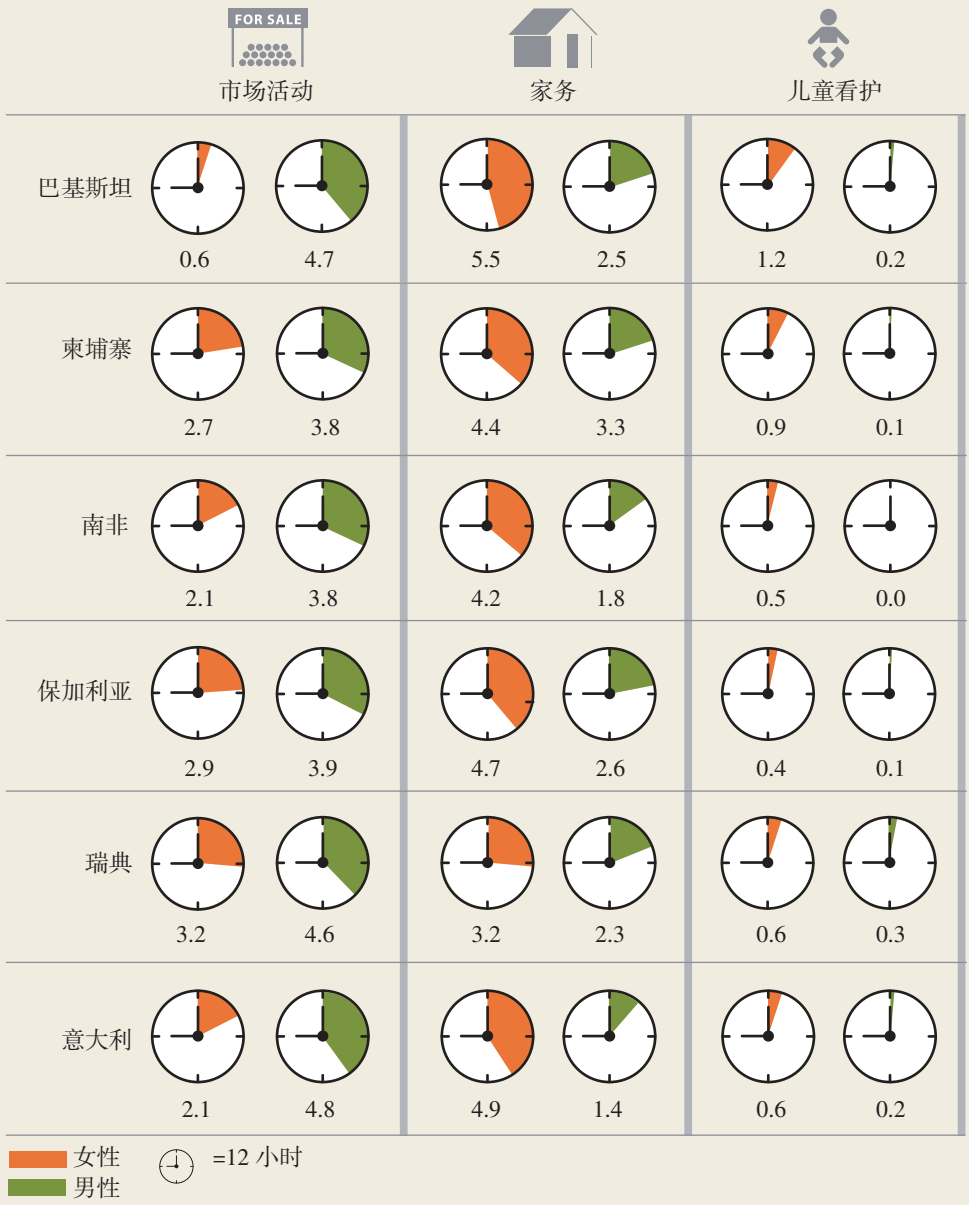
这样的性别差异规律导致了巨大性别收入差异的持续存在，平均工资的性别差异从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的 20%到科特迪瓦、约旦、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80%以上。这些差异正在逐渐消失，主要是由于女性相对于男性在教育方面的进步，女性在一些部门和岗位上集中度的变化，以及由生育控制引起的女性工作经历变化及职业中断的减少等。[26]

家务和照料家人仍被视为女性的职责

家务和照料时间分配是性别差异表现得特别持久的领域之一。在不同

> “女性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女性比男性更辛苦……她们要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而男性全天都在工作，不需要料理家务。如果女性也有一份工作，那么她会更加疲劳。”
>
> ——摩尔多瓦成年女性
>
> “如今的日子，一个女人要被看作‘好妻子’，她非得是个女超人才行。在家和在办公室里都要非常努力，完成家庭成员的每一项要求，仿佛我们没有任何享乐的权利。”
>
> ——不丹成年女性

图 2.8　世界范围内，女性每天用于家务和照料工作的时间多于男性……男性用于市场活动的时间较多



资料来源：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

时间和不同国家，女性所承担的家务和照料职责比例明显偏高，而男性则主要承担市场工作，这种分工和收入无关。这些差别深深地植根在性别角色中，减少了女性的娱乐时间，降低了女性的福利和福祉。不同家庭职责分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男性和女性时间使用的规律和闲暇时间总量差异很大。这些规律意味着女性在教育投资（见第 3 章）、她们的能动性（见第 4 章）、她们占有经济机会的能力（见第 5 章）以及广泛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见第 4 章和第 6 章）等方面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在 6 个收入、经济结构和社会规范非常不同的国家中，规律表现出惊

人的相似性（见图 2.8）。各地女性每天用于家务的时间要比男性多 1~3 个小时；每天用于照料（儿童、老人、病人）的时间是男性的 2~10 倍，每天用于市场活动的时间则要比男性少 1~4 个小时。这还是全体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随着家庭的组建该差异还会加大。正如第 5 章所描述的，婚姻大大增加了女性在家务方面的时间，但对男性影响不大。生育大大增加了男性和女性用于照料的时间，但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随着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和男性的时间分配状况将会趋同，主要是因为女性变得更像男性（增加其在市场中工作的时间并减少其在家务和照料工作上的时间），而不是因为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照料工作（见第 5 章）。

较小的话语权和权利

性别平等进展最慢的维度是女性能动性。考虑这三个方面。第一，女性决定收入或家庭开支的能力，反映了她们对其自身生活和周围环境的控制力。第二，家庭暴力的趋势能够描绘家庭内部的性别动态变化，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对称权利关系。第三，政治话语权的图式能够度量决策的包容性、对领导权的行使以及获得权力的途径。

对资源的控制力较小

很多女性对于家庭财务缺乏话语权，甚至对她们的自有收入也是如此。人口和健康调查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女性，被排除在其自有收入的使用决策之外。高达 34%的马拉维已婚女性和 28%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已婚女性被排除在其自有收入的使用决策之外，18%的印度已婚女性和 14%的尼泊尔已婚女性在如何使用其收入上几乎没有话语权。[27]

低收入家庭的丈夫对于其妻子的收入有更大的控制权。在土耳其，在最富有的 1/5 人口中，2%的已婚女性对其收入没有控制权。这一比例在最贫困的 1/5 人口中膨胀到 28%。在马拉维，在最富有的 1/5 的家庭中，13%的已婚女性没有个人收入控制权，相比之下，最贫困的 1/5 人口中没有收入控制权的女性比例高达 46%（见图 2.9）。

对资源和开支的较小控制力部分反映了男性和女性拥有资产的巨大差异。资产的一般获取途径包括：继承、通过婚姻获得、或通过一生中的收入和储蓄而积累。如上面所述，女性的收入通常低于男性，当我们按照整个生命周期累积计算的时候尤其如此，这将在第 5 章中进一步讨论。且不考虑男女之间储蓄行为的差异，这一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她们的储蓄能力。如第 4 章中所探讨的那样，继承权和所有权的分配通常是男女有别的，因此在获得有形资本和财富方面仍然存在巨大而显著的性别不平等。土地构成了家庭财产的最大部分，对最贫困的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尤其如此。[28] 在巴西，女性只拥有 11%的土地，在巴拉圭也只有 27%。其个人拥有量也比男性要少。在肯尼亚，只有 5%的土地拥

> “某些劳动女性甚至不知道她们工作的收入是多少，因为她们的收入是由其丈夫领取的。”
>
>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成年男性

有者是女性。[29] 在加纳，男性土地拥有量的中位数是女性的三倍。[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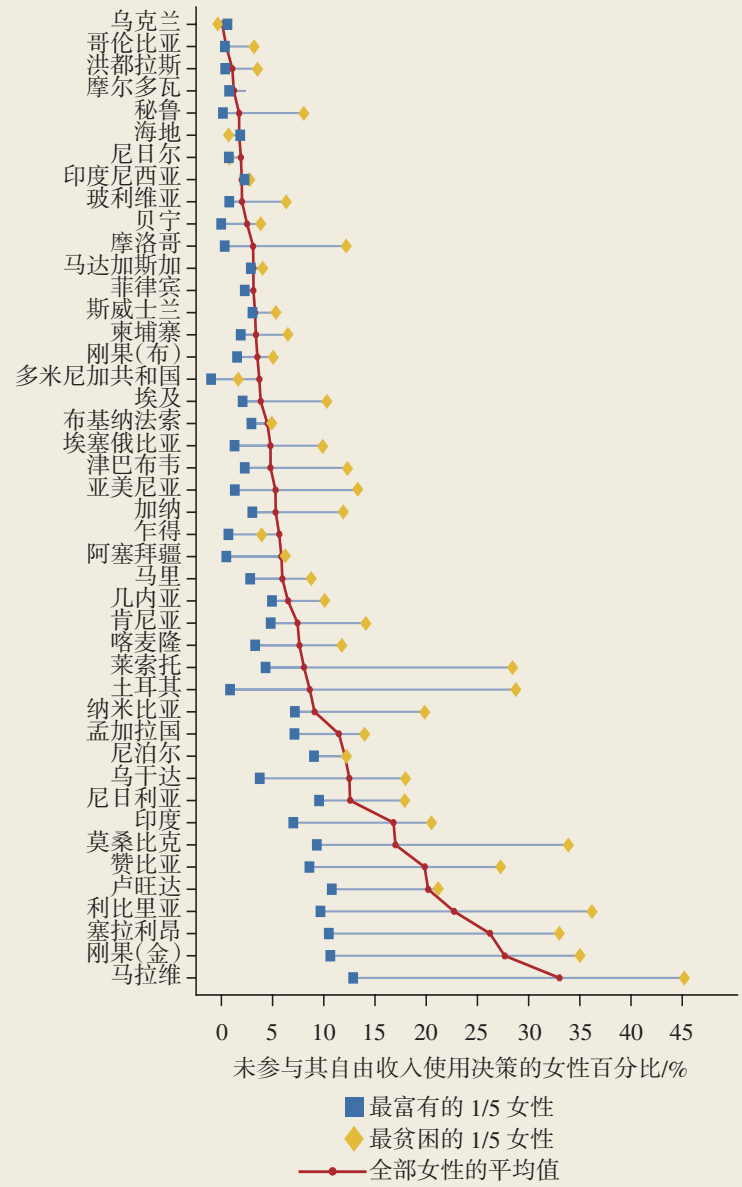
在许多国家，土地所有权仍然仅限于男性，无论是在传统上和法律上都是如此。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和大约半数的亚洲国家，惯例法和成文法中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的规定对女性不利。根据某些非洲地区的惯例法，未经男性许可，女性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31] 婚姻是女性获得土地的最常见途径。但丈夫通常拥有土地，而妻子只有名义上的使用权。事实证明，当女性的财产权利在一些国家正在逐渐开始改进的时候，仅仅靠立法通常不足以改变眼下的实际做法。

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的伤害

对女性的身体上的、性的以及心理上的暴力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作为对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粗暴侵犯，暴力可以表现为许多形式。国际统计数据并不总是具有可比性，但是事实毫无疑问地显示，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一个全球问题。[32] 女性受到其伴侣暴力侵犯的风险比男性大得多，受到相识的人侵犯的风险也比遭受他人侵害的风险要大得多。例如，根据南非的数据，教师是强奸 15 岁以下女孩的最常见的施暴者（案例总数的 1/3）[33] 南非约有 50%的女性遇害案件是由其伴侣犯下的。据估计，每 100 000 名女性中就有 8.8 名因遭受伴侣暴力侵害致死。[34] 总的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杀害、重伤，或成为其伴侣的性暴力受害者。[35]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立法管制伴侣暴力。在 2006 年，60 个国家有了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较之 2003 年的 45 个国家数量有所增长，另有 89 个国家有了某种形式的法律条款。这些国家多为高收入国家，大多数有针对伴侣暴力法律的发展中国家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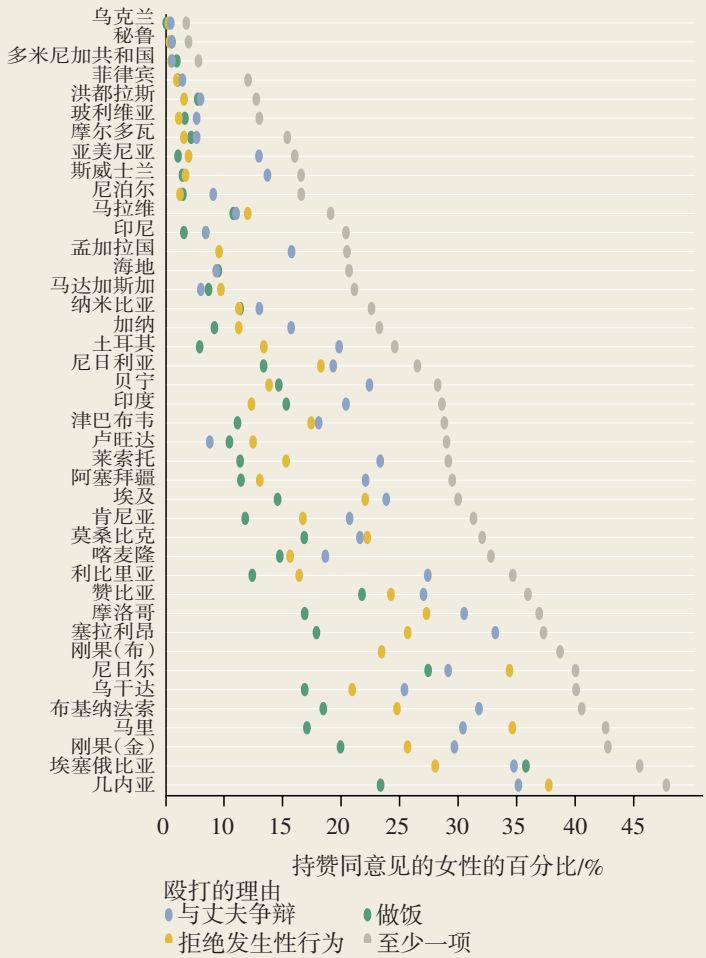
图 2.9　谁控制了女性的自有收入？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得出的估算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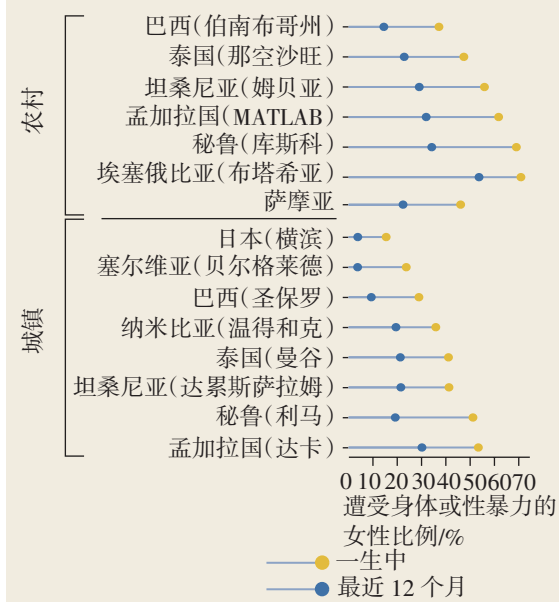
> “我认为女人现在很成问题：她们挣了点钱就不再听我们的话了。所以，如果你在家里还想做个男人的话，你就得立点规矩。你得把她揍老实了，而且如果小孩插手阻拦的话，你得连他一起揍。那样她们才会害怕并尊重你。”
>
> ——坦桑尼亚成年男性

图 2.10 不同国家中女性对“殴打妻子是正当的”这一观点的看法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人口和健康调查得出的估测值。

图 2.11 各国家庭暴力发生率差别很大



资料来源：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然而在许多国家，针对女性的暴力被认为是可接受的甚至是正当的。从各国平均数据来看，女性赞同妻子与丈夫争辩时丈夫可以打妻子的比例为 29%，赞同妻子拒绝发生性行为时丈夫可以打妻子的比例为 25%，赞同丈夫可以因为做饭的原因而打妻子的比例为 21%。在几内亚，60%的女性认为拒绝与其配偶发生性行为时被配偶殴打是可以允许的。在埃塞俄比亚，81%的女性认为，在人口和健康调查统计中列出的至少一种情况下，丈夫打妻子是正当的；据报告，其中 61%的女性认为丈夫因为做饭而打妻子是正当的，59%的女性认为丈夫在妻子与丈夫争辩时打妻子是正当的（见图 2.10）。

家庭暴力在富裕和贫困国家都无处不在，形式各异。在埃塞俄比亚（布塔希亚）和秘鲁（库斯科），过去的 12 个月中遭受过伴侣身体暴力或性虐待的女性分别为 54%和 34%。另一个极端是，在日本（横滨）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该比例则低于 4%的标志线（见图 2.11）。在许多情况下，暴力问题可能非常严重。在秘鲁（库斯科），约有 50%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遭受严重的身体暴力侵害。[36] 而且即使在发生率很低的地方，绝对数量也高得让人无法接受。波兰 3%的家庭虐待发生率意味着每年有 534 000 位女性遭受虐待，或者每天遭受虐待的女性新增 1 463 位。[37]

家庭暴力无国界，但是其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跌落而上升。根据不同经济状况小组反映的情况，家庭暴力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中最为盛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低和家庭暴力互为因果。低教育水平、经济胁迫、物质滥用等，都在虐待行为发生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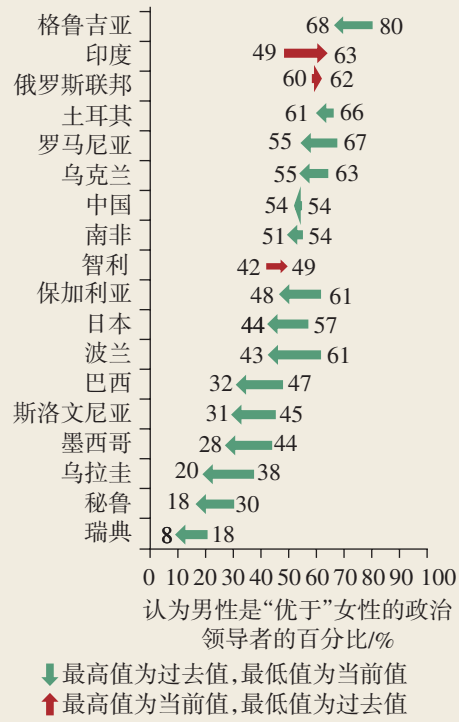
男性也同样可能成为受害者。相对女性而言，无论是从发生率、性质和严重程度上看，针对男性的家庭暴力较为有限。根据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2009 年，每 1 000 名女性中有 4.1 名成为伴侣暴力的受害者——超过 50 万名。而每 1 000 名男性中则有 0.9 名成为伴侣暴力的受害者——11.7 万名。因此男性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几率只有女性的 1/5。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04 年至 2009 年间，五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中有两位是男性。根据《不列颠犯罪调查》的数据，大约 4.0%的男性（女性为 4.8%）报告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遭受过伴侣虐待，估算男性受害者数量约为 600 000。[38]

从政的可能性较小

很少有国家会对女性参与公职竞选的行为设置法律限制，然而议会中女性议员的席位却非常少，而且在过去 15 年中进展非常缓慢。在 1995 年，女性在国家议会下议院或上议院中所占比例为 10%，而到 2009 年，这一比例为 17%。[39] 在非洲和大部分亚洲地区，女性议员的比例翻了一番还多。同样在过去 15 年中，女性议员比例超过 30%的国家从 5 个增加到了 23 个，其中包括 7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阿根廷、古巴、芬兰、冰岛、荷兰和瑞典。卢旺达议会的女性比例从 1995 年的 17%提高到了 56%，东亚的进步最小，太平洋诸岛的女性议员比例尤其低。

尽管男性和女性通过投票平等地行使其政治话语权，据观察，男性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胜过女性。近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表明，过去十年中，在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观朝着积极的方向演进（见图 2.12）。但人们仍然认为男性是“优于”女性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

图 2.12　男性被认为是比女性更好的政治领导者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1994—1997 年和 2005—2007 年间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而且，男性比女性赢得选举的机会要大。女性候选人击败男性赢得议会席位的可能性是 0.87（1 表示男女在选举中胜算均等），各国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别。在非洲，女性战胜男性的机会要更大，相比之下，在亚洲和高收入国家，女性获胜的几率要小许多。在太平洋诸岛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女性是赢得选举的难度最大。[40]

配额制和预留席位制有助于提升议会中的女性代表率。90 个国家对议会代表率有某种形式的配额机制安排，无论是通过预留席位、候选人配额立法，还是自愿性的政治党派配额。16 个国家特别为女性预留了议会席位，这些国家都是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其他国家如芬兰，变化则非常小。例如，1991 年在芬兰议会中新选举出的成员中，38.5%是女性，而到了

专栏 2.1 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

气候变化导致洪涝灾害更加频繁，降雨量更不均匀。由于世界各国人口在灾害多发区域活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大，受到气候冲击和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口也越来越多。低温天气和霜冻的频率越来越低，而热浪的频率和强度则增加了。洪水和干旱发生的更加频繁了。虽然总体降水量在提高，但大陆内部却日趋干旱。从全球范围看，降水总量增长了，但高温带来的水循环加速，使得连西非草原和地中海地区的干旱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大雨和洪水变得更加常见，亦有证据表明暴风和热带龙卷风的强度也增加了。

在自然灾害面前女性似乎更加容易受到伤害，而其影响则与贫困密切相关。最近一项对 141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自然灾害中丧生的女性比男性更多。而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地区，男性和女性在灾害中和灾后的死亡数量大致相当，而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地区，女性死亡（或夭折）的数量高于男性。在灾难中，女性和儿童比男性更容易死亡。在亚洲海啸中，死亡率最高的是 15 岁以下的女性和儿童。相比之下，1998 年由尼加拉瓜“米奇”飓风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之中，54%是男性。

不稳定的天气同样会影响农业生产率，从而降低农户家庭收入和食物量。粮食减产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可能并不均等。气温和降水波动还可能造成虫媒疾病、水传播疾病、水洗病等传染病的流行，并影响动植物对于冷热天气的抵抗力。

变动的天气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可能不同。印度和墨西哥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显示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影响程度和方向则取决于气候冲击本身和当地的环境。在墨西哥的某些地区，在降雨量突然增长或气温急剧下降后，农村女孩基于年龄的相对身高（height-for-age）可能低于男孩。但是，高纬度地区的女孩却可能由于天气比较温暖，基于年龄的相对身高高于男孩。

资料来源：Jacoby，Safir 和 Skoufias 2011；Neumayer 和 Plümper 2007；Skoufias，Vinha 和 Conroy 2011；世界银行 2009。

2011 年，这一比例仅仅提高了一点，达到 42.5%。

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从规模上讲，女性的内阁参与率也比较低。2008 年，部长中女性的比例平均为 17%，与 1998 年的 8%相比，有所提升。在每个地区，我们都可以看到内阁岗位上的女性比例提高了，特别是在西欧、南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998 年，女性部长比例超过 20%的国家只有 13 个，但 10 年后这一数字增长到了 63 个。2008 年，在智利、芬兰、法国、格林纳达、挪威、南非、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内阁中，女性部长比例超过了 40%。[41]

倒退

本章讨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构成了本报告其他部分内容及相应政策建议的主要框架。性别关系通常具有清晰的分析路径，相比之下，可能导致福利和福祉巨大损失的外部冲击，其影响则取决于许多具体的环境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男性或男孩受到负面影响；在另一些情况下，受到负面影响的则是女性和女孩。冲击可能是暂时的，冲击后产生了巨大的福利损失，但随后便能恢复。[42] 但有些冲击，特别是如果它们发生在生命的早期（如关键的前三年），则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这里描述的是外部冲击及其影响的多面性。我们希望传递的信息是：对外部冲击的防御应当成为任何发展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性别视角是否适用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无论冲击的来源是金融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还是自然方面的（见专栏 2.1），冲击和灾难都对男性和女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他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地位所决定的。首先，市场失灵、制度约束，以及社会规范都可能放大或缩小冲击影响的性别差异。导致这些结果的机制是多样的。例如，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中女性（女孩）的较高死亡率，与其行动受到着装和看护幼小子女的职责的限制有关。[43] 第二，这些失灵、限制条件以及规范，都可能使不同性别在冲击面前的易伤害程度的差别扩大或缩小。例如，女性倾向于比男性拥有和控制更少的财富这样一个事实，会使她们在收入受到冲击时更容易受到伤害。

震荡可能导致两个领域的显著倒退，一是教育和健康指标，二是经济机会的获取途径。

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倒退

收入的急剧下降通常会导致女婴的健康状况恶化。妊娠期或婴幼儿期的营养不良以及对医疗保健的忽视，会提升死亡率和日后患病的风险。在印度，由于宏观经济危机，女孩的死亡率显著上升，但男孩则得到了良好的保护。[44] 一项对 59 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经济紧缩期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每 1 000 名女婴中有 7.4 名死亡，每 1 000 名男婴中有 1.5 名死亡，前者是后者的近 5 倍。[45] 经济冲击对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造成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营养补充而得到恢复。

相比之下，就相关危险行为、患病率和死亡率而言，经济危机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在东欧，政治经济突变导致了男性预期寿命的意外下降。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男性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疾病所带来的负担。男性早逝的情况在未婚人口中非常集中。女性比男性的寿命平均要长 9 年，这一差距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男性死亡率的升高部分与危险行为的增加有关，其中包括吸烟和酗酒。[46] 在俄罗斯，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19% 的男性被认为存在酗酒问题，而女性的比例只有 1%。[47] 失业压力（挑战了男性作为谋生者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薄弱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与男性健康水平的下降存在关联。[48]

在某些国家，当家庭经历收入冲击时，女孩的教育相对男孩而言受害更严重。但并非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土耳其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因为家庭预算紧张而辍学。[49] 在印度尼西亚，女孩在农作物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更容易失学。[50] 在外部经济冲击下的易伤害性特别重要，因为学业的中断会增加辍学的风险，而学习进度的落后及延迟可能会对总体成绩产生永久性的影响。埃塞俄比亚 7~14 岁的儿童中，前一学期上过学的女孩比未上过学的女孩继续上学的可能性高 69%，而男孩则高出 21%。[51]

> “摩尔多瓦的金融状况非常糟糕。我想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家庭。”
>
> ——摩尔多瓦成年男性

但男孩同样可能由于经济冲击而辍学，通常是为了帮助家庭摆脱经济困难。当低技能工作机会出现时，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辍学打工以补充正在减少的家庭收入。尽管一般而言，埃塞俄比亚男孩享受更好的入学机会，但是经济危机出现时，他们也同样是首先辍学打工的群体。[52] 在科特迪瓦，当男孩和女孩的录取率都随旱灾而下降时，男孩的入学率下降更多（见第 3 章）。

收入冲击对人力资源禀赋积累的影响有好有坏。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中高收入国家），收入降低事实上会将男孩和女孩带回学校，因为危机中工资减少或不景气的劳动力市场状况降低了就学的机会成本，使得家庭愿意将其子女留在学校，对那些很容易被劳动工资吸引的男孩来说尤其如此。在尼加拉瓜，当咖啡价格在 2000—2002 年间剧烈下降时，农村男孩的入学率提升了 15%。[53] 在阿根廷，1998—2002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就业率下降同样提升了男孩的入学率。[54]

在经济机会获取途径方面的倒退

冲击可能会使得男性和女性的经济机会都出现倒退。女性倾向于从事

较不稳定的工作、做小本生意，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似乎意味着她们更容易被经济震荡所影响。但证据并不支持这样广为人知的观点。

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发现与性别相关的共同规律，也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55] 从 41 个中等收入国家中获得的证据表明，主要的影响来自工作质量（工作时长和工资水平）而不是工作数量。[56] 性别影响在各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对其进行归纳。[57]

在经济危机中，劳动力市场中的进入（新加入的工人）或退出（放弃求职的工人）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对不同类型的女性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低收入家庭的女性通常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家庭更为富裕的女性则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在非正式的、无管制的经济部门，经济危机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些部门会更乐于吸收女性参与小生意或家庭服务。[58]

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方向及其性别差异，取决于宏观经济冲击的本质。出口导向型产业，如灯具制造，是近期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由于女性在这些领域中的劳动参与率高，从而遭受了强烈的第一轮失业负面效应。但女性在经济危机中某些缩水的部门如建筑、依赖外需的产业如旅游等部门中的劳动参与率较低，这意味着，如果将第二轮影响考虑在内，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总体就业影响就被抵消了。在拉脱维亚、摩尔多瓦、黑山共和国和乌克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失业。这些国家中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部门——建筑和制造——是倾向于被男性主导的。

同样，在亚洲 1997 年经济危机对女性就业的冲击并不是最严重的。东亚国家的女性在对经济危机更有弹性的企业中就业的比例明显偏高。[59] 但性别收入差异却扩大了，特别是在较大的企业中。换句话说，女性较小的净就业影响是以其收入降低为代价的。

“滞缓领域”更加“滞缓”

我们在第 1 章指出，变化是相互联系的。性别平等一个维度的进步，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产生乘数效应。反之亦然。一个维度的进展滞缓可能与其他维度的负效应交织在一起。许多层面的限制性条件结合在一起并相互加强，从而使性别差异得以持续。要冲破这一困境，需要在这一持续不平等的网络的多个方向上共同行动。

在发展中国家，产妇教育与婴幼儿死亡率呈负相关关系。在莫桑比克，产妇教育的缺乏预警了健康服务使用率低，以及儿童营养不良现象。[60] 还有 2 岁以下的发育迟缓的儿童，他们的心理活动技能和认知能力都比较差。营养不良的男孩和女孩入学的可能性同样较低，或入学较晚，从而导致贫困的循环不断持续。[61]

女孩和成年女性糟糕的健康水平还会向下一代人传递。母亲当前的和童年时期的健康状况都会对下一代的健康产生影响。女性福祉——可以通过较矮的身高、较低的体重和贫血程度来度量——会影响婴儿出生体重、存活率及其发育。因此对女孩和成年女性的投资不足将会导致儿童死亡率上升，也会造成存活儿童的低健康水平的代际循环。[62] 出生时身体偏小而且未能在随后的成长中赶上的女童，无法达到从其遗传潜力上看可以达到的身高。她们缩小了的子宫和卵巢意

味着其后代的出生体重较轻，从而产生了新的代际贫困的循环。[63]

缺少对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对女性的能动性产生重要影响。财产是帮助女性提升其在家庭决策中话语权和谈判力、获得资本，以及整体经济独立的重要砝码。不拥有土地的尼泊尔女性在家庭决策中的话语权比拥有土地的女性要少。[64] 在哥伦比亚，缺少财产权或社会资产限制了女性在获得工作、控制个人收入、自由流动以及反抗家庭虐待方面的谈判力。[65] 在印度喀拉拉邦，女性对不动产的独立控制权对长时期内的身体或心理的家庭暴力问题而言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因素，远远超过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女性同时拥有一套房产和土地，则其遭到殴打的概率仅是既无房产又无土地的女性的 1/20。[66] 给女性带来现金收入的职业同样与女性赋权紧密相关。没有现金收入是与已婚女性缺少在诸如健康看护、大宗家用品购买、日常需求品购买或探望亲朋好友等家庭事务方面的决策权最紧密相关的因素。在大多数国家，高家庭收入这一因素本身并不总是能够增加女性独立决策或参与家庭决策的可能性。[67]

男性和女性集聚在不同职位和部门的现象早在教育系统内就已开始显现。虽然随着更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参与率都在增长，但各专业领域的分割仍然存在。工程、制造和建筑领域的男性偏向最为突出。在全世界大约 2/3 的国家，科学领域的男性同样超过女性。但是在世界上 9/10 的地方，女性在教育、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商业、法律、健康及社会福利领域人数更多。

由专业而产生的教育分割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按研究领域划分，柬埔寨、老挝民主共和国、摩洛哥、纳米比亚都属于学习领域性别分割程度最低的国家，尽管男性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机会更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划分，土耳其的性别分割程度最低，而克罗地亚、芬兰、日本、立陶宛的性别分割程度最高。在挪威和丹麦，女性占高等教育录取人数的 2/3，但理科学生中女性的比例仅占 1/3。[68]

性别平等的某一方面的限制因素可能阻止其他维度的进步，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持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所举只是其中的几个。性别不平等的持续，造成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代价。报告的第 2 部分分析了这些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基础，将其植根于家庭、市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之中。

注释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0。
2. Yuki 等 2011。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 2010。
4. Berry 1977；Högberg 和 Wall 1986。
5. 美国国际开发署 2006。
6. Lewis 和 Lockheed 2006。
7. Chioda，Garcia-Verdú 和 Muñoz Boudet 2011。
8. Hannum 和 Wang 2010。
9. Hannum 2005。
10. Perkins 等 2004。
11. Vincent-Lancrin 2008。
12. Jha 和 Kelleher 2006。
13. 参见第 3 章，技术附录。
14. Sen 1999。
15. AbouZahr 2003。
16. 世界卫生组织等 2010。
17. Ibid。
18. 在女童生育未被报告的地区，该估计会受到影响。

19. Jha 等 2006。

20. Guilmoto 2009。

21. Abrevaya 2009；Almond，Edlund 和 Milligan 2009；Dubuc 和 Coleman 2007。

22. Chung 和 Das Gupta 2007。

23. Bosch 和 Maloney 2010；Gong 和 van Soest 2002。

24. Beneria 2001。

25. Bruhn 2009；Mead 和 Liedholm 1998。

26. Chioda，Garcia-Verdú 和 Muñoz Boudet 2011。

27.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 2010。

28. Banerjee 和 Duflo 2007。

29. Nyamu-Musembi 2002。

30. Deere 和 Doss 2006。

31. Katz 和 Chamorro 2003。

32. 另外，由于缺少经度数据，我们无法分析该趋势随时间的变化。

33. Jewkes 等 2002。

34. Abrahams 等 2009。

35. Reed 等 2010。

3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 2010。

37. Ibid。

38. 英国政府内政部 2009。

3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 2010。

40. Ibid。

41. Ibid。

42. Dercon 2011。

43. Nishikiori 等 2006。

44. Bhalotra 2010。

45. Baird，Friedman 和 Schady 2007。

46. 世界银行 2007。

47. Bobrova 等 2010。

48. Doyal 2000。

49. Tansel 2002。

50. Cameron 和 Worswick 2001。

51. Mani，Hoddinott 和 Strauss 2010。

52. Rose 和 Al-Samarrai 2001。

53. Maluccio 2005。

54. López Bóo 2010。

55. Habib 等 2010。

56. Khanna，Newhouse 和 Paci 2010。

57. Cho 和 Newhouse 2011；Turk 和 Mason 2009。

58. Sabarwal，Sinha 和 Buvinic 2010。

59. Hallward-Driemeier，Rijkers 和 Waxman 2010。

60. Lindelow 2008。

61. Naudeau 等 2011；Victora 等 2008。

62. Bhalotra 和 Rawlings 2011。

63. Ibañez 等 2000。

64. Allendorf 2007。

65. Friedemann-Sánchez 2006。

66. Agarwal 和 Panda 2007。

67. Kishor 和 Subaiya 2008。

6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9。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ouZahr, Carla. 2003. "Global Burden of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67 (1): 1–11.

Abrahams, Naeemah, Rachel Jewkes, Lorna J. Martin, Shanaaz Mathews, Lisa Vetten, and Carl Lombard. 2009. "Mortality of Women From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A 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Violence and Victims* 24 (4): 546–56.

Abrevaya, Jason. 2009. "Are There Missing Girl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Birth Data." *Applied Economics* 1 (2): 1–34.

Agarwal, Bina, and Pradeep Panda. 2007. "Toward Freedom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glected Obviou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8 (3): 359–88.

Allendorf, Keera. 2007. "Do Women's Land Rights Promote Empowerment and Child Health in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35 (11): 1975–88.

Almond, Douglas, Lena Edlund, and Kevin Milligan. 2009. "O Sister, Where Art Thou? The Role of Son Preference and Sex Choice: Evidence from Immigrants to Canada." Working Paper Series 15391, Nar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aird, Sarah, Jed Friedman, and Norbert Schady. 2007. "Aggregate Income Shocks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3): 847–56.

Banerjee, Abhijit Vinayak, and Esther Duflo. 2007.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1): 141–67.

Beneria, Lourdes. 2001. *Changing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the Informalization of Jobs: General Trends and Gender Dimension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Berniell, María Inés, and Carolina Sánchez-Páramo. 2011. "Overview of Time Use Data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Patter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Berry, Linda G. 1977. "Age and Parity Influences on Maternal Mortality: United States, 1919–1969." *Demography* 14 (3): 297–310.

Bhalotra, Sonia. 2010. "Fatal Fluctuations? Cyclicality in Infant Mortality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3 (1): 7–19.

Bhalotra, Sonia, and Samantha B. Rawlings. 2011.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in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enalty of Gender Inequa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3–4): 286–99.

Bobrova, Natalia, Robert West, Darya Malyutina, Sophia Malyutina, and Martin Bobak. 2010. "Gender Differences in Drinking Practices in Middle Aged and Older Russians." *Alcohol and Alcoholism* 45 (6): 573–80.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Using Markov Processes: An Application to Informality." *Labour Economics* 17 (4): 621–31.

Bruhn, Miriam. 2009. "Female-Owned Firms in Latin America. 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and Obstacles to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12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meron, Lisa A., and Christopher Worswick. 2001. "Education Expenditure Responses to Crop Loss in Indonesia: A Gender B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2): 351–63.

Chioda, Laura, Rodrigo Garcia-Verdú, and Ana María Muñoz Boudet. 2011. *Work and Family: Latin American Women in Search of a New Bala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o, Yoonyoung, and David Newhouse. 2011. "How Did the Great Recession Affect Different Types of Workers? Evidence from 17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5681,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Chung, Woojin, and Monica Das Gupta. 2007. "The Decline of Son Preference in South Korea: The Roles of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4): 757–83.

Deere, Carmen Diana, and Cheryl R. Doss. 2006.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6/115,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Dercon, Stefan. 2011. "Young Lives: Are The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Outcom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oyal, Lesley. 2000. "Gender Equity in Health: Debates and Dilemma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1 (6): 931–9.

Dubuc, Sylvie, and David Coleman. 2007. "An Increase in the Sex Ratio of Births to India-Born Moth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Evidence for Sex-Selective Abor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2): 383–400.

Friedemann-Sánchez, Greta. 2006. "Assets in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among Women Workers in Colombia's Cut-Flower Industry." *Feminist Economics* 12 (1–2): 247–69.

Gong, Xiaodong, and Arthur van Soest. 2002. "Wage Differentials and Mobility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Mexico." *Labour Economics* 9 (4): 513–29.

Guilmoto, Christophe Z. 2009. "The Sex Ratio Transition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 (3): 519–49.

Habib, Bilal, Ambar Narayan, Sergio Olivieri, and Carolina Sanchez-Paramo. 2010. "Assessing Ex-ante the Poverty and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the Global Crisi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 Microsimulation Approach with Application to Banglades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2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llward-Driemeier, Mary, Bob Rijkers, and Andrew Waxman. 2011. "Ladies First? Firm-level Evidence on the Labor Impacts of the East Asian Crisi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Hannum, Emily. 2005. "Market Transition,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Rural China: New Evidence on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graphy* 42 (2): 275–99.

Hannum, Emily, and Meiyan Wang. 2010. "China: A Case Study in Rapid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genous Peoples,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ed. Gillette Hall and Harry Patrino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Högberg, Ulf, and Stig Wall. 1986. "Age and Parity as Determinants of Maternal Mortality—Impact of Their Shifting Distribution among Parturients in Sweden from 1781 to 1980."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64 (1): 85–91.

Home Office British Government. 2009.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2008/2009, Volume 1—Findings from the British Crime Survey and Police Recorded Crime." In *Home Office Statistical Bulletin,* ed. A. Walker, J. Flatley, C. Kershaw, and D. Moon. London: Home Office British Government.

Ibañez, Lourdes, Neus Potau, Goya Enriquez, and Francis de Zegher. 2000. "Reduced Uterine and Ovarian Size in Adolescent Girls Born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Pediatric Research* 47 (5): 575–77.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0.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ILO, Geneva.

Jacoby, Hanan G., Abla Safir, and Emmanuel Skoufias. 2011.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ild Health in Ind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Jewkes, Rachel, Jonathan Levin, Nolwazi Mbananga, and Debbie Bradshaw. 2002. "Rape of Girls in South Africa." *Lancet* 359 (9303): 319–20.

Jha, Jyotsna, and Fatimah Kelleher. 2006. *Boys' Under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An Exploration in Selected Commonwealth Countrie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Gender Section, and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Jha, Prabhat, Rajesh Kumar, Priya Vasa, Neeraj Dhingra, Deva Thiruchelvam, and Rahim Moineddin. 2006. "Low Male-to-Female Sex Ratio of Children Born in India: National Survey of 1.1 Million Households." *Lancet* 367 (9506): 211–18.

Katz, Elizabeth G., and Juan Sebastian Chamorro. 2003. "Gender, Land Rights,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Rural Nicaragua and Hondur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Puebla, Mexico, October 9.

Khanna, Gaurav, David Newhouse, and Pierella Paci. 2010. "Fewer Jobs or Smaller Paychecks?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the Recent Crisis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Poverty Reduction and Network Economic Management, Economic Premise, April 2010, No. 1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ishor, Sunita, and Lekha Subaiya. 2008. "Understanding Women's Empower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DHS) Data." DHS Comparative Reports 20, MacroInternational, Calverton, MD.

Lewis, Maureen A., and Marlaine E. Lockheed. 2006. *Inexcusable Absence: Why 60 Million Girls Aren't in School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Lindelow, Magnus. 2008. "Health as a Family Matter: Do Intra-household Education Externalities Matter for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4 (4): 562–85.

López Bóo, Florencia. 2010. "In School or at Work? Evidence from a Crisi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692,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Bonn.

Maluccio, John A. 2005. "Coping with the 'Coffee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The Role of the Nicaraguan Red de Protección Social." FCND Discussion Paper 188,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Washington, DC.

Mani, Subha, John Hoddinott, and John Strauss. 2010. "Long-Term Impact of Investments in Early School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ral Ethiop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0981,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Mead, Donald C., and Carl Liedholm. 1998. "The Dynamics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6 (1): 61–74.

Naudeau, Sophie, Naoko Kataoka, Alexandria Valerio, Michelle J. Neuman, and Leslie Kennedy Elder. 2011. *Investing in Young Children: A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Guide for Policy Dialogue and Project Prepa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Neumayer, Eric, and Thomas Plümper. 2007. "The Gendered Nature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Impact of Catastrophic Events on the Gender Gap in Life Expectancy, 1981–2002."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7 (3): 551–66.

Nishikiori, Nobuyuki, Tomoko Abe, Dehiwala G. M. Costa, Samath D. Dharmaratne, Osamu Kuni, and Kazuhiko Moji. 2006. "Who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Tsunami?: Risk Factors of Mortality among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Sri Lanka: A Retrospective Cohort Analysis." *BMC Public Health* 6 (1): 73–81.

Nyamu-Musembi, Celestine. 2002. "Are Local Norms and Processes Fences or Pathways? The Example of Women's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Kenya." I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Africa,* ed. Abdullahi A. An-Na'im. London: Zed Books.

Parish, William L., Tianfu Wang, Edward O. Laumann, Suiming Pan, and Ye Luo. 2004.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hina: Nation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Associated Health Problems."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30 (4): 174–81.

Perkins, Robert, Brian Kleiner, Stephen Roey, and Janis Brown. 2004. *The High School Transcript Study: A Decade of Change in Curricula and Achievement, 1990–2000.*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ed, Elizabeth, Anita Raj, Elizabeth Miller, and Jay G. Silverman. 2010. "Losing the 'Gender' in Gender-Based Violence: The Missteps of Research on Dating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 (3): 348–54.

Rose, Pauline, and Samer Al-Samarrai. 2001. "Household Constraints on Schooling by Gend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thiopia."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5 (1): 36–63.

Sabarwal, Shwetlena, Nishta Sinha, and Mayra Buvinic. 2010.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koufias, Emmanuel, Katja Vinha, and Hector V. Conroy. 2011. "The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Welfare in Rural Mexic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55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Tansel, Aysit. 2002. "Determinants of School Attainment of Boys and Girls in Turkey: Individual,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Factor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1 (5): 455–70.

Turk, Carolyn, and Andrew Mason. 2009. "Impacts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East Asia: Findings from Qualitative Monitoring in Five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China-ASEAN Forum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Fourth ASEAN+3 High-level Seminar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Asia-wide Regional High-level Meet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n Pover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eeting, Hanoi, September 28.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9.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09: Comparing Education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 Paris: UNESCO.

———. 2010.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Reaching the Marginaliz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UNESCO.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10.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10: Comparing Education Statistics across the World. Special Focus on Gender.* Montreal: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UN DES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2010. *The World's Women 2010: Trends and Statistic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6. *Women's Lives and Experiences: Chang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Washington, DC: USAID.

Victora, Cesar, Linda Adair, Caroline Fall, Pedro Hallal, Reynaldo Martorell, Linda Richter, and Harshpal Sachdev. 2008. "Maternal and Child Undernutrition: Consequences for Adult Health and Human Capital." *Lancet* 371 (9609): 340–57.

Vincent-Lancrin, Stéphan. 2008. "The Reversal of Gender Inequa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 Ongoing Trend." In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 Volume 1: Demography,* e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aris: OECD Publishing.

World Bank. 2007.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7: Millenium Development Goals,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ragile Stat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0: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itial Results on Prevalence, Health Outcomes and Women's Responses.* Geneva: WHO.

———. 2010.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0.* Geneva: WHO.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World Bank. 2010.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08.* Geneva: WHO.

Yuki, Takako, Keiko Mizuno, Keiichi Ogawa, and Mihoko Sakai. 2011. "Promoting Gender Parity, Lessons from Yemen: A JICA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 in Basic Education."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Research Institut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延伸阅读 1　女性赋权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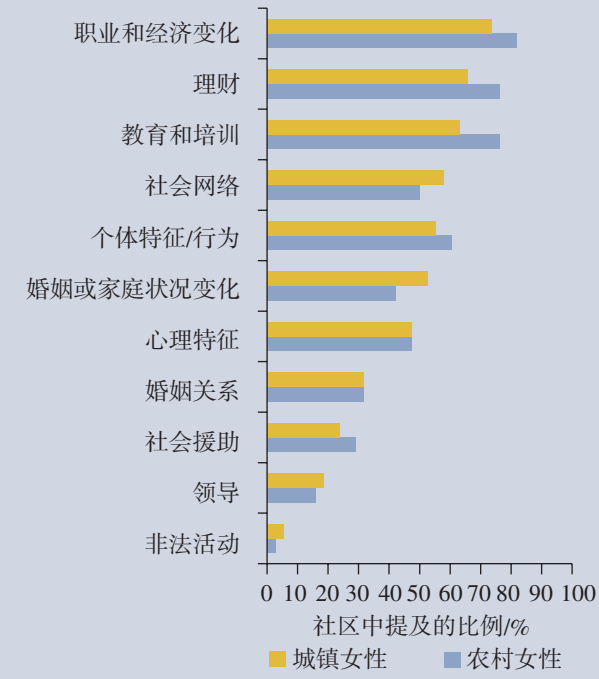
赋予女性权利的因素是什么？与 19 个国家将近 2 000 名女性的谈话显示，女性依赖于多种因素的组合来感受赋予她们的权利。[1]当印度布巴内斯瓦尔的女性被问及权利和自由的含义时，“独立管理家庭事务的自信心增强”、“与邻居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增多”、“出外销售、购物或支付水电费用等其他家庭工作”的能力、“对家庭内外财务交易的更大控制权”，以及“丈夫支持和允许她们外出”是最常见的答案。类似地，不丹帕罗地区的农村女性，将获得权力与教育、配偶及家庭成员支持和努力劳动联系在一起；她们也将获得权利与为错失教育的女性提供教育项目和塑造角色样板联系起来，例如当选女性社区领袖和女性小企业主，前者“帮助女性更好地思考问题”，后者启发和提升了社区中女性的信心。

一位有权势的女性，其特征常常与创造和管理收入相关，获得教育紧随其后，接着是个性特征和融入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见延伸阅读图 1.1）。

显而易见，任何因素都不能单独解释赋权的变化。任何因素都有可能对各种权力地位不同的女性造成影响，甚至决定其权力的增减，这取决于女性生活中其他因素的运作状况。例如，当婚姻和家庭环境的变化为部分女性创造了机会，例如“丈夫支持妻子”（巴布亚新几内亚），或者她们“嫁给了善解人意的好丈夫，允许她们做生意和接受教育”（坦桑尼亚）。甚至离婚也可能具有积极的作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女性意识到，“离婚可以帮助女性从许多负担中解脱出来，她将变得更强大”。但是同样的过程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一位女性在失去丈夫、子女或父母的支持后可能倒下（丧失权利）（布基纳法索）。”“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丈夫又去世了，一个人的收入是不够的（秘鲁）。”“男性抛弃其妻子甚至比让她死还糟糕（波兰）。”

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决定女性赋权的途径。为研究这些途径，研究者要求参与调查的各国女性将社区的 100 位女性代表排列在一个假想的“权利和自由”阶梯上，阶梯的最上端，是最有权利的女性，最下端，是最无权利的女性。研究者还要求她们重复这一排序，排列这些女性 10 年前在这一阶梯上的位置。在 79%的案例中，过去 10 年里女性的位置获得了巨大的提高（比男性对同时期内权利变化的感受高出近 20%）。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南非农村的一个社区，80%的女性都处在这一阶梯的底部，“我们都在挣扎，所以没有什么权利，而且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位女性解释道。她们说自己没有积蓄，在购买基本商品方面都存在困难。“她们能存下什么呢？她们仅有的那一点点钱都用来买吃的了。如果你几乎没钱，总是挨饿，储蓄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只要有一点钱，你一定希望孩子能快乐地度过那一天，哪怕仅仅是一天。”另一位女性说。她们同样指出了艾滋病患者数量惊人的问题。一个没有权利的女人“经常生病，健康状况不稳定，她甚至找不到健康设施，因为诊所太远，她又没有乘车的钱”。而且，“她的丈夫也很可能有病”。

延伸阅读图 1.1　导致地位上升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数据集）得出的估算值。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女性称她们在阶梯上位置迅速提升，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现在的女人学得多，工作也多。"在阿富汗的杰布勒瑟拉杰（Jabal Saraj），女性将 100 位女性中的 60 位放在了顶层，比十年前增加了两倍。研究者发现了许多原因："过去，女性仅仅在家从事像生火煮饭之类的家务活，但是现在有了煤气和电这样的选择。""现在有些女性出外工作，大多数女孩都去上学。"女性还"作为地方委员会等机构的候选人参与选举"。

在解释女性权利变化时，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性，但其中许多因素却是各个社区的共性。为理解推动女性赋权各因素的共性和组合方式，我们将能动性的各个维度与社区中机遇结构和国家人类发展水平结合在一起，开展性质比较分析。其中变量包括：

- 能动性的维度。女性对财产的控制、对家庭组建的控制、免于家庭暴力的自由、活动自由，以及通过社区网络和亲友支持等途径搭建社会资本的能力。
- 具体社区环境特征，或机遇结构。非正规制度（性别标准给人造成的压力水平及对性别标准变迁的乐观/悲观前景预期）；正规制度（社区中的服务如运输、学校、健康、水电等）；女性的经济和市场机遇（工作机会和社区工作女性的比例）。
- 人类发展国家大环境。以该国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得分作为衡量标准。

我们测试了这些因素的多种组合，以识别每种情况下女性赋权的必要条件、跨越国家和文化的普遍性解释，以及那些仅凭自身便足以解释女性权利和自由的进步与其他女性面临的约束和障碍之间的关系的因素。

国家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得分或普遍低水平的家庭暴力足以解释各国半数社区中的女性赋权的进步。这两项因素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抵消其他负面条件——例如缺少流动性或工作机会——的作用。

对农村女性来说，参与社会网络，即社区的女性组织和网络、她们与社区的相关性，以及女性领袖的存在，是最重要的因素。在 25%的社区中，较高的社会资本和网络存在可以抵消诸如家庭暴力等障碍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是唯一能够使女性感受到赋权的因素，即使她们所在的社区面临着很高的家庭暴力。如果缺乏社会资本，女性就必须通过提升其在其他方面的能动性——如外出自由、对家庭组建和财产的控制——来抵消家庭暴力对于赋权的反向影响。如果家庭暴力发生率很低，那么其他任何能动性条件的限制力都会减弱。

城市女性对地方机遇结构（即女性可获得的工作机会和活跃的劳动力市场）的依赖程度与其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相当。事实上，当同时具有地方机遇结构和社会资本时，缺少家庭组建控制权或较高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就不再是重大的障碍了。社会资本不足时，女性要提高自身在权利阶梯上的位置，地方机遇结构的相关性就会提高，同时还需要辅之以其他方面的积极进步，比如提高对财产的控制力，扩大流动自由和免受暴力的威胁。

这些不同的组合说明，女性赋权的途径可能是多样的，但某些因素的组合可以使女性赋权进展得更快更好。任何因素的效果都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的配置，经济机会取决于每位女性自由流动的能力及其财产所有权和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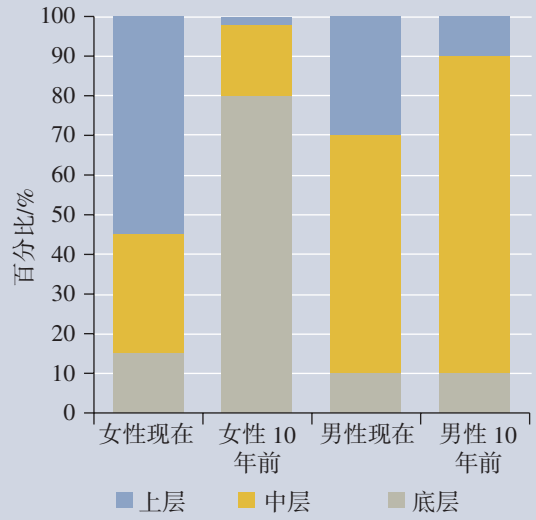
这些途径看起来像什么？下面是两个社区的两个例子：

"有权利的女性被称作 omukazi（女强人）。我认为我们这里大多数女性都是有权力的女人。" 坦桑尼亚布科巴的 Joyce 说，她认为她所在社区的女性生活已经改善了许多。"是的，女人的地位一直在提升。我结过婚，被我的丈夫折磨得很苦。离开他之后，我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现在非常好：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我能做我想做的，我把我的孩子送到了学校（见延伸阅读图 1.2）。"

对布科巴的女性来说，社会资本是关键的因素。该社区有一大批帮助女性的组织，而地方委员会中 33%的成员是女性。女性认可这些网络的价值："我们有自助小组，我们在那里聚会并谈论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你从你的女性同伴那里获得建议，学会如何对付家里让你不安的男人，或如何做生意。""一旦你加入了适合你的小组，听听她们的意见，你便站起来了。"朋友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人是你作为女人能信得过的人。她们会帮你出主意。她们是你所属团体的成员。当你和丈夫吵架时，她们会是最先前来帮忙的。如果你有小孩，她们总会帮你留意你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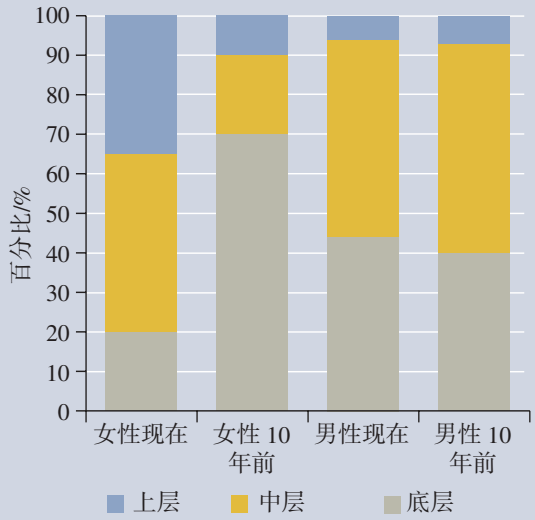
但仅仅靠社会资本是不足以改善女性赋权状况

延伸阅读图 1.2 坦桑尼亚布科巴（市区）现在和 10 年前的阶梯构成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数据集）得出的估算值。

延伸阅读图 1.3 也门共和国扎玛尔（农村）现在和 10 年前的阶梯构成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数据集）得出的估算值。

的。它还需要与良好的机遇和服务相结合，这一点布科巴的女性同样具备："你能进工厂，要求获得各种不同的工作，比如扫地、刷盘子或做杂活，甚至成为他们买鱼的代理商，给厂里送鱼。"保障女性权利的法律也同样到位："这很容易，因为法律上写得很清楚。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受到损失：你想离婚，于是就把家产分开，然后各走各的路。"

布科巴的女性同样意识到社区中存在阻碍其他女性获得权利和自由的障碍。"你意识到自己可以独立做事而不需要依赖于一个男人的时候，你就开始站起来了。我曾经见过一些女人每天都被丈夫打，她们就在那里不离开。当你和她们谈的时候，她们会告诉你，她们已经结婚了，是不能分开的。这些女人永远无法提升她们在阶梯上的地位；她们会停留在社会底层。"

在也门共和国扎玛尔的农村，女性同样看到了自身地位的提升，尽管在其社区中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和教育水平还都很低（见延伸阅读图 1.3）。像布科巴的女性一样，她们的路径包括社会资本——此案例中即非正规网络的塑造——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是在机会很少且存在流动限制的环境下发生的。"男人能够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们有走出去学习的自由，（但是）女性只是在她们有空时来回串门和聊天"，当将她们的幸福感与男人作对比时，Fatima 和 Ghalya 这样说道。在她们的社区中，一个有权利的女人会有许多熟人和朋友，而没有权利的女人"是对扎玛尔的女性没有影响力的女人"。

在扎玛尔女性看来，接受教育和自由流动是最需要的两个因素。拥有自由意味着能够在村里自由走动。但是大多数女性在无合适的人陪伴时却不能走出村子："女人不能出村工作，除非她身边有 Mahram（合法的男性监护人）陪同。" 获得流动性将使她们能够完成教育，并让那些失学的女人继续学业。"如果交通条件具备的话，他们就会让我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成为教师了。"一个年轻女人说。对于工作的渴望是与流动性限制相关的。"在村里的工作机会是有限的，除了教书和招聘男人的农业劳动。"尽管这些也门女性经历了许多困难，她们仍然看到了和上一代人相比在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进步。

注释

1. 研究的经济体包括阿富汗、不丹、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亚、摩尔多瓦、北苏丹、秘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塞尔维亚、南非、坦桑尼亚、越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也门共和国。焦

点团体包括成年男性、成年女性、青年男性、青年女性、未成年男性、未成年女性。仅在 8~19 个国家设置了未成年组。要了解更多信息，可在此查询评估方法：http：//www.worldbank.org/wdr2012 。

2. 模糊集合定性比较分析（fs/QCA）。参见 Ragin（2008）和 Ragin（2000）。该技术允许测试不同路径的模型来实现一个目标——本案例中即不同社区组中的女性赋权水平。考虑到定量数据的特征——个人的声音、感觉和经历的文本和表象，本报告通过度量每个模型的不同拟合度（隶属度）来进行不同国家和社区之间的比较。

参考文献

Ragin, Charles. 2000. *Fuzzy 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2008.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第二部分
性别平等的促进因素有哪些？阻碍因素又有哪些？

本报告第二部分对性别平等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而在另一些领域中没有取得进展的现象给予了解释。为此，本报告采用的概念性框架提出了如下假设，即家庭、市场和（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的关系，并进而最终决定性别成果（见概述专栏 4）。本框架建立在世界银行内部或其他地方之前工作的基础之上。

本报告应用该框架分析性别差异在禀赋（见第 3 章）、能动性（见第 4 章）和经济机会获得（见第 5 章）等方面的演变，同时分析全球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重点分析经济机会获得的影响（见第 6 章）。

这种实证主义方法有助于建立分析和政策选择之间的联系。它强调旨在缩减具体性别差异的政策设计需要考虑家庭的活动、市场功能和结构、正规和非正规制度及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政策干预的预期结果可能会打折扣，甚至和预期相反。

框架阐述

本报告提出的框架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首先，家庭并不是具有相同偏好和目标的铁板一块。相反，家庭由具有不同偏好、需求和目标的不同成员组成，他们影响家庭决策的能力也各不相同。其次，市场和制度对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关系的影响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通过影响家庭的决策）。再次，市场和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理解为个体和家庭的总数）塑造和决定市场和制度。正是这一过程使得包括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在内的市场和制度在适应政策干预或外界变化（如全球化引起的外界变化）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演进。

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框架对家庭如何作出决策、如何与市场和制度相互作用决定性别成果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对这些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并最终决定性别成果进行了阐述。

理解家庭作出决策的方式

家庭自行决定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要孩子，在女儿和儿子的教育和健康问题上支出多少，如何分配（家庭内外的）不同任务以及其他决定性别成果的事务。这些选择是在偏好、决策力（或谈判力）和不同家庭成员的动机和限制因素等基础上做出的。

偏好可以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由性别角色、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形成。这里，社会网络是指正规制度下的群体。个体家庭成员的偏好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例如，对转移支付项目（例如退休金和有条件现金转移）的评估显示，现金转移支付给家庭的男性成员所形成的支出方式和交付给女性成员所形成的支出方式不同，显示了男性和女性的偏好差异。[1]

谈判力取决于个体的两大权利来源，即经济的和社会的来源。经济谈判力首先取决于单个个体所能控制的财富和资产，以及他或她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而社会谈判力则首先取决于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例如，女性在家庭内外各项活动中的时间分配能力可能因缺少资产所有权（即低经济谈判力）或因社会强烈反对女性出外工作（即低社会谈判力）而被削弱。

此外，个体利用家庭以外机会以及承担离开家庭成本（“退出”）的能力也会对经济和社会谈判力产生影响。例如，如果离婚时儿童监护权主要取决于抚养儿童的财力，女性以威胁离婚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将会受到她们收入和资产的限制。

最后，市场和制度会对动机和限制因素产生很大的影响。市场决定家庭决策和家庭投资的回报，从而促使家庭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具有竞争性的目的。例

如，劳动力市场上体现的教育回报（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将对送女孩或男孩去学校读书的决定产生影响。同样，女性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女性是否会牺牲家务劳动和照料家庭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市场性工作。

限制因素来自市场、制度及其相互作用。例如，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限制了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类型和工作数量。而关于女性在经济领域中角色的传统规范可能加剧这种歧视。同样，是否存在足够的学校可以对送女孩（和男孩）到学校读书的决定产生影响。

理解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

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同时表现为收入的提高和服务提供的改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在本框架中，家庭、市场和制度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这种关系并最终决定性别成果。

我们先来讨论经济发展对性别平等的影响。通过市场和制度，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服务提供可以以改变家庭决定的方式增强性别平等。教育和健康提供了有力的阐述。

- 首先，整体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提高家庭收入的程度，教育和某些健康服务获得的限制因素随之减少。因此，提供或获得这些服务时不得不在男孩和女孩、女性和男性之间作出选择的家庭越来越少。
- 其次，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常常伴随着增长（例如制造业和服务活动的扩张）并激励女性更多地参与有酬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也在为缩减这些差异发挥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提高女孩教育的价值，赋予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
- 最后，经济发展意味着健康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得到了改善。制度上的完善降低了家庭获得服务的成本，允许家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更多地获得服务，性别成果随之得到提高。

收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增加、服务提供的改善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强化了对女孩和成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因素，减少了对女孩和成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限制因素，从而有可能缩减教育获得和健康成果（比如寿命）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但是市场和制度也可能削减增长对许多性别成果的影响。也就是说，某些性别偏见并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这正是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烫手的山芋”。男性和女性所从事工作的持久性差异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差异植根于市场和制度将男性和女性分流到经济领域不同部分的工作机制。这些互相强化的市场和制度障碍因素，包括那些与性别角色和性别相关的障碍因素，削弱了经济发展对女性获得经济机会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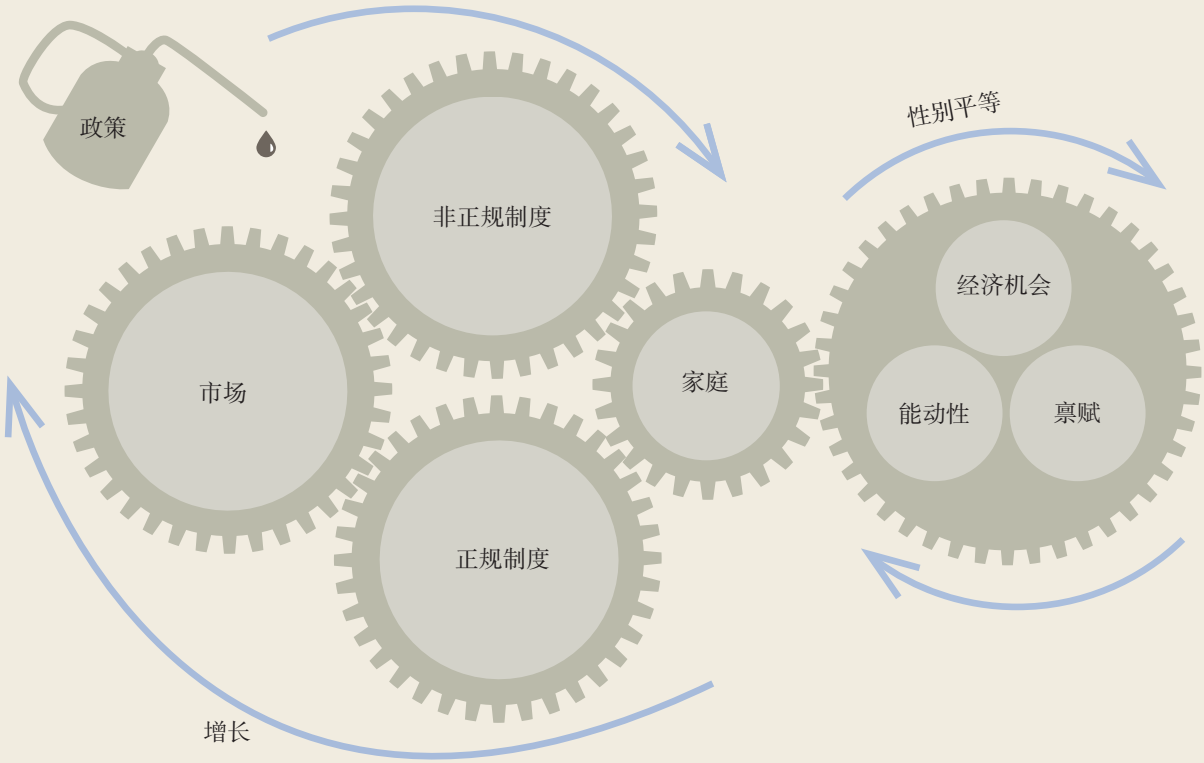
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如同本报告所讨论的那样，扩大性别平等可以通过三大渠道提高经济效益并改善其他发展成果。这三大渠道是：通过更好地利用既有资源提高生产效益，改善下一代发展成果，扩大制度和政策制定的代表性。家庭、市场和制度结合在一起时，可以强化她们的正向联系。例如，完善的、能够负担得起的教育和健康卫生体系可以缓解获得女性人力资本的限制因素，在距离和流动构成限制因素和私营领域可以介入填补公共领域提供的缺口时，更是如此。同样，如果劳动力市场运作情况良好，受过教育的女性将参加劳动力大军，贡献她们的聪明才智和技能。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家庭外部，市场和制度的限制因素可以导致低效的性别成果，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以非洲为例，由于女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得不到保障，农业的肥料和其他生产性投入低于最佳水平，休耕期短于最佳期限，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当就业分割将女性排斥在管理岗位之外，管理层的平均才能降低，从而降低了技术的采用率，迟滞了创新。

我们倾向于将这些现象称为市场失灵和制度阻碍因素。市场失灵伴随着歧视、信息问题或有效合同类型和性质限制。[2] 相比之下，制度阻碍因素来自于法律限制、惯例、社会规范或其他导致不能确定或行使权利的正规或非正规的制度安排。纠正市场失灵和制度阻碍因素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益，扩大经济收益。而在竞争日趋激烈、一体化日趋加强的当今世界，哪怕是一点点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都可以对一国的竞争力和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思想在本框架图表中相互联系的齿轮中得到了表述，这些齿轮代表市场、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家庭（见图 2.1）。在经济增长的驱动下，代表市场和制度的齿轮开始转动，带动家庭齿轮的转动。这些齿轮的联合运动最终启动了代表性别成果的齿轮的转

图 P2.1　性别成果来自家庭、市场和制度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动，从而扩大了性别平等。人们也可以反向思索该运动，也就是说，代表性别平等的齿轮启动了代表家庭、市场和制度的齿轮的运转，从而最终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这种情景下，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可以被视为阻止一个或多个齿轮运转的楔子，从而从两个方向削弱了经济增长和性别平等的双向关系。在本报告中，我们使用绿色表示市场、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运作强化了经济增长和性别平等的关系，使用红色表示它们的运作成为这种关系的限制因素。

尽管本报告在某一时间点只对框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我们也使用该框架去观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家庭的分配决策和家庭能动性的形成发生在动态的环境中，今天的结果对未来的决定和回报都有影响。例如，随着个体参加工作并获得报酬，他们可以积累资产，从而对自身的谈判力产生影响，并进而对家庭未来的分配决定产生影响。此外，资产的提高可能意味着家庭或家庭中某些成员也可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增加他们的生产力，或者同时获得较高的回报和生产力，最终获得更高的收入。

个体或家庭改变市场和社会制度运作方式的能力微乎其微，但是作为个体和家庭整体的社会有这个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得市场和制度经过集体行动、政策干预或外部变化（比如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其他社会的规范、价值和行为）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框架应用

第二部分所包括的四章应用该框架解决两个问题。导致禀赋、能动性和经济机会获得方面性别差异缩减或未能缩减的原因是什么？全球化如何对性别平等产生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政策的作用及其可能的影响。

应用本框架形成了深刻的见解。性别平等进展最快的地方，是那些之前女孩和成年女性所面临的劣势被逆转的地方，即市场和制度力量联合为家庭和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实现对两性投资平等化的地方。在这种

情况下，通过多个切入点发挥作用的力量促进了性别平等的进展，这些切入点包括市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持续的、广泛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如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在迅速消除（见第 3 章）。

相比之下，在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强化了女性和男性在禀赋、能动性和经济获得机会等方面不平等待遇的条件下，即使经济增长了，性别平等也难以取得进展。当经济发展通过这三个领域中某一领域的限制因素影响家庭，同时限制因素约束性极强时，或当这三个领域中的限制因素互相加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同第 3 章对女性超额死亡的讨论所示，在第一种情况下，政策行动只有一个切入点，那就是，为改善性别成果而消除约束性最强的限制因素。如同第 4 章和第 5 章对女性能动性和获得经济机会的讨论所示；在第二种情况下，提高性别平等要求在一系列领域中采取联合干预措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化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消除了在人力资本、能动性和获得经济机会等方面限制性别平等的因素。但是，在公共行动缺失的情况下，受到既有限制因素最大影响的女性面临着被甩在后面的风险（见第 6 章）。

在第 3 章至第 6 章分析的基础上，本报告确定了应当优先采取公共行动的四大领域。这四大领域是：缩短人力资本差距，促进女性获得经济机会，消除话语权和能动性方面的性别差异，限制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代际传递。在这些领域，性别平等进展缓慢，对经济发展常常缺乏应有的响应。

因此在这些领域，政策作用包括两方面，既可以加强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可以解决迟滞性别平等进展的市场失灵问题和制度限制因素。第一种观点可以以放缓市场和制度齿轮的油滴加以阐释。第二种观点相当于去掉制止齿轮转动的楔子。本报告第三部分将对公共行动的基本原理和作用展开更详细的讨论。

注释

1. Duflo 2003；Lundberg，Pollak 和 Wales 1997。

2. 信息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性和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系指市场参与者不能搜集到必要的信息或信息获得存在差异。外部性意味着某些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对同一市场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结果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Duflo, Esther. 2003. “Grandmothers and Granddaughters: Old-Age Pension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 (1): 1–25.

Lundberg, Shelly J., Robert A. Pollak, and Terence J. Wales. 1997. “Do Husbands and Wives Pool Their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Child Benefi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3): 463–80.

第 3 章

3

教育和健康：性别差异对哪些领域产生实际影响？

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即人力资本禀赋）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实现其最大潜力的能力。投资的合理组合可以延长人们的寿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使人们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撇开其背后的原因不提，对女性投资和男性投资的系统差异，会对个体儿童和成人时期及其下一代的发展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不予纠正，这些差异会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为什么性别差异会表现在人力资本禀赋上？如何降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对女性和男性教育参与和死亡风险的国际比较显示，在只需消除家庭、市场或制度中任一阻碍因素就能解决问题的地区，性别平等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以女性在各教育水平上日益增长的参与程度为例。初等教育水平的差距消除了，但是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水平上，新的差距，即不利于男孩的差距出现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女性的大学入学率增加了七倍，男性增加了四倍。原因是针对家庭或市场或制度的任何一项干预措施都会使入学率上升。而当三个领域同时采取了干预措施时，这种变化会加速发生。反之，如果这三个领域中没有一个领域采取干预措施，性别平等的进程就会停滞。严重弱势群体缺少任何促进性别平等的因素，因此，要进一步降低女孩在教育参与方面的劣势，就要对严重弱势群体予以特别重视。

总的来说，在存在家庭、市场和制度等亟待消除多重阻碍因素的地方，或只存在一个推进性别平等化进程的有效切入点的地方，性别平等的进展比较缓慢。下面依次对其进行分析。

尽管无论在哪个教育水平上，女孩都平等（或更多）地参与教育，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收入阶层，他们选择的教育方向迥然相异，而且相对稳定。男性继续在工程领域学习，女性则继续在学习如何当老师。尽管问题的部分症结在于教育体系，但是这种模式却被家庭和市场的性别规范所加强。某些性别规范与家庭的看护工作（几乎无一例外的由女性提供）相联系，这也意味着女性会选择这类工作。其他性别规范与雇主对待组成家庭和生育的态度这一持续存在的“痼疾”相关。两性平等参与不同领域

的学习要求家庭、市场和制度同时进行变革。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成为现实。

当家庭、市场或制度中只存在一个切入点时，性别平等可能止步不前。

女性在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就属于这一领域。以女婴选择性堕胎（和男婴相比较，女婴不足）和产后女性的超额死亡人数（以其所在国家的总体死亡率计算，前一年死亡的女孩和成年女性总数中，假设其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则能够幸存的女婴和女性数量）为例。

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选择性堕胎的女婴和超额死亡的产后女性总计为 600 万，其中 390 万不满 60 岁。在这 600 万中，1/5 未出生，1/10 夭折，1/5 死于生育期，2/5 年龄较大。由于那些早期死亡的人口预期存活的年限更长，她们构成了世界上女性生存年限减少的主体。

情况没有得到任何改观。1990 年，被堕胎女婴和 60 岁以下女性的死亡数量是每年 400 万；2008 年，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这一数字仍然高达 390 万。所有亚洲国家按人口调整的女性超额死亡率都下降了（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尤为突出），但和亚洲国家不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新千年中的进步微不足道。而在那些受到艾滋病最沉重打击的国家，情况就更糟了。在南非，年龄介于 10 岁到 50 岁的女性超额死亡人数从 1990 年的零（虚拟值）增加到截至 2008 年的 74 000 例。

20 世纪早期欧洲存在女性超额死亡问题，但是截至 1950 年，这一问题销声匿迹了。与欧洲相比，今天的模式体现在出生前的公开歧视，以及出生后的不利制度因素和艾滋病负担。对女婴的公开歧视及超声波技术的普及使家庭能够在胎儿出生前确定胎儿的性别，导致中国和印度每年有 130 多万个女婴被堕胎。产生男孩偏好的非正式制度是主要的瓶颈制约因素。

> “……（我们想要）男孩。大家都想要男孩。他们可以工作，可以赚钱。而女孩不得不嫁到别人家里。”
>
> ——印度乡村地区少女
>
> “婆家决定要几个孩子。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们会要求再生，直到生出一个儿子。”
>
> ——印度城市地区少妇

出生以后，公开歧视的作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薄弱的公共卫生和服务提供制度给女孩和成年女性造成的沉重负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艾滋病风险已经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公共健康和服务提供基本制度已经得到改善的国家，女性超额死亡的数量已经降低了。即使在那些历史研究确认存在歧视女孩行为的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公共健康措施的改良提高了男孩和女孩的生存机会，但是对女孩而言更是如此。[1]

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女性超额死亡的问题。在俄罗斯联邦和其他一些转型后国家中，两性都面临着更高的死亡风险，但是对男性而言尤其如此。和当今的高收入国家相比较，这样的环境中存在着男性超额死亡的问题。女性面临的死亡风险主要是由于薄弱的制度引起的。和女性不同，男性超额死亡常常与抽烟、酗酒和参加危险活动等更为社会接纳的行为相联系。

对任何关于人类正义的概念而言，理解这两种死亡风险并了解可以采取的行动都很关键。解决女性超额死亡问题要求改革制度；女婴堕胎问题和男性超额死亡问题则是更难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应当从社会规范和家庭

行为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禀赋至关重要

教育和健康投资对个体能力——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对女孩，儿童时期的健康投资会对整个生命过程的成果产生重要的影响。较低的认知发展水平、较短的学校教育年限、青少年阶段学业不良，这些现象都与新生儿体重较低或儿童时期遭遇疾病侵袭有关系。健康状况不良的儿童成为健康状况不良的成年人的风险更大。[2] 成年时期健康状况不佳，反过来会影响经济成果，主要表现为因健康状况而不能参与劳动、工作时间较短和收入较低。[3]

> “受过教育的女性不会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等着男人供养她们。她们并不需要男人给她们买东西。”
>
> ——南非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如第 5 章所示，教育投资同样可以决定女性赚取较高收入、拥有并经营生产性农场和公司的能力。一般而言，教育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成人的工资和收入差异。无论是在高收入国家还是在低收入国家，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性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和工资差异。

对女性的健康和教育投资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作为母亲，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把高等教育的收益传递给她们的孩子。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生育的孩子死于婴儿期的可能性较小，初生体重可能更高，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也更高。[4] 来自美国的证据显示，将母亲教育和儿童健康联系在一起的途径包括较低的平均生育次数、更多地享用产前护理服务和较低的抽烟率。[5] 在中国台湾，1968 年教育改革扩大了学校教育范围，产生了几乎每出生 1 000 例婴儿就挽救 1 例婴儿的成果，使婴儿死亡率下降了约 11%。[6] 在巴基斯坦，即使仅受过一年教育的母亲也可以使孩子在家里额外多学习一小时，从而在考试中取得更高的分数。[7]

其次，女性在怀孕期间和生产时面临着特别的风险。在阿富汗，1/11 的女性死于生育，在安哥拉，1/29 的女性死于生育。[8] 这和瑞典的 1/11 400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本章所示，产妇死亡率和育龄女性超额死亡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且，高产妇死亡率也会对教育投资和女性参与社会的能力产生影响。教育投资随着生育风险的降低而增加（对女孩更是如此）。[9] 在斯里兰卡，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使女性识字率增加了 1%。[10] 而且由于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也促成了产妇发病率的降低（在 1920 年的美国，每 6 个女性中就会有 1 个女性长期遭受因生育而导致的疾病的折磨），生育条件的改善可以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11]

最后，公开歧视造成的偏重男性的性别比例会对社会产生长期影响。如果男孩的出生率高于女孩，最终会导致许多男人找不到妻子。近期研究现实，中国和印度已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12]

这些基本议题贯穿本章的其余部分，这些议题包括女孩和成年女性的教育问题、改善儿童时期的健康状况、降低生育风险和应对倾斜的性别比例问题，其中后两个议题导致女性超额死亡和女婴堕胎行为。自始至终，本章的重点包括两方面。首先，将那些

可能随着收入增长而削弱的问题与“痼疾”区别开来；其次，理解政策如何通过本报告所述框架——即家庭、市场和制度的互动——发挥作用，以及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教育

在进入新千年十年以后，我们有许多理由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教育状况持乐观态度。性别平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 世纪中许多严重的性别差异已经消除。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女孩和男孩都平等地参加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则出现了明显的偏爱女性的趋势，女性入学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

对入学率而言，只要消除一项阻碍因素就足以解决问题，无论该阻碍因素是由家庭、市场还是由制度造成的。这正是可能取得上述进展的原因所在。多个切入点可以使政策规避来自不利偏好、女性教育回报低或制度薄弱造成的瓶颈制约问题。

> “去学校读书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如果你受过教育，男人就不会欺负你。因此去学校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 ——利比里亚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但是乐观主义必须从三个方面加以克制。第一，在某些国家或某些国家的某些人群中，困难时期最后登记入学和最先辍学的仍然是女孩。这些严重弱势群体面临着众多不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因具体环境而异。第二，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学到的要比高收入国家的同龄人少得多。低学习水平对男孩和女孩都有影响，这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在一个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世界中，低技能会对所有儿童的未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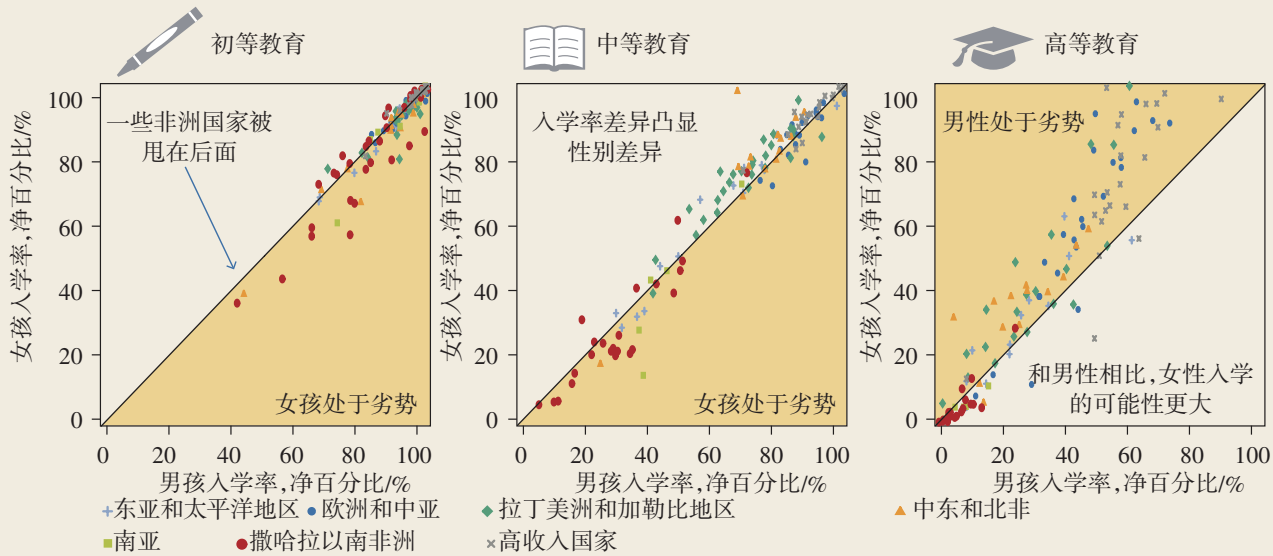
第三，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女性和男性选择在不同领域学习的现象仍在持续。这种分流模式在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很相似，这表明，入学率提高和学习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甚至不能满足日后生活中所从事行业的要求。男性和女性的学习领域与他们选择的职业相适应，从而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工资收入。在解决分流问题方面取得的成绩要少得多，因为这要求同时消除许多阻碍因素，家庭、市场和制度需要通过同时在涉及多个方面的复合政策下同时发生变化。

好消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男孩和女孩的入学数量相当。在目前没有到学校就读的儿童中，53%是女孩，性别不平等主要集中在包括贝宁、乍得、尼日尔和多哥等非洲国家中。但即使这些国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99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学中每 100 个男孩对应 85 个女孩，2008 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91 个。

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进展表现为三种模式（见图 3.1）。首先，大部分孩子参与初等教育，但是不同国家间中等教育入学率从极低到极高变化很大。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再次以其特别低的参与率引起注目。在高等教育领域，低参与率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因此，一些国家有必要提高男孩和女孩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第二，就低年级的中等教育入学率而言，女孩低于男孩，但是在高级中等教育领域，该模式目前已经逆转为有利于女孩的发展趋势。女孩在中等教育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国家数量与男孩处于不平等的国家数

图 3.1 世界上许多地区已经在低层次入学率上实现了性别平等，然而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很低，而且女性占优势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发展指标进行的估测。

注：上图的 45°线显示了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平等。45°线以上的任何一点都表示女性相对于男性入学率较高。

量大体相当。第三，在高等教育领域，和男孩相比，女孩更有可能参与高等教育，而随着整体入学率的增加，这种差异还会增大。1970 年至 2008 年期间，女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七倍多（从 1 080 万增加到 8 090 万），相比之下，男大学生只增加了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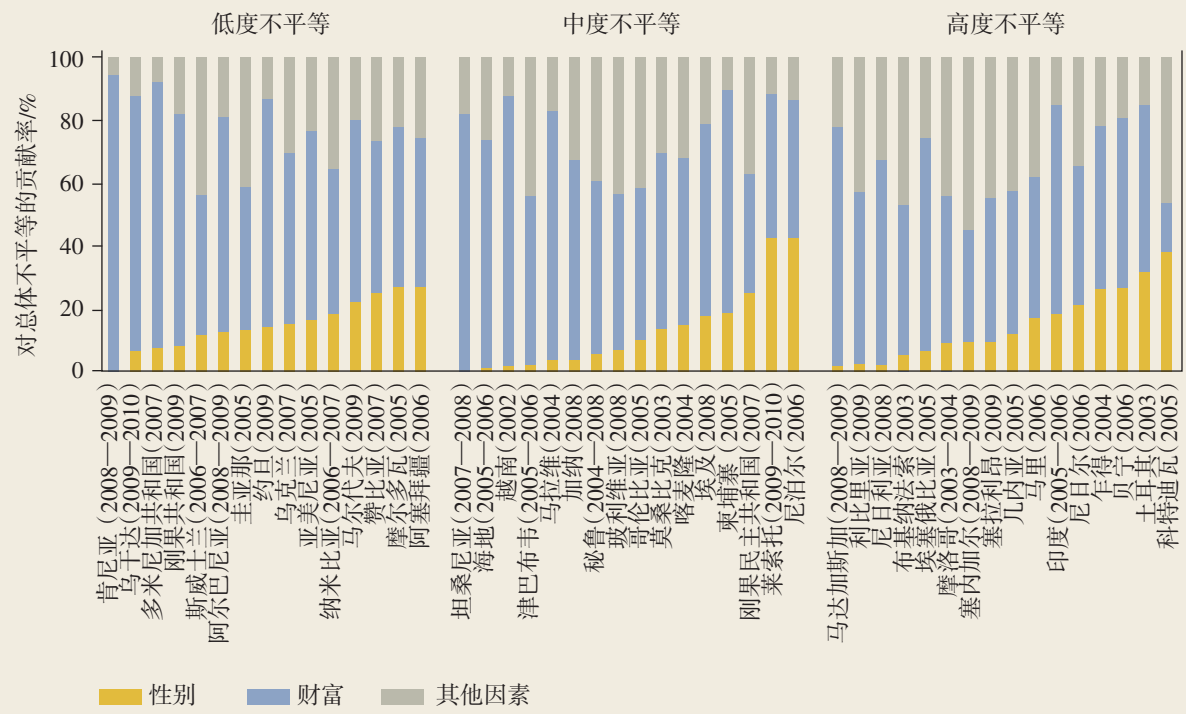
这些积极的结果也只阐述了性别因素引起的不平等。问题是是否还存在其他不平等维度，如果是这样，性别与（比如说）贫困在造成就学不平等方面的相对比例是多少？将教育体系的不平等分解为地理位置、父母教育、财富和性别等四个部分，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13]

假设有两个国家，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数量持平，每个收入群体的男孩和女孩持平。在 A 国，所有富裕家庭的孩子都登记入学，但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有 50%登记入学，就登记入学而言，男孩和女孩之间不存在差异。在 B 国，所有男孩，无论出身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都登记入学了，但是登记入学的女孩（无论贫富）只有 50%。两国教育体系的总体不平等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模式却大为不同。对两国总体不平等的分解显示 A 国的不平等完全是由财富（及富裕群体间的所有差异）造成的，而 B 国的不平等则完全由性别造成。

在对许多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中重复使用该方法，结果显示，大部分情况和 A 国而不是 B 国相似，即大多数教育不平等问题是由财富差异造成的（见图 3.2）。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相对于性别而言，贫困是导致总体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事实上，即使在总体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间入学率差距很大的国家），性别因素对总体不平等至多负 38%的责任。相比之下，贫困常常要承担 50%甚至更多的责任。几乎所有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而总体不平等程度又很高的国家都是非洲国家，只有印度和土耳其是例外。

对教育进步的基本描述显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进步，而大多数国家剩余的不平等问题主要是由

图 3.2　在大多数教育成果存在中度或高度总体不平等问题的国家中，因性别造成的不平等不超过 1/5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2—2010 年各国人口健康调查的估测。
注：不平等程度系指为确保所有情况不同的小组获得均等的覆盖率而重新分配的总机会的百分比。轻度不平等介于 0.3%~2.1%，中等不平等介于 2.3%~6.4%，高度不平等介于 6.5%~26.7%。这里按照性别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对结果进行分类。

贫困或其他环境因素（特别是居住在乡村或城市）而不是性别引起的。因此，在大多数情景下，对不平等问题的全球关注意味着当前的再分配行动应指向贫困问题。

促进进步的因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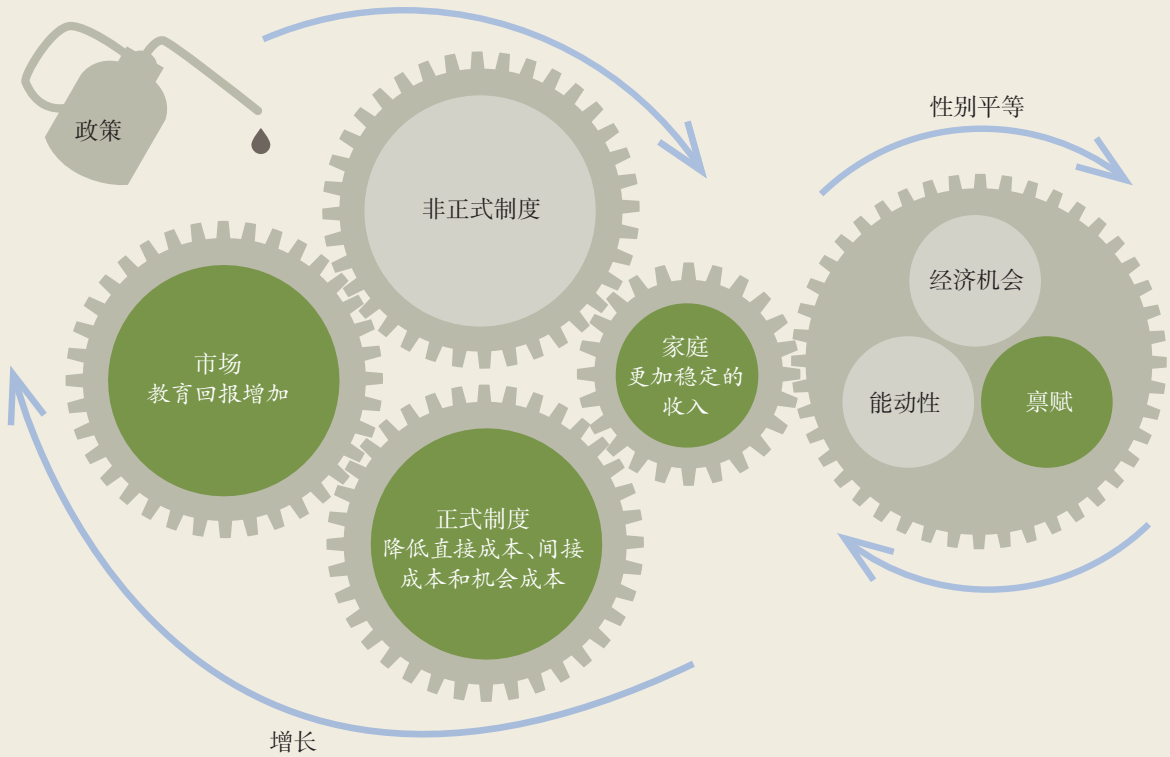
本报告的主旨信息之一是，在那些只需消除单个阻碍因素的地区，进步已经发生了。与此消息相一致的是，当前研究显示，增加女性教育投资的回报，取消制度限制因素或增加家庭收入都足以提高女性的教育参与率（见图 3.3）。当这三者同时实现时，进步的速度甚至更块。下面将对此予以一一阐述。

提高回报。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实验证据表明，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投资会随着女性教育回报的增加而增加。这些早期研究显示，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女性教育的回报率，从而促使父母加大对女孩教育的投资力度。在技术日新月异的环境下，新一代的工作将全球化和教育回报联系在一起。

在印度，外包的兴起正在为人们特别是为女性提供新的工作机会。例如，新设立的信息技术驱动的服务业外包（ITES）中心使得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增加了 5.7%，其中主要是英语语言授课学校入学率的提高。[14] 男孩和女孩入学率的增加大体相当，反映了地方信息市场对教育回报的反应。

同样，业务流程外包带来的机遇会影响女性教育。[15] 在印度随机抽选的村庄里，为女性提供了为期三年的业务流程外包招聘服务，主要是为了提升女性就业意识并提供就业信息。

图 3.3 促进学校入学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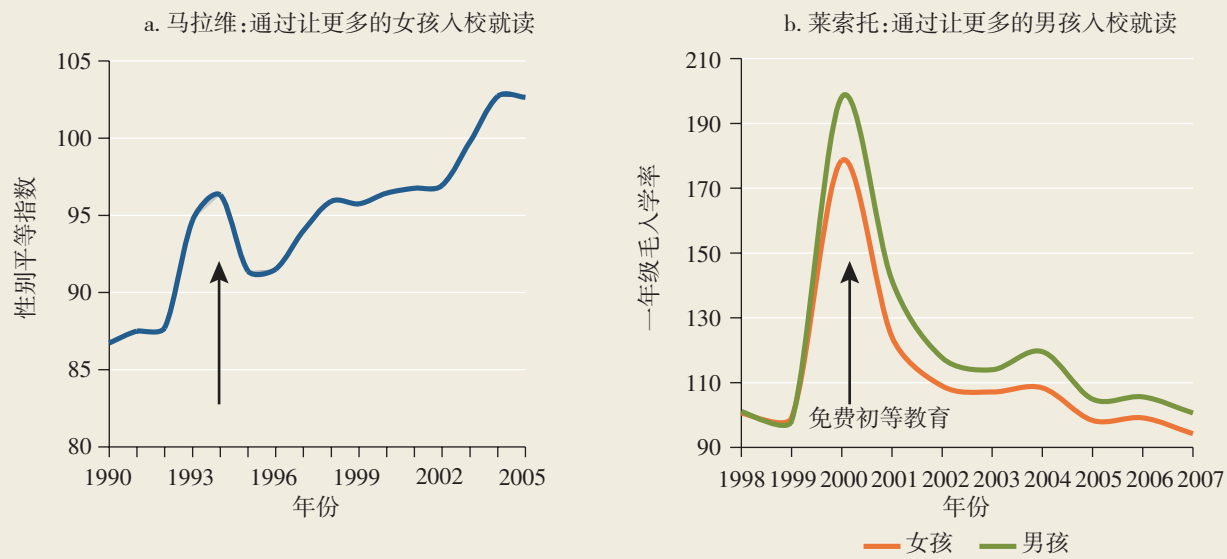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研究发现，村庄层面的干预措施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三年后，干预措施覆盖的村庄里，5~15 岁女孩就学的比例提高了 3%~5%，体重指标也提高了（健康的衡量标准），从事工资工作的女孩比例提高了 10%。针对男孩的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发生变化。干预措施既没有改变家庭内部的结构（例如，母亲的谈判力），也没有改变学校的运作方式。单是关于市场回报的信息就足以提高女性入学率，改善女孩的发展成果。

改变制度限制因素。如果女性入学率只是对日益增长的教育回报的响应，性别平等的进展就会较慢。回报的实现可能非常缓慢，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即使在回报非常低的地方，正式制度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善教育成果。或许，教育收费的变化是这些途径的最佳表现方式，而发生的成本可以是直接的（学费和校服）、间接的（与学校的距离），或来自预期的机会（儿童可以在校外赚取的工资）。

学费的降低使得家庭对孩子的差异性教育投资变得不再必要。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实施免费初等义务教育方案后的第一年，马拉维和乌干达的学生入学率提高了 68%，肯尼亚的学生入学率提高了 22%。马拉维取缔教育税的措施使更多的女孩（相对于男孩）入学就读，减少了初等教育中的既有性别差异（见图 3.4）。在莱索托，政府实施了一项类似的一年一周期、从一年级开始的方案，参与率激增 75%（见图 3.4）[16]。和马拉维相比，莱索托的男孩小学入学率向来低于女孩，高年级时更是如此。免费初等义务教育促使大量大龄男孩涌入了教育体系。

图 3.4　免费初等义务教育降低了入学率方面的性别差异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 Edstats 的测算值。

缩减与学校的距离也有作用。在巴基斯坦，那些成长在其 7 岁时已有学校的村子里的成年女性，较之那些直到其 7 岁以后才建立学校，或没有建立学校的村子里的成年女性，初等教育程度更高。[17] 在阿富汗随机选择的增设了学校的社区中，女孩入学率的增幅比男孩入学率的增幅高 15%，此外，两性的入学率均增加了 50%。[18] 据悉，六个月以后，具有此类学校的村庄的女孩的考试成绩提高了很多。

教育费用也反映了此前在正规劳动力市场或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的童工引起的机会成本。儿童雇佣率越高，入学就读率就越低。[19] 在巴西城市地区，14~16 岁男孩和女孩的雇佣率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善而提高，而随着地方劳动力市场条件的改善，儿童更倾向于离开学校。[20] 在埃塞俄比亚，成人就业率每增加 10%，10~24 岁的青年找到工作的几率就会增加 10%~25%。[21] 对从没有读过书的青年来说，这种影响更强烈。一般而言，男孩子更有可能参与农业劳动或其他有酬或无酬的生产性工作，因而，男性的教育机会成本往往高于女性，从而导致更多的男孩辍学成为童工，参与非家务性的劳动。[22]

男性更多地参与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面是，女孩更多地承担了家务劳动。就自然资源采集和看护家庭成员的工作而言，家庭严重依赖儿童特别是女孩的劳动。在马拉维，6~14 岁的女孩每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长达 21 小时，男孩长达 13.5 小时。在贝宁农村地区，女孩每天要用 1 个小时挑水，相比之下，男孩只用 25 分钟。[23] 在埃及，家务劳动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以家庭获得自来水、管道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等来衡量），就会使女孩接受学校教育的边缘概率降低 6 个百分点。[24] 在秘鲁，室内供水会对同龄级女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不会对男孩产生重大影响。[25] 在肯尼亚，模拟模型显示，家庭和水源距离缩短 2 公里，女孩总入学率和教育成果增加的幅度是男孩的 2 倍。[26]

改变家庭限制因素。即使教育回

报和明显的制度特征没有改善，较高的、来源更稳定的家庭收入也有助于女孩入学读书。家庭收入与较高的儿童入学率相联系（对女孩而言尤其如此），而相对于父亲收入的增加而言，母亲收入的增加对女孩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大。[27] 当家庭遭遇收入的突然下降时（也许由于歉收），家庭会立即减少教育投资。至于教育投资的减少对男孩影响大些还是对女孩影响大些，则取决于根本的劳动力市场条件。

在科特迪瓦 1986 年和 1987 年遭遇旱灾袭击的村庄，男孩的学校入学率下降了 14%，女孩的入学率下降了 11%。[28] 而在同期未遭遇旱灾袭击的村庄，男孩的入学率增加了 5%，女孩的入学率增加了 10%。在土耳其，当家庭面临预算约束时，在小学和中学就读的女孩的辍学率高于男孩。[29] 在埃塞俄比亚（1996—2000）和印度尼西亚（1993）等一系列国家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30] 相比之下，在高收入国家，经济萎缩造成的学龄儿童工作机会的减少可以促进对教育的投资。[31] 来自拉丁美洲，主要是阿根廷、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典型结果均显示，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减少增加了男孩相对于女孩的入学率。[32]

因此，旨在增加家庭收入并帮助家庭抵御经济衰退影响的项目有助于学生留在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或许来自对有条件现金转移（即只有那些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日子达到了最低时限的家庭才有资格领取现金）的研究。给予家庭在困难时期保障儿童教育投资的能力正是这类现金转移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事实证明，它们的确有效。[33]

坏消息

尽管性别平等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没有被彻底消除。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女孩继续面临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入学难的问题，而且普遍来说，低收入国家的儿童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少的可怜。随着国家日渐富裕，入学问题和学习问题不再像以往那样突出，但是在中等和高等教育领域，女孩和男孩依然选择学习截然不同的专业。而这些选择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及赚取的工资产生影响。下面将对此进行一一阐述。

严重弱势群体的小学与中学入学率

在特定的区域，女性教育缺少经济动因和具体的地方形势如安全状况差、人口分散和语言差异等交织在一起时，性别不平等问题就会产生，而且大部分（不是全部）性别不平等问题对女孩不利。这些地方形势可能迥然相异，有效针对当地问题的政策也因不同弱势群体而异。下面以六个例证说明不同群体面临的问题。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为数不多的、小学入学率很低的国家中的两个。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家庭在做教育决定时歧视女孩。但是最新的证据显示，当学校设在家庭附近时，家庭让女孩就学的心情和让男孩就学的心情一样迫切，但是当学校距离家庭较远，在是否让女孩入学就读的问题上，家庭就会犹豫。在巴基斯坦，家庭与学校的距离每增加半公里，女性入学率就会降低 20 个百分点。[34]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住在学校附近的家庭，女孩和男孩入学就读的可能性差不多。这种不利于女孩的“距离惩罚”部分反映了在同一村庄中穿越不同居住区的安全考虑。[35] 对这些严重弱势群体而言，缩短家庭与学校的距离比消除家庭固有的歧视更能提高女性入学率。

柬埔寨东北高地的人群散居在偏远的小村庄里。土地匮乏、宗教压迫、有限的知识和使用高棉语（国语）等造成了该群体的边缘化，实际上成了限制教育的因素。2001 年，土著社区 Kreung 和 Tampuen 的儿童死亡率很高（是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国家平均水平的 2 倍），文化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 1 970 位成年人中，只有 5 位完成了小学教育。那里学校很少，五年级的完成率很低，辍学的儿童多于在学校就读的儿童。各个村庄的入学率高低不一，女孩的入学率在 10%~60%之间波动。许多辍学的女孩从事照顾兄弟姐妹或从事田间劳动。社区的大部分成员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女孩尤其处于弱势，她们是最后吃饭的人，得不到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肉类）。[36]

2006 年，土耳其 945 000 个 6~14 岁不在学校读书的儿童中，194 000 个说他们负担不起学费，22 000 个不得不参加工作，因而不能参加学习。几千个这样的儿童从事季节性工作。14~15 岁是儿童从小学升入中学的关键年龄段，优势群体（居住在富裕的城市地区、孩子较少的家庭）的儿童入学率高达 100%，相比之下，弱势群体（孩子较多的家庭、居住在贫困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只有 10%。

近年来，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牙买加男孩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随着参加中等学校教育男生人数的下降，2008 年中等教育的性别平等比例是 1.04，女性稍稍处于优势，同时男生留级的可能性是女生的 2 倍。除职业技术和物理课程外，女孩在加勒比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的表现优于男生，通过五门或更多课程学习的女生比例达到 30%，而男生只有 16%。[37] 近期一项项目识别了男孩发展所面临的四大关键性挑战 [38]：男孩自尊水平低、有暴力倾向和缺乏纪律意识。男性身份认同导致男孩和青年男子难以取得较好的学术成绩，毕业后就业机会有限。

作为一个区域，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女性教育参与率低而闻名。1990—2008 年期间，两性教育差异迅速降低，女性与男性之间初等教育完成率的比例从 0.78 增至 0.91。但是在中非和西非，女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每 10 个男孩完成初等教育，相对应的女孩只有 8 个。[39] 以布基纳法索为例。据估计，3/5 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 1 美元，其中 4/5 以上居住在乡村地区，许多人依赖糊口农业维持艰难的生计。每 1 000 个出生的婴儿中，有 207 个会在 5 岁之前夭折，儿童死亡率之高，位列世界第 9 位。在学校教育方面，男孩净入学率为 42%，女孩为 29%，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学校远、入校难、没有足够的教室供入学的孩子使用以及高额的预算外费用进一步降低了接受教育的积极性。[40]

这六组严重弱势群体的问题差别很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距离问题，柬埔寨是经济机会匮乏问题；土耳其是高成本和低收入问题；牙买加是暴力问题和男性身份认同问题；布基纳法索是低物质获得和普遍贫困问题。解决之道之一是针对具体问题制定针对具体环境的应对战略。阿富汗建立的社区学校缩减了女孩到学校的距离，而在建立了这类学校的村庄里，女性在入学率方面的劣势已经消失。[41] 土耳其开展了大型的运动以促进提高女孩的入学率，其中一些活动以弱势地区为目标，包括“爸爸，送我去读书吧”和“女孩子们，到学校去吧！”同样，牙买加吸引父亲参与教育并提高课程设置的男孩友好性，布基纳法索

的学校供餐计划使男孩和女孩的入学率提高了 5~6 个百分点。[42]

但是在所有这些区域中，无论是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校扩大学校供给还是通过缓解家庭的经济限制扩大需求，缓解制度或家庭限制因素都有助于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土耳其、柬埔寨和牙买加均采取如果家庭将自己的孩子（在某些情况下，专门针对女孩）送到学校读书，就支付现金给家庭的方案，这些方案提高了目标儿童的入学率，提高的幅度也非常大，巴基斯坦女孩的小学入学率提高了 10%，土耳其女孩的中学入学率提高了 11%，柬埔寨女孩的小升初提高了 30~43 个百分点，牙买加每月受教育时间增加了 0.5 天。[43] 布基纳法索试行了一项财政转移计划，初步结果显示了相似的效果。[44] 同样，布基纳法索（通过卫星教育设施）和阿富汗（通过社区学校）实施的学校建设计划有助于降低旅行成本，也有助于促进女孩入校就读。[45]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失学儿童和就读儿童的特征进行的比较表明，11 个国家中的失学儿童和登记入学的儿童非常相似，因此过去对提高入学率有效的政策也有望将这些孩子带到学校。[46]

至于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取决于具体环境以及对环境的了解。例如，以女孩入学就读为条件而对家庭的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如果转移支付的目的仅仅是扩大教育参与（这些转移也使贫困家庭直接受益），那么转移支付就是一种昂贵的工具，因为那些无须额外激励也会送孩子上学的家庭也会收到转移支付的现金，而在大多数实行转移支付的国家，每增加一位入学的儿童的转移支付成本与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但是众多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在各国间产生的效果显示，如果有针对性的政策难以设计，那么统一的次优解决方案，即有条件现金转移可以产生同样的作用，只是成本更高。在教育设施充裕的条件下，让家庭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是部分解决严重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方法。

女孩和男孩学习成绩不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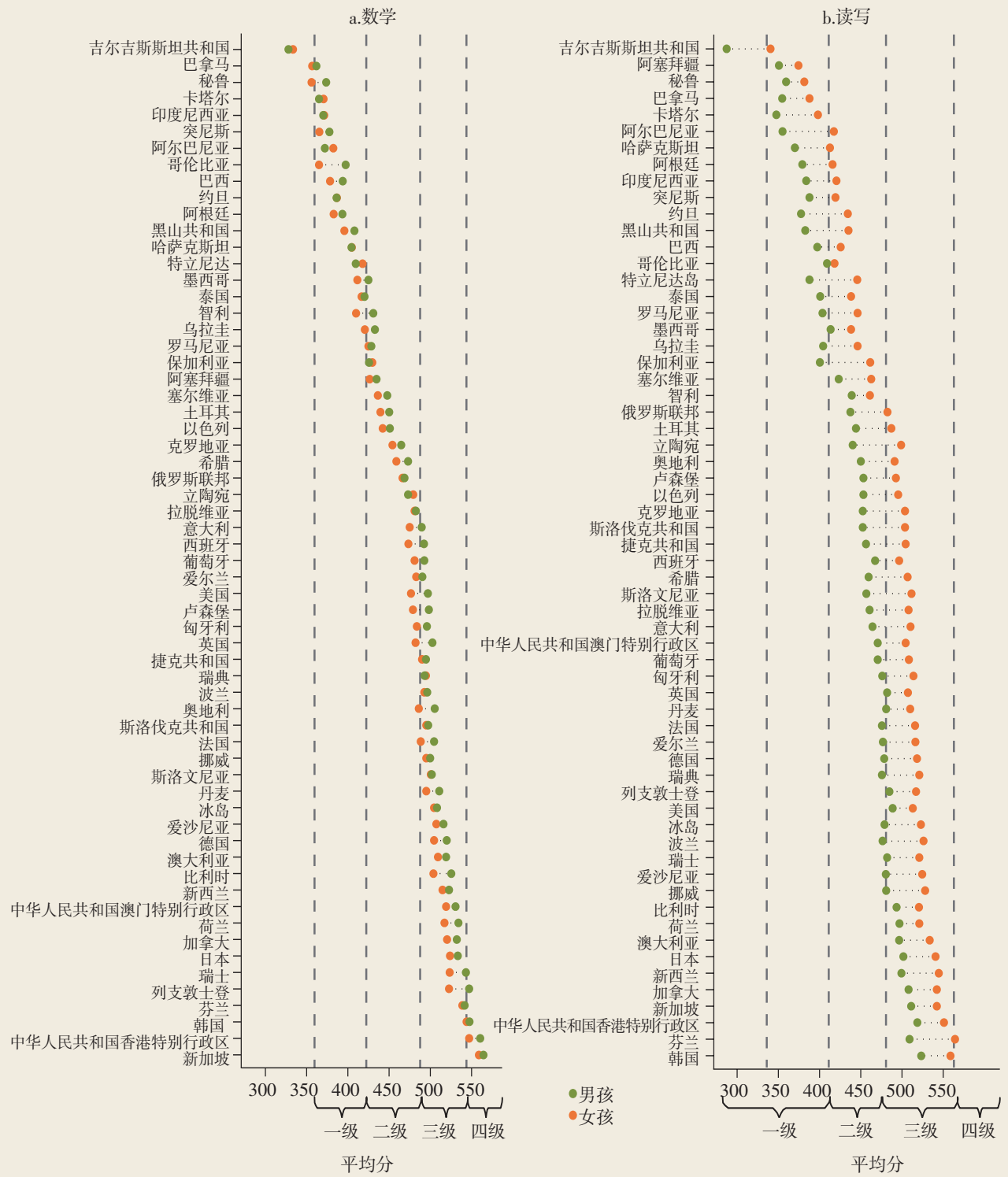
除严重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之外，还存在第二个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司空见惯的问题，即和高收入国家的同龄人相比，低收入国家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儿童学到的知识通常较少，速度也较慢。尽管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差异很小（男孩和女孩的差异表现为男孩比女孩精于数学，女孩的阅读能力强于男孩），国家间差异超过了性别差异（见图 3.5）。

只要看看原始的数字就可以知道这些差异有多大。在印度，10~11 岁的孩子中，只有 27%可以阅读一段简单的文字，可以解答简单的除法题，说出时间并处理与金钱相关的问题。学业水平低不是印度特有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中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参加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的 15 岁儿童中，有 21.3%的儿童数学不能达到 1 级，而这是最基本的技能。阿根廷的比例是 64%；巴西的比例是 72.5%；印度尼西亚的比例是 65%；泰国的比例是 53%。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中，成绩最佳的国家也就是重要的国家。在发达国家，成绩达到 5 级或以上的儿童只是刚刚超过了 13%。而阿根廷、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则只有或不足 1%。显而易见，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提高学习成绩都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分流问题

随着国家日渐富裕和服务提供体

图 3.5　2009 年 PISA 项目各国平均分数的差异超过了国家内部的性别差异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Edstats 的计算值。

注：最高级是六级。数学一级要求学生回答与熟悉的情景相关的、界定清晰的问题，数学三级要求学生解答界定清晰的程序问题，数学五级要求学生能够通过模型演算解答复杂的问题。阅读一级要求学生能够完成最简单的阅读任务，阅读四级要求学生能够准确理解一篇较长或较难的、内容或形式陌生的课文，阅读六级要求学生可以进行既详细又精确的多种推理、比较和对比。

制的改善，严重弱势群体入学率不足和学习差的老大难问题可能不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女性和男性将仍然不能公平地参与教育。作为正式教育的一部分，女性和男性在选择学习领域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难以消弭的差异，就选择模式而言，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非常相似。

正如第 5 章所示，就入学和学习而言，这些选择很重要，因为这些选择会转化为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并最终转化为生产率差异和收入差异：在已观察到的 33 个中低收入国家（在 53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的工资差距中，10%~50%是由就业职业和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引起的。随着国家日渐富裕，性别不平等可能从入学率和学习效果的差异转变为学习领域的分割。因此，政策关注可能也要作出相应变化。

这些性别差异在教育的早期就出现了，而且随着青年男性和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扩大。在中等教育水平，女性选择一般教育的可能性较大，男性选择职业教育的可能性较大。在 63%的国家中（172 个国家中的 109 个），女性在一般教育中的入学率高于在职业教育中的入学率。[47] 在高等教育水平，这些差异就更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比例过高，在社会科学、商学和法律领域的比例和男性相当，在工程、制造业、建筑学和科学领域的比例不足（见表 3.1）。

一项就业和职业灵活性研究（REFLEX）显示了类似的结果。例如，意大利男性和女性在一半学习领域中比例相当，但是另一半学习领域却存在着巨大的性别不平等。[48] 女性更有可能在教育和人文学科取得学位，而男性更有可能在工程学、建筑学、农学和兽医学取得学位。社会科学、商学、法律、科学和数学、医学以及社会服务专业毕业生的性别分布与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人口相当。

两性学习领域的巨大差异并不反映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能力差异。目前还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在中等教育水平，男女两性在平均能力或具体学科能力上存在大的差异。在印度尼西亚，男女两性在中学标准化毕业生考试中的分数差不多，但是无论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意大利，大学教育中女生的考试分数要略略高于男生。[49] 对男性能力的分类与态度上的巨大性别差异结合在一起，才是更重要的因素。根据 REFLEX 研究，考分很高的男生选择男生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作为专业的可能性比其他男性高出 10%，而在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集中性的专业领域中，考试分数对专业选择的影响不大，对考分很高的女生的影响也不大。而且，“选择一个要求很高的/很受欢迎的领域学习”极大地增强了男生选择男性主导的学科领域的可能性，但是对女生却不是如此，而且它降低了男女两性选择女性主导的学科的可能性。当由于培训和能力

表 3.1 学习领域的性别分割：在大多数国家中，女性在医学和教育领域居主导地位，男性在工程学和科学领域居主导地位

	国家被（男性或女性）主导的学习领域的比例			国家数量
学习领域	女性主导 /%	男性主导 /%	中性 /%	
农学	3	74	22	89
教育学	84	6	10	97
工程、制造和建筑学	0	100	0	97
卫生和福利	82	4	13	97
艺术和人文	55	6	39	96
科学	13	68	20	96
服务	21	59	21	87
社会科学、商学和法律	23	16	61	97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的计算值。

错配而导致各个领域的平均质量降低时，国家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分流问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它要求政策行动同时针对家庭、市场和制度。

教育体制造成了女孩和男孩“应该”学什么的期望，是问题的部分症结所在。例如，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前使用的英语教科书倾向于把女性描述为有限社会领域中的角色，把女性的形象刻板化为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弱者。[50]

非正式制度对家庭意愿的影响也是问题的部分症结所在。“年轻一代的生活”对埃塞俄比亚、印度安得拉省、秘鲁和越南的 12 000 名 8 岁、12 岁和 15 岁的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意愿和非认知技能进行了研究。孩子 12 岁之前，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父母偏向于让男孩接受教育，秘鲁和越南倾向于让女孩接受教育。到 15 岁时，这些偏见已经传递给了孩子，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男孩明显显示了较高的教育意愿，而在越南，女孩的教育意愿较高。也是到 15 岁，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旨在提高能动性或效力的措施显示了强烈的男性偏好，而在秘鲁或越南则不是这样。面到“你 20 岁的时候你希望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一问题时，印度 31%的女孩和 11%的男孩选择做“老师”，35%的男孩和 9%的女孩希望到大学读书。在秘鲁，21%的男孩（5%的女孩）希望做工程师。而越南却很少有太大的差异。[51]

问题的部分症结还在于，市场和企业向来不愿意为支持家庭组建和儿童生育而试用新的弹性生产和就业形式，即使在那些其他性别差异已经很小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如果母亲把收入都带回了家庭，但她仍然完全没有假期，还不得不承担家里 90%的家务——如同在加纳那样（见第 5 章图 5.10），打破教育领域陈规陋习的工作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如果学校强化女孩应该学习哪些科目的性别规范，家长将孩子应该学什么、“长大”后应该做什么的意愿灌输给孩子们，减少女性用于照顾家庭的时间的工作也就只能到此了。而且，除非公司愿意试行雇佣女性从事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作（反之亦然），改变家务劳动的分配或学习领域不会发生作用（甚至会产生危害）。学校系统需要声明社会接受认可男性护士和女性工程师。企业应当愿意聘用男性护士和女性工程师。家务劳动应当根据个体的时间限制和能力而不是根据性别规范来分配。除非同时应对三大症结，否则变化难以发生。

从教育到健康

尽管教育参与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严重弱势群体的教育参与任重道远。学业水平低对男孩和女孩都产生影响，而且会削弱青年人口融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未来能力，如同第 6 章所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基于“体力”的工作转向基于“脑力”的工作。在所有国家，男孩和女孩对学习领域的选择存在系统差异，这些选择决定了他们日后生活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家庭、市场和制度框架有助于对下面的现象做出解释，即某一领域的改善有助于绕过另一领域的潜在瓶颈制约时，性别平等化的进程就快，而三个领域需要同时改进时，性别平等化的进程就慢。

相比之下，健康问题就不同了。首先，生理差别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可能较小，但是在健康问题上，女性和男性天生体质不同，面临的健康风险

也不同。在教育问题上，如果投入相同，女孩和男孩可能实现相似的教育成果。但是生理差别可以使同样的健康投入产生截然不同的健康结果。关于健康问题的任何分析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基本的差异。第二，健康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这一点和教育结果不同。的确，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即投资的时间将对其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认知能力发展和学习成果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但是，一个教师在任何一天缺席对学生学习产生的影响和一个医生在孕妇要生产时医生恰恰没在所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后者可能在几分钟内演变成具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因此，正式的服务提供制度自然会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对某些健康问题而言，这些将是首要的瓶颈制约。

健康

医疗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既可以由疾病引起，也可以由死亡引起。但是由于女性和男性具有生理差异，将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性别差异归结为生理差异在概念上具有不合理性。如果女性寿命长于男性（在大多数国家的确如此[52]），那么，这是因为女性具有生理优势还是因为存在对男性的歧视？而且，生理差异具有可塑性，正如一副眼镜可以矫正遗传性近视，改善生物性易染病体质可能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当男性和女性因生理因素而遭遇不同的疾病（乳腺癌或前列腺癌）时，我们又如何判断哪一种疾病的危害性更大呢？涉及这一概念性问题的数据很是贫乏，在许多国家中，关于发病率的信息不仅零散，而且质量也不平衡。更麻烦的是，具有良好数据的地区可能正是性别差异比较小的地区，而这会导致政策优先顺序的错配。

为勾勒一幅全球状况的图景，本章采用了还原论的方法，聚焦于出生时的性别比例和出生后的死亡率。如果只因结果显示的差异就认为健康领域的性别差异很小，将是错误的——通过对比发病率的差异，这些差别会显现出来。而以下四个发现说明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并不小。

首先，在某些国家，性别出生比率不平衡这一众所周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第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世界上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死亡率总体上高于男性。第三，尽管发达国家的男性死亡人数超过女性，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却相反，而且这种差距随着两性成年人整体死亡风险的增加而增加。女性死亡率问题日益严重，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国家尤其如此，但即使在中非和西非等艾滋病感染率比较低的国家，死亡风险也越来越大。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面临的死亡风险正在恶化的地区。第四，许多转型后国家的男性死亡风险增加了，这表明在过去的 30 年中，某些特定的行为和健康风险更严重了。

这些在家庭、市场和制度框架中得到解释的发现形成了尖锐的政策结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原因，女性和男性面临着不同的劣势。出生时女孩失踪源于家庭对女孩的歧视。针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通过家庭决策的过程。市场和制度可以操纵这些过程，但是只有市场和制度还不足以取得成功。尽管在女孩出生后，许多国家的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很严重，但是在许多其他国家，女性高死亡率反映了服务供给制度绩效不佳。完善制度是降低女性死亡率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存在歧视行为的人群中，更好的制度也有助于

降低区别性待遇的不利影响。男性高死亡率反映了更为社会所接受的男性行为类型。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有一个切入点，因此，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但是，无论根据人类正义的哪一种概念，改变都势在必行。

关于低收入国家濒临死亡人口及死亡人口的事实

本章所重点讨论的问题比其他问题更引人注目：印度北部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率失衡，南亚地区女婴和女孩的高死亡率以及某些转型后国家男性死亡率的日益提高等问题，在过去的 10 年中，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成年）女性超额死亡的现象继续存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且日益严峻，然而这一问题却少为人知。对男性和女性随着时间推移而面临的死亡风险进行简单比较，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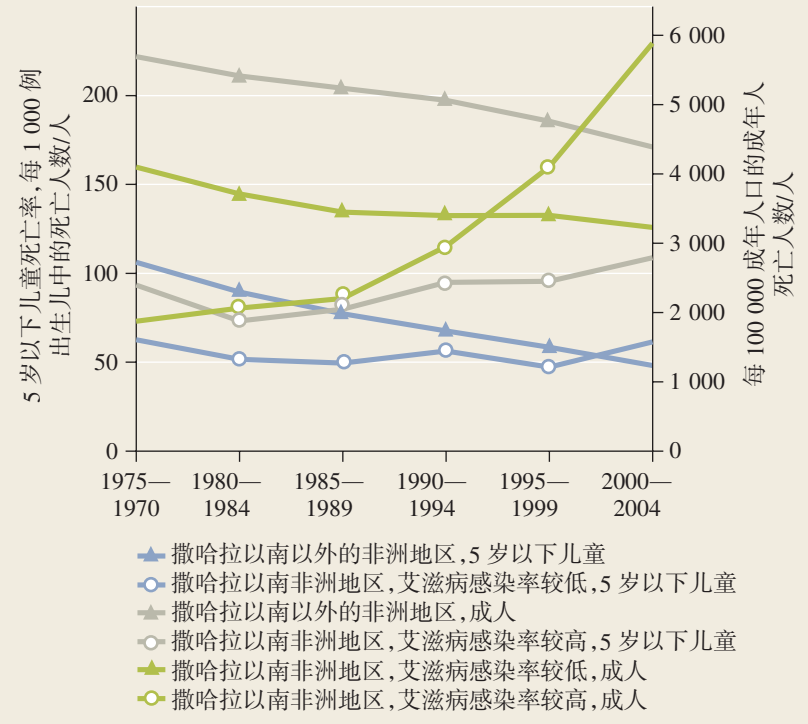
在富裕国家，每 1 000 名 15~60 岁的成人中，每年死亡的男性和女性人数介于 56 人（冰岛）和 107 人（美国）[53] 之间。印度的这一数字增至 213 人（中国增至 113 人）。中非和西非的成人死亡率更高，通常超过 300 人，许多国家超过了 400 人。冲突中国家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数字分别是 285 人和 479 人。而在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国家中，这一数字介于 481 人（马拉维）和 772 人（津巴布韦）之间。就死亡风险而言，这些国家比阿富汗还糟糕（和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相比更糟糕）。

时间序列比较突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差异（见图 3.6）。模式如下 [54]：

- 无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是其他国家，婴儿和儿童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降低了，尽管前者降低的速度较慢。
- 在过去的 25 年中，其他国家的成人死亡率大体上保持稳定，但是 1980 年至 2000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人死亡率却增加了一倍。
- 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亡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艾滋病，在艾滋病感染率比较高的国家，成人死亡率已经达到卢旺达和柬埔寨大屠杀时期死亡率的一半以上，死亡率的增长是持续上升的。
-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几个艾滋病感染率比较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是几个中非和西非国家，成人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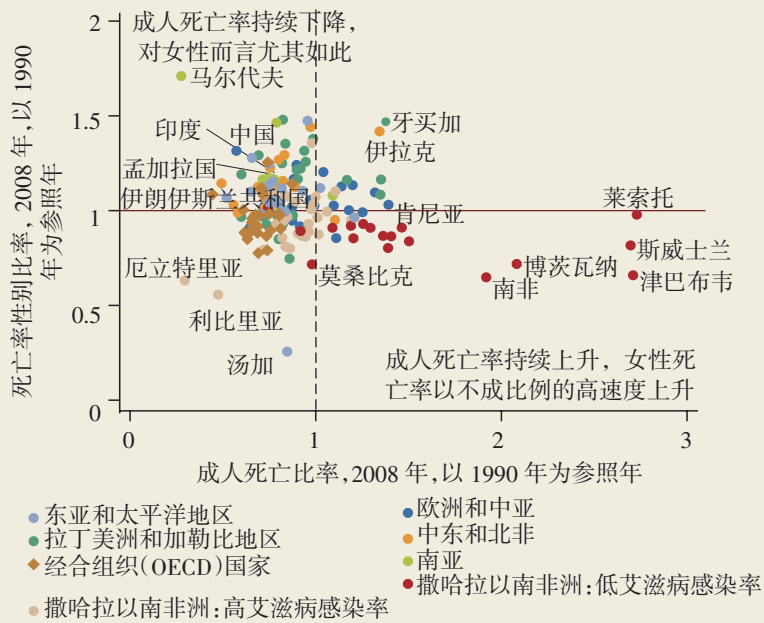
图 3.7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对所有国家 1990 年至 2008 年的预测值，说

图 3.6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成人和儿童死亡率



资料来源：de Walque 和 Filmer 2011。根据 46 个国家不同时段的 83 次人口和健康调查的兄弟姐妹花名册。1975 年和最近（通常是 2000 年）之间的计算值。数据显示了每五年死亡的可能性。

图 3.7 不同时期和不同性别的成人死亡率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年。

注：成人死亡率被定义为年龄介于 15~60 岁的人口的死亡率。死亡率性别比率即男性成人死亡率与女性成人死亡率之比。

明在这一时期，女性和男性死亡率的相对比率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褐色实线以下的国家中，女性面临的相对死亡风险正在恶化，黑色虚线右侧的国家中，成人的死亡率正在恶化（因此右下方的国家，二者都在恶化）。尽管严格意义上这些数字与图 3.6 不具有可比性（部分由于时间段不同，部分由于成人死亡率的统计口径不同），大致情况却是相似的（见专栏 3.1）。

大多数国家的成人死亡风险已经下降了。在受到艾滋病影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2008 年发病率超过 5%的国家），死亡风险日趋严峻，濒于死亡的女性人数相对高于男性。令人惊异的是，很多非洲国家的死亡率有极小的降低，且男性的降幅较大；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显示出女性死亡风险的相对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

专栏 3.1 成人死亡风险：谁的死亡率异常？

图 3.7 突出强调的几个国家的事实有助于引起本章其余部分的分析，并提醒我们为何对特定数据的总结会出现问题，这要求逐国进行分析。

1990 年左右，厄立特里亚和利比里亚结束了冲突，男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面临的死亡风险也随之降低。然而，男性死亡率的降低，使得女性面临的死亡风险相对升高了。对男性和女性而言，这都是一件好事。这表明，对所有国家使用同一参照基准，可以避免对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时段（像图中暗示的那样）比较而可能产生的误读。

伊拉克和牙买加的男性相对死亡风险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在这两个国家中，犯罪行为和暴力活动正在剥夺男性的生命，增加了整体死亡风险。冲突、暴力犯罪和男性死亡率的关系将在本章讨论男性死亡率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专题部分继续得到讨论。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马尔代夫的整体死亡风险大大降低，而由于国家重视解决产妇死亡率和安全孕产问题，女性死亡风险更是大大降低。本章突出强调了孕产妇死亡率及相关健康问题对成年人口女性死亡率的基本影响。

汤加的女性相对死亡风险大大增加了。汤加并不存在本章所强调的问题，这是因为汤加儿童免疫接种率非常高。2008 年，汤加的婴儿死亡数量很少，没有出现孕产妇死亡的情况。但是汤加面临着严峻的非传染性疾病问题，而且，汤加也是世界上糖尿病高发国家之一：75%的女性属于肥胖群体，56%的男性属于肥胖群体。2006 年，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占死亡总数的 48%。尽管本章只涉及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致病和死亡，汤加的情况提醒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大大不同于明天的问题，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具体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报告，不足以涵盖所有的应对方案。[a]

a. Somanathan 和 Hafez 2010。

家的成人死亡率都下降了，且女性改进相对更大。令人不太惊奇的是，图 3.7 中其他突出的国家主要是东欧和中亚国家，这些地区的死亡风险加大了，对男性来说更是如此。[55]

2008 年女性成人死亡风险最高的 14 个国家是（降序排列）津巴布韦、莱索托、斯威士兰、赞比亚、南非、马拉维、中非共和国、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乍得、乌干达、喀麦隆、布隆迪和尼日利亚。阿富汗紧随其后，排在第 15 位，巴基斯坦排在第 64 位。就儿童死亡率而言（5 岁以下，每1 000 例新生婴儿），女孩死亡率最严峻的地方是（降序排列）阿富汗、安哥拉、乍得、索马里、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和利比里亚。

这些基本描述突出强调了本章其余部分采用的方法。本报告将展示女性死亡率的重点逐渐从儿童转向成人，从南亚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尽管印度和中国女婴失踪的问题仍然严重。为此，本报告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审视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研究当今富裕国家的历史背景，确保事实和解释能够经得起不同来源数据的考验。最后，“压力测试”得出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即对基础制度进行改革、改善洁净水和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以及继续抗击艾滋病是必要的。

女婴失踪和女性出生后超额死亡

根据性别和年龄分析死亡风险，理想的状况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时间女性和男性的相对年龄—死亡人数的剖面数据。但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这要求对不同年龄—死亡人数的函数进行比较，而当各比较组的死亡风险在不同的年龄段交叉（可能多次）时，就更难做到。为了以容易理解的方式总结复杂的数据，本章按照两种标准进行计算。

本报告通过对世界各国新生儿性别比率与无歧视人口新生儿性别比率进行比较，估测了女孩失踪数量。[56]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人口”，本报告还通过比较各国各年龄段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死亡风险，计算得出了超额女性（男性）死亡率。[57]

本报告计算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在 1990 年、2000 年和 2008 年三个时间点的超额死亡率。为理解哪些可能是驱动死亡风险的因素，本报告同样计算了 13 个国家的历史超额死亡率，在某些情况下上溯到了 1800 年。发达国家按年龄计算的相对死亡率剖面数据的变化对计算其他国家的超额死亡率具有影响。因此，为更好地解释各国各阶段的模式，本章在所有的计算中，都沿用同一参照基准。死亡率数据的特别总结部分的研究假设将在本章的技术附录中讨论。

两项计算显示，每年出生时失踪的女孩和出生后超额死亡的女性总数超过了 600 万。其中 23%没有出生，10%夭折（5 岁以下），21%死于生育期（15~49 岁），38%死于 60 岁或年龄更大的组。这是女性出生后生命最具危险的三个阶段。但是由于年龄不满 60 岁的女性也是预期生存年限最长的群体，这个群体占据了世界上按年份计算的超额女性死亡的 81%。男性每年超额死亡人数为 100 万，主要集中在某些转型后国家（一半以上）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中。由于 60 岁之前死亡会导致更大的预期生存年限的损失，且相对高龄参照组的敏感度更高（见技术附录），本章聚焦于 60 岁以下人口的死亡风险，特别是女性生命中最关键的三个时期，即出生时、婴儿及

儿童早期、生育期。

尽管新生女婴失踪问题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但是和之前的讨论相一致，撒哈拉以南非洲不仅是女性超额死亡最高的地区，而且是唯一的死亡数量持续递增的地区（见表 3.2 和地图 3.1）。这三大人口群体，即中国（13 亿）、印度（11.5 亿）和撒哈拉以南非洲（8 亿），在世界失踪女孩和成年女性超额死亡中共占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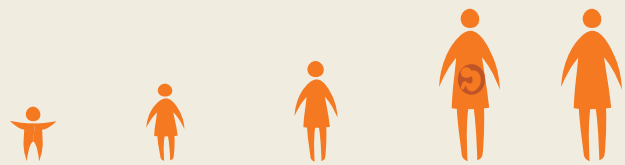
但是年龄分布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大多数超额女性死亡发生在出生时。在印度，出生时女孩失踪、女性幼童超额死亡和生育期女性死亡大致各占 1/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高发国家，生育期女性超额死亡占 7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低发国家，生育期女性超额死亡占 55%。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讲（从 60 万到 110 万）还是从其占女性人口的比例上讲，撒哈拉以南非洲是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世界上唯一的死亡风险上升的国家。

从一开始，本报告就将缺乏收入增长排除在解释女性超额死亡和出生时女婴失踪现象的原因之外（见图3.8）。收入和超额女性死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瑞典的女性超额死亡数量低于喀麦隆，这并不为奇。但是，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女性超额死亡率的变化和同期的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关系。许多国家实现了增长（安哥拉和南非），但是女性超额死亡率并没有下降，甚至出现了恶化的迹象。有些国家增长幅度不大，但是女性超额死亡率却降低了许多。死亡率性别劣势和收入增长之间缺乏密切关系，这与大量其他文献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并行不悖的。[58]

为了探索新生女婴失踪、超额女

表 3.2 偏重男孩的新生婴儿性别比和超额女性死亡是世界性顽疾，导致新生女婴失踪、儿童期和生育期女性超额死亡

新生女婴失踪和超额女性死亡（单位：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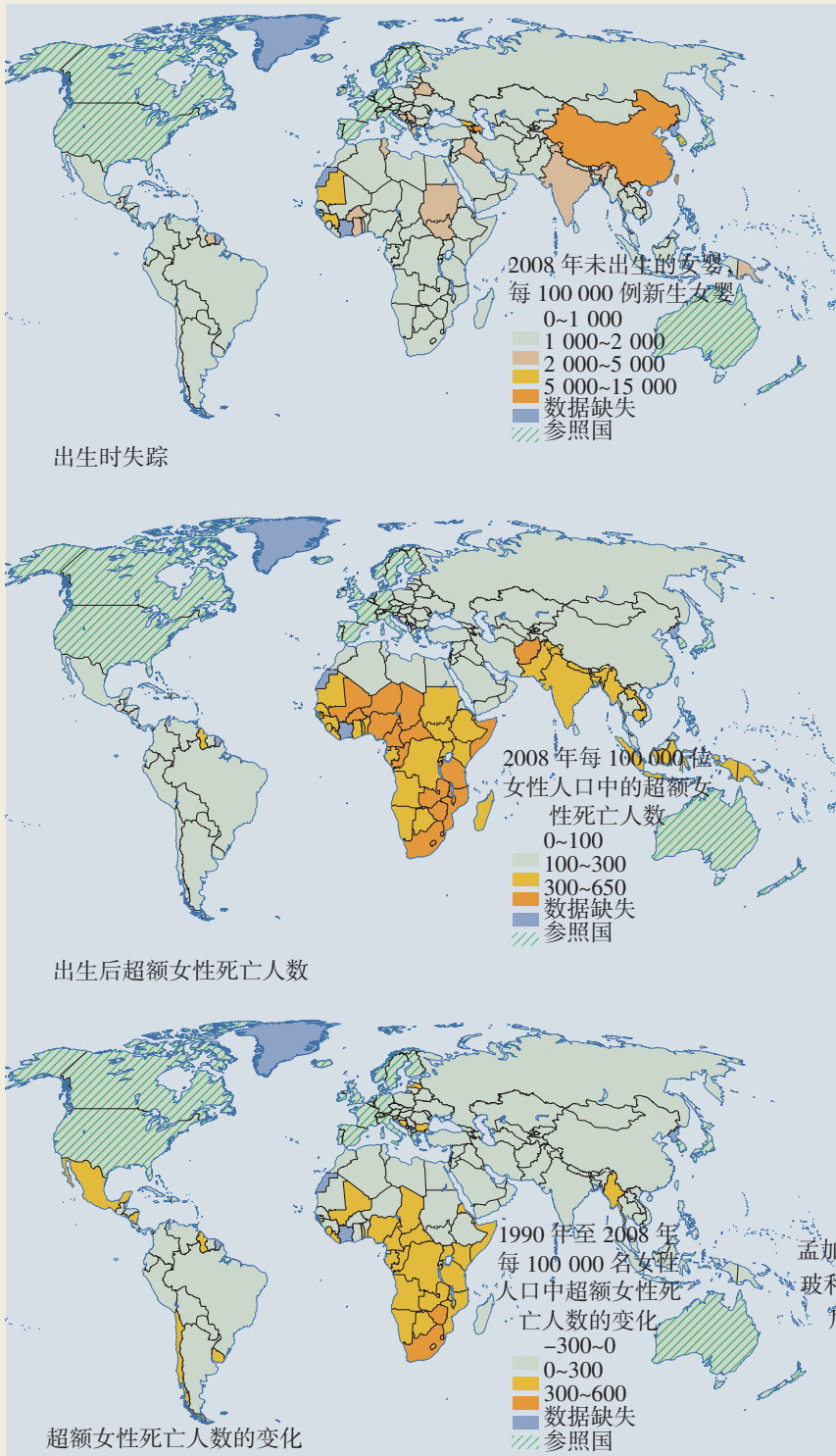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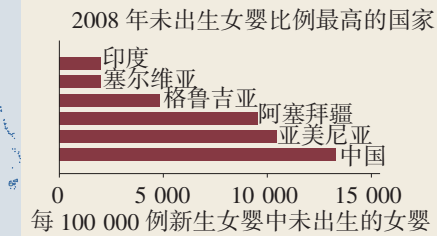
	新生女婴		5 岁以下女孩		5~14 岁女孩		15~49 岁女性		50~59 岁女性		60 岁以下女性总数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1990	2008
中国	890	1 092	259	71	21	5	208	56	92	30	1 470	1 254
印度	265	257	428	251	94	45	388	228	81	75	1 255	85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53	183	203	61	77	302	751	50	99	639	1 182
高艾滋病流行率国家	0	0	6	39	5	18	38	328	4	31	53	416
低艾滋病流行率国家	42	53	177	163	57	59	264	423	46	68	586	766
南亚（印度除外）	0	1	99	72	32	20	176	161	37	51	346	305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除外）	3	4	14	7	14	9	137	113	48	46	216	179
中东和北非	5	6	13	7	4	1	43	24	15	15	80	52
欧洲和中亚	7	14	3	1	0	0	12	4	4	3	27	2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0	0	11	5	3	1	20	10	17	17	51	33
合计	1 212	1 427	1 010	617	230	158	1 286	1 347	343	334	4 082	3 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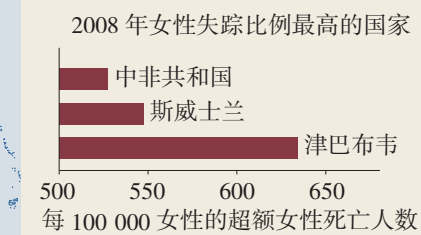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2010）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9 年数据的估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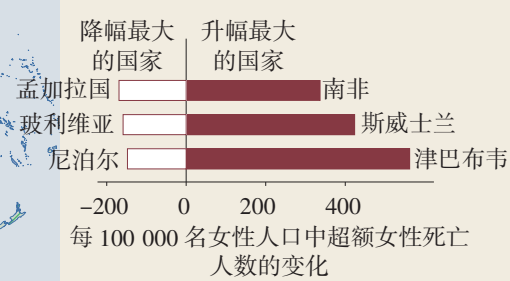
注：由于四舍五入，合计并不一定等于各项加总。

地图 3.1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在中国和印度，新生女婴失踪的数量仍然很高，而在非洲部分地区，超额女性死亡大幅度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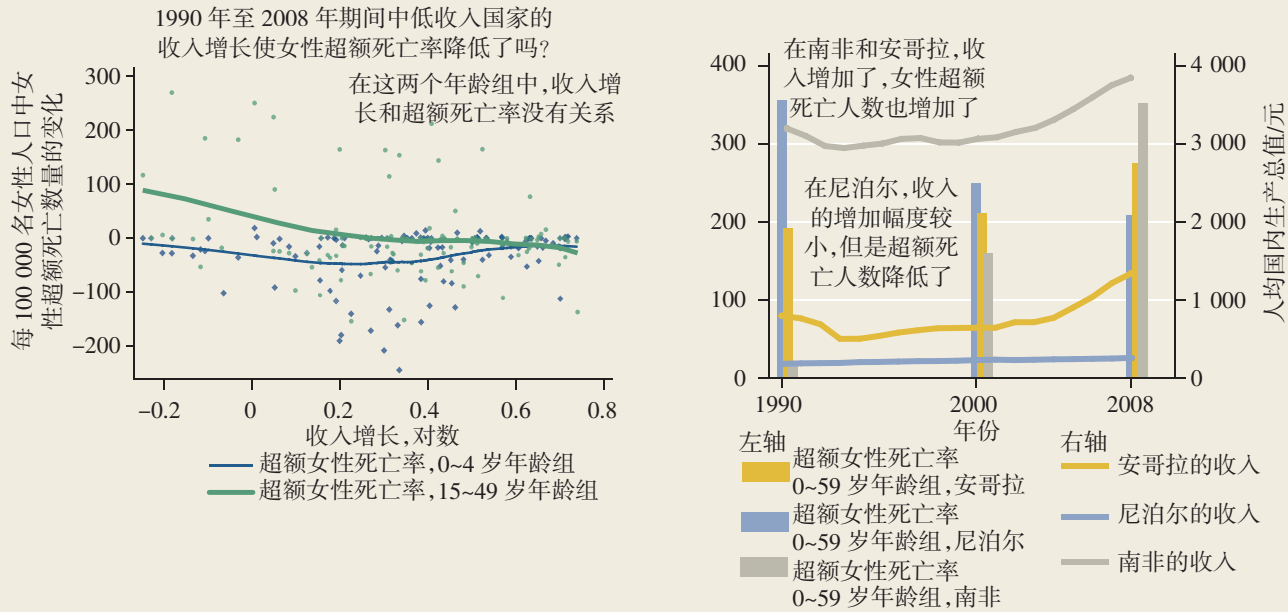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和联合国社会和经济事务部 2009 数据的预测值。

图 3.8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中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增长并没有降低女性超额死亡率



资料来源：工作组基于世界发展指标 2009、世界卫生组织 2010、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09 数据的计算值。
注：增长指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变化值。失踪女性数量被表述为其在相关年龄组别中女性人口的比例。

性死亡和超额男性死亡的原因及可以采取的措施，我们需要多种不同的解释。考虑到出生时、婴幼儿期和生育期等不同年龄组别具有不同的劣势，而且每一组别的劣势具有不同的原因，本章将逐一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印度—中国问题：新生女孩失踪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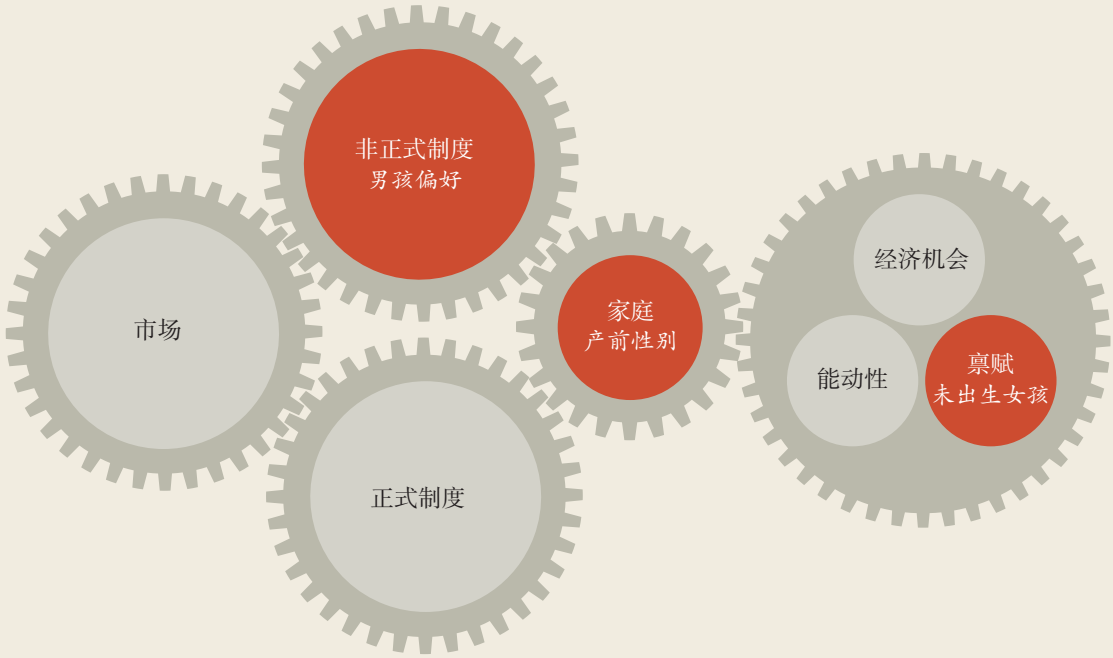
许多女孩失踪问题首先在 Coale，Das Gupta 和 Sen 的文献中分别得到披露。[59] 其后的许多研究确定了印度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地理差异，即在印度，这一问题从北部地带逐渐向南部蔓延，而在中国，这一问题则从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蔓延。[60]

> “第一个孩子必须是男孩。以后的孩子就都一样了。”
>
> ——塞尔维亚农村地区男青年

三个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 20 世纪晚期未出生女婴失踪数量的增加（见图 3.9）。首先，随着女性接受教育及劳动力教育回报的增加，生育率开始下降。而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降低了生育率。其次，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再到农村地区，（能够确定胎儿性别的）超声波技术已经得到广泛使用。最后，男孩偏好依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的家庭希望有两个孩子，但他们希望至少一个是男孩。

为了弄清楚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想想以前每个家庭有四个孩子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其余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几率仍然很高。但是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孩子，而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孩子仍然是女孩的几率和是男孩的几率相等，而他们想要的则是男孩。超声波技术的应用带来了“解决方案”，如果未出生的孩子是个女孩，父母可以选择流产，然后重新怀孕。

图 3.9　为什么如此多的新生女婴会失踪？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很遗憾，这正是数据所显示的结果。在没有性别选择性流产的情况下，第二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机会是均等的，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无关。然而数据显示，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第二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机会是均等的，但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孩子更有可能是男孩。中国、韩国和印度都有这种现象，这在印度北部地区受过教育的印度女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61] 此外，就像为防治破伤风而接种疫苗一样，如果女性怀的是男孩而不是女孩，孕期投资就比较高，而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孕期投资甚至会更高。[62]

这样的结果不仅出现在印度北部地区，也出现在孟加拉国、中国和巴基斯坦，这表明，南亚和东亚普遍存在不利于未出生女婴的习俗。[63] 改变这些习俗非常难。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第一胎和第二胎胎儿的性别选择上表现出与其母国非常相似的规律。[64]

男孩偏好不仅对新生儿的性别组成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日后父母对待他们（她们）的方式产生影响。有一个论据显示了男孩偏好和已出生儿童的性别劣势之间存在的微小关系。[65]

再次以男孩偏好这一简单的框架来考虑问题，不确定生育率，相反，让生育几个孩子成为可供选择的事情。

> “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在父母死亡的时候可以为父母举行葬礼。”
>
> ——印度农村地区青年女性

> “Dorji 告诉 Lhamo，如果她再生一个女孩，他将永远离开她。Lhamo 很快就怀上了她的第三个孩子。他常常打她，但是 Lhamo 仍然希望抓住机会给 Dorji 生一个儿子，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
>
> —— 不丹成年女性

在某些家庭中，第一个孩子将是男孩。如果家庭“停止生育”的原则是儿子的降生，就会出现一个儿子的独生子家庭。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家庭就会再生一个孩子，如果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家庭就会停止生育，如果是女孩，家庭就会选择继续生下去。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女孩的兄弟姐妹远远超过男孩。[66]

在印度北部地区，男孩偏好的后果之一是女孩获得的营养低于男孩（如营养差异所示，这并不是世界性的问题）。考虑到男孩偏好对男孩和女孩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劣势是由兄弟姐妹的数量而不是公开歧视造成的？事实证明，一旦家庭规模得到合理控制，家庭中就不会存在女性在营养获得方面的劣势。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营养差别应当归结于他们（她们）兄弟姐妹的数量。一旦生育行为得到控制，未出生儿童的性别劣势（体现在生育行为上）就不会进一步对已出生儿童的营养状况产生影响。

同样，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而不是男孩，家庭可能会选择在较短的时间内生育第二个孩子。如果母亲急于生育和怀孕而缩短母乳喂养的时间，那么家庭在有了一个女孩后急于生育一个男孩的愿望就可能对已出生女孩造成不利影响。[67] 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见解，即对未出生儿童的偏好可以导致性别劣势，这可能体现在已经出生的儿童身上。

> “现在男女平等了，但是根据传统，我们仍然希望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
> ——越南农村地区男青年

男孩偏好、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和新技术交织在一起，致使出生时女婴失踪数量增加，而兄弟姐妹的多少和生育时机的选择也会置已经出生的儿童于不利之地。改革非正式制度以及通过改革非正式制度改变家庭行为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而且这是可以实现的。韩国根据本国出生性别比率先剧增后下降的切身经历提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社会中引发的广泛的规范变革可以最终使出生性别比率回归到正常的范围内。[68]

幼童时期的女性额外死亡

导致女孩婴幼儿时期超额死亡的原因有哪些呢？解释之一是父母歧视女孩，这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世界的部分地区，例如阿富汗、中国、印度北部地区和巴基斯坦，这样的歧视非常严重。研究显示，女孩生病时，治疗常常被拖延，而且用于女孩的医疗费用也较低，而即使在经济飞速增长的 20 世纪 90 年代，男孩人体测量结果提高的速度超过女孩。[69] 这类歧视的经济基础与回报结构相联系，例如，在印度那些适宜发展农业、使用较多女性劳动力的地区，女性超额死亡率低于印度的平均水平。[70] 女性工资提高了，流动性和地位就会随着提高，而男性工资的提高却会带来相反的影响。[71] 除经济因素以外，由于超额女性死亡的假设出现在某些国家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国家，亲属关系结构对女孩在家人眼中的价值的影响也被提了出来。[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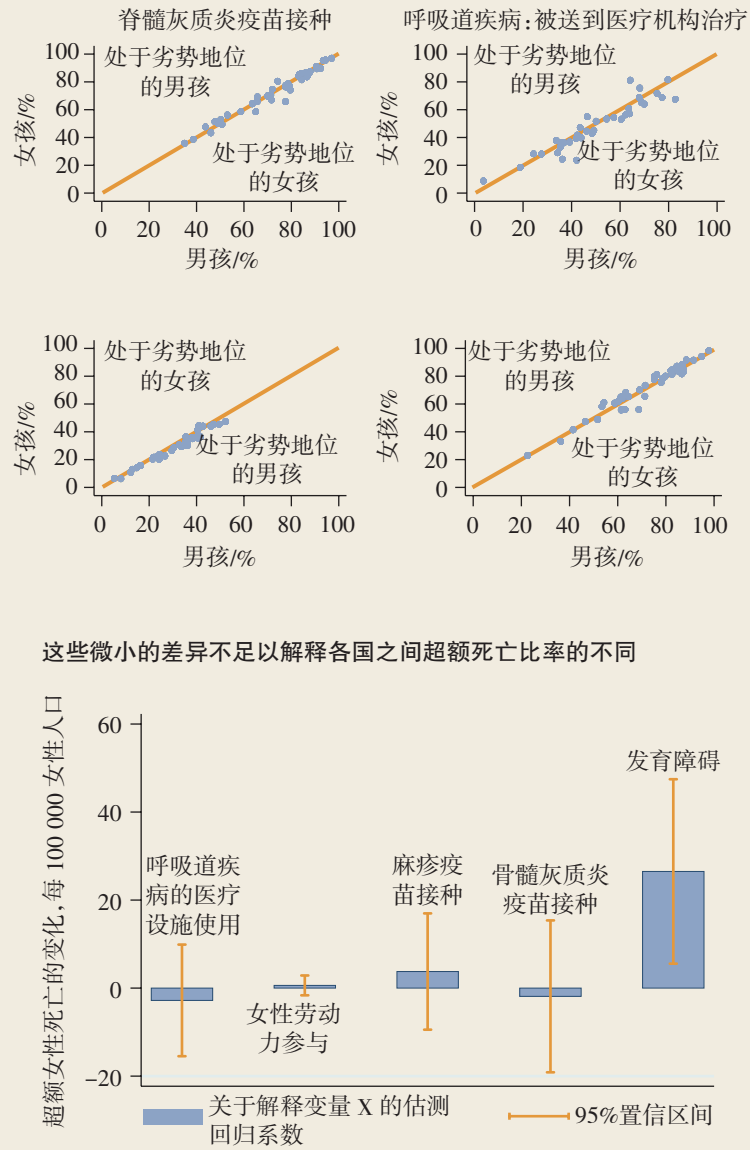
这样的女孩歧视是否是与超额女孩死亡率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模式？也许，正如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孟加拉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印度发现的那样，女孩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比较低，接受治疗的可能性比较低，

在家中得到充足营养的可能性较低。[73] 但是，对世界各国的比较发现了两个现象。首先，这些差异很小或不存在，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遭受营养不良折磨的是男孩）。第二，根据男孩和女孩的身高和体重测量结果，女孩超额死亡与她们在疫苗接种、差别性医疗和儿童期营养差异等之间的联系微不足道（见图 3.10），与女性劳动力参与也不存在联系。这些模式也反映了与之前文献相类似的发现。[74]

即使家庭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态度一样，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即医疗服务提供者歧视女孩。为估测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研究人员对阿富汗、布基纳法索、印度、莫桑比克、巴拉圭、卢旺达和乌干达七个国家的 30 000 多例医生和患者的互动进行了观察，记录了互动的时间、询问的问题、检查的项目以及所有与整体治疗质量相关的治疗环节。令人惊异的是，观察结果显示，男孩和女孩在医疗机构得到的治疗待遇是极其相似的。男孩和女孩之间（或者女性和男性之间）不存在治疗待遇上的差异（见图 3.11）。在这七个国家中，无论患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医生都花费相同的时间，询问相同的问题，完成相同的检查项目。[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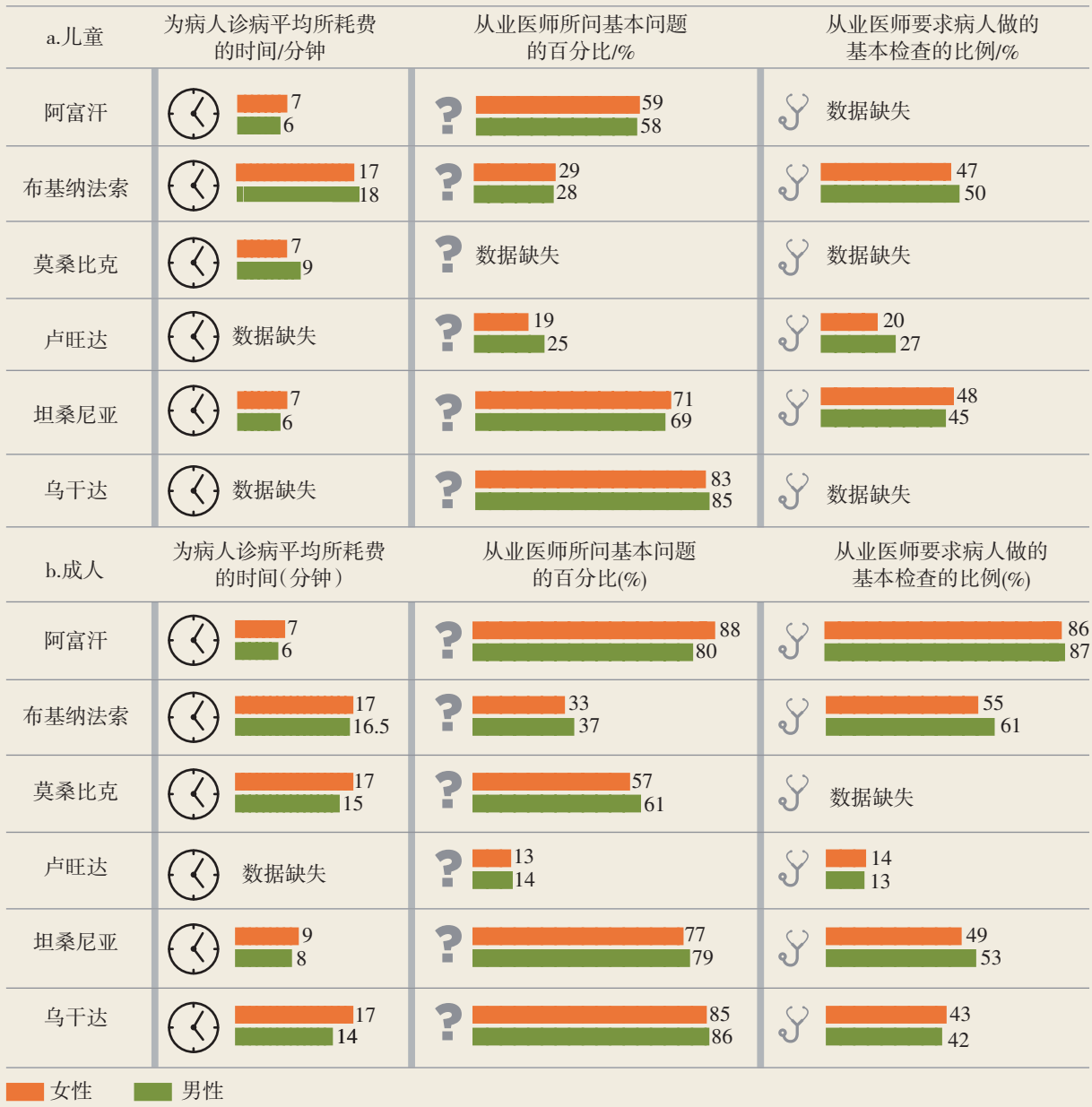
如果家庭和服务提供者都没有歧视女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女性在童年时期的超额死亡？历史辩论为这一谜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在 20 世纪早期，欧洲国家面临着同样的模式，即不存在新生女婴失踪问题，但是女性在童年时期的超额死亡率很高。1900 年至 1930 年期间，女性超额死亡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消失了（见图 3.12）。整个 19 世纪这种模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此后，超额死亡率迅速下降，这是与对公共健康领域、尤其是与洁净水和卫生设施体系（广义，包括污水处理、排水系统、洗手间和传病媒介控制等）的大规模投资相吻合的。此外，这一下降过程还伴随着国内卫生保健工作的改善。美国这一时期婴儿死亡率整体下降和女婴超额死亡问题的解决应该归功于洁

图 3.10　疫苗接种、营养指标或孩子生病时所接受的医疗服务中的性别劣势微不足道或不存在



资料来源：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09、世界发展指标 2009 和 1985—2008 人口健康调查的数据得出的计算值。
注：疫苗接种覆盖率和医疗服务状况数据是 1990—2008 年期间的数据。

图 3.11 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在医疗机构会得到同样的治疗
从业医师一次治疗平均所花费的时间及所提的问题和进行的检查



资料来源：Ali 等 2011。
注：男孩（男性）和女孩（女性）就诊条件没有太大的差别。

> “在发生污染之前，河水可用以烹调和饮用。现在，棕榈油污染影响了我们的河流水质……但是，我们不得不饮用河水，我们别无选择。”
>
>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年女性

净水和卫生设施体系。[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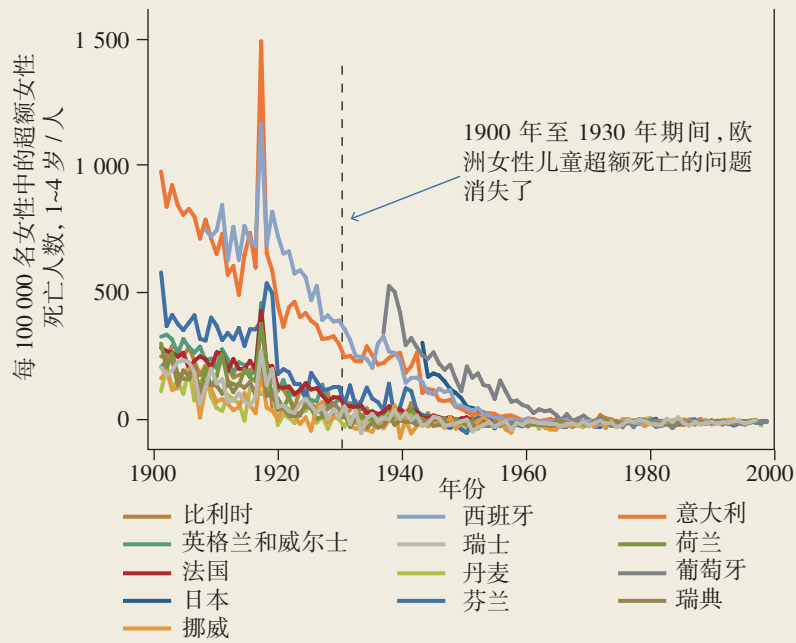
公共健康投资降低了流行病的危害，这是婴儿死亡率下降和女性婴儿和幼童超额死亡问题消失的原因。在 20 世纪早期到 1930 年期间，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人数比例降低了，产期和先天因素引起的死亡比例相对上

升了。[77] 尽管就传染病和围产期条件而言，女孩过去（现在也是）比男孩更健壮，但是相对于传染病，女孩在围产期比男孩更健壮。男孩一直在死亡率方面处于劣势，且随着传染病影响的降低，男孩的不利因素增加了。今天，与富裕国家相比，在公共卫生体系薄弱，不能提供洁净水、卫生设施、废物处理和排水体系的国家，严重的传染病是造成女性在幼童时期高死亡风险的部分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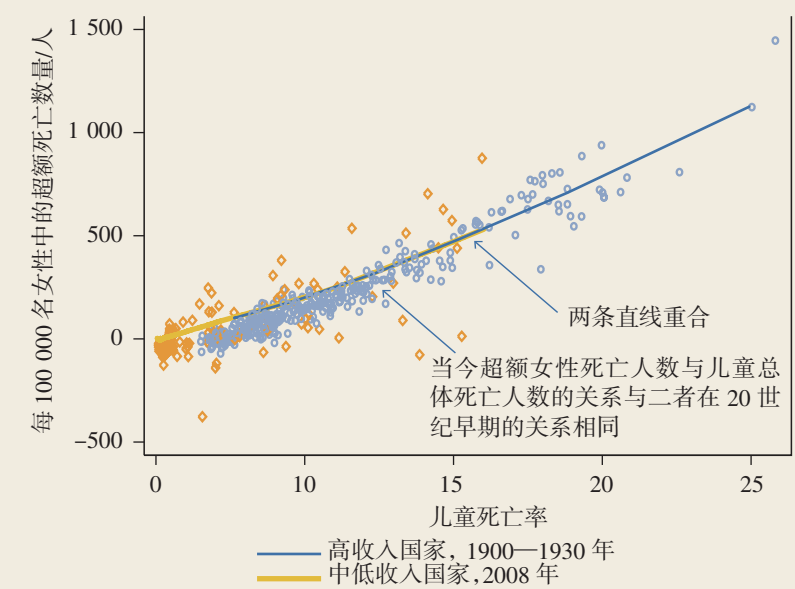
如果该制度—生物假设是当前真实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在婴儿死亡率较低的国家，超额死亡的女性人数也会降低。而事实的确是这样：2000 年超额女孩死亡和总体婴儿死亡率的关系正如 1900 年欧洲国家发生的那样（见图 3.12）。孟加拉国、中国和越南不仅通过提供洁净水和改善卫生设施成功降低了总体婴儿死亡率，而且也降低了女性在婴儿期和儿童早期的超额死亡人数。但是在西非的很多地方，人们对洁净水和卫生设施的重视不足。1990 年至 2005 年期间，非洲 32 国中可以使用自来水的城市家庭从 50%降低至 39%。因此，在像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中，女性在儿童早期超额死亡率的下降要缓慢得多，也就并不奇怪了。

今天，降低低收入国家男孩和女孩面临的死亡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正如大多数欧洲国家在 20 世纪早期所做的那样。降低传染病发生的风险将降低儿童死亡率，对女孩而言尤其如此。

图 3.12　高收入国家在 20 世纪早期的超额女性儿童死亡率和当今的中低收入国家大体相当



而女性超额死亡率随着儿童总体死亡率的降低而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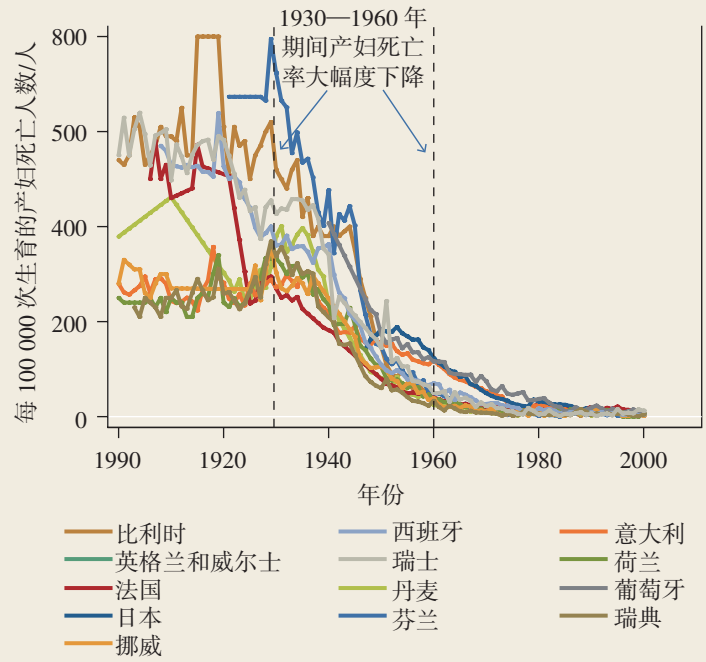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9、人类死亡率数据库 2011、德国马普人口统计学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成年女性的超额死亡

15~60 岁的女性也受到超额女性死亡的威胁，对那些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育龄期女性（15~49 岁）而言尤其如此。在这个年龄组，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超额女性死亡的绝对数量减少了，所占人口的比例也降低了，尽管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撒哈拉以南非洲分为两个区

图 3.13 1930—1960 年期间，部分国家的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



资料来源：Albanesi 和 Olivetti 2010。

域，其一是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地区，这里，甚至以在人口中的所占比例计算的超额女性死亡率都上升了；其二是主要位于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国家，这些国家受到艾滋病的影响不大，女性超额死亡率下降了，尽管非常缓慢。导致育龄期超额死亡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生育导致的产妇死亡或患病；二是艾滋病感染。产妇死亡和其他年龄段的女性超额死亡有着根本的不同，减少产妇死亡数，社会就必须从本质上改善女性状况，尤其是改善产妇保健体系。在本报告中，“产妇死亡”不仅仅指育儿期间的“产妇死亡”，而且也包括由怀孕和生育引起的疾病。这也包括严重贫血（及其与疟疾的关系）和产科瘘。[78]

如同在幼童时期，世界上某些群体的成年女性在医疗支出和寻医问药上都遭遇了歧视。但是，正如幼童时期，这种歧视并不是系统性的存在。在某些国家，从印度到埃及再到南非，医疗总支出及医疗卫生体系的使用还稍稍倾向于女性（见第 1 章）。对七国临床医疗状况的研究也不能揭示从业医师对男女的诊疗方式有何差异（见图 3.11）。尽管由于生理差异和健康需求的差异，这些发现仍然可能与歧视现象相容，但它们也意味着寻找歧视的证据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相比之下，下面将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即产妇死亡和艾滋病感染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却显而易见。

产妇死亡

2008 年，高收入国家的产妇死亡数量总计约 1 900 位。印度的产妇死亡数量是 63 000 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量是 203 000 位（约占全球的 56.7%）。在索马里和乍得，每 14 位女性中就有 1 位女性的死因与生育有关。今天死于生育的印度女性在所有产妇中的比例高于 20 世纪初期的瑞典，而今天死于生育的利比里亚女性在所有产妇中的比例则高于 17 世纪的瑞典。[79]

1930 年至 1960 年期间，发达国家的产妇死亡率（每出生一个婴儿所面临的死亡风险）大幅度下降（见图 3.13）。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大多数国家的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原因部分在于 1936 年磺胺药的应用，部分在于使用制度化保健看护的生育数量的增加。[80]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期间，国家间产妇死亡率迅速拉近，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大多数国家都达到了现代水平。意大利、日本和葡萄牙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达到了这一水平。与北欧国家相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下降幅度更大，1935 年就已经实现了较低的产妇死亡率。

1900 年至 1930 年，美国的产妇死亡率最高，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产妇死亡率开始急剧下降，并于 1960 年降至当前的水平。产妇死亡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同时改善了分娩时的医疗体系和对孕妇的服务，以及分娩地点的变化，即从家里到医院的转变。[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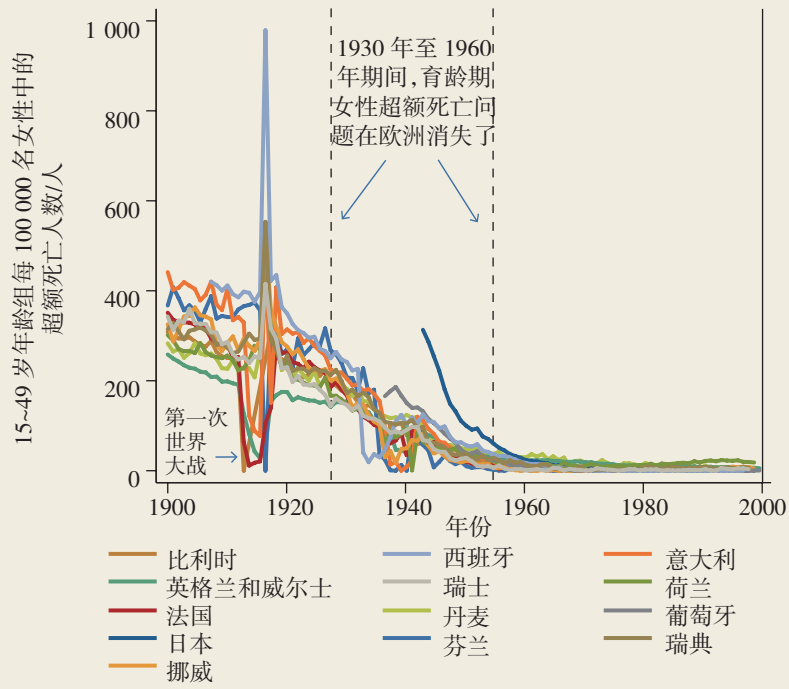
部分国家育龄期女性超额死亡数量的变化充分反映了这一格局（见图 3.14）。直到 1930 年，这些国家的女性成人期超额死亡率一直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下降，1918 年由于流感又达到顶峰），接着在 1930 年至 1960 年期间，这些国家的女性成人期超额死亡率迅速下降至零。[82] 确切地说，后期的死亡率降低主要是意大利、日本和葡萄牙导致的——这些国家的产妇死亡率下降最晚。

对 1990—2008 年期间的所有国家以及有历史数据的高收入国家而言，基本模式都是一致的，即较高的产妇死亡率和较高的成年女性超额死亡率之间存在着联系。因此，降低产妇死亡率对降低成年女性超额死亡率至关重要。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两种，其一是降低生育率，从而降低女性面临的死亡风险（包括不安全流产带来的风险）；其二是降低产妇死亡率（每一次生育带来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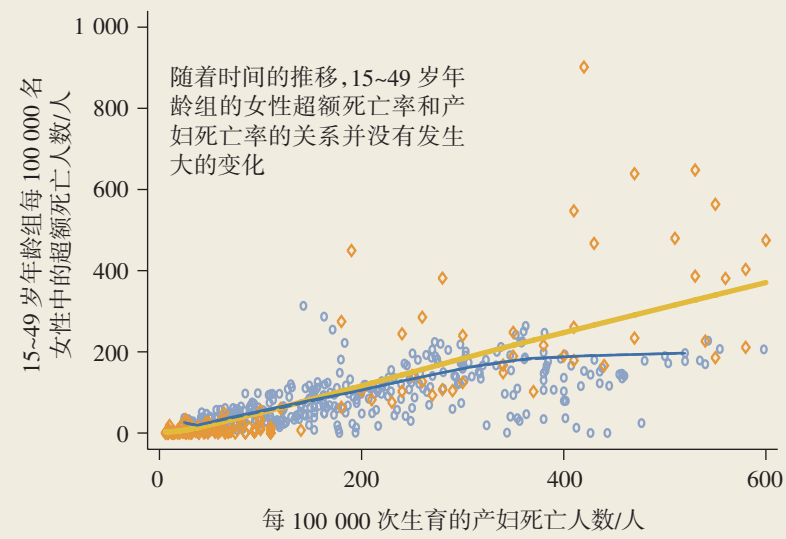
本报告将对此逐一讨论。当生育很高时，死亡率的下降将降低与生育相关的死亡风险。产妇死亡风险取决于母亲的年龄（年轻时期风险要比各年龄组平均水平稍高，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风险会增加，呈“J”形）；平

图 3.14　今天的高收入国家在 20 世纪前半期面临着育龄期女性超额死亡的问题

1900—2000 年期间 13 个欧洲国家的女性超额死亡率



所有收入水平的超额死亡率随着产妇死亡率的降低而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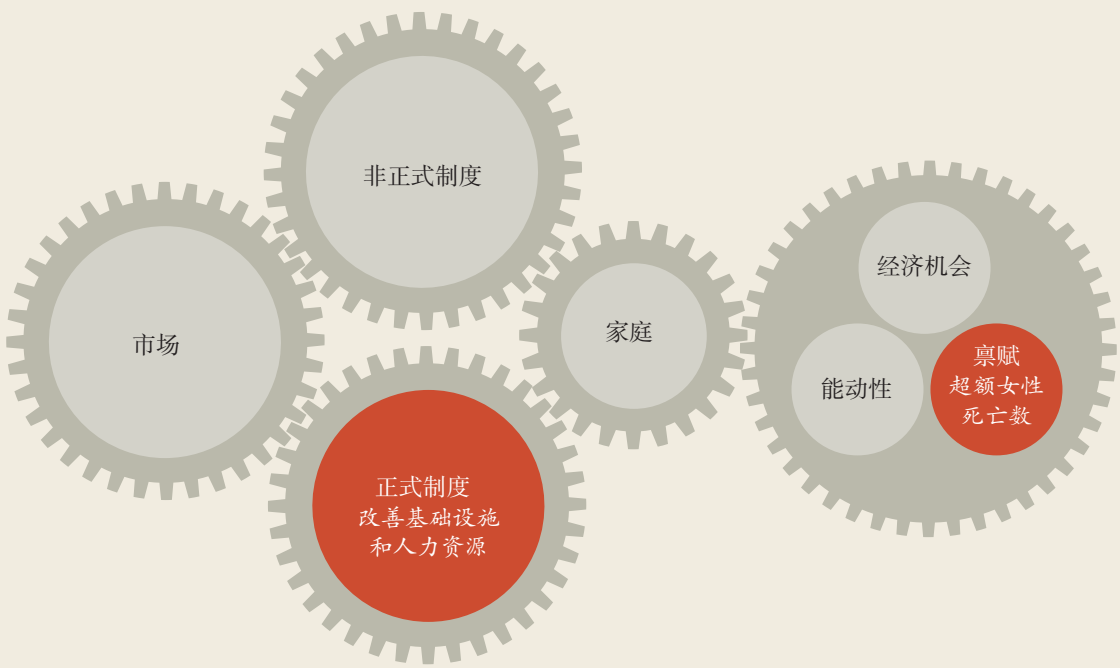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9，人类死亡数据库、德国马普人口统计学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以及 Albanesi 和 Olivetti2010 的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 “村子里谁都没有饮用水。村民从距离村庄 100~1 000 米的泉眼和水塘中取水。在某些季节，泉眼和水塘会干涸。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每天要用五个小时去取水……
>
> 有时候，相邻的村庄之间会因争夺饮用水和居所而发生暴力冲突，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水，而且他们没有住所，他们在沙漠中为自己建筑住宅。有时候，他们为了争夺这些资源而打架。”
>
> ——阿富汗农村地区成年男性

均生育次数，或者说一位女性所生育孩子的数量（第一次怀孕和较高的平均生育次数将增加母亲面临的死亡风险）；独立群体效应（例如，出生在吸烟群体中母亲面临的风险较大）和时间效应（晚几十年意味着更好的医疗条件）。在富裕国家，产妇年龄的变化和平均生育次数分布的变化使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17%。[83] 对少数几个低收入国家的研究（通常在次级行政区水平上）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即产妇死亡率下降了 25%左右，这些研究使用的模型将平均生育次数大于 5 的生育和最安全生育期（20 岁至 39 岁）以外的生育排除在外。[84] 因此，在生育率很高的环境中，生育年龄和平均生育次数结构的变化可以使产妇死亡率降低 20%左右。

对低收入国家的研究是在总体生育率很高的时期进行的，例如，当时孟加拉国每位女性生育的孩子在 6 个以上。今天，只有阿富汗、乍得、尼日尔、索马里、东帝汶和乌干达六个国家保持了如此高的生育率。40 个国家的生育率超过了 4 个，除了阿富汗、危地马拉、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也门共和国以外，其余的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都急剧下降。在生育率等于或小于 3 个的国家中，进一步改变生育年龄和平均生育次数分布可能不会对产妇死亡率产生大的影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产妇死亡率从一开始较高的水平降低了 10%~15%，这些政策可能继续在部分国家发挥作用，但是未必能大幅度减少每年死于生育的女性人数。[85] 降低低收入国家每年高得难以接受的死于生育（及相关原因）的女性人数，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具有地区针对性的，能够降低生育率并配套降低产妇死亡率的具体政策（见图 3.15）。

图 3.15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女孩和成年女性育龄期的超额死亡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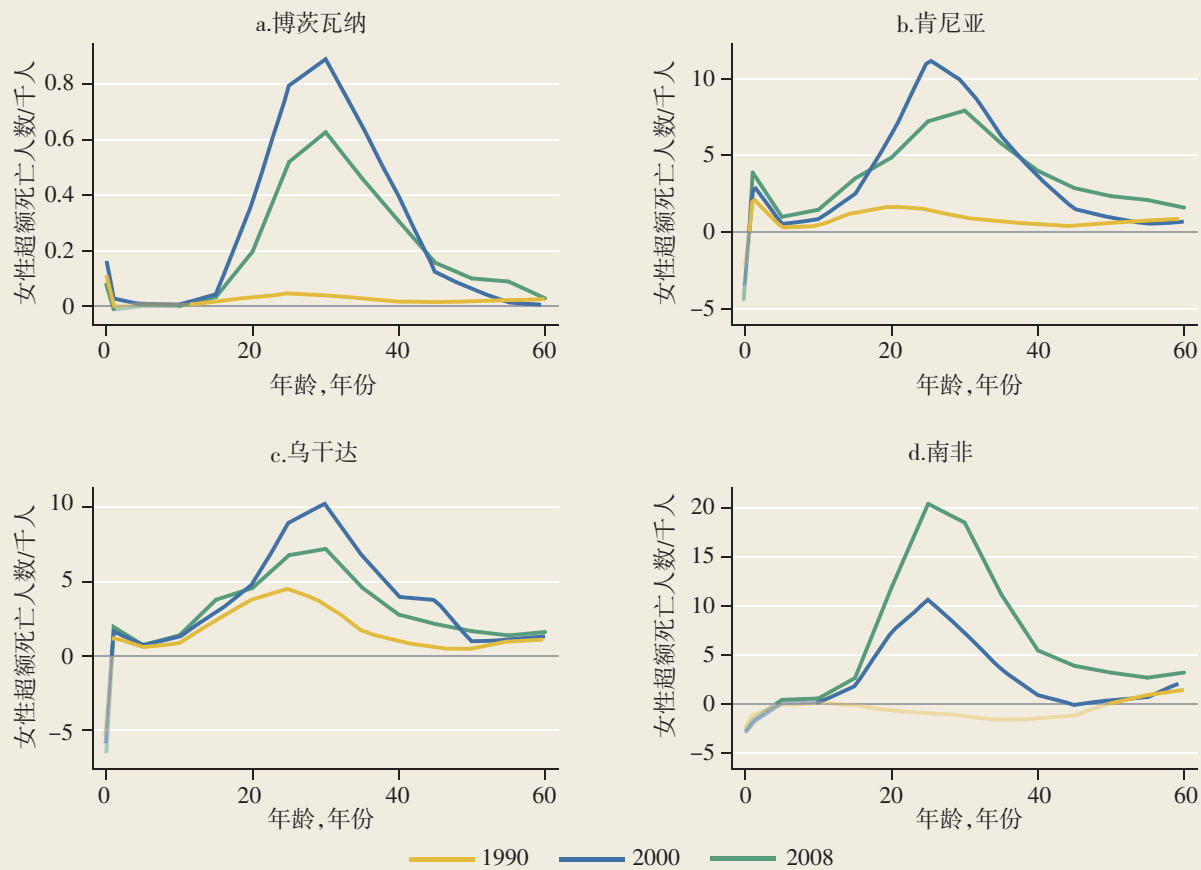
艾滋病

除产妇死亡之外，艾滋病感染也是导致非洲女性超额死亡的原因（见图 3.16）。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0%的成人艾滋病感染者是女性[86]，艾滋病感染的性别差异在较年轻的群体中表现最大。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5~24岁年龄组中艾滋病感染的女性与男性之比是 2.4。[87] 对男女两性艾滋病感染年龄分布数据图表的对比显示，34 岁以后，男性和女性的感染率大体相当。[88]

生理因素和行为因素都是造成女性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的原因。女性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的现象被称为“艾滋病女性化”。[89] 就生理而言，由于和男性相比，女性身体更容易受到感染，女性感染病毒的几率是男性的 1.2 倍。性生活活跃的青年女性，她们的身体仍在发育，尤其容易受到感染。男性和女性感染性病（如单纯疱疹病毒 2 型）的方式不同，也使女性更容易受到 HIV 病毒的感染。[90] 就行为而言，女性与年长几岁的男性约会和结婚，这也是造成男女两性艾滋病感染率年龄梯度差的原因。

如果得不到治疗，HIV 病毒感染会发展成为艾滋病，7~10 年之后，病人就会死亡。但是，艾滋病与超额女性死亡的联系并不是非洲地区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对中非和西非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部分地区的高感染率国家中，在这些国家，艾滋病发病率无论与非洲还是全球相比都明显

图 3.16　在艾滋病感染率很高的四国中根据年龄分组的超额女性死亡率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9 的数据所得出的估算值。

偏高（见专栏 3.2）。

HIV 病毒/艾滋病对女性的打击最为沉重，不仅如此，应对艾滋病危机也会对健康服务的提供产生全面的系统性影响。在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产前护理、分娩时护理和儿童疫苗接种率也受到了不良影响。[91]

令人振奋的是，这些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而女性超额死亡的问题也将发生变化，这既是因为人们可以接受延续生命的治疗，也是因为发病率发生了变化。据估计，到 2009 年年底，中低收入国家中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人口有 520 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将近 37%需要治疗的人口可以获得维持生命的药品。[92] 在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中，治疗覆盖率各不相同：博茨瓦纳是 83%，马拉维是 48%，南非是 36%，乌干达是 43%，赞比亚是 68%，津巴布韦是 34%。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近在 2003 年，非洲还只有为数不多的特权病人可以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这将减少由 HIV 病毒/艾滋病引起的死亡人数，降低成年女性的死亡率。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博茨瓦纳、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女性超额死亡人数降低了（尽管超额死亡人数的数量仍然大大高于 1990 年的水平），这些国家具有很高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覆盖率。相比之下，在HIV 病毒感染率很高、人口很多、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推广较慢的南非，女性超额死亡的人数在 1990 年至 2000 年期间稳步上升，2008 年又进一步上升。

成年男性超额死亡

在某些国家，分析却显示出男性超额死亡的模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暴力犯罪率很高或处于战争和冲突状态的国家和地区中，以及在那些男性人口遭遇地方性 HIV 病毒感染的部分地区，在将这些国家的居民的整体死亡状况纳入考虑之后，男性的死亡率仍然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男性。

首先，男性是武装冲突的直接受害者。对 13 个国家 1955 年至 2002 年期间发生的冲突的研究显示，死于暴力战争的人口中，81%是男性。[93] 一个例子是厄立特里亚，该国长达 30 年的独立战争于 1991 年结束。图 3.17 显示了战争最后一年的男性超额死亡人数。

在战争外，暴力冲突也具有性别差异，在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80%~90%的暴力犯罪是由男性实施的，男性犯罪行为发生率较高，相应的，其监禁率也高。[94] 死于杀人行为的男性人数高于死于武装冲突的男性人数。2000 年全球死于暴力行为的人中，杀人行为的受害者略低于 1/3，其中大多数是男性。拉丁美洲的杀人犯率最高（每 100 000 人中有 27.5 人），这是其他地区所报比率的三倍还多。特别是墨西哥，作为可卡因、大麻和其他非法毒品的重要运输和生产枢纽，该国经历了该地区大多数毒品相关的暴力活动。[95]

在拉丁美洲，大部分杀人行为的受害者是经济社会背景不高的青年男性，比率最高的是 15 岁至 24 岁的青年男性。[96] 除了由毒品和竞争性卡特尔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引起的暴力行动之外，拉丁美洲的暴力活动还与男子汉观念有关，这种观念迫使男性在遇到挑衅时还击。例如，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青年暴力行为的研究显示了男性在人前“赢得”尊重的重要性，而暴力行为是获得这种地位的途径之一。[97] 而拉丁美洲国家的男性超额死亡正是发生在这类暴力行为突

专栏 3.2　四个非洲

1980 年至 2000 年期间，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入学率增加了，儿童死亡率降低了（尽管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相比速度要慢），但是成人的死亡风险却增加了。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男女两性、受过或没有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的死亡率都增加了，但是死亡率增加最大的群体是未完成小学教育的男性。[a] 十年以后，许多非洲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死亡风险水平如何？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人们通常认为存在严重性别歧视的南亚国家相比较又如何呢？ 这里有四类非洲国家，每一类国家对女性争取和享受健康生活的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遍布大陆的进步国家，教育水平高而死亡风险低；受到 HIV 病毒/艾滋病影响的非洲，主要是南部非洲；发生冲突的国家，如厄立特里亚和利比里亚等；还有一些奇怪的地区，西非和中非。

进步的非洲。埃塞俄比亚、加纳、马达加斯加和多哥等国家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艾滋病/HIV 病毒的影响。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约为每 1 000 名新生儿中，约 100 人死亡（加纳不足 76 人）。女性出生后的超额死亡率降低了，而入学率却相对增加了。生育率的降低减少了分娩引起的死亡风险，目前的总体生育率为 4~5 个。就健康和教育而言，这些国家与巴基斯坦相当，但是小学入学率要略高。生育率仍然高于印度（2.7 个）和巴基斯坦（3.9 个），这和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一样。

冲突非洲。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经历了两种类型的冲突。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发生在厄立特里亚和利比里亚等国家的公开战争夺走了许多青年男人的性命。除了周期性的爆发，这些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但是战争的影响依然在延续。在利比里亚的巴哥博拉镇（Bargblor），没有人能获得电、自来水、公用管道或污水处理系统服务。那里没有公共交通服务，最近的医院也要步行 3 个小时才能到达。女性不得不跑到或走到医院。死在医院里的孩子被运回到家庭所在的村庄埋葬。在其他国家，女性仍然在承受普遍存在的内乱造成的沉重代价。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06 年至 2007 年期间，刚果民主共和国中每 1 000 名女性中就有 29 位被强奸，这是美国的 58 倍。[b]1980 年至 2008 年期间，女性超额死亡率增加了。总体生育率在 5~6 个之间徘徊，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每 1 000 名新生儿中 150~200 名之间徘徊。尽管近年来入学率提高了，但其水平仍然很低。

> “男人和我们一样，我们都经历了这种地狱般痛苦的遭遇。”
>
> —— 利比里亚成年女性

受到 HIV 病毒 / 艾滋病感染的非洲。第三个非洲由那些 HIV 病毒/艾滋病感染率很高的国家组成。2009 年年底，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中，15~49 岁的人口中，约 1/6 到 1/4 的人口生活在 HIV 病毒/艾滋病的阴影下。早期儿童死亡风险、入学率和生育率与今天的印度相当。1990 年，博茨瓦纳和南非的男性和女性死亡曲线与今天的高收入国家相似。但是到了 2000 年，成人的死亡风险增加了，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1980 年，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面临的死亡风险也更高，但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城市地区的男性和女性在死亡风险这个问题上都具有优势。到 2000 年至 2004 年，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相比，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和女性面临着较高的死亡风险，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农村地区的死亡率都和城市地区的死亡率相等。

> “如今正在发生的最糟糕的虐待，就是一个男人将艾滋病传染给一个女人……不受保护的性行为引起了男女之间的争执，因为女性说她想用安全套，但是男性会拒绝。”
>
> ——南非成年女性

中非和西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中，真正让人疑惑的是中非和西非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索马里和这些国家非常相似）。这一时期除加纳和塞内加尔之外，许多国家要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要么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死亡风险。在这些国家中，女性面临的死亡风险系统性地提高了。即使到了 2000 年，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却是死亡风险增加最快的群体，尽管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的死亡率仍然低于其他群体。今天，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乍得、马里、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具有和阿富汗非常相似的死亡风险、生育率和女孩入学率。这些国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 170 个至 220 个之间（阿富汗更高，是 257 个），总体生育率在 4.5 个至 7 个之间（阿富汗是 6.6 个），成人死亡风险实际上和阿富汗一样。这些国家的中小学入学率也与阿富汗的数据非常类似。

这些发现令人疑惑，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共同点。有些国家是内陆国，有些国家是沿海国家，有些国家讲英语，有些国家讲法语，有些国家增长迅速，有些国家增长缓慢，有些国家发生了冲突，有些国家没有发生冲突。这些国家唯一的共同点是女性原本就欠缺的生计还在进一步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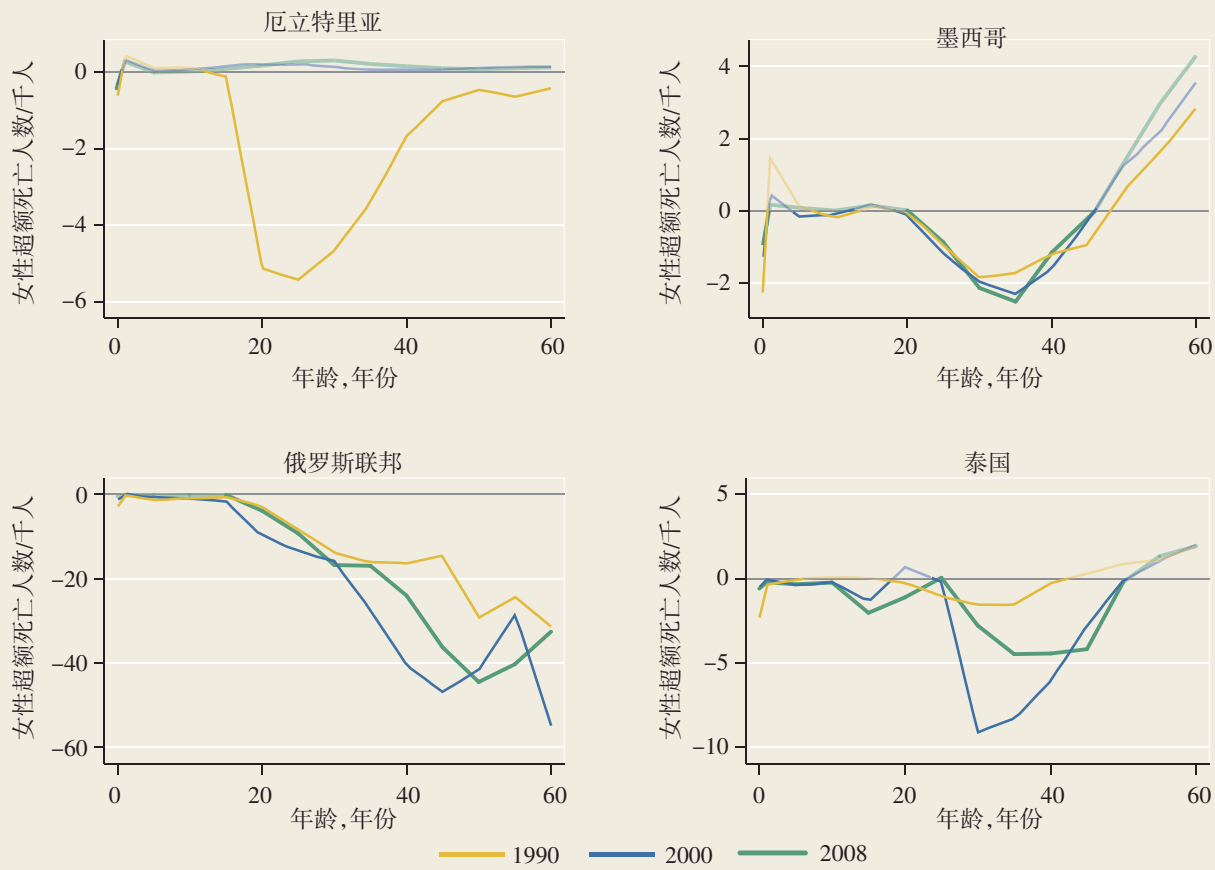
四个非洲彰显了 HIV 病毒/艾滋病和冲突的巨大影响，并说明薄弱的制度和服务供给和公然的性别歧视一样可以

专栏 3.2 四个非洲（续）

伤害女性，伤害程度可能更甚。为确定国际社会应该重视哪些地区，我们有必要指出我们对非洲大陆、尤其是中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了解微乎其微。1985 年至 2004 年期间发表在 202 家顶级经济学杂志上的所有论文中，149 篇论文是关于巴基斯坦的，1 093 篇是关于印度，但是关于中非共和国的论文是 0 篇，关于乍得的是 1 篇，关于贝宁的是 14 篇，关于几内亚比绍的是 2 篇，关于尼日尔的是 20 篇。只有关于布基纳法索（47 篇）和尼日利亚（148 篇）的论文数量开始增加了。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之前，国际社会应当先去理解非洲大陆正在发生什么。[c]

a. de Walque 和 Filmer 2011。
b. Peterman，Palermo 和 Bredenkamp 2011；Shannon 2010。
c. Das 等 2009。

图 3.17 某些国家存在男性超额死亡问题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09 的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y* 轴线值不足零意味着超额男性死亡。例如，1990 年，在厄立特里亚，年龄为 20 岁的男性超额死亡人数约为 5 000。

出的 20~40 岁的群体中。

第二，前社会主义国家是男性健康处于绝对劣势的地方。这些国家的人口除了遭遇经济社会动荡的危害之外，还面临着死亡率的急剧上升，这是过去的三十年中除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唯一有此问题的地区。1989 年至 1994 年期间，俄罗斯新出生男性的寿命预期降低了 6.6 年（从 64.2 岁降低到 57.6 岁），而壮年男性受到的打击

最为严重。研究认为酒精消费量的增加和社会心理压力的加大是引起男性死亡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安全网的削弱是导致酒精消费量增加和社会心理压力加大的原因。[98] 更宽泛地讲，世界范围内男性因酒精和药物滥用引起的死亡率和残疾率高于女性。[99]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随着第一轮 HIV 病毒对以男性为主的静脉注射吸毒者的侵袭，男性死亡率上升。由于病毒从商业性性工作者到顾客，接着再到顾客的配偶的扩散需要一个过程，病毒在异性恋人群中的传播要晚得多，男性死亡率较早达到顶峰，而且其死亡率要高于女性的死亡率。[100] 此外，女性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比例（53%）要高于男性，男性患病的严重程度通常要高于女性。[101] 研究指出，纵容男性婚前或婚后结伴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关系的风险性性行为的社会规范得到广泛承认。[102] 而相比之下，社会要求女性婚前禁欲，婚后对丈夫忠诚。[103]

较高的男性死亡率并不只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特征，无论较高的男性死亡率是由吸毒、暴力犯罪还是风险性性行为引起的。这类行为在工业化世界的男性人口中也很流行，女性的平均寿龄要比男性长 5~10 年。遗传并不是女性寿命优势的唯一原因（且即使在遗传因素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仍然具有可塑性）。研究显示死亡率差异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女性相比，男性抽烟更多，饮食更不规律，内化压力的方式也不同。任何一方面的改善都将缩短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

该发现提出了一个更切中肯綮的问题：导致男性冒险行为及药物滥用，从而增加健康风险的因素有哪些？社会对这些男性行为的纵容，是否因为这些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大丈夫”或“男人气概”的理想，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这或许就是事实，至少在高收入国家中，卫生健康体系开始同时重视改变“行为”和改进制度。尽管影响行为变化的政策杠杆是多方面的、难以精确到位的（毕竟，这要求从对身体的理解转向对大脑的理解），西方国家反吸烟运动的成功表明，当今世界正在应对这个挑战。[104]

薄弱的制度和糟糕的默认选择

重复一遍，每年出生时失踪的女孩和年龄不足 60 岁的超额女性死亡人数将近 390 万。冲突和冒险行为引起的男性超额死亡现象，也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亡风险还在加剧。降低女性出生后死亡风险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制度性的：为婴幼儿提供洁净水和卫生健康设施、更好地护理孕妇妈妈、减少 HIV 病毒/艾滋病，以及某些国家在女性育龄期提供的得到改善的家庭规划服务。

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长达一个世纪的医学知识的增加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改善洁净水和卫生设施的供给制度，也没有改善对产妇的护理。现在，即使没有洁净水，父母也知道让孩子饮用烧开的水。即使孩子得了腹泻，大多数父母也知道如何做。家庭总能够把怀孕的妈妈带到医院。这些私人的解决方案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私人采取的措施并没有考虑患病儿童也感染了其他儿童的事实。这些传染性疾病的“外部性”造成了私人行动广为人知的投资不足问题。

第二，当私人行为运作很好但可

供选择的方式很少，现实可能非常不同。全世界的穷人都被迫去做许多许多选择（大多数是不好的选择），孩子每一次生病时，他们应当到哪里取得木柴烧水，他们应当从哪里得到糖，他们是否应当走五个小时的路把孩子送到医生那里，医生会收多少钱，如果孩子需要被背过去，妈妈应当等丈夫回来吗？如果事情不顺利，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各地的穷人不得不对许多富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做出许多选择和许多决定。制度不好时，人们的选择也是如此，“自由选择”蜕变为“被迫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疾病和许多生命攸关的选择引起了超额死亡。

为解释这些观点，让我们看看为一个贫困村庄患病儿童提供补水溶液治疗方案的例证：

> 高个子男人指着正在给孩子喂奶的青年女子说，“瞧，你瞧那儿，孩子烧得滚烫。昨天我步行跑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抓药。昨天在镇上，我花光了所有的钱，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到家中，可是药根本就没有作用”。我摸了摸孩子的额头，额头很烫，他拼命地吮吸着奶头，但是母亲的奶水好像并不充足。我问那位母亲她是否吃了什么东西。这时，其他人加入了谈话，说他们在等某个男人回来。屋子里没有食物。如果有男人找到办法弄来些大米或粗粮，她们就可以做点儿吃的东西。谈到孩子的情况时，我问她们是否知道以补水溶液治疗的方法。她们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助产护士居然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小村庄……
>
> 陪同我的头领开始辩护起来。他说如果这些人不前来，如果这些人不告诉我们什么困扰了她们，我们又如何帮助他们呢？我要求头领向年轻的妈妈及坐在她旁边年长一点的女性解释为婴儿补水是多么的重要。头领开始用方言解释，“你们家里有盐，不是吗？那么，取这么多的糖放在这么多的水里，把水煮开，然后放一撮盐，再挤几滴柠檬进去。家里没有糖？那好，到村子里找个人要点儿，如果你说自己需要糖，他们可能不会给你，但如果你说你需要糖来救孩子的性命，他们肯定会给你一把。女人点了点头。“你们去哪里取水啊？”我问她们。现在新的问题来了，因为最近的抽水井不能用了。他们的饮用水都来自附近那条不流动的、不干净的小溪。头领告诉婴儿的祖父说必须把那些水煮开，然后冷却。我开始明白了这处境多么令人绝望。没有糖，没有洁净的饮用水来源，燃料匮乏。但是那个醉酒的男人又一次愤怒了，“不论你们说什么，我们不会到别人的家门口乞讨。”女性则更专心地听着，我想她们愿意照我们说的去做。“但是别一次全部喂给孩子，”我说，“一小口一小口的喂给他。”（我怎么做示范呢？）女人拿来了一片树叶，卷成勺子状，说“就像这样？”头领承诺送一盒补水溶液来帮助她们。[105]

这不是个绝无仅有的故事。以产妇死亡为例。技术上，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足够的治疗，产妇死亡人数将大大减少。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来自加纳、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的开创性研究显示，即使女性被送到了医院，治疗的延迟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 今天，帮助我们做家务活儿的玛丽迟到了。我因此责备了她，并问她为什么迟到了。她说她的一个老乡……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在医院了。这是她的第五次分娩。她并没有居住在偏僻的小村庄，相反，她就住在索

科托市。她到达医院的时间也不晚，她是准时到达的……等他们找到去医院的运输工具，等他们尽力为她办好了就诊卡，等她入院，等填好她的医疗档案，等到去叫助产士，等助产士吃完饭，等助产士到来，等丈夫跑去买手套，等手套被拿到医院，等到去叫助产士，等到助产士到来，等助产士给她做检查，等到开始流血……等到去叫医生，等到能够找到医生，等到用救护车去找医生，等到医生到来，等到丈夫跑去买药、静脉输液器械包、点滴和酒精，等到丈夫跑遍小镇寻找血袋，等到丈夫找到了血袋，等到丈夫由于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化验、敷料剂和液体上而恳求药剂师降低价格，等到去叫血液学家，等到血液学家到来，等到从可怜的、疲惫不堪的丈夫身上抽取血液……等到白班护士和夜班护士换岗、等到白班医生和夜班医生换岗，等到助产士再次出现、等到医生到来、等到所有的一切手续履行完毕和丈夫在同意书上签了字，女人死了。今天，她的丈夫想把药品和其他他们从未使用过的东西卖掉，以便他可以将妻子的尸体送回他们的家乡，但是他在医院里再也找不到妻子（的尸体）了。[106]

从认识到危险信号的那一刻起，安全分娩过程的每一步都是问题重重。[107] 即使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信号，家庭“也意识到在缺少经过培训的医生或助产护士、在血源匮乏成为常态、在设备频繁坏掉的情况下，她可以使用的医疗设施不多。如果知道她们可能得不到护理，知道她们甚至可能死在医院里，人们就不会自寻麻烦去寻求护理。[108] 即使是第一阶段（即发现危险信号）的发现也不是用医疗设施完成的。例如，子痫前症是一种怀孕期间威胁生命的高血压状况，对医疗服务者知识的研究显示，接受调查的医疗服务者中，能够将教科书中的案例与医院实例相参照的不足 25%。[109] 这些问题并不限于产妇死亡，例如，对疟疾引起的死亡的研究显示，75%的死者都曾经接受过健康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有些还曾接受过多家机构提供的服务。[110]

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带来巨大的回报。非洲 40%最穷的人口能够获得的安全饮用水有限，最有可能饮用污染水源的水。[111] 在取水点对水进行处理可以极大地减少腹泻的发生，其影响可以与洗手和卫生设施相当（而从源头上治理水的效果较差，因为水源可能再次被污染）。提高阿根廷城市地区自来水和卫生设施的覆盖率减少了由污水引起的疾病，从而使儿童死亡率降低了 8%。[112] 类似地，在 20 世纪之交，洁净水获取使美国的死亡率降低了将近一半，婴儿死亡率降低了 3/4，儿童死亡率降低了 2/3。[113] 女孩获得的回报更高。而对源头水处理的随机评估显示，只有 3 岁以下女孩的腹泻发病率下降了。[114]

这些发现激发了关于不同水处理类型之间的效益和家庭购买洁净水意愿的争论。对没有深入了解洁净水细微差别的局外人来说，该争论与今天富裕国家的历史选择大相径庭。以对肯尼亚水处理的粗略评估为例：家庭不愿意为了获得洁净水而多走 3.5 分钟的路。[115] 解释之一在于了解洁净水的作用恰恰是一件难事。即使家庭完全了解了腹泻病的致病源，但由于对总体疾患载荷中的削减并不大，再加上缺乏显著的营养成果，个体家庭很难“推断出”洁净水可以改善健康结果的结论（对研究者而言，这正是除非样本足够大——远远大于一个家庭所能获得的样本——否则任何对死亡率进

行干预的影响都不可能被确定的原因所在）。此外，当几率很小而支出额很大时，个体就很难进行理性的计算。

历史模式是另一种选择，即只有在使用水时才通过管道提供洁净水，确保家庭在知识匮乏的不确定环境中做出的特别选择得到满足，而复杂的评估模型，无论是如何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或使用哪种特定水源的水，都是不相关的。尽管这一解决方案常常被视为“过于”昂贵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的费用和什么相比较却从来没有明确规定：美国将死亡成本纳入考虑范围，得出提供洁净水的社会回报率是 23:1。[116] 众所周知，洁净水大大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数量。本报告在这里得出如下推论，即洁净水也将大幅度降低女婴和幼年女孩超额死亡的人数。

同样，降低产妇死亡率需要整个系统的方方面面运作起来。女性在怀孕之前需要补充叶酸、进行产前检查、识别可能的危险状况、以标准流程分娩，以及正常运转的医院。此外，当前体制强加给家庭的无数个选择（去哪家医院，从哪里获得血源，从哪里获得药品，应当去哪里找医生）需要排除在外。制度化解决方案减少了人们所需要做出的选择，使她们从被迫做出选择的处境中脱离出来，使她们可以自由选择。

当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即仅仅制度改善是否会产生作用，即使是在歧视问题突出的地区，如南亚的部分地区。尽管仅靠制度改善可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毫无疑问它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部分原因在于，当家庭有了洁净水，那么男孩或女孩生病时就不存在是否要烧水的问题。此外，歧视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并不要求家庭以差别很大的方式对待女孩和男孩。男孩和女孩治疗方式的细微差别可能最终会导致在死亡率上的巨大差异，这是因为在某一个时点发生的致命的、不可逆转的问题。比如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婴儿从出生到五岁期间患病的次数为 50~70 次，孩子每次患病时让男孩存活率保持在 99.997%和女孩存活率保持在 99.992%的行动，可以解释婴儿时期男孩死亡率为 11%和女孩死亡率为 13%的差异。在歧视行为并没有成为严重劣势的环境中，制度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不是通过减少歧视行为本身，而是将其改变为无关紧要的事情。

关于制度改革是如何通过洁净水、卫生设施和产妇护理改善公共健康的问题，将在第 7 章中得到进一步讨论。

技术附件 3.1

计算出生时失踪女孩的流量和育后女性的超额死亡率

本报告采取了两种标准：出生时失踪女孩和出生后女性超额死亡数量。本报告通过将出生时性别比例与没有遭遇歧视的可比人口的性别比例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出生时失踪女孩的数量。可比人口通常是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可比人口是美国的黑人群体。[117] 本报告通过将各国家各年龄的男性—女性死亡比率与 2000 年高收入国家同等年龄的男性—女性死亡比率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女性超额死亡的人数 [118]。这给出了任何既定年龄段的女性超额死亡人数；然后根据年龄组别或生命过程对所有年龄段的超额死亡人数进行加总计算，从而得出相应的估测值。本标准所显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超额死亡问题已经在文献中得到讨论。[119] 我们对本方法所要求的假设进

行讨论，并突出强调可能引起的问题。

对女性超额死亡人数计算方法的自然解释涉及与“参照”国家群体的比较。

另一种解释是我们将女性和男性基于年龄的死亡数据分布函数概括为一个简单的数字，通过（a）假定一个函数形式，将各年龄的男性和女性的相对风险加总（b）对各年龄段的相对风险进行加权。因此，我们对所有年龄段进行加总的标准 $\sum w_i \cdot h\,[g(\text{男性}_a), q(\text{女性}_a)]$ 有兴趣。第一次约简是函数形式，即 $h[g(\text{男性}_a), q(\text{女性}_a]=\text{男性}_a / \text{女性}_a$。第二次约简是各年龄段的权重集合，$w_i$ 是高收入国家男性与女性死亡率的比率。

图 5A.1 绘制了五种情景下男性和女性在任何年龄阶段的相对死亡风险，这五类情景包括：“参照”国高收入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作为参照国的高收入国家中，男性和女性在幼年时期的死亡率是相近的，接着急剧上升，20 岁时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平稳，到 60 岁时留下一个不太高的峰。高收入国家 15~60 岁群体的总体死亡率非常低。中国的模式与作为参照的高收入国家非常相似。而在印度，幼童的相对风险显著较低，但是直到 50 岁，曲线一直在靠拢，然后又开始分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儿童幼年时期的相对死亡风险和参照国家相近，但是 10 岁以后情况就开始恶化，始终处于印度之下。在俄罗斯，男性相对死亡风险从 20 岁开始就远远高于参照国家，并且一直到 80 岁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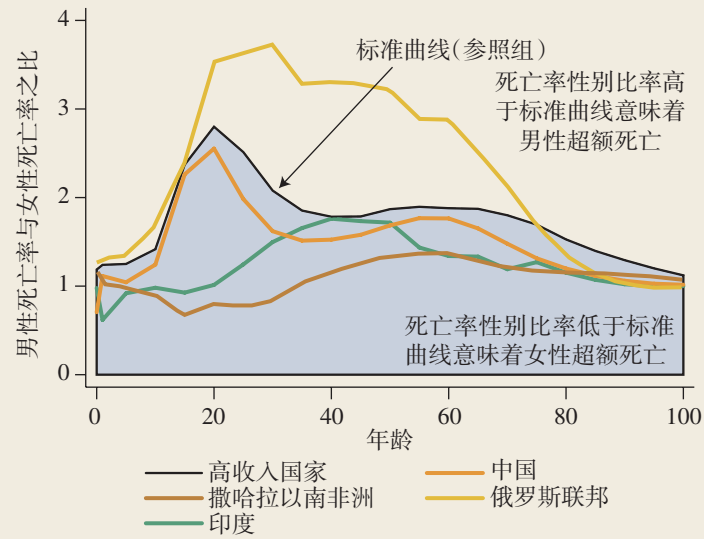
就女性超额死亡人数而言，根据参照组加权意味着如果一国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相同，那么 10~30 岁的人口就要使用较高的权数，这是因为在参照国家里，差别最大的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在总体死亡率不高的国家中，加权的影响较小，但是在总体死亡率高的年龄段中，加权的影响就凸显了出来。而男性超额死亡则相反。其后果是：

1. 参照组死亡数据曲线的任何变动都将改变女性超额死亡的计算结果。因此我们在分析比较时，自始至终都采用了同一个参照组。

2. 各年龄段死亡率差异的变动（例如，行为变化引起的各年龄段相对死亡风险的变化）或总体死亡率曲线形态发生了变化而比率保持不变（例如，将死亡载荷从较为年轻的群体转向年岁较大的群体）都可能会引起男性和女性成人死亡率差异的扩大。

3. 选择效应可以使年龄—死亡率曲线发生偏离，在死亡率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能够活到一定年龄的人和早亡的人可能具有系统性差异。这类效应意味着存活群体的存活几率和哪些群体成员死的较早的群体不同，由此引起的选择偏差会影响对超额死

图 3A.1　特定年龄的死亡率性别比率，2008 年



资料来源：工作组基于世界卫生组织 2010，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09 的数据得出的计算值。

亡的估测。

4. 以比率作为概括性指标意味着如果男性死亡率下降，女性超额死亡率将上升（如同厄立特里亚或利比里亚那样）。本章研究具体的死亡风险，保证重点问题不落入这个范畴，并提醒读者以防误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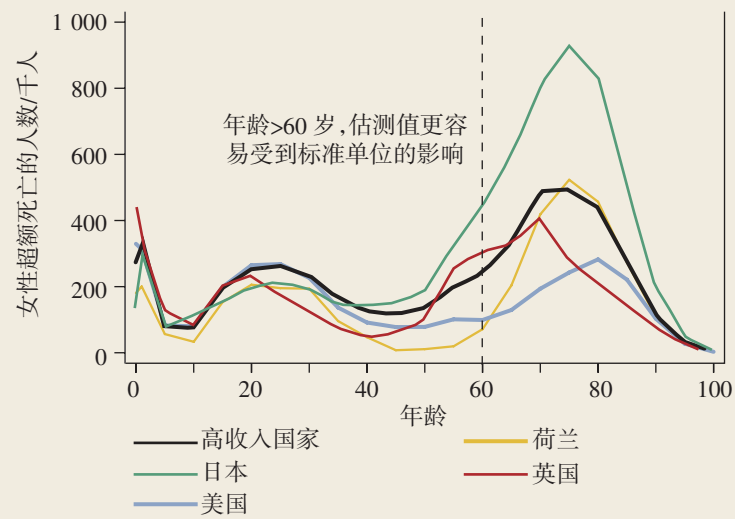
对死亡率函数的任何概括都会使用假设，这一特定的加权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死亡率曲线相接近，而且在与 60 岁以下的各种不同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时相当稳定。图 5A.2 将之与使用替代性参照群体（2000 年的美国、2000 年的日本、2000 年的荷兰和 1960 年的英国）计算出来的女性超额死亡人数进行了比较。日本女性的寿命预期超乎寻常的高，荷兰的交通事故率最低（交通事故致使许多青年人死亡），而 1960 年的英国代表了在抽烟引起男性额外死亡之前的死亡率曲线（抽烟盛行引起的最大性别差异体现在 1900 年组，抽烟引起的额外死亡则发生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中）。[120] 一直到 60 岁，使用不同参照群体的女性超额死亡人数大体相当，此后则迅速分化。

除了模型稳定性问题，选择高收入国家的数据作为权数确保人们充分理解参照群体的风险，从而使加权方案引起的问题更加透明化。选择较少被研究的环境会加大理解加权方案所产生的影响的难度。

替代性的权数标准包括富裕国家的死亡历史数据。本文关于“失踪女性”的概念强调识别纯粹由歧视引起的女性死亡人数。[121] 通过将今天的死亡数据与历史数据相比较，文献力图控制整体的制度环境和死亡风险。相比之下，本章并不尝试抹杀制度的区别，而是将制度融为一体。如果历史死亡模式反映了当前的死亡数据加产妇死亡引起的额外死亡数，歧视措施将力图“控制”高产妇死亡率。相比之下，我们对可以通过强调产妇死亡率就可避免的那一部分女性（和男性）死亡有兴趣。原因有二。首先，本章平等对所有类型的死亡一视同仁。如果采用历史死亡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种描述大错特错。也许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存在歧视引起的死亡，但是薄弱的制度和艾滋病/HIV 病毒结合在一起，使非洲大陆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女性生存区之一。第二，完善制度、提高服务提供质量和应对全球健康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

关于数据的最后注释。本章所采用的成员国生命表摘自世界卫生组织 1990 年、2000 年和 2008 年的数据，人口预测摘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这里所罗列的精确数字将随着 2011 年的生命表和新的人口普查的更新而更新。尽管我们提高了数据的精准性，但是许多国家的数据只是基于调查和推论的估测值。其他数据进行交叉检视确保了结果并不依赖任何一

图 3A.2 使用不同参照群体得出的 2008 年世界各年龄段超额女性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工作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0、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2009 数据的计算值。

种特定的方法。本章展现了一幅全球图景。只强调表面上乐观的数据可能导致忽略暗藏的严重问题。问题并不在于现有数据的具体化，而在于强调死亡风险的地理和年龄剖面，以在将来获得更好的数据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本章小结：在只需消除家庭、市场或制度中的一项障碍因素即足以改善结果的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缩减教育领域和健康领域性别差异的重大进展。但是，当需要同时消除多个阻碍因素或某一切入点导致瓶颈制约时，缩减性别差异的努力进展缓慢

所见所闻

尽管不平等现象依然顽固地盘踞在极度弱势人口中，但无论在哪个水平上，教育参与的性别差异都已经大大缩减。此外，男性和女性依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学习，学科分割模式在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很相似。最后，在许多收入较低的国家中，男孩和女孩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很少。

向男性偏斜的性别比率仍然在中国、印度部分地区、高加索和西巴尔干地区某些国家持续存在。和高收入国家的同侪相比，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女孩和成年女性（相对于男孩和成年男性）面临的死亡风险比较高。虽然这种“女性超额死亡”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但是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女性超额死亡的人数已经大大降低了。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明显是个例外，女性超额死亡率不降反升。

为什么我们的所见是这样？

教育

消除家庭（更稳定的收入）、市场（增加教育回报）或正式制度（降低教育成本）等任一项障碍，就可以在所见教育性别差异方面取得进展。缺乏经济动因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交织在一起，是造成严重弱势群体中女性劣势持续存在的原因。

比较之下，女孩和男孩教育路径的分化在于不同的障碍同时发挥作用影响人们的选择。这些障碍包括教育体制内部的模式、限制女性职业选择的家庭性别角色规范和雇主对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的偏见。

健康

表现为儿子偏好的公开歧视、出生前性别选择的增加，以及生育率的降低，是导致出生时性别比率向男性偏斜的基本原因。而且，出生后，由于公共卫生和服务提供制度薄弱，出现了女性幼童时期和育龄期的超额死亡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HIV 病毒/艾滋病风险加剧了问题在后一阶段的严峻性。

政策启示

首先，教育领域还需要我们为严重弱势群体做大量的工作，无论是通过制定针对具体情景的策略还是通过减少制度的瓶颈制约因素（例如学校建设）和减少家庭限制（例如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其次，改善学习成果，以使女孩和男孩能够参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是当务之急。再次，要减少学习领域分割，以使男性和女性能够发展自身所愿意从事的职业技能，要求家庭、市场和制度同时发生变化。

非正式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家庭的行为方式（比如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变革），从而将解决出生时女孩失踪问题。最后，减少出生后女性超额死亡人数要求改善正式制度：为幼童提供洁净水和卫生设施，改善育龄期产妇护理，并降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HIV 病毒/艾滋病的感染率。

注释

1. Chen，Huq 和 D’Souza 1981。
2. Case，Ferting 和 Paxson 2005。
3. Case 和 Deaton 2003；Cawley 2004；Case，Ferting 和 Paxson 2005。
4. Strauss 和 Duncan 1995。
5. Currie 和 Moretti 2003。
6. Chou 等 2007。
7. Andrabi，Das 和 Khwaja 2009。
8. 世界卫生组织 2010。
9. Albanesi 和 Olivetti 2010。
10. Jayachandran 和 Lleras-Muney 2009。
11. Albanesi 和 Olivetti 2010。
12. Bhaskar 2011a；Bhaskar 2011b。
13. Hoyos 和 Narayan 2011。
14. Oster 和 Millet 2010。
15. Jensen 2010。
16. Avenstrup，Liang 和 Nellemann 2004。

17. Andrabi，Das 和 Khwaja 2008。

18. Burde 和 Linden 2010。

19. Guarcello，Lyon 和 Rosati 2006。

20. Duryea 和 Arends-Kuenning 2003。

21. Guarcello，Lyon 和 Rosati 2006。

22. Ibid。

23. Nankhuni 和 Findeis 2004；Charmes 2006。

24. Assaad，Levison 和 Zibani 2010。

25. Ilahi 1999。

26. Kabubo-Mariara 和 Mwabu 2007。

27. Behrman 和 Knowles 1999；Brown 和 Park 2002；Qian 2008。

28. Jensen 2000。

29. Tansel 2002。

30. Cameron 和 Worswick 2001；Chaudhury，Christiaensen 和 Asadullah 2006。

31. Ferreira 和 Schady 2009。

32. Maluccio 2005；McKenzie 2003；López Bóo 2008。

33. Fiszbein 等 2009；de Janvry 等 2006。

34. Andrabi 等 2007。

35. Jacoby 和 Mansuri 2011。

36. Miske，Meagher 和 DeJaeghere 2010。

37. 牙买加教育部 2009。

38. Jha 和 Kelleher 2006。

39. 世界银行 2011。

40. Back，Coulibaly 和 Hickson 2003。

41. Burde 和 Linden 2010。

42. Kazianga，de Walque 和 Alderman 2009。

43. 世界银行 2009。

44. Akresh，de Walque 和 Kazianga 2011。

45. Back，Coulibaly 和 Hickson 2003。

46. 世界银行 2011。

4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统计研究所数据库。

48. Flabbi 2011。

49. Giles 和 Witoelar 2011；Flabbi 2011。

50. Lee 和 Collins 2010。

51. Dercon 和 Singh 2011。

52. Waldron 1998；Waldron 2000；和 Waldron 2003。

53. 世界卫生组织 2010。

54. de Walque and Filmer 2011。数据覆盖撒哈拉以南非洲约 88%的人口和撒哈拉以南以外的非洲发展中国家 14%的人口。

55. Rajaratnam 等 2010。

56. Chahnazarian 1988。

57. Anderson 和 Ray 2010。

58. 关于例证，请见，Filmer，King 和 Pritchett 1998。

59. Coale 1984；Das Gupta 1987；Sen 1992。

60. Jha 等 2006；Das Gupta 等 2003。

61. Bhalotra 和 Cochrane 2010；Yi 等 1993；Park 和 Cho 1995。

62. Bharadwaj 和 Nelson 2010。

63. Ibid。

64. Abrevaya 2009。

65. Yamaguchi 1989，Jensen 2005 展开论述。

66. Filmer，Friedman 和 Schady 2008。

67. Jayachandran 和 Kuziemko，待出版。

68. Chung 和 Das Gupta 2007。

69. 世界银行 2005；Tarozzi 和 Mahajan 2007。

70. Rose（1999），Rosenzweig 和 Schultz（1982），Foster 和 Rosenzweig（1999），和 Carranza（2010）等都记录了这种联系。

71. Rahman 和 Rao 2004。

72. Dyson 和 Moore 1983。

73. Chen，Huq 和 D'Souza 1981；Das Gupta 1987；Basu 1989。

74. Hill 和 Upchurch 1995；Svedberg 1990；Case 和 Deaton 2003。

75. Ali 等 2011。

76. Cutler 和 Miller 2005。

77. Drevenstedt 等 2008。

78. Okoko，Enwere 和 Ota 2003；Shulman 1999；Rush 2000。

79.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世界银行 2010。

80. Jayachandran 和 Lleras-Muney 2009。

81. Albanesi 和 Olivetti 2010。

82. Noymer 和 Garenne 2000。

83. Högberg 和 Wall 1986，以及 Berry 1977。

84. Trussell 和 Pebley 1984；Fortson 2011；Chen 等 1974。

85. May，待出版；Joshi 和 Schultz 2007；Miller 2005。

86.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10b。

87.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10a。

88. Corno 和 de Walque 2007；de Walque 2009。

89. 纽约时报 2004。

90. Glynn 等 2001。

91. Case 和 Paxson 2011。

92.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010a。

93. Obermeyer，Murray 和 Gakidou 2008。

94. Jacoby 和 Mansuri 2011；国际监狱研究中心，http：//www.prisonstudies. org/2001。

95. Rios 2009。

96. Briceño-León，Villaveces 和 Concha-Eastman 2008。

97. Márquez 1999；Zubillaga 和 Briceño-León 2001。

98. Brainerd 和 Cutler 2005。

99. 世界卫生组织 2004。

100. Weniger 等 1991；Surasiengsunk 等 1998；Le Coeur 等 2009。

101. Le Coeur 等 2009；Braitstein 等 2008；Leusaree 等 2002。

102. Maticka-Tyndale 等 1997；Saengtien-chai 等 1999；VanLandingham 等 1998。

103. Knodel 等 1999。

104. Hopkins 等 2001。

105. Das 1999。

106. Thaddeus 和 Maine 1994。

107. Ibid。

108. Thaddeus 和 Maine 1994。

109. Das 和 Hammer 2005。

110. de Savigny 等 2004。

111. Foster 和 Briceño-Garmendia 2010。

112. Galiani，Gertler 和 Schargrodsky 2005。

113. Cutler 和 Miller 2005。

114. Kremer 等，待出版。

115. Ibid。

116. Cutler 和 Miller 2005。

117. Chahnazarian 1988。

118. Anderson 和 Ray 2010。

119. Obermeyer 等 2010；Anderson 和 Ray 2010。

120. Preston 和 Wang 2006。

121. Klasen 1994；Klasen 和 Wink 2002。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revaya, Jason. 2009. "Are There Missing Girl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Birth Data." *Applied Economics* 1 (2): 1–34.

Akresh, Richard, Damien de Walque, and Harounan Kazianga. 2011. "Gender and Conditionality: Cash Transfers and Children's Schooling."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Albanesi, Stefania, and Claudia Olivetti. 2010. "Maternal Health and the Baby Boom." Working Paper Series 1614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li, Rabia, Jishnu Das, Damien de Walque, Kenneth L. Leonard, Mattias Lundberg, and David Peters. 2011. "Patterns of Health Care Interactions in Seve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Almond, Douglas, Lena Edlund, and Kevin Milligan. 2009. "O Sister, Where Art Thou? The Role of Son Preference and Sex Choice: Evidence from Immigrants to Canada." Working Paper Series 1539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nderson, Siwan, and Debraj Ray. 2010. "Missing Women: Age and Diseas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 (4): 1262–300.

Andrabi, Tahir, Jishnu Das, and Asim Ijaz Khwaja. 2008. "A Dime a Day: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Private Schooling in Pakist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2 (3): 329–55.

———. 2009. "What Did You Do All Day? Maternal Education and Child Outcom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ndrabi, Tahir, Jishnu Das, Asim Ijaz Khwaja, Tara Vishwanath, Tristan Zajonc, and LEAPS Team. 2007. *Pakistan: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Punjab Schools (LEAPS): Insights to Inform the Education Policy Debat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ssaad, Ragui, Deborah Levison, and Nadia Zibani. 2010. "The Effect of Domestic Work on Girls'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gypt." *Feminist Economics* 16 (1): 79–128.

Avenstrup, Roger, Xiaoyan Liang, and Soren Nellemann. 2004. *Kenya, Lesotho, Malawi and Uganda: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Report 3076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ack, Lucien, N'gra-zan Christophe Coulibaly, and Karen Hickson. 2003. *Evaluation of the African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 Country Case Study: Burkina Faso.* Paris: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Basu, Alaka Malwade. 1989. "Is Discrimination in Food Really Necessary for Explaining Sex Differentials in Childhood Mortality?" *Population Studies* 43 (2): 193–210.

Behrman, Jere R., and James C. Knowles. 1999. "Household Income and Child Schooling in Vietnam."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3 (2): 211–56.

Berry, Linda G. 1977. "Age and Parity Influences on Maternal Mortality: United States, 1919–1969." *Demography* 14 (3): 297–310.

Bhalotra, Sonia, and Tom Cochrane. 2010.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Identifying Sex Selection in India." University of Bristol, Working Paper Series 10/254, Centre for Market and Public Organisation, Bristol, U.K.

Bharadwaj, Prashant, and Leah K. Nelson. 2010. "Discrimination Begins in the Womb: Evidence of

Sex-Selective Prenatal Investm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La Jolla, CA. Processed.

Bhaskar, V. 2011a. "Corrigendum: Sex Selection and Gender Bala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3 (2): 52–53.

———. 2011b. "Sex Selection and Gender Bala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3 (2): 14–44.

Brainerd, Elizabeth, and David M. Cutler. 2005. "Autopsy on an Empire: Understanding Mortality in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orking Paper 940.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nn Arbor, MI.

Braitstein, Paula, Andrew Boulle, Denis Mash, Martin W. Brinkhof, Francois Dabis, Christian Laurent, Mauro Schechter, Suely H. Tuboi, Eduardo Sprinz, Paolo Miotti, Mina Hosseinipour, Margaret May, Matthias Egger, David R. Bangsberg, Nicola Low, and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 Lower Income Countries (ART-LINC) Study Group. 2008. "Gender and the Use of Retroviral Treatment in Resource-Constrained Settings: Findings from a Multicenter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17 (1): 47–55.

Briceño-León, Roberto, Andrés Villaveces, and Alberto Concha-Eastman. 2008. "Understanding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Homicide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7 (4): 751–7.

Brown, Philip H., and Albert Park. 2002. "Education and Poverty in Rural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1 (6): 523–41.

Burde, Dana, and Leigh L. Linden. 2010. "The Effect of Village-Based School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Processed.

Cameron, Lisa A., and Christopher Worswick. 2001. "Education Expenditure Responses to Crop Loss in Indonesia: A Gender Bi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2): 351–63.

Carranza, Eliana. 2010. "Soil Endowments,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Missing Women in Indi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Case, Anne, and Angus Deaton. 2003. "Consumption, Health, Gender, and Povert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02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ase, Anne, Angela Ferting, and Christina Paxson. 2005. "The Lasting Impact of Childhood Health and Circumstance."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4: 365–89.

Case, Anne, and Christina Paxson. 2011. "The Impact of the AIDS Pandemic on Health Services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Demography* 48 (2): 675–97.

Cawley, John. 2004. "The Impact of Obesity on Wag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9 (2): 451–74.

Chahnazarian, Anouch. 1988. "Determinants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Social Biology* 35 (3–4): 214–35.

Charmes, Jacques. 2006.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Time Use in Africa from UN-Sponsored Surveys." In *Gender, Time Use, and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 ed. C. Mark Blackden and Quentin Wod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haudhury, Nazmul, Luc Christiaensen, and Mohammad Niaz Asadullah. 2006. "Schools, Household, Risk, and Gender: Determinants of Child Schooling in Ethiopia." Working Paper 250,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African Economies, Oxford, U.K.

Chen, Lincoln C., Melita C. Gesche, Shamsa Ahmed, A. I. Chowdhury, and W. H. Mosley. 1974. "Maternal Mortality in Rural Bangladesh."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5 (11): 334–41.

Chen, Lincoln C., Emdadul. Huq, and Stan D'Souza. 1981. "Sex Bias in the Family Allocation of Food and Health Care in Rural Bangladesh."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7 (1): 55–70.

Chou, Shin-Yi, Jin-Tan Liu, Michael Grossman, and Theodore J. Joyce. 2007.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aiwan." Working Paper Series 1346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Chung, Woojin, and Monica Das Gupta. 2007. "The Decline of Son Preference in South Korea: The Roles of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 (4): 757–83.

Coale, Ansley J. 1984.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Corno, Lucia, and Damien de Walque.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HIV Infection and Related Sexual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Lesoth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42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urrie, Janet, and Enrico Moretti. 2003. "Mother's Educa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College Opening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1495–532.

Cutler, David M., and Grant Miller. 2005. "The Role of Public Health Improvements in Health Advances: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42 (1): 1–22.

Das Gupta, Monica. 1987. "Selectiv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 Children in Rural Punjab, Ind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 (1): 77–100.

Das Gupta, Monica, Jiang Zhenghua, Li Bohua, Xie Zhenming, Woojin Chung, and Bae Hwa-Ok. 2003. "Why Is Son Preference so Persistent in East and South Asia?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China,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0 (2): 153–87.

Das, Jishnu, Quy-Toan Do, Karen Shaines, and Sowmya Srinivasan. 2009. "U.S. and Them: The Geography of Academic Researc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15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as, Jishnu, and Jeffrey Hammer. 2005. "Which Doctor? Combining Vignettes and Item Response to Measure Clinic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8 (2): 348–83.

Das, Veena. 1999. "Public Good, Ethics, and Everyday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Bioethics." *Daedalus* 128 (4): 99–133.

de Janvry, Alain, Frederico Finan, Elisabeth Sadoulet, and Renos Vakis. 2006. "Can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Serve as Safety Nets in Keeping Children at School and from Working when Exposed to Schock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9 (2): 349–73.

de Savigny, Don, Charles Mayombana, Eleuther Mwageni, Honorati Masanja, Abdulatif Minhaj, Yahya Mkilindi, Conrad Mbuya, Harun Kasale, and Graham Reid. 2004. "Care-seeking Patterns for Fatal Malaria in Tanzania." *Malaria Journal* 3 (1): 27.

de Walque, Damien. 2009. "Does Education Affect HIV Status? Evidence from Five African Countri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3 (2): 209–33.

de Walque, Damien, and Deon Filmer. 2011. "Trends and Socio-Economic Gradients in Adult Mortality around the Developing Worl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1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en Boer, Andrea M., and Valerie M. Hudson. 2004. "The Security Threat of Asia's Sex Ratios." *SAIS Review* 24 (2): 27–43.

Dercon, Stefan, and Abhijeet Singh. 2011. "From Nutrition to Aspirations and Self-Efficacy: Gender Bias over Time among Children in Four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U.K. Processed.

Drevenstedt, Greg L., Eileen M. Crimmins, Sarinnapha Vasunilashorn, and Caleb E. Finch. 2008. "The Rise and Fall of Excess Male Infant Mortality." *PNAS* 105 (13): 5016–21.

Duryea, Suzanne, and Mary Arends-Kuenning. 2003. "School Attendance, Child Labor, and Local Labor Market Fluctuations in Urban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31 (7): 1165–78.

Dyson, Tim, and Mick Moore. 1983. "On Kinship Structure, Female Autonom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in Ind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 (1): 35–60.

Ferreira, Francisco H. G., and Norbert Schady. 2009. "Aggregate Economic Shocks, Child Schooling, and Child Health."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4 (2): 147–81.

Filmer, Deon, Jed Friedman, and Norbert Schady. 2008.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and Son Preference in Fertility Decision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71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ilmer, Deon, Elizabeth M. King, and Lant Pritchett. 1998. "Gender Disparity in South Asia: Comparisons Between and Within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186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Fiszbein, Ariel, Norbert Schady, Francisco H. G. Ferreira, Margaret Grosch, Nial Kelleher, Pedro Olinto, and Emmanuel Skoufias.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labbi, Luca. 2011.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 Career Choic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on a Sample of OECD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Fortson, Jane G. 2011. "Mortality Risk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Impact of 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 (1): 1–15.

Foster, Andrew D., and Mark Rosenzweig. 1999. "Missing Women,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Series 49,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CA.

Foster, Vivien, and Cecilia Briceño-Garmendia, eds. 2010. *Africa's 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Agence Francaise de Développement and World Bank.

Galiani, Sebastian, Paul Gertler, and Ernesto Schargrodsky. 2005. "Water for Life: The Impact of the Privatization of Water Services on Child Mort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1): 83–120.

Giles, John, and Firman Witoelar. 2011. "Idonesia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Labor Markets in Indones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Glynn, J. R., M. Caraël, B. Auvert, M. Kahindo, J. Chege, R. Musonda, F. Kaona, and A. Buvé. 2001. "Why Do Young Women Have a Much Higher Prevalence of HIV than Young Men? A Study in Kisumu, Kenya and Ndola, Zambia." *AIDS* 15 (4): S51–S60.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8. "Transitions: Career and Family Life Cycles of the Educational Eli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2): 363–69.

Guarcello, Lorenzo, Scot Lyon, and Furio C. Rosati. 2006. "The Twin Challenges of Child Labor and Youth Employment in Ethiop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8,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Work Project, Rome.

Hill, Kenneth, and Dawn M. Upchurch. 1995.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1): 127–51.

Högberg, U., and S. Wall. 1986. "Age and Parity as Determinants of Maternal Mortality-Impact of their Shifting Distribution among Parturients in Sweden from 1781 to 1980."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64 (1): 85–91.

Hopkins, David P., Peter A. Briss, Connie J. Ricard, Corinne G. Husten, Vilma G. Carande-Kulis, Jonathan E. Fielding, Mary O. Alao, Jeffrey W. McKenna, Donald J. Sharp, Jeffrey R. Harris, Trevor A. Woollery, Kate W. Harris, and the Task Force on Community Preventive Services. 2001. "Review of Evidence Regarding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Tobacco Use and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 (2S): 16–66.

Hoyos, Alejandro, and Ambar Narayan. 2011. "Inequalities of Opportunities among Children: How Much Does Gender Matter." Background note for the WDR 2012.

Ilahi, Nadeem. 1999. "Gender and the Allocation of Adult Time: Evidence from the Peru LSMS Panel Dat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74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Jacoby, Hanan G., and Ghazala Mansuri. 2011. "Crossing Boundaries: Gender, Caste, and Schooling in Rural Pakista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1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Jamaic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 "Jamaica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8–2009." Annual Statistical Review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Kingston.

Jayachandran, Seema, and Ilyana Kuziemko. Forthcoming. "Why Do Mothers Breastfeed Girls Less than Boy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ld Health in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ayachandran, Seema, and Adriana Lleras-Muney. 2009. "Life Expectanc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Maternal Mortality Declin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1): 349–97.

Jensen, Robert. 2000. "Agricultural Volatility and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2): 399–404.

———. 2005. "Equal Treatment, Unequal Outcomes? Generating Sex Inequality through Fertility Behavior."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 2010.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ha, Jyotsna, and Fatimah Kelleher. 2006. *Boys' Under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An Exploration in Selected Commonwealth Countrie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Gender Section, and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Jha, Prabhat, Rajesh Kumar, Priya Vasa, Neeraj Dhingra, Deva Thiruchelvam, and Rahim Moineddin. 2006. "Low Male-to-Female Sex Ratio of Children Born in India: National Survey of 1.1 Million Households." *Lancet* 367 (9506): 211–18.

Joshi, Shareen, and T. Paul Schultz. 2007. "Family Planning as an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a Program's Consequences in Matlab, Bangladesh."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951,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Kabubo-Mariara, Jane, and Domisiano K. Mwabu. 2007. "Determinants of School Enrolment and Education Attai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Keny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75 (3): 572–93.

Kazianga, Harounan, Damien de Walque, and Harold Alderman. 2009. "Educational and Health Impacts of Two School Feeding Scheme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in Rural Burkina Fas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97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lasen, Stephan. 1994. "Missing Women Reconsidered." *World Development* 22 (7): 1061–71.

Klasen, Stephan, and Claudia Wink. 2002. "A Turning Point in Gender Bias Mortality? An Update on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8 (2): 285–312.

Knodel, John, Chapin Saengtienchai, Mark VanLandingham, and Rachel Lucas. 1999. "Sexuality, Sexual Experience, and the Good Spouse: Views of Married Thai Men and Women." In *Genders and Sexualities in Modern Thailand,* ed. Peter A. Jackson and Nerida M. Cook.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Kremer, Michael, Jessica Leino, Edward Miguel, and Alix Peterson Zwane. Forthcoming. "Spring Cleaning: Rural Water Impacts, Valu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e Coeur, Sophie, Intira J. Collins, Julie Pannetier, and Èva Lelièvre. 2009. "Gender and Access to HIV Testing and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s in Thailand: Why Do Women Have More and Earlier Acces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 (6): 846–53.

Lee, Fung King Jackie, and Peter Collins. 2010.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n and Hong Kong English Language Books."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9 (2): 121–37.

Leusaree, Tasana, Kanyapak Srithanaviboonchai, S. Chanmangkang, Lai Ying-Ru, and C. Natpratan. 2002. "The Feasibility of HAART in a Northern Thai Cohort: 2000-2001."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4th 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 Barcelona, July 7.

López Bóo, Florencia. 2008. "How Do Crises Affect Schooling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Changing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A Policy Experi-

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65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Maluccio, John A. 2005. "Coping with the 'Coffee Crisis' in Central America: The Role of the Nicaraguan Red de Protección Social." FCND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88,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Márquez, Patricia C. 1999. *The Street Is My Home: Youth and Violence in Caraca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icka-Tyndale, Eleanor, David Elkins, Melissa Haswell-Elkins, Darunee Rujkarakorn, Thicumporn Kuyyakanond, and Kathryn Stam. 1997. "Contexts and Patterns of Men's Commercial Sexual Partnership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Implications for AIDS Preven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4 (2): 199–213.

May, John F. Forthcoming. *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 Their Origin, Evolution, and Impact.* New York, NY: Springer.

McKenzie, David Y. 2003. "How Do Households Cope with Aggregate Shocks? 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Peso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31 (7): 1179–99.

Miller, Grant. 2005. "Contraception as Development? New Evidence from Family Planning in Colombia." *Economic Journal* 120 (545): 709–36.

Miske, Shirley, Margaret Meagher, and Joan DeJaeghere. 2010.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Education at the Level of Field Operations: The Case of CARE USA's Indicator Framework."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0 (4): 441–58.

Nankhuni, Flora J., and Jill L. Findeis. 2004. "Natural Resource-Collection Work and Children's Schooling in Malawi."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1 (2–3): 123–34.

New York Times. 2004. "The Feminization of AID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Noymer, Andrew, and Michel Garenne. 2000.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s Effects on Sex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 (3): 565–81.

Obermeyer, Ziad, Julie Knoll Rajaratnam, Chang H. Park, Emmanuela Gakidou, Margaret C. Hogan, Alan D. Lopez, and Christopher J. L. Murray. 2010. "Measuring Adult Mortality Using Sibling Survival: A New Analytical Method and New Results for 44 Countries, 1974–2006." *PLoS Medicine* 7 (4). e1000260. doi:10.1371/journal.pmed.1000260.

Obermeyer, Ziad, Christopher J. L. Murray, and Emmanuela Gakidou. 2008. "Fifty Years of Violent War Deaths from Vietnam to Bosnia: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World Health Survey Programm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6 (7659): 1482–86.

Okoko, Brown J., Godwin Enwere, and Martin O. Ota. 2003. "The Epidemiology and Consequences of Maternal Malaria: A Review of Immunological Basis." *Acta Tropica* 87 (2): 193–205.

Oster, Emily, and Bryce Millet. 2010. "Do Call Centers Promote School Enrollment? Evidence from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59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Park, Insook Hary, and Lee-Jay Cho. 1995. "Confucianism and the Korean Famil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26 (1): 117–27.

Peterman, Amber, Tia Palermo, and Caryn Bredenkamp. 2011. "Estimates and Determinants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1 (6): 1060–7.

Preston, Samuel H., and Haidong Wang. 2006. "Sex Mortality Dif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ole of Cohort Smoking Patterns." *Demography* 43 (4): 631–46.

Qian, Nancy.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51–85.

Rahman, Lupin, and Vijayendra Rao. 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Gender Equity in India: Examining Dyson and Moore's Thesis with New Dat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0 (2): 239–68.

Rajaratnam, Julie Knoll, Jake R. Marcus, Alison Levin-Rector, Andrew N. Chalupka, Haidong Wang, Laura Dwyer, Megan Costa, Alan D. Lopez, and Christopher J. L. Murray. 2010. "Worldwide Mortality in Men and Women Aged 15–59 Years from 1970 to 2010: A Systematic Analysis." *Lancet* 375 (9727): 1704–20.

Rios, Viridiana. 2009. "Comparativo Internacional de Homicidios."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Mexico, Ciudad de Mexico.

Rose, Elaina. 1999.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Excess Female Mortality in Rural Indi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1 (1): 41–9.

Rosenzweig, Mark R., and Theodore Paul Schultz. 1982. "Market Opportunities, Genetic Endowments and the Intrafamily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hild Survival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4): 803–15.

Rush, David. 2000. "Nutrition and Maternal Mort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72 (1): S212–S240.

Saengtienchai, Chanpen, John Knodel, Mark VanLandingham, and Anthony Pramualratana. 1999. "Prostitutes Are Better than Lovers: Wive's Views on the Extramarital Sexual Behavior of Thai Men." In *Genders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Thailand,* ed. Peter A. Jackson and Nerida M. Cook.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Sen, Amartya. 1992. "Missing Wome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4 (6827): 587–8.

Shannon, Lisa J. 2010. *A Thousand Sisters: My Journey into the Worst Place on Earth to Be a Woman.* Berkeley, CA: Seal Press.

Shulman, Caroline E. 1999. "Malaria in Pregnancy: Its Relevance to Safe-Motherhood Programmes." *Annals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arasitology* 93 (S1): S59–S66.

Somanathan, Aparnaa, and Reem Hafez. 2010. "Financing Options for the Health Sector in Tong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trauss, John, and Thomas Duncan. 1995. "Human Resources: Empirical Modeling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Decisions." In Vol. 3 of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 Jere R. Behrman and T. N. Srinivasan. Amsterdam and Oxford: North Holland.

Surasiengsunk, Suwanee, Suchada Kiranandana, Kua Wongboonsin, Geoffrey P. Garnett, Roy M. Anderson, and Godfried J. P. van Griensven. 1998. "Demographic Impact of the HIV Epidemic in Thailand." *AIDS* 12 (7): 775–84.

Svedberg, Peter. 1990. "Undernutr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Is There a Gender Bia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6 (3): 469–86.

Tansel, Aysit. 2002. "Determinants of School Attainment of Boys and Girls in Turkey: Individual,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Factor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1 (5): 455–70.

Tarozzi, Alessandro, and Aprajit Mahajan. 2007. "Child Nutrition in India in the Nine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5 (3): 441–86.

Thaddeus, Sereen, and Deborah Maine. 1994. "Too Far to Walk: Maternal Mortality in Contex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8 (8): 1091–110.

Trussell, James, and Anne R. Pebley. 1984.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Changes in Fertility on Infant, Child, and Maternal Mortality."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5 (6): 267–80.

UNAIDS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2010a. *UNAIDS Report on the Global AIDS Epidemic 2010.* Geneva: UNAIDS.

———. 2010b. "Women, Girls and HIV." UNAIDS Fact Sheet 10, Geneva.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VanLandingham, Mark, John Knodel, Chanpen Saengtienchai, and Anthony Pramualratana. 1998. "In the Company of Friends: Peer Influence on Thai Male Extramarital Sex."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7 (12): 1193–2011.

Waldron, Indrid. 1998. "Sex Differences in Infant and Early Child Mortality: Major Causes of Death and Possible Biological Causes." In *Too Young to Die: Genes or Gender?,* ed.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2000. "Trends 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Relationships to Chang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Other Causal Factors." I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Health,* ed. Ellen Annandale and Kate Hunt. Buckingham, U.K. and Philadelphia,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2003. "Mortality Differentials by Sex." In *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 Paul Demeny and Geoffrey McNicoll. New York: MacMillan.

Wei, Shang-Jin, and Xiaobo Zhang. 2009.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Series 1509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Weniger, Bruce G., Khanchit Limpakarnjanarat, Kummuan Ungchusak, Sombat Thanprasertsuk, Kachit Choopanya, Suphak Vanichseni, Thongchai Uneklabh, Prasert Thongcharoen, and Chantapong Wasi. 1991. "The Epidemiology of HIV Infection and AIDS in Thailand." *AIDS* 5 (Supplement 2): S71–S85.

World Bank. 2005. *Pakistan Country Gender Assessment: Bridging the Gender Gap: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1a. "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orld Bank African Region 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 2011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4.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Changing History.* Geneva: WHO.

———. 2010.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Geneva: WHO.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World Bank. 2010.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08." WHO, Washington, DC.

Yamaguchi, Kazuo. 1989. "A Formal Theory for Male-Preferring Stopping Rules of Childbearing: Sex Differences in Birth Order and in the Number of Siblings." *Demography* 26 (3): 451–65.

Yi, Zeng, Tu Ping, Gu Baochang, Xu Yi, Li Bohua, and Li Youngping. 1993. "An Analysis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Reported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2): 283–302.

Zubillaga, Veronica, and Robert Briceño-León. 2001. "Exclusión, Masculinidad y Respeto: Algunas Claves para Entender la Violencia entre Adolescentes en Barrios." *Nueva Sociedad* 173: 34–8.

第 4 章

4

提高女性能动性

即使人力资本和物质资产方面的性别差异缩小了，但由于女孩和男孩及以后的女性和男性发挥能动性的能力不同，两性的成果差异依然可能发生。这里，能动性系指个体（或团体）做出有效选择并使选择转化成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能动性可以理解为女性和男性使用自身禀赋、利用经济机会实现所希望的结果的过程。因此，能动性是理解性别成果如何形成以及为什么有时候性别成果是平等的，有时候又是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在所有国家中，女性和男性在一系列领域内做出有效选择的能力都存在差异，处于劣势的通常是女性。本章挑选了一些与女性能力（或无能）密切相关的一些结果进行重点分析。这些结果相互联系，彼此强化。结果，女性在任何时间的选择能力和行为能力都部分反映了她在早期生活中、常常从儿童时期就开始打下的基础。这些结果，或者说能动性的表现形式，是：

- 资源控制力：资源控制力的衡量标准是女性获得并控制收入，拥有、使用和处置物质资产的能力。
- 自由流动力：自由流动力的衡量标准是女性决定自己移动的自由及离开家庭到外面生活的能力。
- 组建家庭决策力：组建家庭决策力的衡量标准是女性和女孩决定什么时候结婚、与谁结婚、生养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结束婚姻的能力。
- 免遭暴力风险的能力：免遭暴力风险的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家庭暴力的普遍程度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身体暴力和情感暴力。
- 社会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社会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的衡量标准是女性在正规政治中的参与程度和代表席位以及女性参与集体行动和协会的程度。

在分析经济增长、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和市场如何相互作用以提高或限制女性的能动性时，我们发现了四大核心现象。[1] 首先，通过提高收入、拓宽服务渠道和扩大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可以改善发挥能动性的物质条件。但是，提高总体收入来提高女性能动性部分取决于自身获得收入的能力，这种能力增强了她们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力以及她们积累自有资产的能力。仅靠经济增长并不能消除女性

之间的能动性差异。

第二，扩大女性权利可以培育女性在某些领域的能动性。但是组建家庭权和家庭资源控制权的扩大确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扩大权利来实现变化的效果取决于其适用性（常常与多层法律体系相联系）和执行度。

第三，社会规范塑造女性的能动性。与市场和制度一道，社会规范决定了女性具有的禀赋和机会以及她们是否选择运用这些禀赋和机会。如果社会规范阻碍男女两性从法律、服务和收入中平等受益，它将限制女性的能动性。当女性能动性的提高直接改变家庭和社会的权力平衡时，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就表现得尤其明显。市场改革和制度改革，例如改善服务提供、信息提供、网络创建等，通过对遵守规范的成本和收益施加影响，可以降低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第四，女性的集体能动性可以改变社会。女性的集体能动性既取决于她们的个体能动性，也决定了她们的个体能动性。女性影响周围环境的能力超出了正规的政治渠道，正规的政治渠道可能受到社会规范、性别角色和非正规结构观念等的限制。女性可以通过参加非正规的协会和集体行动来影响周围的环境，但是她们的成功部分取决于她们做出有效选择的个体能力。

女性的能动性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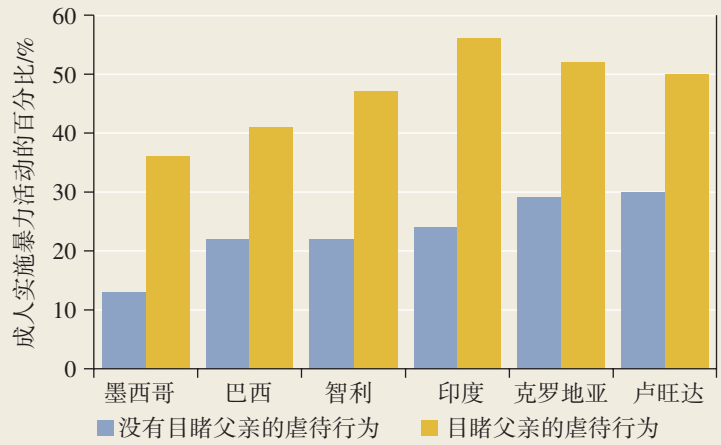
女性能动性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它与女性的个体福利和生活质量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与提高女性及其家庭的福利有着重大关系。能动性是女性在建设制度、社会规范和社区福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2]

- 女性影响自己生活的能力对其自身很重要。一人做出有效选择和左右自己生命的能力是幸福与否的重要方面。只有在能够追求更好的成果、做出有效的选择并采取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时，女性和男性才可以参与竞争并改变自身的状况。

- 女性影响自己生活的能力对福利的其他方面也很重要。能动性决定了女性发展自身人力资本和获得经济机会的能力。组建家庭的决策，尤其是关于结婚时间、生育时间和子女数量的决定，对女性的教育投资而言至关重要。事实上，晚婚与较高的教育程度、较高的收入和追求健康的行为密切相关。[3] 在孟加拉国，对健康护理、家庭采购行为、走访亲朋控制力较强的女性，其总体营养状况也较好（即使在同一收入组中）。[4] 身体流动对女孩和成年女性获得服务（包括教育、健康、水和公正）和发展社会关系网络同样重要。在赞比亚，住宅距离医疗机构不足两小时路程的女性住院分娩的几率是那些距离医疗机构遥远的女性的两倍。[5] 在巴基斯坦，身体流动越多，使用避孕药和获得的护理服务也越多。[6] 在美国，避孕行为提高了结婚的年龄和收入，而欧洲实施的节育措施则扩大了女性劳动力和她们的收入。[7]

- 女性发挥能动性可以改善孩子的福利。性别偏好差异体现在家庭内部支出和消费的不同模式上，女性更看重对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女性对收入和资产的支配权是实现儿童福利的工具，非常重要。在巴西、科特迪瓦和英国，较大的女性收入支配权增加了对儿童身心有益的物品的支出。[8] 在加纳，女性的资产份额和所拥有土地份额与农村家庭较高的食物开支呈正相关关系。[9] 在尼泊尔，土地所有权较大的母亲，其体重严重不足的孩子也较少。[10] 在墨西哥，那些在家庭中决策权较大的女性的女儿（而不是儿

图 4.1 目睹暴力活动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实施暴力活动



资料来源：Barker 等 2011。

子）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也较短。[11]

- 女性的能动性也塑造了自己孩子的未来行为。孩子们在家里看到的、经历过的可以对他们一生的信仰和行为产生影响。童年时期目睹过家暴或是家暴受害者的孩子在成年后更有可能实施家暴或经历家暴，童年时期目睹过家暴的男性实施暴力行为的几率是其他男性的 2~3 倍（见图 4.1）。[12] 对儿童的认识（同时包括女孩和男孩），以及什么样的活动或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男性和女性行为通常也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在日本，由全职工作妈妈带大的男性支持性别角色分割的可能性较小，而在美国，自己母亲和婆婆参与工作的女性参与工作的可能性更大。[13] 因此，女性免于暴力危害和发挥更大的经济能动性的能力可以限制暴力的跨代传递，促进形成积极的性别角色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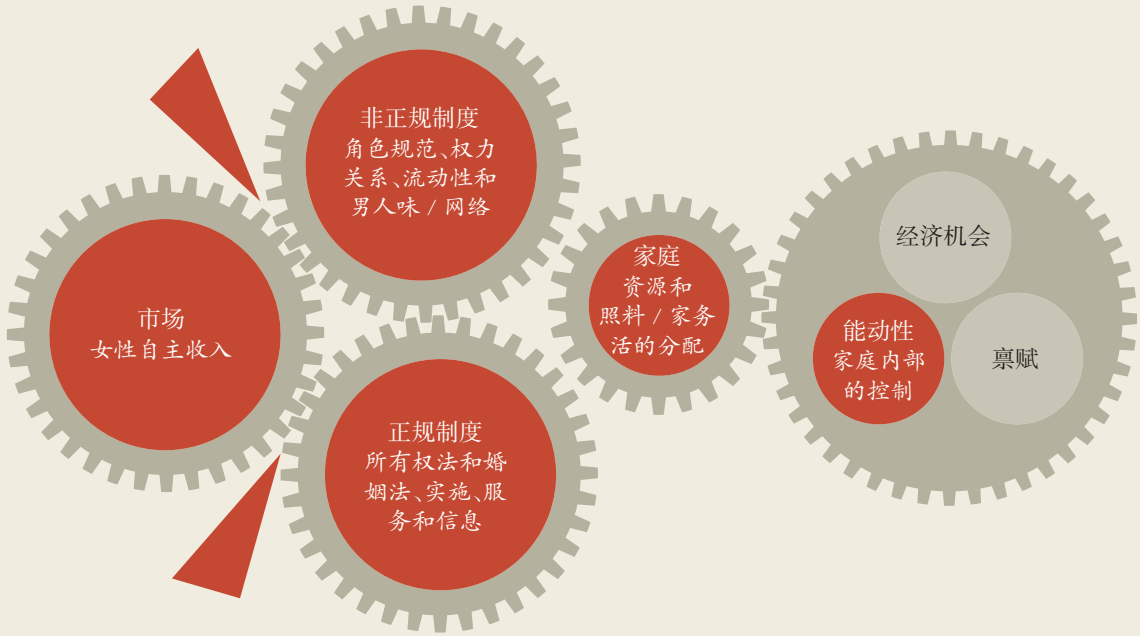
- 女性的集体能动性具有改革能力，可以促进社会和政策变革。尽管单个女性的影响力可能有限，但是女性和女孩作为一个群体可以产生巨大的压力。她们有时一起行动，从而克服个体所面临的限制因素。尽管个体女性发挥能动性的较高能力可能帮助她为自己在自己的环境和限制因素面前实现更好的成果，这还远远不足以促进为其他女性改革环境的结构性变革。相比之下，女性的集体声音可以促进法律、政策、服务、制度和社会规范发生变化，从而最终增强女性的个体能动性。在高收入国家，女性代表的增加突出了与女性生活相关议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儿童死亡率、产假、儿童护理、针对女性的家暴等。[14] 对 70 个国家性别政策变化的分析突出了 1975 年以来，女性集体运动在提倡更加平等的家庭法和应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活动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15] 女性在地方政治机构中代表席位的增加（例如印度的潘查亚特制），（在某些情景下）可以扩大用于满足女性及她们孩子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服务；它也使女性更多地参与村庄会议，针对女性的犯罪活动的告发率及这类犯罪分子的逮捕率提高了。[16]

就整体而言，女性能动性对促进成果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和男性相比，女性能够支配的资产和自主收入仍然较少，对家庭决策的控制力也较弱。各国仍然存在大量的不同程度的家暴问题，而女性在政府和议会中的话语权又是有限的。分析框架之后的三节系统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和市场、正规制度（法律和服务）、影响女性能动性能力的社会规范的作用（见图 4.2）。这三节将展示这些决定因素在界定女性能动性时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以及每一种决定因素的限制因素是如何互相加强的。

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女性的能动性，但是影响有限

通过消除金融壁垒、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和自主收入并扩大服务和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女性发挥

图 4.2　市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限制因素的互相加强是女性能动性进展有限的原因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能动性。但是它的整体影响取决于女性可以获得的收入和得到的经济机会。

较高的家庭收入消除了提高女性能动性的部分金融壁垒。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增加可以降低在男性和女性（或男孩和女孩）之间分配物品和服务的需要。例如，哥伦比亚、肯尼亚和马拉维实施的现金转移支付方案或学费津贴为女孩赢得了较晚的结婚年龄，减少了早孕现象。[17] 家庭财产较多也有助于减少女孩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早婚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生长于富裕家庭的女孩和成年女性平均结婚年龄较晚（尽管某些地区和社区存在例外）（见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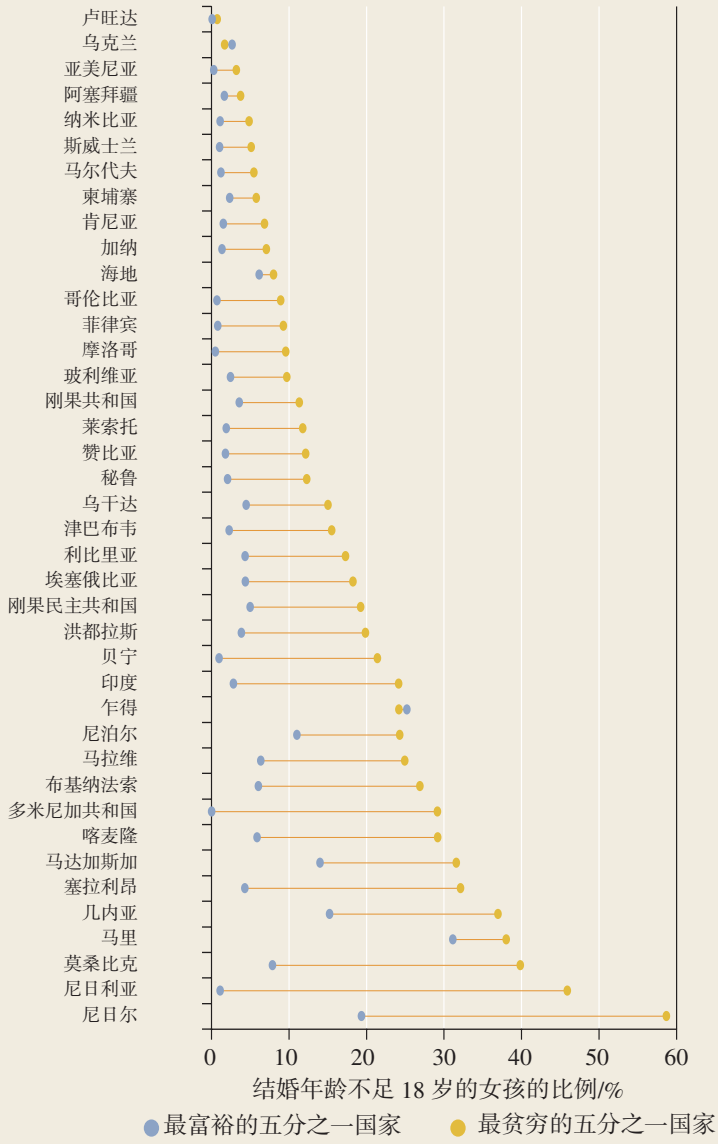
较高的家庭收入和财富也可以降低身体流动的经济限制。交通成本可能是获得服务与信息或获得雇佣机会和进入市场（第 5 章对后者进行了深入讨论）的壁垒。在巴西和布基纳法索，获得医院健康服务四分之一的成本与交通相关。[18] 来自 36 个国家的数据表明，财富越多，接近基础设施的流动限制因素也越弱。[19]

据悉，由于在满足家庭的基本开支之外还有较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富裕家庭的女性左右家庭决策的力量也较强。南亚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走亲访友决策的女性比例各不相同，五分之一最贫穷国家的比例是 57%，而五分之一最富裕国家的比例是 71%，而可以自主使用自身收入的女性比例则从 80%增加至 92%（见图 4.4）。其他地区具有相似的模式。

女性的收入机会和自身财产提高了她们的谈判力

扩大收入机会是经济增长（较高的国民收入）对女性能动性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渠道。经济增长改变了就业结构，这种改变通常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为她们加入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激励。当较高的收入主要来自男性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对女性的影响

图 4.3 富裕女性结婚较晚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3—2009 年人口和健康调查的计算值。
注：15~17 岁女孩样本。根据五分之一测算财富。

可能不大，甚至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但是，当较高的收入来自女性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就会从多方面增强女性的话语权和谈判力。

有证据显示，女性资产、收入、其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与家暴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关系。在哥伦比亚、印度、南非和乌干达，女性的财产所有权（至少从中期来看）降低了发生家暴的风险。[20] 而在美国，男性和女性工资差距的减少使家暴行为减少了十分之一左右。[21] 但是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善也可以对女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中扮演角色的规范构成挑战，短期内导致某些形式家暴或这类家暴威胁的增加，设计干预措施时需要考虑这个因素。[22]

> “我很高兴用自己赚的钱做事情和买东西。”
>
> ——越南成年女性

女性的收入对包括退休金和保险在内的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金融资产的积累产生影响。女性自己的收入和继承的财产或土地再分配方案一道，成为积累个人财产的关键机制。对女性而言，个人资产对女性退出婚姻、应对冲击、投资并扩大自身收入和经济机会非常重要。

土地和退休金是两项重要的资产。来自拉美六国的证据显示，市场是女性获得土地的第二大渠道，但是和男性相比，却是女性较少使用的渠道（见图 4.5）。而在国家或社区现金转移很大的国家中，男性是更大的受益者。在分析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发现箭头指向了土地市场的歧视现象和收入、贷款渠道的差异。[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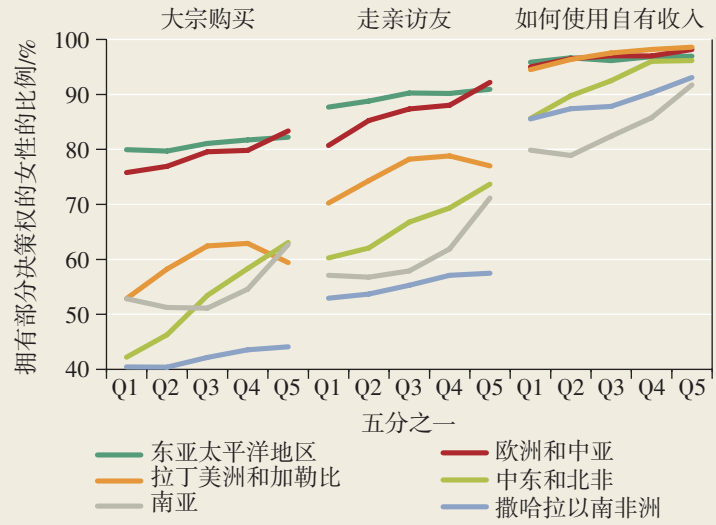
就退休金而言，财富积累的模式反映了已经观察到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全球女性平均参与退休金体制的人数较少，储蓄较低。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证据显示，即使男性和女性参与退休金体系的比例相当，男性的退休金资产远远高于女性。因此，许多老年女性的福祉取决于她们丈夫的储蓄和退休金收入，以及退休金所有者死亡时根据规定提供给未亡人的福利。大多数体制都设定了某些机制来

保证未亡人收到已亡配偶的部分退休金。但是这些规则对女性能动性产生影响的方式可能大不相同（见专栏 4.1）。

规范的储蓄工具有助于保护资产。而相对于男性，女性在获取金融服务时面临更多的限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储蓄账户的女性比例是 22%，男性是 28%（拥有借记卡/ATM 卡的比例分别是 16%和 2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拥有银行账户的女性比例是 13%，男性比例是 1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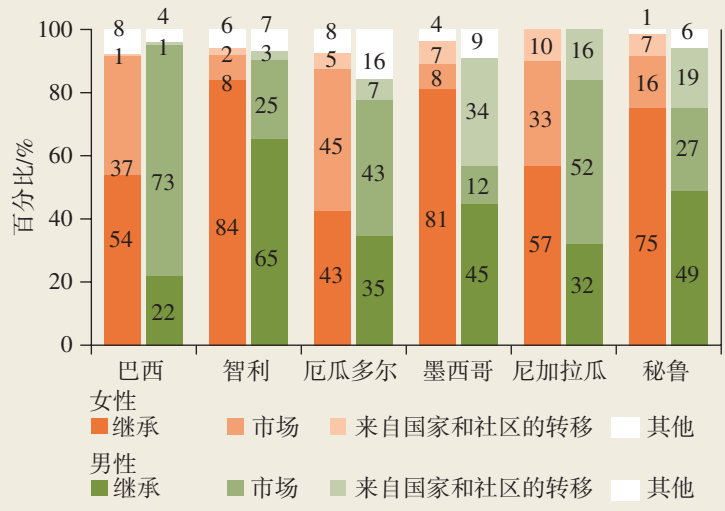
通过扩大女性网络（大部分是亲属关系网络）扩大女性的信息来源和支持力度，从而扩大女性和女孩的经济机会也将有助于促进女性发挥能动性。就业引起的人口流动使女性与工作中和其他场合的众多个体建立了联系。全职女性积极参与工会或职业协会，其参与率几乎和男性一样（见图 4.6）。在欧洲 30 个国家中，女性工会成员的比例是 44%（约 5 000 万工人）。[25] 在许多国家中，少女倾向于将自己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免费的家务工作，而男孩的时间则更多地用于有酬工作，或参与娱乐活动。结果，女孩的社会网络要比男孩窄的多（而且在青春期前后，社会网络会削弱）。[26]

图 4.4　家庭越富裕，女性的控制力也越强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3—2009 年人口和健康调查的计算值。
注：决定家庭大宗购买和走亲访友的已婚女性样本和为获取现金、控制自身收入而工作的已婚女性样本。

图 4.5　拉美六国基于性别的土地获得形式



资料来源：Deere 和 León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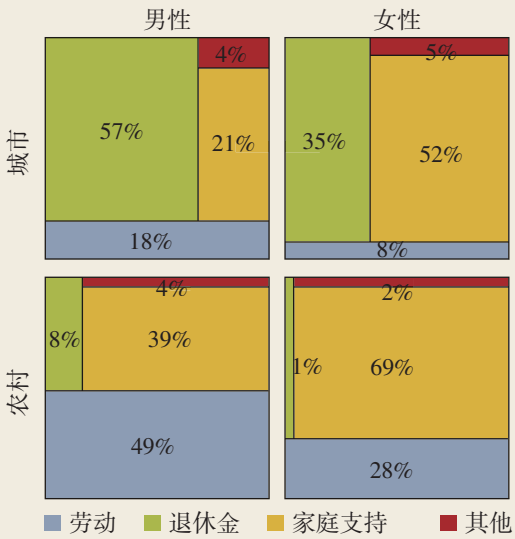
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促进发挥能动性

国家收入和女性能动性之间的联系和基础设施的扩张部分相关。的确，作为关爱者，女性和女孩在时间上和流动上面临着重大的限制，而对电力、水、道路和交通服务的投资也可能降低。南非对农村电网的投资使女性就业率在五年内提高了将近 10 个百分点。电力使女性从家庭生产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她们可以参与的市场活动的类型（例如，服务工作要求使用电），但是对男性就业没有重大的影响。[27] 农村公路网络的扩建与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提供也可以改善女性和女孩的成果。在危地马拉和巴基斯坦城市地区，农村公路网络的扩建对女性流动和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8] 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城郊，公共交通服务的可得性、成本和效率会产生

专栏 4.1 退休金的覆盖率、数量和未亡人利益对女性的自主能力很重要

女性在正规退休金体制中的资产少于男性。即使她们参加工作，由于收入较低、工作时间较短、较少参与正规领域，她们被纳入退休金体制的比例也较少。来自欧洲 25 国的数据显示，有退休金收入的老年女性比例（在全体退休年龄女性中的比例）大于男性比例的国家只有 6 个。其他国家的比例很低，为 40%（卢森堡）或 60%（奥地利、希腊和马耳他）。在当今美国，女性和男性的覆盖率相近（65%左右），但是女性的个体账户积累额平均约为男性的一半。在中国，退休金是城市地区 57%的退休男性的第一收入来源，但以退休金为第一收入来源的女性只有 35%，女性更多依赖家庭的支持（见专栏图 4.1）。

专栏图 4.1 2005 年中国老人的收入来源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1%的人口样本数据。

至于配偶对退休金的继承权，来自各地区 24 国的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国家，妻子和儿女一起都是第一继承人。在玻利维亚、菲律宾和多哥，如果妻子再婚，她的这一权利将终止，同样，女儿的这一权利也在结婚时终止（而男孩的继承权通常会持续到一定的年龄）。限定继承显示，未亡人退休金并不是因女性为家庭无偿奉献而获得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女性在再婚之前替代主要养家者的机制。

近年来，许多退休金体制采用了个体账户的做法，减少了体制的再分配因素，而且为了反映女性较长的寿命而采取了不同的年金表。这些改革致使女性在老年时期具有较小的经济自主权。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2010；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各国社会保障概览，http：//www.issa.int/Observatory/Country-Profi les；Johnson 1999.

不同的效果。长途通勤限制了女性从事正式或高收入工作的能力，这是因为长途通勤和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难以并行。在南非德班，由于交通服务不足，城郊女性很难获得在城市中心的工作或享受地方福利设施。[29]

> “现在女性可以决定生几个孩子了，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以前，男人告诉女人应该要几个孩子。”
>
> ——布基纳法索成年女性

通常，较高的国家收入也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质量的提高相关。这类服务可以促进女性发挥能动性。例如，生殖健康服务可以帮助女性（和男性）做出生育决定。[30] 事实上，在为本报告的性别和经济选择定性研究准备的调查中，许多青年男性和女性认为计划生育服务有助于将生育决定权从男性转向夫妻双方。[31]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和收入的增长相一致，在大多数国家中，现代避孕用具的可得性大大增加了，但是限制因素依然存在。正如三分之二的女性所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健康考虑或反对避孕（见图 4.7）。然而，和避孕用具可得性的增加相一致，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只有 8%说得不到避孕用具或成本问题是她们不使用避孕用具的主要原因。如果能瞒住配偶，赞比亚的女性更频繁地使用避孕工具，这解释了家庭内部就节育问题进行磋商的影响。[32]

但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和一些人口群体中，如布基纳法索、莫桑比克和菲律宾，有 20%的女性需要避孕工具却得不到避孕工具。而且，贫穷也对

> “如果他们了解计划生育，他们会共同决定（要几个孩子）；了解计划生育会有所帮助。”
>
> ——巴布亚新几内亚青年

获得避孕工具构成限制。例如在贝宁和印度尼西亚，在五分之一最贫穷的女性中，需要却不能得到避孕工具的女性几乎占 18%，而在五分之一最富裕的女性中，需要却不能得到避孕工具的女性只占 3%。而且，青少年女性的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通常有限，引导她们转向性成熟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她们的谈判力也有限，许多青少年女性经历过不情愿的性接触。[33] 不赞成或谴责她们性行为的社会规范可能阻碍这些女孩获得生殖健康服务。在一些国家，青年女孩在接受这类服务时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34] 结果，撒哈拉以南非洲 15~24 岁的女孩和成年女性中，60%有不安全流产的经历；据估计，在世界范围内，15~19 岁的女孩中，约 25%有不安全流产的经历。[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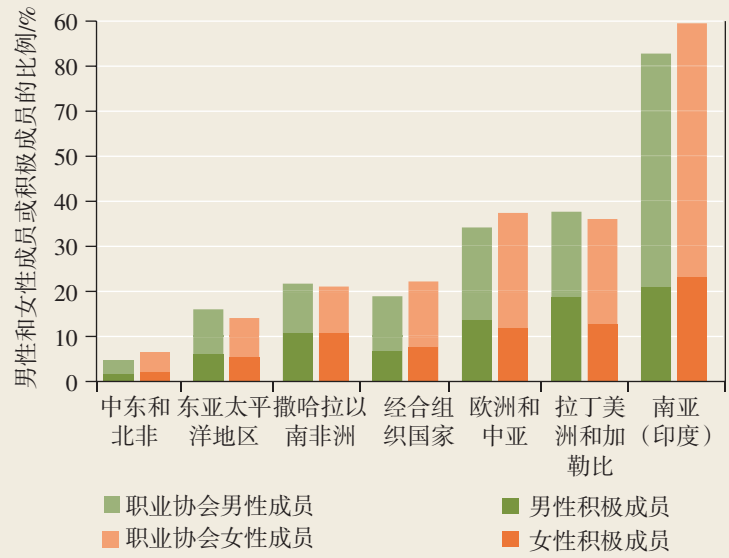
即使国家收入和女性的能动性相联系，这种联系也因国家和结果而大不相同，这表明能动性的许多方面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法律和服务等正式制度可以增加或缓解发挥能动性的限制因素。而普遍的社会规范及其相关的信仰可以促进或限制能动性的发挥。

权利及其有效贯彻实施塑造女性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在正规制度中，法律正式确定女性的权利并提供框架界定女性可以发挥能动性的环境。许多法律反映了过去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待遇，或者是对不平等社会规范和实践的正式认可。因此，确保法律平等对待两性可能有助于扭转现状。承认权利是许多国家女性表达自己观点、做出选择和积累资产能力的关键性力量。

但是，法律增强女性能动性的作用可能受到四个因素的限制。首先，许多正规的成文法律体系中仍然存在歧视，尤其是婚姻和资源控制方面的歧视。第二，许多国家的习惯法，尤其是关系到家庭的习惯法，影响甚广。第三，如果权利对女性发挥能动性具有影响，那么权利的实现及女性寻求补偿或要求实现权利的能力就非常重要。第四，市场和社会规范与法律相互作用，不是限制就是提高法律的影响。

图 4.6　出外工作（几乎）平等地拓宽了男性和女性的社交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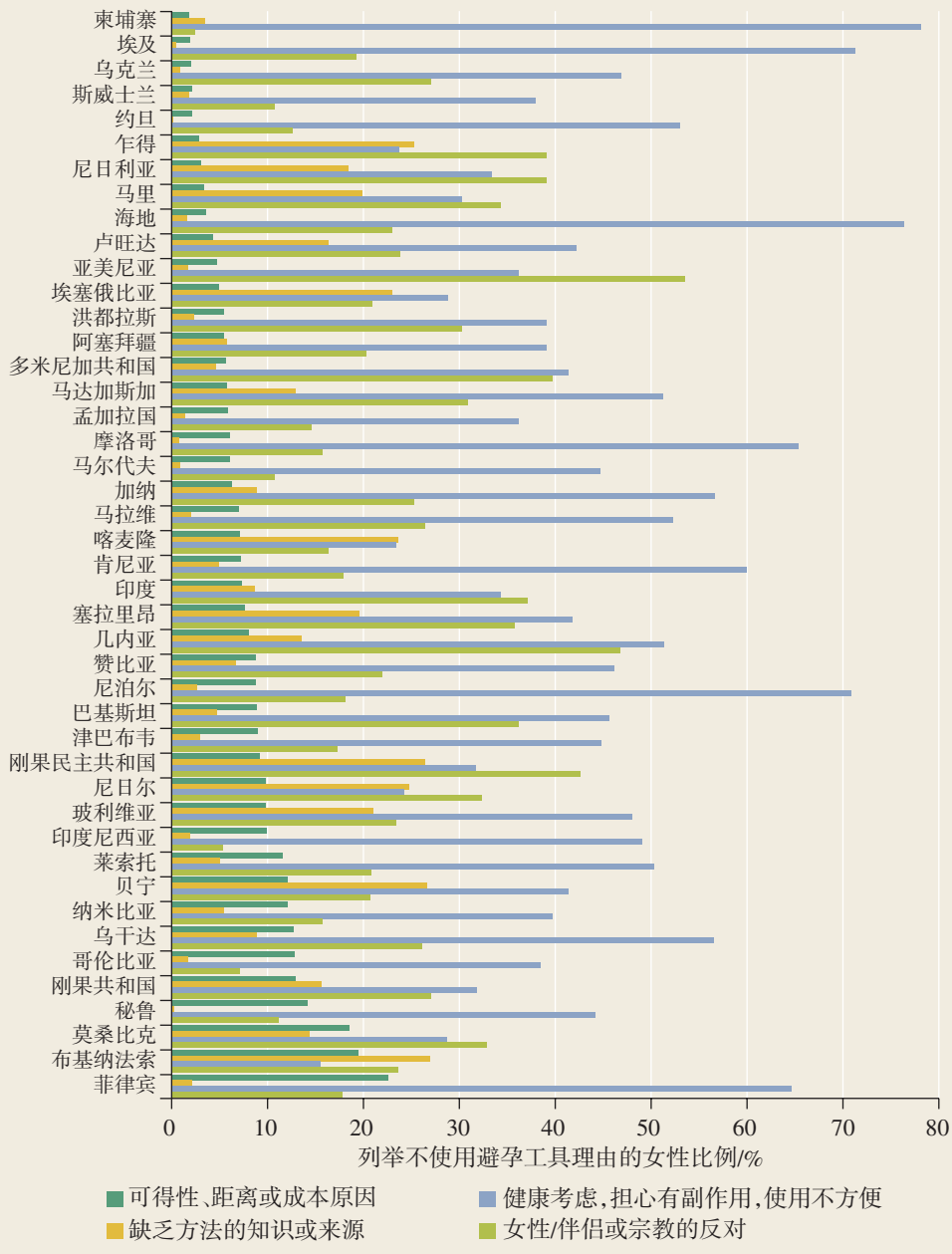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4—2009 年 38 国人口和健康调查的估测值。
注：全职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样本。

对女性的能动性而言，权利非常重要

今天，女性选举权几乎成了普遍的权利。尽管仍然有几个例外，许多国家已经对拿破仑法典关于家长制的法则、普通法法规的保护条例，以及限制已婚女性法律行为能力及工作权利的宗教或习惯法进行了改革。

其他法律的变化可以提高女性的能动性。事实上，许多法律可以增加女性的自主权，即使这不是法律原来的目标。例如，要求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延迟了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时间，

图 4.7 在大多数国家中，相对于知识缺少和反对避孕，避孕工具可得性的限制作用较小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2003—2009 年人口和健康调查得出的估测值。
注：在未来两年不想要孩子、生殖力旺盛且不使用避孕工具的女性样本。

从而增强了女性的能动性。在非婚生育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土耳其，1997 年实施的将义务教育法定时间延长三年（到 14 岁）的规定使 16 岁就结婚的女孩的比例降低了 45%，17 岁就生育的女孩的比例降低了 36%。[36] 尽管最终结婚的女性的比例或其最终生育的孩子数量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由于早婚和生育降低教育成果并进而降低成年生活中的收入和能动性，结婚和生育时间的变化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增强女性对收入和资产的支配力的法律可能改善女性在自己家庭内部的地位，这主要是通过提高女性脱离

婚姻（“退出选择”）的能力和谈判力实现的。通过提高女孩的价值改善女孩的法律地位同样可以引起其他变化：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可能提高，结婚年龄可能提高，生育时间可能延迟。例如，印度的继承法改革延迟了女孩的结婚时间，提高了女孩的教育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 11%~25%），降低了嫁妆支出。[37]

允许离婚或减轻离婚难度的法律也可以增加女性选择的能力。例如，赋予女性离婚权利、为女性提供平等经济给养的法律对配偶的工作及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具有影响。在有些国家，女性在离婚时得到家庭一半的财产，这些国家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可能较短，这是因为她们更能感觉到她们得到了婚姻存续期间财产平等分割的保护。[38] 在美国，这类法律也降低了对婚姻性质资本的投资，例如，尽管家庭所有权没有受到影响，对配偶教育的投资还是降低了，这是因为离婚导致财产损失的奉献增加了。家暴也降低了 30%左右。[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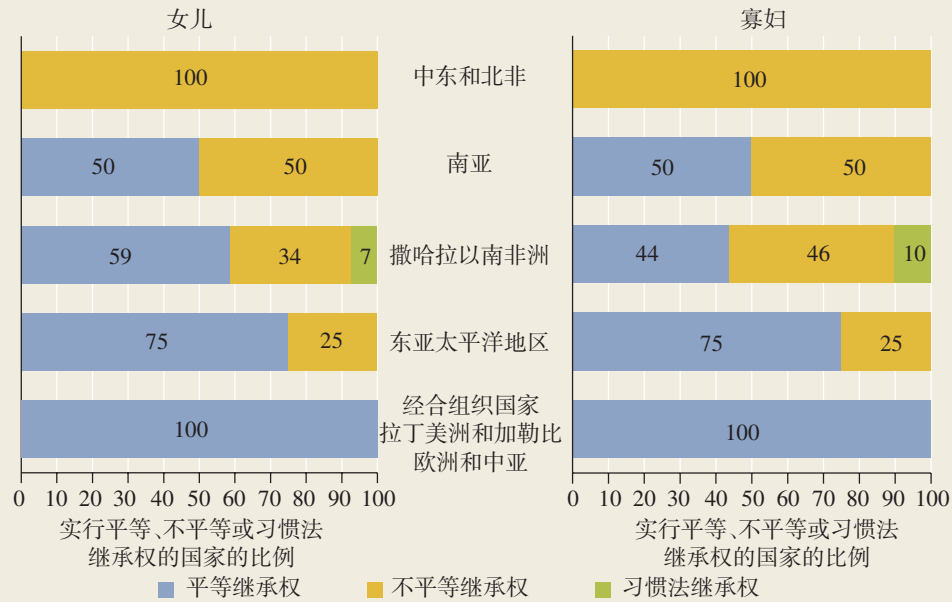
调整家庭内部关系领域的进展受到限制

完善法律以调整家庭关系是进展最缓慢的领域。许多方案和政策似乎止于家庭门口，避免干涉家庭内部的关系。国家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时所持的保留态度也反映了这种阻力。在签署该条约的 187 个国家中，完全认可第 16 条的国家只有 29 个，第 16 条呼吁取缔婚姻家庭关系中所有形式的歧视，包括缔结婚姻的自由选择权利，配偶的权利，结婚和解除婚姻的平等权利，对孩子平等的监护权，作为配偶平等的人身权利，拥有、获得、管理和处分财产的平等权利。[40]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女性都享有占有财产的法律能力，但是至少在 9 个国家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具有不同的所有权。[41] 女性在获得、出售、转移或馈赠资产时可能受到限制，而且在购买、出售或转移任何财产时都需要得到男性监护人或丈夫的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可能只能支配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任何违反这些限制的行为都可能形成丈夫管理妻子个人财产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财产登记都需要得到男性监护人的同意。公民法案可能阻止女性的外国丈夫或她们的孩子获得女性所在国的国籍。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公民资格缺失会对享受国家利益构成限制（比如义务教育）、限制国家法律适用的范围。

遗产继承是积累资产的重要机制之一。在许多国家，女性和女孩的继承权仍然低于男性和男孩。在 63 个具有 40 多年数据可考的国家中，21 国的女性（在没有遗嘱的条件下）没有平等继承遗产的权利（见图 4.8）。这种现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突出，据悉，能够继承已故丈夫财产的寡妇（及她们的孩子）不足一半（来自 16 个国家的数据，见专栏 4.6）。早在五十多年前，经合组织的所有国家、苏联和拉丁美洲就对婚姻法进行了改革。在实行普通法继承或承认习惯法或宗教法的非经合组织国家中，儿子和女儿更有可能面临不平等的继承权。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教义存在着重大差异，有些赋予女孩较大的继承权。在土耳其，无论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在法律上，男孩和女孩一直拥有平等的继承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女孩的继承份额大体上与男孩相当。在其他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法律规定了不平等的继承权，但是存在机制使家

图 4.8 女孩在继承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快于寡妇取得的进展
（继承权平等、不平等或根据习惯法的国家的比例）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Htun 和 Weldon2011b、非洲女性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性别法图书馆的估算值。
注：在计算区域比例时，国家适用了相同的权数。

庭对财产进行更平等的分割，只要家庭愿意。最后，在少数几个国家（如不丹），女孩继承父母的大部分财产，而且财产通常是在女性的名下。[42]

即使国家改革法律以实现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待遇，重大的差异依然会存在。在印度，少数几州对继承法的修订赋予了儿子和女儿在家庭财产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极大地增加了女儿继承土地的可能性，但是仅仅法律的变化不足以弥补女性潜在的劣势。[43]有时候，法律被忽视、或得不到有力实施、或通过制定遗嘱的形式被规避（例如，家庭有意选择给予儿子更多的财产，给予女儿较少的财产。某些国家的体制以宗教法为基础，限制个体决定继承人的自行决定权（或提供挑战遗嘱的场所），从而帮助确保女性的继承份额得到保护。非宗教法典有时候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在巴西，遗嘱必须给予孩子和寡妇至少一半的遗产，男孩和女孩具有平等的继承权。这种要求把分配另一半财产的自行决定权留给了个体，个体可以选择只有儿子可以继承这部分财产，但是这种做法的确为女孩和成年女性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44]

对女性能动性而言，缔结和解除婚姻的权力非常重要

在许多国家，法律体系并不支持女性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享有平等的权利。婚姻是一个里程碑，有时候会削弱女性的法律权利和财产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婚前享有的法定资格和责任会在结婚时转移到丈夫身上。在某些国家，通过阻止女性申请护照、缔结合同或没有丈夫允许不能出现在法庭等，婚姻降低了女性的民事行为能力。

规定女性婚姻持续期间或离婚时

可支配财产额度的财产体制也反映了婚姻的影响。因此，财产体制的类型可以塑造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力。允许女性带着相当一部分家庭资产解除婚姻的财产体制（降低了离开家庭的成本，使得解除婚姻的威胁更可信）可能提高了女性的谈判力，即使她从未行使该权利。相反，限制女性支配她所带给婚姻的资产（常常少于男性带给婚姻的资产[45]）及她自己所赚资产的财产体制，限制了女性的谈判力。

之前被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或西班牙殖民的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基本上延续旧有的法典，继承的财产通常被默认为共有财产（见专栏 4.2）。苏联集团的国家通常也实行默认的共享财产体制。实行普通法或伊斯兰法律的国家和公开允许多配偶制的国家通常默认独立的财产所有制（土耳其默认共享财产制，在穆斯林国家中，是特例。）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与经济机会定性研究认为，60%的成年人认为离婚存在困难，年轻一点儿的成年人的观点也只是稍稍乐观一点儿。[46]在分割财产和儿童监护权时（对女性）有失公允是所调查男性和女性均提及的离婚障碍因素之一。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反对、社会隔阂和耻辱也被认为是阻碍离婚的关键因素。

对世界上的许多女性而言，孀居意味着失去使用和支配财产的重大权利，这是因为她们丈夫的财产被返还到了他们的家庭，寡妇失去了支配、有时也失去使用土地和房屋的权利（见专栏 4.3）。尽管寡妇在实行共享财产体制的国家中受到保护，但是她们在独立所有权体制下的情况比较不尽如人意。事实上，默认的继承权划分给寡妇的资产不及一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份额通常在 0~30%之间，而且有时候习俗土地被排除在寡妇可以继承的遗产之外（母系社会除外）。

> “她们（离婚女性）离婚后回到娘家，但是却不能从丈夫那边得到赡养费或财产份额，从娘家那里她们也得不到财产份额……在某些情况下，她们被迫再嫁给年长的男性，从而通过在户主或丈夫的农田里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
>
> ——印度成年女性
>
> “如果你死了，你的财产将被你的亲属瓜分，你的妻子和女儿不能继承财产。如果你有一个儿子，所有的财产属于你的儿子。”
>
> ——阿富汗青年女性
>
> “（家庭法）帮助了我们。当你离开那个男人的家，你分到了一些财产，带着一些东西开始你的新生活。”
>
> ——坦桑尼亚成年女性

在许多国家，增强寡妇权利的改革落后于增强女儿权利的改革（见图 4.8）。尽管肯尼亚、摩洛哥、坦桑尼亚、突尼斯在家庭法和土地法等其他领域进行的重大改革对女性产生了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寡妇面临的不平等现象。这种缺陷部分与隐含的假设，即男性亲属有义务照顾需要照顾的女性亲属的假设相关。但是男性并不总能履行这种义务。改革女儿继承权的经验教训可以延伸至寡妇的权利。在无遗嘱继承法没有划留50%时，共享财产体制也可能帮助寡妇获得财产。公民法也应当是改革的重点，这是因为公民法也可能赋予女性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家庭获得权益和财产的权利，而且和属人法相比，公民法可能更容易改变。

> “由于现在有了界定个人权利的法律，争论可能很激烈，补偿也加大了，人们也意识到了法律的作用。”
>
> ——不丹成年男性

专栏 4.2 婚姻持续期间（和离婚时）的财产

财产共享制度。如果发生离婚，这种财产制度通常会为妻子提供保护，在夫妻双方之间平等地分割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收入由夫妻双方平等地拥有（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继承或赠与的财产可以由配偶一方所有）。在普适性共享财产体制下，配偶婚前所得财产也会成为夫妻共有的财产。这一体制完全承认对家庭的非货币贡献（包括照顾家庭、生孩子、家务事或糊口农业），并不要求提供对家庭贡献的证据。在这一体制下，一些国家仍然将婚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交与丈夫打理，剥夺了女性的支配权（这是殖民地法典的遗留）。在 43 个接受调查的、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默认共享财产体制的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其中包括 8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智利（唯一保留该规定的拉丁美洲国家）和菲律宾（菲律宾改革了家庭法，但是保留了这一规定）（见专栏地图）。法国于 1985 年废止了这一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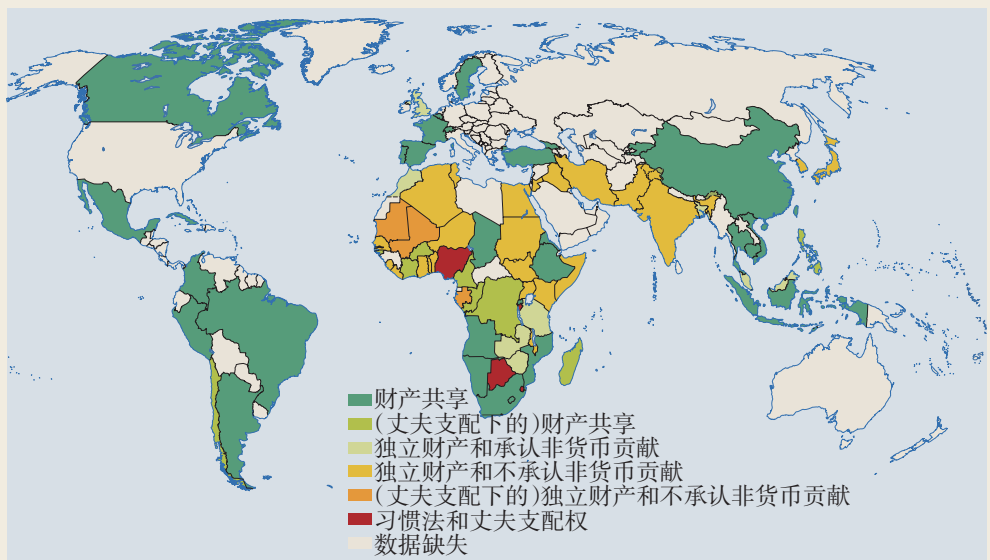
独立财产制度。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任何财产归自己所有。这种制度保护女性企业家，使她们在离婚时可以保持对生产性资产的支配权。但这使大多数女性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除非立法有规定，离婚时对家庭的非货币贡献是不被承认的（女性的货币贡献通常低于男性，因此在婚姻存续期间她们的资产也少于男性）。有几个国家已经在婚姻法中加进了承认女性非货币贡献的条款（尽管许多国家认为这种贡献低于男性的贡献）。

在 35 个接受调查的、实行独立财产制度的国家中，承认非货币贡献的国家只有 7 个（包括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摩洛哥和坦桑尼亚）。传统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习惯法或宗教法并不承认非货币贡献。穆斯林国家实行的 Mehr（结婚时给予新娘的嫁妆）的确为女性提供了赡养费，但是在某些情况嫁妆的价值太低了，不能保证女性的平等地位。一些国家已经试着增加价值（如孟加拉国），或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些国家，女性还被列为优先权利人，她们对 Mehr 的权利优于任何其他权利人的所有权。一些穆斯林国家（比如摩洛哥和突尼斯）允许非强制性婚姻财产共享制度，后者是土耳其默认的制度。

习惯法制度。默认习惯法制度的只有非洲的四个国家，它们是博茨瓦纳、布隆迪、尼日利亚和斯威士兰。一般而言，习惯法制度对女性不利，传统上，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由男性打理，非货币贡献不被承认。婚姻存续期间，财产通常由丈夫支配。在某些情况下，女性在离婚时甚至丢失了她们带到婚姻中的财产。

多种制度。某些国家存在多种制度。每一对夫妻都可以从中选择。理论上女性可以选择为她们提供最大保护的制度，但是大多数夫妻选择默认的制度。例如，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家庭法改革意味着夫妻可以选择放弃独立财产制度，转而选择共享财产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选择却是有限的。因此，选择默认的婚姻财产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决定。

专栏地图 4.2.1 世界各地女性具有不同的财产支配权，对女性而言，这是离婚时或丈夫死亡时事关重大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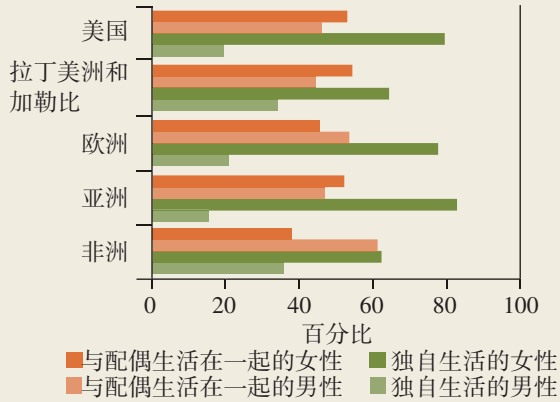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Htun 和 Weldon 2011b、利兹非洲女性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性别法图书馆的估算值。

专栏 4.3　寡妇面临着丧失资产的风险，但是可能获得一些自由

在配偶死后，丧失自主能力的风险就会出现，这种风险对老年女性的威胁更大，丧失配偶的女性人数几乎是男性的三倍。由于女性预期寿命更长，丈夫和妻子之间存在年龄差异，在生命某一点经历丧偶之痛的女性远远超过男性。在马里，许多女性年纪轻轻就成了没有多少权利的寡妇，她们的孩子更有可能遭遇营养不良问题和辍学问题，这表明贫困的代际传递源于孀居。而且，世界上不生活在大家庭中的老人中，独居的女性更多，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男性更多（见专栏图 4.3.1），男性再婚的几率高于女性。

专栏图 4.3.1　老年女性独居的可能性更大，老年男性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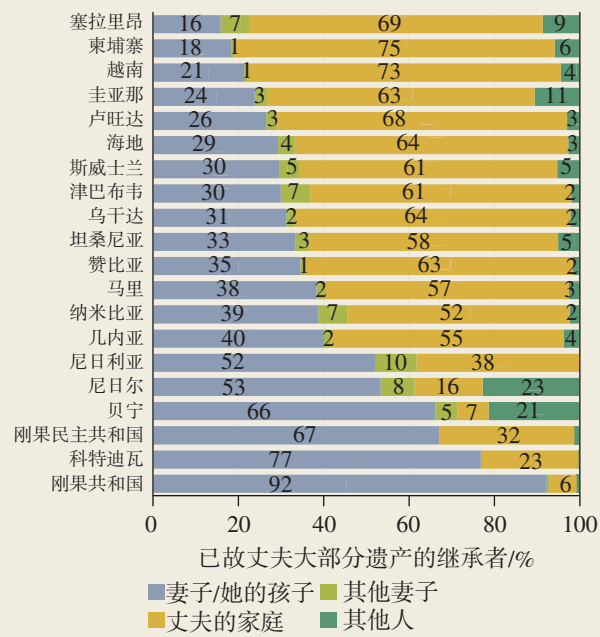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表Ⅱ.7 的估算值。
注：样本不包括生活在大家庭中的老年人。

成为寡妇常常意味着女性的生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和经济机会定性研究的参与者系统地将寡妇列入权力和权利很低的层级，而这却并不适用于鳏夫。

女性积累资产的过程受到普遍的继承法及其实施的影响，而在许多地区，继承法及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女性。[a] 来自柬埔寨、圭亚那、海地和越南的证据表明，妻子（或她们的孩子）继承了已亡丈夫的大部分遗产。相比之下，在 16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没有继承配偶任何遗产的寡妇超过了一半，只有三分之一的寡妇宣称她们继承了丈夫的大部分遗产。其中在 14 个国家中，大部分财产由丈夫的孩子和家庭继承（见专栏图 4.3.2），卢旺达和斯威士兰是例外。较大的继承权通常与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好的财富状况相联系，这表明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通过谈判获得有利的财产继承权利。这种模式也体现在寡妇的土地和牲畜所有权上。在 70%具有数据可考的国家中，和男性户主家庭相比，以寡妇为户主的家庭（家里没有工作年龄的男性）拥有土地的可能性较低。

专栏图 4.3.2　在大多数国家中，丈夫的家庭获得他的大部分遗产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Peterman（2010）和（2005—2008）人口健康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注：丈夫拥有资产、处于寡居状态的女性样本。

当女性失去了婚姻家庭或丈夫所在村庄的土地，她们就不得不回到娘家所在地或另找一个人再婚。但是，年长寡妇再婚的选择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男性更倾向于娶年轻一点儿的女性。事实上，马里的寡妇更有可能缔结一夫多妻的婚姻，成为其中地位较低的妻子，这进一步降低了她们的能动性和福利。

根据一个更积极的解释，孀居可以带来重要的收获和日益增长的自由。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与经济机会定性研究显示，在婚姻制度与社会、经济和物质限制密切相关的地方，尤其如此。在阿富汗，寡妇的权力和权利层次很高，这是因为“由于家庭中没有男人，她们才是家庭中的权力拥有者。她们决定所有的事情。她们并不富有，但是在家庭内部，她们拥有权力和自由”。讨论显示，寡妇是唯一能够独立参与经济活动（例如养羊）的女性群体。在印度尼西亚，女性指出寡妇具有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再需要获得丈夫许可的优势。在也门共和国，需要参加工作养家的寡妇和已婚女性相比，具有更大的流动自由，而且赞成参加工作。

资料来源：Catell 1997；van de Walle 2011；Velkoff 和 Kinsella 1993；世界银行 2011。
a.《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乡村创收活动数据库调查得出的估算值。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等存在差异，但是玻利维亚、肯尼亚、马拉维、尼泊尔和尼加拉瓜没有发现差异。

关于离婚后儿童监护的安排可能阻止女性脱离多配偶制婚姻，降低她们在家庭中的能动性。在许多国家，母亲对孩子的监护通常要持续到一定年龄，然后监护权转移到父亲那里（或允许孩子进行选择）。但是如果母亲不是公民，一般情况下，她的监护权会被削弱。但是在某些国家，如果女性再婚，父亲会取得监护权，或即使母亲行使监护权，父亲也会保留自己的监护资格。监护权法通常被视为保护女性、确保父亲即使放弃了监护权也要为自己的孩子提供经济保障的法律（如摩洛哥），但是在实践中监护权法却可能削弱母亲就自己孩子做出决定的能力。在某些父亲忽视自身责任和义务的情况下，国家法律迫使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非婚生子女。在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立法确定了独立于法定婚姻的父母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了确认父亲身份、确保父亲抚养非婚生子女的机制。此类立法增强了巴西女性的谈判力。[47]

> “一些女性担心她们的丈夫把孩子带走。”
>
> ——塞尔维亚成年女性

至于家庭暴力，许多国家已经通过了健全的法律，而参与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与经济机会定性研究的女性已经意识到法律是反对家庭暴力的。[48] 但是许多刑法典和民法典不能对某些类型的身体、性或情感暴力定罪（拥有针对性骚扰具体立法的国家刚刚超过一半[49]），或仍然包含阻挠定罪的条款。同样，立法也未能完全覆盖除配偶外的家庭其他成员针对女孩和成年女性实施的暴力行动，这些家庭成员包括父母、继父母、兄弟姐妹、叔叔或阿姨、祖父母。在某些国家，如果女性被确认为通奸，那么法律就会减轻罪犯所应受到的惩罚，如果强奸犯同意迎娶受害者，法律就会允许强奸犯逃避刑事制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婚内强奸仍然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在所有国家中，只有 1/3 的国家规定婚内强奸是非法的。各地区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立法进程是不平衡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欧洲和中亚、经合组织国家的进展比较大，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南亚的进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50]

许多国家或者要求女性外出工作时征得丈夫的同意，或者在妻子的工作与家庭利益发生矛盾时允许丈夫提出异议，从而限制女性出外工作的能力，在 117 个具有既往 50 年信息的国家中，23 个国家是这样。大多数这样的限制出现在以殖民时代法律和惯例法或宗教法为法律基础的国家中（具有习惯法传统的国家通常没有这样的限制）。德国、希腊、西班牙和瑞士最终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取缔了这类规定的残余部分。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中，这些法律似乎不具有约束力，与女性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没有太密切的联系。但是中东和北非是例外，在那里，对女性的限制很普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很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女性使用赋予她们出外工作权利的标准婚姻契约来规避这些限制，因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很高。

在婚姻关系受到“从夫居”习俗影响的地方，即婚后妻子到丈夫家生活的地方，法律可能体现了普遍的社会规范。在尼日利亚，成文法并没有对女性的工作做出具体的限制，但是惯例法和宗教法仍然约束大多数人口。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阿姆哈拉和

哈迪亚），2000 年的家庭法改革使得与丈夫的家庭一起生活的女性人数减少了，在那里，48%的女性感觉她们需要丈夫的允许外出工作，和印度北部地区（北方邦）和尼日利亚（马古札瓦和豪萨）的 90%和印度南部地区（泰米尔纳德）的 75%相比，这一比例显然要低得多。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这一比例降至 28%，这表明城市化和日益变化的家庭结构可以对习俗产生影响。[51]

多元化法律体制可以对女性的自主性和平等地位产生影响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都存在着不同法律体制并行不悖的现象，我们将这种情景称为法律多元主义。简单说，当人口（或部分人口）承认一个以上的法律渊源时，法律多元主义就产生了（见专栏 4.4）。在这些国家中（有时候也在这些国家之外），个体可以在不同的审判地提起诉讼，法官或其他决策者也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法律。

一般来说，法律多元主义本质上对女性的能动性和性别平等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事实上，当所有体制是非歧视性的和促进性别平等的体制时，多元体制可以在不损害女性能动性的前提下并存。而当所有体制都隐含了不平等的社会规范和权利机制时，这些体制可能难以适应平等服务女性利益的需求。[52]

尽管如此，并行体制可以提供不同的权利。和惯例法相比，许多成文法法律体制给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惯例法可以淡化成文法规定的权利，导致一种和成文法体制规定大不相同的形势。例如，某些在宪法中承认惯例法的国家也免除了惯例法的非歧视原则（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见地图 4.1）。这并不是说惯例法一定是歧视性的，但是它却为国家制裁的歧视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当法律带有歧视性时，惯例法的确限制了可用于质疑这些法律的机制（通过取缔宣布这些法律违宪的选择）。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惯例法也可以比成文法更有利于女性。例如，某些国家中（成文法）土地产权化过程剥夺了女性在惯例法下获得土地或使用土地的权利。[53] 在肯尼亚，管理土地获得的体制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共用制度，而新的成人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却将公共土地权利给予男性，

专栏 4.4　法律多元主义及其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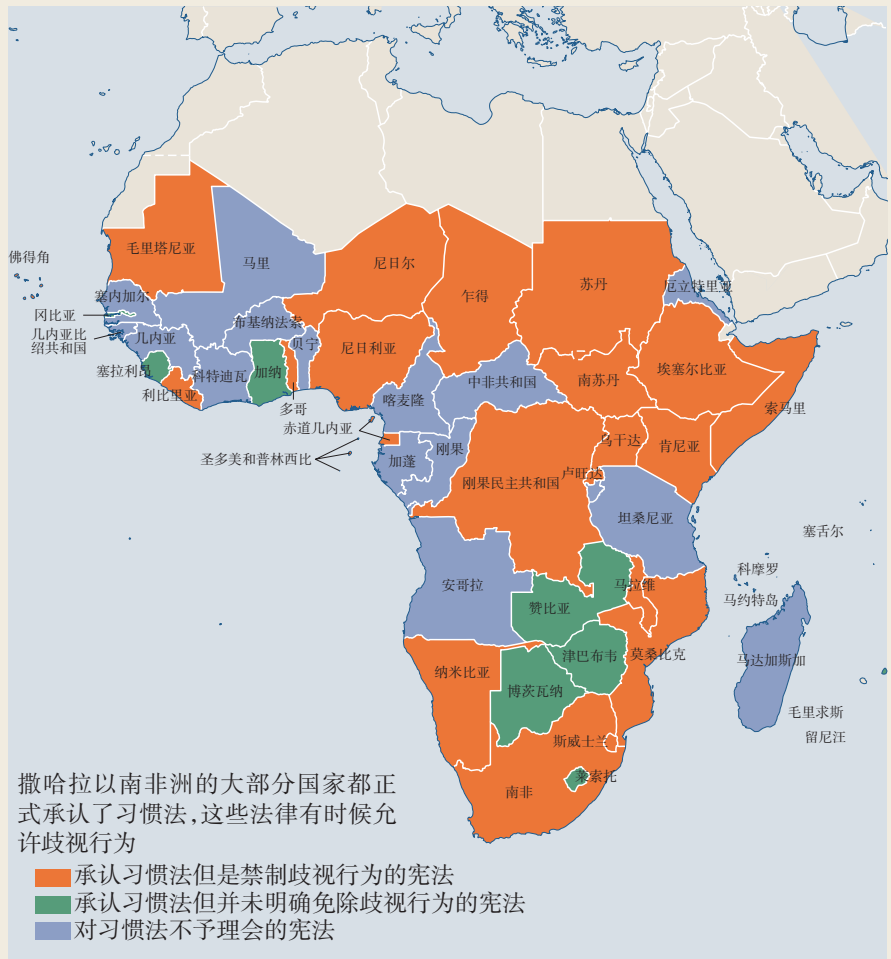
什么是法律多元主义？当存在解决纠纷的多种法律和审判地点时（国家的、超国家的和国际的法律和机构、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宗教和传统权力机构），法律多元主义就产生了。法律制度可能是正式的、纳入国家制度的存在。它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独立于国家制度之外的存在，比如巴西的街道委员会，中国农村地区的泛灵论机构或基督教机构，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族族长会议等。最后，某些混合型制度可以同时具有国家和非国家制度的因素，国家可以创建或承认这些机制并将其纳入正式的司法体系，例如印度的人民法院，但是可以适用不同层面的法律。

多元主义的适用程度有多广泛呢？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多元的。例如在英国，伊斯兰教教法法院和国家法院并行不悖，并且接受国家法院的管辖；在肯尼亚，正规法院可以同时解释并适用惯例法和成文法。但是，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法律多元主义，但是它对低收入环境、农村地区、冲突后脆弱国家的影响尤其大。在实行法律多元主义的国家中，惯例法和宗教法有时得到宪法或立法的正式承认并被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中。在对 63 个国家过去五十年中普遍适用的法律进行的深度审核中，本报告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正式承认惯例法或宗教法。正式承认惯例法或宗教法的国家行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为盛行（在分析的 47 个国家中，27 个国家正式承认了惯例法和宗教法）。在接受审核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只是在近期才在宪法中承认了惯例法，例如菲律宾在 1987 年承认了惯例法，莫桑比克在 2004 年承认了惯例法。

在许多奉行法律多元主义的地方，惯例法和宗教法在大多数人口群体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而不依赖于正式的认可。例如在加纳，尽管可以换一种选择，但是大约 80%的女性遵守惯例法庆祝她们的婚礼。同样，在马拉维，72%的土地根据惯例法管理，莫桑比克的这一比例是 80%，斯威士兰的是 60%，赞比亚的是 80%。因此，即使正式法律保护女性的权利，它们也不一定能够普遍适用。更宽泛一点，在国家制度薄弱或不可及的地方，地方传统机构或宗教纠纷解决机构的作用可能更明显。

资料来源：Chiongson 等 2011；Fenrich 2001；Hallward-Driemeier 2011。

地图 4.1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正式承认惯例法，这些法律有时带有歧视性



资料来源：Hallward-Driemeier 2011。

由于女性的使用权没有被纳入正规的制度，女性在土地交易活动中被边缘化了。莫桑比克和所罗门群岛也存在类似的例子。[54] 在某些传统母系社会中，惯例法也可能对女性更为有利。

因此，在奉行法律多元主义的环境中促进女性的权利，有两个方面必须得到考虑。第一，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法律必须同时应对歧视问题。成文法可以增强女性在惯例法代表性问题上的谈判力，发挥将惯例法拉向较大平等一端的磁铁石作用。[55] 第二，必须确认不同体系和机制中有助于扩大女性权利的有利因素，从而调解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之间的冲突，帮助女性同时使用两种制度。

有效行使权利是促进女性能动性的关键因素

女性缺少获得公正的途径是将规定的女性权利转化为女性能动性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许多因素可能限制女性获得公正，从供给方来说，法律制度和其他国家行为者不能充分履行职能就是限制因素，从需求方来说，个体或群体不寻求恢复公正就是限制因素。一些限制获得公正的因素（比如公正的可得性和权利意识的缺乏），对男性和女性而言都很常见。但是有些因素却更具有性别针对性。

国家制度能力低下或国家制度的偏好可以妨碍法律的实施

从供应方来说，供应方拥有一系列决策管理制度以确保法律得到贯彻和实施。这些制度包括从国家法院、警察机构、国家法律援助中心、法院执行官、征管机构等司法制度到土地委员会和移民法庭等半司法机构，再到土地登记、出生登记和婚姻登记等管理机构在内的一系列机构。此外，还存在私人纠纷解决机制和习惯宗教和社会制度等替代性机构，其中包括传统长老，宗教领袖和社区的族区理事会。

在许多国家，这些行为者确保权利实施的能力是有限的。制度的法律知识可能有限，实施法律的管理能力有限，设计的程序可能不合理。例如，土地所有权的程序可能不利于女性获得土地所有权，即使法律提倡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在法律被采纳后，司法机构要对规定的权利进行界定，对不同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的责任进行界定，对执法过程进行界定。建立具有性别灵敏性的程序可以确保强有力的权利行使。在发生家暴的情况下，这类程序将包括允许家暴受害者提供私人证词、以非对抗性程序解决冲突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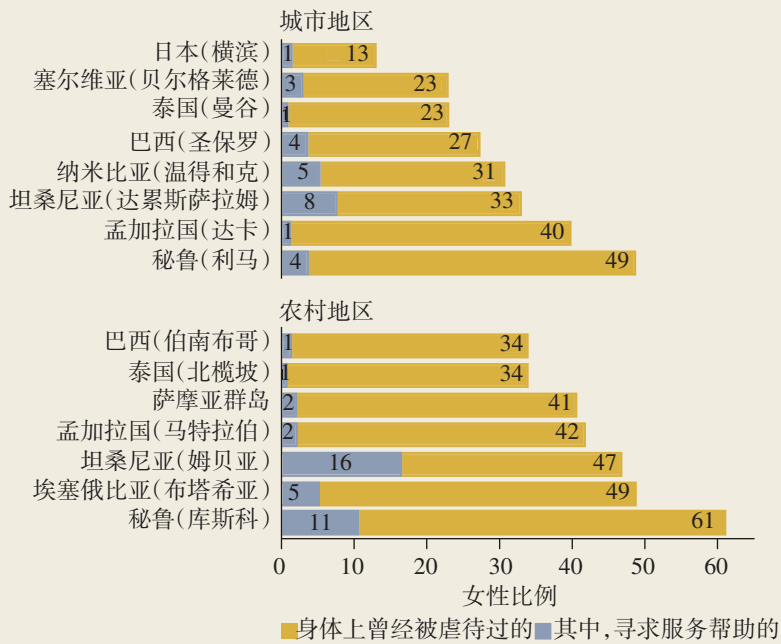
缺乏问责和监督常常阻碍了法律的执行，这是更普遍的问题。警官或法官的态度反映的常常是社会盛行的社会准则，从而限制了制度执行某些法律的制度能力。例如，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采访的印度警官中，几乎所有的警官都认为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一半接受采访的法官感觉被配偶虐待的女性自身是造成这种虐待的部分原因，68%的法官认为性感的着装是引起强奸行为的诱因。[56]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社会态度导致执法的延缓。在美国，和被陌生人强奸的案件相比，法官和陪审团迟迟不愿对约会对象实施的强奸行为或婚内强奸行为定罪。[57] 更普遍的问题是，在某些情境下，司法制度不愿促进女性的权利，尤其是不愿意促进围绕财产所有权、婚姻事务和家暴行为的女性权利。[58] 这种不情愿部分与男性在许多司法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相联系。在 2/3 以上被研究的国家中，女性在最高法院中的席位不足 1/4，即使在层级较低的法院中，女性的席位也有限（一些东欧国家除外）。[59] 在某些法庭上，女性法官可能不能享有与同级男性法官同等的权利或责任。例如，在瓦努阿图群岛的法庭上，社会规范意味着女性法官不能参与界定土地的范围。[60] 同样，在 13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11 个国家（包括印度、罗马尼亚、塞拉利昂、瑞典和美国）的女性在警察队伍中的体系不足 20%。[61]

> “医生的鉴定书总是很晚才能拿到，女性不能报警，因为丈夫会杀了她。警察来告诉你如果有人死了，你可以报警。如果我说我每天都惨遭毒打，法官是不会相信的。”
>
> ——塞尔维亚农村地区成年女性

> “女性了解关于歧视的法律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法律规定被违背了。在工作面试时，主考官会问她们是否会结婚，当她们怀孕时，她们会被解聘。”
>
> —— 塞尔维亚成年女性
>
> “成为寡妇后，（丈夫）的家庭会拿走一切财产。我们不能成功确保法律在家庭内部得到执行。”
>
> ——布基纳法索成年女性

图 4.9 遭遇家暴的女性很少寻求服务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2010。

难以对权利的行使进行监督和评估，尤其是难以对家庭内部权利的行使进行监督和评估进一步加剧了能力不高、迟疑和缺乏灵敏性等问题的严重性。许多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权利行使状况是不容易观察到的，因此，对其进行评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缺乏意识、社会规范和有所偏重的服务限制了女性对公正的需求

许多时候，女性无力要求执行，无论是因为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还是因为无力承担提出要求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尽管这种可得性不足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但是由于女性文化程度低、收入低、流动性低、社会网络窄，女性更容易受到影响。有些国家已经派遣律师助理传播法律知识并为农村地区的女性提供帮助。在印度尼西亚，在女性承认诉讼费用是她们获得离婚证书（要求获得社会援助项目的援助）的障碍因素时，最高法院预算对诉讼费用的免除机制增加了女性、穷人和其他边缘化群体获得离婚证书的机会。[62]

许多女性流动性不足，也缺乏参与法律体制的时间。社会规范关于性别角色的规定使女性承担了照顾家庭和从事家务劳动的责任，她们没有时间去寻求法律服务，当她们必须长途跋涉才能获得法律服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关于可接受行为和安全的规范也限制了女性的流动性及其获得司法服务的能力。

另一个具有性别针对性的因素是涉入诉讼引起的社会耻辱和精神创伤。当结果不可预测、当法律制度具有性别偏好、当法律行动者不合理地责罚原告而引起双重牺牲，女性通常不愿寻求司法帮助。对九个国家选定地区和城市的研究发现，因身体受到虐待而寻求服务的女性只有 10%左右（见图 4.9）。不寻求服务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规范对女性的权利要求毫不同情，同时女性对法律服务缺乏信任（低质量，制度宽容暴力行为和缺乏保密性）。[63] 正如纳米比亚城市地区成功提供法律援助、健康服务和咨询的专业化机构和巴西和秘鲁女性管理的警察局和专业化服务所示，如果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服务，转而寻求服务的女性就会增加。[64]

其他限制因素也可能对女性产生比例不相称的影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提起法律诉讼时，女性需要得到丈夫或监护人的许可。在惯例法法

> “我们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迄今为止我们对规则一无所知。”
>
> ——阿富汗成年女性
>
>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哪些权利。我们对法律所知不多。不要打老婆，法律规定了这个吗?”
>
> ——布基纳法索成年女性

庭上，她们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限制，她们不能直接诉说自己的不满，陈诉不满以引起长辈的注意通常是男性户主的事情。[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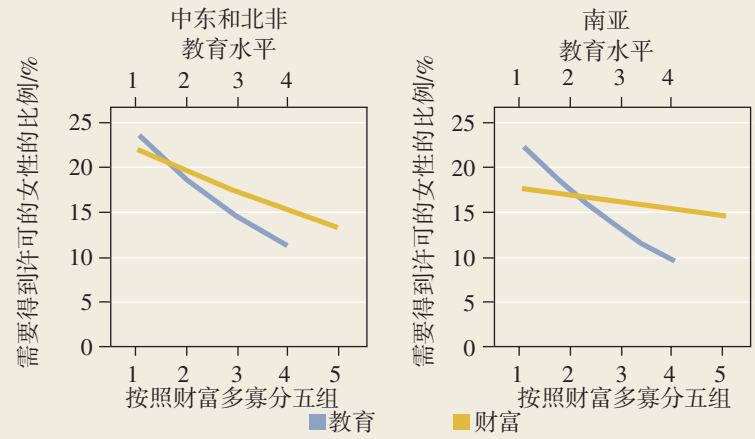
社会规范阻碍或促进女性能动性的提高

社会规范对期望、价值和行为产生影响。社会规范本身可以通过法律、提高服务和收入等消除能动性的限制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是否可以改变规范本身，从而改善性别成果。当社会规范效率不高，或不公正，或引起规范生成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时，力图改革社会规范的行为就尤其相关。但是有时候，社会规范可以以一种抵消法律和服务局限性的方式发生改变，从而提高女性能动性。例如，随着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加，孟加拉国等国关于女性身体流动的社会规范迅速发生了变化。

社会规范可以阻碍政策和服务发挥作用

通过对偏离社会规范或不遵守社会规范的人实施惩罚，社会规范界定和限制了女性发挥能动性的范围。例如，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存在对流动性的法律限制。但是流动性也受到关于女性可接受行为的社会规范和女性在公共场合安全性观念的影响，这里所指的社会规范主要围绕女性作为照顾家庭的人、谦虚原则和荣誉原则等几个方面。在南亚、中东和北非，家庭资源的增多部分消除了女性寻求医疗建议的限制因素，她们不再必须获得许可。但是教育更多地放宽了这一限制（见图 4.10）。在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关于性别和经济机会定性研究所覆盖的 19 个国家中，社会规范被认为是限制身体流动最频繁的因素，其次是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很少被提及）。[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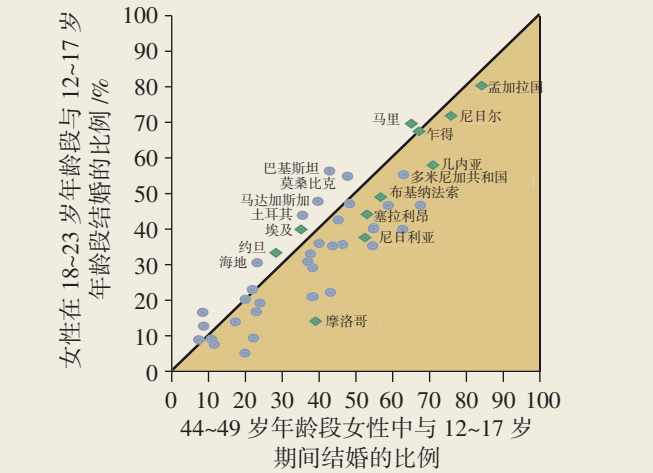
图 4.10　和收入相比较，教育更能抑制规范性限制因素
需要得到许可才能接受医疗护理的女性的比例，根据教育和财富水平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 2003—2009 年人口和健康调查得出的估算值，40 个国家。
注：蓝色线是拥有一半财富和支配特征、接受医疗护理需要得到许可的女性的比例。黄色线代表拥有处于平均教育水平和拥有支配特征、接受医疗护理需要得到许可的女性的比例。

影响女性流动性的规范包括对合理使用公共交通、骑自行车和获得驾驶执照等进行管理的规范。在马拉维，社会规范阻止孕产妇使用用于紧急产科护理的自行车式救护车。[67] 在城市地区，人们更关注安全问题，而不是社会规范本身。在摩洛哥和也门共和国，25%~30%的城市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说她们在街道上遭遇过性骚扰，农村地区的数量则要低得多，约为 5%左右。女孩到学校读书面临的限制因素更多地与安全问题而不是社会规范问题联系在一起。[68] 在青春期前后，随着人们更多地考虑女孩的安全问题，她们的流动性可能因此而大大降低，这可以限制她们追求经济机会或发展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在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与经济机会的定性研究中，大部分城市社区的男性和女性均面临着高于农村地区的安全风险。在农村地区，女性对安全问题的担忧甚于男性，但是城市地区的男性

图 4.11 尽管结婚年龄存在差异，许多女孩仍然在 18 岁之前结婚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3—2009 年人口和健康调查的估算值。
注：上图中 45°线是表明横坐标轴和竖坐标轴相等值的直线。

和女性表达的忧虑大体相似，这可能是城市中心地带街道暴力的反映。[69]

社会规范也可以决定女性较高的独立收入能否转化为在家庭内部较强的谈判力。在印度，女性使用自身收入影响决定的能力取决于她们的社会背景，与祖先所属社区联系较弱的女性更能挑战社会规范，收获自主收入的利益。[70] 约 20%的世界发展报告研究的参与者说丈夫完全控制妻子的自主收入（农村地区的比例稍微突出一点儿）。参与者还说如果女性并不控制自己的收入，那么自主收入对赋权的潜在作用就会受到限制。[71]

社会规范的约束性尤其表现在诸如家庭组建这样的领域中。很少有男孩在非常小的年纪结婚，但是在许多国家，女孩童婚现象依然很严重。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南非和坦桑尼亚，到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再到中东的科威特，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女孩在较小的年龄结婚（通常最低结婚年龄低于男孩）。[72] 许多童养媳嫁给了年长许多的男人。女性结婚时年龄较小和夫妻之间年龄差距太大都与女性较低的谈判力和较高的家暴风险（以及在高发病率环境下较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风险）相关。[73] 本报告分析了 46 个国家，其中 29 个国家的 18~23 岁的女性中，在 12~17 岁之间结婚的女性比例超过 30%；在其中的 11 个国家中，超过 30%的早婚女孩嫁给了至少比自己年长 10 岁的男性（见图 4.11）。

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社会规范是造成家庭暴力行为持续猖獗的部分原因所在，即使是在国家和个体收入增加的时候也是如此。[74] 如同来自亚美尼亚、马拉维和卢旺达的数据所证明的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国家对待家庭暴力的态度一直在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仍然是有限的，而多种形式的身体虐待、感情虐待和性虐待依然得到许多男性和女性的宽恕。在几内亚、马里和尼日尔这样的国家中，约 60%的女性认为如果妻子拒绝性生活，男人殴打妻子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和塞拉里昂，超过 50%的女性认为如果妻子和丈夫争论，男人殴打妻子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观念在农村地区更为盛行，农村地区有这种观念的女性要高出 10%，但是在所有受到研究的方面，年轻女性持有的观念和她们长辈持有的观念惊人的相似（持有如果妻子拒绝性生活，男人可以殴打妻子这一观念的女性比例稍微低一点，是个例外）。[75] 社会规范接受暴力行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家庭暴力常常与更广泛社会领域的暴力，例如打架斗殴、抢劫或枪支暴力等相叠合。对六个国家选定城市的研究发现，对妻子实施身体暴力的男性在外面参与暴力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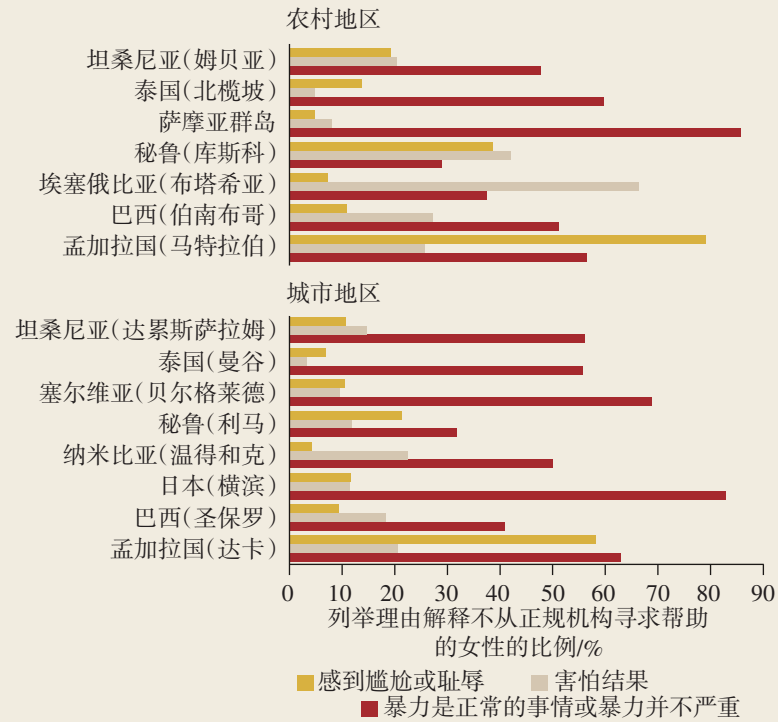
可能性是其他男性的 2~5 倍。[76]

很少有暴力活动的受害者会寻求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的帮助。女性就不告发家暴行为而陈述的主要理由包括耻辱感或负罪感、暴力是正常的或被认为是合理的、害怕后果以及缺乏来自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见图 4.12）。这些感觉大体上是由接受暴力活动的社会规范促成的，是由受害者自己应当对所受暴力负责的观念促成的，是由家庭和朋友将不会承认或支持受害者的恐惧感造成的，是由偏离社会规范的人将受到惩罚的恐惧感造成的。[77] 在许多环境中，人们认为女性才是在街道上、工作场所或学校等家庭外部暴力侵害的责任人。

在大多数国家中，家务活、生儿育女、照料病人和长辈的任务被视为女性唯一的、首要的责任，而男人的主要责任则是养家。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和经济机会定性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好男人”的定义稍稍改变了一点儿，加入了一些与照顾家庭相关的因素，而“好女人”的定义仍然停留在家务领域的作用上（见专栏 4.5）。而这种观念可能规定了女孩的愿望和父母对女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

有些社会规范对男性和男孩也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这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界定为男人，他们可以强化那些对女性和女孩产生影响的社会规范（见专栏 4.6）。男人也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这些社会规范决定他们的角色和行为及其做出选择的能力，从而决定他们的目标实现并支配他们的生活。就性别角色而言，即使女性在家庭外部的生产性活动已经增加，男性在家里也很少多做一点儿事情（见第 5 章）。因此，男性身份深深扎根于他供养家庭的能力。[78] 世界发展报告对 19 个国家进行的定性评估显示，尽管偶尔也存在丈夫接受妻子经济角色的特例，但是收入较高的妻子通常被视为是对男性地位的威胁而不是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调查参加者强调经济紧张通常是家暴的根本原因，这可能是因为这挑战了男人作为维持家庭生计者履行其职责的能力。而且讨论显示女性语言上或精神上虐待男人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剧男人因失业而形成的懦弱。在巴西、智利、克罗地亚和印度等地区，受到经济紧张问题困扰的男性和没有受到经济紧张问题困扰的男性相比，更有可能采取暴力行为攻击他们最亲密的伴侣。[79] 他们也更有可能遭遇经济大萧条的伤害。在印度，受到经济紧张问题困扰的男性经常滥用酒精的次数是其他男性的 2.5 倍，这给他们带来了健康风险，也带来了家暴行为的风险因子。[80]

图 4.12　暴力受害者不寻求帮助的原因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2010。

专栏 4.5 做一个“好妻子”和“好丈夫”意味着什么?

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好妻子?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好丈夫?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城市地区还是在农村地区,是在贫穷国家还是富裕国家,关于好妻子的社会标准呈现惊人的相似性。

首先,一个好妻子会熟练地处理她所承担的家庭事务,善解人意,照顾其他人的生活。好妻子要“能够理家”,一位巴布亚新几内亚女性如是说。“她们必须做一手好菜”,另一位波兰女性如是说。在加沙,一个好妻子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做家务和孩子的教育”。女性是否出外工作和是否受过教育却很少被提及。

即使在女性出外工作的地方,关于好妻子的社会规范也是这样。印度奥里萨邦一个群体是这样定义好妻子的,“早晨早点起来,做完所有的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如果有机会就要到村里做工赚钱,收集可在市场出售的森林产品以增加家庭的收入”。不丹的情况也差不多,“即使女性和男性都在农场上工作,回到家里,女性仍然被要求去做饭、洗衣服、喂养动物并照顾儿童”,一位农村女性如是说。

做一个好妻子也包括尊敬自己的丈夫:对丈夫忠诚,支持、尊敬和顺从自己的丈夫。在非洲,好妻子“尊敬自己的丈夫并为丈夫做饭”。在秘鲁,妻子必须“性格好,爱自己的丈夫,帮助自己的丈夫,做一个家庭主妇”。在性别规范禁止女性出外工作的社区里,好妻子的内容也包括不在外面从事工作。在阿富汗,“好妻子就是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

拿今天的好妻子和前几代的好妻子相比,许多女性发现了积极的变化。她们认为和今天的好妻子相比,自己的母亲是无私的、辛勤工作的主妇,更顺从、更依赖自己的丈夫。一位波兰女性说在她母亲那个时代,“女性的概念是不同的,她只是个女仆。但是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女性考虑其他人,考虑自己的家庭,但是她不会忘记自己的需求。”赚钱能力也成为好妻子品质清单上的一项,而且正在朝着最重要的地位发展。

男性和女性关于好丈夫的定义重申了许多关于男子气的老套。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对好丈夫定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养家的能力。“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不养家,那你算什么男人?”坦桑尼亚的一个男人如是说。“一个好丈夫应该能够赚钱。往家里拿钱是他的主要责任”,一位越南男人如是说。“一个好丈夫要辛勤工作,要养家,是家庭的实际户主,尊敬家庭的成员。”

然而男性群体也承认,时代促使他们更多采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平等的性别规范。在坦桑尼亚的同一个村庄里,一个非常有势力的男人“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与妻子关系很好,决定家庭的事情”。讨论组常常将好丈夫规范的变化、当前男性努力成为好的养家者和女性日益成为养家者的角色混合联系在一起。在越南,男性说随着女性参与工作并赚取收入,“男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而现在“丈夫和妻子之间应该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在斐济,男性说在过去,好丈夫“传授家庭道德”,“要求严格”,而现在,好丈夫依然维持“家庭的团结和道德”,但是也会“花一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并“听听妻子的话”。在过去的 10 年中,和体贴(包括帮助做家务活)相比较,对好丈夫应当有权威、应当是家庭事务的主要决策者的要求不再那么重要了,也不再那么频繁地被提及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1。

由于社会规范塑造了市场和制度运作的环境,因此,它们同样也对有关女性选择的政策和公共服务的影响构成限制。例如,只有在女性具有使用避孕工具的自主权时,生殖健康服务在赞比亚的推广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分娩次数,这一发现揭示了在家庭内部社会规范对生育控制的约束力。[81] 在前面讨论过的例子中,土耳其义务教育对家庭组建的影响取决于社会规范对教育、婚姻和生育的排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强烈反对社会规范的法律只能适得其反。这正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迫使警察即使在原告撤诉的情况下也要逮捕并起诉家暴实施者的严苛法律,最终导致告发率的下降。[82]

“男人的虚荣心尤其不能容忍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的收入比男人高,供养男人,告诉男人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男人不能毫无羞耻的忍受这种情况。”

——塞尔维亚城市地区成年男性

“面对失业,男人会感到挫败,感到沮丧,会酗酒,殴打老婆。”

——巴布亚新几内亚成年男性

社会规范难以消除

在直接影响权力或控制力的领域，社会规范通常具有极大的反复性。那些在社会规范变革中丧失权利的人会积极地抵制变革，而那些能在变革中受益的人又不足以对变革施加影响。不良社会规范的反复也可能是由潜在利益获得者无力对那些变革中的输家进行补偿引起的。

某些性别规范可能非常顽固。从殉夫（寡妇在丈夫葬礼的柴堆上成为牺牲品的印度教传统）和缠足等不再存在的规范，到目前女性的生殖器切割和对女性身体流动的限制，再到就业或家务活分配等更普通但仍然有害的规范，都表现了极强的顽固性。专栏 4.7 对这些规范顽固存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对即使大多数或全部支持这些规范的个体在没有这些规范的情况下会更好或有意反对这些规范的时候这些规范如何顽固地存在作了揭示。专栏也对女性自身如何推广和强化伤害她们的社会规范进行了解释。由于许多规范是在年龄较小的时候习学的，过时的或令人讨厌的规范可以跨代传递。近期研究突出了态度和观念的代际传递。例如研究显示在美国，女性将她们关于养育重要性的观念传递给了她们的孩子。[83]

自信心和自效力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规范的顽固性。事实上，科学证据显示，个体对自身能力及其成功可能性的自我感觉对他们的实际表现非常重要。因此，暗示女性在某一特定职能领域内（如政界或商界领袖，或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不如男性的社会规范将可能内化在女孩和成年女性的心中，然后，这些女孩和成年女性由于缺乏自效力意识或发展这些职能的意愿可能较小而不能和男性一样表现突出。如此，社会规范将进一步被确认，被维护。自信心和人们将证据误解为对他们初始观念额外支持的倾向解释了社会规范是如何持续存在的，即使它们的存在没有任何基础。[84]

专栏 4.6　男子气概及其对责任、偏好和行为的影响

关于男子气概的普遍概念因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异，但是某些特征在大多数文化形态中都存在。关于男子气概的规范影响男人和男孩与女性、儿童和其他男人之间的关系。关于男性的理想，包括男人应当强壮、粗犷、富有冒险精神，为维护自己的男性形象而忍受疼痛等，似乎是普遍接受的特征。这些观念对冒险行为和健康产生影响。

男人气概最重要的特征是养家的能力。在某些情景中，当男人因没有足够的工作和收入而不能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养家时，社会规范就会造成高度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沮丧、拘留、暴力、酗酒等较高的发生率）。除养家之外，男子气概的另一个条件是成为丈夫和父亲，掌控整个家庭。在单身男人受到猜忌或不同待遇的地方，这种期望给男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家务活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男性认为换尿布或洗衣服绝对是女人做的事情。结果，即使女性在外面的工作更多，男性也不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工作或没有报酬的照顾家庭的工作，因此也就错过了因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而获得的心理和健康收益。调查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男性更有可能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家务劳动或照顾家人，也许这是因为教育改变了社会规范、削弱了陈词滥调的约束力，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收入也较高，从而可能对他们挑战社会规范的能力或倾向产生了影响。

在某些国家，例如牙买加，在学校或教育方面表现不佳常常被视为男子气概，即使这种观念降低了男性的未来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公开承认他们是“真正”男人的压力导致男孩子以冒险行为和强调成就或性能力而不是亲密关系的性生活经历来强化自己的男子气概，而这种性经历常常伴随着性虐待。在冲突的环境中，有关男子气概的社会规范增加了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在冲突期间，青年女性常常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由于男性去了战场，冲突也挑战了男性履行家庭生计提供者和家庭保护者的职责。

男性基本上不参与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有关性别平等的方案和政策基本上是为女性设计的，如果这些方案和政策涉及男性，那常常是限制或约束男性的行为。以积极的态度改变男子气概的政策设计却少的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产假就是突出的例子之一，在这些国家，改变男性的角色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正如女性性别身份的形成一样，男性性别身份的形成，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可塑的、动态变化的过程。

资料来源：Alesina，Giuliano 和 Nunn 2011；Bannon 和 Correia 2006；Barker 等 2011；Barker 和 Ricardo 2005；Barker，Ricardo 和 Nascimento 2007；Connell 2003；Connell 和 Messerschmidt 2005；Emslie 等 2005；Greene 和 Levack 2010；Kimmel 2010；Moller-Leimkühler 2003；Ousgane 和 Morrell 2005；Pollack 1995；世界卫生组织 2000。

专栏 4.7 社会规范为什么持续存在?

文化信仰塑造观念。来自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证据显示，个体的信仰决定他们所注意的事情或事务以及他们对这些事情或事务的解释方式。人们有一种认识偏知，这种偏知导致他们误读新的信息，从而强化他们原先已有的信仰。结果由于这种偏知，一种信仰，即使不再为事实所支持，也很难消除。事实上，如果两个小组具有不同的初始信仰，同样的新信息可能同时导致两个小组坚定他们的信念，即他们原来的信仰是对的。

由于许多假设认为个体是由其父母或祖父母所生活的社会塑造的，一整套既定的信仰可能发挥如何看待行为、如何解释行为的过滤器作用。文化决定认知。认知转而决定行为。例如，认为男性在某些领域天生比女性能力强的信仰可能塑造了个体的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这种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又导致个体在一个两性之间既无能力差异又无机会差异的环境中以一种创造差异的行为方式肯定这种信仰。

普遍的习俗塑造观念。当（几乎）所有家庭都遵守社会规范，当违背社会规范的后果非常严重，自觉遵守习俗可能成为普遍的存在。例如在中国，缠足几乎成为所有阶层（最贫穷的阶层除外）婚姻内群体的习俗，因为，违背这一习俗的特定个体或家庭就会受到丧失群体内婚嫁机会、丧失荣誉和地位的惩罚。只有在社区全体成员集体决定终止这一习俗，并保证不让自己的女儿缠足或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与缠足女性结婚时，这种习俗才会被废止。在习俗得到普遍遵守的时期，个体基本上是别无选择。以女性生殖器切割为例，通过阻止对切割或不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性道德进行比较，普遍遵循本身就塑造了信仰（确保性道德是切割女性生殖器的正当理由之一）。

权力塑造观念。当一种社会规范符合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该群体就会使用多种机制压制不同意见并维持现状，包括宣扬社会规范是上帝的恩赐或事务的自然秩序，封锁信息以阻止弱势群体认识到社会规范存在着替代方式。事实上，文化正是以确保男性更大控制力的方式架构的，而且有时候这种架构方式是有意而为的。

多数无知塑造观念。遵守某种社会规范的利益常常取决于有多少人遵循它。多数无知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一个群体里的大多数成员私底下反对某种规范，但是（不正确地）假设大多数成员接受这一种规范："没有人相信这种信仰，但是人人都认为其他人相信这种信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废除社会规范是一件难事。此外，如果个体相信他们必须排斥违背社会规则的人，否则他们自己会遭遇排斥，那么废除社会规范也会面临困难。于是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为避免遭到排斥，所有的个体都遵守谁都不会从中受益、谁都不会赞同的社会规范。

资料来源：Akerlof 1976；Benhabib 2002；Bruner 和 Potter 1964；Douglas 1986；Hoff 和 Stiglitz 2010，2011；North 2005；Powell 和 DiMaggio 1991；Rabin 和 Schrag 1999。

在许多国家中，实验证据显示，和男性相比，女性更讨厌竞争，即使她们具有同样的能力。这种差异是由男性较强的自信心形成的，而随着女性经验的增多，这种差距可以缩小。它也受到教养和社会过程的影响。事实上，这类差异不是出现在青年男孩和女孩之间，而是在社会性别规范开始起作用的时候，通常是在青春期就出现了。在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模式正好相反。两个均由男女两性组成的小组，一个来自女性主导的社会（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卡西），一个来自男性主导的社会（坦桑尼亚的马赛），两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相近。这两个小组被要求在两个游戏中做出选择。在游戏一中，成果取决于他们（她们）的表现；在游戏二中，成果取决于他们（她们）与他人竞争的结果。结果，在父系社会中（马赛），选择竞争游戏的男性人数是女性的二倍。但是在母系社会中（卡西），选择竞争游戏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即使将教育、收入和年龄因素的差异考虑进去，得出的依然是这种模式。该研究显示，教养和社会化过程共同塑造了对竞争的偏好，单是教养本身并不能解释竞争的性别差异。[85]

市场激励、信息和社会网络可以改变社会规范

通过对因违背社会规范而受到制裁的人提供补偿，市场力量有时候可以帮助削弱社会规范的影响力。例如，

如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或以女孩入学为条件的社会转移支付足够大，这就会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和父母让女儿接受教育提供极大的激励，即使在社会规范不支持的地方也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响应市场的强大激励，社会规范迅速演进。在孟加拉国，关于女性身体流动的社会规范迅速演变，这主要是由服装业带给女性的日益增长的经济机会形成的。[86]

可以使用两种干预方式影响社会规范，干预方式之一是扩大关于替代性社会规范知识的宣传（从而降低选择规范的学习成本）；干预方式之二是促进个体挑战社会规范或集体行动的协调（本章稍后将对此进行论述）。某些干预措施，例如女孩俱乐部，通过为女孩增加与同侪接触的机会，提供社会支持、信息，以及学习集体行动价值和机制的途径，覆盖了所有这些因素。

在其他环境下，信息可以转变社会规范。女性较少以政治身份亮相导致人们缺乏对女性政治领导能力的认识，这可以塑造她们没有价值的形象，降低她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而政策（例如配额制度）可以减少这些限制因素。在印度，从来没有过女性领导的村庄的村民倾向于选择男性领导，主观地认为和男性领导比较起来，女性领导的效率较低，即使女性领导和男性领导的绩效差不多。对女性领导的披露并不能改变村民对男性领导人的偏好，但是这的确削弱了公共和家庭领域中关于女性角色的陈规陋习，而且也减少了男性村民对女性领导人效率的负面印象。态度上的转变具有重要的选举意义，在配额政策实行十年后，在持续要求有一位女性委员的村庄里，女性参与竞选，获得自由席位的可能性更大。[87]

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里，一开始就参加投票的女性少于男性，部分原因在于参与投票的成本可能太高。社会规范可能鼓励诉求偏好。社会规范关于女性身体流动（包括安全考虑）的要求可能限制了她们的参与，女性也可能缺少关于她们投票、她们的权利和选举过程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息可以扩大政治参与。在巴基斯坦，信息缺乏强化了社会规范，进一步使女性与公共生活脱节。但是提倡参与的活动增加了参与的人数（提高了 12%），增加了女性选择候选人的独立性。[88]

角色模型也可以传递信息。当女性发现其他女性（当选官员、成功企业家和公众人物）并不屈从于普遍的社会规范，她们质疑这些社会规范时会感到更从容。事实上，实验显示，关于能力如何增长的信息披露可以消除绩效方面的性别差异。[89] 角色模型也可以对个体的自我概念产生影响。性别模式化会损害女性的智力表现。媒体披露或教育可以增加个体关于选择的知识和降低发现信息的成本，因而会对女孩和成年女性在生命中做出的选择产生影响（见专栏 4.8）。如同第 6 章所研究的那样，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角色模型从一种文化传递到另一种文化的扩散也可以促进这种模式的发展。有时候，个体与不同模型和信息的接触可以改变社会规范。在巴西，人们收看的肥皂剧中，主人公的家庭规模不大，这促进了意愿生殖率和实际生殖率的降低，相当于两年额外教育的影响。[90] 在印度农村地区，有线电视对性别态度产生了影响，导致生育率降低（主要是通过扩大生育间隔），从而促使农村地区的性别态度与城市地区的性别态度靠拢。[91]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普及可以加速信息共享

专栏 4.8 模式化观念是如何对表现产生影响的?

社会差异的历史可以形成模式化观念，即某一群体的成员天生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成员这一被广泛接受的信仰。而且模式化见解通过固化这些差异的方式对表现产生了影响。

实验显示，当人们被提醒他们（她们）的某一特征与负面的模式化观念有关系时，他们（她们）的表现会不尽如人意。例如，如果人们被要求说明他们（她们）的种族，那么对与负面模式化观念有联系的人口而言，被要求考前说明种族的人口的表现不如考后被要求说明种族的人口的表现。

另一个实验要应对的模式化观念是亚洲学生的表现要好于其他种族群体的学生和男性的表现好于女性。亚裔美国女性在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后参加了考试。调查问卷分两份，一份包括许多与亚洲相关的、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一份是没有提及亚洲或性别的无倾向问卷。完成第一份问卷的小组表现最优秀，完成第二份问卷的小组表现最糟糕。该研究清晰地展现了自我怀疑和群体身份认同会降低表现的模式。同样，人们发现在执行复杂的任务时，激发一人权力小于他人的感觉会降低他或她的表现，而激发一人权力大于他人的感觉会提高他或她的表现。

负面模式化观念和无权力的感觉均会降低表现，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发生了进步的改革，历史不平等还常常会继续存在。它也对试图改变这种模式的方式提出了建议。事实上，近期实验显示，改变人的智力天生就有性别差异的信仰、教导个体他们（她们）有能力提高自己的表现等可以降低或消除这里所描述的影响。

资料来源：Ambady 等 2001；Hoff 和 Pandey 2011a；Hoff 和 Pandey 2011b；Krendl 等 2008；Shih，Pittinsky 和 Ambady 1999；Smith 等 2008；Steele 2010；Steele 和 Aronson 1995。

的速度，尤其是随着较年青的一代获得信息渠道，信息共享的速度加快了。人口运动，尤其是返回到原社区的移民，也可以为信息的传播和社会规范的演变提供机制。在中国，返回农村地区的移民削弱了男孩偏好，大大促进了原籍地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接受和认可。[92]

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增加身体流动次数可以扩大女性的社会网络，从而降低女性的发现成本，即女性获得新信息的成本。通过扩大女性直系家庭（通常指丈夫的家庭）和同龄人以外的信息来源，这些网络扩大了已知替代方式和选择的范围。劳动力参与是扩大和深化社会网络的重要机制（见图 4.6）。

青春期尤其可能是女孩社交网络薄弱、生活环境狭窄的关键时期，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安全考虑和社会关于可接受行为的规范降低了女孩的身体流动；其二是她们在家庭中作为照料提供者的角色日益突出。尤其对贫穷的乡下女孩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在危地马拉，青少年女孩和男孩均汇报说缺少金钱和利益动机是他们（她们）不登记入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在 13~24 岁的青少年中，33%的女孩说家务活儿是主要原因，而 56%的男孩将出外工作列为不登记入学的主要原因（18%的女孩将出外工作列为主要原因）。因此，许多女孩丧失了她们的学校网络，又未能以工作场合中形成的新网络取而代之。[93] 在埃塞俄比亚，青少年女孩的社交网络比男孩小得多，如果需要留宿过夜，她们可以待在一起的朋友、可以待的地方要少得多。可以和她们的异性朋友相会的安全地方也少得多。[94] 来自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加纳、印度、马拉维、南非和乌干达的证据显示，青年女性的友情网络不如她们的男性同龄人的友情网络稳固。[95]

社会结构是将个体或家庭与其社区联系起来的纽带。社会结构的削弱也可以减少社会规范。例如，从乡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移民或乡村地区之间的移民削弱了家庭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降低了群体强化社会规范的能力。同样，提高女性参与劳动力的程度可以为女性提供降低来自同龄人或家庭控制的机制。和农村地区相比较，城市地区某些社会规范，即与丈夫控制家

> “现在，女性成为候选人已经成为选举中的一项义务。女性可以成为地方理事会的成员，而以前她们是不能成为理事会成员的。我们甚至有了女性法官，这提高了我对司法体系的信任，而且她们也提出了更好的建议。”
>
> ——秘鲁城市地区成年女性

庭中其他成员相关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也较小，这可能是较高的劳动力参与度和不同时间使用模式的反映。在所有女性需要取得丈夫许可才能进行体检的国家中，城市地区需要取得丈夫许可的女性的比例远远低于农村地区。[96]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移民城市可以导致移民社会网络关系的丧失和孤立状态。在其他情况下，和在原籍地时相比，移民社区强化了社会规范的应用。[97] 同样，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信息流动可以迫使群体采纳国际社会规范，而这可能遭遇抵制，至少在短期内导致更保守的社会规范。在中东的某些国家，和长辈相比，年青一代对女性外出工作持更保守的态度。尽管女性教育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安曼，约 40%的 15~44 岁男性认为女性不应该外出工作，比 45 岁以上男人的比例高出许多（29%）。[98]

女性的集体能动性可以塑造制度、市场和社会规范

挑战现状和增强女性个体能动性的能力也取决于女性集体发言的能力。挑战既有制度和社会规范要求有利于扩大性别平等的声音，包括来自女性的声音。女性并不是扩大性别平等政策的唯一提倡者（而且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提倡性别平等）；在许多环境下，男性也是这类政策的幕后推动者，是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同盟力量（见第 8 章）。但是对推动社会走向性别平等而言，女性参与决策进程非常重要。

女性要推进改革，要使自己的声音具有改革的力量，她们就要在决策机构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议会、立法机构、正规的专业协会、政府、法律承认的劳动力组织、土地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等。她们既可以通过参与决策机构（比如作为议员、法官、委员会委员或警官）也可以通过塑造（男性）决策的环境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有限

女性确实参与投票，但是她们进入或改善正规政治制度的行为不能和男性相提并论。尽管她们在国家层面，更明显的是，在次国家层面的代表席位增加了，指定由女性担任的位置增多了，但是总体来说进步一直比较慢，而且通常低于保证声音影响力所需要的水平（通常认为是 30%左右）。[99] 事实上，欧洲（日耳曼国家除外）和北美国家取得的进步并不比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少。尽管最近取得了进步，中东和北非的情况尤其引人瞩目，在那里，每 10 个议员中，只有 1 个是女性（2000 年，每 25 个议员中只有 1 个议员是女性）。[100]

进入政治舞台的女性倾向于担任较低的职位，集中在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即使在女性代表增加的领域，只有在女性能够进入重大决策实体时才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苏联的立法机构中有许多女性代表，但是她们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实权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国家部长委员会之外。女性也更有可能担任卫生部、教育部或社会福利部的部长，而不是主管经济或金融工作（见图 4.13）。[101] 某些国家依然存在着女性不能担任国家元首的宪法限制，确保女性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级之外。

女性参与司法机构重复这一模式。一般来说，低级法院女性法官的人数超过高级法院。通常，在其他半司法性质的机构中，男性同样占据主导地位。

女性在工会角色中的性别差异常常反映了在政治实体中的差异。全职工作并参与了工会的女性比例几乎和

图 4.13 即使到 2010 年，女性部长具有社会性档案的可能是经济性档案的两倍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各国议会联盟 2010，如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10 所述。

男性持平（发展中国家是 30%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欧洲和中亚是 10%左右，东亚太平洋地区是 10%左右），她们整体较低的参与率仅仅是她们劳动力参与程度较低的反映。相应地，地方层面的女性领导人数相当高，但是在高层领导层面的人数却急剧下降。在具有 5 000 万成员的欧洲工会中，女性成员的比例高达 44%，但是女性工会主席的比例不足 10%，秘书长的比例不足 20%，副主席的比例不足 1/3。[102]

结果，许多影响女性的议题没有在议程中得到体现。例如，工人运动在同一工种内同工同酬的倡导取得了成效，但是却没有对提高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工种的工资给予同等的重视。[103] 工会甚至会压制女性。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最大的公务员联合会支持保留结婚关限（据此，女性结婚时就不得不辞职）。而一直等到 1963 年，工会代表大会才要求实行司法干预实现平等报酬。在其他情况下，工会可能会捍卫女性的利益，即使其领导结构是男性主导的，例如美国教师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迫使女性结婚时离开劳动力队伍的法律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104] 在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马来西亚（但是不是美国），工会对女性工资施加的影响常常大于对男性工资施加的影响。[105] 除了促进平等，工会可以扩大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加她们发挥主动性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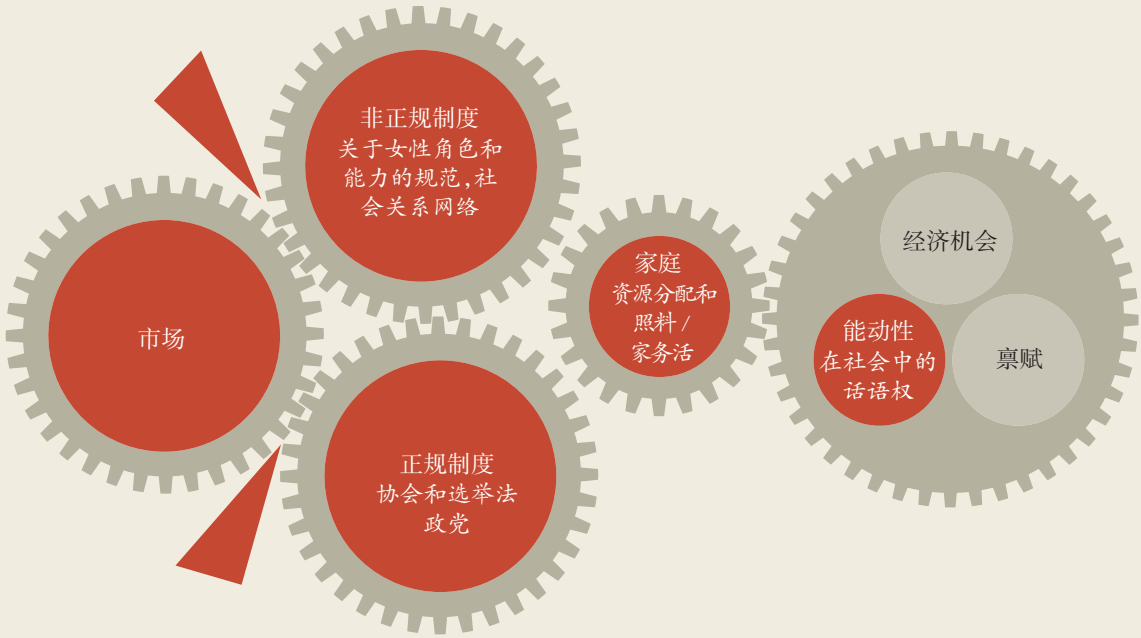
女性在大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席位也不多（欧洲约 12%，美国约 10%，亚洲太平洋地区约 7%，中东和北非约 3%）。[106] 大学中也是这种模式。2000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生分校的 70 个领导岗位中，女性只占据了 12 个（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6 个增加到 80 年代的 18 个和 90 年代的 22 个，然后又下降到 12 个）。女性所在的岗位更多是较低的、不容易引起注意的幕后岗位。[107]

如同本报告概念框架所示（见图 4.14），女性在社会中有限的话语权反映了一系列复杂的限制因素。关于女性角色和能力的社会规范、她们有限的社会关系以及她们在正规制度中的代表性不高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女性能力和性别角色的社会规范和信仰限制了女性在正规政治中的话语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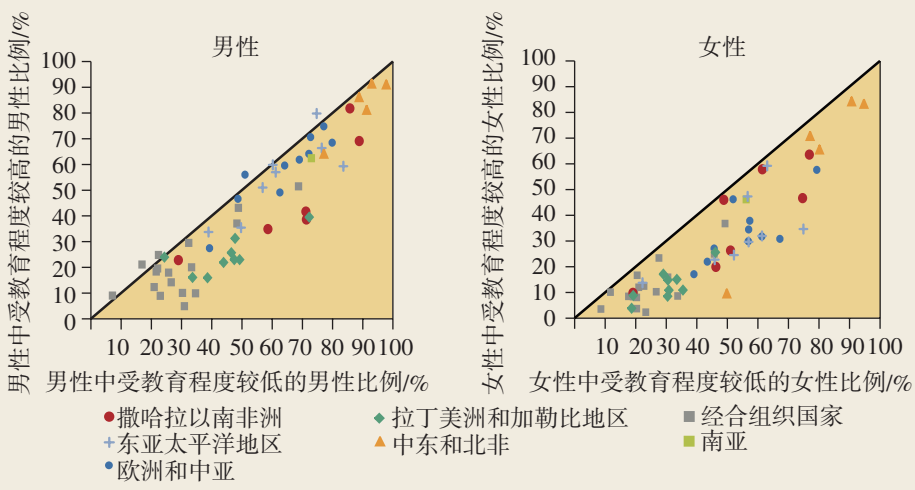
在许多国家中，男性（和女性）仍然认为男性是优于女性的政治领袖。近年来，在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中，在比较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中，这种观念已经削弱。[108] 但是在 2005—2008 年期间，在一半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仍然持有这种观念的男性人数超过 50%（见图 4.15）。缺乏对女性领导人的披露，因而大部分男性和女性并不知悉女性领导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有多高（信息失灵），这是造成这种观念持续存在的部分原因。事实上，如

图 4.14　女性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受到关于女性角色和能力的社会规范与正式制度的限制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图 4.15　关于领导力的观念依然盛行，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偏见更大
认同“男性会是更优秀的政治领袖”这一观点的人口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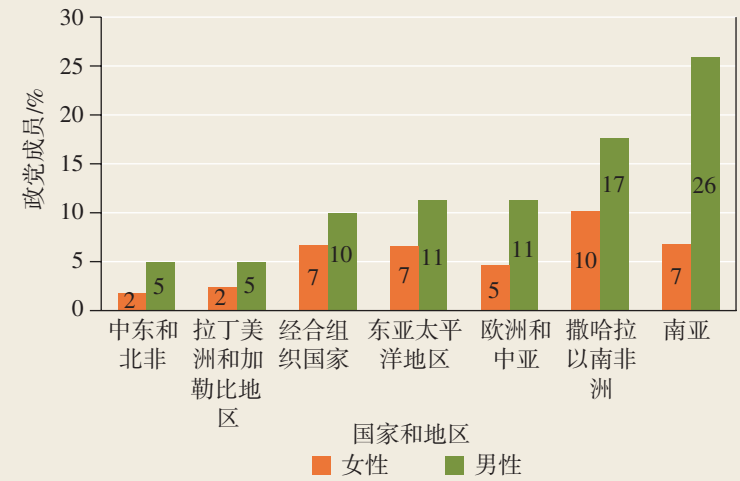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5—2008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注：上图 45°线均是横轴和纵轴的等值线。

果政党（或工会）采纳了候选名单配额制，或国家在某些选举中为女性保留了席位，那么观念会转变，配额的影响会超越政策实施的时期。[109]

和男性相比，女性具有较少涉足政治的倾向，平均党派关系率约为男性的一半（见图 4.16）。关于女性角色的强大社会规范也可以诱导女性选择男性领导人和歧视其他女性，这是因为她们高估男性的技能而对自身的技能认识不足。在西班牙，女性在选举法官的过程中倾向于高估男性候选人

图 4.16 女性加入政党的可能性远远低于男性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1994—1999 年和 2005—2007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的资格。一个基本由女性成员构成的专门小组进行的面试会使女性候选人的成功率降低 17%（与完全由男性进行的面试相比），使男性的机会增加了 34%。[110]

时间限制也是阻碍女性参与许多正规制度的因素，时间限制主要是由女性作为孩子和家庭主要照料者的女性角色社会规范引起的。最后，缺乏职业关系网是女性办公室政治参与不足的部分原因所在。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女性获得能够产生政治网络和社会资本、有助于进入政治舞台工作的机会较少，而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阻碍了她们建立稳固的、广泛的关系网。在亚洲中低收入国家中，时间限制和与女性有关的社会规范是女性较少参与政治的关键因素。[111]

这些限制因素常常导致女性为适应时间限制（例如孩子上学或宗教组织的活动）而集中在更加“女性友好型”的活动中。在这些次群体中，女性可以进步，但是这些群体通常并不能提供使女性赖以迈向更高层决策岗位的社会网络。[112] 在从南非到英国的许多国家中，据悉女性议员就议会内既有的常规做法进行了斗争，包括因会议定在一天较晚的时间而与家庭责任相冲突的问题到不合适的语言和态度等问题。[113]

选举法、政党、公共竞选资金使女性在正规政治中的边缘化角色得以持久化

政治选举制度和过程决定了女性的代表权和旨在改变现状的政策的影响。比例代表制是促进女性参与议会更有效的手段，而在封闭式代表制中，配额制的效果最好。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女性面临着根据党的路线投票的更大压力。[114]

只有在女性被列入选举名单，投票者才可以选举更多的女性议员。由于政党是政治制度的守护者，许多通过选举成立的机构要增加女性代表，这就要求政党的候选人名单确保提高性别平衡。但是许多任职者拒绝分享权力。

- 在西班牙，随着自愿性政党配额制度的实施，政党有时候遵循该指导原则，增加列入名单开始部分的女性人数，但这仅限于候选人顺序无关结果的选区。在候选人顺序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地区，政党有时候倾向于把女性候选人提名放在较为不利的位置上。[115]
- 在法国，政党有时候会通过将女性放在最具挑战性的地区、为违反配额制缴纳罚款或甚至为男性候选人特设独立的选举条件（否则这些男性候选人会被女性取代）回避配额制度。[116]
- 在挪威，劳动党引入了配额制，但是在 2009 年的议会选举中放松了规则，以男性和女性候选人总数与

其在选举名单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无关取代了第一候选人和第二候选人男性和女性人数相等的选举要求。在其他情况下，政党有提名作为男性候选人陪衬或无力挑战传统模式的弱势女性为候选人的嫌疑。[117]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会针对女性在名单上的位置设定额外条件，例如规定名单的前两个人必须是一男一女。和讨论相一致，对旨在提高性别平等的改革的分析彰显了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女性投票模式、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和贯彻配额法国家能力等的重要性。[118]

在政党和工会里，女性有时候会组成隔离的替代性群体，从而规避主流制度中的玻璃天花板。苦于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缺少代表，加拿大的女性工会成员组建了只有女性构成的委员会，对总议程施加影响并积极推动女性获得领导岗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女性成功竞选了中央劳动机构执行委员会的重要职位。[119] 同期在冰岛，女性组建了政治性政党女性联盟，以扩大她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并强调对她们而言重要的问题，即增加女性代表席位的数量。

制度环境也可以对女性参与决策机构转变为切实的行为构成限制。政党可能对其成员实施强有力的控制，阻止当选女性挑战现状和提倡不同的优先事项：而一旦当选，女性可能被迫遵循政党的路线而不是性别路线。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女性站在政党的路线一边，支持社区土地权法案，尽管由于某一选区对女性利益持敌对态度给非洲人国民大会造成了政治威胁，该法案未能赋予女性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120]

在国家层面，政党对自己代表的影响力更大，党性忠诚可能尤其重要，但是在地方层面，当选官员可能更多地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党性忠诚也许是有限度的。当然，当选官员的能力或投票者影响政策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她们）所在或所选举产生的制度的整体能力。[121] 在乌干达，30%的土地委员会成员必须是女性，但是土地立法并没有明确地授予女性土地权力，也没有明确制定女性友好型管理措施，从而限制了委员会女性委员的影响力。[122]

除非政治制度本身经历了更广泛的转变（如冲突后、政治分裂或其他冲击），否则女性不可能在政治代表席位问题上取得大的、突然的收益。这些转变为女性在不取代男性任职者或不挑战现状的前提下进入政治舞台提供了独特的机会。[123] 如果没有这样的转变，进步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更普遍一点，如在巴西、智利、希腊、南非、西班牙和土耳其发生的一样，国内转型可以为改革创造机遇之窗（但是改革不是自动的）。[124]

在非正规的群体中，女性发挥的作用较大

女性常常参加多个非正规群体，例如围绕经济活动组织的集合体、非正规的工会等等。[125] 非正规群体的成功与其消除正规领域中阻碍女性行使决策权的障碍因素、或获得正规领域否认的利益、或对整体政策议程施加影响的能力相关。非正规协会为女性提供了一种更具灵活性的、调和时间限制因素的聚会环境，提供了一个与其自我效能感觉一致的、威胁较小的空间，而且为具体问题提出了违背党派路线或种族路线可能性较小的务实性解决方案。[126] 例如在孟加拉国，女性服装工人没有参加男性主导的工会，而是建立了她们自己的非正规工会，从而更好地代表了自己的利益。[127] 尽

管受到时间和身体流动的限制，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和社会媒体也可以促进女性参与非正规组织。广义上，女性参与社会领域的团体很少对男性造成直接威胁，这是因为这些团体倾向于强调实际的性别利益而不是强调战略利益，因为她们被限制在教育或卫生健康等常常被视为女性领域的领域。[128]

是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是变革的有效促进者，这取决于政治环境。在某些国家，例如在法国和美国，这两国的女性运动都很活跃，拥有众多性别敏感的社团，因此，尽管女性在政治中的代表席位很少，性别问题仍然是议程中的重点问题。在其他国家，包括苏联的许多国家，尽管参与政治的女性人数很多，但是女性运动的影响却有限。[129] 而且有时候，民间运动和正规群体的利益并行不悖。在拉丁美洲，提倡增加女性代表席位的女性运动和政党寻求国际合法性或将其触角延伸至女性选民的利益相吻合，形成了为女性设立配额的努力。[130]

哪一种渠道最有效还取决于它挑战规范、信仰和社会制度的程度。如同第 8 章所讨论的那样，某些议题可能涉及所有女性的地位，而其他议题关注女性所属的具体次群体。同样，某些议题可能挑战特定宗教或传统群体的信仰和规范，而其他可能被视为争议较小的问题。我们发现，女性运动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与全体女性相关的问题上，而政党及其领导更多地在

本章小结：女性发挥能动性的能力持续低于男性

所见所闻

男性和女性发挥能动性的能力被定义为做出有效选择的能力，二者能动性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家庭中，而且更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在女性能动性增加的地方，能动性促进了女性及其孩子的福利的改善。但是事实普遍证明，提高能动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动性的某些方面，比如在政治诉求和政治代表方面，即使是在富裕国家，即使女性的积极行动和其他领域的变化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能动性差异依然顽固地存在着。

为什么我们的所见是这样?

通过改善发挥能动性的条件，例如提高收入、拓宽服务渠道和扩大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女性的能动性。然而，这种潜在影响部分取决于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谈判力的增加，而谈判力的增加又来自她们自身的收入能力。而且，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国家而异，而且局限在主观能动性某些方面的成果。

有效应用法律的重要性

尽管女性权利的扩大促进了某些领域的能动性，但是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的法律的影响是最弱的，当这些法律涉及支配资源和家庭事务时尤其如此。法律形式的进步也没有导致能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这些法律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政府确保这些法律得到完全适用和执行的能力和意愿。

规范的力量

社会规范可以限制法律、服务或收入的影响，危害性别平等。尤其是当女性能动性的提高会对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产生威胁时，这些社会规范会发挥约束作用。社会规范也可以抑制女性的集体能动性，例如通过限制她们可以承担的政治角色或限制她们在商界可以获得的实权位置等。在某些场合，社会规范的变化可以提供女性的能动性。

政策启示

当法律、服务、社会规范和市场相互作用时，它们就会导致互相强化的限制因素，这就需要熟悉选择的政策的顺序。围绕性别角色和女性能力改变社会规范对提高女性的能动性而言尤其重要。这个过程可能是复杂的、缓慢的，但是通过为个体或群体提供挑战社会规范所需的动力或信息，政策可以改变遵守普遍社会规范所产生的成本或利益。尽管这些社会规范以及制度结构有时会限制女性通过正式政策渠道对政策施加影响，女性可以通过较不正式的渠道有效地发挥集体能动性。这反过来可以对政策辩论、选择和塑造女性个体能动性的因素产生影响。

与次女性群体相关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女性的巨大异质性体现在不同类型的运动中，也体现在她们的地位和平台上（有时候体现在政治中或反映了具体次群体的利益）。

总之，女性的集体声音，无论是通过直接参加决策机构还是通过塑造决策的环境，都可以形成完全不同的政策、方案和法律（与没有女性集体声音时形成的政策、方案和法律相比）。这样，为女性提供一个她们可以形成集体声音的环境可以促进女性发挥能动性，并进而扩大性别平等。

注释

1. 本章所述的部分证据建立了能动性及其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但是没有建立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关系的指向可以是单向的（任一方向的）或双向的，也可以由第三个因素决定。

2. Alkire 2009；Drèze，Sen 和 Hussain 1995；Kabeer1999；Sen 1985。

3. Field 和 Ambrus 2008；Goldin 和 Katz 2002；Pezzini 2005。

4. Begum 和 Sen 2005。

5. Stekelenburg 等 2004。

6. Mumtaz 和 Salway 2005。

7. Goldin 和 Katz 2002；Pezzini 2005。

8. Attanasio 和 Lechene 2002；Doss 2006；Duflo 2003；Haddad，Hoddinott 和 Alderman 1997；Hoddinott 和 Haddad 1995；Katz 和 Chamorro 2003；Lundberg，Pollak 和 Wales 1997；Quisumbing 和 Maluccio 2000；Rubalcava，Teruel 和 Thomas 2009；Schady 和 Rosero2008；Thomas 1990。

9. Doss 2006。

10. Allendorf 2007。

11. Akinbami，Schoendorf 和 Kiely 2000；Reggio 2010；Smith 和 Pell 2001。

12. 在将年龄、教育、经济压力、性别态度和滥用酒精考虑进去以后计算出来的几率。Contreras 等 2011。同时见 Barker 等（2011），Hindin，Kishor 和 Ansara（2008）；Johnson 和 Cares（2004）；以及 Kishor 和 Johnson（2004）。

13. Farré 和 Vella 2007；Fernández，Fogli 和 Olivetti 2004；Kawaguchi 和 Miyazaki 2005。

14. Caiazza 2002；Kittilson 2008；Miller 2008。

15. Htun 和 Weldon 2008；Htun 和 Weldon 2011a。

16. Ban 和 Rao 2008；Beaman 等，待出版；Chattopadhyay 和 Duflo 2004；Iyer 等 2010；Rajaraman 和 Gupta 2011。

17. Baird 等 2009；DNP 等 2008；Duflo 等 2006。

18. Babinard 和 Roberts 2006。

19.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人口和健康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20. Pronyk 等 2006；Panda 和 Agarwal 2005；国际女性研究中心 2006；Swaminathan，Walker 和 Rugadya 2008。

21. Aizer 2010。

22. Hjort 和 Villanger 2011；Panda 和 Agarwal 2005。

23. Deere 和 León 2001。

24.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盖洛普 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数据的估算值。这些数据是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乌拉圭岛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等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数据。

25. ETUC 2010。

26. Erulkar 等 2004。

27. Dinkelman 2010。

28. Babinard 和 Scott 2011。

29. Venter，Vokolkova 和 Michalek 2007。

30. Joshi 和 Schultz 2007；Gertler 和 Molyneaux 1994。

31. 世界银行 2011。

32. Ashraf，Field 和 Lee 2010。

33. Jejeebhoy，Shah 和 Thapa 2005。

34. Singh 等（2009）认为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流产的国家有 32 个，其中包括丹麦、希腊、意大利、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美国等富裕国家。

35. Lule，Singh 和 Chowdhury 2007；世界银行 2007。

36. Kirdar，Dayioglu Tayfur 和 Koç 2010。

37. Roy 2011。

38. Chiappori，Fortin 和 Lacroix 2002。

39. Stevenson 2007；Stevenson 和 Wolfers 2006。关于爱尔兰的证据，同时见 Bargain 等（2010），González 和 Özcan（2008）。

40. Byrnes 和 Freeman 2011。

41. 两性商业法律图书馆，世界银行。

42. 世界银行 2011。

43. Deininger，Goyal 和 Nagarajan 2010。

44. Deere 和 Doss 2006a；Deere 和 Doss 2006b。

45. Quisumbing 和 Hallman 2005。

46. 世界银行 2011。

47. Rangel 2006。

48. 世界银行 2011。

49.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03。

50.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10。

51. Tarazona 和 Munro 2011。

52. Harrington 和 Chopra 2010。

53. Lastarria-Cornhiel 1997。

54. Ayuko 和 Chopra 2008；Monson 2010。

55. Aldashev 等，待出版。

56. Kapur 1996；Khan，Bhuiya 和 Bhattacharya 2010。

57. Kahan 2010；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09。

58.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10。

59.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08 图 5.4。

60. 世界银行 2011a。

61. Denham 2008。

62. Sumner，Zurstrassen 和 Lister 2011。

63. Contreras 等 2010；世界卫生组织 2010。

64. Jubb 和 Pasinato Izumino 2003。

65. Ayuko 和 Chopra 2008。

66. 世界银行 2011b。

67. Lungu 等 2001。

68. 世界银行 2010。

69. 世界银行 2011b。

70. Luke 和 Munshi 2011。

71. 世界银行 2011b。

72. 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最低年龄是女孩 14 岁，男孩 16 岁；在科威特、南非和坦桑尼亚，最低年龄是女孩 15 岁和男孩 18 岁。玻利维亚、科威特、南非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女孩在这些年龄结婚时需要取得父母的同意。

73. Jensen 和 Thornton 2003。

74. 关于印度家暴发生率及态度的趋势的讨论，见 Iversen 和 Rao（2011）。

75.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人口和健康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76. Contreras 等 2011。

77. 世界卫生组织（2010）及其参考文献。

78. Osawa（2011）显示在日本，该规范渗入到市场，形成了事业发展、社会安全和社会利益的男性—养家糊口者—中心模型。

79. 世界银行 2011b。国际男性和性别平等调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城市地区）、智利（瓦尔帕莱索、康塞普西翁和圣地亚哥的城市地区）、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城市地区和东部农村地区）、印度（德里和维杰亚瓦达城市地区）、墨西哥（蒙特雷、克雷塔罗和哈拉帕城市地区）和卢旺达（全国范围内）进行。

80. Abramsky 等 2011；Contreras 等 2011。

81. Ashraf，Field 和 Lee 2010。

82. Iyengar 2009。

83. Fogli 和 Veldkamp，待出版。

84. Hoff 和 Mansuri 2011。

85. Croson 和 Gneezy 2009；Gneezy，Leonard 和 List 2009；Gneezy，Niederle 和 Rustichini 2003。

86. Hossain 2011。

87. Beaman 等，待出版；Bhavnani 2009。

88. Giné 和 Mansuri 2011。

89. Good，Aronson 和 Inzlicht 2003。

90. La Ferrara，Chong 和 Duryea 2008。

91. Jensen 和 Oster 2007。

92. Chen，Liu 和 Xie 2010。

93. Hallman 等 2007。

94. Erulkar 等 2004。

95. Bruce 和 Hallman 2008 里的参考文献。

96.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3—2009 年对 40 个国家人口和健康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97. Fernández 2007；Fernández 和 Fogli 2006；Fernández 和 Fogli 2009。

98. 世界银行 2008 年在开罗、萨那和安曼开展的以家庭为基地的工作和企业。见 Chamlou 2011。

99. 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证据显示，一旦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和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超过 20%，政策就会发生转变（明尼苏达州女性竞选资金 2002 引自 Tinker 2004）；在印度的森林管理中，当女性在一个群体中的比例达到 25%~33%时，女性参与村庄会议、发言并担任公职的可能性就会增加。Agarwal 2010a，Agarwal 2010b。

100. 各国议会联盟 http：//www.ipu.org。

101. Zetterberg 2008。

102. ETUC 2010。

103. Kaminski 和 Yakura 2008。

104. Donahue 2002。

105. Tzannatos 1986；Tzannatos 2008。

106. 国际企业妇女领袖和国际金融公司 2010。

107. 女大学生领导力指导委员会 2011。

108. Buvinic 和 Roza 2004。

109. Krook 2006；各国议会联盟 http：//www.ipu.org；Bhavnani 2009。

110. Bagués 和 Esteve-Volart 2010。

11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0。

112. Burns，Schlozman 和 Verba 2001；Jayaweera 1997。

113. 见 Tinker（2004）及其参考文献。在英国，这个问题被确定为重要的问题，议会议事规则委员会正在对工作条件进行审核。

114. Krook 2006。

115. Bagués 和 Esteve-Volart 2010。

116. Dahlerup 和 Freidenvall 2005；Murray，Krook 和 Opello 2009。

117. 关于例证，见 Ballington 和 Karam（2005），Dahlerup（2002）以及 Vyasulu 和 Vyasulu（1999）。

118. Goetz 2009。

119. Foley 和 Baker 2009。

120. Hassim 2006。

121. Goetz 2009。

122. Kane，Oloka-Onyango 和 Tejan-Cole 2005。

123. Hassim 2010。

124. Htun 和 Weldon 2010。

125. Baltiwala 1994；Sen 和 Grown 1988。

126. Tripp 2003；Tripp 2010。

127. Dannecker 2000。

128. Molyneux 1985a；Molyneux 1985b。

129. Molyneux 1985a。

130. Htun 和 Jones 2002。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ramsky, Tanya, Charlotte H. Watts, Claudia Garcia-Moreno, Karen Devries, Ligia Kiss, Mary Ellsberg, Henrica A. F. M. Jansen, and Lori Heise. 2011. "What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Recen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the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BMC Public Health* 11 (109): 1–17.

Agarwal, Bina. 2010a. "Does Women's Proportional Strength Affect Their Participation? Governing Local Forests in South Asia." *World Development* 38 (1): 98–112.

———. 2010b. *Gender and Green Govern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Presence Within and Beyond Community Fores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izer, Anna. 2010. "The Gender Wage Gap and Domestic Viol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4): 1847–59.

Akerlof, George A. 1976. "The Economics of Caste and of the Rat Race and Other Woeful Ta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4): 599–617.

Akinbami, Lara J., Kenneth C. Schoendorf, and John L. Kiely. 2000. "Risk of Preterm Birth in Multiparous Teenager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4 (11): 1101–7.

Aldashev, Gani, Imane Chaara, Jean-Philippe Platteau, and Zaki Wahhaj. Forthcoming. "Using the Law to Change the Custo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lesina, Alberto, Paola Giuliano, and Nathan Nunn. 2011. "Fertility and the Ploug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1(3): 499–503.

Alkire, Sabina. 2009. "Concepts and Measures of Agency." In *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 Vol. I: Ethics,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ed. Basu Kaushik and Kanbur Ravi. New York: Oxford.

Allendorf, Keera. 2007. "Do Women's Land Rights Promote Empowerment and Child Health in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35 (11): 1975–88.

Ambady, Nalini, Margaret Shih, Amy Kim, and Todd L. Pittinsky. 2001.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n Children: Effect of Identity Activation o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5): 385–90.

Ashraf, Nava, Erica Field, and Jean Lee. 2010. "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Excess Fertil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Zambi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Attanasio, Orazio, and Valérie Lechene. 2002. "Tests of Income Pooling in Household Decisions."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4): 720–48.

Ayuko, Bonita, and Tanja Chopra. 2008. *The Illusion of Inclusion: Women's Access to Rights in Northern Kenya.* Nairobi: Legal Resources Foundation Trust Research Report.

Babinard, Julie, and Peter Roberts. 2006. "Maternal and Child Mortality Development Goals: What Can the Transport Sector Do?" Transport Paper 12,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binard, Julie, and Kinnon Scott. 2011. "What Do Existing Household Surveys Tell Us about Gender and Transpor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mmary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s Issues Transport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46, vol. 2.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ashington, DC.

Bagués, Manuel F., and Berta Esteve-Volart. 2010. "Can Gender Parity Break the Glass Ceiling? Evidence from a Repeated Randomized Experi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 (4): 1301–28.

Baird, Sarah, Ephraim Chirwa, Craig McIntosh, and Berk Özler. 2009. "The Short-term Impacts of a School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on the Sexual Behavior of Young Wome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08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llington, Julie, and Azza Karam, eds. 2005.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rev. ed.*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Baltiwala, Srilatha. 1994. "The Meaning of Women's Empowerment. New Concepts from Action." In *Population Policies Reconsidered: Health, Empowerment and Rights,* ed. Gita Sen, Lincoln C. Chen and Adrienne Germain.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n, Radu, and Vijayendra Rao. 2008. "Tokenism or Agency? The Impact of Women's Reservations on Village Democracies in South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6 (3): 501–30.

Bannon, Ian, and Maria C. Correia, eds. 2006. *The Other Half of Gender: Men's Issues in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argain, Olivier, Libertad González, Claire Keane, and Berkay Özcan. 2010. "Female Labour Supply and Divorce: New Evidence from Ireland."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95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arker, Gary, Manuel Contreras, Brian Heilman, Ajay Singh, Ravi Verman, and Marcos Nascimento. 2011. *Evolving Men: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Survey* (IMAG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Instituto Promundo, Men and Gender Quality Policy Project.

Barker, Gary, and Christine Ricardo. 2005. "Young M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HIV/AIDS, Conflict and Violence."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2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rker, Gary, Christine Ricardo, and Marcos Nascimento. 2007. *Engaging Men and Boys in Changing Gender-based Inequity in Health: Evidence from Programme Intervention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eaman, Lori,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Forthcoming. "Political Reserv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In *India Policy Forum*, 2010, ed. Suman Berg, Barry Bosworth, and Arvind Panagariy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New Delhi.

Begum, Sharifa, and Binayak Sen. 2005. "Maternal Health, Child Well-Be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ly Transmitted Chronic Poverty: Does Women's Agency Mat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8, Programme for Research on Chronic Poverty in Bangladesh, Dhaka, Bangladesh.

Benhabib, Seyla. 2002. *The Claims of Cultur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Global Er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havnani, Rikhil R. 2009. "Do Electoral Quotas Work after They Are Withdraw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Ind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1): 23–35.

Bruce, Judith, and Kelly Hallman. 2008. "Reaching the Girls Left Behind." *Gender and Development* 16 (2): 227–45.

Bruner, Jerome S., and Mary C. Potter. 1964. "Interference in Visual Recognition." *Science* 144 (3617): 424–25.

Burns, Nanc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Sidney Verba. 2001.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Ac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vinic, Mayra, and Vivian Roza. 2004. "Women,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in Latin Americ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echnical Paper Series WID-108,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Byrnes, Andrew, and Marsha A. Freeman. 2011. "The Impact of the CEDAW Conventions: Paths to Equalit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aiazza, Amy. 2002. "Does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Elected Office Lead to Women-Friendly Policy?" Research-in-Brief Series 1910, Institute for Women's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Cattell, Maria G. 1997. "African Widows,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Case Studies from Kenya." In *Cultural Context of Aging: Worldwide Perspectives,* 2d ed., Jay Sokolovsky.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Chamlou, Nadeseh. 2011. "Will People Power Empower Women?" Blog Voices and Views: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rch 20.

Chattopadhyay, Raghabendra, and Esther Duflo. 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72 (5): 1409–43.

Chen, Jiajian, Hongyan Liu, and Zhenming Xie. 2010. "Effects of Rural-Urban Return Migration on Women's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Rural Chin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41 (1): 31–44.

Chiappori, Pierre-André, Bernard Fortin, and Guy Lacroix. 2002. "Marriage Market, Divorce Legislation, and Household Labor Supp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 (1): 37–72.

Chiongson, Rea Abada, Deval Desai, Teresa Marchiori, and Michael Woolcock. 2011. "Role of Law and Justice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onnell, Robert W. 2003. *The Role of Men and Boy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onnell, Robert W., and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19 (6): 829–59.

Contreras, Juan Manuel, Sarah Bott, Elizabeth Dartnall, and Alessandra Guedes. 2010. *Violencia sexual en Latinoamérica y el Caribe: Análisis de Datos Secundarios.* Pretoria, South Africa: Iniciativa de Investigación en Violencia Sexual Unidad de Investigación sobre Género y Salud Consejo de Investigación Médica.

Contreras, Juan Manuel, Brian Heilman, Gary Barker, Ajay Singh, and Ravi Verma. 2011. "Childhood Antecedents of Adult Behaviors: New Fin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Surve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orporate Women Directors International (CWDI)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2010. *CWDI/IFC 2010 Report: Accelerating Board Diversity*. Washington, DC: CWDI and IFC.

Croson, Rachel, and Uri Gneezy.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 (2): 448–74.

Dahlerup, Drude. 2002. "Quotas—A Jump to Equality?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Use of Electoral Quotas to Obtain Equal Political Citizenship for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Worksho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otas: Asian Experiences, Jakarta, September 25.

Dahlerup, Drude, and Lenita Freidenvall. 2005. "Quotas as a 'Fast Track' to Equal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for Women—Why Scandinavia Is No Longer the Model."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7(1): 26–48.

Dannecker, Petra. 2000.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sation Building, and Leadership: Women Workers in the Garment Sector in Bangladesh." *Gender and Development* 8 (3): 31–9.

Deere, Carmen Diana, and Cheryl R. Doss. 2006a.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6/115,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 2006b. "The Gender Asset Gap: What Do We Know and Why Does It Matter?" *Feminist Economics* 12 (1–2): 1–50.

Deere, Carmen Diana, and Magdalena León. 2001. "Who Owns the Land? Gender and Land-Titling Programme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 (3): 440–67.

Deininger, Klaus, Aparajita Goyal, and Hari Nagarajan. 2010. "Inheritance Law Reform and Women's Access to Capital: Evidence from India's Hindu Succession Ac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enham, Tara. 2008. "Police Reform and Gender." In *Gender and Sector Security Reform Toolkit,* ed. Megan Bastick and Kristin Valasek. Geneva: Geneva Centre for the Democratic Control of Armed Forces,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UN-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d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DNP (Departamento Nacional de Planeación de Colombia), SINERGIA, ACCION SOCIAL, 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and Banco Mundial. 2008. *Programa Familias en Acción: Impactos en Capital Humano y Evaluacion Beneficio-Costo del Programa.* Bogota and Washington, DC: DNP, SINERGIA, ACCION SOCIAL, IADB, World Bank.

Dinkelman, Taryn. 2010. "The Effects of Rural Electrification on Employment: New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272, Princeton Uni-

versit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search Program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rinceton, NJ.

Donahue, David M. 2002. "Rhode Island's Last Holdout: Tenure and Married Women Teachers at the Brink of the Women's Movement."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42 (1): 50–74.

Doss, Cheryl R. 2006. "The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Property Ownership on Expenditure Patterns in Ghan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5 (1): 149–80.

Douglas, Mary. 1986. *How Institutions Think.*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Drèze, Jean, Amartya Sen, and Athar Hussain, eds.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Selected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uflo, Esther. 2003. "Grandmothers and Granddaughters: Old-Age Pension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in South Afric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7 (1): 1–25.

Duflo, Esther, Pascaline Dupas, Michael Kremer, and Samuel Sinei. 2006. "Education and HIV/AIDS Prevention: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in Western Keny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02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mslie, Carol, Damien Ridge, Sue Ziebland, and Kate Hunt. 2006. "Men's Account of Depression: Reconstructing or Resisting Hegemonic Masculin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 (2009): 2246–57.

Erulkar, Annabel S., Tekle Ab Mekbib, Negussie Simie, and Tsehai Gulema. 2004. *The Experience of Adolescence in Rural Amhara Region Ethiopi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Ethiopian Ministry of Youth, Sports and Culture; and Population Council.

ETUC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2010. *3rd Annual ETUC 8 March Survey 2010.* Brussels: ETUC.

Farré, Lídia, and Francis Vella. 2007.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ZA Discussion Series 280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Fenrich, Jeanmarie, and Tracy E. Higgins. 2001. "Promise Unfulfilled: Law, Culture and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in Ghana."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5 (2): 259–341.

Fernández, Raquel. 2007. "Alfred Marshall Lecture: Women, Work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5 (2–3): 305–32.

Fernández, Raquel, and Alessandra Fogli. 2006. "Fertility: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Fami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2–3): 552–61.

———. 2009. "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 (1): 146–77.

Fernández, Raquel, Alessandra Fogli, and Claudia Olivetti. 2004. "Mothers and Sons: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Female Labor Forc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249–99.

Field, Erica, and Attila Ambrus. 2008. "Early Marriage, Age of Menarche, and Female Schooling Attainment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 (5): 881–930.

Fogli, Alessandra, and Laura Veldkamp. Forthcoming. "Nature or Nurture? Learning and the Geography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conometrica.*

Foley, Janice R., and Patricia L. Baker, eds. 2009. *Unions, Equity, and the Path to Renewal.* Toronto: UBC Press.

Gauri, Varun. 2010. "The Publicity 'Defect' of Customary Law."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4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ertler, Paul J., and John W. Molyneaux. 1994. "Ho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Combined to Reduce Indonesian Fertility." *Demography* 31 (1): 33–63.

Giné, Xavier, and Ghazala Mansuri. 2011. "Together We Will: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on Female Voter Turnout in Pakista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Gneezy, Uri, Kenneth L. Leonard, and John A. List.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 *Econometrica* 77 (5): 1637–64.

Gneezy, Uri, Muriel Niederle, and Aldo Rustichini. 2003.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veness Environments: Gender Differen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3): 1049–74.

Goetz, Anne Marie. 2009. *Governing Women: Women's Political Effectiveness in the Context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ance Reform.* New York: Routledge.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2.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 (4): 730–70.

González, Libertad, and Berkay Özcan. 2008. "The Risk of Divorce and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726,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Good, Catherine, Joshua Aronson, and Michael Inzlicht. 2003. "Improving Adolescents' Standardized Test Performance: An Intervention to Reduce the Effects of Stereotype Threat."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 (2003): 645–62.

Greene, Margaret E., and Andrew Levack. 2010. *Synchronizing Gender Strategies: A Cooperative Model for Improving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Transforming Gender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

agency Gender Working Group,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and Engender Health.

Haddad, Lawrence, John Hoddinott, and Harold Alderman. 1997.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odels, Methods and Poli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allman, Kelly, Sara Peracca, Jennifer Catino, and Marta Julia Ruiz. 2007. "Indigenous Girls in Guatemala: Poverty and Location." In *Exclusion, Gender and Educa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ed. Lewis Maureen and Marlaine Lockheed.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11. *Improving the Legal Investment Climate for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anson, Valkyrie. 2009. "A Social Label for Social Dialogue: A Proposal to Improve Working Conditions for Women in the Guatemalan Apparel Industry." *Georgetown Journal of Gender and the Law* 10 (I): 125–64.

Harrington, Andrew, and Tanya Chopra. 2010. "Arguing 'Traditions': Denying Kenya's Women Access to Land Rights." Justice for the Poor Research Report No. 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ssim, Shireen. 2006. *Women's Organization and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 Contesting Authorit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2010. "Perverse Consequences? The Impact of Quotas for Women on Democratisation in Africa."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ed. Ian Shapiro, Susan C. Stokes, Elisabeth Jean Wood, and Alexander S. Kirshn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ndin, Michelle J., Sunita Kishor, and Donna L. Ansara. 2008.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Couples in 10 DHS Countries: Predictors and Health Outcomes." DHS Analytical Studies 18,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Hjort, Jonas, and Espen Villanger. 2011. "Backlash: Female Employment and Domestic Viol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Processed.

Hoddinott, John, and Lawrence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ô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1): 77–96.

Hoff, Karla, and Ghazala Mansuri. 2011. "Gender Inequality beyond the Law: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Hoff, Karla, and Priyanka Pandey. 2011a. "Discrimin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Durable Inequal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2): 206–11.

———. 2011b. "Identity, Social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Hoff, Karla,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10. "Equilibrium Fiction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ocietal Rigidit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21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11. "The Role of Cognitive Frames in Societal Rigidity and Chang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Hossain, Naomi. 2011. "Exports, Equity and Empowerment: The Effects of Readymade Garment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Gender Equality in Banglades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Htun, Mala, and Mark P. Jones. 2002. "Engendering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Electoral Quotas and Leadership in Latin America."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d. Nikki Craske and Maxine Molyneux. New York: McMillan.

Htun, Mala, and S. Laurel Weldon. 2008. "When and Why Do Governments Promote Sex Equalit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Work-Family Issues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ssociation. Boston, MA, August 27.

———. 2010. "When Do Governments Promote Women's Rights? A Framework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x Equality Polic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 (1): 207–16.

———. 2011a. "Communism, Colonialism, and Clerical Power: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Struggle over Family Law."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 2011b. Htun-Weldon Database.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http://web.ics.purdue.edu/~weldons/.

ICRW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Women). 2006. *Property Ownership and Inheritance Rights of Women for Social Protection: The South Asia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ICRW.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0. *World Social Security Report 2010/11: Providing Coverage in Times of Crisis and Beyond*. Geneva: ILO.

Iversen, Vegard, and Nitya Rao. 2011. "India Case Stud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Iyengar, Radha. 2009. "Does the Certainty of Arrest Reduce Domestic Violence? Evidence from Mandatory and Recommended Arrest Law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 (1–2): 85–98.

Iyer, Lakshmi, Anandi Mani, Prachi Mishra, and Petia Topalova. 2010.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India's Panchayati Ra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Jayaweera, Swarna. 1997. "Women,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in Asia." *Gender & Education* 9 (4): 411–23.

Jejeebhoy, Shireen J., Iqbal Shah, and Shyam Thapa, eds. 2005. *Sex without Consent: Young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Zed Books.

Jensen, Robert, and Emily Oster. 2007. "The Power of TV: Cable Television and Women's Status in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33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ensen, Robert, and Rebecca Thornton. 2003. "Early Female Marriag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Gender and Development* 11 (2): 9–19.

Johnson, Michael P., and Alison Cares. 2004. "Effects and Non-effects of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Family Violence on Adult Partner Violenc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tate College, PA. Processed.

Johnson, Richard W. 1999. "The Gender Gap in Pension Wealth: Is Women's Progress in the Labor Market Equalizing Retirement Benefits?" Brief Series 1, Urb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Joshi, Shareen, and T. Paul Schultz. 2007. "Family Planning as an Investment i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a Program's Consequences in Matlab, Bangladesh."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951,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Jubb, Nadine, and Wânia Pasinato Izumino. 2003. "Women and Policing in Latin America: A Revised Background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Dallas, March 27.

Kabeer, Naila. 1999.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 (3): 35–64.

Kahan, Dan M. 2010. "Culture, Cognition, and Consent: Who Perceives What, and Why, in Acquaintance-Rape Cas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58 (3): 729–813.

Kaminski, Michelle, and Elaine K. Yakura. 2008. "Women's Union Leadership: Closing the Gender Gap." *Working USA: 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11 (4): 459–75.

Kane, Minneh, J. Oloka-Onyango, and Abdul Tejan-Cole. 2005. "Reassessing Customary Law Systems as a Vehicle for Providing Equitable Access to Justice for the Po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s confrence "New Frontiers of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rusha, Tanzania, December 12.

Kapur, Naina. 1996. *Gender and Judges: A Judicial Point of View*. New Delhi: Sakshi.

Katz, Elizabeth G., and Juan Sebastian Chamorro. 2003. "Gender, Land Rights,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Rural Nicaragua and Hondur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Puebla, Mexico, October 9.

Kawaguchi, Daiji, and Junko Miyazaki. 2005. "Working Mothers and Sons' Preferences Regarding Female Labor: Direct Evidence from Stated Preferences." Discussion Working Paper 110,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Tokyo.

Khan, M. E., Ismat Bhuiya, and Aruna Bhattacharya. 2010. "A Situation Analysis of Care and Support for Rape Survivors at First Point of Contact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Injury Prevention* 16: A160–61.

Kimmel, Michael S. 2004. *The Gendere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rdar, Murat G, Meltem Dayioglu Tayfur, and Ismet Koç. 2010. "The Effect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Laws on Teenage Marriage and Births in Turkey." Working Paper Series 1035, TÜSIAD-Koç University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Sariyer, Istanbul.

Kishor, Sunita, and Kiersten Johnson. 2004. *Profiling Domestic Violence: A Multi-Country Study*. Calverton, MD: ORC Macro.

———. 2006.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re the Poorest Women Uniquely Disadvantaged?" *Demography* 43 (2): 293–307.

Kishor, Sunita, and Lekha Subaiya. 2008. "Understanding Women's Empower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DHS) Data." DHS Comparative Reports 20, MacroInternational, Calverton, MD.

Kittilson, Miki Caul. 2008. "Representing Women: The Adoption of Family Leav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s* 70 (2): 323–34.

Krendl, Anne C., Jennifer A. Richeson, William M. Kelley, and Todd F. Heatherton. 2008.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a Threat: A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Neur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Women's Underperformance in Math."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2): 168–75.

Krook, Mona Lena. 2006. "Reforming Representation: The Diffusion of Candidate Gender Quotas Worldwide." *Politics & Gender* 2 (3): 303–27.

La Ferrara, Eliana, Alberto Chong, and Suzanne Duryea. 2008.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Working Paper Series 63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Lastarria-Cornhiel, Susana. 1997.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Gender and Property Right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25 (8): 1317–33.

Luke, Nancy, and Kaivan Munshi. 2011. "Women as Agents of Change: Female Income and Mobility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4 (1): 1–17.

Lule, Elizabeth, Susheela Singh, and Sadia Afroze Chowdhury. 2007. "Fertility Regulation Behaviors and Their Costs: Contraception and Unintended Pregnancies in Africa and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Discussion Paper, December, World Bank,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Family, Washington, DC.

Lundberg, Shelly J., Robert A. Pollak, and Terence J. Wales. 1997. "Do Husbands and Wives Pool Their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Child Benefi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3): 463–80.

Lungu, K., V. Kamfosa, J. Hussein, and H. Ashwood-Smith. 2001. "Are Bicycle Ambulances and Community Transport Plans Effective in Strengthening Obstetric Referral Systems in Southern Mali?" *Malawi Medical Journal* 12: 16–8.

Miller, Grant. 2008. "Women's Suffrage, Political Responsiveness, and Child Survival in American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3): 1287–327.

Möller-Leimkühler, Anne Maria. 2003. "The Gender Gap in Suicide and Premature Death or: Why Are Men So Vulnerable?" *Europe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253 (1): 1–8.

Molyneux, Maxine. 1985a. "Family Reform in Socialist States: The Hidden Agenda." *Feminist Review* 21 (winter): 47–64.

———. 1985b. "Mobilization without Emancipation? Women's Interest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Nicaragua." *Feminist Studies* 11 (2): 227–54.

Monson, Rebecca. 2010. "Women, State Law and Land in Peri-Urban Settlements on Guadalcanal, Solomon Islands." Briefing Notes 4(3), Justice for the Poo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umtaz, Zubia, and Sarah Salway. 2005. " 'I Never Go Anywhere': Extricating the Links between Women's Mobility and Uptake of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 Pakista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0 (8): 1751–65.

Murray, Rainbow, Mona Lena Krook, and Katherine A. R. Opello. 2009. "Elite Bias, Not Voter Bias: Gender Quotas and Candidate Performance in Fr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olitics and Gender. Belfast, January 21.

North, Douglass C. 2005.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uzgane, Lahoucine, and Robert Morrell, eds. 2005. *African Masculinities: Men in Africa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Osawa, Mari. 2011. "Gender-Equalit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Japan's Society and Economy under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Panda, Pradeep, and Bina Agarwal. 2005. "Marital Violence,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men's Property Status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33 (5): 823–50.

Peterman, Amber. 2010. "Widowhood and Asset Inherit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5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 (CPRC)/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Roundtable "Inheritan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ODI, London, October 11.

Pezzini, Silvia. 2005. "The Effect of Women's Rights on Women's Welfar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Economic Journal* 115 (502): C208–C227.

Pollack, William S. 2003. "No Man Is an Island: Toward a New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of Men." In *A New Psychology of Men,* ed. Ronald F. Levant and William S. Pollack. New York: Basic Books.

Powell, Water W., and Paul J. DiMaggio.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onyk, Paul M., James R. Hargreaves, Julia C. Kim, Linda A. Morison, Godfrey Phetla, Charlotte Watts, Joanna Busza, and John D. H. Porter. 2006. "Effect of a Structural Inter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Intimate-partner Violence and HIV in Rural South Africa: A Cluster Randomized Trial." *Lancet* 368 (9551): 1973–83.

Quisumbing, Agnes R., and Kelly Hallman. 2005. "Marriage in Transition: Evidence on Age, Education, and Assets from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hanging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 Cynthia B. Lloyd, Jere R. Behrman, Nelly Stromquist, and Barney Cohe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cs Press.

Quisumbing, Agnes R., and John A. Maluccio. 2000.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and Gender Relation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Four Developing Countries." Discussion Paper 84,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Rabin, Matthew, and Joel L. Schrag. 1999. "First Impressions Matter: A Model of Confirmatory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1): 37–82.

Rajaraman, Indira, and Manish Gupta. 2011. "Public Expenditure Choices and Gender Quotas."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Policy, New Delhi.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Rangel, Marcos A. 2006. "Alimony Rights and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Brazil." *Economic Journal* 116 (513): 627–58.

Reggio, Iliana. 2010. "The Influence of Mother's Power on Her Child's Labor in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1): 95–105.

Roy, Sanchari. 2011. "Empowering Women: Inheritance Rights and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University of Warwick, Warwick U.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Rubalcava, Luis, Graciela Teruel, and Duncan Thomas. 2009. "Investments, Time Preferences, and Public

Transfers Paid to Wom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7 (3): 507–38.

Sato, Mine. 2011.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by Facilitating Women's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Capacity Development: Japanese Experience with Post-War Life Improvement Progra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ontemporary Developing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Schady, Norbert, and José Rosero. 2008. "Are Cash Transfers Made to Women Spent Lik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Economics Letters* 101 (3): 246–48.

Sen, Amartya. 1985.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Journal of Philosophy* 82 (4): 169–221.

Sen, Gita, and Caren Grown. 1988.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London: Earthcan Publications.

Shih, Margaret, Todd Pittinsky, and Nalini Ambady. 1999.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1): 80–3.

Singh, Susheela, Deirdre Wulf, Rubina Hussain, Akinrinola Bankole, and Gilda Sedgh. 2009. "Abortion Worldwide: A Decade of Uneven Progress." Guttmacher Institute, New York.

Smith, Gordon C. S., and Jill P. Pell. 2001. "Teenage Pregnancy and Risk of Adverse Perinatal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First and Second Births: Population Based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3 (7311): 476–9.

Smith, Pamela, Nils B. Jostmann, Adam D. Galinsky, and Wilco W. van Dijck. 2008. "Lacking Power Impairs Executive Func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5): 441–7.

Steele, Claude M. 2010. *Whistling Vivaldi: And Other Clues to How Stereotypes Affect U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Steele, Claude M., and Joshua Aronson. 1995.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of African-America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5): 797–811.

Steering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Women's Leadership. 2011. *Report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Women's Leader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Stekelenburg, Jelle, Sindele Kyanamina, M. Mukelabai, Ivan Wolffers, and Jos van Roosmalen. 2004. "Waiting Too Long: Low Use of Maternal Health Services in Kalabo, Zambia." *Tropical Medicine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9 (3): 390–8.

Stevenson, Betsey. 2007. "The Impact of Divorce Laws on Marriage-Specific Capital."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5 (1): 75–94.

Stevenson, Betsey, and Justin Wolfers. 2006.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Divorce Laws and Family Dist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1): 267–88.

Sumner, Cate, Matthew Zurstrassen, and Leisha Lister. 2011. "Increasing Access to Justice for Women, the Poor and Thos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An Indonesian Case Study." Briefing Note vol. 16, issue 2, Justice for the Poo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waminathan, Hema, Cherryl Walker, and Margaret A. Rugadya, eds. 2008. *Women's Property Rights, HIV and AIDS, and Domestic Violenc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wo Rural Districts in South Africa and Uganda.* Cape Town: HSRC Press.

Tarazona, Marcela, and Alistair Munro. 2011. "Experiments with Households in Four Countrie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an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Thomas, Duncan. 1990.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 Inferential Approach."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5 (4): 635–64.

Tinker, Irene. 2004. "Quotas for Women in Elected Legislatures: Do They Really Empower Wome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7 (5–6): 531–46.

Tripp, Aili Mari. 2003. "The Changing Face of Africa's Legislatures: Women and Quot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rliamentary Forum Conference: Implementation of Quotas: African Experiences, Pretoria, South Africa, November 11.

———. 2010. "Creating, Collective Capabilities: Women, A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Gender and Law* 19 (1): 219–48.

Tzannatos, Zafiris. 1986. "Female Pay: Has the State Unshackled the Market?" *Economic Affairs* 7 (2): 26–8.

———. 2008. "The Impact of Trade Unions: What Do Economists Say?" In *In Defence of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Cultivating Justi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ed. Janine Berg and David Kucera.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5.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rson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10. *Power, Voice, and Rights: A Turning Point for Gender Eq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Delhi: McMillan Publishers India Ltd.

UNIFEM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2003. *Not a Minute More: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ew York: UNIFEM.

———. 2008. *Progress to the World's Women 2008/2009. Who Answers to Women? Gender & Accountability.* New York: UNIFEM.

———. 2009.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An Analysis for ASEAN Countri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Good Practices.* Bangkok: UNIFEM.

———. 2010. *Gender Justice: Key to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New York: UNIFEM.

van de Walle, Dominique. 2011. "Welfare Effects of Widowhood in a Poor Countr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Velkoff, Victoria A., and Kevin G. Kinsella. 1993. *Aging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ureau of Census.

Venter, Christoffel, Vera Vokolkova, and Jaroslav Michalek. 2007. "Gender, Residential Location, and Household Travel: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Low-Income Urban Settlements in Durban, South Africa." *Transport Reviews* 27 (6): 653–77.

Vyasulu, Poornima, and Vinod Vyasulu. 1999. "Women in Panchayati Raj: Grass Roots Democracy in India: Experience from Malgud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4 (52): 3677–86.

World Bank. 2007. "Population Issu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World Bank,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Family, Washington, DC.

———. 2010. "Gender and Transport in MENA: Case Studies from West Bank Gaza and Yeme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Knowledge and Learning Quick Notes Series 2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1a. "Island Courts in Vanuatu."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 2011b. *Defining Gender in the 21st Century: Talking with Women and Men around the World; A Multi-Country Qualitative Study of Gender and Economic Choi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0. *What about Boy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Boys.* Geneva: WHO.

———. 2010. *Preventing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aking Action and Generating Advice.* Geneva: WHO.

Zetterberg, Pär. 2008. "The Downside of Gender Quota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Women in Mexican State Legislatures." *Parliamentary Affairs* 61 (3): 442–60.

延伸阅读 2　养家糊口者的衰落：21 世纪的男性

在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中，大部分男性和男孩都对如何行为才能像个男人有着强烈的诉求。从作为一家之主的传统家庭角色（主要的养家者和家庭的权威所在）到包括力量、坚强、雄心及其他男性渴望有的个体特征，被马尔代夫两个青年明确概括为，“男人是一个征服者，这就是他总需要征服一些事情的原因所在，比如职位、女人、社会地位、工作等。”

大多数男性都承认社区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决定了他们应该履行的主要职责。[1] 男性的主要职责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赚取者和家庭生计的主要维持者。在研究所涉及的所有 19 个国家中，为家庭赚取收入是男性家庭责任概念和一个好丈夫最先被提及，也最有可能被提及的特征，“一个好丈夫是衣食等物品的好的提供者”（阿富汗），“一个好丈夫是家中所有物品的提供者。家中所有的账单都由他来付”（布基纳法索），“好丈夫有一份体面的收入，让自己的家庭成员生活得很舒服……他必须是一个好的供养者，为实现这个目标，必要时他会付出额外的时间”（印度），“他每天都应该早早出去工作，为他的孩子赚取收入”（北苏丹）。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男性才能免予这种职责，“好丈夫必须是好的供养者，除非他病得很严重，不能够再工作。一个丈夫，如果不是一个好的供养者，那他在家庭中就没有一点儿地位”（越南）。

养家者角色也对男性关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观念产生了影响，“（一个男人）要有责任心，要有一份工作，他的核心压力是他必须给家人一份安全感”（波兰）。“他的收入最多，而且他的收入对家庭的正常生活最重要。这给了他自尊”（塞尔维亚）。“许多男人在家里不被尊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不能提供或提供很少的维持生计的收入，女性提供了更多的维持生计的收入。因此，你会发现丈夫不是家庭的主宰者”（坦桑尼亚）。赢得的权力也赋予了男性在家庭决策中的最终决定权。

但是性别关系也在演变中，男性也被要求去适应新的要求、新的期望和新的角色。曾经，一个有权威，能保证家庭经济福利的男人足以当得起好丈夫、好父亲的称呼。但是现在，男人也被要求分担照顾孩子的任务、在家务活动中搭把手、表达情感和感觉以及在决策时尊重妻子的意见。当今的好丈夫必须“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好丈夫应该更好地管理时间，爱护自己的家庭，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庭成员”（马尔代夫）。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一个社会中，所有参与群体的男性一致认为“好丈夫会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在做事情时他会与妻子和孩子商量一下，而过去他在做事情时，是不会在家庭内讨论或与妻子商量的”。

男性在适应，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改变观念和方式的速度不如女性快。在女性争取权力和自由的时候，男性在抵制变革。许多男性感觉他们的男性权威和主导地位在多个方面受到了挑战。和城市男性相比，农村男性表现了更多的不自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一切都变了，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好像 200 年过去了，一切过去不正常的事情现在都正常了。一切事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价值观体系完全消失了，”塞尔维亚一个农村男性群体如是说。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男性表达了同样的不自在，并将这归咎于新的法律和赋予女性的权利，“我们的确知道存在与女性权利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那当成一回事。作为男人，我们是一家之主。以前，女性和男性不知道这些法律，女性尊重自己的丈夫。但是现在，由于这些法律的存在，女性试图控制自己的丈夫，这样不好。女性，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削弱了丈夫的地位。他们必须也应当屈从于自己的丈夫。”南非和北苏丹的男性认同这种观点。

男性感觉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处于停滞状态。男性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获得了很小的权力或没有获得权力，部分原因在于社会规范和法律的变化，但是所在国或所居社区缺乏经济进步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当被要求分别列举 100 名他们认为现在和 10 年前在社区中最有权力的男性的名单时，社区中 60%的男性说排名上升或获得权力的男性比例没有增加或几乎没有增加。剩下的 40%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没有女性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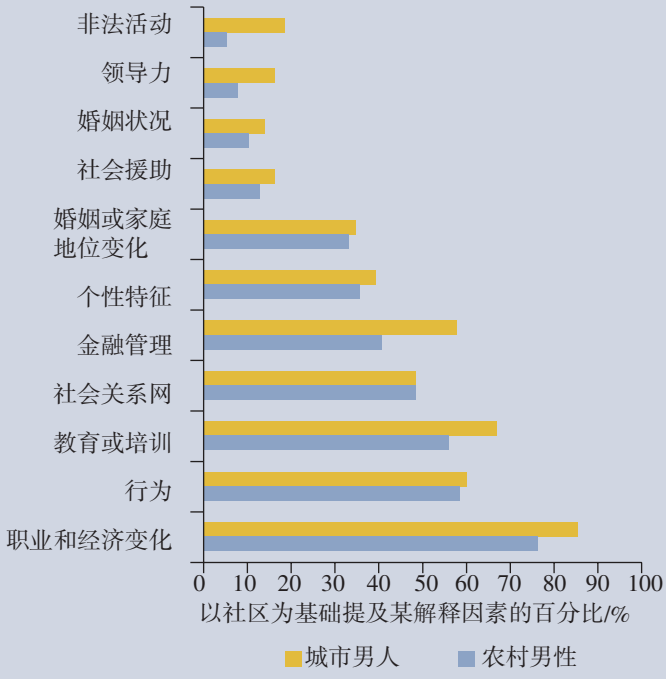
男性权力获得基本上取决于所在国或所居社区的经济条件，特别是经济增长和地方与国家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对男性为自身权力变化所做解释的调查指向了几个联结在一起的因素。首先，用以描述可见女性赋权扩大幕后力量的解释模型在适用于男性时没有任何解释力（见延伸阅读 1）。事实上，男性和女性的路径完全不同。扩大赋权的女性路径包括一系列广泛的因素，基本上取决于决策能力、免予暴力侵害的能力和构建社会网络关系的能力。男性路径要狭窄的多，主要取决于经济和就业机会的存在与获得。只有两种因素组合方式是强大的，这两种方式均包括国家的发展（根据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分数测算）：

- 私营领域就业和高人类发展指数的组合可以解释社区 56%的权力变化。
- 高人类发展指数、地方市场的高活跃度（如同社区男性所观察到的）和国家层面高男性劳动力参与度的组合可以解释 39%的权力变化。

这种模型和处于权力阶梯最顶端和最底层男性的描述很相近，“男人应当有权力。但是当居住的村庄发生如此大的危机时，他又怎么获得权力呢？权力意味着经济安全”，塞尔维亚一个男子如是说，这反映了男性在界定拥有权力意味着什么时对经济条件和工作的重视程度。给予就业的地位和权力有助于那些拥有一份男性工作的人保持乐观，有时候甚至到了骄傲或炫耀的地步。“处在阶梯顶端的男人有大房子，有大量的农用湿地。他有牛群，他能负担得起用以烹调的牛油和茶。他的农场机械化程度较高，他有许多人为他工作。他很傲慢，也很自我。”不丹的一个农村女性如是说。在利比里亚，被认可的男性是那些“继承父母可可种植园或其他种植园的男性，无论是处于权力阶梯顶端的人还是底端的人都需要种植园；这些人能够买得起摩托车，从而产生收入；他们有从上层人士那里获得贷款的资源”。男性认为工作和经济条件是决定在阶梯上位置上升或下降的主要因素（见延伸阅读图 2.1 和延伸阅读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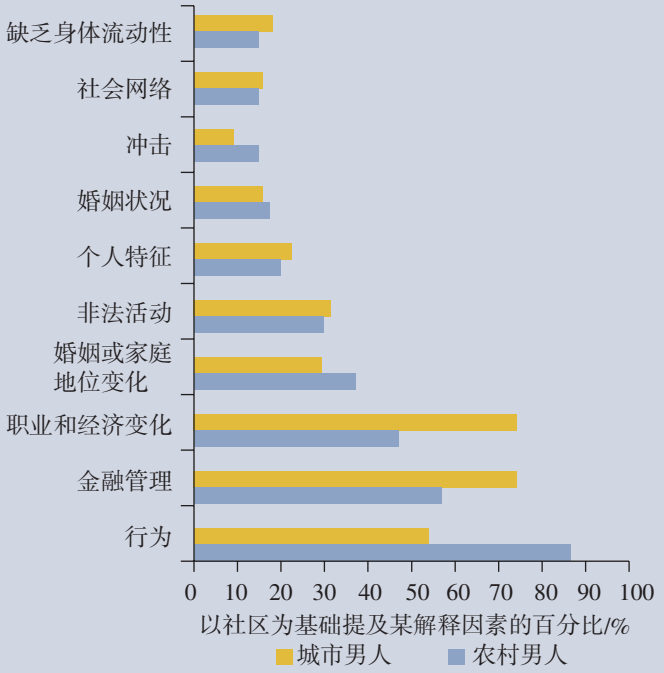
在劳动力市场丧失自尊的男性可能试图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夺取弥补性收入，从教育投资到以暴力控制家庭及风险行为。男性丢失工作或女性取代男性成为主要的养家者给男性自尊心造成的重大影响又被当今世界普遍的高失业率和工作安全缺乏所加剧。青年男性较少对人力资本投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教育的价

延伸阅读图 2.1　获得权力的解释因素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数据库）得出的估算值。

延伸阅读图 2.2　丧失权力的解释因素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根据“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数据库）的估算值。

值低，或教育的价值利弊参半，在不以成绩运作的劳动力市场上尤其如此。马尔代夫、波兰和塞尔维亚的青年男性的怀疑态度最坚决，他们认为决定他们能否找到工作的因素中，关系比教育更重要，“我想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现在任何事情都和政治关系有关”（波兰）。“关系就是一切，能够取得成功的人多半是资源丰富的人。这就形成了矛盾，你的教育程度越低，你赚的钱就越多”（塞尔维亚）。高失业率致使受过教育的男性或者失业，或者在低技能的工作中挣扎。“我获得了两所大学的毕业证书和一所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可是我却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马尔代夫）。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理想会破灭，“我辍学了，不想再继续自己的学业，因为我缺乏足够的愿望和动力。反正不管我有没有受过教育，结果都一样，我可能不能得到一份能让我正常生活的工作”（塞尔维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西恩富戈斯是男人权力下降最大的社区之一，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后自由贸易区的关闭引起的。在那里，男性看到赚钱的唯一道路是贩卖毒品或从事某些相似的非法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男性的地位和自我价值取决于他们的就业状况，这使他们尤其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伤害，“（就就业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这导致男性的挫败感和家庭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导致男性针对女性和孩子的暴力行为，而且也可能导致疾病”（西岸和加沙地带）。当被问及失业后会有什么反应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男人说他们将会“感到挫败，沮丧，会酗酒，然后打老婆”。

注释

1. 被研究的经济体包括阿富汗、不丹、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马尔代夫、北苏丹、秘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塞尔维亚、南非、坦桑尼亚、越南、西岸和加沙地带、也门共和国。重点群体包括男性成人群体、女性成年群体、男青年、女青年、男性青少年、女性青少年。青少年群体只包括 19 个国家中的 8 个国家。欲知更多信息和评估方法，请登录 http：//www.worldbank.org/wdr2012。

第 5 章

5

就业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

两性活动经济机遇的差异常常与两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差异放在一起讨论。本章超越了劳动力参与的范畴，强调生产率和收入，原因有二。首先，对劳动力参与的绝对强调只描述了女性和男性劳动力市场活动的部分状况。这远非参加或不参加劳动力市场的简单决定，参与市场工作涉及在一系列活动间重新分配时间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昂贵的过程，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只强调市场参与抹杀了性别本质差异和动态工作中的性别差异。

第二，尽管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女性在劳动力参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见第 1 章和专栏 5.1），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工作中，性别差异依然普遍地、持续地存在。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女性似乎陷入了生产率陷阱，该陷阱给今天的女性福利和女性经济赋权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也严重阻碍了对未来女性的投资。

尽管收入和生产率比较低，但作为农民、企业家和工人，女性并不比男性差。相反，我们认为，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男性和女性的经济活动差异造成的，尽管人力资本、工人所得报酬和工作特点也发挥了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领域、行业、职业、工作类型或公司类型，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差异都很大。尽管这些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演变，但是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并不足以消除就业的性别分割。因此，全世界的女性似乎集中在生产率不高的职业中。她们在小农场工作，或经营小公司。她们中间的无酬家庭工人比例过高，在非正规领域工作的人数比例过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她们很少能被提升到具有权力的位置。

导致农民、企业家和领薪水工人在经济机遇获得方面性别分割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时间使用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照料责任差异引起的）、生产投入获得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土地和信贷）、市场及制度失灵引起的性别差异。由于在经济活动各领域中引起分割的因素都很普遍，我们可以将对农业、企业和工资领域的分析纳入同一个框架。

经济机遇获得的性别分割反过来又强化了时间使用、获得投入的性别

专栏 5.1　消除获得差距：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近期进展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人数呈上升趋势，部分消除了性别市场参与差异（见第 1 章）。1980 年至 2009 年期间，全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 50.2%上升至 51.8%，而男性的参与率则从 82.0%降低至 77.7%。结果，劳动力参与率性别差异从 1980 年的 32%降至 2009 年的 2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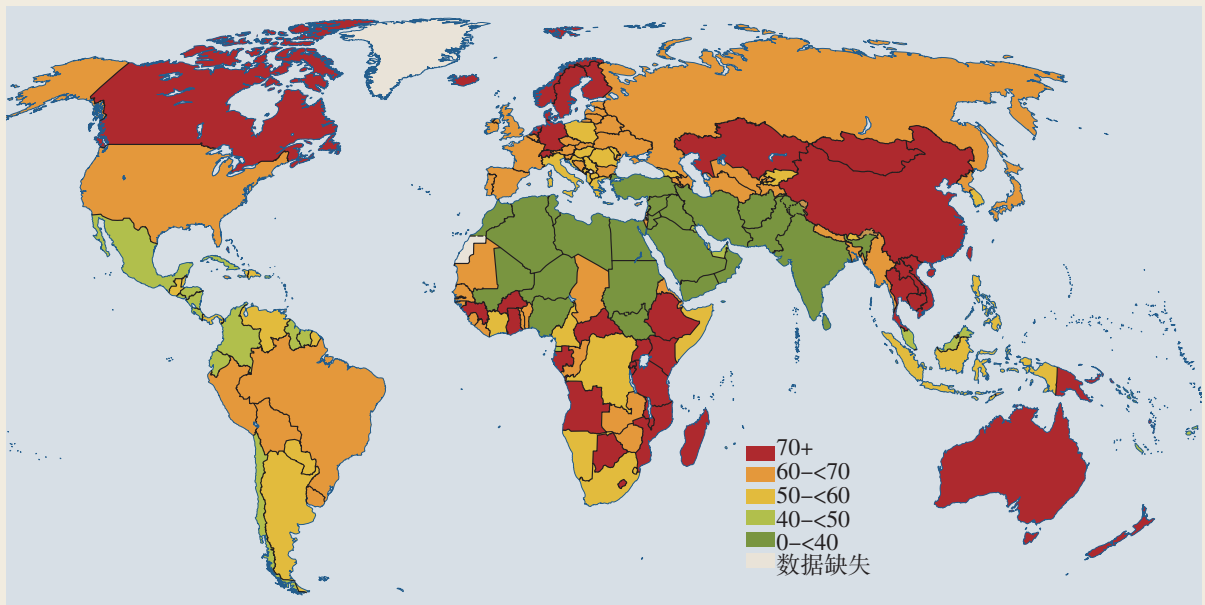
中东和北非（26%）、南亚（35%）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东亚太平洋地区（64%）和撒哈拉以南非洲（61%）的参与率最高（见专栏地图 5.1.1）。尽管地区间差异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参与率非常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经历了参与率的大幅度增长，而参与率非常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欧洲、中亚、东亚太平洋地区）经历了参与率的小幅度下降，各国各地区的参与率趋同（见专栏图 5.1.1）。

经济发展、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和生育率下降的联合效应对解释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女性参与率的变化大有帮助。从全球来看，经济发展伴随着女性经济机遇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而且在许多国家，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经济一体化给出口导向型领域带来了较大的增长，其中某些领域，比如服装业和轻工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雇佣了大量的女性（见第 6 章）。发展转化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升的强劲市场动力，这种动力主要体现为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也体现为较高的绝对工资和相对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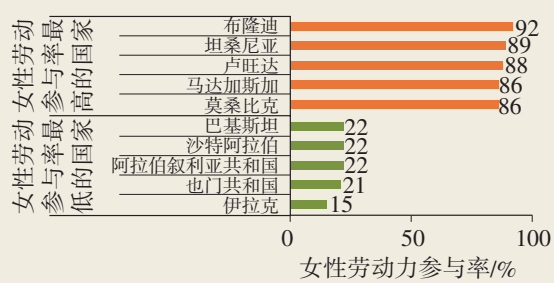
此外，经济发展伴随着包括电力、水、公路和交通等在内的基础设施改善，这可以缓解时间限制因素、降低与市场工作相关的交易成本，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教育领域的变化也促进了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相比，传统上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因此随着世界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大胆涉足有酬工作。在拉丁美洲，1975 年以来 42%的可见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可以由这种人力资本

专栏地图 5.1.1　女性劳动力参与：有些国家和地区较高，有些国家和地区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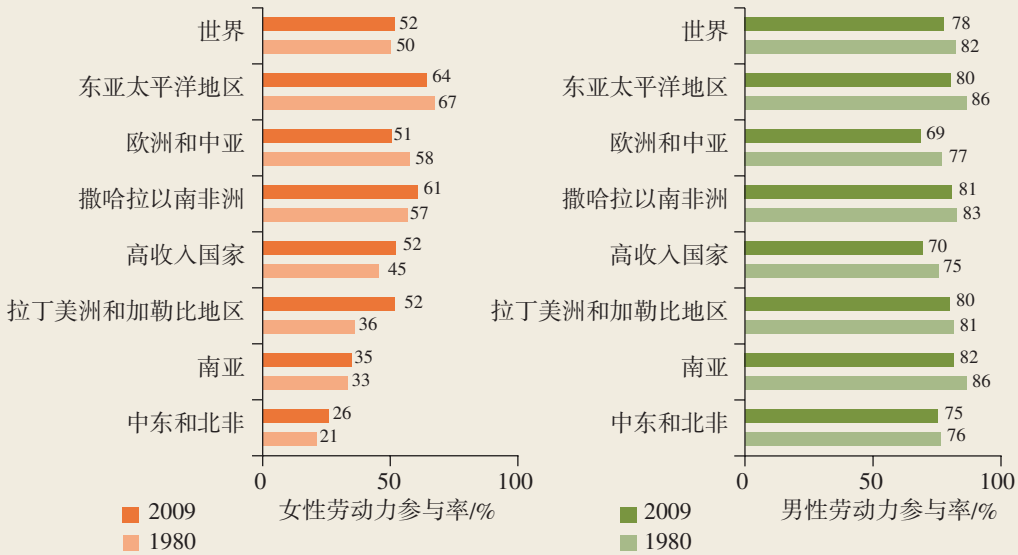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0a）。



专栏 5.1 消除获得差距：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近期进展（续）

专栏图 5.1.1 参与率：趋同



资料来源： 《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

的增加加以解释。[b]

同样，家庭组建方面的变化也增加了青年女性和有小孩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联系。传统上，婚姻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有关，而一旦孩子出生，参与率将进一步降低。在埃及进行的调查中，1997 年刚刚结婚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比将在一年内结婚的女性低 40%（19%对 29%），而 10 年以后，两组之间的差异大大缩短了（分别为 32%和 27%），这表明一些女性在结婚几年后重新参与劳动力大军。[c] 这样，结婚年龄的增加和生育率的降低促进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

即便如此，经济发展和教育、家庭组建的变化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影响因人而异，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最终取决于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及个体偏好。当市场和制度变化强化了参与的动力和削弱了参与的障碍因素时，大量女性将参与劳动力。相反，当限制因素，尤其是非正规制度的存在，或当市场和制度变化引发了相反的力量，这种影响就会大大削弱。

例如，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未能促进南亚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而中东和北非教育的重大改善只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有关女性在经济领域角色的社会规范可能削弱了参与市场工作强劲动力与实际成果之间的联系。同样，脱离共产主义转型后，东欧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相对较高的）56%降低至 2008 年的 50%。这种降低可能是伴随着政体改变的制度改变的反映，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参与市场工作已经不再是命令，而某些针对工作妈妈的支持结构（如儿童看护）也被取消了。

更广义上讲，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结构均可限制（或支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许多地区的许多国家以立法调节市场工作，比如限制工作时间、工作行业，男女两性待遇不同等。对女性实施这些限制措施的国家的平均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也较低（为 45%，而不实行这些干预措施的国家为 60%），性别参与率差异也较高（45%，而不实行这些干预措施的国家为 25%）。

此外，对父母产假利益和退休的调节也能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大多数国家提供某种形式的母亲产假，但是在产假的天数、产假期间所得工资的比例及由谁付款等方面的利益却大不相同。提供父亲产假的国家很少，而且常常附有更多的限制条件。男性和女性的父母产假差异可以增加雇佣女性的可见成本，因而降低了她们的就业机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女性工人退休年龄较早虽然出于保护的目的，但是这也可能导致终身收入、退休金利益、事业机会等方面的两性不平等，从而降低女性参与市场工作的积极性。

近年来，人们开始日益重视非正规制度，尤其是文化或社会规范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影响。本研究显示，很多传统观念与女性就业率（性别工资差异）呈负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关系还很强大。[d] 这类观点的影响似乎尤其对处于两个不同但又互相联系的时间点的女性，即青春期和结婚后女性具有约束力（见专栏 5.10 关于埃及家庭组

专栏 5.1　消除获得差距：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近期进展（续）

建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内容）。在两种情况下，与照顾家庭和流动相关的性别角色社会规范可以限制（青年）女性参与市场工作（见第 4 章和《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关于性别定性分析的延伸阅读）。

最后，市场工作个体偏好也可以解释国家间或同一国家内部的参与率差异。毫无疑问，一国内或特定群体的文化社会规范会影响偏好，尽管如此，它们通过对家庭决策过程的影响独立发挥作用。和社会规范一样，传统的个体态度和偏好与市场工作参与呈负相关关系。[e]

a. 世界银行 2011。
b. Chioda，García-Verdú 和 Munoz Boudet，待出版。
c. 世界银行 2010a。
d. Antecol 2000；Fernández 和 Fogli 2006；Fortin 2005；Goldin 2006。
e.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Fortin 2005。

差异，并使市场及制度失灵持久化。例如，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工作安排灵活的岗位上工作（比如兼职或非正式工作），这样她们就可以工作和照顾家庭两不耽误。但是由于与全职工作和正式工作相比，兼职和非正式工作的（小时）工资比较低，大量女性集中在这些报酬较低的工作领域中，削弱了她们参与市场工作的动力，并进而强化了非市场工作（包括照料）和市场工作沿着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专业化程度。

正是时间使用、投入获得以及市场和制度失灵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分割的互动使女性陷入了低收入的工作和低生产率的行业。因此要突破这种生产率陷阱，就要求取消时间限制因素、增加女性生产投入获得和矫正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的干预措施到位。

理解生产和收入的性别差异

生产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是系统的、持久的。无论是在农业中还是在非农业中，无论是自就业还是工资就业，女性的生产率都低于男性，收入也低于男性。这种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记录，而且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降低了（主要是教育差距缩短的结果），这些差异依然很大。[1]

女性农民的平均生产率低于男性农民。家庭内基于女性—男性比较的估测产量差异幅度很大（见表 5.1），但是许多聚集在 20%~30%左右。[2] 结果来自对家庭内部男性和女性的绩效对比研究，因此也对市场条件和制度限制的可能差异做了解释，从而进一步对发现予以支持。例如，在布基纳法索的部分地区，在同一家庭中，女性比男性农民的产量低 18%。[3]

同样，女性企业家的生产率低于男性企业家。[4] 在欧洲和中亚、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地区，女性管理的公司的工人生产的附加值低于男性管理的公司的工人生产的附加值，其中欧洲和中亚低于 34%，拉丁美洲低于 35%，撒哈拉以南非洲低于 6%~8%。[5] 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国乡村地区，女性所有企业和男性所有企业的利润率也有很大的差异。孟加拉国的差异最大，男性所有企业的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是女性所有企业每个工人平均产出的 8 倍，印度尼西亚的差异最小，女性所有企业每个工人的产出要比男性所有企业的低 6 个百分点。[6]

女性所有的企业在其他方面的表

表 5.1 和男性农民相比，女性农民的平均生产率较低

国 家	年份/季节	性别比较类别	作物	生产率标准	平均生产率性别差异/%
尼日利亚（奥孙州）	2002/03	农民性别	大米	产量	40
贝宁（中部）	2003—04	农民性别	大米	产量	21
加纳	2002 和 2004	农民性别	可可	产量	17
马拉维（全国）	1998—99	农民性别	玉米	产量	11～16
肯尼亚（西部）	1971	农民性别	玉米	产量	4
肯尼亚（西部）	2004/05	户主性别	玉米	产量	19
肯尼亚（次国家区域）	1989/90	农民性别	玉米、豆类和豇豆	每公顷产量总产值	7．7
埃塞俄比亚（中部高地）	1997	户主性别	所有农业产出	产量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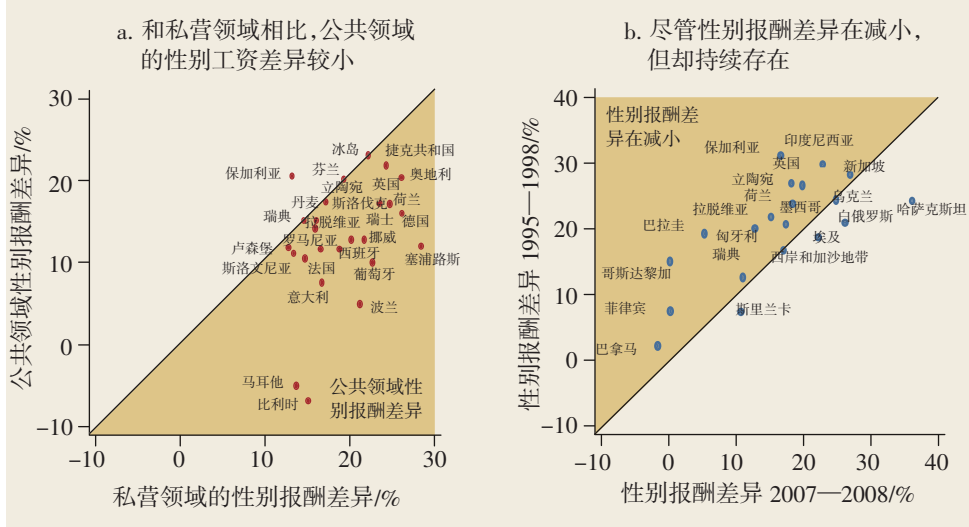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Alene 等 2008；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Kinkingninhoun-Mêdagbé 等 2010；Moock 1976；Oladeebo 和 Fajuyigbe 2007；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Tiruneh 等 2001；Vargas Hill 和 Vigneri 2009。

现也不如男性所有的企业。女性所有企业的利润较低[7]，所产生的销售额也较小。[8] 尽管证据好坏不一，女性所有企业的存活几率也比较低。[9]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工资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广泛存在（见第 2 章图 2.8）[1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在缩小，但是在正规和非正规领域，这种差异依然很大，女性常常从事零工或计件工作。[11] 公共领域的差异比较小（见图 5.1）。

这些生产率和收入的系统性性别差异的背后存在那些力量？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女性工人和男性工人的特征差异，女性和男性所从事活动和工作类型的差异，工人和工作特征所引起的效益差异。这里我们认为在工人特征（尤其是人力资本）和效益作用重要时，工作差异是导致生产率和收入性别差异的首要因素。

图 5.1 收入方面存在系统的性别差异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欧洲国家收入结构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年鉴》得出的估算值。

注：上面两图中的 45°线表示纵轴和横轴等值。

性别教育差异和经验差异

尽管性别差异已经缩小，和男性相比，（在某些国家）女性的教育程度仍然较低，女性更容易遭遇中断事业的困扰（主要是由生育引起的）。在某些国家，年岁较大的工人的教育差异仍然很大，但是年轻工人的差异差不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消失了（见第 1 章和第 3 章）。比较之下，在 19 个国家中 15 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男性个体就业年限的时间较长，从立陶宛的 0.3 年到冰岛的 5.4 年。[12] 尽管年轻工人（18~25 岁）的差异不大，但是在 26~39 岁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中，性别的经验差异非常大，这表明他们（她们）主要是在生育期间开始工作的。

由于教育和工作经验是宝贵的生产性投入，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差异会导致生产率和收入的差异。由教育程度较高、经验较为丰富的个体经营的农场和可比企业相比，展现了较高的生产率，因此，人力资本的性别差异转化为农业生产率的差异。[13] 同样，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商业培训机会的女性企业家也会迟滞生产率。[14] 而且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差异一直都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关键因子。[15]

近年来可见性别工资差异的减少可以归功于教育差异的缩短。但是它也降低了以教育差异解释以下国家可见工资差异的解释力，即 5 个有数据可查的中低收入国家（53 个）男性和女性 10%~50%可见工资差异，其他 5 个有数据可查的中低收入国家和 3 个有数据可查的高收入国家（17 个国家）男性和女性 0%~10%可见工资差异。这些中低收入国家大多是性别教育差异仍然很大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中，性别教育差异要么很小，要么出现了女性教育程度超过男性的趋势。在这种状况下，教育不仅不能解释可见的差异，而且当教育因素被考虑进去以后，它实际上使不能得到解释的差异扩大了。[16]

相比之下，实际经验方面的性别差异并没有减少多少，依然很大。结果，在性别教育差异很小但女性持续承担生育责任的发达国家中，实际经验对收入的影响得到了特别关注。在美国和英国，由生育和其他家庭事情引起的事业中断意味着和其他女性相比，有孩子女性的工资较低。女性在生小孩后，工资增长非常缓慢。而孩子出生后，对高技能女性相对较高的罚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17]

无疑，进一步缩短教育差异和经验差异有助于消除生产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但是考虑到在消除教育差异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后性别的工资差异仍然很大，只要收益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就业和看护责任的收益差异依然存在，只是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

人力资本和其他生产性资源收益的性别差异

如果性别对男女两性系统的个体差异和工作特征之外的生产和工资收入很重要，那么收益差异就可以解释生产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

女性农民和企业家不比男性差

如果将土地获得和生产性投入因素考虑进去，农业领域的生产率性别差异几乎就消失了。同样，女性所有企业和男性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常常以获得和使用生产性资源的差异加以解释，这些差异是企业规模和运营领域的函数，而不是性别因素的函数。[18] 在非洲城市地区的企业中，正规领域

专栏 5.2 董事会中的女性

世界上成为董事会董事的女性非常有限。在政府实施配额制的挪威，董事会女性董事的比例是 40%，瑞典的比例是 21%，巴林、日本、约旦、韩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比例则不足 2%。[a] 有趣的是，至少有一名女性董事的公司前景较好，这表明很多公司采纳了性别图腾主义的做法，例如，90%的法国公司都至少有一名女性董事，所有董事均为女性的公司只有 14%。

除了增加对性别平等的关注，许多人认为较低的性别多样性削弱了公司的潜在价值和增长。较高的多样性常常被视为改善董事会职能的途径，改善的方式主要是提高监控能力，扩大有关潜在客户基础信息渠道，集思广益提高创新性。[b] 较高的多样性意味着可以从较大的人才储备库中挑选董事会董事。[c] 但是，这也可能导致冲突增多、决策权力削弱。[d]

然而我们很难对这种影响进行测量。然而，正如现有很多文献所做的那样，仅仅展示女性董事越多，公司绩效越好是不够的。较成功的公司可能具有确保较高多样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是成功而不是其他方式引起的。因此，能够将公司绩效的改善归功于董事会女性董事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

因果关系证据展现了不同的结果。卡特等指出，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出现会提高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的绩效，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其对董事会审计功能的影响取得的。[e] 来自美国公司样本的信息显示了相似的结果，但是在治理薄弱的公司中，这种积极的影响是有限的。[f] 主要渠道是较高的出席率和更好的监管。其他学者发现的证据表明，董事会性别多样化提高了公司最高管理层的性别多样化。[g] 相比之下，对 2 500 家丹麦公司的研究发现，选举产生的女性董事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但其他女性董事对公司绩效具有消极的影响。[h]

a. 国际企业妇女领袖和国际金融公司（2010），摘自杂志《董事会》（2010）。
b. Carter 等 2007。
c. Adams 和 Ferreira 2009。
d. Hambrick，Cho 和 Chen 1996。
e. Carter 等 2007。
f. Adams 和 Ferreira 2009。
g. Bilimoria 2006。
h. Smith，Smith 和 Verner 2005。

中女性所有的中型企业的启动资本比男性所有的中型企业的启动资本少 2.5 倍，但是却是非正规领域女性所有中型企业启动资本的 5 倍。可以说企业中有酬员工的数量也是这种状况。[19]

证据显示，如果女性能够获得同等的投入，她们的生产效率可以和男性一样高。而且，如果能够为女性提供同等数量的资源，女性农民和企业家的生产效率可以和她们的男性同行相提并论。在加纳，农业实践性别差异证据一开始显示女性农民差于男性农民，仔细的调查发现在女性土地所有不安全的状况下，这已经是最理想的状态了[20]。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管理和企业绩效的性别差异反映了女性和男性对待风险与竞争的不同态度及对人事管理和企业组织的不同态度，这些差异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是后天学习造成的。[21] 本报告首先强调在发达国家中性别对企业家和公司绩效的影响。一些研究分析了性别差异在通过管理提高公司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强调女性在有关公司绩效会议中的（积极）影响（见专栏 5.2）。

其他学者认为，对待企业的态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较小，为什么即使女性成了企业家，其公司在投资和增长方面都不如男性的原因。传统的女性角色和形象可能影响女性对自身能力的判断，降低她们的自效力和潜力，包括那些扩大自身企业的效力和潜力（见第 4 章）。[22] 实证研究证据显示，个人特征并不对男性和女性的创业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个体对自身技能的判断、失败概率和机遇存在等除外。[23]

然而，关于管理和信仰差异对生

> “即使从事与男性一样的工作，（女性）在工资上也受到歧视。例如，在……地方的塑料厂，女性每月的工资是 900 新谢克尔（247 美元），男性每月的工资是 1 800 新谢克尔（495 美元）。”
>
> ——西岸和加沙地带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产率性别差异的整体影响的证据仍然有限，而且正反不一。因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就整体而言，现有证据显示作为农民和企业家，女性并不差于男性。

为什么女性从事工作的报酬较少？

女性从事工作的报酬确实低于男性。第一，即使在将工人和工作特征的可见差别纳入考虑范围之后，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工资性别差异无法得到解释。[24] 第二，和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和职业相比，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和行业的工资较低。这种现象已经得到很大关注。而且大量证据显示，个体工资因职业的性别构成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25]

本报告对这种程序化事实提供了两种类型的解释，一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歧视；二是根据不同的看护责任，（主动）将男性和女性划归不同的领域和职业。也就是说，女性更有可能选择允许她们调整工作时间、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频繁退出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现有证据（部分）支持两种解释。

不能得到解释的性别工资差异常常被视为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的证据，但是由于这些不能得到解释的性别工资差异可能反映了未观察到的或未能测量的男性和女性工人及其工作的特点，在解释这些结果时我们需要谨慎一点儿。[26]

近期对工资性别差异和歧视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新方法。第一组特别对同质群体的男性和女性进行比较，使用宽泛的资历信息，以尽量减少性别差异对不可测量的特征产生影响。[27] 该研究仍然发现了不能解释的工资差异（在 12%和 20%之间波动），尽管与在异质群体中进行比较相比这种不能解释的工资差异比例较小。第二组检验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力量应当降低或消除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歧视这一经济预测。[28] 和这一推理相一致，几位学者分析了市场力量变化、调节和通过贸易提高的竞争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29] 所有情形下的结果显示，某些性别歧视影响薪酬。第三组补充性研究强调雇佣歧视而不是薪酬歧视，这主要是通过将具有同等特征的应聘者推荐给可能的雇主。由此形成的结果好坏参半（见专栏 5.3）。

关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性别歧视的大多数证据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信息可能不是特别充分。事实上，反歧视法的覆盖范围，尤其是执行能力可能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扩大，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歧视问题及其影响范围可能更严重。在巴基斯坦，和男性同行相比，农村地区私

专栏 5.3　雇佣性别歧视？来自就业审计学研究的证据

就业审计学研究旨在通过同等女性和男性应聘者推荐给可能的雇主，将性别（或其他类型）歧视的影响与其他影响雇佣决定的因素隔离开来。结果好坏参半，表面上取决于环境和研究设计。

对费城一家高档饭店的研究发现了歧视女性的大量证据。[a] 和男性应聘者相比，得到面试机会的女性应聘者的比例低 0.4 个百分点，得到工作机会的比例低 0.35 个百分点。然而由于个性和外表等个体特征可能对雇佣决定产生了影响，我们应当谨慎解释这些结果。

为应对个体互动中个体差异所造成的比较力降低，某些研究采用了书面申请而不是实际的“模拟”工作申请。[b] 他们未能找到性别歧视的系统性差异，尽管他们的确发现了一些程式化和统计性性别歧视的蛛丝马迹。类似方法对雇佣时“为人母的经济惩罚”做了评估。Correll，Bernard 和 Paik 发现单身女性比单身男性的面试机会多，无小孩的女性接到的面试邀请是同等资历的做了母亲的女性的 2.1 倍。[c] 第三组研究对真正应聘者的找工作过程进行追踪，对男性和女性雇佣率的差异做了研究。证据没有带来任何结论。[d] symphony orchestras，Goldin 和 Rouse 进行的相关研究检验了无性别审计的影响，发现了歧视的证据。[e]

a. Hellerstein，Neumark 和 Troske 1997。
b. Bravo，Sanhueza 和 Urzua 2008；Riach 和 Rich 2006。
c. Correll，Benard 和 Paik 2007。
d. Moreno 等 2004。
e. Goldin 和 Rouse 2000。

专栏 5.4 就业性别分割的含义是什么?

本报告使用就业（或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割的术语来指代男性和女性从事工作的差异。尽管该术语被频频用于讨论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分布差异和领薪水工人的行业与职业分布差异，本报告认为，同样的性别差异也发生在农民和企业家所从事的工作和活动中。而且，本报告还将分割的讨论延伸到这些领域，因为这样可以为就业结果中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提供深刻的见解。

由于在很多方面农业和企业活动与工资就业不同，界定术语分割在两个领域中的含义就非常重要。谈及农民时，讨论强调在农场规模（根据土地规模衡量）和生产的市场导向方面的性别差异。谈及企业时，讨论强调公司规模（根据雇员人数衡量）和运营领域的性别差异。本报告也展示了一些有关成长为企业家的动机和公司增长方向性别差异的证据。谈及工资就业时，讨论强调就业所在的产业或行业。因此，术语就业分割系指沿着这些特征中任一特征的系统性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分割是由性别差异限制因素与具体经济机会（包括歧视）的组合造成的，并根据基于性别的偏好分类。

立学校的女性教师的薪酬要低 30%，而即使在将个体和学校特征纳入考虑之后，薪酬差异依然存在。[30] 但是我们需要更系统的信息。

选择假设基于这样的观念，即由于照顾家庭及其他责任，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灵活性较高、不需要对公司或公司群体独需的技能进行持续或大规模投资的工作，或技能不会因事业中断而大幅度贬值的行业的工作。[31] 这些通常是技能和经验收益较低的行业，其他条件相等，工资也是如此。

女性高度集中在这些工作中将对为何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的工资低于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做出解释。来自美国的证据显示，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支付给女性和男性的工资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她们（他们）（不可测量的）技能相关的特征和偏好引起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发现一旦技能相关的工作特征得到考虑，女性就业比例对女性工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就降低了 25%，对男性工资造成的影响就降低了 50%。[32]

在发展中国家中，灵活性较高的工作通常是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工作。尽管裁判委员会仍然没有确定非正规领域中多少就业属于自愿性就业，现实状况是平均技能收益比较低。来自埃及、坦桑尼亚和几个欧洲国家的证据显示，教育和经验的收益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在正规领域里更高。[33] 考虑到女性在非正式工人中的比例很高，这将会转化为女性工作的工资低于男性。

> “服装公司很少招聘男人，这是因为服装公司的工作需要缝纫技能。”
>
> ——印度尼西亚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工作分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就业性别分割

无论是领域、产业、行业、工作类型还是公司类型，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都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的差异（属于“就业性别分割”系指这些差异）（见专栏 5.4）。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农业（占所有女性就业人数的 37%，男性为 33%）和服务业（占所有女性就业人数的 47%，男性为 40%）中就业。制造业则相反。[34] 女性在无酬和日工或非正规领域中的比例也较高。女性在全球总劳动力中的比例约为 40%，但是 58%的女性从事无酬工作，44%是工作就业，50%在非正式领域就业（见图 5.2）。[35]

当对同一领域内的男性和女性，即对女性和男性农民和企业家、女性和男性工资工人进行比较时，这些差异同样普遍存在。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拥有和经营较小的公司和从事糊口农业。在 16 个被分析的国家中，15 个国家农村地区女性户主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小于男性户主家庭，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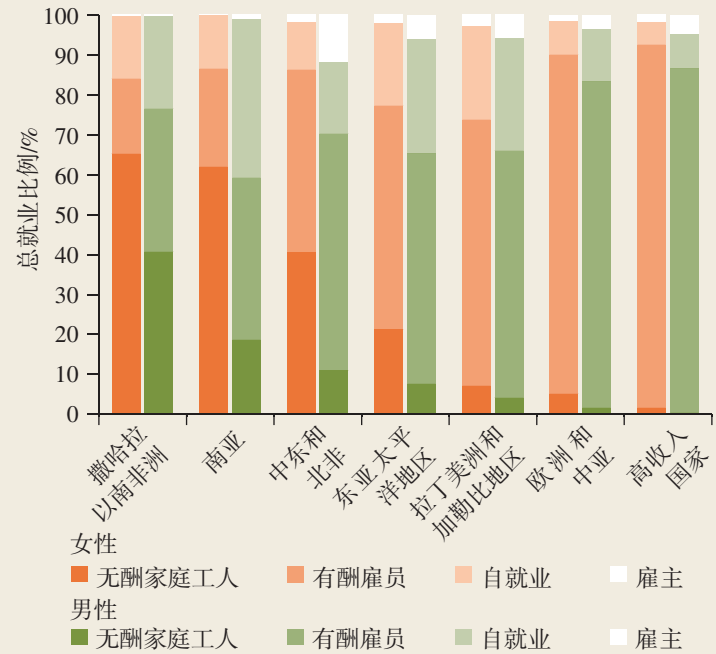
中 6 个国家的平均差异等于或大于 1.5 公顷（或平均地块规模的 50%）。[36] 此外，大部分经济作物由男性管理，尽管女性也做出了贡献（常常是无酬的）。而女性只是因为硬性的任务分工才参与商业性农业的。

同样，大量的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由女性经营，女性所有的公司的比例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降低。[37] 如果应用更严格的所有权定义，即有多个所有者时女性具有实际的决策权，该比例会更加急剧的下降。[38] 此外，和男性领导的企业相比，女性领导的企业更容易以家庭为基地，在家庭内经营。[39] 在墨西哥，30%的女性领导的企业在家庭中经营，相比之下，男性领导的在家庭中经营的企业只占 11%。玻利维亚的相应比例是 23%和 10%。[40]

女性企业家也更可能是“被逼出来的”企业家而不是“抓住机遇”的企业家，“被逼出来的”企业家认为办企业是最后的选择。在美国，女性在高增长公司中的比例很低，企业是否以增长为导向是根据企业家是否被推进或拉进企业为衡量标准的。[41] 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常常列举的进入企业的主要原因是贴补家庭收入，而男性列举的主要原因则是利用市场机遇的愿望。[42] 即使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向女性敞开的经济机遇越来越多，“被逼出来的”女性企业家的比例降低了。[43]

如前所述，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产业和行业领域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在公共服务领域（公共管理、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就业率超过了 50%，其中包括职业工作者（包括教师和护士等）、文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人员。她们也代表了零售业、餐饮业和农业工人的 40%，相当于女性在全部就业中的比例。[44]

图 5.2　女性在工资工人和无酬家庭工人中的比例很高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注：56 个国家 2003—2008 年期间可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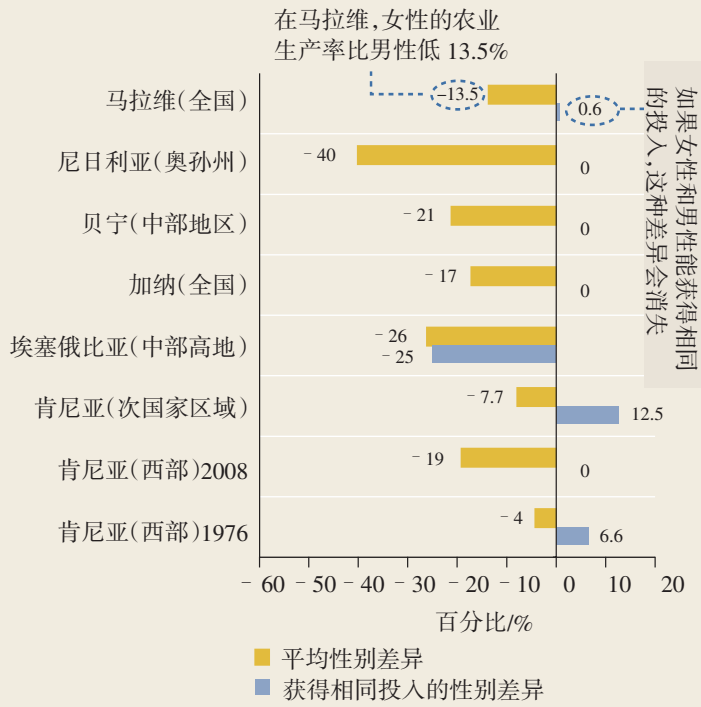
当以公司而不是工人为审视对象时，工业分割呈现相似的模式。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所有的公司往往在有限的几个领域中运营，这些领域遍布小规模的企业，以低附加值和低增长潜力为特征。[45] 女性企业家高度集中在服务行业和更适合女性角色的行业里（诸如美容院、食物贩卖或缝纫）。[46]

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平均（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领域、产业、行业和工种中工作，这种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性别差异。

“对女性而言，银行和学校的工作被认为是安全的、体面的工作，对男性而言，管理和工程领域的工作被认为是体面的高收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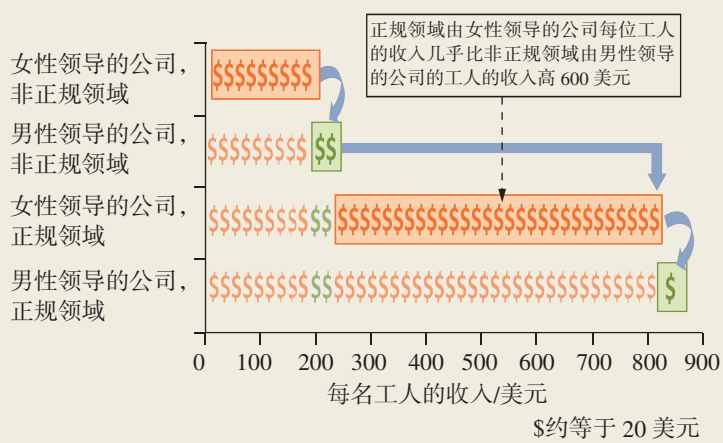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图 5.3　如果将获得和使用生产性投入纳入考虑范围，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异就会大大降低



资料来源：Alene 等 2008；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Kinkingninhoun-Mêdagbé 等 2010；Moock 1976；Oladeebo 和 Fajuyigbe 2007；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Tiruneh 等 2001；Vargas Hill 和 Vigneri 2009。

图 5.4　与正规和非正规领域企业家的生产率差异相比，女性和男性企业家的生产率差异反倒显得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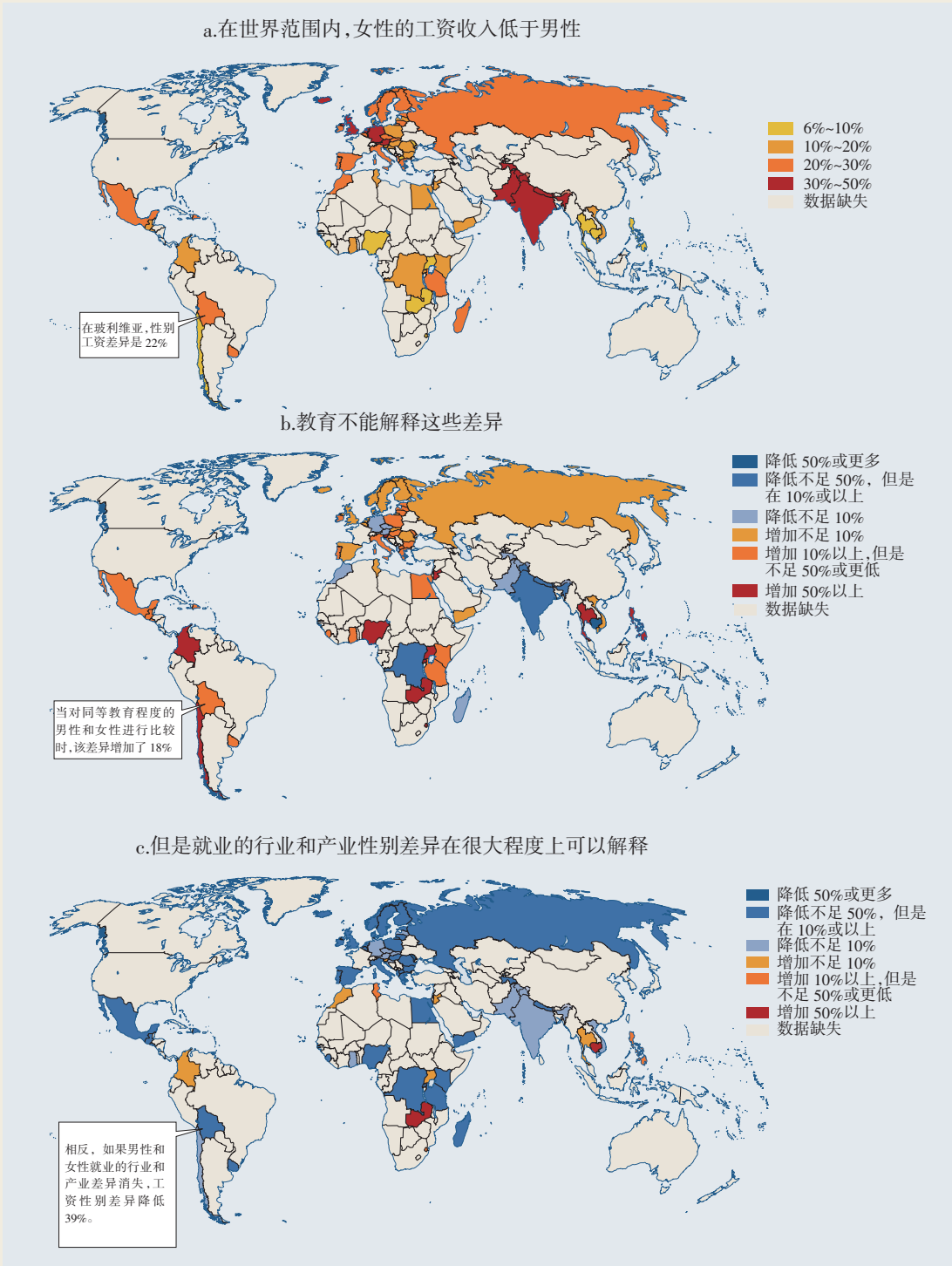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Hallward-Driemeier 2011b。

一旦经营规模（以土地规模和技术投入的应用为衡量标准）的性别差异得到控制，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异就会大幅度降低乃至消失。[47] 在表 5.1 中除一个例子以外的所有其他例子中，在土地规模、肥料获得、机械化程度和其他生产性投入的差异得到控制后，生产率性别的差异就会变得无关紧要（见图 5.3）。来自家庭内部比较的证据也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布基纳法索女性农民较低的生产率完全可以由女性土地的劳动密度低、肥料使用量少来解释。[48]

营业领域和公司规模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女性领导的企业和男性领导的企业之间的平均生产率差异（以附加值或每名工人的收入衡量生产率）。例如，自就业个体收入性别差异的 9%~14%可以由营业领域解释。[49] 在非洲城市地区的正规领域公司中，超过 20%的性别生产率总差异可以由营业领域的差异解释，30%的差异可以由公司规模差异解释。[50] 在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农村企业受到的影响大体相似，在那里，营业领域和公司规模解释了 30%~90%的生产率性别差异。[51] 在对正规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做出区分后，绩效差异也大大降低了。与正规和非正规领域的生产率差异相比，女性领导的公司和男性领导的公司的生产率差异反倒显得小了（见图 5.4）。

男性和女性在产业和行业中的分布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工资性别差异。在对个体特征（包括人力资本）和居住地进行控制后，行业和就业领域性别差异解释了（53 个中低收入国家中）33 个和（17 个高收入国家中）14 个有数据可考的国家 10%~50%的可见工资差异。而且，行业和就业领域性别差异解释了另外 9 个中低收入国家和 3 个高收入国家 0%~10%的可见工资差异（见地图 5.1）。因此，和教育差异相比，行业和产业差异可以对

地图 5.1　在考虑个体特征后，就业的行业和产业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性别差异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使用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I2D2）和欧盟收入与生活状况数据得出的估算值。

更多国家的未解释工资差异予以解释。

此外，在对这些国家女性和男性工资工人进行比较时，只雇佣男性或只雇佣女性的工作相当多，换句话说，许多工人找不到可以相比较的男性或女性工人。在某些国家，没有可比较女性的男性平均赚取的工资比较高，没有可比较男性的女性平均赚取的工资比较低，这一发现支持就业的行业和产业性别差异导致性别可见工资差异这一假设。[52]

这里以生产率和收入作为判定一种工作是好是坏的主要特征的思想假设男性和女性可以提高生产率与收入的工作是更可取的工作。定性证据显示，尽管在评估某一特定工作是否称心如意时也考虑其他因素，这一假设距离现实并不远（见专栏 5.5）。

在这里讨论的证据表明了三个意思。第一，人力资本性别差异是造成生产率和收入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教育差异的缩小，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的相对重要性正在降低。第二，在将生产投入获得的性别差异纳入考虑之后，女性农民和企业家的效率与她们的男性同行一样高。第三，尽管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些有关性别歧视的证据，可见工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女性和男性所属行业的差异来解释。

因此，尽管工人特征差异（尤其是人力资本）和收益会发挥作用，生产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就业差异引起的。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直接和间接发挥作用。一方面，女性在较小的农场和公司工作，其所从事的产业和行业工资较低，从而直接对生产率和收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收益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收益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对生产率和收入产生影响。本章其余部分确认和理解导致性别就业分割的原因。

第一印象：如何以性别因素解释就业领域的分割现象

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经济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引起了可提供的工作的数量和性质的变化。农场工作给非农场工作让位，工资比例和有薪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上升，非正规领域的覆盖范围会降低。而且随着不同领域新的经济机会的出现，市场价格和工资可能发生变化，指出潜在劳动生产率最高和最需要工人的行业。

但是，经济活动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如何对就业结果并最终对就业性别分割产生影响尚不明确。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尤其是较快发展的服务业和工资就业鼓励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见专栏 5.1）。而随着女性工人人数的增加，女性可能从事传统上男性从事的工作。但是其他限制因素可能限制促进女性到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就业的经济动力的影响（反之亦然）。

对经济发展引起的信号，家庭和个体可能或愿意做出响应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她们）的偏好和新市场与制度力量改变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的方式。由于偏好、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对女性和男性产生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对就业分割的影响需要以经验方式得到评估。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经济发展（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和整体就业分割的关系，重点是分割的性质和程度如何随着国家的富裕而变化。

孟加拉国和瑞典相像吗？

国家富裕了，全球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农业就业在全球劳动力中的比例从 19.6%降低至 13%，制造业则从 31%

专栏 5.5　好工作与坏工作：是什么？谁来做？

来自发展中世界 88 个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女性和男性和我们提到了好工作和坏工作，提到了什么是好工作，什么是坏工作，谁从事这些工作。

如同下面的引用所示，好工作就是报酬很好的工作：

> “好工作就是薪水很好的工作。”
>
> 塞尔维亚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 “护理工作很好，因为可以赚到很多钱。”
>
> 南非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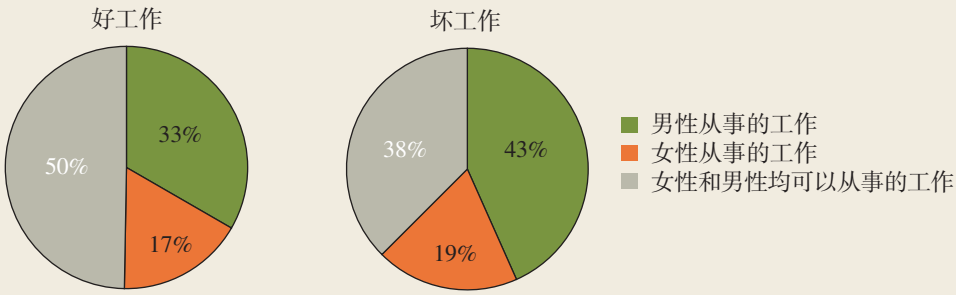
> “谋生的最好方式是到国外从事建筑业、管家、种植马铃薯和玉米、开办企业。这些工作由于收入较高，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作。”
>
> 马尔代夫农村地区成年男性

女性和男性认为大多数工作（60%的工作得到讨论组的确认）都是好工作，这和他们的年龄或居住地点无关。而且尽管工作的性质因国家和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而不同，什么被认为是好工作、什么被认为是坏工作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公共雇员或高技能工作（比如医生律师或法官）一般被认为是好工作。比较之下，收集垃圾或清扫街道等“肮脏”的工作被认为是坏工作。

在所有国家和社区中，就业性别分割都是严重的问题，约 50%的工作被认为是男性的工作或女性的工作。如同下图所示，在具有性别针对性的工作中，更多的是针对男性的工作。

在大多数国家中，无论工作被认为是男性的、女性的或中性的工作，这都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概念。例如，男性的工作通常是技术性的（电工、机械工）、要求体力的工作。在许多国家中，高技能工作也被认为是男性的工作。相比之下，女性工作包括零售、个人服务和家政服务。许多社区将“家庭主妇”视为女性的工作，即使这些工作没有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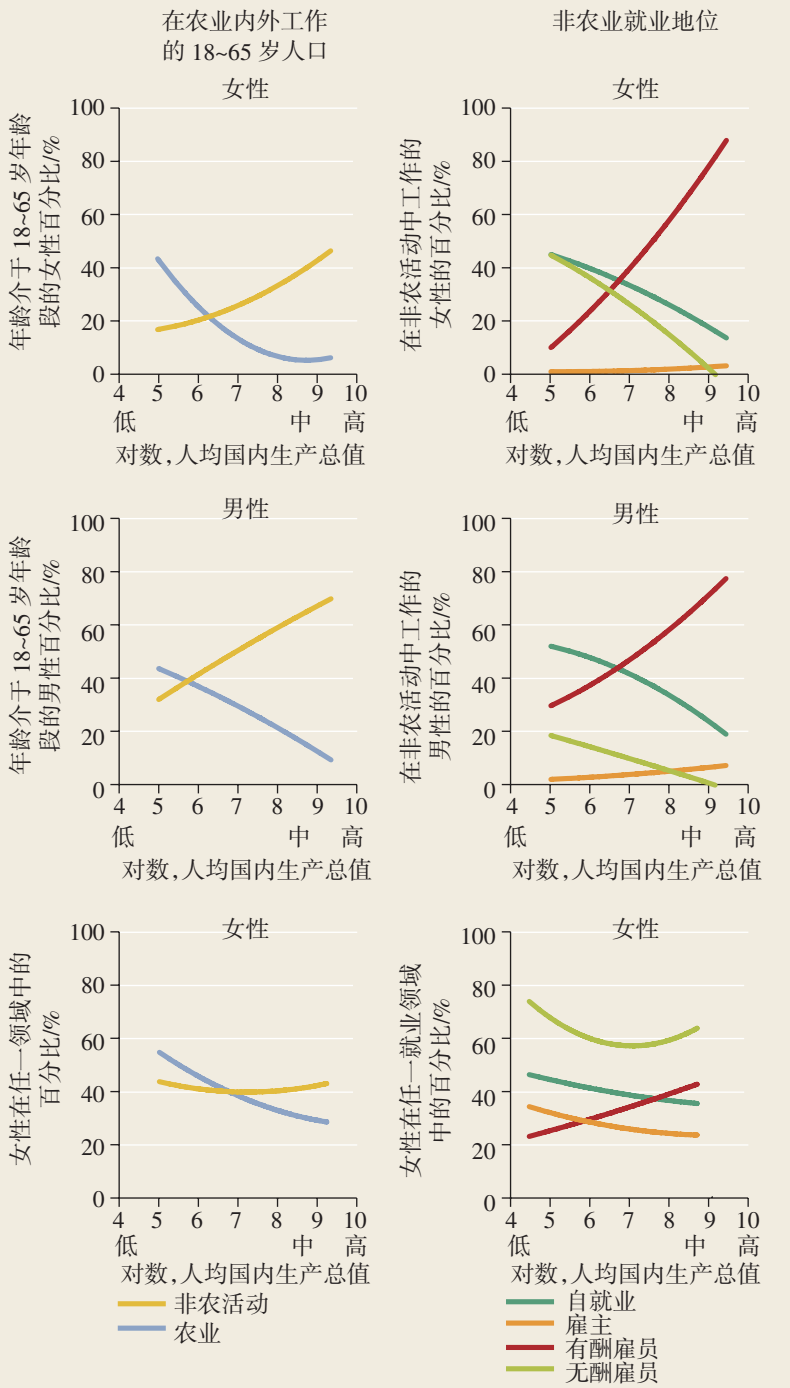
在坏工作中，就业性别分割和女性工作在分割性工作中的比例比较高。超过 60%的坏工作是具有性别针对性的工作。在这些坏工作中，25%~35%是女性从事的工作。相比之下，具有性别针对性的好工作只有 15%~30%。最后，具有性别针对性的好工作和坏工作中女性工作分别所占比例的差异完全由男性观念决定，换句话说，男性所认为的应当由女性来做的坏工作的比例大于好工作的比例，而女性的观念并不因工作的特点发生太大的变化。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资料库）的计算值。
注：数据来自讨论组在阿富汗、不丹、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波兰、塞尔维亚、南非、坦桑尼亚、越南、西岸和加沙地带和也门共和国等 88 个城市和乡村社区中与男性和女性进行的讨论。讨论组分别与成年男性、成年女性、青年男性和青年女性进行讨论。数据是平均数。

降低至 23.5%，相反，服务业从 49%上升至 63.5%。[53] 此外，工资和薪水就业在全球总就业中的比例从 73%升至 76%，而自就业从 17%降低至 16%，无酬就业从 8%降低至 6%。企业家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大致保留在 2.5%。这些变化引起的结果是，非正式就业在全球就业中的比例从 25%降低至 21%。[54] 虽然在不同地区中存在不同工作类型相对重要性和变化幅度的差异，但是

图 5.5 经济发展与工资就业女性工人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与女性在无酬工作、自就业和创业活动中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I2D2）得出的估算值。
注：数据来自 100 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来自 1996 年至 2008 年期间可以得到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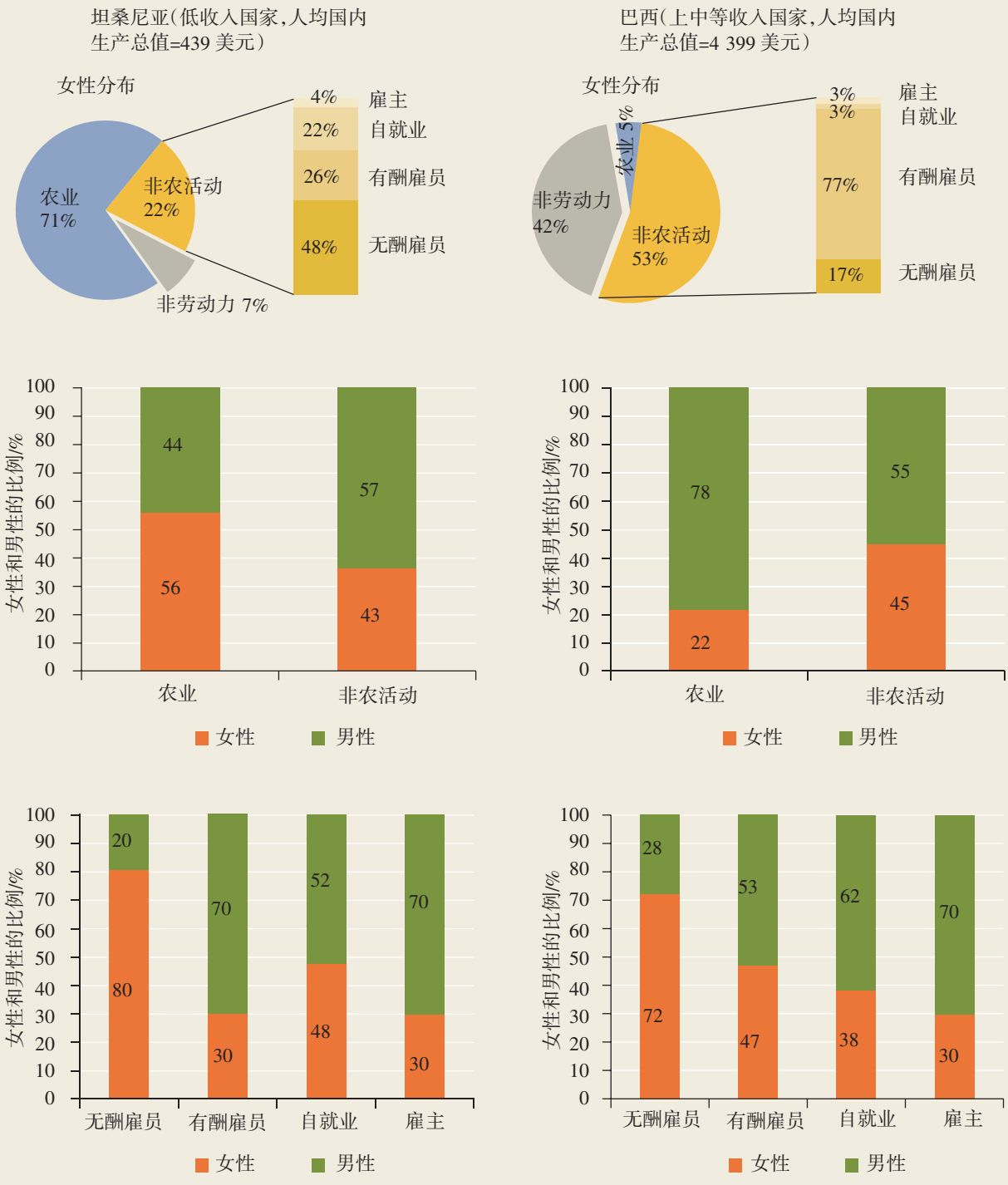
这些趋势在不同地区中很普遍。

然而，经济发展引起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消除或削弱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分割问题。因此，尽管收入差异很大，孟加拉国的就业分割与瑞典的就业分割看起来差不多。使用 100 个发展中国家 1993 年至 2009 年的数据，我们对农业和非农业就业的比例，无酬就业、有酬工资就业和企业家的比例（后者分为自就业和雇主）的比例进行的估测，并将其作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对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是分开来做的。而且，我们也计算了在任一就业领域女性工人的比例。

随着国家日益富裕，男性和女性均倾向于脱离农业，进入非农业活动（见图 5.5）。就非农业就业而言，有酬就业的比例和雇主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只是后者的增长幅度较小。这些模式对男性和女性都很普遍，但是在发展水平较低时有酬工作和自就业发生率的性别差异表明，女性更有可能从无酬工作转向工资工作，男性更有可能从自就业转向工资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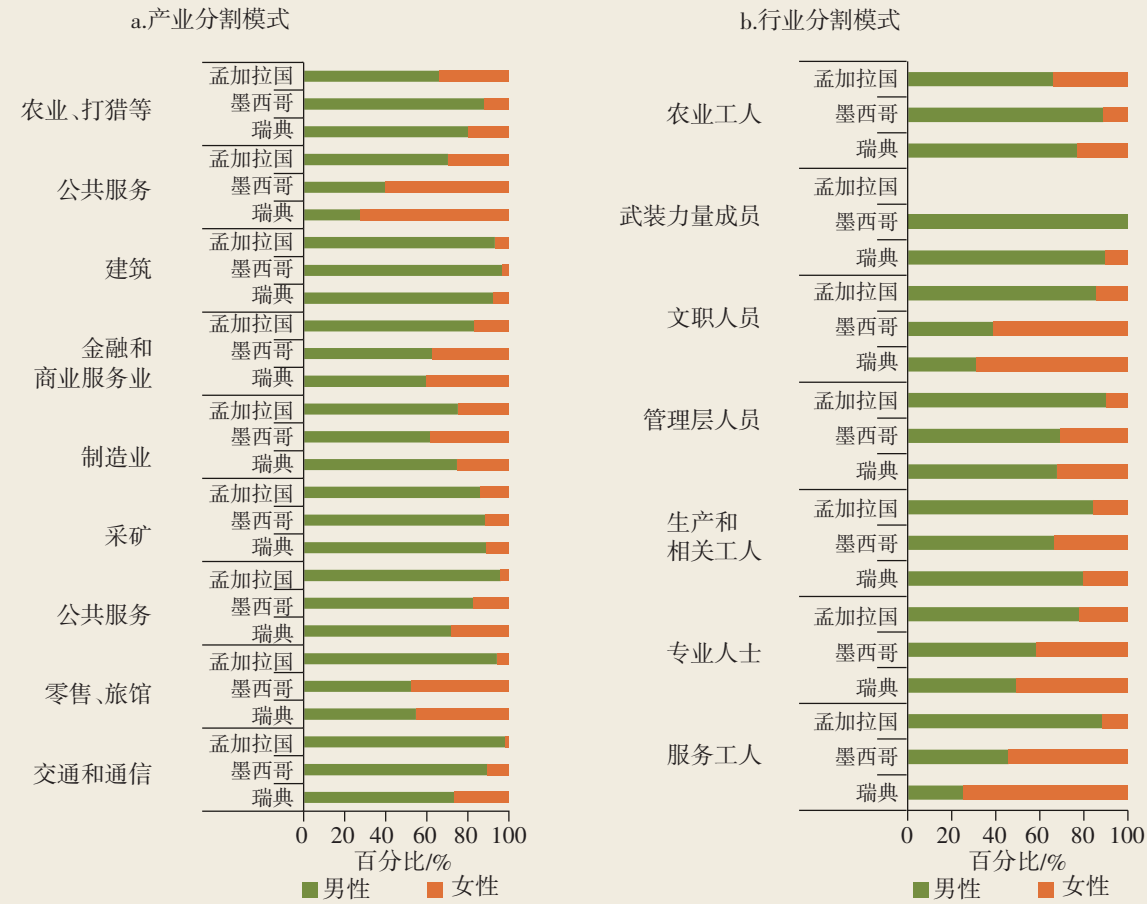
结合在一起，这些趋势表明经济发展改变了这类分割的性质，而不是通过就业状况消除性别分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低到中的发展与女性工人在工资就业中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与女性在无酬工作、自就业和创业中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的时候，女性在农业和无酬工作中的比例过高，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中等程度的时候，女性在无酬工作和工资工作中的比例较高。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中向高发展，这种趋势保持不变，但是女性在无偿工作中的比例上升了，是例外。然而请注意，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无酬就业中的总就业率都很低。通过对低收入国家坦桑尼亚和中等收入国家巴西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分割模式的这些变化（见图 5.6）。

图 5.6　坦桑尼亚和巴西阐释了就业性别模式如何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改变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收入分布数据库（I2D2）：坦桑尼亚 2006 年和巴西 2005 年所得的估算值。
注：200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 年不变美元。

图 5.7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领域就业分布差异很大的国家中，产业和行业分割模式很普遍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孟加拉国 2005 年，墨西哥 2008 年，瑞典 2008 年）。

经济发展对产业和行业分割的影响甚至更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领域就业分布差异很大的国家中，这些模式非常普遍。例如，在经济活动的九大领域中，孟加拉国、墨西哥和瑞典的女性工资就业的比例惊人的形似，差异最显著的领域是公共服务、零售和餐饮业，孟加拉国的女性就业要低得多。八大行业集群中的女性就业比例也是如此，文员和服务业人员的差异最大（见图 5.7）。也有学者使用不同国家组别的信息提出了相似的证据。[55]

无论是行业间比较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较高的收入并不总能减少产业或行业分割。如同第 2 章所讨论的那样，尽管国家间产业和行业分割存在着重大差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水平）分割的标准化衡量标准之间的关系很小或不存在关系。事实上，一些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可能强化了产业和行业分割。导致女性融入有酬就业（日益增长的服务业、工资就业领域就业机会的增加）的因素也可能通过某些领域或行业的女性化，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制度化。[56]

随着服务领域的增长，许多“女性”工作，比如看护儿童和食品服务也卷入了市场经济。服务领域许多新的工作与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的密切关系可能扩大领域和行业范围内的劳动性别分工。同样，大的工资领域的出

现增加了部门和行业的区别。结果，与在简单的经济体中相比，技能、家庭义务、偏好以及已经存在的文化规范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更容易体现在部门和行业分工中。在简单的经济体中，性别通常沿着家庭或市场的轴线形成层次。[57] 本论断与关于高收入国家和工资工人中较高分割的证据是一致的。[58]

如果不是经济发展，那么是什么？

就业性别分割（随着时间推移的）的持续性和（在不同国家间的）连贯性指向了根植于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结构性原因，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社会环境的国家中，这些结构性原因具有很多共性。

我们认为三个因素规定了女性和男性参与市场工作、选择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或工作的决策，这三个因素是时间利用模式的性别差异、获得生产性投入的性别差异、所受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影响的性别差异。

教育背景的性别差异也造成就业分割，在受过高等教育男性和女性人数较多的国家中尤其如此（见第 3 章和专栏 5.6）。

市场和制度决定了家庭分配时间和其他生产性资源的决策，从而也就决定了家庭的性别就业结果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响应。当市场和制度一起提供变革的持续性信号时，家庭会对这些信号做出响应，降低性别不平等就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例如，当存在儿童护理的服务或社会不反对女性参与市场工作时，女性就更有可能响应贸易开放带来的经济机会和工资的增加。相比之下，当重大壁垒依然存在，信号就会削弱或甚至产生相反的作用，进展就会受到更大的限制。

但是市场和制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们对个体和家庭动力和限制因素的影响。相反，市场和制度，尤其是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也会以一种有意无意产生性别差异的方式，对个体和家庭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或作为雇员和雇主在经济领域内的互动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价格和其他相关信息通过很少有女性参与的网络实现交流和共享，那么女性农民在进入市场时面临的困难可能多于男性农民。

本报告框架通过强调获得经济机遇的性别差异来描述这些影响，由此引起的就业分割是家庭、市场和制度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领域中任一领域的限制因素或壁垒阻碍均可阻碍获得经济机遇或缩小就业分割，不仅如此，不同领域中的限制因素和壁垒还会互相加强（见图 5.8）。通过审核家庭、市场和制度在决定时间利用模式和获得生产性投入中的作用、检查有关潜在限制因素的证据和突出强调政策行动领域，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报告第三部分将对政策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性别、时间使用和就业分割

时间是一种资源。时间可以用于包括市场工作、家庭内部其他（无酬）工作和儿童看护等生产性活动，也可以用于个体活动（例如吃和睡）和休闲。[59] 本部分强调时间使用性别差异和性别就业分割的关系。时间使用模式对一系列其他（性别）成果、更广泛一点，对个体和家庭福利的影响将在其他章节中得到讨论。

关于时间的两种基本观念及其应用决定了家庭内部关于时间分配的讨论。第一种基本观念是家庭需要为“生存相关”的个体活动分配最低的时间，比如做饭、睡眠、取水或保证最低限度的消费。只有在这些任务得到解决后时间才能用于其他活动（自由

专栏 5.6 分割的种子早已种下：教育经历的性别差异如何决定就业分割

教育差异在缩小，但是由于女性和男性在正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中持续获得的技能类型不同，女性和男性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见第 3 章）。有限的证据显示教育经历的性别差异先是转化为就业的性别差异，并最终转化为生产率和收入的性别差异。[a]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非常有限，可以对就业成果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教育程度（在高等教育内部，学位类型）。在印度尼西亚，普遍的中等教育和较高的学术能力使男性和女性完成大学教育的可能性均得以增加，但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却因性别而异。无论是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大学学位的确大大增加了女性和男性的就业机会。但是对女性而言，大学学位只是进入公共领域工资工作的“敲门砖”，对男性而言，大学学位似乎打开了就业机会的选择板。[b]

在男性和女性教育与高等教育入学率均很高的发达国家，学习领域的性别差异对决定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更重要。女性和男性集中在不同的学习领域，这些模式迅速转化为就业性别差异。例如，14 个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信息是，6%的男性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而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女性仅为 3.8%。比较之下，11%的女性从事文员工作，而从事文员工作的男性仅为 7%。[c]

即使对同一专业的男性和女性进行比较，行业分割依然存在，这表明教育经历的性别差异只是问题的部分症结所在。在所有获得理科学士学位的人中，55%的男性在与物理、数学和工程学相关的行业工作，而女性仅为 33%。相比之下，具有理科学位的女性中，22%成了教师，而男性仅为 13%。其他专业领域也发现了相似的差异。[d]

天生能力和学业表现的性别差异不能解释高等教育获得和教育轨道选择的差异。但是能力强度排序和学习专业偏好的性别差异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在对相关的个体特征进行限定后，在发达经济体中，和其他男性相比，学术能力最强的男性更有可能选择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学习，但是分数对学术能力最强的女性的选择影响不大，对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和中性领域的影响也不大。而且，选择高要求的或受重视的专业进行学习大大增加了男性而不是女性登记进入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学科的概率，而且大大降低了男性和女性登记进入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学习的概率。[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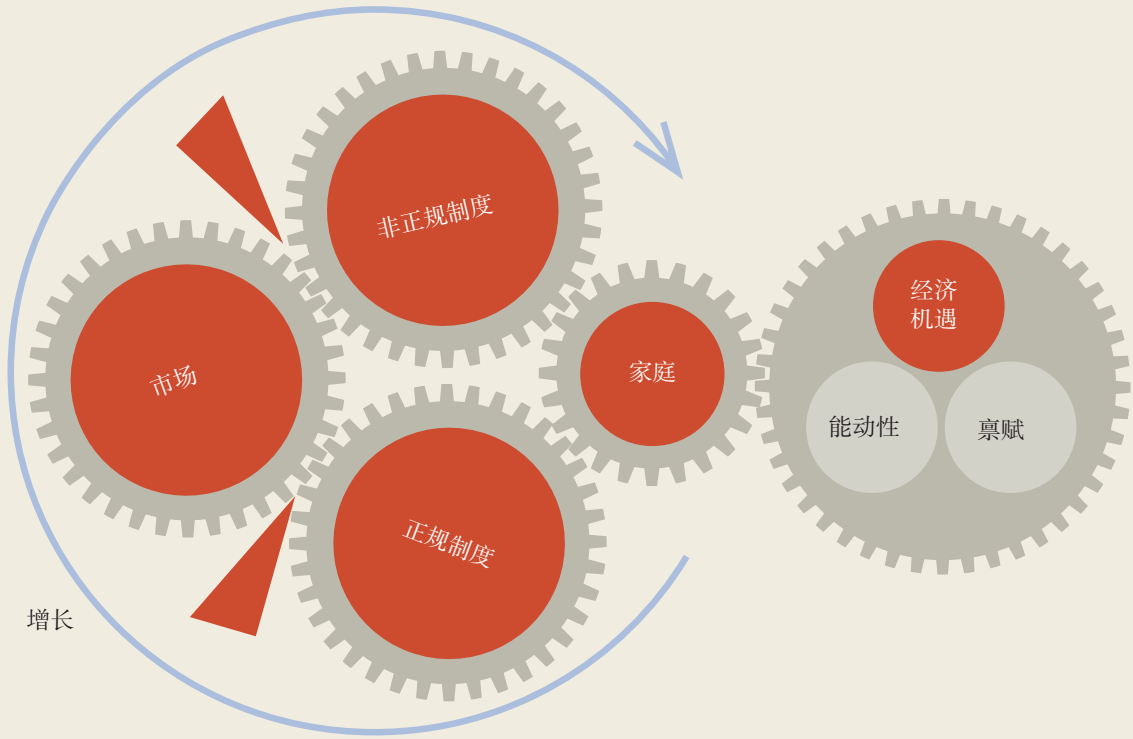
a. Clifford 1996；Goldin 和 Katz 2008；Morris 等 2006；Stevenson 1986；以及为本报告准备的新的工作：Flabbi 2011；Giles 和 Kartaadipoetra 2011。
b. Giles 和 Kartaadipoetra 2011；世界银行 2010b。
c. Flabbi 2011。
d. Ibid。
e. Ibid。

时间）。[60] 自由时间的性别差异转化为女性和男性参与非生存性活动的能力，包括工资就业等市场导向型活动。

第二种基本观念是时间可以补充其他生产性投入，因此某些活动可能要求最低时限具有足够的生产性。例如，只有拨出足够的时间在家庭和市场之间奔波，农产品的市场导向型生产才可能有利可图。同样，（正规的）工资就业可能要求制定固定的时间表，每天或每周拨出最低时间从事某些特定的活动。根据这种意义，自由时间及自由时间的量与可预见性可能对不同个体从事具体活动类型的能力产生影响。

这里重点讨论时间在三个主要生产性领域分配上的性别差异。这三个主要生产性领域是家务、护理（包括

图 5.8　经济机遇获得及由此引起的就业分割是家庭、市场和制度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护理儿童和老人）、市场或有酬工作。家务工作包括那些可能构成潜在市场的生产性活动（做饭、取水）等，而市场工作包括用于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货物的有酬和无酬工作。数据中也有关于第四范畴的信息（生存相关的个人活动，包括吃喝、个人护理、睡眠、教育、休闲、参与社区和社会活动等）。但是考虑到这些活动时间分配不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或跨国差异，我们将这些排斥在讨论之外（见专栏5.7）。

先是爱情，接着是婚姻，最后是在马车上看孩子

时间使用方面的大的、系统的性别差异可以概括为三个程序化事实。首先，一旦所有的生产性活动（家务活、照料和市场）都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女性的工作量大于男性[61]。来自国家研究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62]

第二，尽管专业化的程度因国家而异，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活和照料工作，而男性主要从事市场工作。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中，女性用于家务和照顾儿童的时间超过男性，差异波动很大，柬埔寨和瑞典的差异超过了 50%，意大利的差异超过了 3 倍，伊拉克的差异超过了 6 倍。[63]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女性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可以和男性持平。[64] 在瑞典，女性用于市场活动的时间约为男性的 70%，而在巴基斯坦，女性用于市场活动的时间在八分之一左右（见图 5.9）。其他人关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和美国的记录记录了相似的模式。[65]

第三，时间使用模式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组建家庭引起的。婚姻使女

专栏 5.7 对在分析时间利用模式性别差异时所使用数据的概述

时间利用数据提供了某一特定时段内（通常是一天 24 小时或一周）从事不同活动或任务的详细的时间记录。收集这样的信息要求个体在调查进行期间记录自己大量活动所用的时间。活动的数量和种类及记录信息的工具因国家和调查而异，因此跨国比较常常要求标准化处理。

本报告使用 23 个国家 1998 年到 2009 年的数据。11 个国家的信息来自多国时间使用研究（MTUS）。我们另外增加了 12 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作为补充，以保证低于覆盖范围的广泛性。这些数据来自国家层面的调查，为使这些数据与多国时间使用研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对这些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活动被划分为四大类（家务工作；照顾儿童、病人和老人的护理工作；市场工作；与市场相关的活动或个人活动），以每天多少小时来表示时间分配。数据系指 15 岁以上的个体信息，某些国家局限于 18~65 岁个体的信息。

大多数调查也提供了个体和家庭特征等方面的数据，尽管同一特征并不包括在所有的调查中（Berniell 和 Sanchez-Púramo 提供了分析所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其可得性的信息）。例如，在 23 个国家中，只有 18 个国家具有关于家庭收入的信息。当所需信息缺失时，报告只在那些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采取样本。此外，在 6 个国家中，每个家庭只有一人具有时间使用信息，因此分析只能在个体层面进行。

最后，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爱沙尼亚、芬兰、印度、以色列、日本、立陶宛、波兰、瑞典、土耳其、西岸和加沙地带也具有整体的时间使用数据可查。当提供国家平均数并对国家的总体水平进行比较时，这些信息可以和来自家庭调查的信息结合在一起使用。

资料来源：Berniell 和 Sánchez-Púramo 2011b。

性用于家务工作的时间大大增加了，但对男性影响不大。在大多数国家中，在对相关个体和家庭特征限定后，已婚女性每天用于家务工作的时间比单身女性至少多一个小时或 30%。同样，孩子，尤其是小孩子使男性和女性用于照料的时间大大增加，但是女性的时间增加更大。一个 5 岁以下孩子意味着每天的照料时间要增加 1.0~2.8 小时，具体时间取决于国家，而较大的孩子（5~17 岁）意味着每天的照料时间增加 0.1~1.0 小时。男性的相应变化为护理小孩子的时间每天增加 0.1~1.0 小时，护理较大孩子的时间每天增加 0~0.5 小时。作为参考，单身女性平均每天从事护理活动的时间为 30 分钟，单身男性平均每天从事护理活动的时间为 6 分钟。[66]

富裕和受过教育群体较小但很重要的差异

对夫妻双方而言，随着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和男性的时间使用趋同，尽管即使在富裕的、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整体差异也仍然存在。随着夫妻双方日渐富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用于家务工作时间的平均性别差异降低了，但是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差异仍然得不到解释，这取决于国家。[67]

趋同意味着活动中发生的不同事情，男人和女人间的不同事情。家务工作趋同和大多数情况下护理工作趋同主要是由于女性用于这些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男性用于这些工作的时间增多了引起的。此外，市场工作的趋同强于家务工作和护理工作的趋同（见图 5.10）。即使女性构成了市场工作的一大部分（横轴），她们仍然持续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工作和护理工作（纵轴）。而且尽管一般而言，法国男性对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的贡献大于加纳的男性（随着收入而增长），但对这两国的大部分夫妻而言，女性 40%多的时间被用于这类活动（其中护理所用时间超过了这类活动所用时间的 50%），这和她们的就业状况无关。[68]

最后，性别胜过金钱。例如，美国女性，随着她们对家庭总体收入相对贡献的增加，即夫妻双方的收入贡献持平，她们减少了自己的家务劳动量。[69] 换句话说，偏离了名义收入标准的夫妻（男性比女性赚取的收入多）似乎以更传统的家务分工的方式进行补偿。和让男性采取女性的行为方式（例如从事家务和护理工作）相比，也许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是女性采取男性

的行为方式，即工作换取报酬。[70] 因此，将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市场工作通常是以女性承担更多的总工作量为代价的。[71]

有趣的是，来自讨论组对男性和女性采访的定性信息证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护理、家务工作和主要挣钱者责任的性别角色分工根深蒂固。当被问及自己和配偶白天做什么时，女性准确地回答说男性主要在外面工作，而男性则准确地回答说女性主要从事护理和家务工作。相比之下，双方都相对扭曲了自己对对方从事传统活动较少的观念（见专栏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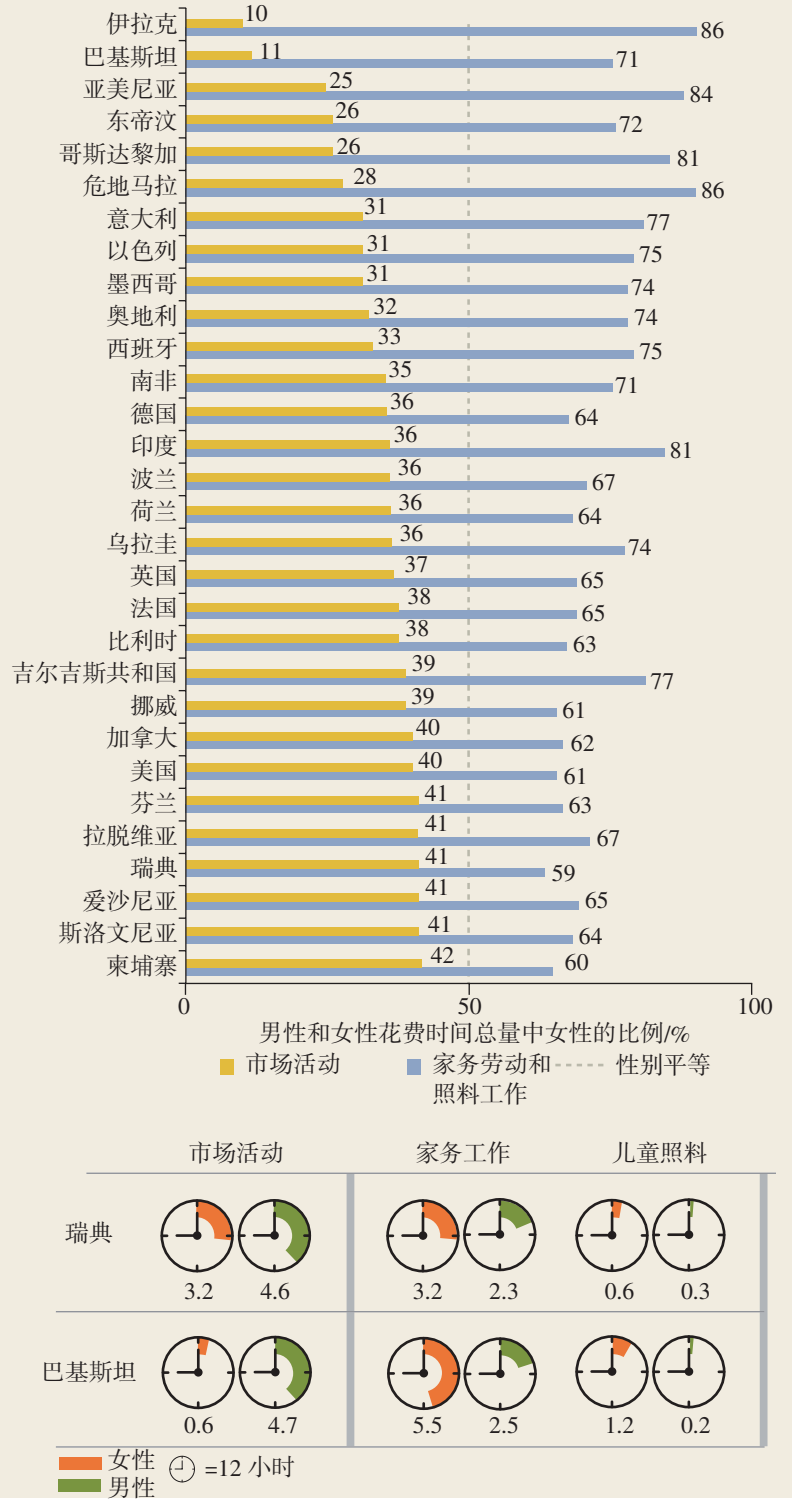
家庭中的事情并不仅止于家庭

时间使用上的性别差异意味着女性进入市场工作时面临着较大的固定成本，因此她们更有可能看重灵活的工作安排，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也少于男性。市场工作高固定成本是由固定的工作时间表和最低时间要求造成的，特别是（正式的）工资工作，接下来所需要的就是调整主要由女性负责的其他组织活动。这也反映了随着女性更多地介入市场工作，她们阻止整体工作量上升的能力是有限的。

事实上，当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家务工作时，领取薪水的女性雇员面临的调整成本要高于无酬或自就业女性所面临的成本。男性不这样。而且，如果妻子是领取薪水的雇员而不是无酬或自就业工人，丈夫用于家务活动的时间就大大提高。因此，女性要实现有酬工资就业，就需要大幅度调整在家庭内部的时间分配。[72]

对那些仍然需要从事家务工作和护理工作却又在寻找市场工作的女性而言，那些具有灵活性、进出劳动力市场比较容易的工作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些选择有时候会带来将女性导入低

图 5.9　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工作和照料工作，而男性主要从事市场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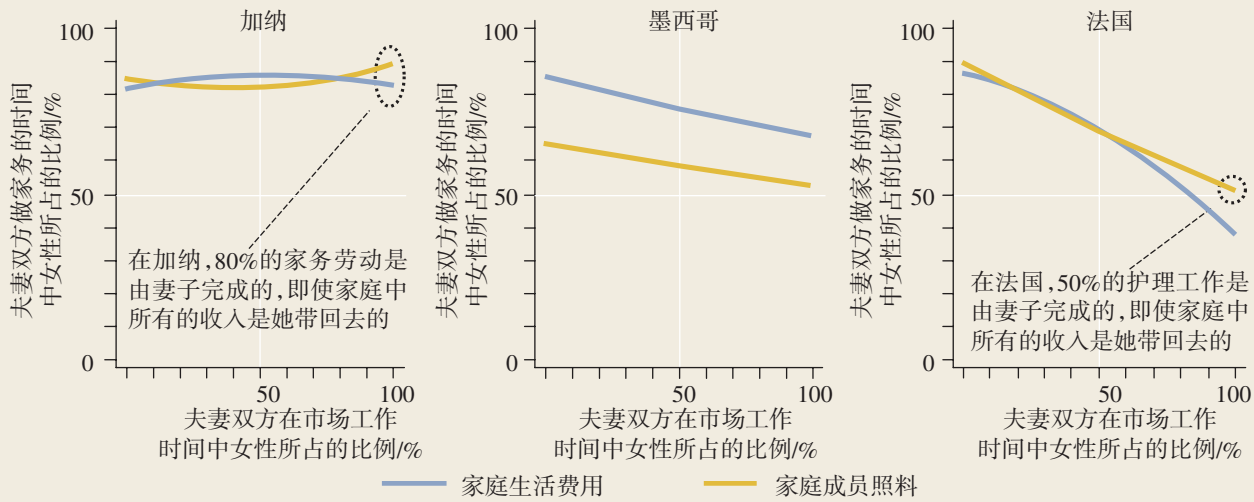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时间使用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种植水果、蔬菜和谷类是谋生的最好方式，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工作，而且还可以赚到一些钱。”

——马尔代夫农村地区青年女性

图 5.10 市场工作性别时间使用模式的趋同强于家务劳动和护理工作性别时间使用模式的趋同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1998 年法国时间使用调查、加纳 LSMS 2005 年和 2009 年墨西哥时间使用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质量的工作中、削弱她们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潜在风险。

在高收入国家，灵活的工作安排通常相当于正规就业中的兼职。在奥地利、德国、瑞士和英国，因家庭责任而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的比例高达 40%以上。[73] 尽管兼职工作允许女性将就业与照顾家庭结合起来，但是兼职工作也可能导致女性陷在质量较低的工作中不能自拔。[74] 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证据显示，即使有了孩子导致女性暂时从事兼职工作，但是由于很少有女性可以把兼职工作当作回归全职工作的跳板，兼职经历常常降低了全职工作的几率。[75] 此外，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从事临时性兼职工作的女性会受到惩罚，回归全职工作的女性每小时得到的工资率比较低，即使工作量相等，长期工资增长率也比较低，尽管这些惩罚因国家不同而相差很大。[76]

中断事业是女性协调自身养家和母亲责任的第二最佳选择。如同前面讨论的那样，事业中断导致女性实际工作经验较少，并最终导致她们工资较低，工资增长较慢，甚至在她们返回工作岗位后还是如此。[77] 这种“妈妈陷阱”明确显示女性工人和妈妈的双重角色造成女性与男性不同的事业发展路径。

在正式工资就业只是全部就业一小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灵活性通常表现为其他的形式，尤其表现为自就业和非正式就业。在有就业状况信息可考的八个国家中，家务工作较重的女性更有可能在工作安排比较灵活的领域就业，自就业和无酬家庭就业。照料工作也是这样。在某些国家，男性展现了相似的行为，只是结果好坏不一。[78]

时间使用和照料工作的性别差异也可以转化为劳动力市场转型和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联系方面的差异。在阿根廷、巴西、加纳、墨西哥、塞尔维亚和泰国，女性脱离劳动力的时间要长的多，较少转入正式就业领域，更有可能在不工作和非正式就业领域之间转换。[79] 这些性别差异主要是由家庭组建引起的。婚姻和生育通常是造成较少在正规领域就业、更多来自就业的关联因素。相比之下，单身女

专栏 5.8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关于异性时间利用模式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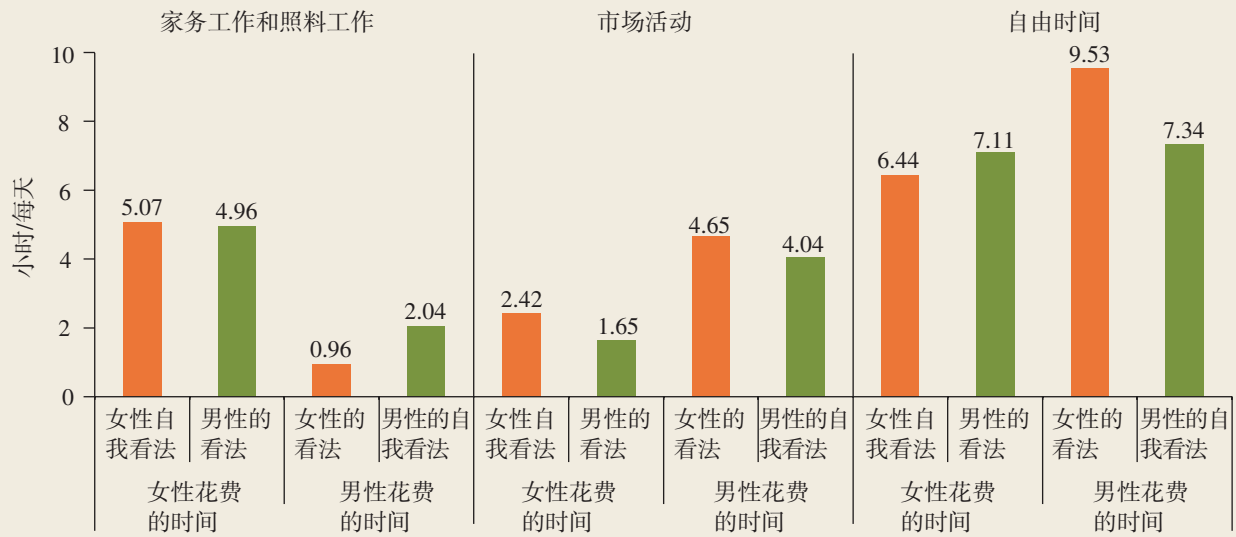
18 个国家的青年女性和男性被要求汇报自己及异性的时间利用模式。这是本报告性别定性评估的一部分。

在所有的 18 个国家中，两组均汇报说女性从事大部分照料工作和家务活儿，而男性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市场工作。如果将所有的活动都考虑进去，女性的工作负担比男性重。这和时间使用调查数据是一致的。

但是汇报中的一致意见到此为止。当被问及对异性的看法时，女性大大低估了男性用于“女性”活动（照料和家务工作）的时间，女性认为男性用于这些活动的时间为平均每天 0.96 小时，男性则认为平均每天 2.04 小时，相差 113%。男性则大大低估了女性用于“男性”活动的时间，男性认为女性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为平均每天 1.65 小时，而女性则认为平均每天为 2.24 小时，相差 47%。两组也倾向于高估异性用于休闲的时间，男性休闲时间的差异较高（见专栏图 5.8.1）。

在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中都可以观察到观点差异，尽管自我看法和异性看法之间差异的程度因国家而异。

专栏图 5.8.1　低估异性用于非传统男性 / 女性活动和休闲的时间长度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资料库）的计算值。
注：在阿富汗、不丹、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马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波兰、塞尔维亚、南非、坦桑尼亚、越南、西岸和加沙地带、也门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讨论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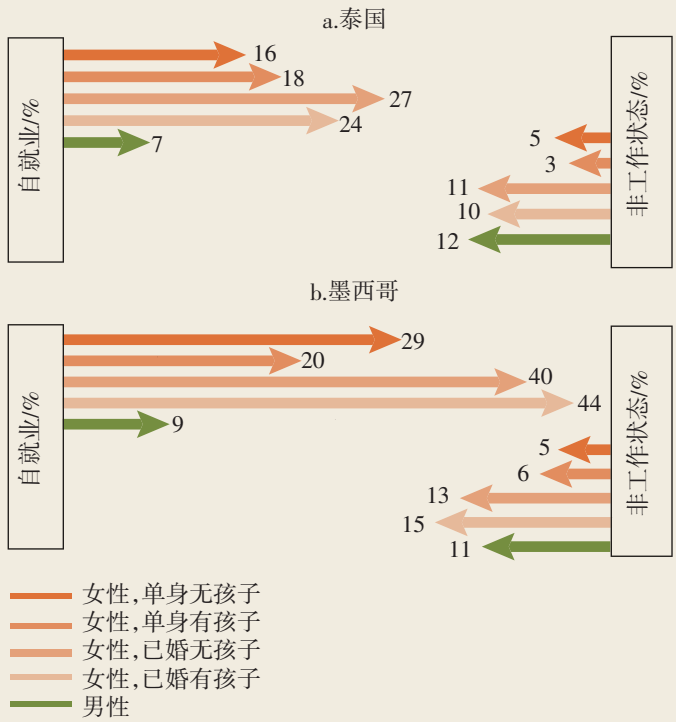
性（包括那些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与男性的转型更相近，而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在正规领域的比例通常较高（见图 5.11）。

即使女性有时间从事工作，她们将时间用于市场工作的决定（可能还有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要服从于她们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员经营的（家族）生意劳动的需要。在印度尼西亚，和那些丈夫是领取薪水的雇员的女性相比，那些丈夫是自就业的女性成为无酬工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80] 问题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从事家庭生意的无酬工人获得自主收入的可能性较少，她们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力较低，从而最终导致她们能动性不强（见第 4 章）。

取消时间限制：市场、正规制度和社会规范与偏好

夫妻双方或家庭内部时间使用的性别差异是由男性和女性在家务、照料和市场工作中的生产率及其以市场投入替代家庭时间的能力决定的。增加女性在家庭生产中或在有酬领域中生产率的因素，或降低她们转入市场

图 5.11 在墨西哥和泰国，与男性和单身女性相比，已婚女性更有可能在不工作或非正规自就业中转换



资料来源：Bosch 和 Maloney 2010。

工作成本的因素可能导致她们将原本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重新分配给市场工作。同时，女性能够或愿意重新将时间分配给市场活动的程度是既有制度限制因素的函数，例如灵活（正式）的工作安排、关于女性作为经济行为者角色的社会规范和个体偏好。

时间和市场：回报对市场工作和儿童护理的影响

女性响应较强的经济动力、参与不同市场导向型活动的能力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运作正常，家务劳动的需要可以通过雇佣劳动力而不是通过重新组合家庭资源来满足。例如，在农忙时节，需要额外劳动力的农户可以到地方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者，而家庭其他成员则可以在生产率和收入比较高的家庭生意中或工资领域中继续工作。[81] 如果家庭不能在市场上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结果就会相反。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农村地区家庭非农企业高度依赖家庭获得劳动力供给，因此，不同家庭成员的劳动分配取决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82]

女性对市场动力的响应取决于她们降低用于家务工作尤其是照料工作时间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市场将这些责任承包出去还是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责任。

（补贴性）儿童（和老人）照料服务的可得性与工作时间的增加有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与女性工人参与正规领域就业有关，这表明，如果正规领域的儿童照料服务可得性得到改善，女性就可以获得较大的灵活性，具有允许女性到正规领域寻求就业机会的潜在作用。[83] 但是在不存在照料责任可选项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在博茨瓦纳、危地马拉、墨西哥和越南，由于缺乏儿童护理服务，妈妈们被从正规领域推向了非正规领域。[84]

然而价格很高时，儿童（和老人）照料服务的使用率就会降低。例如，高额儿童照料成本降低了美国和危地马拉女性，特别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参与工作的积极性。[85]

对贫穷国家和贫困家庭而言，能够负担得起的儿童照料服务非常重要。在没有这类服务的地方，女性可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工作，或将孩子留给家庭的其他成员看顾。在巴基斯坦、秘鲁和 10 个非洲国家，40%的工作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参加工作。或者妈妈外出工作时，大点儿的孩子，特别是大点儿的女孩成了照顾者。[86]

时间和正式制度：基本服务提供和灵活的工作安排

通过改变男性和女性在无酬和有酬工作中的相对生产率和降低与市场工作相关的交易成本，制度也可以对

时间使用产生影响。

在 20 世纪，发达国家的电气化和自来水降低了家庭家务劳动的成本。[87] 但是家庭工作较高的生产率对时间使用的影响比较弱，因此，对市场工作的女性劳动力供给影响也比较弱。[88] 时间节约型创新并没有减少用于家务工作的时间，而是改变了家务工作的时间分配，用于准备食物的时间减少了，用于购物和管理家庭的时间增多了。[89]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参与市场工作的增多与较高的工具所有权相联系 [90]，然而，女性家务劳动的降低被其他家庭成员家务劳动的增多抵消了，因此，用于家务劳动的总时间反倒有所增加。[91]

自来水和电力对发展中国家女性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分配的影响也尚不明确。就自来水而言，研究的数量很小，结果似乎取决于具体的干预措施和环境。[92] 也许是由于电力可以减少分配给家务工作的时间以补充给市场导向型活动，关于电力可得性对市场工作时间使用的影响的更多结论性证据可供参考。[93]

相比之下，通过降低旅行时间和增加流动性，交通投资可以增加女性获得经济机遇的渠道（见第 4 章）[94]。考虑到她们的多重职责，女性常常选择距离较短、交通比较方便的工作，这种选择将她们和地方工作选择绑架在一起。对贫穷女性而言，这些限制尤其严重，因为贫穷女人常常居住在边远地区，在这些地区，大部分工作是非正规的、生产率不高的工作。

因此，交通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在秘鲁农村地区，接受调查的女性中，77%认为经过修复的道路使她们能够到更远的地方旅行，67%认为她们可以更安全地旅行，43%认为她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95] 在孟加拉国，农村道路的改善使得男性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了 49%，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了 51%。[96]

使女性可能从事兼职工作是为女性降低市场工作交易成本、增加女性在市场领域生产率、提高用以有酬工作时间的制度改变之一。但是在许多国家，兼职工作得不到法律承认。而且即使在允许兼职工作的国家，正规领域的大部分工作机会也是全职岗位。由于女性倾向于承担过多的家务工作，所以她们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就很少，而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作有限或缺失，这降低了她们参与正规领域的能力，增加了她们在非正规领域工作的可能性。关于日托服务增加对就业结果影响的证据支持兼职工作可得性和女性参与正规就业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发达国家，家庭组建和兼职工作存在密切的关系。[97] 在英国，和没有孩子的单身男性相比，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要高出 6%，但是对那些已婚无孩子女性而言，这一可能性增加至 24%，对已婚有小孩的女性而言，这一可能性增加至 50%。由于非正规就业率太高，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更有限。但是和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相比，印度和南非跨国公司的员工要求更灵活的工作日程。[98] 至于公司是否响应这种要求，如何响应这种要求，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晰。

在阿根廷，无论是女性劳动力参与还是女性在正规领域中的就业都随着兼职合同的增加而增加了，而女性在兼职工作更多的领域中的正规就业也增长更快。和没有小孩的已婚女性相比，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参与正规领域就业的比例增加了 9%，自就业降低了 9%。这相当于女性在非正规领域的就业降低了 4%~5%。[99]

也就是说，兼职和灵活性工作常常伴有工资较低、升职较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兼职工作后实现全职就业的可能性较低等惩罚。因此，在应当给女性提供兼职和灵活就业机会的同时，不应当以强化现有就业分割并最终强化性别照料责任的方式应用兼职工作。那些劳动力队伍、管理层和董事会中女性参与增加的公司可以就避免就业分割的方式提供有益借鉴（见第 8 章专栏 8.8）。

时间和非正规制度：偏好和社会规范

关于经济领域中性别角色的社会规范也对女性就业结果产生影响。关于女性参与市场工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与全世界范围内女性较低的就业率（和较高的性别工资差异）联系在一起。[100] 但是这种影响被个体在家庭中的地位（即父亲、母亲、女儿、儿媳等等）和家庭结构所调和。在印度，和女儿相比，儿媳面临着较重的工作负担。[101] 在墨西哥，单身妈妈用于市场工作的时间使用和时间分配与男性人口差不多。[102]

对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和经济行为人的个体偏好也会对女性分配给市场工作的时间产生影响。女性作为母亲和照料者的传统个人观点对用于有酬工作的时间分配尤其具有重大而负面的影响，正如《分歧的程度》用这样一句陈述所表达的衡量，“工作妈妈与孩子之间可以建立和非工作妈妈与孩子之间一样温暖的、安全的关系”。[103]

偏好也对选择工作时间较少的工作（兼职）产生影响，尽管这主要发生在富裕国家。在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从事兼职工作的已婚女性和有配偶的女性对工作的满意度很高，改变工作时间的愿望很低，在这样的家庭生产具有很高的性别差异。[104] 相比之下，洪都拉斯的许多女性愿意从事全职工作，但是由于劳动力需求低，她们多从事兼职工作。[105]

关于态度和观念跨代传递的近期研究发现，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她自主决定自己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在推动社会规范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6]

一开始规范和偏好的变化可能不快，但是随着示范效应日益增强，变化可能加速。[107] 以荷兰男性员工的兼职工作为例。这一直由女性主导，直到近期，当一些工作职位相对较高的男性开始尝试“星期五爸爸陪伴”的活动，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刚开始，人们对该新体制的接受不快，但是一旦形成了典范，男性工人的兼职工作率迅速提高了将近 25%。在那些一个或多个管理层男性较早采取了这种灵活工作日程的公司，这种变化也比较快，突出了示范效应。[108] 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因此通过政策干预培育或加速这种相对关联的学习过程，这里政策干预以产生进行试验的动力、克服男性和女性在市场活动与非市场活动时间分配中的既有限制因素的方式进行。

获得生产性投入的性别差异和就业分割

生产性投入决定生产、投资和增长的规模。农民依赖土地、劳动力、水资源、种子、肥料、农药、机器和其他投入生产粮食。[109] 企业家需要劳动力，依赖企业的规模和运营领域、资本等。对农民和企业家来说，获得贷款非常重要。鉴于我们认为土地和贷款是获得其他投入及生产规模和生产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此处重点讨论获得土地和贷款的性别差异。对个体农民和企业家进行比较最好，但是数据常常对从事农业的女性户主家庭和

专栏 5.9　户主性别和家庭组成：对政策最重要的因素

资产所有权和使用常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单位来加以衡量。结果，对土地获得和使用性别差异的分析主要是对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的比较，而不是对个体女性农民和个体男性农民的比较。

但是由于未能考虑家庭中工作年龄成人和受抚养人或受赡养人的数量，对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的比较可以夸大性别差异。和受抚养人（受赡养人）与工作年龄成人比率较高的家庭相比，该比率较低的家庭更有能力产生收入。考虑到这一现实，我们将具有一个或多个工作年龄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和没有工作年龄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做了区分（工作年龄指 15~59 岁）。

具有一个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常常比没有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发展得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和男性户主家庭发展的一样好，这也许并不奇怪。该发现表明，对农村家庭进行更精细的分类，可能与政策设计和政策目标相关。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男性户主家庭、对女性企业家和男性企业家进行比较构成限制（见专栏 5.9）。

获得和使用土地与信贷的性别差异

和她们的男性同行相比，女性农民和企业家能够获得的土地与信贷较少。无论是根据所有权还是根据经营土地的能力来衡量，获得土地的性别差异都持续存在着。同样，女性农民和企业家对贷款的需求与使用也低于她们的男性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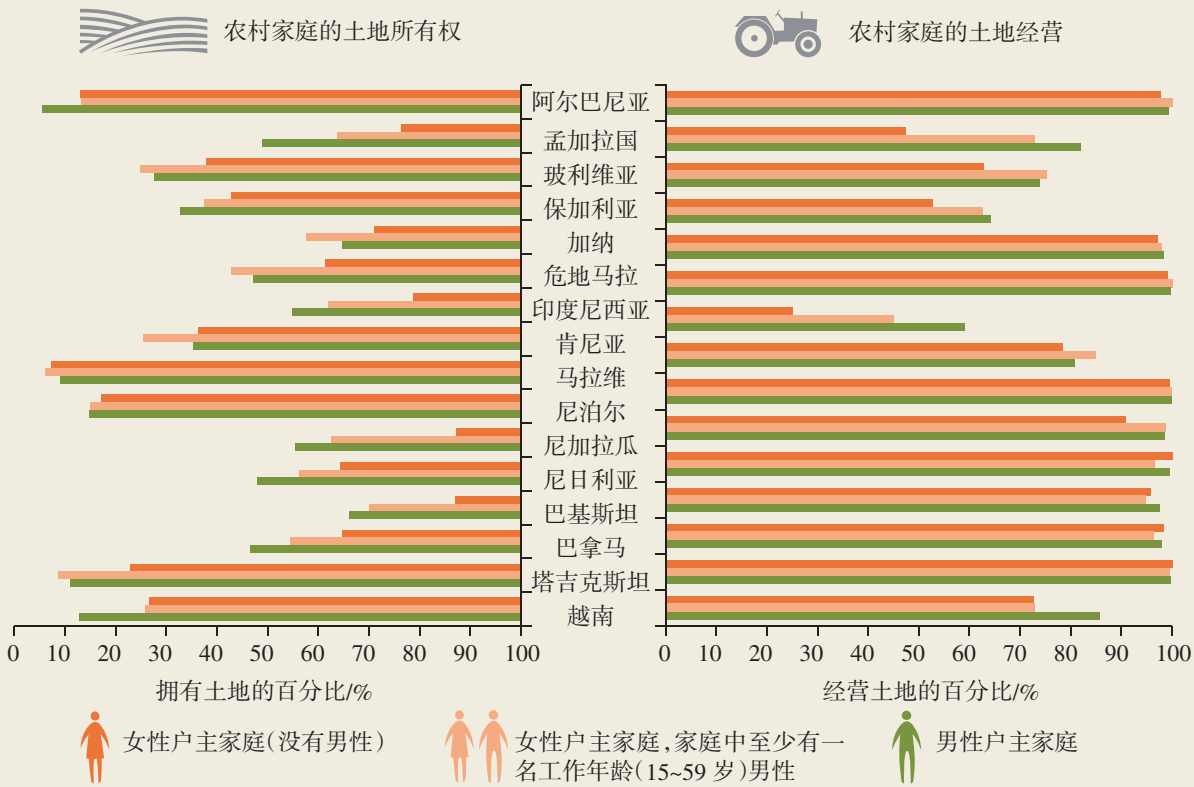
平均而言，女性户主家庭拥有和经营土地的可能性小于男性户主家庭。在五个发展中区域的 16 个国家中，拥有土地的女性户主家庭是 55%，而男性户主家庭则是 64%。具有工作年龄男性成员的女性户主家庭约占女性户主家庭的 61%。和男性相比，女性户主家庭经营土地的可能性也较低，在这 16 个国家中，83%的女性户主家庭经营土地（具有工作年龄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的比例是 86%），而男性户主家庭的比例则是 89%（见图 5.12）。更宽泛一点儿，在所有农民都具有证据可考的情况下，女性很少拥有她们所经营的土地。在拉丁美洲，农业用地的所有者中，男性农民约占 70%~90%，具体比例因国家而异。[110]

和男性户主家庭相比较，女性户主家庭拥有和经营的土地规模较小。图 5.13 所引用的关于女性户主家庭所拥有土地的数据比男性户主家庭低 22%。有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拥有土地的比例是 21%，经营土地的比例是 26%。[111] 在贝宁，女性拥有土地的平均规模是 1 公顷，而男性则是 2 公顷。[112] 在布基纳法索，男性平均控制的土地比女性控制的土地大 8 倍。[113] 而在其他四个非洲国家中，女性平均耕种的土地介于男性平均耕种土地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114] 拉丁美洲也显示了类似的证据。[115]

即使女性确实能够获得土地，她们也面临着较大的土地占有不安全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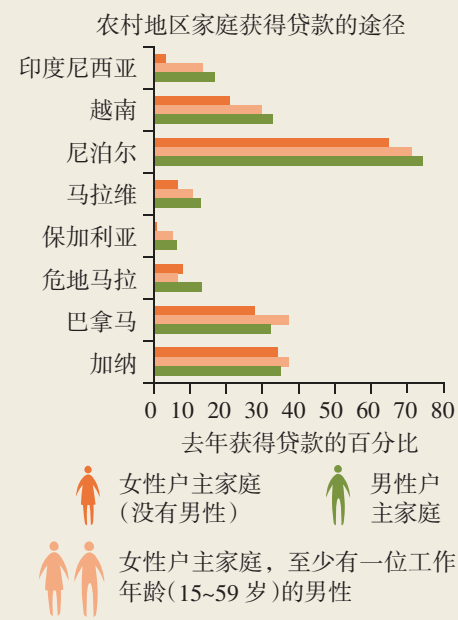
> “女性没有用于可获得贷款的资源，也不存在任何针对女性的支持和援助。”
>
> ——阿富汗农村地区成年女性

图 5.12 和男性户主家庭相比，女性户主家庭拥有和经营土地的可能性较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粮农组织数据库，可供参考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图 5.13 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农村地区的女性户主家庭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比男性户主家庭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粮农组织数据库，最近年份的数据。

题。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方，女性的土地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即使没有原则限制，在实际运作中也会受到限制（见第 4 章）。[116]

在获得和使用贷款上，尤其是正式贷款上也存在着巨大的性别差异。[117] 世界银行和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女性户主家庭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小于男性户主家庭（24% 对 28%），而具有至少一位工作年龄男性的女性户主家庭差异较小（26%）（见图 5.13）。[118]

此外，和男性管理的企业相比，女性管理的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较小，尽管这种差异因公司规模而缩小，在正规领域中也较小。[119] 在危地马拉，14%的自就业男性可以获得贷款，但是可以获得贷款的自就业女性只有 7%。雇佣 2~4 个雇员的男性企业家和

女性企业家的数量分别为 19% 和 9.8%，雇佣 5 个及 5 个以上雇员的男性企业家和女性企业家的数量分别为 18 和 16.5%。[120] 在非洲的正规企业中，女性企业家可以享受和男性企业家同等的贷款待遇。[121]

然而，在阐释关于获得需求数据时需要谨慎，这是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同时反映贷款需求的性别差异和获得金融机构服务和待遇的性别差异。和男性企业家相比，女性企业家申请贷款的可能性也比较低。[122] 而当她们申请贷款时，她们更可能从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或小型金融机构中获取贷款，[123] 和男性相比，受到的信贷限制也更多。[124]

无疑，小额信贷的迅速增长减轻了女性面临的信贷限制。2007 年，小额贷款组织为 1.548 亿名顾客提供服务，其中 1.066 亿名属于最贫穷的、第一次贷款的顾客，其中女性占 83.4%。[125] 然而，小额贷款在多大程度上拓宽了正规金融服务的渠道（比如说通过帮助个体建立信贷记录），或考虑到贷款规模较小，小额贷款是否解除了那些希望获得额度稍大贷款的女性所面临的限制，这尚不明确。[126]

获得土地和信贷的性别差异如何影响农业分割和企业分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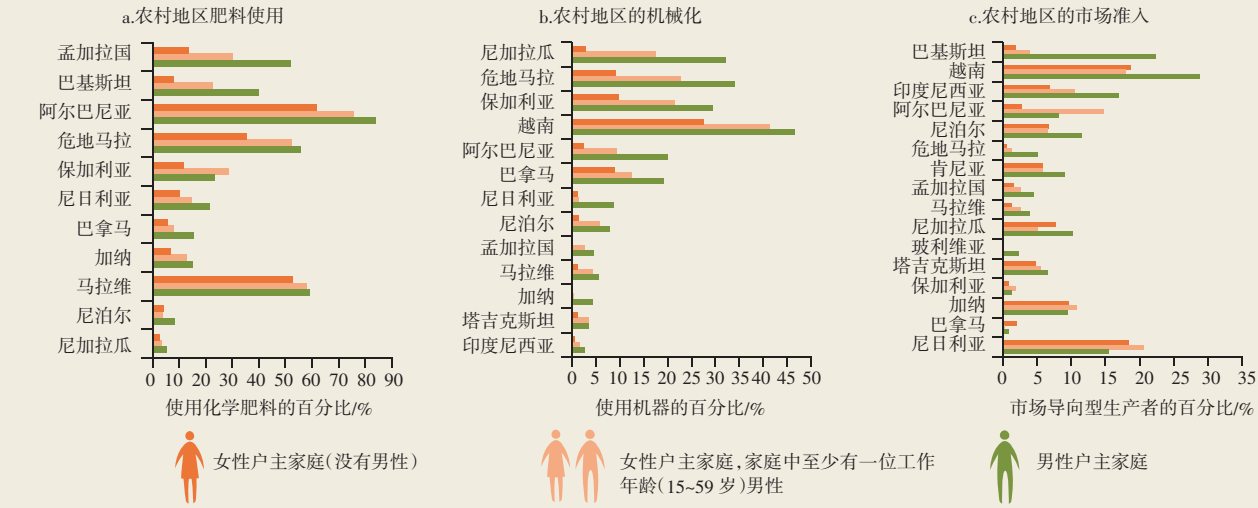
获得土地和信贷的性别差异可能转化为生产的性别差异。首先，使用额外生产性投入的意愿和能力受到这些资源的影响。第二，市场准入、投资决策和增长潜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农民或商业主的既有限制及其克服这些限制的能力。换句话说，获得土地和信贷的性别差异对女性和男性农民与企业家投资、规模经营和从新经济机遇中受益的相对能力产生影响。

土地规模小，土地权利不安全和约束性信贷限制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限制女性使用农业投入和技术能力的因素。和男性相比，女性可获得的农业投入较少，这些农业投入包括肥料、农药和改良品种。[127] 在我们数据库的所有国家中，女性户主家庭使用肥料的可能性小于男性户主家庭，差异在巴基斯坦的 25% 到尼加拉瓜的 2% 之间波动。[128] 机器的使用，例如犁、拖拉机、抽水泵和其他农业机械的使用也是如此。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机器使用率的差异从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将近 20% 到印度尼西亚和塔吉克斯坦的不足 1% 之间波动，大多数国家的差异在 5% 或 5% 以上（见图 5.14）。

土地规模，更广泛一点儿说，规模生产的能力决定投入和机器使用。[129] 因此，由于女性耕种的土地地块较小，因而和男性相比，她们更可能面临更高的单位成本，因此，女性受到生产投入和机器使用不可分性的严重困扰。信贷（和现金）限制因素同样重要。肥料使用最突出的阻碍因素是资本。同样，用于机器的金融费用大，这表明信贷限制因素可以部分解释信贷差异，尽管这一结论的证据不多。女性种植经济作物的可能性较小，这表明对农业生产投入资料或机器的投资价值不高。[130]

获得土地、信贷和劳动力的性别差异也对女性进入市场、利用新经济机遇的能力产生影响。我们数据库的 16 个国家中，14 个国家（孟加拉国和尼加拉瓜除外）中女性户主家庭在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产出低于男性户主家庭。巴基斯坦的市场准入性别差异最大（25%），加纳和塔吉克斯坦的差异最小（2%~3%），加纳和塔吉克斯坦的总体市场渗透最低（见图 5.14）。对出口农产品而言，市场准入的性别差异

图 5.14 和男性户主家庭相比，女性户主家庭获得的生产性投入和进入市场的机会较低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粮农组织数据库，可得到的最近年份的数据。

甚至更大。[131] 在危地马拉中部高地，女性生产的雪豆和西兰花（该地区最重要的两种出口农作物）在合同中仅占 3%。[132]

在南非、塞内加尔和中国，农产品加工公司的经理倾向于和男性签署出口合同，这是因为女性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渠道有限、缺少对土地的法律权利，以及在家庭中缺少权威（因此缺少对潜在农业劳动力的控制）。[133] 在危地马拉，女性独立（而不是联合）的土地所有权是女性参与非传统出口农产品生产的“晴雨表”。[134] 女性农民地块较小、资本化程度较低也是她们进入出口领域的壁垒因素。[135] 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高额单位成本和信贷限制紧缩使根据合同为他人种植作物的女性大麦种植者较难开展灌溉农业。[136]

相对于男性而言，获得土地和信贷的性别差异也降低了女性农民启动企业、投资和增长的能力。提高土地权利的安全性可以促进农业投资和生产率的提高。[137] 在尼加拉瓜，拥有注册证书可以使土地相关投资的可能性增加 35%，无论证书是公共行为还是农业改革的所有权，但是这对信贷获得没有影响。该发现表明，安全的权利是正规的土地所有权影响投资的渠道。[138]

信贷限制因素也是女性所有的企业创新、投资决策和增长的重大障碍。欧盟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评估融资的困难是即将成为企业家的女性面临的最大障碍。[139] 审视发展中国家企业启动的研究的数量很少，但是可获得的证据指向了同样的方向。[140] 在印度，在那些可以获得小额贷款的人

> “我认为如果你想贷款，你要考虑一切因素。如果我想得到一笔 1 000 万的贷款，那么我用这笔钱做什么？在开始的几个月，我喂养一些家禽获得一些收入。我可以用一些钱养猪，一些钱养鸡。我可以用养鸡赚来的钱还债。我有赖以还债的物品。贷款不仅有助于为我的家庭成员创造就业机会，也改善了我的家庭状况。”
>
> ——越南成年女性

口中，拥有现成企业的女性的耐用品消费增加了，极有可能成为企业主的女性的耐用品消费也增加了，同时降低了他们的非耐用品消费，这与进入企业家行列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的需求是一致的。[141]

获得贷款和储蓄机制也对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在肯尼亚，储蓄账户对女性小型企业主的生产性投资和支出产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但是对男性小型企业主不产生影响，尽管那里有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等非正规储蓄渠道。[142] 金融获得受限也可能阻碍企业增长，对小型企业和小公司而言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它们提供担保物的能力较弱，针对它们的具体金融产品有限。[143]

取缔获得土地和信贷的限制因素

市场、制度和家庭及其相互作用（而不是经济发展）是获得生产性投入性别差异的原因。市场价格可以严重限制女性获得投入，特别是获得信贷的能力。同样，正规和不正规制度限制因素可以对获得投入和信贷产生具有性别差异的影响，即使这不是其本来的目的。而家庭偏好（和潜在的性别规范）可以导致有利于男性不利于女性的资源分配，即使这种分配是低效的。相比之下，获得生产性投入的许多性别差异对经济发展、对具体市场的密度和覆盖面相当不敏感。[144]

市场：土地和信贷市场的歧视和差异性价格

土地和（正规）信贷市场不是增加女性农民和女性企业家土地和信贷获得的强有力的手段。[145] 某一市场的不平等常常强化另一市场的不平等，土地常常作为获得信贷的抵押品，人们又常常需要贷款来获得土地。

性别歧视和差别计价共同导致了市场准入较低的问题。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女性在土地和信贷市场上遭遇歧视。[146] 在欧洲和中亚，女性管理的公司支付的利息率高于男性管理的公司（平均高出 0.6 个百分点），在该地区金融业极不发达的国家中，针对女性企业家的价格歧视问题可能更严重。[147] 在意大利，即使将债务人和企业的特征及信贷市场的地方条件考虑进去，女性拥有的小型企业所支付的利息率仍然高于男性经营的小型公司（约高出 0.3 个百分点）。[148]

较高的利息率也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可观察到的指标偿还能力方面的差异，或者反映了债权人在女性作为债务人而缺乏其表现的客观信息时对借贷风险的考虑。由于和男性相比，女性较少与（正规的）金融体系互动，因而金融体系缺乏女性作为债务人潜在表现的信息，因而女性更容易遭遇较高利息率的困扰。

话虽如此，（将在下面讨论的）市场和制度对获得正规信贷的限制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改变信贷模型以应对小型企业的需求等加以克服（见第 7 章专栏 7.5）。

非正规制度：土地权利、土地分配计划和金融管制

土地和信贷市场的制度结构常常将女性置于不利地位。继承制度、婚姻制度和土地权利使土地所有权和资产积累的性别不平等持续下去，有时还加重了性别不平等的程度（见第 4 章）。[149] 管理带入婚姻或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婚姻财产制度决定了女性在丧偶或婚姻破裂时的生存状况。[150] 如果女性被视为处于丈夫的监护之下，那么婚姻期间资产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常常属于她们的丈夫及其家庭，所以在婚姻解体时或她们的丈夫死亡时许多女性被剥夺了

财产。同样，在传统的父系继承制度下，财产由世系中的男性成员传递和继承，这将女性置于家庭农场无酬劳动力的地位，或者对日益增加的无地或土地贫乏家庭而言，将女性置于农业工资劳动力的地位。[151] 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的证据显示，通过婚姻和继承，包括土地在内的较大的、质量较好的资产转移到男性手中。[152]

女性从国家资助的土地分配计划中受益的可能性也较小。在 13 个拉丁美洲土地改革计划中，女性受益者的比例在 11%~12%左右。[153] 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地获得性别不平衡可以归因于这些计划的制度结构，这些计划倾向于以户主为目标（过去只认定男性户主），有时候限定家庭的受益人只能有一个（也许是为了预防欺诈行为），因此，男性受益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政策改革降低性别差异。在哥伦比亚，一旦地块的联合权利得到批准和执行，农业改革女性受益人的比例就会从 11%增加至 45%。[154]

就信贷而言，正规机构及某些情况下非正规机构适用的规章制度可以限制小农和小生产者获得信贷服务，而女性在小农和小生产者中比例很高。由于信贷常常要求担保品，土地或不动产尤其受到青睐，而女性由于缺少稳固的土地，并且在资本化程度较低、产出常常是无形产品的服务业领域的比例过高，因此她们处于不利地位。在印度，土地权利确实大大限制了女性农民获得制度性信贷服务。[155] 在中东，女性经营的中小企业通常是服务业，由于没有机器等有形资产，银行很难量化其产出以作为贷款评估的基础。[156] 此外，要求丈夫或父亲联合签名的申请程序可以阻碍女性借款人借款的积极性。[157] 非正规和小型金融机构中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要求。[158]

当通过非正规机构贷款时，组织的结构、会员资格和治理规范可以对女性贷款构成限制。例如，马拉维农民俱乐部是为小农提供贷款和推广服务的主要渠道，其关于会员资格的规则不允许女性成为完全会员，指责单身女性或一夫多妻婚姻中的女性，削弱了她们从俱乐部所能提供的服务中受益的能力。[159]

非正规制度：基于性别的偏好和家庭内生产性资源的分配

基于性别的偏好可能导致在同一家庭内男性和女性在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待遇。例如，拉丁美洲的继承法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但是个体在死亡前分割财产时所表现的偏好可能使土地和其他财产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持续下去。对墨西哥遗嘱的回顾显示，选择老伴继承土地的比例是 39%，选择儿子继承土地的比例是 39%，选择女儿继承土地的比例是 9%。[160]

一些基于性别的偏好非常强烈，从而导致支持对生产性资源的低效分配和家庭内部不完全的资源聚集，对性别获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布基纳法索，在分配生产性投入时，男性控制的地块受到偏重，据估计，这导致家庭总收入降低了 6%。[161] 在巴拉圭，女性（包括家庭中不受信贷限制的女性）从信贷增加中的获益高于男性，这表明在同一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金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162]

但是行为并不响应和适应带来新机遇的经济变化。在喀麦隆南部和加纳西部，女性谈判力的增加是和可可种植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有关系的。可可是劳动密集型传统出口作物。可可种植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许多丈夫绕开传统的做法，允许他们的妻子通过“间接方式”继承土地，以作为妻子帮助他们种植和耕种可可的奖

励。[163] 结果强化了个体土地所有权，加强了女性的土地权利。

“综合”市场和制度失灵的性别影响

市场和制度（及其设计和运作）本身就是居住于其中的经纪人及经纪人互动的产物。市场参与者共享和传播信息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及最终的市场结果。当信息缺乏或某些参与者的信息多于其他参与者的信息时，就会发生信息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可以对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结果产生影响，从而促进性别就业分割问题。

例如，一位近期毕业的工业工程专业的女生可能未能成功在私营公司就业，这是因为可能的雇主不确定一位女性工人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入一个原本应该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公司里。换句话说，由于雇主对她的潜在表现信息所知甚少，她可能不能得到工作。同样，一个生活在村庄里的女性企业家可能用她的资本购买鸡，因为村庄里所有的女性都是这样做的，而不是因为这会带来最高的回报。换句话说，由于她没有替代性生产的信息，她效仿她的社会关系网中其他人的做法。

不同制度的结构和规则也会对经纪人与制度的互动及经纪人之间的互动产生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被视为性别中立性的制度结构和规则也可以导致性别差异性行为或影响。制度失灵可以促成就业分割。例如，埃塞俄比亚农村的女性农民对她所在地区的农业推广服务的使用可能有限，这是因为这些服务重视男性所种植的作物。同样，如果产假期间工资由雇主支付而不是由国税资助，育龄期女性在正规领域中找到工作就比较困难，这是因为潜在的雇主可能认为与雇佣同样的男性相比，雇佣她的成本更高。

> “如果公司里空出了一个适合男人来做的工作，公司更愿意聘用男性。”
>
> ——塞尔维亚城市地区成年女性

你的信息和你的关系网都很重要：信息和关系网的性别影响

由于女性在一些市场上露面的次数有限，关于女性表现的信息缺乏，这可能进一步强化女性的劳动力低参与率，在缺乏促进实验和学习的补偿性措施时尤其是这样。在许多国家，女性在正规私营就业中的低参与率导致雇主难以充分了解女性工人的生产率。所以雇主可能迟迟不愿雇佣女性工人，致使针对女性就业的偏见得以持续化（这类行为通常被视为统计性歧视）。

信贷市场亦然。女性进入信贷市场有限，因而她们作为借贷人的潜在表现，包括她们的还贷能力难以被了解。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可见成本和其他差异以及日益强化的社会规范加剧了这一问题。例如，商业银行严格审核借贷人的偏好可能减少对小农场和小型非农企业的贷款，因此这就是说在小农场和小型非农企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女性获得的贷款也减少了。[164]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积极的政策行动通过支持弱势群体就业促进雇主对这类群体的了解。在美国，这类政策确实以不太高的效益成本促进了就业在白人男性与女性、少数群体之间的再分配。[165]

在积极的政策行动缺位时，相当数量的女性在公共领域就业也可以起到同样的示范效应。在富裕国家，公共领域增长对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166] 来自 15 个发达经济体的数

专栏 5.10 埃及的家庭组建和公共领域就业

2006 年，埃及城市地区在私营公司就业的女性不足就业女性的四分之一。农村地区的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在 8%左右。大部分城市工作女性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农村地区，超过 70%的就业女性在国家政府和家庭企业中工作。

人们认为公共领域的工作“工作时间较短、照料儿童的可能性更大，对产假更为宽容”，因此与女性的“生育角色”更契合。据悉 2006 年在临产前仍在工作岗位的女性中，公共领域的女性比例最高。86%的公共领域工人有至少 6 周的带薪产假，相比之下，正规私营领域的这一比例只有 47%。年龄介于 15~29 岁的、抱怨工作时间长的私营领域女性工人的比例（50%）大大高于公共领域的比例（32%）。

公共领域脱离工作的现象也少得多。1998 年的工作女性中，截至 2006 年，政府和公共领域的员工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可能性最小。具体来讲，私营公司女性雇员的退出率比政府女性工作人员的退出率高出 12%，在统计学意义上，这种差异很大。在非正规公司或家庭企业中工作或自就业的女性工人的退出率比政府工作人员的退出率约高出 35%。即使在将个体特征考虑进去以后，差异依然存在。

婚姻是导致退出率提高的首要动因，但是政府（公共）领域中婚姻和脱离劳动力的关系要小得多。和那些婚姻状况没有发生变化的女性相比，那些在 1998 年至 2006 年期间结婚的女性到 2006 年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约高出 14 个百分点）。而且到 2006 年，1998 年在私营领域就业的 20 岁女性中，如果这期间没有结婚，她们脱离劳动力队伍的概率是 26%，如果这期间她们结婚了，她们脱离劳动力队伍的概率是 54%，而相比之下，公共领域的这一比例分别是 16%和 22%。因此，婚姻的影响是它使私营领域雇员的退出率提高了 28%，使政府工作人员的退出率提高了 6%。婚姻对非正规领域雇员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影响。

政府工作人员和非正规领域雇员婚后在女性劳动力市场上的退出率差异基本上是一种城市现象。在农村地区，这种差异在统计数字上不大。这表明农村地区的非正规领域工作（主要包括家禽养殖业和乳制品加工业）与婚姻的关系和政府工作与婚姻的关系相似。农村地区女性的生产性角色和生育角色的界限要模糊得多。

在城市地区，有证据显示在家庭企业中工作的女性婚后留职率最高，甚至比政府工作人员的留职率还高。由于家庭企业中的工作时间可能非常灵活，这一结果也对已婚女性在工作时间和婚姻生活相匹配的条件下更有可能继续工作的观念提供支持。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0a。

据显示了女性劳动力参与和女性公共领域就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对男性而言这种关系较弱。更重要的是，公共体系庞大或公共领域就业高增长国家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提高是双轮驱动，即公共领域就业增长和私营领域就业增长同时驱动的结果。在 12 个有数据可考的经济体中，女性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可能性高于男性的国家只有 5 个，可能性低于男性的国家有 4 个。在其他 3 个国家中，在对其他相关的工人特征进行控制后，性别对公共领域就业可能性的解释力不大。[167]

在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就业增长是女性在正规领域工资就业的主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对受过教育、所在地观念对女性参与市场工作限制又较多的已婚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在埃及，女性聚集在公共领域的工作中，政府工作更适合婚姻生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见专栏 5.10）。

小型金融机构的扩张也可以在信

“人们通过网络和关系寻找（工作），如果你认识有工作的人，他们（她们）会给你提供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

——南非城市地区青年女性

贷市场产生相似的示范效应。通过以女性为服务对象，设计交付机制促进借贷人的良好表现和高还贷率，小型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大量关于女性作为借贷人的表现的信息。给女性提供贷款带来高额平均利润的新预期正在吸引更多的传统信贷机构给女性提供贷款（见第 7 章专栏 7.5）。

女性在某些职业或行业的参与率不高，这不仅对那些试图进入该职业或行业的女性产生影响，而且也对那些已经被雇佣女性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在搜集信息成本昂贵或围绕性别建立网络非常重要时尤其这样。对这两类女性而言，女性的额外参与会产生效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演变可以得到以下解释，当参与工作的女性比例很小，学习的速度非常慢，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变化也就非常小，但是当女性工作的比例接近全部工作的一半，就会出现快速学习和女性劳动力参与快速变化的现象。[168] 投资和参与决策的推动力量常常是可见回报而不是实际回报，因此，在具体市场缺少重要群体的时候，信息不完全甚至可以使学习进一步减速。[169]

加入关系网络的壁垒因素，无论是由于女性参与率低引起的还是由更明确的基于性别的会员资格引起的，都可以通过限制女性搜集和分享信息的能力和进入市场的可能性降低女性的生产率。 和男性相比，女性参与非排他性女性关系网络的可能性较小，与较大的、非正规的伙伴群体的联系也比较小。来自全球创业观察的数据显示，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认识一位在访谈前两年才开始创业的企业家的女性企业家大大少于男性企业家。[170] 同样，墨西哥女性企业家难以闯进男性网络成为企业增长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171]

宝贵的信息通过这些网络交流，就这个方面而言，性别准入差异可以损害女性的经济绩效。投资环境调查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正规领域城市企业的数据显示，有一个企业家爸爸或参加了家庭企业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生产率，[172] 这表明提高关系网络准入可以促进生产率。但是这只对男性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表明女性面临着较大的限制因素，降低了这种潜在优势的积极效应。女性在加入农村组织和合作社时也面临着壁垒，这可能进一步限制了促进市场准入的渠道。[173] 即使在具有“市场皇后”美誉、女性流动性大于其他地区的西非农村市场，女性也很少能实现向上的经济流动。销售代理、指挥交通和拥有加工设施等用于空间和社会流动的经济资源与关系资源通常都掌握在男性的手里。[174] 这里新信息和通信技术有望为解除女性面临的某些时间限制因素和流动限制因素发挥巨大作用（见第 6 章）。

最后，某些具体职业中女性的高参与率和广泛的（或者“深厚”的）关系网也可以产生负面影响。[175] 新进入市场的女性更有可能聚集在同一群体其他女性所就业的领域，致使就业分割持久化。教育文献已经使用该论断解释学习领域的性别分割以及教育行业中的女性化现象。[176] 信息的缺乏

> “（找工作）非常难，即使找学徒的机会也很难。我很难成为学徒，因为只有‘内部人’可以让你成为学徒。”
>
> ——印度尼西亚青年女性

只能加剧这一现象。例如，就业审计显示，歧视男性从事“传统女性”工作（护理行业）和歧视女性从事“传统男性”工作[177]的雇主反映的更可能是信息不完全引起的歧视而非行业间雇佣偏好差异引起的歧视。

游戏规则会发挥作用：正规（经济）制度的性别影响

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平等服务的制度可以对性别成果产生意想不到的差别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某一具体制度的架构和职能是既有不平等的产物，因此制度很少采取措施去降低不平等程度。农业推广服务阐释了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某一维度的性别不平等而非某一具体制度处理的性别不平等以一种可能导致差别性性别成果的方式调和了这种影响。“性别中立”劳动立法和招聘人员实践阐述了这一点。在两种情况下，不能对某一具体制度影响范围内的性别差异予以解释会进一步导致性别不平等。

为所有人提供农业推广服务还是只为男性提供农业推广服务？

农业推广服务包括咨询服务、信息、培训以及获得种子和肥料等生产性投入等方面的服务，农业推广服务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率。但是推广服务在很多方面大大忽视了女性农民的需求。[178]在越南，男性全部劳动活动的 20%用于农业自就业，相比之下，女性为 30%，但是参与养殖业培训项目的女性只有 25%，参与种植业培训项目的女性只有 10%。[179]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男性户主有地家庭获得推广服务访问的比例占 29%，而女性户主家庭则只有 18%。相比之下，与推广服务代理商有接触的女性户主家庭占 79%，男性户主家庭占 72%。[180]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存在获得推广服务的性别差异。在加纳，受到推广服务访问的男性户主家庭的比例是 12%，女性户主家庭的比例是 2%。而在男性户主家庭中，配偶受到访问的比例仅为 2%。由于加纳是非洲国家中女性推广服务官员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出现这种现象很令人惊讶。[181]

服务提供男性偏好已经被确认为获得推广服务性别差异的原因，这种偏好常常是由男性是决策者，所以服务应当积极地针对男性的观念[182]以及教育男性将确保他们与家庭其他成员共享知识的假设共同引起的[183]。这种可能和家庭并不作为单一整体行动的现实相冲突，在男性和女性从事不同任务或种植不同作物时尤其如此。亲男性偏好也可能是由歧视性社会规范或制度内部的实践引起的。美国农业部最近与一群女性农民达成了协议，这些女性因贷款服务获得中的性别歧视提起了诉讼。

大部分推广官员是男性，这也会造成服务提供偏好。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推广代理人的比例仅为 15%，[184]而非洲的这一比例仅为 7%。[185]结果，阻止女性抛头露面（因而阻止女性拜访推广官员）或要求女性在丈夫不在场时不得与男性交谈的社会规范限制女性获得推广服务。此外，男性推广官员倾向于为男性农民提供服务。[186]推广资源分配向较大的、女性比例不足的商业导向型农场倾斜，这也促进了服务获得的可见性别差异。

劳动立法、聘用和人事实践如何对女性造成危害？

劳动立法和其他管理劳动力市场职能的实践可以产生重要的性别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立法本身强调性别，比如对工作时间、就业行业和产假等的限制。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就业保护法，法律本身是性别中立的，但是

法律的影响是非中立的。聘用和人事管理的实践也可以对女性造成伤害。

基于性别的立法对女性就业结果的影响

许多国家对女性参与市场工作和女性可以从事的工作加以种种限制。众多非洲国家要求女性出外工作时取得父亲或丈夫的允许，而在其他地方，女性不可以开立或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187] 此外，考虑到孕妇、哺乳期母亲或从事具有潜在危险工作的女性的健康问题，对工作时间和工作行业的限制也常常作为保护性措施被引入法律。行业限制比工作时间限制更普遍，但是两者常常同时存在。在某些发达经济体，比如西班牙，虽然这样的实践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些实践消失的时间并不长。

这些限制因素似乎与较低的女性参与率和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联系在一起。那些实行某种工作时间或行业限制的国家，其平均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较低（45%，相比之下，没有实行限制的国家的参与率是 60%），其性别参与差异较大（45%，相比之下，没有实行限制的国家是 25%）。将女性工作局限在白天或某些行业的措施也可能限制她们的就业机会，这些措施促使雇主只雇佣男性从事那些女性也可能选择的工作。然而措施的整体影响取决于女性的就业偏好，也就是说，即使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也很少有女性选择在矿井或其他要求强大体力的行业中工作。[188]

对产假和退休的差异性管理也可以对女性的劳动力参与产生影响。大多数国家都提供某种形式的母亲产假，但是产假的天数、产假期间薪水的比例和产假期间由谁支付薪水等权益的变化很大。提供父亲产假的国家很少，而且常常有很多限制条件。男性和女性在父母产假方面的既有差异增加了雇佣女性的可见成本，因而减少了她们的就业机会（见第 7 章）。而且，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退休年龄限制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这些差异可以造成终身收入、退休金利益和事业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从而阻碍女性进入市场工作（见第 4 章）。

“性别中立”立法和人事实践对女性就业结果的影响

就业保护立法和其他规章旨在为那些具有正式工作的人，即内部人士提供工作安全，但是，这常常是以牺牲其他得不到此类工作或根本没有工作的人（外部人士）的利益为代价的。女性和青年的失业率和临时合同的覆盖率远远高于男性，在劳动保护限制性更强，永久就业和临时就业差异更显著的地方，这些差异也更显著。[189]

针对国内工人的社会保障规则是具有显著性别影响的立法的又一典范。在世界范围内，家政工人获得就业保险、退休和健康权益以及其他形式工人补偿金的权益非常有限，即使他们是正式聘用的员工。而由于大部分家政工人是女性，这意味着女性工人获得的社会保障大大低于其男性同胞。[190]

性别就业分割可以取决于公司内部的工作分配和升职实践。某些确定工作分配的人有意歧视某一性别从事某些工作（见专栏 5.3）。其他人使用性别作为生产率的代表，这是统计上的歧视。统计歧视常常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男性是理性人和女性是情感人的刻板印象常常导致管理岗位偏爱男性。[191] 工作和公司的性别组成对谁申请工作、谁会被雇佣产生影响，可能既反映了工作的性别标签，也反映了雇主通过雇员个人关系网络招聘员工

的倾向。[192] 简言之，参与者在匹配过程中是否认为工作适合某一特定性别的观点密切了性别与人们工作或工作地点的关系，换言之，它促进了就业分割。

行业和职业分割反过来又促进了升职和权力的可见性别差异以及工人态度和行为的差异。[193] 首先，在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和女性居于主导地位工作中工作阶梯的间距和长度差异导致了性别间的流动差异。男性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作的阶梯比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作的阶梯长。[194] 此外，女性居于主导地位的工作的阶梯的梯级之间的距离较近，所以升职给女性带来的发展低于给男性带来的发展。[195] 第二，女性更有可能是女性主导工业的管理者，[196] 所以男性和女性通常会遇到同性管理者。[197] 第三，男性和女性聚集在不同的职业中或公司中，他们在公司“机遇结构”中的不同位置造成他们与劳动力的关系、他们的事业抱负和工作行为的差异。来自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的数据显示，尽管大多数从事没有前途的白领工作的工人是女性，从事这类工作的任何人都将缺少工作承诺，相反，他们更愿意与合作者交往。[198] 而尽管男性占据了升职阶梯中的大部分职位，这些职位上的男性和女性均表现出了事业承诺并寻求升职。[199]

突破生产性陷阱：如何突破？为什么要突破？

我们以对适用本报告框架分析就业性别分割、原因及其政策含义形成的重要远见和对降低分割的政策行动的原因讨论的简短综述来结束本章。

弱化反馈环，互相强化限制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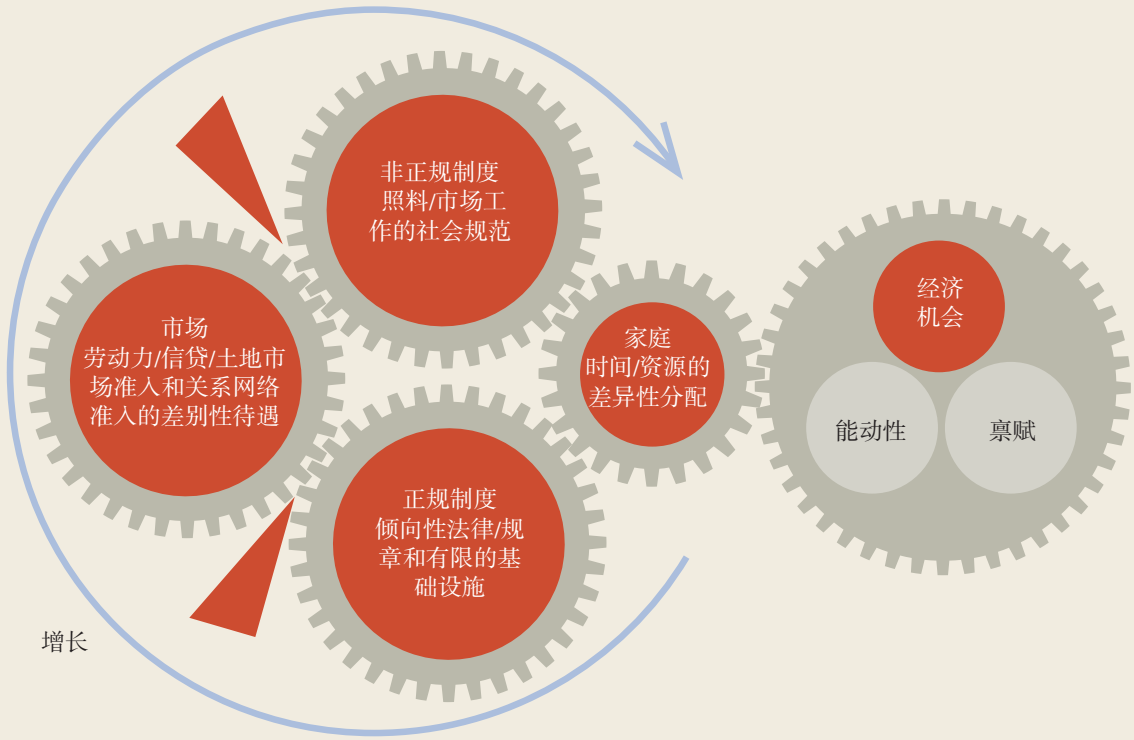
在就业分割及其原因之间存在着反馈环。正如我们所示，导致农民、企业家和工资工人获得经济机遇性别分割的三大因素是：时间使用性别差异（主要是照料责任引起的差异）、获得生产性投入的性别差异（尤其是土地和信贷）和市场与制度失灵的性别差异性影响。

同时，获得经济机会的性别分割强化了时间使用、获得投入和市场与制度失灵方面的性别差异。以时间使用的性别差异为例。由于女性倾向于在低生产率、低薪工作中就业，相对于男性，她们具有家庭生产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有酬工作和无酬工作生产率方面的性别差异强化了家务工作和照料工作专业化的既有动力，强化了时间使用的性别差异。

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性别差异也是这样。例如，女性农民商业化程度较低，这可能阻碍她们进行投资，而投资可以提高女性经营土地的生产率（无论是通过补充生产性投资的直接手段还是通过节省时间投资的间接手段），可能扩大市场准入。而且，信贷机构普遍认为女性企业实现增长的能力有限，从而限制了女性企业家获得信贷，这本身又将阻碍增长。

此外，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可以互相加强，因此，如果另一领域没有取得进步，某一领域的进步不能改善另一领域获得经济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状况。例如，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回报的持续增加为女性参与有酬工作提供了较强的动力，但是在有关女性参与市场工作的传统社会规范存在的前提下，这些动力可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市场工作。允许灵活就业形式的制度变革，比如兼职工作，具有缓解既有时间限制因素的作用，但是在缺少（儿童）护理服务扩张等补充性措施的情况下，对女性就业结果的影响可能有限。

图 5.15　互相加强的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是女性落入生产性陷阱的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这种基于性别和分割自身的就业分割主要原因反馈环和互相加强的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一道，构成了女性陷入生产性陷阱的主要原因（见图 5.15）。突破这种生产性陷阱要求采取干预措施，解除女性面临的时间限制因素，增加她们可以获得的生产性投入并矫正市场和制度失灵问题。成功的干预在于充分认识并针对每一环境中最具限制性的因素，同时承认多重限制因素问题，这也许可以通过政策排序实现（见第 7 章和第 8 章）。

突破生产性陷阱的收益

突破生产性陷阱的收益将体现在几个关键的方面。促进获得经济机会的性别平等可以对生产率产生巨大影响。当前女性在世界劳动力中的比例超过了 40%，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例是 43%。根据粮农组织，实现女性农民和男性农民获得生产性资源的平等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出增加 2.5%~4%。[200] 对具体国家的深入研究显示了同样的收益。例如，如果保证女性农民可以和男性一样获得肥料和其他农业投入，马拉维的玉米产量将增加 11%~16%，加纳的玉米产量将增加 17%。改善布基纳法索女性的财产权力将使家庭在不增加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即只是通过肥料和劳动力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重新分配，使家庭的总农业生产增加 6%。

消除针对女性工人和管理者的歧视可以使每位工人的生产率增加 25%~40%，具体取决于她们被排除在劳动力和管理层蓄水池之外的类型和程度。[201] 而取消阻止女性进入某一特定行业或就业领域的壁垒将产生相似的

专栏 5.11 性别平等和企业案例

更多的公司意识到促进女性经济赋权可以成为实现企业和女性双赢环境的措施。秘鲁 Belcorp 公司和印度斯坦利华公司展示了如何利用创新型商业模型对女性劳动力投资可以既有利于企业发展，也可以为女性生活和地方社区带来可见的变化。

Belcorp 公司。该公司是具有 40 年历史的、广受欢迎的化妆品公司，主要因其高质量产品而享有盛誉。通过直接销售，该公司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 15 个国家中的 9 000 名雇员每年产生的收入高达 13 亿美元。

女性对公司的商业模型及其成功而言非常重要。Belcorp 公司 80%的劳动力是女性，77%的高级职员是女性。Belcorp 公司早就意识到促进女性赋权是一项稳健的商业战略。通过运作，Belcorp 公司使 650 000 名美容顾问成为企业家，从商业培训、社会网络和教育给她们、她们的家庭和社区赋权中受益的机会，这些美容顾问中，大部分来自低收入家庭。

Belcorp 的商业模型基于三大轴线：经济支持（通过以合理的培训提供商业机会）、情感支持（通过动力、认可和信心建设以及对营养、健康、儿童养育等问题，同时应对对女性很重要的个人和家庭考虑的问题的意识）和社会支持（通过给予女性成为同龄人关系网成员的机会）。

印度斯坦利华公司。斯坦利华公司长期以来在印度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斯坦利华公司在包括肥皂、洗涤剂和洗发水在内的产品中的市场份额将近 60%。但是随着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对宝洁等外国跨国公司的开放，斯坦利华提高收入和利润的压力增加了。到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公司在寻求另一个重大机遇，即触及那些不是其分配网络组成部分的非常小的村庄。

显然，企业案例强调印度的农村市场。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它的 12 亿人口中，70%以上居住在农村地区。尽管商业原因很明确，建立一套触及印度边远地区的分配渠道要复杂的多。一直以来，斯坦利华通过沿途零售车等工具覆盖农村人口，但是仍然有很大比例的人口不在覆盖范围中。斯坦利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女性小企业家网络建立分销系统，将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

斯坦利华设计了直接针对消费者的 Shakti 销售分配网络。该网络依靠 45 000 名女性小企业家，触及到边远农村市场 135 000 个村庄的 300 万家庭。该计划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在增加女性收入的同时增加了利润。而且通过将少量产品打包，并以农村贫穷人口可以承受的价格销售，该方案改善了印度农村地区的卫生和福利状况。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 2010a，2010b。

积极效果，降低了男性和女性的生产率差异。例如在美国，1960 年至 1980 年期间南部和东北部地区 40%的工资趋同和 1960 年至 2008 年期间总体工资增长的 15%~20%归功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和种族分割的减少。[202]

这些成果可以带来广泛的利益。女性获得的经济机会增加了，从而增强了女性对家庭收入和其他资源的控制力，这可以提高女性的能动性，惠及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儿童（见第 3 章和第 4 章）。随着女性在最能发挥自己技能和才能的工作岗位上就业，私营领域可以支持女性更多地参与市场工作、降低分割并从中受益（见专栏 5.11）。随着技术变革迅速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增加了世界对技能工人的需求量，女性，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性成为寻找才能和技能未被开发的资源库，因此，利用这一机会非常重要。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获得经济机会的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成本也在日益增加。世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赡养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的工人人数较少，除非今天劳动力参与率较低的群体的参与率大幅度增长，这些群体基本上是女性群体。如果女性的参与率保持不变，那么预计到 2040 年，欧洲将面临 2 400 万名的工人缺口。相反，如果女性的参与率上升至与男性同等的比率，预计这一缺口会下降至 300 万名。[203] 在一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即使最微小的资源使用效率的改善都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对那些歧视较低、性别平等较高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竞争优势（见第 6 章）。

本章小结：持续性性别就业分割使女性陷入低生产率、低收入的工作

所见所闻

男性和女性工作差异很大，而经济发展引起的就业结构变化还不足以消除就业的性别分割。在世界范围内，女性集中在生产率不高、报酬不高的工作中。她们在小农场工作，经营小公司，她们在无酬工人和非正规领域中的比例过高，她们很少能做到有权力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的所见是这样？

照料责任和时间使用

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和照料责任过多，因而面临着与市场工作相关的较大的固定成本。固定工作安排和最低工作时间要求，特别是（正规的）工资性工作的工作安排和最低工作时间要求和难以调整家里的照料责任构成了女性进入市场工作的壁垒。有关女性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社会规范也会对这些平衡关系产生影响。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看重工作安排灵活、平均工作时间较短的工作，这使她们面临被导入低质量工作的风险。

土地和信贷

和男性同行相比，各国女性农民和企业家获得土地和信贷的可能性较小。获得这些生产性投入的性别差异是由进入市场的壁垒因素和制度限制共同造成的，壁垒因素包括土地和信贷市场上的歧视和差别定价，制度限制包括土地权利、金融规则和规章制度等。这也可能反映了家庭内部在分配生产性资源时给予男性厚爱的歧视性偏好。这些差异可能转化为生产规模、生产率、投资和增长能力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市场和制度失灵

女性在某些市场上的有限存在可能造成了解女性表现的壁垒因素，反过来，这进一步限制了女性进入这些市场。此外，制度的设计和职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以一种致使既有不平等持久化的方式歧视女性。

政策启示

就业分割与时间利用、获得投入的性别差异之间的互动，与市场和制度失灵之间的互动使女性陷入了低薪水、低生产率的行业。突破这种生产率陷阱要求采取干预措施取缔时间限制因素，增加女性获得的生产性投入并矫正市场和制度失灵问题。

注释

1. Blau 和 Kahn 2000；Terrell 1992；Hertz 等 2009。

2. 关于完全的文献综述，见粮农组织（2011）。同时见 Jamison 和 Lau（1982）；Tiruneh 等(2001)；Horrell 和 Krishnan(2007)。

3. Udry 等 1995；Udry 1996；Akresh 2008。

4. 在本章中，术语企业家系指不雇佣员工（自己就是工人）的自就业个体或雇佣员工的自就业个体（雇主）。

5. Sabarwal，Terrell 和 Bardasi 2009；Bruhn 2009；Hallward-Driemeier 2011a；Hallward-Driemeier 2011b。

6. Costa 和 Rijkers 2011。

7. Robb 和 Wolken 2002。

8. Chaganti 和 Parasuraman 1996；Loscocco 等 1991。

9. Bosma 等 2004；Lohmann 和 Luber 2004；Kalleberg 和 Leicht 1991；Kepler 和 Shane 2007。

10. 关于美国，见 Blau 和 Kahn（2000）；关于欧洲，见国际劳工组织（2009）。

11. Das 和 Dutta 2008；Whitehead 2009。

12.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13. Alene 等 2008；Kumar 1994；Moock 1976；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

14. Aterid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09；Brush 1992；Costa 和 Rijkers 2011；Morris 等 2006；Watkins 和 Watkins 1984。

15. Blau 和 Kahn 2000，和 Terrell 1992。

16. Ñopo，Daza 和 Ramos 2011。

17. Bertrand，Goldin 和 Katz 2010；Goldin 和 Katz 2008；Joshi，Paci 和 Waldfogel 1999；Wilde，Batchelder 和 Ellwood 2010。

18. Sabarwal，Terrell 和 Bardasi 2009；Hallward-Driemeier 2011b。

19. Gajig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11。

20. Goldstein 和 Udry 2008。

21. Croson 和 Gneezy 2009。

22. Brush 等 2004；Bird 和 Brush 2002。

23. Minniti 2010；Welter 和 Smallbone 2003。

24. Blau 和 Kahn 2000；Goldin 和 Katz 2008；Wood，Corcoran 和 Courant 1993。

25. Dolado，Felgueroso 和 Jimeno 2003；

Killingsworth 1990；Macpherson 和 Hirsch 1995；Pitts 2003。

26. Blau 和 Kahn 2000。

27. Goldin 和 Katz 2008；Weinberger 1998；Wood，Corcoran 和 Courant 1993。

28. Becker 1957。

29. Black 和 Brainerd 2004；Black 和 Strahan 2001；Hellerstein，Neumark 和 Troske 1997。

30. Andrabi 等 2007。

31. Görlich 和 de Grip 2009。

32. Macpherson 和 Hirsch 1995；Pitts 2003。

33. Lallemand 和 Rycx 2006；Kahyarara 和 Teal 2008；Herrera 和 Badr 2011。

34. 国际劳工组织 2010b。

35. 国际劳工组织 2010b。

36. 我们使用乡村创收活动数据库的数据。乡村创收活动数据库是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大学共同努力创建的数据库，为研究生计战略和收入来源，该数据库对一组国家代表性调查进行协调。乡村创收活动数据库包括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保加利亚、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的数据。样本是国家层面乡村地区的代表性样本。

37. Bruhn 2009;Hallward-Driemeier 2011a；Sabarwal，Terrell 和 Bardasi 2009；Costa 和 Rijkers 2011。

38. Hallward-Driemeier 2011a。

39. Mead 和 Liedholm 1998；Bruhn 2009。

40. 世界银行 2010d。

41. Morris 等 2006。

42. Aidis 等 2007；Bardasi 和 Gornick 2008；世界银行 2008。

43. Allen 等 2008。

44. 国际劳工组织 2010b；Anker，Melkas 和 Korten 2003。

45. Mayoux 1995。

46. Bates 1995；Hallward-Driemeier 2011b；Verheul，van Stel 和 Thurik 2006；世界银行 2010d，世界银行 2007，世界银行 2010a。

47. Horrell 和 Krishnan 2007；Tiruneh 等 2001；Alene 等 2008；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Kinkingninhoun-Mêdagbé 2010；Moock 1976；Oladeebo 和 ajuyigbe 2007；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1994；Vargas Hill 和 Vigneri 2009；Aly 和 hields 2010；Hasnah 和 Coelli 2004；Udry 等 1995；Bindlish，Evenson，和 Gbetibouo1993；Akresh 2008；Goldstein 和 Udry 2008；Rahman 2010。

48. Udry 等 1995。

49. Hundley 2001。

50. Hallward-Driemeier 2011b。

51. Costa 和 Rijkers 2011。

52. Ñopo，Daza 和 Ramos 2011。

53. 十进位数字是近似值；国际劳工组织 2010b。

54. 国际劳工组织 2010b。

55. Anker 1998；Anker，Melkas 和 Korten 2003；国际劳工组织 2010b。

56. Charles 1992。

57. Charles 1992。

58. Tzannatos 2006。

59. Becker 1965；Gronau 1977。

60. Goodin 等 2008。

61.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62. 关于例证，见 Ilahi（1999）；Haddad 等（1995）。

63.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64. Ilahi 2000；国际劳工组织 2010b；Blackden 和 Wodon 2006；联合国 2010。

65. Ilahi 2000；国际劳工组织 2010b；Blackden 和 Wodon 2006；联合国 2010；世界银行 2010a；Apps 2004；Bianchi 2000；Fisher 等 2007；Lachance-Grzela 和 Bouchard 2010。

66.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67.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68.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69. Bittman 等 2003。

70. Badgett 和 Folbre 1999；Elson 1994；Folbre 2006。

71. Hochschild 和 Machung 1989；Hochschild 1997。

72.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73. 欧洲劳动力调查 2001。

74. 经合组织 2007；Ronde 2008。

75. 相比之下，Blank（1989）和 Farber（2001）根据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证据得出，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常常是脱离失业状态的过渡阶段，导向未来的常态全职工作。同时见 Miller 和 Mulvey（1997）；O'Reilly 和 Bothfeld（2002）。

76. Bardasi 和 Gornick 2008；Manning 和 Petrongolo 2008。

77. Bertrand，Goldin 和 Katz 2010；Goldin 和 Katz 2008；Wilde，Batchelder 和

Ellwood 2010。

78.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b。

79. Bosch 和 Maloney 2010。

80. Posadas 和 Smitz 2011。

81. Ilahi 和 Jafarey 1999；Ilahi 和 Grimard 2000；Katz 1995；Kennedy 和 Cogill 1988；Khandker 1988；Skoufi as 1993。

82. Rijkers 2011。

83. 哥伦比亚的数据来自 Attanasio 和 Vera-Hernandez（2004）；加拿大的来自 Baker，Gruber 和 Milligan（2008）；阿根廷的来自 Berlinski 和 Galiani（2007）；经合组织的来自 Jeaumotte（2003）；挪威的来自 Havnes 和 Mogstad（2009）；危地马拉的来自 Quisumbing，Hallman 和 Ruel（2007）。

84. Heymann，Earle 和 Hanchate 2004。

85. Anderson 和 Levine 2000；Blau 和 Currie 2006；Hallman 等 2005；Quisumbing，Hallman 和 Ruel 2007。

86. Hein 2005。有证据显示当女性外出工作时男性被拉回家里（Bloemen 和 Stancanelli 2008；Fisher 等 2007；Newman 2002；Newman 和 Gertler 1994；Skoufias 1993），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和照料责任被转移到年长一点儿的兄弟姐妹身上（Heymann，Earle 和 Hanchate 2004；Kamerman 2002）。

87. Jacobsen 2011；Oropesa 1993。

88. Greenwood，Seshadri 和 Yorukoglu 2005；Jones，Manuelli 和 McGrattan 2003。

89. Manning 1964；Schwartz Cowan 1983；Robinson 和 Milkie 1997；Vanek 1973。

90. Cavalcanti 和 Tavares 2008；Coen-Pirani，León 和 Lugauer 2010；Connelly 和 Kimmel 2010。

91. Ramey 2009。

92. 关于积极影响的证据，见 Ilahi 和 Grimard（2000）；Costa 等（2009）；Koolwal 和 van de Walle（2010）；关于无影响的证据见 Lokshin 和 Yemtsov（2005）。

93. Costa 等 2009；Dinkelman 2011；Grogan 和 Sadanand 2009；Jacobsen 2011。

94. Duchène 2011；Peters 2001。

95. 世界银行 2005。

96. Khandker，Bakht 和 Koolwal 2006。

97. Boeri Del Boca 和 Pissarides 2005；O'Reilly 和 Fagan 1998；经合组织 2007。

98. 企业领导力理事会 2008。

99. Bosch 和 Maloney 2010。

100. Contreras 和 Plaza 2010；Fernández 2007a；Fortin 2005；Burda，Hamermesh 和 Weil 2007；Nicodemo 和 Waldmann 2009。

101. Fafchamps 和 Quisumbing 1999。

102. Cunningham 2001。

103. Berniell 和 Sánchez-Páramo 2011a；Fortin 2005。

104. Booth 和 van Ours 2008，Booth 和 van Ours 2009；Booth 和 van Ours 2010。

105. López Bóo，Madrigal 和 Pagés 2009。

106. Fernández，Fogli 和 Olivetti 2004；Fogli 和 Veldkamp，待出版。

107. Fernández 2007b。

108. Bennhold 2010。

109. 本部分讨论从 Bardasi（2011）、Croppenstedt，Goldstein 和 Rosas（2011）提供的卓识中受益匪浅。

110. Deere 和 León 2003。

111. 关于所包括的国家的名单，见注释 36。

112. 粮农组织 2011。

113. Udry 1996。

114. Quisumbing, Estudillo和Otsuka 2004。

115. Deere 2003。

116. Agarwal 1994；Deere 2003；Kevane 和 Gray 1999。

117. Brush 1992；Carter 和 Cannon 1992；Carter 2000。

118. 这些国家是保加利亚、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马拉维、尼泊尔、巴拿马和越南。

119. Aidis 等 2007；Muravyevy，Talavera 和 Schäfer 2009。

120. 世界银行 2010d。

121. Hallward-Driemeier 2011b。

122. Buvinic 和 Berger 1994。

123. Akoten，Sawada 和 Otsuka 2006。

124. Diagne，Zeller 和 Sharma 2000；Fletschner 2008。

125. Daley-Harris 2009。

126. Banerjee 等 2010。

127. Gilbert，Sakala 和 Benson 2002；Moock 1976；Peterman 2010。

128. 粮农组织 2011。

129. Due 和 Gladwin 1991；SOAS 等 2008。

130. Dolan 2001；Due 和 Gladwin 1991。

131. von Bülow 和 Sørensen 1993；Dolan 2001；Katz 1995；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Porter 和 Phillips-Howard 1997；Raynolds 2001。

132. Katz 1995。

133. Eaton 和 Shepherd 2001；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Porter 和 Phillips-Howard 1997。

134. Hamilton 和 Fischer 2003。

135. Fafchamps 1992；Fafchamps 2003；Porter 和 Phillips-Howard 1997。

136. Porter 和 Phillips-Howard 1997。

137. 它也对劳动力参与和住房质量投资，尤其是城市地区的劳动力参与和住房质量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加纳的数据，来自 Besley（1995）、Goldstein 和 Udry（2008）；关于印度的数据来自 Banerjee，Gertler，和 Ghatak（2002）；关于越南的数据来自 Do 和 Iyer（2008）；关于阿根廷的数据来自 Galiani 和 Schargrodsky（2010）；关于秘鲁的数据来自 Field（2007）、Antle 等（2003）；关于尼加拉瓜的数据来自 De Laiglesia（2005）。

138. De Laiglesia 2005。

139. 欧盟委员会 2008。

140. Demirgüc-Kunt，Klapper 和 Panos 2010；Hallward-Driemeier 2011b；Gajig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11。

141. Banerjee 等 2010。

142. Dupas 和 Robinson 2009。

143. Bardasi 2011。

144. Croppenstedt，Goldstein 和 Rosas 2011。

145. 联合国千年项目 2005。

146. Alesina，Lotti 和 Mistrulli 2008；Deere 和 León 2001；Muravyevy，Talavera 和 Schäfer 2009。

147. Muravyevy，Talavera 和 Schäfer 2009。

148. Alesina，Lotti 和 Mistrulli 2008。

149. Agarwal 1994。

150. Deere 和 Doss 2006。

151. UN-Habitat 2007。

152. Quisumbing 1994；Fafchamps 和 Quisumbing 2005。

153. Deere 和 León 2001。

154. Deere 和 León 2001。

155. Srivastava 和 Srivastava 2009。

156. McCarter 2006。

157. Berger 1989；Almeyda 1996。

158. Frank 2008。

159. Due and Gladwin 1991。

160. Deere 和 León 2001。

161. Udry 等 1995；Udry 1996。

162. Fletschner 2008。

163. Kumase，Bisseleua 和 Klasen 2010；Quisumbing，Payongayong 和 Otsuka 2004。

164.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2009。

165. Holzer 和 Neumark 2000。

166. Gornick 和 Jacobs 1998；经合组织 1993；Schmidt 1993。

167. Anghel，de la Rica 和 Dolado 2011。

168. Fernández 2007b。

169. Jensen 2010。

170. Kotiranta，Kovalainen 和 Rouvinen 2010。

171. Cunningham 和 Maloney 2000。

172. Aterid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09。

173. Doss 2001；Crowley 等 2005。

174. Harriss-White 1998。

175. Schelling 1971。

176. England 等 2007。

177. Booth 和 Leigh 2010。

178. 粮农组织 2008；粮农组织 2011。

179. 越南政府 2000。

180. 世界银行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10。

181. 世界银行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10。

182. 世界银行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2010。

183. Meinzen-Dick 等 2010。

184. Hertz 等 2009。

185. Williams 2003。

186. Hertz 等 2009。

187. Kelly 和 Breslin 2010。

188. 世界银行 2010c。

189. Blanchard 和 Landier 2002；Cahuc 和 PostelVinay 2002；de la Rica 2004；Saint Paul 1996。

190. 国际劳工组织 2010d。

191. Kanter 1977。

192. Fernandez 和 Sosa 2005。

193. Reskin 和 Bielby 2005。

194. Petersen 和 Saporta 2004。

195. Barnett，Baron 和 Stuart 2000。

196. Reskin 和 McBrier 2000。

197. Browne，Tigges 和 Press 2001。

198. Kanter 1977。

199. Bettio 和 Verashchagina 2009。

200. 粮农组织 2011。

201. Cuberes 和 Teignier Baqué 2011。

202. Hurst 等 2011。

203. 麦肯锡公司 2007。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dams, Renée B., and Daniel Ferreira. 2009. "Wome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4 (2): 291–309.

Agarwal, Bina. 1994. *A Field of One's Own: 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idis, Ruta, Friederike Welter, David Smallbone, and Nina Isakova. 2007.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Lithuania and Ukraine." *Feminist Economics* 13 (2): 157–83.

Akoten, John E., Yasuyukiz Sawada, and Keijiro Otsuka. 2006. "The Determinants of Credit Access and Its Impacts on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Garment Producers in Keny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4 (4): 927–44.

Akresh, Richard. 2008. "(In) Efficiency in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Urbana, IL. Processed.

Alene, Arega D., Victor M. Manyong, Gospel O. Omanya, Hodeba D. Mignouna, Mpoko Bokanga, and George D. Odhiambo. 2008.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upply Response of Women as Farm Managers: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Western Kenya." *World Development* 36 (7): 1247–60.

Alesina, Alberto F., Francesca Lotti, and Paolo Emilio Mistrulli. 2008. "Do Women Pay More for Credit? Evidence from Italy." Working Paper Series 1420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llen, I. Elaine, Amanda Elam, Nan Langowitz, and Monica Dean. 2008. *Global Entreprenurship Monitor: 2007 Report on Women and Entreprenurship.* London: Center for Women's Leadership at Babson College.

Almeyda, Gloria. 1996. *Money Matters: Reaching Women Microentrepreneurs with Financial Services.*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ly, Hassan Y., and Michael P. Shields. 2010. "Gend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a Surplus Labor Traditional Econom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epal."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43 (2): 111–24.

Anderson, Patricia M., and Phillip B. Levine. 2000. "Child Care and Mothers' Employment Decisions." In *Finding Jobs: Work and Welfare Reform,* ed. R. M. Blank and D. Card 25–3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rabi, Tahir, Jishnu Das, Asim Ijaz Khwaja, Tara Vishwanath, Tristan Zajonc, and LEAPS Team. 2007. *PAKISTAN: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Punjab Schools (LEAPS): Insights to Inform the Education Policy Debat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ghel, Brindusa, Sara de la Rica, and Juan J. Dolado. 2011. "The Effect of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on Women's Labour Market Outcom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Anker, Richard. 1998. *Gender and Jobs: Sex Segregation of Occupations in the World.*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Anker, Richard, Helinä Melkas, and Ailsa Korten. 2003. "Gender-Base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the 1990s." In Focus Programme on Promoting the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Rights at Work. Working Paper Series 16,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eneva.

Antecol, Heather. 2000. "An Examination of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Gap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Labour Economics* 7 (4): 409–26.

Antle, John, David Yanggen, Roberto Valdivia, and Charles Crissman. 2003. "Endogeneity of Land Titling and Farm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Peruvian Andes." Working Paper August,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Bozeman, MT.

Apps, Patricia. 2004. "Gender, Time Use and Models of the Househol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23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terido, Reyes, and Mary Hallward-Driemeier. 2009. "Whose Business Is It Anyway?"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ttanasio, Orazio, and Marcos Vera-Hernandez. 2004. "Medium- and Long-Run Effects of Nutrition and Child Care: Evaluation of a Community Nursery Programme in Rural Colombia." Working Paper Series 04/06,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London.

Badgett, M. V. Lee, and Nancy Folbre. 1999. "Assigning Care: Gender Norms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8 (3): 311–26.

Baker, Michael, Jonathan Gruber, and Kevin Milligan. 2008. "Universal Child Care, Maternal Labor Supply, and Family Well-Be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 (4): 709–45.

Banerjee, Abhijit Vinayak, Esther Duflo, Rachel Glennerster, and Dhruva Kothari. 2010. "Improving Immunisation Coverage in Rural India: Clustered Randomised Controlled Evaluation of Immunisation Campaigns With and Without Incentive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40 (c2220): 1–9.

Banerjee, Abhijit Vinayak, Paul J. Gertler, and Maitreesh Ghatak. 2002. "Empowerment and Efficiency: Tenancy Reform in West Beng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 (2): 239–80.

Bardasi, Elena. 2011. "Improv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Focus on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Bardasi, Elena, and Janet C. Gornick. 2008. "Working for Less? Women's Part-Time Wage Penalties across Countries." *Feminist Economics* 14 (1): 37–72.

Barnett, William P., James N. Baron, and Toby E. Stuart. 2000. "Avenues of Attainment: Occupational Demography and Organizational Careers in the California Civil Servi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1): 88–144.

Bates, Timothy. 1995. "Self-Employment Entry across Industry Group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0 (2): 143–56.

Becker, Gary S. 1957.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75 (299): 493–517.

Bennhold, Katrin. 2010. "Working (Part-time)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A13.

Berger, Marguerite. 1989. "Giving Women Credit: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Credit as a Tool for Alleviating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17 (7): 1017–32.

Berlinski, Samuel, and Sebastian Galiani. 2007. "The Effect of a Large Expansion of Pre-Primary School Facilities on Preschool Attendance Maternal Employment." *Labour Economics* 14 (3): 665–80.

Berniell, María Inés, and Carolina Sánchez-Páramo. 2011a. "Closing the Access Gap: Recent Advance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 2011b. "Overview of Time Use Data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Patter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Bertrand, Marianne,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2010. "Dynamics of the Gender Gap for Young Professionals in the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Sector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 (3): 228–55.

Besley, Timothy. 1995.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5): 903–37.

Bettio, Francesca, and Alina Verashchagina. 2009. *Gender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Root Cause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the EU*.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s Expert Group on Gender and Employment.

Bianchi, Suzanne M. 2000.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Time with Children: Dramatic Change or Surprising Continuity." *Demography* 37 (4): 401–14.

Bilimoria, Diana. 200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Women Corporate Officers."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18 (1): 47–61.

Bindlish, Vishva, Robert Evenson, and Mathutin Gbetibouo. 1993. "Evaluation of T&V-Based Extension in Burkina Faso." World Bank, Africa Technical Paper Series 226, Washington, DC.

Bird, Barbara, and Candida G. Brush. 2002. "A Gendered Perspective on Organizational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6 (3): 41–65.

Bittman, Michael, Paula England, Liana Sayer, Nancy Folbre, and George Matheson. 2003. "When Does Gender Trump Money? Bargaining and Time in Household Wor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1): 186–214.

Black, Sandra E., and Elizabeth Brainerd. 2004. "Importing Equality?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7 (4): 540–59.

Black, Sandra E., and Philip E. Strahan. 2001. "The Division of Spoils: Rent-Sharing and Discrimination in a Regulated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4): 814–31.

Blackden, C. Mark, and Quentin Wodon, eds. 2006. *Gender, Time Use, and Poverty in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lanchard, Olivier, and Augustin Landier. 2002. "The Perverse Effects of Partial Labour Market Reform: Fixed-Term Contracts in France." *Economic Journal* 112: 214–44.

Blank, Rebecca M. 1989. "The Role of Part-Time Work in Women's Labor Market Choices over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 (2): 295–9.

Blau, David M., and Janet Currie. 2006. "Preschool, Day Care, and Afterschool Care: Who's Minding the Kids?" In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Vol. 2, ed. Eric Alan Hanushek and Finis Welch.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lau, Francine D., and Lawrence M. Kahn.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4): 75–99.

Bloemen, Hans G., and Elena G. F. Stancanelli. 2008. "How Do Parents Allocate Time? The Effects of Wages and Income."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67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oeri, Tito, Daniela Del Boca,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eds. 2005. *Women at Work: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th, Alison L., and Andrew Leigh. 2010. "Do Employers Discriminate by Gender? A Field Experiment in Fe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 *Economic Letters* 107 (2): 236–8.

Booth, Alison L., and Jan C. van Ours. 2008.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Happiness: The Part-Time Work Puzzle." *Economic Journal* 118 (526): F77–F99.

———. 2009. "Hours of Work and Gender Identity: Does Part-Time Work Make the Family Happier?" *Economica* 76 (301): 176–96.

———. 2010. "Part-Time Jobs: What Women Wa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7627,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Using Markov Processes: An Application to Informality." *Labour Economics* 17 (4): 621–31.

Bosma, Niels, Mirjam van Praag, Roy Thurik, and Gerrit de Wit. 2004. "The Valu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Investments for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3 (3): 227–36.

Bravo, David, Claudia Sanhueza, and Sergio Urzúa. 2008.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Gender, Social Class and Neighborhood in Chile."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 R-541,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Browne, Irene, Leann M. Tigges, and Julie Press. 2001. "Inequality through Labor Markets, Firms, and Families: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Race/Ethnicity." In *Urban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Four Cities,* ed. Alice O'Connor, Chris Tilly, and Lawrence D. Bobo.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ruhn, Miriam. 2009. "Female-Owned Firms in Latin America. 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and Obstacles to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12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rush, Candida, Nancy M. Carter, Elizabeth Gate-

wood, Patricia G. Greene, and Myra Hart. 2004. *Clearing the Hurdles: Women Building High-Growth Businesses.* New Jersey: Financial Times-Prentice Hall.

Brush, Candida G. 1992. "Research on Women Business Owners: Past Trends, a New Perspective and Future Direc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6 (4): 5–30.

Burda, Michael C., Daniel S. Hamermesh, and Philippe Weil. 2007. "Total Work, Gender and Social Norms." Working Paper Series 130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uvinic, Mayra, and Marguerite Berger. 1994. "Sex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a Smal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 in Peru." *World Development* 18 (5): 695–705.

Cahuc, Pierre, and Fabien Poste-Vinay. 2002. "Temporary Jobs,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Labor Economics* 9 (1): 63–91.

Carter, David A., Frank D'Souza, Betty J. Simkins, and W. Gary Simpson. 2007. "The Diversity of Corporate Board Committe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Stillwater, OK. Processed.

Carter, Sara. 2000. "Improving the Numbers and Performance of Women-Owned Businesse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Education + Training* 42 (4/5): 326–34.

Carter, Sara, and Tom Cannon. 1992. *Women as Entrepreneurs: A Study of Female Business Owners, Their Motivations,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London: Academic Press.

Cavalcanti, Tiago V. de V., and José Tavares. 2008. "Assessing the 'Engines of Liberation': Home Appliance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 (1): 81–8.

Chaganti, Radha, and Saroj Parasuraman. 1996.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Gender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Patterns in Small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1 (2): 73–5.

Charles, Maria. 1992.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4): 483–502.

Chioda, Laura, with Rodrigo Garcia-Verdú, and Ana María Muñoz Boudet 2011. *Work and Family: Latin American Women in Search of a New Balance.*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and Poverty Gender Group, LAC.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lifford, V. 1996. "A Case Study of a Feminist Small Business: Theory into Practi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Women and Leadership* 2 (2): 98–111.

Coen-Pirani, Daniele, Alexis León, and Steven Lugauer. 2010.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Appliances o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Labour Economics* 17 (3): 503–13.

Connelly, Rachel, and Jean Kimmel. 2010. *The Time Use of Mot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Kalamazoo, MI: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Contreras, Dante, and Gonzalo Plaza. 2010. "Cultural Factors i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Chile." *Feminist Economics* 16 (2): 27–46.

Corporate Leadership Council. 2008. *Building and Managing a Work-Life Proposition: Identifying the Work-Life Drivers of Attr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the Labor Market.* Arlington, VA: 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

CWDI (Corporate Women Directors International), and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0. *CWDI/IFC 2010 Report: Accelerating Board Diversity.* Washington, DC: CWDI and IFC.

Correll, Shelley J., Stephen Benard, and In Paik. 2007.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5): 1297–1338.

Costa, Joana, Degol Hailu, Elydia Silva, and Raquel Tsukada. 2009. "Water Supply in Rural Ghana: Do Women Benefit?" One Pager Series 101,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Brasilia.

Costa, Rita, and Bob Rijkers. 2011. "Gender and Rural Non-Farm Entrepreneurship."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roppenstedt, Andre, Markus Goldstein, and Nina Rosas. 2011. "Gender and Agriculture: Inefficiencies, Segregation and Low Productivity Trap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roson, Rachel, and Uri Gneezy.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 (2): 448–74.

Crowley, Eve, Stephen Baas, Paola Termine, John Rouse, Pamela Pozarny, and Genevieve Dionne. 2005. "Organizations of the Poor: Conditions for Succ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mbership-Based Organizations of the Poor: Theory, Experience, and Policy, organiz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Women in Informal Employment Globalizing and Organizing, and the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Ahmedabad, India, January 17.

C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 Baqué. 2011.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unningham, Wendy V. 2001. "Breadwinner or Caregiver? How Household Role Affects Labor Choices in Mexico."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74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Cunningham, Wendy V.,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00.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Who Suffered in the 1995 Mexican Crisi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Daley-Harris, Sam. 2009. *State of the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Report 2009.* Washington, DC: Microcredit Summit Campaign.

Das, Maitreyi Bordia, and Puja Vasudeva Dutta. 2008. "Does Caste Matter for Wages in the Indian Labor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IZA/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Rabat, Morocco, May 5.

de la Rica, Sara. 2004. "Wage Gaps between Workers with Indefinite and Fixed-Term Contracts: The Impact of Firm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Moneda y Credito* 219: 43–69.

De Laiglesia, Juan R. 2005. *Investment and Credit Effects of Land Titling and Registration: Evidence from*

Nicaragua. Germany: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Research Committee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oceedings of the German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ference.

Deere, Carmen Diana, and Cheryl R. Doss. 2006.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06/115,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Helsinki.

Deere, Carmen Diana, and Magdalena León. 2001. "Who Owns the Land? Gender and Land-Titling Programme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 (3): 440–67.

———. 2003. "The Gender Asset Gap: Land in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 31 (6): 925–47.

Demirgüc-Kunt, Asli, Leora F. Klapper, and Georgìos A. Panos. 2010. "Entrepreneurship in Post-Conflict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 (1): 27–78.

Diagne, Aliou, Manfred Zeller, and Manohar Sharma. 2000. "Empirical Measurements of Households' Access to Credit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Evidenc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90,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Washington, DC.

Dinkelman, Taryn. 2010. "The Effects of Rural Electrification on Employment: New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272, Princeton University,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search Program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rinceton, NJ.

Directors and Boards magazine. 2010. CWDI and IFC 2010.

Do, Quy-Toan, and Lakshmi Iyer. 2008. "Land Titling and Rural Transition in Vietna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6 (3): 531–79.

Dolado, Juan J., Florentino Felgueroso, and Juan F. Jimeno. 2004. "Where Do Women Work? Analysing Patterns in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Gender."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72: 293–315.

Dolan, Catherine S. 2001. "The 'Good Wife': Struggles over Resources in the Kenyan Horticultural Sect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 (3): 39–70.

Doss, Cheryl R. 2001. "Design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for African Women Farmers: Lessons from 25 Years of Experience." *World Development* 29 (12): 2075–92.

Duchène, Chantal. 2011. "Gender and Transport." Discussion Paper 2011-11,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Due, Jean M., and Christina H. Gladwin. 1991. "Impact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on African Women Farmers and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3 (5): 1431–9.

Dupas, Pascaline, and Jonathan Robinson. 2009. "Savings Constraints an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Kenya." Working Paper Series 14693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Eaton, Charles, and Andrew W. Shepherd. 2001. "Contract Farming: Partnerships for Growth." Agricultural Services Bulletin 145,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Rome.

Elson, Diane. 1994. "Micro, Meso, Macro: Gender and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Reform." In *The Strategic Silence: Gender and Economic Policy,* ed. Isabella Bakker. London, U.K.: Zed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orth and South Institute.

England, Paula, Paul Allison, Su Li, Noah Mark, Jennifer Thompson, Michelle J. Budig, and Han Sun. 2007. "Why Are Some Academic Fields Tipping toward Female? The Sex Composition of U.S. Fields of Doctoral Degree Receipt, 1971–2002."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0 (1): 23–42.

Fafchamps, Marcel. 1992. "Cash Crop Production, Food Price Volatility and Rur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4 (1): 90–9.

———. 2003. *Rural Poverty, Risk and Development.*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Fafchamps, Marcel, and Agnes R. Quisumbing. 1999. "Human Capital, Productivity, and Labor Allocation in Rural Pakista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4 (2): 369–406.

———. 2005. "Marriage, Bequest, and Assortative Matching in Rural Ethiop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 (2): 347–80.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08. *Global Review of Goo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Advisory Service Practices.* Rome: FAO.

———.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 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Rome: FAO.

Farber, Henry S. 2001. "Job Lo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1–1999." Working Paper Series 832, Princ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ndustrial Relations Se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Fernández, Raquel. 2007a. Alfred Marshall Lecture: "Women, Work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5 (2-3): 305–32.

———. 2007b. "Culture as Learning: The Evolution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ver a Century." Working Paper Series 133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Fernández, Raquel, and Alessandra Fogli. 2006.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Fami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 (2–3): 552–61.

Fernández, Raquel, Alessandra Fogli, and Claudia Olivetti. 2004. "Mothers and Sons: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Female Labor Forc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249–99.

Fernandez, Roberto M., and M. Lourdes Sosa. 2005. "Gendering the Job: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at a Call Cen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3): 859–904.

Field, Erica. 2007. "Entitled to Work: Urban Property Rights and Labor Supply in Peru."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4): 1561–602.

Fisher, Kimberly, Muriel Egerton, Jonathan I. Gershuny, and John P. Robinson. 2007. "Gender Convergence in the American Heritage Time Use Study

(AHTU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2 (1): 1–33.
Flabbi, Luca. 2011.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 Career Choic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on a Sample of OECD Countr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Fletschner, Diana. 2008. "Women's Access to Credit: Does It Matter for Household Effici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0 (3): 669–83.
Fogli, Alessandra, and Laura Veldkamp. Forthcoming. "Nature or Nurture? Learning and the Geography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conometrica.*
Folbre, Nancy. 2006. "Measuring Care: Gender, Empowerment, and the Care Economy."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7 (2): 183–99.
Fortin, Nicole M. 2005.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of Women across OECD Countries."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1 (3): 416–38.
Frank, Daphne. 2008. *Sustainable Housing Finance for Low-Income Groups: A Comparative Study.*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Gajigo, Ousman, and Mary Hallward-Driemeier. 2011.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New Entrepreneurs in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aliani, Sebastian, and Ernesto Schargrodsky. 2010. "Property Rights for the Poor: Effects of Land Titl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4 (9–10): 700–29.
Gilbert, Robert A., Webster D. Sakala, and Todd D. Benson. 2002. "Gender Analysis of a Nationwide Cropping System Trial Survey in Malawi."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6: 1–2.
Giles, John, and Firman Witoelar Kartaadipoetra. 2011. "Indonesia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ackground note for the WDR 2012.
Goldin, Claudia.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2): 1–21.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8. "Transitions: Career and Family Life Cycles of the Educational Eli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2): 363–69.
Goldin, Claudia, and Cecilia Rouse. 2000. "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 'Blind' 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4): 715–41.
Goldstein, Markus, and Christopher Udry. 2008. "The Profits of Power: Land Rights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Gh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 (6): 981–1022.
Goodin, Robert E., James Mahmud Rice, Antti Parpo, and Lina Eriksson. 2008. *Discretionary Time: A New Measure of Freedo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örlich, Dennis, and Andries de Grip. 2009. "Human Capital Depreciation during Hometim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1 (2008): 98–121.
Gornick, Janet C., and Jerry A. Jacobs. 1998. "Gender, the Welfare State, and Public 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5): 688–710.
Greenwood, Jeremy, Ananth Seshadri, and Mehmet Yorukoglu. 2005. "Engines of Libe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2 (1): 109–33.
Grogan, Louise, and Asha Sadanand. 2009. "Electrification and the Household." University of Guelph, Economics Department, Guelph, Ontario. Processed.
Gronau, Reuben. 1977. "Leisure, Home Production, and Work—The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6): 1099–123.
Haddad, Lawrence, Lynn R. Brown, Andrea Richter, and Lisa Smith. 1995.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Policies: Potential Interactions and Evidence to Date." *World Development* 23 (6): 881–96.
Hallman, Kelly, Agnes R. Quisumbing, Marie Ruel, and Benedicte de la Briere. 2005. "Mothers' Work and Child Care: Findings from the Urban Slums of Guatemala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 (4): 855–85.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11a. *Expanding Women's Opportunities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b. *Improving the Legal Investment Climate for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ambrick, Donald C., Teresha Seung Cho, and Ming-Jer Chen. 1996.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eogeneity on Firm's Competitive Mo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4): 659–84.
Hamilton, Sara, and Edward F. Fischer. 2003. "Non-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xports in Highland Guatemala: Understandings of Risk and Perceptions of Chang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 (3): 82–110.
Harriss-White, Barbara. 1998. "Female and Male Grain Marketing Systems: Analytical and Policy Issues for West Africa and India." In *Feminist Visions of Development: Gender Analysis and Policy,* ed. Cecile Jackson and Ruth Pearson. London: Routledge.
Hasnah, Euan Fleming, and Tim Coelli. 2004.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Nucleus Estate and Smallhoder Scheme for Oil Palm Production in West Sumatra: 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Agricultural Systems* 79 (1): 17–30.
Havnes, Tarjei, and Magne Mogstad. 2009. "The Irrelevance of Subsidized Child Care for Maternal Employment: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Oslo, Economics Department, Oslo. Processed.
Hein, Catherine. 2005. *Reconciling Work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al Ideas from Global Experie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ellerstein, Judith K., David Neumark, and Kenneth Troske. 1997. "Market Forces and Sex Discrimin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574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errera, Santiago, and Karim Badr. 2011. "Why Does Productivity of Education Vary across Individuals in Egypt? Firm Size, Gender and Access to Technology as Sources of Heterogeneity in Returns to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4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Hertz, Tom, Ana Paula de la O Campos, Alberto Zezza, Carlo Azzarri, Paul Winters, Esteban J. Quiñones, and Benjamin Davis. 2009. "Wage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ffects of Location, Sector, and Gend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AO-IFAD-ILO Workshop on Gaps, Trends and Current Research in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Rome, March 31.

Heymann, S. Jody, Alison Earle, and Amresh Hanchate. 2004. "Bringing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An Examination of Extended Work Hours in Families in Four Countries."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7 (2): 247–72.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1997. *The Time Bind: When Work Becomes Home and Home Becomes Work*.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and Anne Machung.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Holzer, Harry J., and David Neumark. 2000. "What Does Affirmative Action Do?"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3 (2): 240–71.

Horrell, Sara, and Pramila Krishnan. 2007. "Poverty and Productivity in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Zimbabw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 (8): 1351–80.

Hundley, Greg. 2001. "Why Women Earn Less than Men in Self-Employment?"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22 (4): 817–29.

Hurst, Erik, Chang-Tai Hsieh, Charles Jones, and Peter Klenow. 2011.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Booth, Chicago. Processed.

IF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0. *Promoting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The Learning Journey of Hindustan Unilev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IFC.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09.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Women: March 2009*. Geneva: ILO.

Ilahi, Nadeem. 1999. "Gender and the Allocation of Adult Time: Evidence from the Peru LSMS Panel Dat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74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000. "The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Time and Tasks: 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3,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Ilahi, Nadeem, and F. Grimard. 2000.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Private Costs: Water Supply and Time Allocation of Women in Rural Pakis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1): 45–75.

Ilahi, Nadeem, and Saqib Jafarey. 1999. "Guestworker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Extended Family: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8 (2): 485–512.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9.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Women: March 2009*. Geneva: ILO.

———. 2010a.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ILO: Geneva.

———. 2010b. *Women in Labor Markets: Measuring Progress and Identifying Challenges*. ILO: Geneva.

———. 2010c. *World Social Security Report 2010/11: Providing Coverage in Times of Crisis and Beyond*. ILO: Geneva.

Jacobsen, Joyce P. 2011.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ncreasing Gender Equity with a Focus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Jamison, Dean T., and Lawrence J. Lau. 1982. *Farmer Education and Farm Efficien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Jeaumotte, F. 2003.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Past Trends and Main Determinants in OECD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37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partment, Paris.

Jensen, Robert. 2010.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2): 515–48.

Jones, Larry E., Rodolfo E. Manuelli, and Ellen R. McGrattan. 2003. "Why Are Married Women Working So Muc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 Series 317, Minneapolis, MN.

Joshi, Heather, Pierella Paci, and Jane Waldfogel. 1999.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Better or Wors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3 (3): 543–64.

Kahyarara, Godius, and Francis Teal. 2008. "The Returns to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Academic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Tanzania." *World Development* 36 (11): 2223–42.

Kalleberg, Arne L., and Kevin T. Leicht. 1991. "Gender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Determinants of Small Business Survival and Succ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4 (1): 136–61.

Kamerman, Sheila B. 2002.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and Other Family 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South-East Asi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arly Childhood and Family Policy Series 4, Paris.

Kanter, Rosabeth Moss. 1977. "Some Effects of Proportions on Group Life: Skewed Sex Ratios and Responses to Toke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5): 965–90.

Katz, Elizabeth G. 1995. "Gender and Trade within the Household: Observations from Rural Guatemala." *World Development* 23 (2): 327–42.

Kelly, Sanja, and Julia Breslin, eds. 2010. *Women's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gress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Freedom House.

Kennedy, Eileen T., and Bruce Cogill. 1988. "The Case of Sugarcane in Kenya: Part 1 Effects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on Women's Income, Time Allocation, and Child Care Practices."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67,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Kepler, Erin, and Scott Shane. 2007. "Are Male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 Really That Differ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309,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Advocacy Small Business, Washington, DC.

Kevane, Michael, and Leslie C. Gray. 1999. "A Woman's Field Is Made At Night: Gendered Land Rights and Norms in Burkina Faso." *Feminist Economics* 5 (3): 1–26.

Khandker, Shahidur R. 1988. "Determinants of Women's Time Allocation in Rural Banglade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7 (1): 111–26.

Khandker, Shahidur R., Zaid Bakht, and Gayatri B. Koolwal. 2006. "The Poverty Impact of Rural Roads: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87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illingsworth, Mark R. 2007. "A Framework for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Labor Supply and Wage Rate of Married Pers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N.J. Processed.

Kinkingninhoun-Mêdagbé, Florent M., Aliou Diagne, Franklin Simtowe, Afiavi R. Agboh-Noameshie, and Patrice Y. Adégbola. 2010.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Benin." *Agricultural and Human Values* 27 (1): 57–69.

Koolwal, Gayatri, and Dominique van de Walle. 2010. "Access to Water, Women's Work and Child Outcom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otiranta, Annu, Anne Kovalainen, and Petri Rouvinen. 2010. "Female Leadership and Company Profitability." In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or Growth: A Research Perspective,* ed. Candida G. Brush, Anne de Bruin, Elizabeth J. Gatewood, and Colette Henr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Kumar, Shubh K. 1994. *Adoption of Hybrid Maize in Zambia: Effects on Gender Roles,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Kumase, Wokia-azi N., Herve Bisseleua, and Stephan Klasen. 2010.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in Agriculture: A Gendered Analysis of Cocoa Production in Southern Cameroon."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7, Courant Research Centre, Goettingen, Germany.

Lachance-Grzela, Mylène, and Geneviève Bouchard. 2010. "Why Do Women Do the Lion's Share of Housework? A Decade of Research." *Sex Roles* 63 (11–12): 767–80.

Lallemand, Thierry, and Francois Rycx. 2006. "Establishment Size and the Dispersion of Wage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Applied Econometrics Quarterly* 52 (4): 309–36.

Lohmann, Henning, and Silvia Luber. 2004. "Trends in Self-Employment in Germany: Different Types, Diffe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eemergence of Self-Employ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Employment Dynamics and Social Inequality,* ed. Richard Arum and Walter Müll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kshin, Michael, and Ruslan Yemtsov. 2005. "Has Rural Infrastructure Rehabilitation in Georgia Helped the Poor?"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 (2): 311–33.

López Bóo, Florencia, Lucia Madrigal, and Carmen Pagés. 2009. "Part-Time Work, Gender, and Job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99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Loscocco, Karyn A., Joyce Robinson, Richard H. Hall, and John K. Allen. 1991. "Gender and Small Business Success: An Inquiry into Women's Relative Disadvantage." *Social Forces* 70 (1): 65–85.

Macpherson, David A., and Barry T. Hirsch. 1995. "Wages and Gender Composition: Why Do Women's Jobs Pay Les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3 (3): 426–71.

Maertens, Miet, and Johan F. M. Swinnen. 2009. "Trade, Standards,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Senegal." *World Development* 37 (1): 161–78.

Manning, Alan, and Barbara Petrongolo. 2008. "The Part-Time Pay Penalty for Women in Britain." *Economic Journal* 118 (526): F28–F51.

Manning, Charles A. W. 1964. "S. A. and the World: In Defense of Apartheid." *Foreign Affairs* 43 (1): 135–49.

Mayoux, Linda. 1995. "From Vicious to Virtuous Circles? Gender an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Occasional Paper 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Geneva.

McCarter, Elissa. 2006. "The Global Advancement of Women: Barriers and Best Practices: Women and Microfinance: Why We Should Do 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w Journal of Race, Religion, Gender & Class* 6 (2): 353–66.

McKinsey & Company Inc. 2007. *Women Matter. Gender Diversity, A Corporate Performance Driver.* London: McKinsey & Company Inc.

Mead, Donald C., and Carl Liedholm. 1998. "The Dynamics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6 (1): 61–74.

Meinzen-Dick, Ruth, Agnes Quisumbing, Julia Behrman, Patricia Biermayr-Jenzano, Vicki Wilde, Marco Noordeloos, Catherine Ragasa, and Nienke Beintema. 2010. "Engenderi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0973,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Miller, Paul, and Charles Mulvey. 1997. "Computer Skills and Wages."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36 (68): 106–13.

Minniti, María 2010.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Act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2 (3): 294–312.

Moock, Peter R. 1976. "The Efficiency of Women as

Farm Managers: Keny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8 (5): 831–5.

Moreno, Martin, Hugo Ñopo, Jaime Saavedra, and Maximo Torero. 2004. "Gender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A Pseudo Audit Study for Three Selected Occupations in Metropolitan Lima."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97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Morris, Michael H., Nola N. Miyasaki, Craig E. Watters, and Susan M. Coombes. 2006. "The Dilemma of Growth: Understanding Venture Size Choices of Women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4 (2): 221–44.

Muravyev, Alexander, Dorothea Schäfer, and Oleksandr Talavera. 2009. "Entrepreneurs' Gender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 (2): 270–86.

NCFAW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Vietnam). 2000. *Situation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Vietnam.* Hanoi: NCFAW.

Newman, Constance. 2002. "Gender, Time Use, and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Cut Flower Industry in Ecuador."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6 (3): 375–96.

Newman, John L., and Paul J. Gertler. 1994. "Family Productivity, Labor Supply, and Welfare in a Low Income Countr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 (4): 989–1026.

Nicodemo, Catia, and Robert Waldmann. 2009. "Child-Car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for Married Women in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983,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Ñopo, Hugo, Nancy Daza, and Johanna Ramos. 2011. "Gender Earnings Gaps in the World."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 *Private Pay for Public Work. Performance-Related Pay for Public Sector Managers.* Paris: OECD.

———. 2007.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7.* Paris: OECD.

O'Reilly, Jacqueline, and Silke Bothfeld. 2002. "What Happens after Working Part Time? Integration, Maintenance or Exclusionary Transitions in Britain and Western German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6 (4): 409–39.

O'Reilly, Jaqueline, and Colette Fagan. 1998. *Part-Time Prospect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Part-Time Work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Rim.* London: Routledge.

Oladeebo, J. O., and A. A. Fajuyigbe. 2007.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Men and Women Upland Rice Farmers in Osun State, Nigeria." *Journal of Human Ecology* 22 (2): 93–100.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 *Private Pay for Public Work. Performance-Related Pay for Public Sector Managers.* Paris: OECD.

———. 2007.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7.* Paris: OECD.

Oropesa, R. S. 1993.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ime-Saving Household 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f the Microwave from 1978 to 1989."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 (4): 567–79.

Peterman, Amber. 2010. "Widowhood and Asset Inherit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5 Count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RPC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s)/ODI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Roundtable 'Inheritan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London, October 11.

Peters, Deike. 2001. "Gender and Transpor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 Background Paper in Preparation for CSD-9."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Expert Workshop "Gender Perspectives for Earth Summit 2002: Energy, Transport,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Center for Metropolitan Studies, Berlin. Processed.

Petersen, Trond, and Ishak Saporta. 2004.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for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4): 852–901.

Pitts, M. Melinda. 2003. "Why Choose Women's Work If It Pays Less? A Structural Model of Occupational Choice." In *Worker Well-being and Public Policy: volume 22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ed. Solomon W. Polacheck. Oxford, UK: Elsevier Science Ltd.

Porter, Gina, and Kevin Phillips-Howard. 1997. "Comparing Contracts: An Evaluation of Contract Farming Scheme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25 (2): 227–38.

Posadas, Josefina, and Marc Smitz. 2011. "Work Decisions for Men and Women: A Household Approach for Indonesia and Peru."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Quisumbing, Agnes R. 1994.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Philippine Rice Villag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Custo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3 (2): 167–95.

Quisumbing, Agnes R., Joanna P. Estudillo, and Keijiro Otsuka. 2004. *Land and Schooling: Transferring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Quisumbing, Agnes R., Kelly Hallman, and Marie T. Ruel. 2007. "Maquiladoras and Market Mamas: Women's Work and Childcare in Guatemala City and Accr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 (3): 420–55.

Quisumbing, Agnes R., Ellen Payongayong, and Keijiro Otsuka. 2004. "Are Wealth Transfers Biased against Girls?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d Inheritance and Schooling Investment in Ghana's Western Reg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86,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ivision, Washington, DC.

Rahman, Sanzidur. 2010. "Women's Labour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1 (2): 318–42.

Ramey, Valerie A. 2009. "Time Spent in Home Productio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New Estimates from Old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9 (1): 1–47.

Raynolds, Laura T. 2001. "New Plantations, New Workers: Gender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Gender and Society* 15 (1): 7–28.

Reskin, Barbara F., and Denise D. Bielby. 2005.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Gender and Career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1): 71–86.

Reskin, Barbara F., and Debra Branch McBrier. 2000. "Why Not Ascription? Organizations' Employment of Male and Female Manag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2): 210–33.

Riach, Peter A., and Judith Rich. 2006.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in the English Labor Market."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6 (2): 1–20.

Rijkers, Bob. 2011. "Non-Separability and Labor Demand in Rural Non-Farm Enterpris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Robb, Alicia, and John Wolken. 2002. "Firm, Owner, and Financing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between Female- and Male-Owned Small Businesse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Working Paper 2002-18,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Washington, DC.

Robinson, John P., and Melissa Milkie. 1997. "Dances with Dust Bunnies: Housecleaning in America." *American Demographics* 19 (1): 37–42.

Ronde, Kahliya. 2008. "Nederland deeltijdland (maar alleen voor vrouwen)." *Kennislink.nl*, February 13.

Sabarwal, Shwetlena, Katherine Terrell, and Elena Bardasi. 2009. "How Do Female Entrepreneurs Perform? Evidence from Three Developing Region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Saint Paul, Gilles. 1996. *Dual Labor Markets.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aito, Katrine A., Hailu Mekonnen, and Daphne Spurling. 1994. "Rai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Women Farmers in Sub-Saharan Afric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30, World Bank, Africa Technical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Schelling, Thomas C. 1971. "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 (2): 143–86.

Schmidt, Manfred G. 1993. "Gendered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Families of Nations: Patterns of Public Polic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d. Frances G. Castles. Brookfield, V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Schwartz Cowan, Ruth.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Skoufias, Emmanuel. 1993.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Intrafamily Time Allocation in Rural Households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0 (2): 277–310.

Smith, Nina, Valdemar Smith, and Mette Verner. 2006. "Do Women in Top Management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A Panel Study of 2500 Danish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55 (7): 569–93.

SOAS and others. 2008. Due and Gladwin 1991.

Srivastava, N., and R. Srivastava. 2009. "Women, Work, and Poverty Interlinks in Rural In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AO-IFAD-ILO Workshop on Gaps, Trends and Current Research in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Rome, March 31.

Stevenson, Lois A. 1986. "Against All Odds: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Wome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4 (4): 30–6.

Terrell, Katherine. 1992. "Female-Male Earnings Differentials and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1 (4–5): 387–404.

Tiruneh, Addis, Teklu Testfaye, Wilfred Mwangi, and Hugo Verkuijl. 2001.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cision-Making among Smallholders in Ada, Lume, and Gimbichu Woredas of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Ethiopia.* Mexico, DF, and Addis Ababa: 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 and Ethiop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Tzannatos, Zafiris. 2006. "Monitoring Progress in Gender Equality: The Labor Market in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Udry, Christopher. 1996. "Gen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Househo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5): 1010–46.

Udry, Christopher, John Hoddinott, Harold Alderman, and Lawrence Haddad. 1995. "Gender Differentials in Farm Productivity: Implications for Household Efficiency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Food Policy* 20 (5): 407–3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9. *2009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Women's Control over Economic Resources and Access to Financial Resources, including Microfinanc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2010. *The World's Women 2010: Trends and Statistic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Habitat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7. *Policy Makers Guide to Women's Land, Property and Housing Rights across the World.* Nairobi: UN-Habitat.

UN Millenium Project. 2005. *Taking Actio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ing Women.* London: Earthscan.

Vanek, Joann. 1973. "Keeping Busy: Time Spent in Housework, United States, 1920–1970." Sociology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argas Hill, Ruth, and Marcella Vigneri. 2009. *Mainstream Gender Sensitivity in Cash Crop Markets Supply Chai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Verheul, Ingrid, André van Stel, and Roy Thurik. 2006. "Explaining Female and Male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Country Level."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8 (2): 151–83.

von Bülow, Dorthe, and Anne Sørensen. 1993. "Gender and Contract Farming: Tea Outgrower Schemes in Keny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56: 38–52.

Watkins, David S., and Jean Watkins. 1984. "The Female Entrepreneur: Background and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hoice, Some British Data."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 (4): 21–31.

Weinberger, Catherine J. 1998. "Race and Gender Wage Gaps in the Market for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37 (1): 67–84.

Welter, Friederike, and David Smallbone. 2003.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erprise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Small Fi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A Reader,* ed. David A. Kirby and Anna Watson. Aldershot, UK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Whitehead, Ann. 2009.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on Af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es and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Liberalization: Towards "Embedded Liberalism?"* ed. Shahra Razavi. New York: Routledge.

Wilde, Elizabeth Ty, Lily Batchelder, and David T. Ellwood. 2010. "The Mommy Track Divides: The Impact of Childbearing on Wages of Women of Differing Skill Levels." Working Paper Series 165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Williams, Mariama. 2003. *Gender Mainstreaming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 Handbook for Policy-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Wood, Robert G., Mary E. Corcoran, and Paul N. Courant. 1993. "Pay Differences among the Highly Paid: The Male-Female Earnings Gap in Lawyers' Salar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3): 417–41.

World Bank. 2005. *Making Rural Roads Work for Both Men and Women: Promising Approaches to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7. *The Environment for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 *Reducing Gender Based Differences in Formality and Productiv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a. *Arab Republic of Egypt: Gender Assessment 2010: Narrowing the Gap, Improving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Egyp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b. *Indonesia Jobs Repor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c. *Women'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the Formal Private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Focus on Entrepreneurship.*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0d. *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Measuring Legal Gender Parity for Entrepreneurs and Workers in 128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Forthcoming. *Regional Study on Gende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inking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Intra-household Dynamic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0. *Promoting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The Learning Journey of Bekorp.*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10. *Gender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Services: Insights from India, Ghana, and Ethiop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第 6 章

6

全球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已产生的效果及所需采取的措施

世界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随着人口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加快和信息获得渠道的拓宽，原先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转化为日益深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技术发展迅速改变了人们学习、工作和交流的方式。世界人口日益集中到大中城市。

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新力量通过市场、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运作，消除促进性别平等的限制因素，这些新力量被理解为经济一体化、技术扩散和信息获得渠道得到拓宽等因素的联合。

首先，贸易开放度和新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已经转化为更多的工作机会，众多女性与市场联系的加强，拓宽了她们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在某些国家和领域，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也增加了。

第二，性别不平等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成本更高。性别不平等会降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对那些在潜在出口商品或服务领域中女性就业率很高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鉴于全球女性权利意识的日益加强，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会损害一国的国际声誉。这些因素强化了世界范围内采取政策行动推进性别平等的动力。

第三，信息渠道的畅通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活等状况提供了便利，其中包括与女性角色相关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转型也已经得到推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经济赋权加强了这种趋势。

但是在缺少公共政策的情况下，仅靠全球化不足以降低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尽管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许多国家许多女性的能动性和获得经济机遇的机会，进步的浪潮并没有使人人受益。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女性常常是最受既有限制因素限制的女性。这也是那些希望完全利用全球化作为发展力量的潜力和性别平等扩大的国家有必要采取以消弭禀赋、能动性和经济机会获得为目标的政策行动的原因所在。

本章对经济一体化、技术变革和信息获得对性别不平等影响的证据予以讨论。本章参考了大量文献，在存在知识欠缺时，本报告委托有关人士做了新的工作。这些新的工作以贸易

领域性别不平等[1]、技术变革及其扩散[2]和信息获得[3]为重点。现有论据是贸易和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影响的最有力论据。至少在经济学文献中，这些论据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影响的新趋势的影响最弱，因此，讨论是试探性的、推测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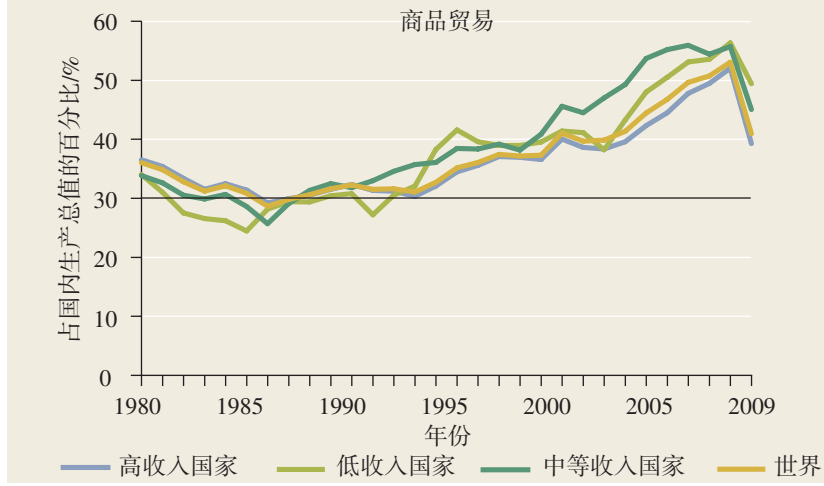
世界日益一体化：近期趋势与事实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世界经历了巨大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型是由全球商品和服务、技术和信息流动的日益增长引起的。这些变革已经引起了国内和全球市场和制度运作的方式的转型，从而改变了个体、家庭、公司和政府的经济环境。下述一些数字显示了这些变革的重要性。

中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从 1993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1%上升至 2008 年的 57%，同时反映了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的扩大（见图 6.1）。[4]所有地区的贸易开放度都提高了，尤其是南亚和东亚，南亚的商品贸易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增加至 41%，东亚的商品贸易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增至 52%。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变化也非常大，外国直接投资（FDI）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0.5%上升到 4%，但在近期的金融危机中，这一比例降低了。

随着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信息和知识成了全球性商品。嵌在贸易商品中的技术变革跨境流动加速了技术的推广和适用性。而且尽管技术转移首先出现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随着公司互动和工人变换工作，技术传播迅速超越了进出口的领域。[5]同样，随着国际移民潮中技术移民的增多（从 1990 年的 25%到 2000 年的 36%），观念和技术也从一国流向另一国。

图 6.1　1990 年以来全球贸易迅速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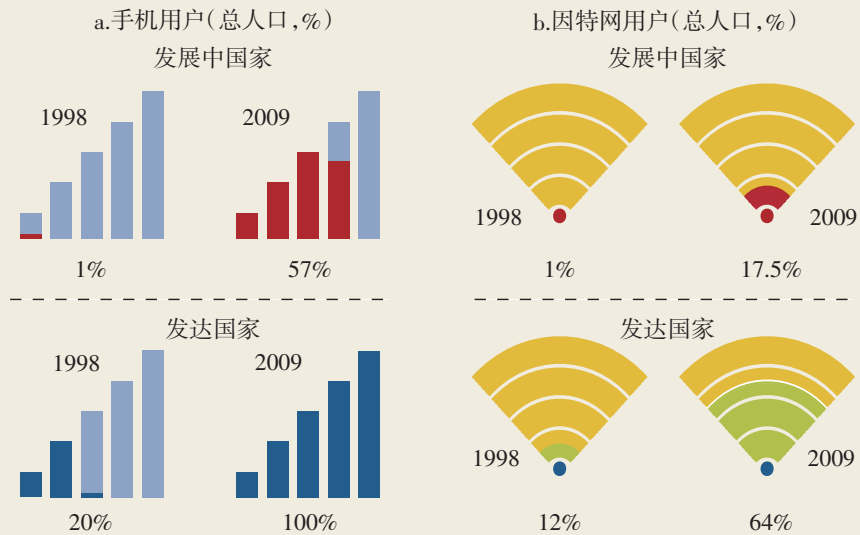
得益于手机和因特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获得了全球的、国内的和地方的信息。1998 年，拥有手机的发达国家人口只占 20%，发展中世界人口只占 1%。到 2009 年，该比例分别攀升至 100%和 57%。因特网的普及和使用也增加了。高收入国家的因特网用户从 1998 年占人口的 12%增加至 2009 年的 64%，发展中国家的因特网用户从几乎为零增加至 17.5%（见图 6.2）[6]。

这些变化是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增长（也可能促进了这些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即使近期发生了食品、燃料和金融危机。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国家的年人均收入以平均 5%或高于 5%的速度持续增长 15 年。但是此后，35 个国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其中四分之三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7]

贸易开放度和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拓宽了女性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贸易开放

图 6.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手机与因特网使用都增加了



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 2010。

度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扩大了经济机遇。

出口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行业领域对女性工人的需求增加了，而随着女性填补到这些新的工作岗位上，领域间和国家间的就业性别分布发生了变化。女性脱离了农业，转入到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业中。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是发展中国家女性（和男性）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就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这反映了生产和劳动力全球分布的更广义领域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就业的女性比例在全球就业女性中的比例分别从 1987 年的 6% 和 17%增加至 2007 年的 7%和 24%。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女性比例在全球就业女性中的比例从 1987 年的 12%降低至 2007 年的 6%，而同期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女性比例从 44%增加至 46%（见图 6.3）。[8] 男性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相似，但是程度不同。

同时，信息通信技术的提高降低了信息壁垒和与市场工作相关的交易成本，从而给全世界女性（和男性）以持续增加的人数进入市场创造了条件。由于时间和流动限制因素对女性的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女性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受益更大（见第 4 章和第 5 章）。

获得经济机遇可能性增大，在某些情况下，经济活动收益提高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这可能增加对女孩和青年女性——未来工人技能的投资（见专栏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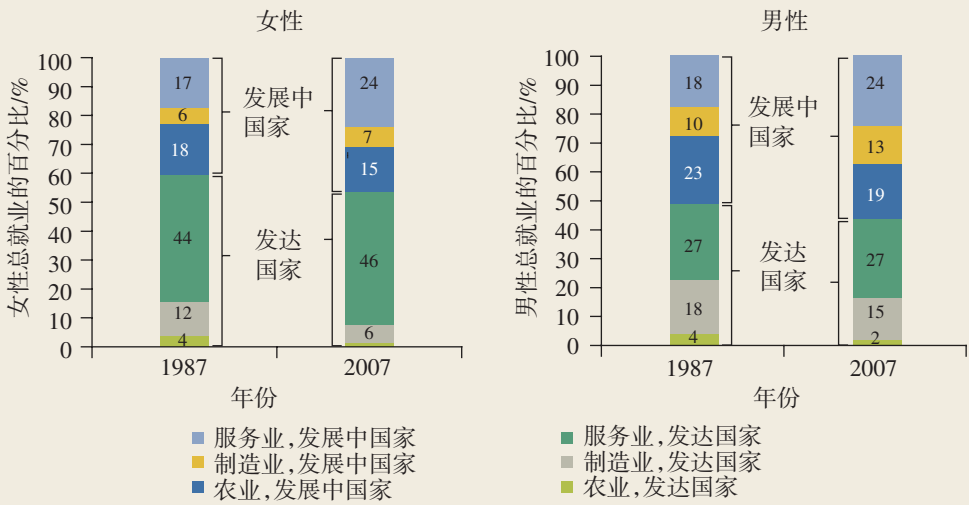
对女性工人的需求

早期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特征是纺织和信息技术制造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9] 制造业中的新就业机会常常包括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线工作，在不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具有基本制造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国家中，制造业就业的优势最大。

生产活动地理位置的改变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和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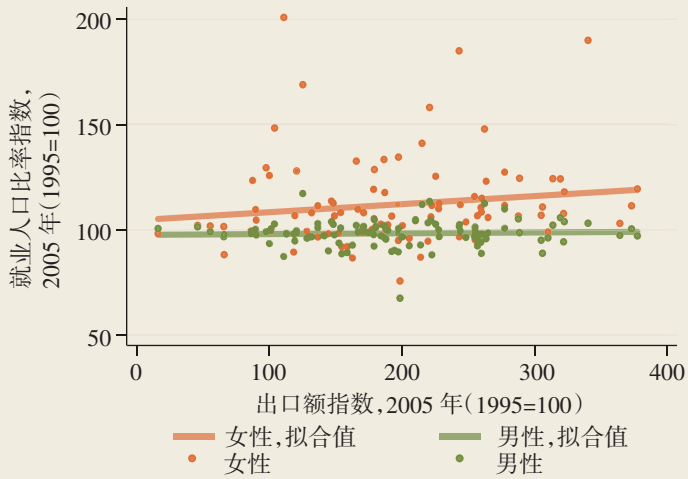
图 6.3　经济机遇发生了变化

图 6.3a　发展中国家女性（和男性）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就业迅速增长，这反映了生产和劳动力在全球分布中更广义领域内的变化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的估测值。

图 6.3b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女性（而非男性）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的增长相关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世界发展指标的估测值。

业就业的女性化，在亚洲和中美国家尤其如此。[10] 在韩国，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从 1970 年的 6%增加至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的 30%左右。此后，制造业在韩国女性劳动力就业中的重要性降低了（2007 年降低到 14%），但是制造业雇佣的女性人数依然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0 倍。同样，在墨西哥，制造业中的女性就业人数从 1960 年的 12%增加至 2008 年的 17%，2008 年的人数是 1960 年的 10 倍。[11]

在过去的 15 年中，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扩大了服务产品的贸易，也在较小的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增长。结果，就业从工作可被自动化的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工作任务更

专栏 6.1 经济机遇增加对女性人力资本的影响：今天的工作或明天更好的工作

全球化影响并不局限于现在的女性工人，加强技能的强大经济动因也可以促进提高未来几年青年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研究文献中，对教育是否有经济回报、期待的回报是多少对教育决策的影响予以了较大的关注。而对不存在义务教育法律或义务教育法贯彻不力、大量青年人口不到学校就读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关注。但是家庭和个人的确会增加教育投资，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a] 而回报较高的前景对女孩产生的影响更大（见第 3 章）。

预计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导向型领域就业机会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工作机会的增加会强化已有的促进教育投资的动力。在印度，信息技术形成的服务中心（主要是呼叫中心）带来的工作机会使儿童的入学登记率增加了 5.7%。英语语言学校可以解释所有这些变化，这与新的工作机会与具体技能，比如讲英语，[b] 相联系的观念一致。南非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据。[c]

由于贸易开放度和技术变革引起的变化给女性工人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给男性带来的利益，所以女孩和青年女性去学校读书的动力要强于男孩和青年男性。例如，在印度农村地区，业务流程外包招募和就业安排服务增加了年轻女孩的就业，但是对年纪较长的女性或任何年龄段的男性没有影响。在招募服务覆盖的村庄里，5~15 岁的女孩到学校就读的比例比其他村庄高出 3~5 个百分点。男孩则没有变化。[d]

a. Foster 和 Rosenzweig 1996；Jensen 2010b。
b. Oster 和 Millet 2010。
c. Levinsohn 2004。
d. Jensen 2010a。

加复杂，与客户和顾客的直接互动更为普遍，对装配线熟练技术工的需求让位于对计算机文化熟悉的工人的需求。

随着技术的进步，轻工制造业中的低技能女性常常被男性取而代之。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马来西亚女性在制造业工人中的比例占 80%，但是到 1987 年，该比例下降至 67%，此后该比例持续下降。[12] 拉丁美洲也是这样，随着不同环节生产的自动化，轻工制造业中，尤其是电子制造业中的低技能女性工人失去了工作。[13]

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服务，尤其是银行业、保险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信息处理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却不是由那些在制造业中丢失了工作的女性承担，这是因为新的工作要求不同的技能，包括录入、英语，有时候也包括法语技能。在巴巴多斯岛、牙买加和菲律宾，女性在数据录入和处理中的就业一开始是最高的。[14] 后来，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工作集中到软件、呼叫中心和地理信息系统，聚集在马拉西亚、印度，尤其是德里和孟买，这些地方的呼叫中心雇佣的人数超过 100 万人，大多数是女性。[15]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贸易出口，女性就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也超过其他领域。而且尽管许多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领域的女性就业一开始在女性总就业中的比例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业迅速增长，出口在女性就业中的重要意义开始凸显。

全球农业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农作物出口的比例降低了，而非传统和高附加值商品（比如园艺业、花艺、高蛋白肉楼和加工食品）的出口迅速增加。非传统和高附加值商品出口的扩张是由冷藏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的降低、作为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买家的超市的增长等推动的，它们的扩张已经创造了一系列的工作机会。[16]

但是在农业经济体中，出口引起的就业女性化并不普遍。传统农产品出口增长带给男性的利益大于女性，这是因为女性种植经济作物的可能性较低，而当传统女性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发展为经济作物时，女性又会被排除出去。[17] 相比之下，非传统和高附加值出口商品刺激了女性在出口生产活动中的就业增长，尽管这一影响因国家和产品而异。[18] 在智利和南非，新增加的女性就业主要是临时性和季节性就业，[19] 而在哥伦比亚和肯尼亚，女性常常在花艺业中实现长期就业。[20]

女性在出口生产中较高的就业率常常（但并不总是）伴随着工资收益。和地方公司及生产在国内市场上销售

的产品的公司相比，跨国公司和出口公司可能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同时，跨国公司和出口公司使其工人免受经济周期不良影响能力也可能较强，其工人可能更好地受到劳动立法的保护，更有可能加入工会组织，因此，他们有资格获得利益。[21] 这就是即使对工人特征进行了控制之后，和其他领域相比，出口领域的女性工人工资通常较高[22]、工资性别差异较低的原因所在。来自中国的证据显示，在新兴出口导向型工业中工作的女性工人，其所得的工资收入高于在老的国家工业中工作的女性工人。[23] 在 1990 年至 1995 年期间，墨西哥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增长伴随着性别工资差异的缩减。[24] 而孟加拉国和摩洛哥在自由化早期阶段，出口纺织业中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低于其他制造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纺织业中针对女性的工资歧视进一步下降。[25]

然而在某些地方，开放度的提高对工资性别差异的影响微不足道，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获益只是暂时性的。[26] 在韩国，开放度提高的影响微不足道，甚至是扩大了性别差异。来自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的数据表明，新兴出口加工业领域的工资水平高于地方工资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会缩减。[27] 在发达世界，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探讨（见专栏 6.2）。

脑力还是体力？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信息通信技术转变了经济活动组织，相对于体力（手工）和常规技能，对脑力劳动（认知）和非常规技能的需求增加了，相应的其回报也增加了（见专栏 6.3）。[28] 以美国为例，1950 年至 2005 年期间，脑力任务增加了，体力任务减少了。[29] 促进这一转变的因素是经济体的职业结构组成的变化，例如每 100 名工人中医生的数量增加了，每 100 名工人

专栏 6.2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男性（和女性）的影响

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也对发达国家的工人产生了影响。熟练工人从经济一体化中受益，有时候是以牺牲欠熟练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它增加了对熟练工人的需求，这是相对于欠熟练工人而言的。在美国，这种转变深化了工资不平等的程度，在欧洲，由于劳动市场管理条例阻止降低欠熟练工人的工资，这种转变提高了欠熟练工人的失业率。[a]

由于男性集中在最受国外竞争和生产向发展中世界转移的工业和行业中，经济一体化深化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对女性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美国，制造业 12%~33%的就业损失是由贸易开放度的提高造成的，技能溢价约 20%的提升是由贸易开放度的提高造成的。[b] 技术变革也是促成技能溢价增加的重要原因。关于贸易对女性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的证据正反不一。[c]

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的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工作也可能提高了工作的不安全性。在英国，在外资很高的领域中工作的工人更有可能汇报工作不安全性较高。[d] 美国在服务业领域或有可能成为贸易行业的职业中工作的工人既表达了工作安全性不高的顾虑，也表达了希望强化政府安全网的较强烈的意愿。[e]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革的影响延伸到经济领域之外。随着女性经济机会的增多和男性居于主导地位领域中工作的消失，男性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观念受到了挑战。这些变化常常导致家庭内部权力平衡的调整。

a. Freeman 1994；Wood 1995。
b. Baily 和 Lawrence 2004；Bivens 2004；Bivens 2006；Harrison，McLaren 和 McMillan 2010；Lawrence 2008。
c. Black 和 Brainerd 2004；Wood 1991。
d. Scheve 和 Slaughter 2004，
e. Anderson 和 Gascon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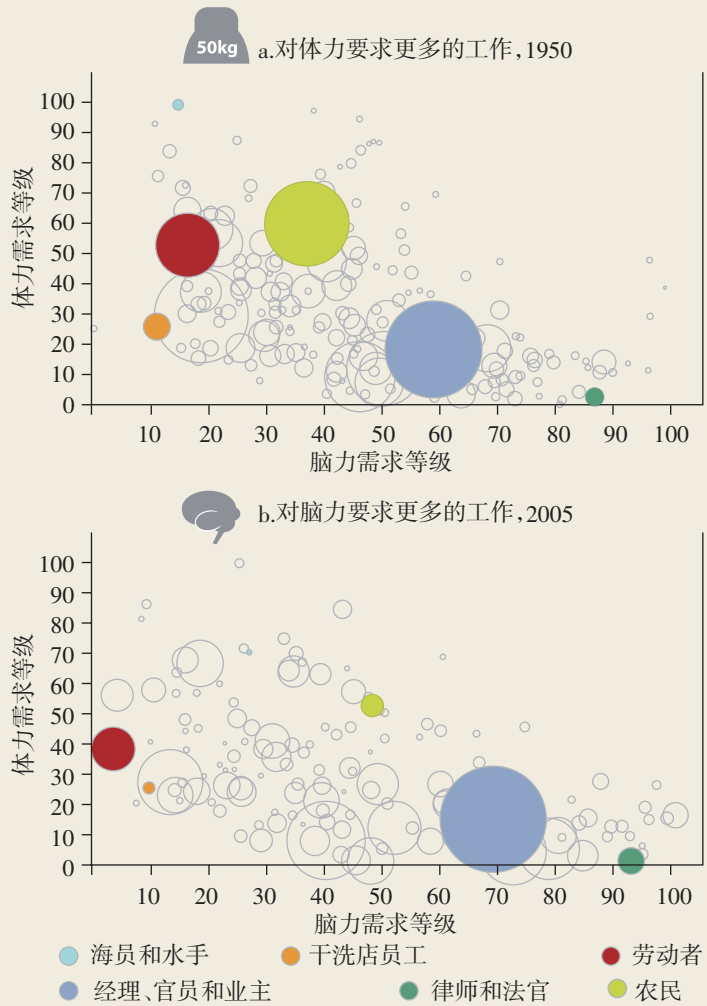
专栏 6.3　行业任务和技能要求：正确理解术语

特定行业的工作可以分解成不同的任务，每一种任务都以其智力或体力要求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标准化为特征。本处讨论使用“认知/手工”和“脑力/体力”这两组词来描述某项工作主要是智力的还是体力的，这两组词可以替换使用。同样，能够实现标准化的工作被视为常规工作，不能实现标准化的工作被称为非常规工作。这些选择反映了在描述技术变革对行业技能要求的影响时文献所使用的术语。

手工和常规认知任务均为明确的任务，也就是说，它们很容易实现程序化，可以由计算机以可行的经济成本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一特征使得这些任务可以由计算机资本来替代工资费用。[a] 相比之下，非常规和认知任务不明确，程序化不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容易实现计算机化。

a. Levy 和 Murnane 1992。

图 6.4 1950 年至 2005 年期间，美国对脑力劳动的需求大幅度上升，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下降



资料来源：Rendall 2010。

中生产线操作员的数量减少了。具体行业的变化，例如生产线操作员中机器人技术应用的增加，同样促进了这种转变。就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加而言，这些转变提高了对女性工人的需求。

图 6.4 描述了这些变化。图中圆圈代表不同的行业，1950 年至 2005年期间这些圆圈的变大或变小取决于这一时期这一行业雇佣的员工数量是增加了（律师和法官）还是降低了（农民）。同样，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移动代表某一特定行业对脑力劳动需求的变化，而从上到下的运动则描述了对体力劳动需求的变化，这里以从 0 到 100 的等级对需求进行衡量。随着 1995 年至 2005 年期间对脑力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对体力劳动需求的下降，大多数圆圈向下、向右移动。关于信息通信技术和电脑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需求的影响，其他发达国家也具有类似的证据。[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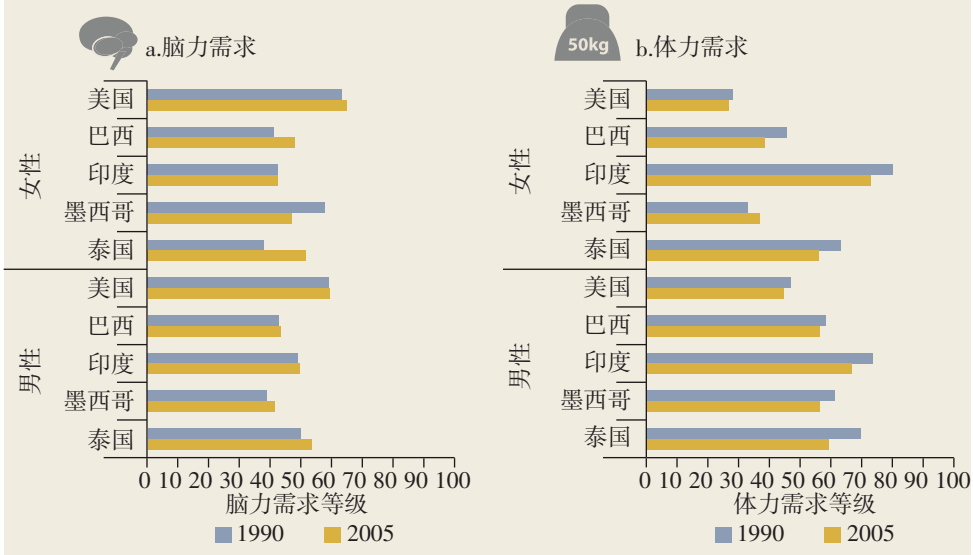
传统上，男性到要求更高体力的行业和职业中就业的可能性一直高于女性（男性具有体力优势）。因此，通过降低体力技能的重要性，电脑有利于女性，即使女性并不比男性更具使用计算机或获得电脑技能的优势。来自美国和德国的证据对这一观点予以支持。信息通信技术和工作场所计算机化对脑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需求的持续增加是过去几十年中这些国家可见女性工人需求量、女性劳动力参与和女性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31] 此外，脑力劳动相对于体力劳动回报的增加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这两国工资性别差异缩减的重要原因。[32]

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技术变革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世界的转移及其采纳和适应，发展中国家对脑力劳动的需求及其回报同样应当增加。

关于这一问题的数据非常有限，[33] 但是为撰写本报告而开展的新工作提供了巴西、印度、墨西哥和泰国在 1990—2005 年期间的支持性证据。[34] 和 1950 年时的美国相比，这四个国家 1990 年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大大高于对脑力劳动的需求。但是此后，随着农业就业相对重要性的降低和经济行业结构发生了相关变化，对男女两性的脑力劳动需求增加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减少了，这些差异也随之减少了。

在巴西、墨西哥和泰国，和男性

图 6.5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度的男性和女性，尤其是女性经历了对脑力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对体力劳动需求的降低



资料来源：Rendall 2011。

比较，女性一开始多在对体力要求较低的行业中就业，而在印度，由于女性大量在农业中就业，对男女两性的体力要求基本相当。在巴西、印度和泰国，对女性脑力要求的增加快于男性。相比之下，在墨西哥，女性在对技能要求较低的组装工厂中就业的增加意味着在女性中，对脑力的要求降低了，对体力的要求则有所增加（见图 6.5）。[35]

> “计算机正在向全世界普及，没有电脑知识，你就会落伍。所以我现在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
>
> ——不丹青年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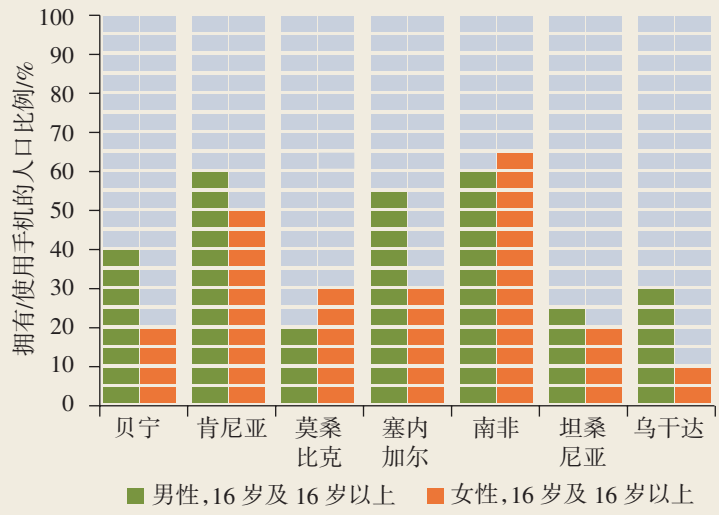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供给与回报的变化也缩减了这些国家的工资性别差异，尽管这种影响变化很大。巴西和印度 1990 年至 2005 年期间女性和男性之间可见工资差异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变化引起的。尽管墨西哥的工资性别差异有所增加，但是脑力劳动回报的增加缓解了差异的扩大。在泰国，由于男女两性在这些领域和行业中的分布相当平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供应与回报的变化不能解释工资性别差异的变化。[36]

更密切的联系和更对称的信息：信息通信技术扩大了女性的市场准入

通过降低时间和流动限制因素引起的交易成本，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市场工作参与率。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价格和其他信息的搜集和传播，增加了经济活动发生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由于和男性相比，女性受到的流动性和时间限制更大（见第 4 章和第 5 章），所以女性从这些发展中受益更多。

这里强调手机和因特网，这是因为手机和因特网是工作场所之外最普遍的信息通信技术，而且它们的覆盖率将持续地、迅速地增加。

图 6.6 在非洲，女性拥有或使用手机的可能性低于男性



资料来源：www.ResearchICTafrica.net。

移动手机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移动手机普及率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手机普及率差异迅速缩减。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内部，手机获得和使用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在青年人之间尤其是这样，但是在低收入国家，性别差异依然很大，拥有移动手机的女性比男性低 21%。在非洲，这一数字增至 23%（见图 6.6），在中东，这些数字增至 24%，在南亚，这一数字增至 37%。[37]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特网准入和使用的差异仍然非常大，而在某些国家，性别差异问题严重。在有数据可考的国家中，因特网的人口普及率在丹麦的 90%和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 10%之间波动。此外，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差异很大，而且这似乎和国家的总体准入水平无关，这些国家包括卢森堡、塞尔维亚、瑞士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男性和女性因特网准入的差异超过了 10 个百分点（见图 6.7）。

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中，迄今为止手机应该比因特网发挥更大的转型作用。然而在这些国家，无论是手机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和经济机会获得的整体影响还是性别差异影响，证据的分散和缺少令人惊讶。大部分信息来自案例研究，其中许多是非洲和南亚的案例。

通过增强女性协调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关系，降低现金转移的成本，减少获得信息所需付出的体力劳动或来回周折（包括为获得信息或接待客户而进行的无果奔波），手机的获得和使用缓解了时间和流动限制因素对女性的约束。[38] 在塞内加尔，女性渔商认为手机方便了她们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沟通，降低了旅行的时间和成本，在她们出外时方便了她们与家庭的联系。[39] 同样，在玻利维亚、埃及、印度和肯尼亚接受采访的女性中，41%的女性声称拥有一部手机增加了她们的收入和经济机会。这对女性企业家的影响要高得多：女性企业主声称，女性企业主使用移动手机获得收入的可能性是非企业主的 2.5 倍，而且和其他女性相比，她们更愿意使用通过手机接受现金转移通知等服务（63%对 41%）。[40] 最后，这里强调的是获得经济机会，而实际上移动手机的影响要广泛得多（见专栏 6.4 和第7 章）。

在许多情况下，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愿意降低其他用品的开支来获得一部手机，这表明，手机带来的可见收益要高出成本，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手机是家庭收入的 3.5%。玻利维亚、埃及、印度和肯尼亚 34%的农

> “每个人都使用手机，甚至是市场女性等等。例如，她们的货物到了，供货商只是给她们打个电话通知。”
>
> ——利比里亚青年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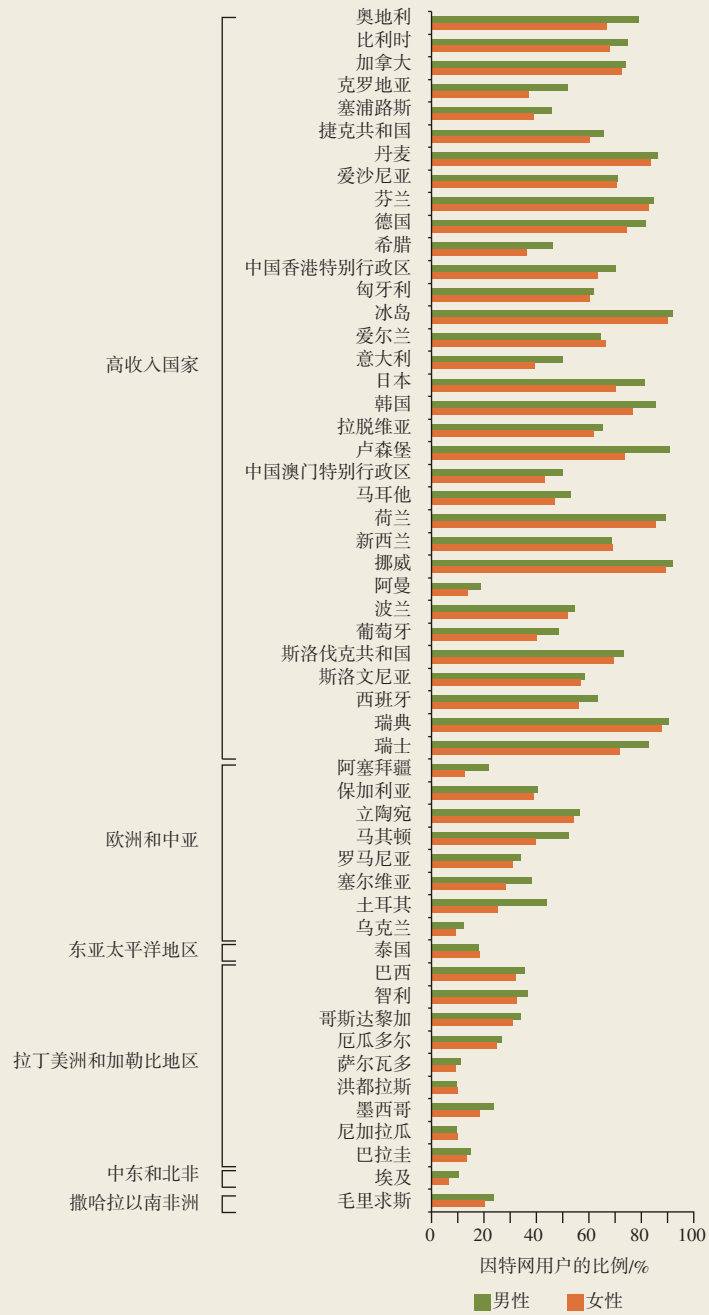
村女性将用于其他用品的开支重新分配到手机上，相比之下，所有接受调查的女性的比例是 20%，从事有酬工作的女性的比例是 12%。

缩减使用手机的性别差异将使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3 亿名额外女性受益。鉴于女性构成了移动手机三分之二的未开发市场，它也为移动运营商创造了 130 亿美元的额外收入。[41]

因特网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发展中世界因特网普及率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限制了因特网对获得经济机会产生影响，超出了之前讨论的信息通信技术对外包和服务出口外包的影响。政府和发展机构设立了公用乡村“电信中心”，通常是收费服务，增加不能得到足够服务的人群获得基本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机会。这些中心通常提供联网的电脑，可以用于文字处理、画图、发传真、发电子邮件、复印影印和充当电话线。中心也可能有设备培训的职能，某些中心还纳入了广播或视频资源。

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评估，评价这些中心是否有力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地方社区女性企业家的发展存在着困难，但是事实证据显示了一些积极的影响。[42] 在喀麦隆，纺织业 50%的女性企业家称她们使用这些中心的行业用途和社会用途，赞扬这些中心在商业相关沟通中的作用。[43] 但是考虑到设立和维护这些电信中心的高额成本，我们需要更多的确凿证据，证明它们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和获得市场机会的影响。在其他地方，一群女性企业家已经开始利用因特网直接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在摩洛哥，以家庭为基地的女性编织工使用因特网销售小地毯和其他纺织品，和传统的基于中年男性的体系相比，保持了更高的利润率。[44]

图 6.7　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因特网准入与使用的差异仍然很大，而且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性别差异仍然很大



资料来源：全球电信/信息通信技术指标数据库。

相比之下，在高收入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允许人们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工作，换句话说，允许人们以更灵活的方式工作，从而降低了市场工作的交易成本。家庭电脑系统和补充性电信设备普及率的提高，以及

专栏 6.4 利用移动和信息通信技术改善服务提供

移动手机、因特网和较为传统的通信技术（比如广播）正在为信息传播、更好地服务边远地区或服务水平不足地区及流动性较低的群体提供新的平台。由于女性在这些群体的比例过高，她们能够从这些倡议中获得较高的收益，即使这些倡议并不是针对女性所发起的。

大部分实验是在银行、卫生和教育领域开展的。举例如下：移动电话技术为金融服务提供了渠道，例如处理现金转移和小额支付、促进储蓄等（肯尼亚的手机支付系统 M-PESA）。文本信息为女性和卫生工作者提供了产前和产后护理、营养（美国和俄罗斯联盟实行的婴儿四篇 Text4Baby）、卢旺达的快速短信息服务以及治疗等的宝贵信息。某些项目允许与用户的互动，包括定制化服务（秘鲁的 Wawabet）。而且某些卫生服务已经和其他工商联合发挥作用，提高储蓄，用以支付产前护理和分娩的费用（肯尼亚与手机支付系统 M-PESA 配合使用的 Mamabika 计划）。移动手机和因特网也有助于提高识字率（巴基斯坦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Mobilink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扩大远程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准入（肯尼亚的社区护士）。

除获得服务外，移动手机和因特网对加强女性之间及她们与社区的联系（墨西哥的 Zumbido 项目和塞内加尔的 Tostan 项目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高她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话语权提供了便利（科索沃的 Mobilise 项目）。

这些倡议大多数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得到评估。进一步说，这将对了解在某一具体环境中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很重要，对继续实验从而完全利用新技术的潜力很重要。

资料来源：Franklin 等 2006；GSMA 发展基金 2010；Kanwar 和 Taplin 2001；Lester 等 2010；Melhem，Morrell 和 Tandon 2009。

设备和宽带服务价格较低使得运营成本较低，这些都刺激了远程办公（或远程工作）的发展。2009 年，美国 26%的工人完全或经常性地采用远程办公方式。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欧盟远程办公几乎翻了一番，在所有工人中的比例增加至 9%。这种趋势似乎反映了广泛领域中的实践。来自荷兰的数据显示，2003 年至 2007 年期间，公司雇佣远程办公工人的比例翻了一番。[45]

在这个意义上，对那些时间限制因素约束力更大，尤其是对那些家庭中有孩子的女性而言（见第 5 章），远程工作可以产生较大的性别影响。欧洲有 7%的工作女性声称她们经常远程办公，相比之下，经常远程办公的男性的比例是 12%。这些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男性就业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域，远程办公更为普遍。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有数据可考的欧洲国家中，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女性远程办公的增长都比较快，这表明女性利用更灵活的工作安排的意愿或愿望更强（见图 6.8）。

以家庭为基地的远程工作在其他发展中区域的推广非常有限。即使在孟买和吉隆坡这样活跃的城市中，远程工作的覆盖率也只有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工作中就业的工人的 0.4%~1.0%。这种低水平可能同时反映了女性对基于制度的远程工作的偏好和管理层的考虑。在马拉西亚，信息通信技术公司的管理者声称与员工面对面的互动是基本的需要，在印度，管理者也表达了直接监管员工的偏好。[46]

适应还是坐失良机?

贸易开放度、技术扩散和信息获得渠道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经济中各国之间互动和互相竞争的方式。由于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性别（和其他）不平等问题造成了更高的成本，这些变化可能转化为公司和政府转而支持性别平等的更强烈的动力。具体来讲，在女性生产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中，市场准入的性别差异和持久性的就业性别分割可能严重削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最终损害经济增长。

国际社会要求国家赋予并执行女性权利的压力日益增长，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这种经济现实。这一方面的国际行动转化为国际组织的协议，主要是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等发起的。继而是要求这些国家正式遵守这些协议的强大国际压力，将遵守这些协议列为更广泛贸易和其他经济协议的直

接或间接组成部分来实现。

下一部分讨论的证据（尽管有限）显示，这种由全球化促成的要求提高性别平等程度的国内外压力，对过去几十年的取得进步是有贡献的。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性别）歧视的成本在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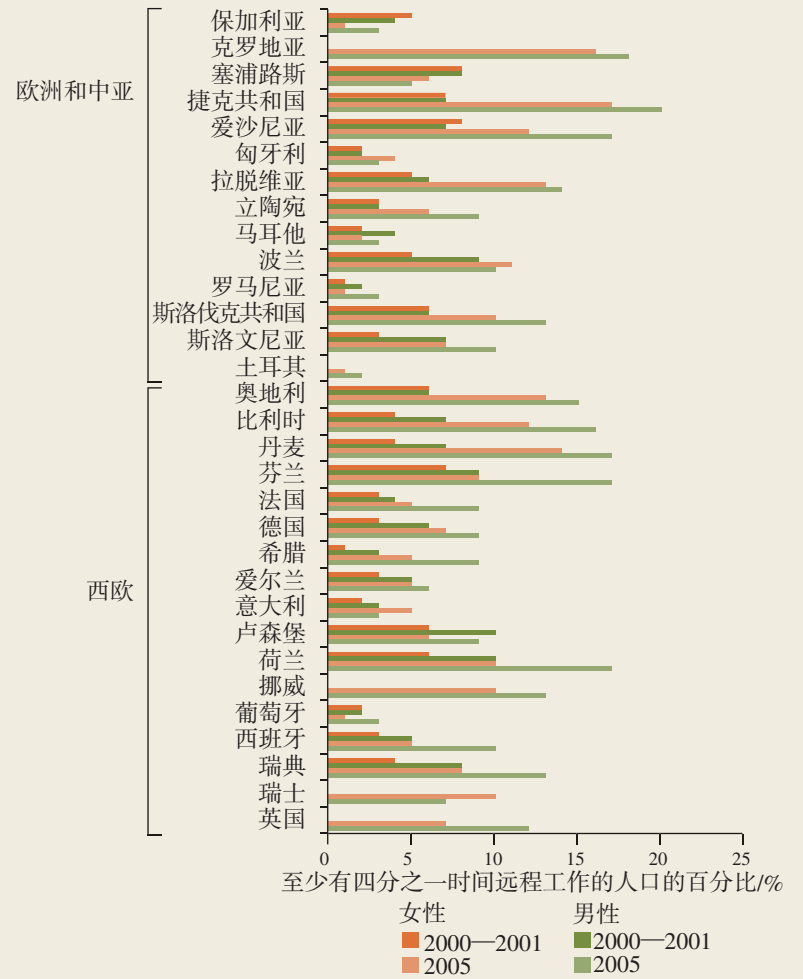
经济理论认为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强应当降低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上的歧视。[47] 换句话说，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使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这应当迫使雇主降低成本高昂的性别（和其他）歧视。[48] 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数据的支持，其时，贸易竞争的加剧使集中行业中的女性工资得到了相对提高，这表明尽管存在顾虑，即这种降低也反映了（以牺牲欠熟练工人为代价的）偏重技能熟练型女性工人的就业结构变化，贸易仍然通过降低公司的歧视能力使女性受益。[49]

就贸易开放度如何影响性别平等而言，起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整体贸易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样重要。[50] 本报告开展的新的工作显示，在女性或劳动密集型工业（见图 6.9）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由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雇佣了大量女性工人，性别歧视会给开放贸易造成更高的成本。这类产品生产具有劣势的国家则相反。此外，女性的地位应当不仅仅对贸易额产生影响，而且短期内对贸易伙伴也产生影响。[51]

事实上，在那些女性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中，性别平等的程度似乎较高，反之亦然。在女性劳动力参与较高、生殖率较低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女性劳动力密集的领域的产品出口的比例也较大。具体来讲，从低平等（三项选择指标中任一项指标都在最底端）向高平等的移动使那些女性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女性密集型领域）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多增加 1~2 个百分点（和那些女性就业比例较低的领域（非女性密集型领域）相比）[52]。即使将性别平等和贸易作为一种双向关系来理解，这种影响依然存在。

而且，在女性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中，生育率比较低，而且在较小程度上，女性劳动力参与度和教育水平比较高。例如，从女性密集度不高的出口中（分布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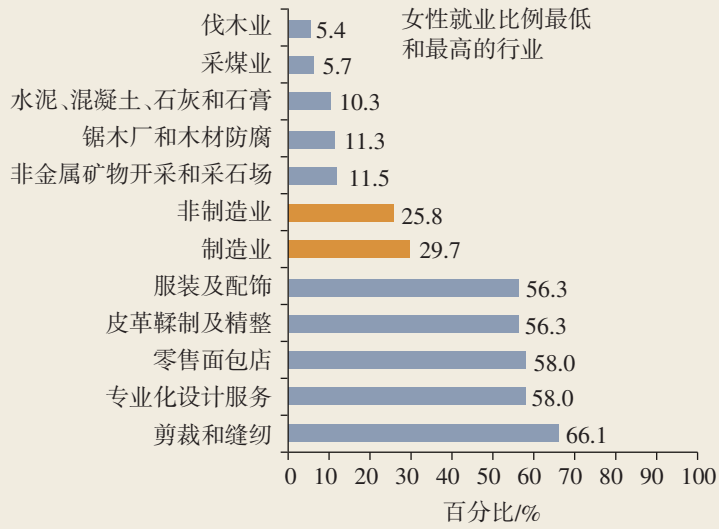
图 6.8　近年来远程工作，尤其是女性工人的远程工作迅速增长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 2000 年，2001 年和 2005 年欧洲工作条件调查得出的估算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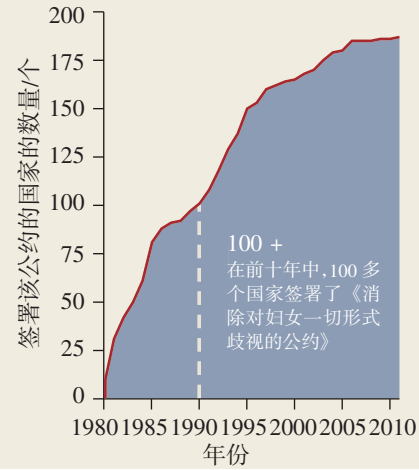
注：2000—2001 年关于挪威、瑞士、土耳其和英国的数据缺失。

图 6.9 不同行业中女性就业比例的差别很大



资料来源：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图 6.10 2011 年，所有地区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的国家的数量都增加了，在 193 个国家中，187 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



资料来源：《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

底端的四分之一）转向女性高度密集（最顶端的四分之一）将使每位女性的分娩次数降低 0.21，或全球总生育率降低约 10%。[53] 和以往一样，影响的衡量是在对性别平等和贸易的反向因果进行控制后进行的。

为撰写本报告而开展的新的研究具体强调贸易和劳动力参与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他分析者在对工资的作用（即工资是低成本生产比较优势的源头）进行研究后，认为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国家，低工资（特别是女性低工资）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维系竞争力的手段。[54] 然而，尽管发展中国家出口公司的工资常常低于发达国家公司支付的薪金，但是和地方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工作机会相比较，其工作水平通常还是较高（见结尾部分的讨论）。

在理解贸易开放度如何影响性别平等时，比较优势的性质很重要，这对政策具有启示意义。自 197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领域中女性劳动力的比例增加了约 10%，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持续传播，预计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例会继续增加。而且和女性就业比例低的行业相比，女性就业比例高的行业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大部分出口相关的就业发生在这些领域。因此，如果不采取行动取缔市场准入的壁垒因素，在女性密集型商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全球市场上遭遇竞争者时，将丢失自己的地盘。

同行竞争压力和国际社会的胡萝卜与大棒政策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性别平等和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此起草了一些独立的国际条约及几个目的更广泛的、包含有非歧视条款的经济协议。这些公约和协议也促进了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性别平等的立法行动。

最突出的国际公约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197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公约。截至 2011 年 8 月，187 个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共有 193 个）参与了该公约（见图 6.10）。当时还没有参与该公约的国家有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帕劳、索马里、南苏丹、苏丹、汤加和美国。国际劳工组织第 100 号公约（简称《同酬公约》）和第 111 号公约（《关于消除就业和行业歧视的公约》）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批准。

这些协议和公约已经成为监管和提倡非歧视待遇的首要国际工具，协议和公约的正式批准已经在促进赋予女性在几个领域的正式权利的进展中发挥了推动作用，这部分是通过推动立法工作来实现的，无论是法律不存在还是既有法律因具有歧视性而需要被废除。[55] 一些证据显示，参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提高了女性的识字水平、劳动率参与率和在议会的席位，在某些情景下还降低绝对性别不平等的程度。[56] 但是法律改革，无论对确保女性的完全平等多么必要，在缺少充分执行力时（见第 4 章），常常并不足以确保性别平等，因此应当以持续的努力保证事实改革。

贸易和其他经济协议是刺激推进性别平等国内行动的第二国际压力渠道。这些协议文件常常包括反歧视社会条款，协议将一国获得经济利益与遵守某些最低标准联系在一起。贸易协议就是这样，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经济区会员资格获得管理协议也是这样，例如欧盟。就执行力而言，这些协议比国际公约具有优势，这是因为基于经济考虑，某些情况潜在的制裁威胁可能促进原本不情愿的国家接受和执行某些最低标准。例如，在贸易更开放的国家中，女性的经济权利更高，强迫劳动的发生率也较低。[57]

来自发达国家媒体和消费者的压力也可以促使跨国公司改善其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条件。例如，柬埔寨、萨尔瓦多和印度尼西亚在出口纺织业和服装业中工作的正式工人（大多数是女性）的工资和非工资工作条件（例如工作时长、事故、合同特征、工作环境和其他福利）都处于或好于经济中的平均水平。[58] 同样，印度尼西亚的“抵抗血汗工厂运动”迫使外资和出口公司大幅度提高了工资，给公司造成的成本表现为投资降低、利润下降和小工厂倒闭的几率升高等，但是对就业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59]

对那些被排斥在正规就业之外的人而言，工作条件依然是严峻的挑战（见专栏 6.5）。最后，解决问题还需要对不同的策略加以组合，这里，不同的策略包括贸易协议中的社会条款、公司的行为准则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

专栏 6.5　全球化和工作条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更需要进一步的行动

在公众的观念里，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与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恶劣等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的公共舆论常常将全球化与童工普遍、工人被剥夺了大部分基本权利的血汗工厂相联系。人们常常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受到的伤害尤其大。工人愿意接受这类工作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他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又被全球化给破坏了。

事实上，贸易自由化对工作条件的影响因公司、行业和国家而异。在某些情景下，贸易开放和经济一体化推动采纳了较高的工作标准，对正式工人而言尤其是如此。例如，柬埔寨、萨尔瓦多和印度尼西亚出口纺织业和服装业领域正式工人的工资和非工资工作条件都相当于或超过了经济领域的平均水平。[a] 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似乎也和女性经济权利的改善和强迫劳动发生率的降低联系在一起。[b]

然而在其他情境下，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是保持低成本的广域战略的组成部分。在分承包安排下进行生产的地方公司的工作条件不会受到监管，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尤其面临着这样的条件，而且由于女性在非正规领域比例过高，她们尤其容易受到伤害。[c] 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在分承包公司工作的工人面临着工作安全不确定、利益几乎完全缺失以及基本上不存在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可能性等问题。但是在许多情景下，在分承包公司的工作是女性唯一在不违背家庭责任或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有酬就业的途径。[d]

a. Robertson 等 2009。
b. Neumayer 和 De Soysa 2007。
c. Carr 和 Chen 2004。
d. Balakrishnan 2002。

“体面工作”方法。根据社会条款，出口国政府而不是主导全球生产体系的公司要承担维护工人权利的义务。行为准则将负担放在公司身上，但是它们同时是自愿的，可能不能约束涉足出口商品生产的分包商或其他行为者的行为。最后，国际劳工组织意在使政府、公司和工人共同参与，但是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只有对话和说服。[60] 因此，三者的组合可能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

全球化也可以促进性别角色和性别规范的平等化

全球化引起的变化，尤其是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经济机会和信息的变化，也可以对既有性别角色和规范产生影响，并最终促进更为平等的观念。和前一部分相比，关于这一效应的证据比较有限，试探性较强，但是（我们认为）本着进一步促进这方面工作的精神，这些证据足以值得在这里进行一些讨论。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时间和资源分配产生影响，改变家庭中的相对权利和在更广泛领域中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女性成为收入赚取者可能可以平衡她们在家庭中改变性别角色的新位置。事实上，通过在出口导向型活动中就业，女性对自身收入的控制力似乎增强了，尽管就对福利和能动性的影响来看，这对在制造业中和远离男性亲属的女性的影响比对农业领域中女性的影响更积极。在工厂中工作的女性感到她们的地位提高了。[61] 和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其他女性相比，她们结婚、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可能更晚，她们的居住条件较好，获得的现代基础设施服务更多。[62] 据悉，她们的自尊心和决策能力也较强，利益惠及家庭的其他成员。[63] 相比之下，商业化和出口导向的增强（即使代表性“女性作物”得到促进）并没有使农业女性的决策能力或能动性发生较大的变化。[64]

> “我希望（比我母亲）好一点儿。在她们的时代，她们没有接受教育，不了解她们周围的世界。现在，我们有因特网和其他媒体。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好地做事情。”
>
> ——苏丹青年女性

在经济领域之外，主要由电视机和因特网的普及引起的信息传播也使发展中国家许多女性了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女性的角色，这可能对性别角色和结果产生影响（见第 4 章）。例如在巴西，无所不在的肥皂剧打破了社会阶级的范例，环球电视台的出现（播映许多深受欢迎的巴西肥皂剧的电视频道）降低了生殖率，这是以 15~49 岁年龄段女性生育的数量来衡量的。[65] 这一效果是结婚效果的十分之一，相当于每 1 000 名人口增加了 1 个医生或护士，或相当于两年额外教育。换句话说，影响非常大。

同样，来自印度农村地区的证据显示村民对性别的态度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而发生了变化。[66] 和其他女性相比，可以获得有线电视服务的女性较少表现出男孩偏好或认为丈夫打妻子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与女性地位相关的传统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女性的自主性增强了（不需要征得允许就可以到外面去或参与家庭决策），生育率降低了。而对巴西的研究发现这种影响非常大。例如，有线电视使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的态度和行为差异降低了 45%~70%。有线电视很快就产生了影响，在有线电视引入的第一

年就看到了效果。

有趣的是，这里讨论的证据显示，在某些情景下信息披露可以引起巨大的、迅速的变化，这和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和能动性的标准观念多少有点儿抵触。该发现与媒体披露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这些研究发现此类信息披露引起了重大的、迅速的行为变化，例如避孕用具的使用、怀孕、公共厕所建设以及对村庄地位的观念等行为迅速发生了重大变化。[67]

获得经济机会也给公共领域带来了变化。在孟加拉国，成千上万在成衣行业就业的女性扩大了城市公共空间中女性的领地，形成了女性公共流动和获得公共制度服务方面更为平等的社会规范。[68] 在这一过程中，孟加拉国女性不得不重新界定和讨论“深闺”这个概念，对“深闺”的习惯解释是不出现在公共场合、朴素的着装和娴静的气质，相比之下，现在通常将“深闺”重新诠释为一种心理状态。[69]

信息通信技术和获得信息对性别规范的影响，更广义一点，对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利弊不一。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赋予了女性拓宽关系网络的社会和政治能力（见专栏 6.4 和第 8 章）。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积极行动者网络利用因特网提高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公共意识。[70] 但是通过规避而不是解决限制因素，网络结构也允许女性在不是根本上改变她们地方条件或在家庭中角色的前提下成为行为者，换句话说，在平行宇宙中，技术的变革力量是显而易见的。[71] 稳定的个体环境与较强的意识和公共存在之间的拉力可以为进一步变革提供丰厚的土壤。但是，这类变革要求女性获得的因特网服务和其他信息源达到一定的临界值。[72]

老问题，新风险

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并没有惠及所有的人。禀赋、时间使用模式、获得生产性投入的机会以及能动性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有时候削弱了全球化的积极影响，偶尔还加剧了男性和女性以及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即使在那些因获得了更多经济机会而受益的人群中，旧的性别就业分割模式也会发生。某些国家、行业和职业（正规）就业中出现的“去女性化信号”和非正规就业的增加一起表明，某些收益可能是不持续的。

因此，要想充分利用全球化促进发展、提高性别平等的潜力，国家就有必要采取公共行动消弭能动性、禀赋和获得经济机会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当“旧的”差异遭遇新的趋势，弱势女性就会被抛在后面

当女性陷入“旧的”性别差异（禀赋、可用时间、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机会和能动性等方面的差异）和全球化引起的新力量的交集中时，她们就会远远落后于那些成功从贸易开放、技术变革和信息扩散中受益的男性和女性。

首先，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限制了女性获得新经济机会的能力。在农业中，教育除了对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外（见第 5 章），教育对农民接受改良种子、化肥[73]，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农民与产出标准及其他进入非传统、高价值出口领域的决定因素接轨的能力具有影响。由于教育水平较低，索马里、莫桑比克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女性生产者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遭遇的限制因素高于男性生产者。[74] 教育和技能不足也

阻碍了女性进入服务领域中的出口和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行业就业。

教育分类根据性别划分也对女性到与信息通信技术直接相关的行业中就业造成了限制，例如电脑程序员、工程师、系统分析师和设计师（见第 3 章）。[75] 来自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就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很小，而在领域内部，女性在管理、科研和专业岗位上的比例过低，在办公室和文秘岗位上的比例过高。[76] 由于信息通信技能是技术发展的推动力量，这些领域的增长和就业有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这些差异非常重要。

第二，如果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可以承担照料责任，照料责任的性别差异可以阻碍女性抓住出口领域的新农业机遇和工资机遇。当新的机遇在大农场或正规领域兴起，较长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作日程会得到额外的奖赏时，就更是如此。对厄瓜多尔切花产业、危地马拉的出口加工领域、肯尼亚的非传统高附加值出口产业和马来西亚城乡联系的研究均显示，家庭中存在其他女性成员是女性参与贸易带来的新机遇的决定因素。[77] 家庭中的其他女性成员可能是可以承担外出工作，但是，是将应承担的责任交给母亲或年龄较大的女儿的情况下。关于在家庭中重新分配家务活儿或照料责任的环境及其价格，我们所知甚少。[78]

第三，女性薄弱的土地财产权和获得生产性投入的有限能力也限制了她们从贸易开放中受益的能力。对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为出口大宗产品的非洲而言，这一问题尤其严重。[79] 塞内加尔 59 位种植法国菜豆的农民中，只有一位是女性 [80]，而在肯尼亚的梅鲁，90%以上的出口合同是由男性家庭成员签署的。[81]

> “这里有裁剪工作和刺绣工作，但是有电脑技能的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还没有为女性提供技能培训的机构。”
>
> ——阿富汗成年女性

第四，关于流动和女性在经济领域中角色的保守性别规范可以严重影响女性获得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和更广泛的信息能力。在家里，男性常常是家庭收音机、移动手机和电视的管理者，决定其他家庭成员可以什么时候、怎样使用这些产品。[82] 在工作中，男性可以决定女性操作犁形铲雪机或电脑不是应该学习的技能。即使是以女性为目标对象的技术方案，一旦其功效和利润确立起来，男性也可以被指派进去。因此，确实能够获得技术的女性并不能看到经济效益。[83]

鉴于发展中国家私营因特网连接的数量依然不高，女性获得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的能力也受到公共因特网中心地理位置的影响。如果因特网中心位于与居民区距离很远且不安全的地段，女性光顾因特网中心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除安全因素外，如果服务是在女性不可能到访的环境和机构中提供的，或男性和女性需要共享同一场所，女性获得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的能力也会被禁止。在 2000 年的研究中，72%的阿拉伯因特网女性用户宣称她们最喜欢的因特网使用场所是家庭。[84]

女性获得的收益是可持续的吗？新产业和行业中的分割

某些领域和行业就业的“去女性化信号”，和对女性在出口导向型领域非正式就业增长的顾虑一道，引起了非出口领域的可见分割是否在新的产

业和行业中兴起的顾虑。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出口领域的生产以两种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公司进行资本重组，采用基于普遍化而不是基于专业化设备的生产系统，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密集型技术转移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其次，通过降低成本、缩短从订货到交货的时间和生产线差异化，公司重新组织生产，使之更加灵活。[85] 在竞争压力加剧和信息通信技术传播的推动下，这些变化促进了出口导向型领域就业的“去女性化”和信息化。

在许多情况下，资本重组降低了欠熟练工人，主要是女性工人的就业机会。据观察，男性具有使用新的广义技术的教育和技能，而女性则会被推到较小的分承包公司里去。然而，由于许多国家的教育性别差异迅速降低，阻碍女性从生产向技能密集型产品升级和转移中受益的因素尚不明确。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内容和非正式技能（包括具体领域的经验和获得的工作培训）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86]

提高生产灵活性的努力扩大了非正式工作安排的普遍性，对女性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87] 在印度，尽管出口增长很快，女性在产业就业中的比例却下降了（从 1989 年至 1990 年的 21.3% 降低至 1994 年至 1995 年的 17.5%），将工作分承包给以家庭为基地的工人和以计件工资为生产基础的小生产者与这一现象有关。[88] 尽管更灵活的工作选择可以允许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这类安排的优势需要与它们对工资和其他利益的潜在负面影响进行比较评估。[89]

在某些情况下，较高的灵活性也会导致较高的失业和工作不稳定性。在土耳其，女性从出口领域创造的净就业机会性别差异中受益，女性就业的波动性比男性更大。[90] 同样，在柬埔寨，在受到保护较小的领域中就业的工人工作任期较短，在正规领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这些差异只是暂时性的，不受性别的影响。[91]

关于这些趋势，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意识到就业性别分割的旧模式在新兴产业和行业中迅速兴起。因此，一开始看起来是对劳动力市场既有性别角色的突破，却被证明为短暂的偏离。而且，随着（出口）公司通过资本重组和更新工人所用设备沿价值链向上移动，女性就业分割似乎产生了，同时伴随着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

玻璃杯是半满还是半空？世界需要采取公共行动

那么，从本章的讨论中，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证据显示，对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女性而言，出口领域的就业机会是很有诱惑力的选择。[92] 这些工作赋予女性为增加家庭收入贡献力量的能力、增加了她们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权利，为她们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有时候这些工作也给她们提供了参与她们原本没机会参与的政府和社区支持性项目的机会。[93] 因此，即使工作本身存在负面的属性，但工作也有许多积极方面，而且和其他选择相比，女性仍然愿意选择这些工作。

例如，印度尼西亚女性认为在大型的、出口导向型的工厂工作是受尊敬的工作，因为和国内非出口领域和地方服务领域的工作相比，这些工作报酬较高，工作条件也较好。尽管受过教育的女性希望到非体力服务领域就业（例如教育和旅游），但是大型出口导向型工厂的工作似乎为她们提供了最好的短期过渡期。[94] 同样，尽管

全球生产中女性农业工人（尤其是那些从事灵活非正式工作的人）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女性工人仍然表达了在众多选择中对这类工作的厚爱。[95]

但是禀赋、可用时间、获得的生产性投入和能动性等性别差异的持续存在及就业性别分割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可以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会中完全受益。而且即使在确实从中受益的女性群体中，残留的差异（主要是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差异），仍然有待消弭。

只要这些差异存在，单单全球化不能（也将不会）消除性别不平等。因此，对那些希望充分利用全球化促进发展、提高性别平等的国家而言，消除性别差异的公共行动非常关键。鉴于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成本日益攀升，这类公共行动刻不容缓。

本章小结：全球化具有促进性别平等的潜力

所见所闻

贸易开放、技术变革和扩散、信息渠道的拓宽等释放出来的力量消除了某些实现性别平等的限制因素。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而且常常是最受既有限制因素约束的女性被甩在后面。

为什么我们的所见是这样？

获得的经济机会增多了

贸易开放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传播增加了女性获得经济机遇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也增加了她们相对于男性的工作。出口和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领域的增长、体力重要性的降低和认知技能重要性的上升一道，增加了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通过缓解时间和流动限制因素，信息通信技术也拓宽了女性农民和企业家进入市场的路径。

行动动机更加强烈

几个因素和更加全球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共同强化了提高性别平等的行动动机。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性别不平等的成本更高，这是因为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一个专门从事女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尤其如此。国际同行压力也迫使更多的国家批准参与反对歧视的公约，而媒体披露的增加和消费者给予工人更好待遇的要求推动了跨国公司给女性工人提供更公平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

转变性别角色和社会规范

主要由电视和因特网使用范围扩大引起的所获信息的增加允许国家去了解其他地方的生活和社会规范，这种知识可以改变观念并最终促进人们采纳更平等的态度。通过促进性别角色的改变，允许新近获得权利的女性对时间分配、家庭内部相对权力转变施加影响并更广泛地发挥能动性，女性经济赋权强化了这一进程。

政策启示

在公共政策缺失时，单单全球化不能也将不会消除性别不平等。尽管许多国家的许多女性的能动性和获得的经济机会均大幅度增加，某些领域的差异依然很大。对那些希望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潜力促进发展、提高性别平等的国家而言，消除禀赋、能动性和获得经济机会等方面性别差异的公共行动非常关键。

注释

1. Aguayo-Téllez 2011；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2. Jacobsen 2011；Rendall 2011。
3. Sassen 2011。
4. 世界银行 2010。
5. Aguayo-Téllez，Muendler 和 Poole 2010。
6. 国际电信联盟 2010。
7. Stern，Dethier 和 Rogers 2005。
8. 本计算使用的数据来自 51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希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波多黎各、圣马力诺、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和美国。发展中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埃及、塞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和委内瑞拉。

9. Fontana 2009。

10. Baden 和 Joekes 1993；Pearson 1999；Standing 1999；Wood 1991。

11. Wood 和 Mayer 2001。

12. Mitter 2000。

13. Nanda 2000。

14. Mitter 2000；Pearson 1998。

15. Mitter 2000。

16. Barrientos，Kabeer 和 Hossain 2004。

17. von Braun，Johm 和 Puetz 1994；Wold 1997。

18. Arizpe 和 Aranda 1981；Barndt 1999；Barrientos 等 1999；Barrón 1994；Collins 1993；Dolan 和 Sorby 2003；Thrupp，Bergeron 和 Waters 1995。

19. Barrientos 等 1999；Barrientos 和 Kritzinger 2003。

20. Dolan 和 Sorby 2003；Thrupp，Bergeron 和 Waters 1995。

21. 国际劳工组织 2002。

22. Davin 2001；Fernández-Kelly 1983；Kabeer 2000；Lim 1990。

23. Davin 2001。

24. Artecona 和 Cunningham 2002；Berik 2000；Ghiara 1999。

25. Bhattacharya 1999；Belghazi 1997，摘自 Joekes 1999a。

26. Berik，van der Meulen Rodgers 和 Zveglich，Jr. 2003；Seguino 1997；Seguino 2000。

27. Fussell 2000；Ver Beek 2001。

28. Borghans 和 ter Weel 2004；DiNardo 和 Pischke 1997；Entorf，Gollac 和 Kramarz 1999；Krueger 1993；Lee 和 Kim 2004。

29. Rendall 2010。

30. Black 和 Spitz-Oener 2010。相关文献强调技术变革（特别是技能偏重型技术变革）对技能需求的影响，技能通常以工人的教育水平来衡量。国际电信联盟和计算机在工作场所的普遍使用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行业中不同任务的相对重要性及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种类，就这个意义上将，两种观念是互为补充。

31. Black 和 Spitz-Oener 2010；Rendall 2010；Weinberg 2000。

32. Bacolod 和 Blum 2010；Black 和 Spitz-Oener 2010。

33. Liu，Tsou 和 Hammit 2004；Ng 2006。

34. Rendall 2011。

35. Ibid。

36. Ibid。

37. GSMA 发展基金 2010。

38. Comfort 和 Dada 2009；Kyomuhendo 2009；Munyua 2009；GSMA 发展基金 2010。

39. Sane 和 Traore 2009。

40. GSMA 发展基金 2010。

41. Ibid。

42. Melhem，Morrell 和 Tandon 2009；Ng 和 Mitter 2005。

43. Yitamben 和 Tchinda 2009。

44. Schaefer Davis 2005。

45. 数据来自 2009 年荷兰统计。http：//www.cbs.nl/en-GB/menu/home/default.htm.

46. Mitter 2000；Ng 2001。

47. Becker 1957。

48. Bhagwati 2004。

49. Black 和 Brainerd 2004；Kongar 2007。

50. 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van Stavaren 等 2007。

51. Do，Levchenko 和 Raddatz 2011。

52. Ibid。

53. Ibid。

54. Seguino 1997；Seguino 2000。

55. Byrnes 和 Freeman 2011。

56. Gray，Kittilson 和 Sandholtz 2006。

57. Neumayer 和 De Soysa 2007。

58. Robertson 等 2009。

59. Harrison 和 Scorse 2010。

60. Barrientos 2007。

61. Hewett，Amin 和 Sen. 2001；Kabeer 1997；Kabeer 2000；Zohir 1998。

62. Hewett，Amin 和 Sen. 2001。

63. Kusago 和 Barham 2001；Zohir 1998。

64. Elson，Evers 和 Gideon. 1996；Katz 1995；von Braun 和 Kennedy 1994。

65. La Ferrara，Chong 和 Duryea 2008。

66. Jense n 和 Oster 2007。

67. Johnson 2001；Kane 等 1998；Pace 1993；Rogers 等 1999；Valente 等 1994。

68. Hossain 2011。

69. Feldman 2009；Kabeer 2000。

70. Adams 2006；Friedman 2005。

71. Sassen 2011。

72. Ibid。

73. Kumar 1994；Saito，Mekonnen 和 Spurling 1994。

74. Carr 2004；Tran-Nguyen 和 Beviglia-Zampetti 2004。

75. Hafkin 和 Taggart 2001。

76. 经合组织 2007。

77. Katz 1995；Kusago 2000；McCulloch 和 Ota 2002；Newman 2001。

78. Fontana 2009。

79. Joekes 1999b；Porter 和 Phillips-Howard 1997；von Bülow 和 Sørensen 1993。

80. Maertens 和 Swinnen 2009。

81. Dolan 2001。

82. Gill 等 2010。

83. Ashby 等 2011；Cecchini 和 Scott 2003；Cecelski 2000。

84. Hafkin 和 Taggart 2001。

85. Barrientos，Kabeer 和 Hossain 2004。

86. Ibid。

87. Barrientos 和 Barrientos 2002；Carr 和 Chen 2004；Standing 1999。

88. Ghosh 2002。

89. Barrientos，Kabeer 和 Hossain 2004。

90. Özler 2007。

91. Eslava 等 2011。

92. Barrientos，Kabeer 和 Hossain 2004；Chiu 和 Lee 1997。

93. Barrientos 等 1999；Barrientos 和 Barrientos 2002；Dolan 和 Sorby 2003；SER–NAM 2001；Venegas Leiva 1992；Venegas Leiva 1993。

94. Chant 和 McIlwaine 1995；Grijns 等 1994。

95. Barrientos，Kabeer 和 Hossain 2004。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dams, Melinda. 2006. "Regional's Women's Activism: African Women's Networks and the African Union." In *Global Feminism: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Organizing, and Human Rights,* ed. Mira Marx Ferree and Aili Mari Tripp 187–21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Aguayo-Téllez, Ernesto. 2011.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and FDI on Gender Inequalities. A Literature Review."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Aguayo-Téllez, Ernesto, Marc-Andreas Muendler, and Jennifer P. Poole. 2010. "Globalization and Formal Sector Migration in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38 (6): 840–56.

Anderson, Richard G., and Charles S. Gascon. 2007. "The Perils of Globalization: Offshoring and Economic In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7–004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St. Louis.

Arizpe, Lourdes, and Josefina Aranda. 1981.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Women's Disadvantages: Women Workers in the Strawberry Export Agribusiness in Mexico." *Signs* 7 (2): 453–73.

Artecona, Raquel, and Wendy Cunningham. 2002.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Gender Wage Gap in Mexico."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2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shby, Jacqueline, Maria Hartl, Yianna Lambrou, Gunnar Larson, Annina Lubbock, Eija Pehu, and Catherine Ragasa. 2008. *Investing in Women as Driver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colod, Marigee, and Bernardo S. Blum. 2010.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U.S. "Residual" Inequality and the Gender Gap."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5 (1): 197–242.

Baden, Sally, and Susan Joekes. 1993. "Gender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Open Area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Women in the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May 15.

Baily, Martin Neil, and Robert Z. Lawrence. 2004. "What Happened to the Great U.S. Job Machine? The Role of Trade and Electronic Offshoring."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211–70.

Balakrishnan, Radhika, ed. 2002. *The Hidden Assembly Line: Gender Dynamics of Subcontracted Work in a Global Economy.* Bloomfield, CT: Kumarian Press.

Barndt, Deborah, ed. 1999. *Women Working the NAFTA Food Chain: Women, Food & Globalization.* Toronto: Sumach Press.

Barrientos, Armando, and Stephanie Ware Barrientos. 2002. "Extending Social Protection to Infor-

mal Workers in the Horticulture Global Value Chain."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16, World Bank,Washington, DC.

Barrientos, Stephanie. 2007. "Gender, Codes of Conduct, and Labor Standards in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 In *The Feminist Economics of Trade,* ed. Irene van Stavaren and others. London: Routledge.

Barrientos, Stephanie, Anna Bee, Ann Matear, and Isabel Vogel. 1999. *Women and Agribusiness: Working Miracles in the Chilean Fruit Export Sector.*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Barrientos, Stephanie, Naila Kabeer, and Naomi Hossain. 2004.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Policy Integration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7,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eneva.

Barrientos, Stephanie, and A. Kritzinger. 2003. "The Poverty of Work and Social Cohesion in Global Exports: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n Fruit." In *What Holds Us Together. Social Cohesion in South Africa,* ed. David Chidester, Phillip Dexter, and Wilmot James. Cape Town: HSRC Press.

Barrón, Antonieta. 1994. "Mexican Rural Women Wage Earner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Strategic Silence: Gender and Economic Policy,* ed. Isabella Bakker. London: Zed Books.

Becker, Gary S. 1957.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ghazi, S. 1997. "Rethinking the Viability of a Low Wage Export Strategy in Morocco." Focus on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Gender Programme Newsletter No. 3,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Geneva.

Berik, Günseli. 2000. "Mature Export-Led Growth and Gender Wage Inequality in Taiwan." *Feminist Economics* 6 (3): 1–26.

Berik, Günseli, Yana van der Meulen Rodgers, and Joseph E. Zveglich Jr. 2003. "Does Trade Promote Gender Wage Equity?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Working Paper Series 372, The Levy Economic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Annandale-on-Hudson, NY.

Bhagwati, Jagdish. 2004. *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hattacharya, Debapriya. 1999. "The Post-MFA Challenges to the Bangladesh Textile and Clothing Sect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eneva, July 12.

Bivens, L. Josh. 2004. "Shifting Blame for Manufacturing Job Loss: Effect of Rising Trade Deficit Shouldn't Be Ignored." Briefing Paper 149,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2006. "Trade Deficits and Manufacturing Job Loss: Correlation and Causality." Briefing Paper 171,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Black, Sandra E., and Elizabeth Brainerd. 2004. "Importing Equality?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7 (4): 540–59.

Black, Sandra E., and Alexandra Spitz-Oener. 2010. "Explaining Women's Succes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Skill Content of Women's Work."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2 (1): 187–94.

Borghans, Lex, and Bas ter Weel. 2004. "Are Computer Skills the New Basic Skills? The Returns to Computer, Writing and Math Skills in Britain." *Labour Economics* 11 (1): 85–98.

Byrnes, Andrew, and Marsha A. Freeman. 2011. "The Impact of the CEDAW Conventions: Paths to Equality. A Study for the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arr, Marilyn, ed. 2004. *Chains of Fortune: Linking Women Producers and Workers with Global Markets.*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Carr, Marilyn, and Martha Chen. 2004. "Globalization, Social Exclusion and Gender."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3 (1–2): 129–60.

Cecchini, Simone, and Christopher Scott. 2003. "C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Lessons from Rura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10 (2): 73–84.

Cecelski, Elizabeth. 2000. *The Role of Women in 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 Golden, CO: 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Chant, Sylvia, and Cathy McIlwaine. 1995. *Women of a Lesser Cost: Female Labour, Foreign Exchange and Philippine Development.* London: Pluto Press.

Chiu, Stephen W. K., and Ching Kwan Lee. 1997. "After the Hong Kong Miracle: Women Workers under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37 (8): 752–70.

Collins, Jane L. 1993. "Gender, Contracts and Wage Work: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in Brazil's São Francisco Valle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4 (1): 53–82.

Comfort, Kazanka, and John Dada. 2009. "Rural Women's Use of Cell Phones to Meet Their Communication Needs: A Study from Northern Nigeria." In *African Women and ICTs: Investigating Technology, Gender and Empowerment,* ed. Ineke Buskens and Anne Webb. London: Zed Books.

Davin, Delia. 2001. *The Impact of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on Chinese Women Worke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DiNardo, John E., and Jorn-Steffen Pischke. 1997. "The Returns to Computer Use Revisited: Have Pencils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 To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 291–303.

Do, Quy-Toan, Andrei Levchenko, and Claudio Raddatz. 2011. "Engendering Trad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olan, Catherine S. 2001. "The 'Good Wife': Struggles over Resources in the Kenyan Horticultural Sect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 (3): 39–70.

Dolan, Catherine, and Kristina Sorby. 2003. "Gender and Employment in High-Value Agriculture Industries."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Elson, Diane, Barbara Evers, and J. Gideon. 1996. "Gender-Aware Coun-try Economic Reports: Concepts and Sources." GENCON Unit Working Paper 1,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Manchester, U.K.

Entorf, Horst, Michel Gollac, and Francis Kramarz. 1999. "New Technologies, Wages, and Worker Selec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7 (3): 464–91.

Eslava, Marcela, John Haltiwanger, Adriana Kugler, and Maurice Kugler. 2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Worker Displacement: Evidence from Trade Reforms in Colombi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Feldman, Shelley. 2009. "Historicizing Garment Manufacturing in Bangladesh: Gender, Generation, and New Regulatory Regim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1 (1): 268–88.

Fernández-Kelly, María Patricia. 1983. *For We Are Sold, I and My People: Women and Industry in Mexico's Fronti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ontana, Marzia. 2009. "The Gender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Gender Aspects of Trade and Poverty Nexus: A Macro-Micro Approach,* ed. Maurizio Bussolo and Rafael E. de Hoyos. Washington, DC: Palgrave and McMillan for the World Bank.

Foster, Andrew D., and Mark R. Rosenzweig. 1996. "Technical Change and Human-Capital Returns and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the Green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4): 931–53.

Franklin, Victoria L., Annalu Waller, Claudia Pagliari, and Stephen A. Greene. 2006.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Sweet Talk: A Text-Messaging System to Support Young People with Diabetes." *Diabetic Medicine* 23 (12): 1332–8.

Freeman, Richard B., ed. 1994. *Working under Different Ru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riedman, Elisabeth Jay. 2005. "The Reality of Virtual Reality: The Internet and Gender Equality Advocacy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 Politics & Society* 47 (3): 1–34.

Fussell, Elizabeth. 2000. "Making Labor Flexible: The Recomposition of Tijuana's Maquiladora Female Labour Force." *Feminist Economics* 6 (3): 59–79.

Ghiara, Ranjeeta. 1999.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on Female Wages in Mexico: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7 (2): 171–90.

Ghosh, Jayati. 2002. "Globalization, Export-Oriented Employment for Women and Social Policy: A Case Study of India." *Social Scientist* 30 (11/12): 17–60.

Gill, Kirrin, Kim Brooks, Janna McDougall, Payal Patel, and Aslihan Kes. 2010.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How Technology Can Advance Women Economicall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Gray, Mark M., Miki Caul Kittilson, and Wayne Sandholtz. 2006. "Women and Globalization: A Study of 180 Countries,1975—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2): 293–333.

Grijns, Mies, Ines Smyth, Anita Van Velzen, Sugiah Machfud, and Pudjiwati Sayago, eds. 1994. *Different Women, Different Work: Gender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Indonesia.* Brookfield, VT: Avebury.

GSMA Development Fund. 2010. *Women and Mobile: A Global Opportunity: A Study on the Mobile Phone Gender Gap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London: GSMA and the Cherie Blair Foundation for Women.

Hafkin, Nancy, and Nancy Taggart. 2001. *Gend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Analytical Study.*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rrison, Ann, John McLaren, and Margaret S. McMillan. 2010. "Recent Findings on Trade and Inequality." Working Paper Series 1642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rrison, Ann, and Jason Scorse. 2010. "Multinational and Anti-Sweatshop Activ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1): 247–73.

Hewett, Paul C., Sajeda Amin, and Binayak Sen. 2001.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Garment Work on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In *Growth of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Bangladesh: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ed. Binayak Sen. Dhaka: UPL Publications.

Hossain, Naomi. 2011. "Exports, Equity and Empowerment: The Effects of Readymade Garment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Gender Equality in Bangladesh."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2.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Geneva: ILO.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10. *Measuring the Informal Society.* Geneva: ITU.

Jacobsen, Joyce P. 2011.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ncreasing Gender Equity with a Focus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Jensen, Robert. 2010a.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2010b.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2): 515–48.

Jensen, Robert, and Emily Oster. 2007. "The Power of TV: Cable Television and Women's Status in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330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Joekes, Susan. 1999a. "A Gender-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eneva, July 12.

———. 1999b. "Gender, Property Rights and Trade: Constraints to Africa Growth." In *Enterprise in Africa: Between Poverty and Growth,* ed. Kenneth King and Simon McGrath. London: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

Johnson, Kirk. 2001.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The Modernizing Influences of Television in Rural Indi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3 (2): 147–69.

Kabeer, Naila. 1997. "Women, Wages and Intra-household Power Relations in Urban Banglades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8 (2): 261–302.

———. 2000. *The Power to Choose: Bangladeshi Women and Labour Market Decisions in London and Dhaka.* London: Verso.

Kane, Thomas, T. Mohamadou Gueye, Ilene Speizer, Sara Pacque-Margolis, and Danielle Baron. 1998. "The Impact of a Family Planning Multimedia Campaign in Bamako, Mali."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9 (3): 309–23.

Kanwar, Asha S., and Margaret Taplin, eds. 2001. *Brave New Women of Asia: How Distance Education Changed Their Lives.* Vancouver: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Katz, Elizabeth G. 1995. "Gender and Trade within the Household: Observations from Rural Guatemala." *World Development* 23 (2): 327–42.

Kongar, Ebru. 2007. "Importing Equality or Exporting Jobs? Competition and Gender Wage and Employment Differentials in U.S. Manufacturing." In *The Feminist Economics of Trade,* ed. Irene van Stavaren and others. London: Routledge.

Krueger, Alan B. 1993. "How Computers Have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1984–198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1): 33–60.

Kumar, Shubh K. 1994. *Adoption of Hybrid Maize in Zambia: Effects on Gender Roles,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Kusago, Takayoshi. 2000. "Why Did Rural Households Permit Their Daughters to Be Urban Factory Workers? A Case from Rural Malay Villages."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Development Journal* 1 (2): 3–24.

Kusago, Takayoshi, and Bradford L. Barham. 2001.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Power, and Intra-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in Rural Malaysia." *World Development* 29 (7): 1237–56.

Kyomuhendo, Grace Bantebya. 2009. "The Mobile Payphone Business: A Vehicle for Rural Women's Empowerment in Uganda." In *African Women and ICTs: Investigating Technology, Gender and Empowerment,* ed. Ineke Buskens and Anne Webb. London: Zed Books.

La Ferrara, Eliana, Alberto Chong, and Suzanne Duryea. 2008.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Working Paper Series 63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Lawrence, Robert Z. 2008. *Blue-Collar Blues: Is Trade to Blame for Rising U.S. Income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ee, Sang-Hyop, and Jonghyuk Kim. 2004. "Has the Internet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 Too?" *Labour Economics* 11 (1): 119–27.

Lester, Richard T., Paul Ritvo, Edward J. Mills, Antony Kariri, Sarah Karanja, Michael H. Chung, William Jack, James Habyarimana, Mohsen Sadatsafavi, Mehdi Najafzadeh, Carlo A. Marra, Benson Estambale, Elizabeth Ngugi, T. Blake Ball, Lehana Thabane, Lawrence J. Gelmon, Joshua Kimani, Marta Ackers, and Francis A. Plummer. 2010. "Effects of a Mobile Phone Short Message Service on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Adherence in Kenya (WelTel Kenya 1): A Randomized Trial." *Lancet* 376 (9755): 1838–45.

Levinsohn, James A. 2007.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turns to Speaking English in South Africa." In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ed. Ann Har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y, Frank, and Richard J. Murnane. 1992. "U.S. Earnings Level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A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and Proposed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 (3): 1333–81.

Lim, Linda. 1990. "Women's Work in Export Factories: The Politics of a Cause." In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Women and World Development,* ed. Irene Tin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u, Jin-Tan, Meng-Wen Tsou, and James K. Hammit. 2004. "Computer Use and Wages: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s Letters* 82 (1): 43–51.

Maertens, Miet, and Johan F. M. Swinnen. 2009. "Trade, Standards,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Senegal." *World Development* 37 (1): 161–78.

McCulloch, Neil, and Masako Ota. 2002. "Export Horticulture and Poverty in Kenya." Working Paper Series 174,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U.K.

Melhem, Samia, Claudia Morrell, and Nidhi Tandon.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or Women's Socio-economic Empowerment." Working Paper 17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itter, Swasti. 2000. "Teleworking and Teletrade in India: Combining 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Visio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5 (26): 2241–52.

Munyua, Alice Wanjira. 2009. "Women Entrepreneurs in Nairobi: Examining and Contextualizing Women's Choices." In *African Women and ICTs: Investigating Technology and Gender and Empowerment,* ed. Ineke Buskens and Anne Webb. London: Zed Books.

Nanda, Meera. 2000. "Post-Fordist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e Third World."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4 (1): 25–59.

Neumayer, Eric, and Indra De Soysa. 2007. "Globalization, Women's Economic Rights and Forced Labour." *World Economy* 30 (10): 1510–35.

Newman, Constance. 2001. "Gender, Time Use, and Change: Impacts of Agricultural Export Employment in Ecuador."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Ng, Cecilia, ed. 2001. *Teleworking and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Penang, Malaysia: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Malaysia Southbound.

Ng, Cecilia, and Swasti Mitter, eds. 2005. *Gender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Perspectives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Ng, Ying Chu. 2006. "Levels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Computer Use and Earnings in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90 (3): 427–32.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7.* Paris: OECD.

Oster, Emily, and M. Bryce Millet. 2010. "Do Call Centers Promote School Enrollment? Evidence from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592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Özler, Sule. 2007. "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Micro-evidence from the Turkish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Feminist Economy of Trade,* ed. Irene van Stavaren and others. London: Routledge.

Pace, Richard. 1993. "First Time Televiewing in Amazônia: Television Acculturation in Gurupá, Brazil." *Ethnology* 32 (2): 187–205.

Pearson, Ruth. 1993. "Gender and New Technology in the Caribbean." In *Women and Change in the Caribbean: New Work for Women?* ed. Janet Monsen. London: James Currey.

———. 1998. "Nimble Fingers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Women and Third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Feminist Visions of Development,* ed. Cecile Jackson and Ruth Pearson. London: Routledge.

Porter, Gina, and Kevin Phillips-Howard. 1997. "Comparing Contracts: An Evaluation of Contract Farming Scheme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25 (2): 227–38.

Rendall, Michelle. 2010. "Brain versus Brawn: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Comparative Advantage." Working Paper Series 306, University of Zuri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enter for Institutions, Policy and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Zürich.

———. 2011. "Technic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It Decreased Gender Inequalit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Robertson, Raymond, Drusilla Brown, Gaelle Pierre, and Maria Laura Sanchez-Puerta. 2009. *Globalization, Wages, and the Quality of Jobs: Five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ogers, Everett M., Peter W. Vaughan, Ramadhan M. A. Swalehe, Nagesh Rao, Peer Svenkerud, and Suruchi Sood. 1999. "Effects of an Entertainment-Education Radio Soap Opera on Family Planning Behavior in Tanzani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0 (3): 193–211.

Saito, Katrine A., Hailu Mekonnen, and Daphne Spurling. 1994. "Rai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Women Farmers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 Technical Depart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ane, Ibou, and Mamadou Balla Traore. 2009. "Mobile Phones in a Time of Modernity: The Quest for Increased Self-Sufficiency among Women Fishmongers and Fish Processors in Dakar." In *African Women and ICTs: Investigating Technology, Gender and Empowerment,* ed. Ineke Buskens and Anne Webb. *London: Zed Books.*

Sassen, Saskia. 2011.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ende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Schaefer Davis, Susan. "Women Weavers Online: Rural Moroccan Women on the Internet." In *Gender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Perspectives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ed. Cecilia Ng and Swasti Mitter. New Dehli: Sage Publications.

Scheve, Kevin, and Matthew J. Slaughter. 2004.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4): 662–74.

Seguino, Stephanie. 1997. "Gender Wage Inequality and Export Led Growth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4 (2): 102–32.

———. 2000.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on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4 (4): 437–59.

SERNAM (Servicio Nacional de la Mujer). 2001. *Acuerdos de las Comisiones de la Agro-exportación para Trabajadores y Trabajadoras Agrícolas de Temporada.* Santiago de Chile: SERNAM.

Standing, Guy. 1999. "Global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r: A Theme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27 (3): 583–602.

Stern, Nicholas, Jean-Jacques Dethier, and F. Halsey Rogers. 2005. *Growth and Empowerment: Making Development Happ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hrupp, Lori Ann, Gilles Bergeron, and William F. Waters. 1995. *Bittersweet Harvests for Global*

Supermarkets: Challenges in Latin America's Agricultural Export Boom.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Tran-Nguyen, Anh-Nga, and Americo Beviglia-Zampetti. 2004. *Trade and Gende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Valente, Thomas W., Young Mi Kim, Cheryl Lettenmaier, William Glass, and Yankuba Dibba. 1994. "Radio Promotion of Family Planning in The Gambia."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 (3): 96–100.

van Stavaren, Irene, Diane Nelson, Caren Grown, and Nilüfer Cagatay. 2007. *The Feminist Economy of Trade.* London: Routledge.

Venegas Leiva, Sylvia. 1992. *Una Gota al Día . . . un Chorro al Año. El Impacto Social de la Expansión Frutícola.* Santiago de Chile: LOM Ediciones.

———. 1993. "Programas de Apoyo a Temporeros y Temporeras en Chile." In *Los Pobres del Campo: El Trabajador Eventual,* ed. Sergio Gómez and Emilio Klein. Santiago de Chile: FLACSO/PREALC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Ver Beek, Kurt Alan. 2001. "Maquiladoras: Exploitation or Emancip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Maquiladora Workers in Honduras." *World Development* 29 (9): 1553–67.

von Braun, Joachim, Ken B. Johm, and Detlev Puetz. 1994. "Nutritional Effect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a Woman's Crop: Irrigated Rice in The Gambia." In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utrition,* ed. von Braun and Kenned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von Braun, Joachim, and Eileen Kennedy, eds. 1994.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utri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von Bülow, Dorthe, and Anne Sørensen. 1993. "Gender and Contract Farming: Tea Outgrower Schemes in Keny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56: 38–52.

Weinberg, Bruce A. 2000. "Computer Use and the Demand for Female Worker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53 (2): 290–308.

Wold, Bjorn K., ed. 1997. *Supply Response in a Gender-Perspective: The Cas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ambia.* Reports 97/23. Oslo: Statistics Norway.

Wood, Adrian. 1991. "North-South Trade and Female Labour in Manufacturing: An Asymmet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7 (2): 168–89.

———. 1995. "How Trade Hurts Unskilled Worke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3): 57–80.

Wood, Adrian, and Jörg Mayer. 2001. "Africa's Export Structur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5 (3): 369–94.

World Bank.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Yitamben, Gisele, and Elise Tchinda. 2009. "Internet Use Among Women Entrepreneurs in the Textile Sector in Douala, Cameroon: Self-Taught and Independent." In *African Women and ICTs: Investigating Technology, Gender and Empowerment,* ed. Ineke Buskens and Anne Webb. London: Zed Books.

Zohir, S. C. 1998. "Gender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 Reforms and Adjust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Bangladesh."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U.K.

延伸阅读 3　年龄在增加，身体在发育，时代在发展：青少年男孩和女孩

来自八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社区的 800 名介于 11 岁至 17 岁的男孩和女孩谈论了他（她）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利用、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以及在今天作为一个女孩或一个男孩意味着什么。[1] 意识到当今世界的需求和机会，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很重视教育，希望能得到一份好工作。他（她）们的回答和谈话显示了性别差异在生命中多早的阶段开始显露，期望的性别角色和行为如何渗透到他（她）们日常生活从与父母的关系到彼此的评价等方方面面。这也包括他（她）们对得体行为的界定：好女孩或坏女孩、好男孩和坏男孩是什么样子（见延伸阅读图 3.1）。

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取得优良成绩，这既是好男孩、好女孩的特征，也是他（她）们的主要责任。对女孩而言，在家里帮忙是继学校之后的第二责任。好女孩的其他标志包括个体性格特征，例如温顺的性格、端庄的举止。相反，衣着不端庄、出去时没有配偶陪伴在侧或在外面待到很晚被视为对女孩而言不得体的行为。对男孩而言，抽烟、酗酒和吸毒等冒险行为被视为坏男孩的最主要的特征，而好男孩则被定义为没有这些行为的男孩。

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都很看重教育。接受调查的大多数青少年在接受调查时正在学校读书，印度接受调查的孩子中四分之一的男孩和女孩除外。从一年级到十年级，这些女孩和男孩在不同的年级辍学，其中大多数是在五年级或六年级辍学。女孩辍学后在家里或家庭农业生产中帮忙，男孩辍学后到城市地区做油漆工、木匠或机械工，或者到农村社区做农业工人。

在所有情况下，青少年在学校就读或他们辍学的决定基本上取决于父母对教育的认识。而父母对教育的认识（特别是女儿教育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正如北苏丹红海地区的一位女性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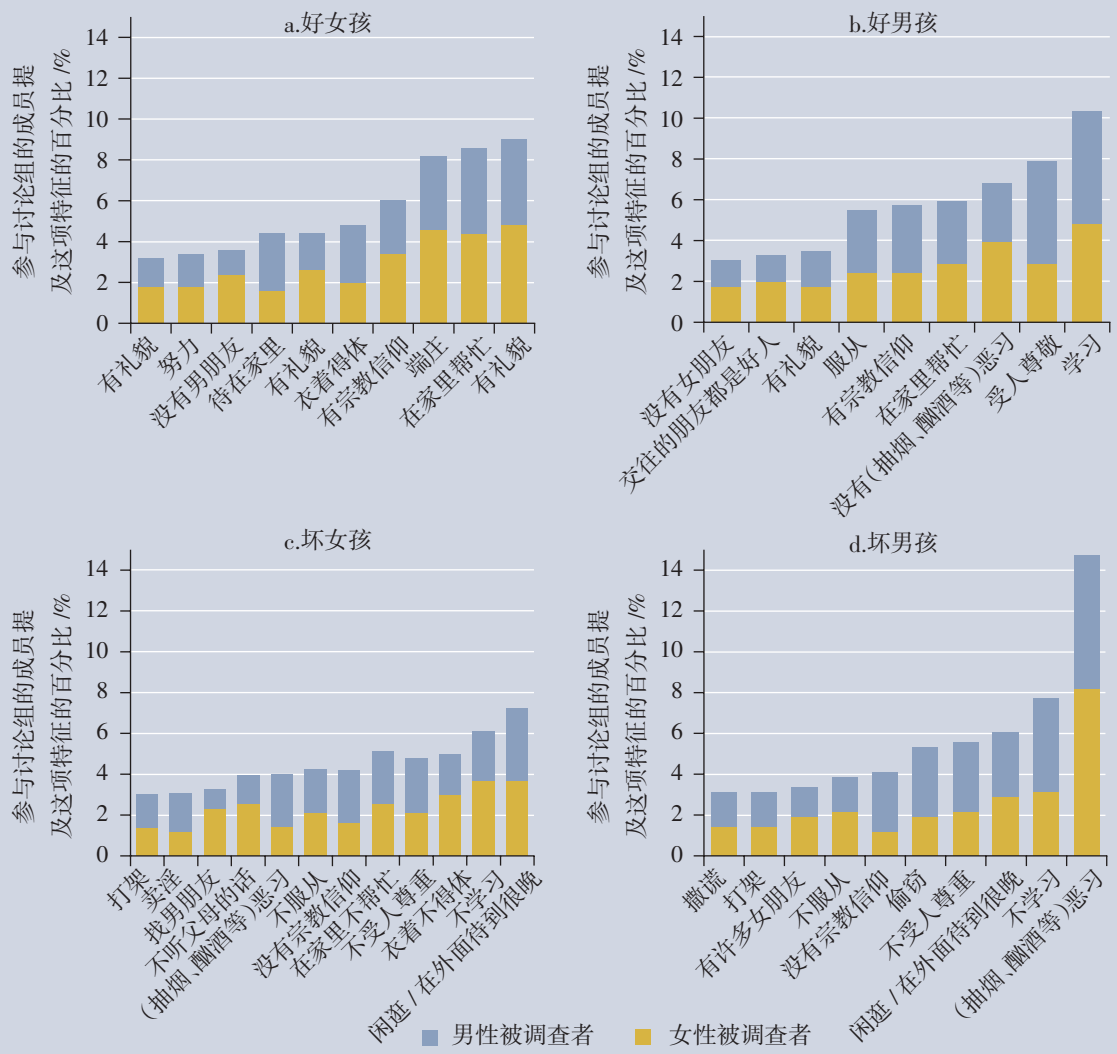
> 1963 年，我出生在 Bega 部落的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中。那时的情况非常不同。我 7 岁时，开始帮助妈妈在家庭农场和家里做点儿事情。我们那个地区的女性不从事农场工作，但是在播种和收割季节她们会到农场帮忙。我没有去学校上学，我们的村子里也没有学校。而且，那时没有女孩教育，我所在的地区也没有一个接受过教育的女孩。人们认为女孩教育是一种耻辱。我 17 岁时，父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嫁给了我的表兄（堂兄）。我们生养了七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孩、四个男孩。我的女儿都上学了，但是只有一个女儿通过了四年级，目前仍在读书……我希望上帝保佑她会继续并完成她的教育，并达到同村女孩所能取得的最高水平。是的，现在我已经改变了对教育，尤其是对女孩教育的认识。

男孩和女孩希望接受教育可以给予他（她）们比父辈更好的未来，允许他（她）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学校非常重要。我看到了我的哥哥们成了公务员，我希望像他们一样成为公务员。"（布基纳法索，青年男性）"教育让我们融入了现代世界，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教育在过去并不重要，这是因为那些人是农民，并不关注自己的未来或期望改变他们的现状。"（北苏丹，青年男性）"更好的未来，没有农民工作辛苦，更好的经济生活。"（越南，青年男性）"直至完成大学教育，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成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妈妈。"（北苏丹，青年女性）

但是他（她）们也意识到他（她）们可能不能达到他（她）们所期望的教育水平。当被要求对愿望和现实进行比较时，不丹、布基纳法索、也门共和国接受调查的女孩子说她们希望至少取得大学学位，但是农村女孩意识到如果她们还算幸运，她们的学校教育可能到达但不能超越中等教育水平。斐济女孩和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女孩认为她们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印度绝大多数女孩希望获得学位，但是当被问及她们的教育路会走多远时，答案不一，有些认为她们可能仅仅完成中等教育，并不能实现她们成为医生、律师或工程师的梦想。男孩也希望获得大学和专业学位，但是在布基纳法索和斐济，他们意识到许多人可能不能成功完成小学教育。而在加沙，一些男孩都有完成高等教育的梦想，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求学生涯可能终止在中等教育上。布基纳法索的一些男孩并不真的希望超越小学教育。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男孩都有这样的观念，即学习并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最佳路径。

解释愿望和现实之间差异的原因从物理距离到经济困难再到性别角色，种种不一。距离和基础设施匮

延伸阅读图 3.1　好女孩 / 男孩和坏女孩 / 男孩的特征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资料库）的计算值。

乏对男孩和女孩产生同样的影响，但是当村里没有学校，或因其同伴开始辍学失去了上学路上的同伴时，女孩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女孩面临的流动限制因素比男孩多，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男孩和女孩均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男孩离开学校，为增加家庭收入贡献一份力量，女孩则在家里帮忙。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数量和排行会对父母的决定产生影响。“如果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要送去上学。如果存在经济问题，较小的孩子被送去读书，较大的孩子被送去工作，”印度的一个男孩这样说。其他社区的女孩提供了类似的解释。

性别差异也会对辍学的决定产生影响。在不丹、布基纳法索、印度、北苏丹和也门共和国，女孩为准备履行未来的婚姻义务、为免予危险和防止意外怀孕而辍学，“我升到六年级时，我的男朋友阻挡了我的求学之路，我怀孕了”（利比里亚，青年女性）。“都是我自己的错误。我有一个男朋友，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怀孕了。我离开了学校，不得不待在家里”（巴布亚新几内亚，青年女性）。

关于性别角色的普遍观念和约束性社会规范塑造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对女孩的期望是在家里会帮忙，而她们对某些家务的责任意味着总的来说，她们

的自由时间比男孩少。在布基纳法索的四个社区中，人们几乎无一例外的认为“由于男孩的自由时间更多，男孩用于玩乐的时间更多，他们不需要洗衣做饭”。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群女孩抱怨说，“我们必须擦洗地板，我们必须洗衣服，我们必须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艾玛拉解释说，“男孩子一点儿忙都不帮。他们找自己的朋友讲故事，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嚼着口香糖，听着音乐，睡觉和休息。女孩子要料理家庭的杂事，采集木柴和挑水。女儿不得不从事家务工作，她们没有自由时间。”来自不丹的一个男孩 San-gay 也认同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年龄，女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家务劳动上，她们玩的时间较少。而男孩子玩耍的时间更多，工作的时间较少。”

被期望帮忙的男孩子，他们的任务有限，占用的时间也不多：“男孩子没有要做的具体工作。需要时他们到临近地方买点儿东西，但是每天所用的时间不超过 1 小时”，“如果家里要我帮忙，我会帮忙。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帮忙”（北苏丹，青年男性）。尽管他们将一部分剩余时间用于学习，男孩子说他们愿意以更具生产性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时间，以部分响应社会规范对他们作为家庭未来收入提供者的角色要求，“我愿意更多地工作，少玩天堂游戏”（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青年男性）。“和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相比，我更愿意赚点儿钱，做一点儿小生意，那样我会很高兴。”“我很愿意找一份工作或任何使用我们自由时间的有益方式”（西岸和加沙地带）。“我们希望涉足可以带来收入的活动”（阿富汗）。

青少年是向成人过渡的时期，也是许多青年组建家庭、生育孩子的时期。在对所有 19 个国家中五分之二的社区进行评估时，青年女性说女孩常常在 17 岁之前就结婚生子了。19 个国家中，11 个国家的青年女性说在 15 岁之前结婚生子是很普遍的事情，和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较早开始性行为与早婚联系在一起，但也并不总是这样：“10 岁时我结婚了，15 岁时我有了孩子……这不是合适的年龄。只有在 18 岁或 18 岁以上生育才好。一个女孩，只有在能够分辨对错以后生孩子才是正确的。”（印度，青年女性）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大多数女孩说她们在 13 岁时就开始性生活并成为母亲，“我的一个 11 岁的朋友怀孕了”，来自圣多明各的一位女孩说。在坦桑尼亚，第一次怀孕女性的平均年龄是 15 岁。“但是有些女孩在 12 岁的时候就有了她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青年女性说。“有时候，这么早生孩子是要死人的，”利比里亚的另一个女孩说。

最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任一讨论组的青年女性或男性中没有人认为在这样小的年纪生孩子是可取的或可以接受的。事实上，当被问及组建家庭的理想的和合适的年龄时，大部分认为 18 岁或 18 岁以上是结婚和生育的合适年龄。没有 15 岁以下男孩报告说他们做了父亲，他们承认他们开始性生活的年龄晚于女孩。在秘鲁，男孩子说他们开始性生活的最低年龄是16 岁，性关系开始较早也决定了家庭组建较早，夫妻双方并不正式结婚，一旦女孩怀孕他们就开始同居，正如一个男孩所说，他们认为怀孕是“共同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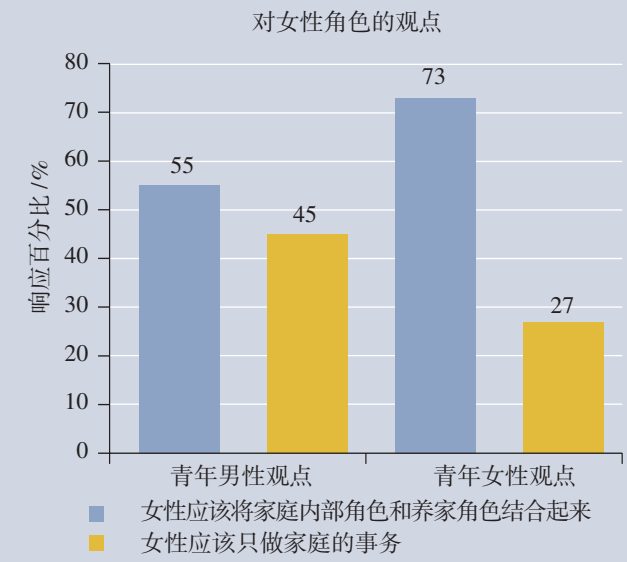
早恋（很早就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被群体界定为不良行为。对男孩来说，不良行为发展为不良习惯和与不良分子交朋友。和参与帮派或其他在街头欺负人或骚扰女孩的男孩子群体一样，暴力、抽烟或酗酒频频被提及为不良的行为（见延伸阅读图 3.1）。与不良分子交朋友往往与男孩子常常在外面待到很晚，与毒品、酒精和其他不良习惯接触的风险增加，以及丧失学习兴趣有关。女孩被拉回家庭，男孩则被推出家庭。行动自由给男孩带来了多于女孩的风险，“男孩为成为自由人而高兴，女孩则为待在家里而高兴”，北苏丹的男孩子们说。“男孩子，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逛来逛去”（斐济青年男人），“男孩子可以互相影响，变得更加好斗。而女孩子根本就没有暴力倾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青少年男孩），“男孩子参加帮派，用弯刀、石头和枪支互相攻击”（多米尼加共和国，青年男孩）。

女孩子更多地在家庭中活动。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说女孩子喜欢待在家里，或与她们的朋友一起打发时间，“当我们在一起玩或与朋友在一起时，在一起的感觉让我们感到很高兴”（印度，青年女性）。但是这些观念中某些是与女孩自由行动的能力和女孩的自由时间等具体限制相关的。“他们有更多出去的自由，而女孩有限制”；“女孩子担心出去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她们会被强奸”，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女孩子和男孩子说。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男孩子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行动，这没有问题。

女孩子晚上不能出去。男孩子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印度尼西亚）。“男孩子可以在社区周围自由行动，无论去那儿，他们都不担忧，也没有人问他们任何问题”（也门共和国）。“女孩子不得不在家里寻找乐趣，她们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出去，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女性应当留在家里……她们更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到大街上或其他任何地方闲逛”（北苏丹）。

但是女孩愿意挑战这些将她们禁锢在家庭中的社会规范。男性对女性在家庭中角色的观念更为传统，但是女孩子憧憬一种和自己母亲不同的生活，她们希望将生产和生育任务结合起来（见延伸阅读图 3.2）。尽管尊崇母亲辛勤劳动的性格、奉献精神和照料家庭的付出，大多数母亲是家庭主妇的女孩并不希望在将来重蹈母亲的路径。许多男孩也希望自己的姐妹和未来的妻子过上一种有别于他们母亲的生活，“她在家里劳动，她还要从经济上支撑家庭，她在家里的责任更大。如果我父亲回来时喝醉了，他可能骂她，打她，（但是）她总是鼓励男孩子们去做梦。我们不能面对这么多的困难，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印度青年男孩）。“我们母亲的生活非常艰难”，斐济一群女孩如是说，“她们待在家里，有大量的责任——照料小孩、家庭杂事、洗衣做饭、到农场工作”，“（我们希望）获得更好的教育、更体面的工作……教育优先，然后是工作，结婚排在最后（不像她们的母亲那样早早结婚）。”

延伸阅读图 3.2　青少年对女性角色的观点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基于“21 世纪性别定义：一项多国评估”（资料库）的计算值。

注释

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定性评估包括 19 个经济体（关于完整的国家名单可以查阅延伸阅读 1，注释 1）。具体的青少年讨论小组在 8 个经济体中的二次抽样样本中进行，这 8 个国家和地区是：不丹、布基纳法索、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印度、北苏丹、西岸和加沙地带、也门共和国。在其他许多经济体中，青少年与青年女性一道参与了采访。

第三部分
公共行动的作用和潜力

第二部分的分析指出了公共行动的四大优先领域：降低女性超额死亡率，尤其是降低女性婴幼儿时期和生育时期的死亡率；消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和生产率差异；降低两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差异；限制性别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递，无论它是通过禀赋、经济机遇还是通过能动性传递。尽管经济发展了，但是性别差异仍然顽固地盘踞在这四个领域，这就为采取公共行动提供了强大的理性基础。

本报告第三部分关注以下三个问题，如何选择正确的政策？促使政策成功实施的因素有哪些？国际发展社区如何支持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讨论首先详细阐述了应对四大优先领域问题的行动政策选项，同时追加了政策选项在不同国家环境应用的具体阐释（见第 7 章）。讨论接着研究了性别改革的政治经济因素，突出了将这一领域改革与再分配改革或增强性别平等的改革等其他类型的改革区别开来的（见第 8 章）因素。本报告最后提出了全球行动议程（见第 9 章）。

选择正确的政策

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或通过正规和非正规制度发挥作用的干预措施。政策也可以随着所解决问题的不同而变化。对市场而言，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税收或补贴政策改变价格。对正规制度而言，国家可以改变法律或提高法律的执行力，也可以提高所提供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在以非正规制度为目标对象时，尤其是以社会规范为目标对象时，政策通常比较间接：其中的例子包括提供信息或促进组建群体。

第 7 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第二部分框架如何促进降低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的复杂性。首先，本章强调对最受关注的性别差异予以政策关注。第二，本章将注意力从表象转向决定因素，从而使政策针对问题的根源而不是众多的外在表现形式。第三，本章就最具约束力的限制因素和政策行动可能的切入点提供了指导。而在限制因素互相强化的地方，本章强调排列或组合干预措施的需要。

在每一个优先领域，本章都审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政策的经历，无论这些国家是富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评估和推荐政策时，我们尽可能的使用可考的论据，情况允许时包括来自效果评估的论据。这样，我们就能够将可以获得较多、较好论据的政策（比如旨在改善教育准入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和旨在促进工资性就业的工作安置计划）与少为人知的其他干预措施（例如促进女性获得司法公正的措施或降低青少年女孩意外怀孕的方式）区分开。

通过对针对持续性性别平等根本原因以外的政策进行研究，第 7 章也阐释了本报告框架如何引导有效的、战略性的性别主流化进程。许多政策并不直接关注性别问题，但是可能对家庭内部和社会中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影响。忽略这些联系可能降低干预措施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效率。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对性别差异效果予以考虑可以使以政策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途径成为可能。

使政策得以贯彻

设计适当的政策只是迈向性别平等的第一步。有效贯彻政策同样重要。第 8 章审视了一系列国家的经验，从而突出性别改革政治经济因素的主要方面。

要产生积极的变化，我们就需要对性别改革的两个可能激发反对意见或反对行动的特征进行管理。

首先，与所有改革一样，性别改革在社会群体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其中包括在男性和女性之间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即使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益，某些群体也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利益。其次，性别改革常常挑战关于性别角色的强大社会规范和观念。本章突出强调了与性别平等格外相关的四大政治经济因素。第一，建立联盟动员改革力量并赢得广泛的支持是基本的要素。国家行动是政策改革的中心，而包括政党、工会、民间社团和私营领域在内的非国家行动者可以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就劳动立法和家庭法而言，女性团体在提高性别平等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尽管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中，男性还不够积极，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男性在许多领域的参与程度增加了，对女性权力的支持也日益增加。

第二，公司（无论大小）有推进性别平等的强烈商业动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对人才的争夺是激烈的。公司再也承担不起轻视或忽略有才能女性的代价。对性别平等的承诺是客户和投资者日益要求的条件，大公司尤其如此。而女性日益增长的市场购买力可以促进企业以行动支持这些承诺。

第三，自然灾害或政治变革或经济变革的意外发生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发动改革、改善性别成果的机遇之窗。跨国机构的推动和全球议程的角色模拟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

第四，改革存在多条路径。在测定和推动改革时，政府常常遵循社会的意向。当政策制定和实施在正在发生的市场变化和社会规范中形成，趋同和协作可以促进持续的变革。但是这类“辅助”改革可能不足以克服持续的性别不平等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僵化问题。政府“转型”改革的大胆行动可能是改变社会动力和转向更高层次平等均势的必要行动。在选择作为性别改革一部分的辅助改革和转型改革时，如何平衡改革的速度和逆转的风险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

全球行动议程

如同第 7 章和第 8 章所示，国内公共行动是降低性别不平等程度的核心。然而政府、社团组织和国际机构共同发动的全球行动可以扩大国内政策的范围及其影响。第 9 章讨论了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辅助国内行动的动机及行动重点应当放在哪些方面。

性别平等全球行动是必要的，原因有三。第一，某些方面的进展，例如应对超额女性死亡根本原因的进展，要求将更多的资源导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导向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第二，有效的行动有时候会要求公共物品的生产，比如新知识的生产和扩散。第三，众多国家和机构的国际协作可以促进采用有效的政策并提高其整体效果，例如通过建立国内行动的动机和压力。

第 9 章认为全球议程应当强调我们分析中所指向的内在性别差异最大的地方、潜在发展收益最大的地方以及收入增长并没有消除性别差异的地方。因此，国际社会应当以辅助国家在本报告所识别的四大优先领域中的行动为重点：降低超额女性死亡率和消除性别教育差异；拓宽女性获得经济机遇的渠道；增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限制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而且我们突出重视一个额外的交叉性优先领域：通过优化数据、改善知识的生产与共享和加强学习支撑基于实证的公共行动。

在这些领域，国际社会的支持应当是一个组合，即提供融资平台、培育创新和学习以及加强包括学术界、社团和私营领域间合作的组合。正如第 9 章所示，细节将随着国家和优先领域而变化，并且要求在逐步增加对其他领域支持力度的同时维系对某些领域的持续支持。

第 7 章

7

采取公共行动促进性别平等

继本报告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的趋势描述与分析之后，本章将讨论如何选择公共政策来解决最为严重的性别差异问题。在实践中，改善性别平等状况的政策形式多样，并通过市场手段（税收与补贴）、正规制度（修改法律法规，提供公共服务）、甚至非正规制度（即改变社会规范的努力）发挥作用。可行干预手段的这种多样性，使政策选择与政策设计成为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从三个方面入手降低了处理问题的难度，并借此说明基于本报告框架的透彻分析如何促进问题的解决。首先，本章重点关注前文分析中突出强调过的、最受关注的性别差异问题。性别差异问题关系到社会福利与国家的发展前景，而且并不一定会随着国家的逐渐富裕而缩小。这些优先领域包括降低女性超额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女性在婴幼儿时期的超额死亡率和生育时期的超额死亡率；缩小两性收入差距与生产力差异；缩小社会和家庭环境下两性在话语权方面的差异；限制性别不平等随着时间推移的复制，包括通过禀赋、经济机会及能动性传递的性别不平等。显然，上述优先领域并不适用于所有收入水平的所有国家。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如何制订因地制宜的纠偏政策。

第二，我们一直强调在选择与设计政策时，必须针对性别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即针对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表面症状。本报告第 2 部分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凸显这些根本原因，以及在市场和制度的各自运行过程中及市场与制度的相互作用中及其与家庭的相互作用中，这些原因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从本框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即使收入增加了，某些性别差异仍将继续存在，仍然是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无外有两大原因。第一，推动性别平等的单一动力可能受到阻碍，正如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为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而需要进行的制度改善所面临的那样。第二，市场和制度的运行、市场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家庭的相互作用可能意味着需要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对推进性别平等面临的多重制约因素进行改革。这样，要解决两性工作场所、工作效率的性别差异，就要求改变市场运行方式、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社会对两性职业选择的观念与成规。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弄清楚，某一特定问题究竟是受一种突出因素还是受多重制约因素的阻碍，如果是后者，还要考虑清楚是要同时解决还是逐个击破。

本章主要讨论禀赋、经济机会、能动性等三大领域中的重点性别差异的各项应对政策。本章还涉及了性别不平等随着时间推移而传递复制的某些方面，如教育领域的性别弱势群体等。本章还会分别讨论如何应对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开始显现的性别劣势，这是因为这些时期产生的性别差异是造成“性别不平等”陷阱的重要因素，也因为纠偏措施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龄段的人而言，禀赋、经济机会和能动性是如何更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要解决人力资本禀赋方面的性别差异问题，比如特定生命时期女性的超额死亡率问题以及教育方面的性别弱势群体，就必须注重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提高洁净水和卫生设施的家庭覆盖率，向孕妇提供及时的基本服务等工作都需要长期坚持下去，才能降低女性的超额死亡率。教育服务应当重点提高普及率，让因贫困、种族、种性、人种或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处于劣势的大量人口拥有受教育的机会。无论解决方案来自需求端还是供给端，足够的重视将解决贫困人口和边缘人口所遭受到的“性别不平等陷阱”问题。广泛的安全网络将抑制收入冲击的负面影响，根据收入冲击性质和潜在性别关系的不同，这种负面影响将对两性产生不同的影响。缩小两性在获取经济机会方面的差异，意味着要缩小两性在有酬就业、农业生产或创业方面的收入差异和生产力差异。这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消除女性因家务劳动与照料家人而造成的时间约束，改善劳动力市场与信贷市场的运行以及正规制度的结构，特别是改善经济服务方面的法律与实施。

缩小社会或家庭话语权的性别差异，往往也要求政策干预措施从多个领域切入。改善女性教育状况的政策就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在社会话语权方面，应采取措施提供有能力胜任政治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的女性的相关信息，转变人们的观念，同时还应改变只有男性才可以承担领导角色的社会规范。在家庭话语权方面，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减少法律系统、执法过程与法律援助中的性别偏见是最为重要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采取一些影响社会规范的措施也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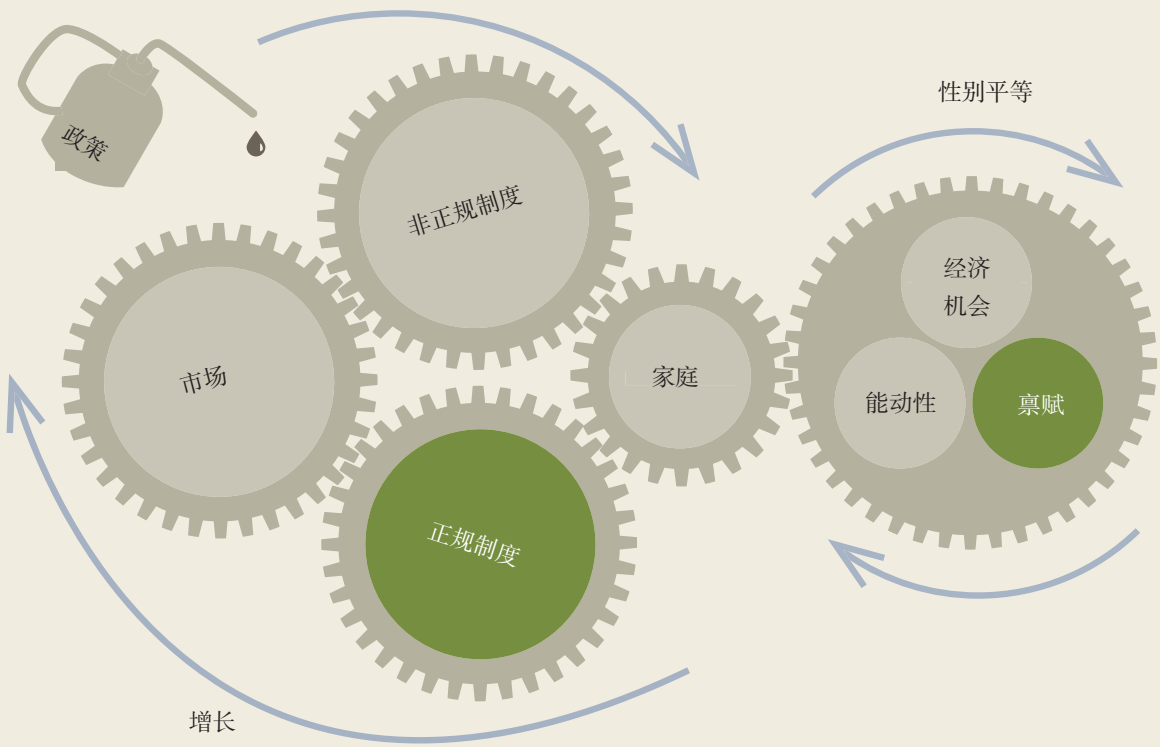
要切实解决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形成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仅需要尽早干预，并且需要以一种认识到干预措施如何对若干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进行干预。例如，对青春期少女进行职业培训不仅能够增加她们的就业机会，还能够推迟生育，而这反过来能使她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学习技能。

本章最后一部分从旨在降低性别不平等程度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转向如何将具有其他目标的政策产生的性别差异化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以及为什么要将其纳入考虑范围。我们还说明了忽视性别问题如何降低这些政策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的效率。不考虑性别平等问题的政策也可以通过一定的设计，实际上起到改善性别平等状况的作用。因此，即使实现性别平等并不是某项政策的明确目标，但性别对政策设计仍然关系重大，从而说明了如何以一种战略性方式推动性别主流化工作。

缩小健康和教育性别差异的政策

许多教育领域的性别差异以及某

图 7.1 缩小禀赋差异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些健康领域的性别差异可以随着国家的富裕而逐步缩小。对于家庭而言，收入的增加缓解了其在面临基本教育、卫生和营养支出决策时在男孩或是女孩之间作出取舍的压力。对于国家而言，收入的增加使得上述这些领域的服务供给增加，这不仅意味着学校和卫生诊所的数量会增加，其覆盖率也会相应提高。通常，经济增长引起的市场信号也会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有酬劳动，通过提高女孩教育的价值而实现缩小性别差异的目的。

但我们的分析显示，即使收入增加，健康与教育领域中的两大性别差异仍会存在：生命周期中特定时期的女性超额死亡以及教育领域的性别弱势群体。解决这些性别差异问题需要改善服务供应，特别是改善针对贫困人群和其他边缘人群的服务供应；这就要求强化服务供给部门的职能作用（见图 7.1 中绿色部分所示）。

解决女性超额死亡问题，关键是修复制度

正如《2004 年世界发展报告》及其他文献所述，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是小事，也绝非易事。[1] 所有政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都在于为服务覆盖面的扩大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服务的高效供给以及贫困人口可以获得服务。

提供洁净水与卫生设施

如第 3 章所示，1900 年到 1930 年间，当今的富裕国家通过积极提高洁净水与高质量卫生设施的覆盖率，最终解决了女性婴幼儿的超额死亡问

题。总体上说，用户端水处理比水源处水处理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痢疾的发病率，这是因为后者存在着二次污染的潜在风险。[2] 例如，对埃塞俄比亚的家庭储水检测发现，一半以上的家庭用水都出现了后水源污染。[3] 因此，富裕国家政府选择通过管道系统确保用户端用水的清洁，同时改善城区的卫生设施。在一些水供给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阿根廷的水供给改善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 5~7 个百分点，这一措施在最贫困地区的效果更为突出。[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监测计划显示，从 1990 年到 2008 年，洁净水使用率从 1990 年的 71%提高到 2008 年的 84%，但自来水的使用率增长却相对缓慢一些，从 1990 年的 39%提高到 2008 年的 49%，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城区覆盖率增长停滞。非洲最贫穷的 40%人口当中，能用上安全饮用水（自来水或供水站的水）的人不足五分之一。[5] 这种情况下，家庭（特别是但不限于贫困家庭）难以准确评估各项水净化决策的风险与收益。问题在于，这些家庭的错误选择通常十分有害，而且除非供水和卫生系统有所改善，这种错误选择也不会得到改善。

正如城乡之间洁净水供给模式与卫生设施改善模式不同，在城乡改善服务提供的方式也不同。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提高覆盖率都需要大量增加资源投入。举例来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到的结论是，每年洁净水与卫生设施需求方面需要 110 亿美元的支出，约为目前支出水平的 1.5 倍。[6] 同一研究还显示，解决资本支出的瓶颈问题，提高运营效率，改善成本收益等几项措施产生的收益相当于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还多。提高供水与卫生设施服务系统效率，需要确立既承认政府实施干预措施合理性，又能完善服务用户负责制的合理法规。在城镇地区，水资源通过网络供给。因此，应加大力度，加强“短线”负责制（即供给者对服务使用者负责）和“长线”负责制（即政策制定者与政府官员对服务使用者负责以及供给者对政策制定者负责）。必须找到有效的方法，将水价维持在贫困人口承受得起的水平上（见专栏 7.1）。

改善合同结构，制定与实施适合服务供应商的管理条例，从而将供应商与政策制定者分离开来，这对于改善“长线”负责制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情况下，最优方案会涉及私营机构的参与。以马尼拉为例，私营供应商将水供给覆盖率从 1997 年的 67%提高到 2009 年的 99%，并在通过减少水流失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供水效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大用户对供应商的影响可以支持“短线”负责制；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标杆管理确保明确的服务标准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服务收费的方式来实现。柬埔寨的大型自来水公司和（小城市的）小型水供应商通过一些措施加强了“短线”负责制：它们设定了明确的收费机制——在每个供水点都安装水表，计费系统计算机化，停止向未付费用户供水——还建立了客户投诉机制。按服务收取费用十分重要，但同时又必须使服务价格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特别要考虑到贫困人群的负担能力。因此可能需要向一部分用户提供补贴，确保他们能够承担服务的成本。但提供补贴又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准确进行定向补贴，使补贴能够落到贫困人群手中，

专栏 7.1 改善水供给：达喀尔和金边

正如塞内加尔和柬埔寨的案例所示，尽管改善水资源供给服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可以大大降低儿童死亡率，即便在低收入条件下也是如此。塞内加尔和柬埔寨在改善主要城市与近郊地区的水务服务供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功的取得主要来自两大渠道：增加投资与相关配套设施以提高服务效率，同时保持并改善服务相对于贫困人口的可负担性。

达喀尔是塞内加尔的首都，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那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达喀尔的水质与覆盖率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有供水网络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覆盖范围得到扩大，新建了近 97 000 条（面向贫困人群并由政府提供补贴的）社会供水线路，使得水务服务的人口覆盖率从 1996 年的 79%提高到 2006 年的 98%，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排名第一。此外，用户遭遇供水中断的频率也降低了。

与此同时，塞内加尔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保证以经济的价格提供服务，同时还不至于影响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水服务收费结构也是综合考虑到这两者间的平衡后精心设计的：居民用水与非居民用水实行不同费率，对那些用水量超过一定限额的用户（如用水浇灌花园的富裕人家）征收更高的费用。这些费率安排都融入规划阶段与执行后阶段的财务模型中，用以监控项目资金自给自足的进展情况。为降低运营成本，日常供水运营都移交给私营企业，令其负责水务及公共卫生服务的账单与费用收缴工作。为了提高供应商的工作积极性，将供应商的酬金直接与绩效指标挂钩，如流失水量的减少量和账单与费用收缴效率的改善程度等。1996 年的水费收缴率只有 80%，而 2006 年水费收缴率已经提高到了 98%。在此期间，水流失率也从 32%下降到不足 20%，节水量相当于近一百万用水者的需水量。不仅如此，自 2006 年起，塞内加尔的城市水务部门已经能够在不接受政府直接补贴的条件下负担其运营与维护成本。

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居住着全国约 20%的人口，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柬埔寨的水务部门对金边市的供水系统进行了改革。1997 年的金边仅一半人口用得上自来水，平均每日供水时长 12 小时。1997 年到 2003 年间，供水量翻了一番，配水管网覆盖范围提高了近 150 个百分点，为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居住的近郊地区引入了受政府补贴的供水点。到 2010 年，近 90%人口（包括 3 800 户贫困家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用得上洁净水。

与塞内加尔的经验相似，降低水流失量和欠缴收入，执行贫困人口支付得起且不威胁到长期可持续性的费率结构等两项措施对于改变金边水务部门的困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柬埔寨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塞内加尔的效率提升之路：并不单纯地关注公共部门的参与度，而是将加大公共部门投资与采用新技术相结合。电脑全程监控系统的购入，使金边的自来水公司的水流失损失率从 1998 年的 57%（位于亚洲前列）降低到 2003 年的 17%。费率安排中包括了向特贫用户提供 30%~100%的补贴。费率结构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则保证了长期的财务可行性。同时，每年对费率安排进行审议，确定必要的增长幅度（水流失量的大幅度削减意味着费率上调幅度较为适度）。同时，金边还运用信息技术改善会计数据管理，使费用收缴率从 1997 年的 89%提高到了 2003 年的 100%。同塞内加尔一样，金边的供水部门也实现了财务独立，并且因其杰出的水务管理于 2010 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工业水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水务部门项目文件。

同时又不会导致用水过度。目前有几个解决方案，各有优缺。最常用的结构是根据用水量提供补贴（补贴一定的用水量）。然而，由于富人与穷人的水消费量相差并不太大，因此此类补贴往往呈现累退性——最终是富人受益更大，而穷人受益更小。此外，还可以按地区确定补贴范围（如哥伦比亚）和按照服务提供手段确定补贴范围（如智利），这两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向贫困人群提供定向补贴。但是要充分发挥这些方式的效率，就需要充足的数据与足够的行政管理能力。因此，智利的补贴范围不是由自来水公司确定，而是由专业机构确定。最后，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向相对较低水平的服务提供补贴，如向使用公共水塔的用户提供补贴，但不向拥有独栋房屋或庭院用水的家庭提供补贴。怎样划定范围才最为合理，往往取决于目前的环境，包括目前享受不到水务服务的人群、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自来水公司客户群体的组成结构等。 第二个问题是补贴的钱从何而来。一种选择是实行交叉补贴（例如由非民用用水补贴民用用水）。第二个

选择是用政府财政总收入支付补贴。究竟哪种筹资机制最佳，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农村地区，可以实行水网供水。东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即是如此，这些地方普遍建立了社区管理的供水系统。在其他农村地区，包括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家庭以地下水和地表水作为水源。地方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完善社区管理的供水系统。乌干达利用其广泛的地方所得税征收网络额外征收小额税，并将所征得税收投入地区自治会管理的专项基金中，专门用于支付重大水务整修。

即便是在农村供水网络覆盖的地区，供给也往往十分有限。贫困人口通常被排除在外，许多家庭仍然用着水质无法保障的其他水源。玻利维亚、加纳、秘鲁的许多村庄都有自来水网接入，但其他水质无法保障的水源的使用率仍然很高，分别为 21%、23%、38%。资金获取渠道往往非常有限，资金可持续性问题仍然非常普遍，即使供水系统配备到位，系统的维护也仍然是个问题。

卫生问题与用水问题的区别在于，个体与家庭不仅受到自身选择的影响，还会受到社区中其他人行为的影响。在改善农村与城镇地区的卫生设施时，应当将这些“外部性”也纳入考虑范畴。在废物处理与安全处置等个人支付意愿通常低于服务成本的情况下，尤其要考虑“外部性”。因此，政府在设定标准、规范服务供给以及在可能情况下提供补贴等方面要扮演的角色十分明确。城镇地区应强化产权，其中也包括认可非正规住房，这有助于刺激需求与个人对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从供给端看，确保各个社区享有独立供应商将会有助于服务的改善。农村地区以及人口密度较低的城镇地区的首要问题是提高卫生意识、转变行为方式、扩大需求。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社区集体责任意识的苏醒促进形成了可持续性的卫生行为规范。越南的一些乡村社区就改善卫生实践（设施建设、废物处置）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地方政府监测目标完成情况，并通过社区广播发布实践成果。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社区则通过学校发起竞赛，在实践中发现，孩子希望赢得竞赛形成的压力成了转变卫生习惯的主要动力。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尽管在过去的 20 年中，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从全球来看，其进展速度仍然远远不足以实现将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的千年发展目标。一些地区的进展仍然滞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 31 名女性中就会有 1 名死于妊娠或分娩造成的并发症；而富裕国家的这一比例仅为四千三百分之一。[7] 各国国内差异也较为悬殊。阿富汗的总体孕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一千四百，这一比例掩盖了极大的差异：首都坎布尔的孕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四百，而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则高达十万分之六千五百。[8]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键在于给予待产女性及时与充分的关注。正如第 3 章所述，由于整个链条中涉及的环节太多，因此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需要整个系统的运作。产妇在产前、产中、产后都需要得到照顾，以便在必要时让运转正常的医院能够降低或处理潜在的生命危险。改进医疗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孕妇及其家庭不必再就应当在何时何地寻求何种医疗护理作出一系列艰难的决定。改善负责提供孕产护理的机构，实际

上意味着需要采取多方面行动。首先，扩大服务链、特别是一线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的覆盖率可以降低产妇死亡率，但是这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意识到这一点，国际社会于 2009 年追加了 53 亿美元投入，用于改善妇幼保健。2011 年年初，多家双边、多边援助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重大行动——“发展大挑战”——以减少孕产妇死亡率与新生儿死亡率。

但是正如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情况所显示，加大资金投入并不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两国略微增加了相关支出，就大幅度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两国在妇幼保健领域的支出比例就一直没有超过 GDP 的 0.4%。但是两国却提高了服务链各个环节的人员素质。尽管对卫生人员、特别是对技术熟练型助产士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但是也可以通过引入社区层面的服务提供者和私有部门提高服务覆盖率，在服务欠缺的地区尤其是这样。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将大量诊疗任务从较高层次的卫生服务提供者分流给中层或较低层次的卫生服务提供者。在印度的农村地区，受过专门训练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利用预制的抗生素包来治疗败血症，改变了由内科医生治疗该疾病的惯例。[9] 将技能熟练型卫生人员安置在缺少卫生服务的人群周围，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尼西亚的 Bidam Di Desa（印尼语，意为乡村助产士）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计划培训了 5 万名助产士并将他们分配到全国的农村地区。由助产士协助分娩的比例大大提高，特别是在最贫困的农村地区。[10] 技术能在必要时给一线服务供应者以协助。乌干达的“农村紧急救援扩展服务与护理计划”运用无线电和步话机联系卫生设施、救护车和助产士，让助产人员可以得到高级医护人员的即时建议。[11]

> “我们需要附近有一家每天都开门营业的诊所。”
>
> ——一名来自南非的农村妇女

向私人服务供应商采购服务也是一种可以代替公共孕产妇健康服务的经济选择。在柬埔寨的某些地区，接受政府资金的非政府组织代替了政府提供孕产妇服务，实践表明这些地区的产前护理和医院助产的服务质量明显优于较直接由政府提供服务的地区。[12]

第二，孕产妇保健服务提供者必须提高对孕妇需求的响应能力。可以通过增加服务提供者承担对孕妇的责任来实现这一点。责任制要落到实处，就需要让服务使用者了解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和服务改进政策的相关信息，以及如何根据以上信息行动的方法。在乌干达，基于社区的服务监测措施改善了初级卫生保健的质量与数量。[13] 社区更多地参与到服务供应者的监督上来，而后者也因此提供了更多更优质的孕产保健服务。候诊时间缩短了，保健服务更加专业了，医院分娩的病例数增加了。

对于孕产妇保健服务，确保“长线”责任制取得更好的效果尤为重要：公民需要具备使其政治代表为服务实施中的失败负责的能力，反过来政治家则需要对服务供应者实施更多更为有效的控制。以秘鲁为例，要改善孕产妇保健服务，不仅要求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还要求为服务供应者创造恰当的激励并且提高公民对高效服务的呼声，以上达政策制定者。[14] 分娩的专业护理率由 2000 年的 58%提高到 2004 年的 71%。一项以贫困人群为对象的新保险计划直接按照所提供服务

向一线服务提供者支付服务费用，而不是将额外的预算资源划拨给卫生部进行分配。公民参与度的提高，提高了他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从而提高了服务提供商对客户需要的响应能力。

第三，限制贫困女性获取孕产妇保健服务的资金制约因素值得引起特别重视。一种方法是向贫困女性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仅用于支付已知的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卫生保健服务。举例来说，印度的母亲保护计划（Janani Suraksha Yojana Program）将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协助的分娩比率提高了 36 个百分点。[15] 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的产前、产后护理和医院分娩的服务券计划也提高了辅助分娩率，增加了产前、产后的就诊人次。[16]

第四，改善上述制度需要政治意志的支持，因为孕产妇保健服务在政治议程中的优先等级通常较低（比如与教育相比）。洪都拉斯和土耳其的经验揭示了一些可能的措施。尽管洪都拉斯在捐助者的支持下已经开展了二十年的改革，但直至 1990 年孕产妇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每 100 000 例活产中就有 182 例产妇死亡。在公众意识到孕产妇死亡率过高的问题后，政府（和卫生部长）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提升到了全国优先事务的位置。政府推行了一项新计划，重点改革卫生系统，培训传统和正规的卫生工作者，建立高危产妇的专门医疗设施，并组建了许多公私结合的合作伙伴关系。捐赠者为培训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至 1997 年，孕产妇死亡率已经下降到每 100 000 例活产中死亡产妇为 108 例。[17]

土耳其也有相似经历。2000 年，土耳其每 100 000 例活产中有 70 例产妇死亡。新政府充分利用它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在 2003 年启动了“卫生转型计划”，强调体制改革与对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并将重点放在服务欠缺的地区。该计划实施后，政府对服务欠缺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预防的预算增加了 58%，为偏远地区人群配备了救护直升机，并重新部署了卫生工作人员提高贫困地区的服务覆盖率。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鼓励孕妇使用产前宿舍并在公立医院生产。截至 2009 年，土耳其的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了每 100 000 例活产仅有 19.8 例产妇死亡。[18]

第五，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必须进行跨部门合作，将重点扩大到卫生系统与服务之外的其他领域。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在发展初期成功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案例就证实了这一观点（见专栏 7.2）。基础设施投资（如建设

专栏 7.2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经验

改善孕产妇保健服务的实施虽然有难度，但也是可以实现的——即使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的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30 年代，斯里兰卡每 10 000 例分娩就有 2 000 例孕妇死亡，但到 1947 年，这一比例降到了 1 000 例，而在随后三年里又降低了一半，即 500 例。到 1996 年降到了 24 例。在 1950—1957 年这七年间，马来西亚成功地降低了孕妇死亡率，从最初的 534 例降低到原来的一半。此后，基本每十年孕妇死亡率就降低一半，到 1997 年已经降到 19 例。

为克服阻碍医疗系统有效运作的一系列制度障碍因素，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都采取了综合性、分步骤的方法。而且它们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并不大——自 1950 年以来平均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 1.8%或 GDP 的 4%。两个国家的医疗健康事业都充分发挥了与基础教育、供水和卫生设施、疟疾控制及农村综合发展（比如修建农村道路，这大大有助于处理紧急分娩）的协同效应。为解决孕产妇服务面临的财务、地理和文化障碍，两国向处在问题最前线的农村地区培养输送大量有能力的专职接生人员，保障了农村人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将他们与后备服务联系起来，同时也努力改善通讯和交通条件。与此同时，对有关设施进行了强化，以提供助产服务，处理各种复杂情况和并发症。更好的组织管理改善了对服务提供机构的监管和问责。通过监测体系统计每个地区的死亡率数据，社区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要求政治领导人负责，国家和地方的有关部门被迫认识到每一例孕妇死亡都是不可接受的。最后，这两个国家都非常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改善：女性在国家独立前或独立后不久就获得了选举权，而女性教育也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

资料来源：Pathmanathan 等 2003。

农村公路），关注女性教育，增加孕产保健服务人员培训，投资建设医院等措施综合起来，迅速、显著且持续地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19]

覆盖边缘人群——为极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服务

教育服务提供机构对实现性别平等十分重要。正如第 3 章所述，经济增长扩大了教育覆盖面，改善了服务提供状况，对缩小男孩与女孩在各阶段的入学率差异作出了长期的贡献。尽管许多国家的教育效果仍然不佳，教育体系的管理也有待改进，但性别差异已不太明显。不过，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中，很多人群的教育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这些弱势群体在入学率上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也最为顽固，因此帮助他们理应成为教育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些极端弱势群体可能人数众多，有时一国的某些次级区域或人口稠密区（如西非大部分地区和阿富汗的农村地区）或社区（如东欧的罗姆）的全部人口都属于极端弱势群体。造成他们边缘化的因素包括经济极端贫困，地处偏远地带，以及基于种族、人种或其他特征的社会排斥。这个群体中一直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问题，而且问题在不断恶化，如果不能得到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永久存在，而那些因贫困而受排斥的女孩与女性就会陷入“性别不平等陷阱”。

需要针对加剧性别不平等状况的特定劣势提出解决方案，是针对当地供给端的解决方案，直接查出特定环境下加深性别不平等情况的劣势的根源。比如，如果距离远近是主要问题，特别是女孩上学距离问题（阿富汗农村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那么可以通过在偏远地区建设更多学校来缩小性别差异。[20] 如果种族问题是主要原因，那么招聘讲本地语言的教师则是比较经济的解决办法。在其他情况下，还需要注意其他因素，例如校园女孩性虐待等。这种量身定制的供给方措施直接针对问题的根本，这是此类措施的优势所在，但设计这类政策成本往往较高，耗时较长。巴基斯坦近年来的工作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孩来说，穿越居住地的边界是约束入学率的一大因素。但是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女孩来说，主要障碍在于与地位较高的孩子们同校上学。[21] 因此，面向社会地位较高的女孩的政策需要解决距离远近的问题，而针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女孩的政策则要解决社会排斥问题。针对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设计解决方案，是一项要求较高和复杂的任务。

在学校数量比较充足的地区，采取一些相对简单的需求端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如以送女儿上学为条件向家长提供现金转移支付。虽然此类现金转移支付或许并不能很准确地解决根本问题，但正像第 3 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多项计划表明，此类现金转移支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在短期内此类解决方案也相对容易设计。巴基斯坦的计划也表明，此类现金转移支付的效果并不局限于减少收入贫困带来的劣势，还可以解决其他可能导致性别不平等状况恶化的问题：现金转移支付还可以缩小受到流动性限制的女孩的教育完成率差异。如何锁定目标群体关系到各项计划缩小性别差异的效率。在一国国内采用不同的目标群体锁定机制可以带来益处，如家庭贫困指标或以社区为基础的机制。相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安全网络的设计，以应对冲击带来的性别差异的影响。

增加经济机会的政策

正如第 5 章所示，无论是有酬就业、农业就业还是自创业，收入性别差异与生产力的性别差异是由两性经济机会的差异造成的。

两性不同的经济活动模式，来源于市场、正规与非正规制度的运作模式和家庭如何作出响应。因此，政策应锁定影响经济机会的决定因素。第 5 章凸显了时间限制、投入获取渠道和市场失灵与制度失灵等干预的重点。由于造成问题的因素通常是多重的，因此通常需要出台一揽子干预计划（在图 7.2 中用绿色标示）。

本节将讨论有酬就业、农业或创业领域中性别差异的决定因素，并列举可供选择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方案在各收入水平国家的实施效果。根据理论框架，本节将逐步讨论摆脱非正规制度、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正规制度的制约的政策对策。

专栏 7.3　保护成年男女与未成年男女免受收入冲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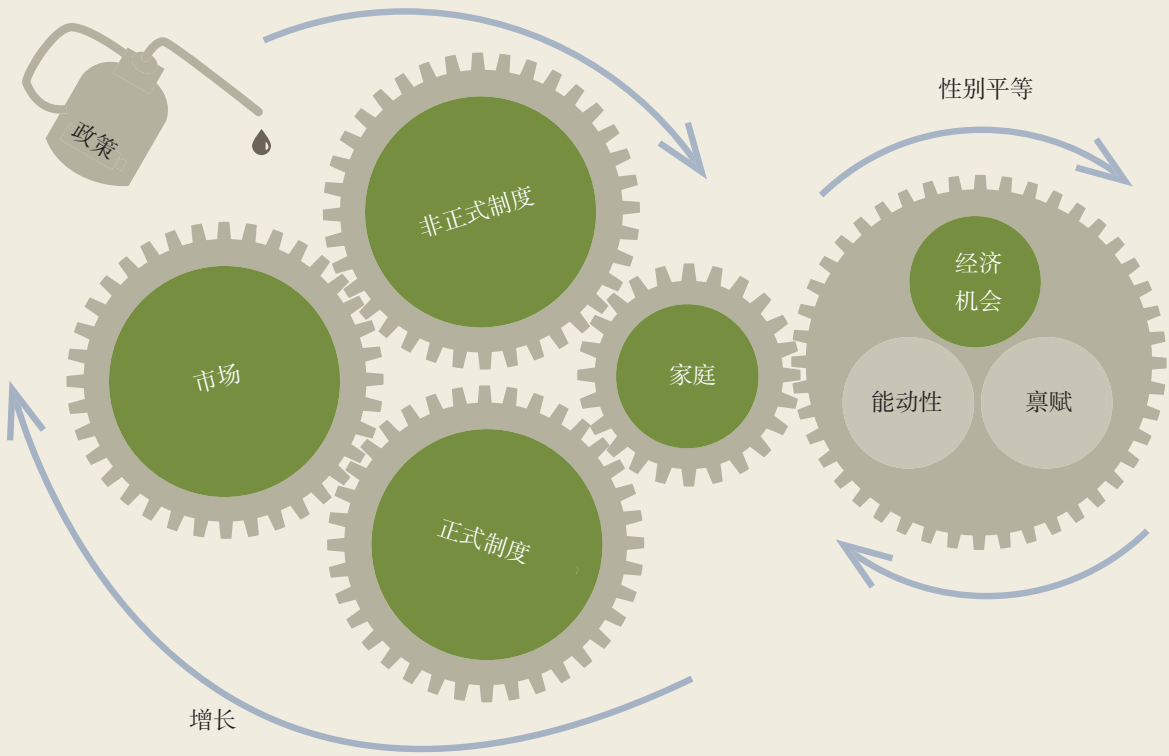
冲击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往往因性别而异。无论是成年男性、成年女性、男孩、女孩，冲击对其造成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冲击的性质和当地经济的基本结构，这一点我们在第 2 章、第 3 章和第 5 章中都已讨论过。因此，对于这些冲击的政策响应，应当利用根据性别维度与充分依据作出的分析诊断结论，针对性别差异设计切实有效的安全网措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干预措施，包括现金转移支付、食品券、基本需要的临时补贴（食品、公用事业、卫生和教育）以及临时就业（可能与下文讨论到的积极劳动市场计划相结合）。此外，鉴于冲击可能会对幼儿（0~3 岁）造成长久且不可逆转的影响，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因此应针对这一群体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喂养计划和向父母提供现金转移支付等。

资料来源：2012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非正式制度：消除女性的时间限制

时间限制因素是造成女性收入低、

图 7.2　改善经济机会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见第 5 章）。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来自非正式制度——关于由谁承担家务、照料家人的社会规范与观念。解决此类限制的政策必须解决社会规范带来的问题，而不是尝试改变社会观念。主要方法有四：扩大儿童保育服务的覆盖面，完善产假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使女性从时间限制因素中脱离出来，运用技术手段与交通手段降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扩大儿童保育服务的覆盖面

女性花费在儿童保育方面的时间要多于男性——瑞典女性用于儿童保育的时间是男性的 2 倍；加纳女性用于儿童保育的时间是男性的 4.6 倍；而巴基斯坦女性所用的时间则是男性的 6 倍。[22] 女性在儿童保育方面更大的时间投入限制了她们的经济机会——儿童保育一方面占用了她们大量时间，一方面限制了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连续性。儿童保育服务可以消除女性的时间限制因素。这种服务既可以直接由国家（包括地方）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营部门或非政府组织提供，并由政府提供补贴与监管。

目前各类儿童保育政策的实施经验大多来自于欧洲和北美的高收入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此类政策女性工作时长与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好坏不一。哥伦比亚实施了社区家庭计划（Hogares Comunitarios Program），向被改造为社区儿童保育中心的指定民宅提供补贴，此举大大提高了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率和工作时长。[23] 阿根廷扩大了全民公立学校的覆盖范围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时长都有提升，不过不同的研究得到的提升幅度略有不同。[24] 巴西在城镇低收入居民区开展的公立儿童保育服务大大提高了母亲就业率，但对计划实施前就已经就业的女性的工作时长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25] 在其他国家，扩展儿童保育服务覆盖范围或降低儿童保育服务价格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十分有限。挪威实施的全民儿童保育政府补贴计划对儿童保育利用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微乎其微。[26] 智利扩大了公立日托中心，但此举并没有对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产生影响。[27] 在美国，免费公立日托所的存在对母亲就业率的影响显示出群体性差异，比如，这一政策对于子女 5 岁、且没有更年幼子女的已婚母亲没有什么影响，但对子女 5 岁、且没有更年幼子女的单身母亲则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28]

各国的不同经验凸显了在设计政策时甄别与选定目标人群——因缺少儿童保育服务而难以参加市场劳动的女性——的必要性，以及更好地理解此类制约的本质。[29] 母亲选择不参加市场劳动的原因各不相同，她们对于学前计划的劳动响应也因此各不相同。儿童保育服务替代方案的可获取性与可承受性也至关重要。如果已经存在比较廉价的替代方案，那么对新型儿童保育计划进行补贴只可能会将替代方案挤出，但并不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挪威的情况就是这样，补贴几乎淘汰掉了大部分非正规安排，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成本，但同时未能使总体儿童保育情况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出

> “造成我们不找工作的根源是我们生了许多孩子，而且没有人能照看他们。”
>
>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名年轻女性

现实质性改善。[30] 巴西的政策实践过程也证明了存在相似的非正规安排被挤出的现象。

关于如何解决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女性（这在低收入国家尤其重要）以及满足广大农村女性儿童保育需求的知识相对更少。一些计划（包括由非政府组织实施的计划）对如何在这些人群中扩大儿童保育服务覆盖率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正如第 9 章所强调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创新与学习的重要领域。

印度的非政府组织“移动托儿所（Mobile Creches）”正在实验几种向在农村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女性和从事公共工程建设的女性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的模式。[31] 该计划与工程承包商合作，在新德里周边的公共设施建筑工地上建立了日托中心。承包商提供保育设施并承担一部分成本。这些日托中心响应了一种预期，即女性在公共工程建设人员中占主要地位——某些工地的女性占到人员总数的 80%。日托计划包括营养计划，提供孩子们的饮食，并跟踪记录孩子们的营养状况。日托计划还包括综合健康服务（例如疫苗接种、医生定期巡诊）。为了给德里再安置区在非正规领域就业的女性提供幼儿保育服务，移动托儿所还设立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日托中心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日托计划，招募并培训当地女性来提供儿童保育服务。移动托儿所还与另一家印度非政府组织 Pradan（意为：发展行动职业援助）合作，在贾坎德邦和比哈尔邦的偏远农村地区与当地女性探讨限制她们参与当地主要创收活动（具体来说是纺纱）的儿童保育方面的约束，并随后建立了一批日托中心。这些日托中心采用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模式，管理、食物供给、教师培训和甄选都依赖于雇主和整个社区。

自就业女性协会（SEWA）是一家由非正规部门的贫困自就业女性组成的商会，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自就业女性协会为其成员子女（6 岁以下）设立了日托中心。这种服务不仅为儿童提供教育与营养，而且也减少了女性因照顾子女而缺席劳动的天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她们中很少有人是领月薪的员工。[32]

雇主也可以提供日托服务。在农村地区，由于大量员工集中作业（如种植园农业），因此由雇主提供日托服务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肯尼亚的一家大型咖啡出口生产商在每个种植园都设立了托儿所与幼儿园，为正式工人和季节性临时工提供服务。[33]

面向非正规就业女性的公立日托服务的另一种替代选择是延长每日上学时间（特别是针对只需要上半天学的年级）或者降低儿童入学年龄门槛。越南推行了前一种政策，而后一种政策则在许多国家得以试行。以色列政府为 3 岁到 4 岁的儿童提供公立幼儿园。这项措施大大增加了阿拉伯裔母亲的劳动力供给。而在此之前，这些孩子们不太有机会得到日托服务。[34] 肯尼亚政府将儿童早期教育与学前教育计划拓展到全国范围内 4 岁到 5 岁的儿童。[35]

完善产假政策

产假是否能够有效地增加女性的劳动力市场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成本由谁来承担。有些国家只规定了女性享受产假且由雇主承担成本，因而削弱了雇主雇佣女性的积极性。这意味着政府应该补贴雇主，或者要求雇主批准男女两性员工休同等长度的产假。第二，产假期间发放多大比例的基本工资。比例越高，个人休假的意愿时间就越长。由于男性对休假期间获薪比例比女性更为敏感，

因此可以采取提高薪水发放比例的办法鼓励男性休产假。第三，产假的长短关系重大。如果过短，女性更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请假。如果过长，则存在员工遗忘技能与经验的风险。后者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允许员工在休假期间从事一些兼职工作。德国就是这样做的。

尽管产假的替代政策对增加女性劳动机会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但产假政策不同，对关于儿童保育的社会规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某些政策将会强化这些规范，而另一些政策则可能转变这些规范。只提供女性产假而不提供男性产假，有可能改善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前景，但是却有可能强化女性作为主要的家政服务提供者（household care）的社会观念。这种政策是“递增式”的，即它承认既定的社会规范，又寻求解决社会规范带来的问题。相比之下，同时提供男性和女性产假并强制男性休产假的政策具有“转变式”特点——激励男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职责，试图转变有关儿童保育的社会规范。一些北欧国家已经试行了后一种方法。挪威与瑞典为男性员工提供了不可用作其他用途的产假，从而提高了男性的休假率。冰岛的办法是，提供总长度为 9 个月的一揽子产假（期间发放工资的 80%）；母亲与父亲必须每人休三个月假，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其余三个月假期。大多数情况下，母亲会休剩下三个月的假期，但总体上说，此项政策提高了男性产假的休假率，使家庭与工作场所的两性关系均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36]

“我们了解劳动法。了解保护怀孕女性的条款。了解解雇的相关内容。这些法律的出现提升了现代女性的地位。”

——来自多米尼加的一名女性

“女性遭受着对孕妇的歧视。私有企业主总是倾向于雇佣男性员工，因为男性员工不需要休产假。”

——来自塞尔维亚的一名女性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消除女性的时间限制因素

女性用于取水和收集木柴的时间也多于男性。例如，在几内亚农村地区，女性用于取水和搜集木柴的时间是男性的四倍半，而在加纳农村，女性用于搜集柴火的时间至少是男性的四倍。[37] 这些活动和其他家务琐事占用了女性很多时间，减少了她们用于休闲或市场工作的时间。

电气化经常被视为减少家务劳动占用女性时间的手段。[38] 例如，电气化减少了南非农村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从而将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 9 个百分点。尼加拉瓜也推行了电气化，大大增加了年轻农村女性出门工作的可能性。[39] 电气化还缩短了不丹女性用于搜集木柴的时间，增加了孟加拉国女性晚间的空闲时间。[40] 在某些情况下，女性时间的增加对应着男性在家务劳动中时间投入的增加。例如，引入电气化后，斯里兰卡的男性越来越多地从事包括熨烫衣服在内的家务劳动。[41]

扩大用水覆盖范围，缩短用户与水源的距离，也可以消除女性的时间限制因素。例如，巴基斯坦的一项研究表明，居住地与水源越近，用于市场劳动的时间越多。[42] 然而，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节省下来的时间并不一定用于市场劳动；在有些情况下，节省下来的时间被用于休闲，从而改善了女性的福利。以一项跨国研究为例，该研究并未发现水源距离的拉近与市场劳动的增加有什么联系，但却发现某些国家水源距离拉近与非市场劳动时间呈负相关，这意味着休闲时间的增加。[43] 近期一项对摩洛哥城镇地区

的家庭供水与水管供水的随机抽样比较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即节省的时间被用于休闲。[44] 对于改善供水条件对女性家庭以外的劳动的影响还需要作更多地研究，特别是对水源较远的偏远农村地区。

拉近市场与女性间的距离

考虑到对女性时间的多重需求，降低女性进入市场的难度，也有利于增加她们的经济机会。改善公路与交通运输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然而，男性和女性使用的交通方式不一样，女性更倾向于步行。了解到这一差异后，秘鲁的一项项目优先维修与改善了 3 000 多公里的农村人行道。一项女性受益人调查显示，77%的女性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67%的女性觉得安全性得到了提高，而 43%的女性则认为收入得到了增加。[45] 孟加拉国的乡村公路的升级与延伸提高了两性的劳动力供给和家庭收入。[46]

技术也可以拉近市场与女性的距离。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可以帮助女性了解价格信息，并将她们与客户相联。在印度，非政府组织职业发展基金会开展的一项项目，向一些女性群体提供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组织她们直接在市场上销售她们的产品，此举提高了她们的利润所得。[47] 印度的自就业女性协会的贸易促进中心专门为女性设立了在线零售商店，销售纺织和手工艺产品，作为对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物流时间的供应链措施的补充。当然，正如第 6 章所强调的那样，女性群体中的技术普及率还存在差异；而且第 9 章指出，应当优先研究缩小这些差异的办法，使女性共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正如第 5 章所述，由于信息障碍的存在，市场运行对两性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性别而异的市场失灵”）。这种差异可能对女性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潜在雇主恰恰可能因为某类职业或行业的从业女性数量极少而认定女性生产力不及男性。这种观念会使雇主更加不愿意雇佣女员工，导致这类职业中的女性从业者比例始终不高。而雇主对女性的歧视也可能会加重这个局面。女农民和女企业家在信用市场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由于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信贷利用率低于男性，借款方对于女性的潜在偿还能力了解不足或者完全不了解，因此即便女性贷款人信誉良好，他们也不愿意发放信贷给女性。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女性的资产占有率都比较低，这限制了女性提供质押的能力。

第二，有关职位和晋升机会的信息都包含在行业的人际网络中，而这种网络往往由某一性别主导。这种情况限制了女性在同性从业者稀缺的职业或行业内的就业和发展，并鼓励她们进一步向同性从业者已占较大比例的职业或行业内聚集，例如护士（男性同样会向那些男性从业者已占较大比例的职业或行业内聚集，如工程等）。因此，在女性数量较少的职业或行业内，只有当她们的数量达到临界值时，女性从业者的数量才会增加。性别主导的社交网络同样也会限制女企业家名下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多元化发展。

克服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障碍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特别是技能培训与工资补贴，可以解决信息障碍问题。[48] 此类政策中部分注重提供培训；有些则为参与者安排新的岗位（通常只是临时岗位），让她们有机会向雇主展示能力，从而克服信息障碍。工资补贴则可以降低雇主雇佣女

专栏 7.4 促进约旦女性就业

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劳动参与率仍然很低。在约旦，20~45 岁女性中就业女性仅占 17%，而男性的相应比例为 77%。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也存在这种差异。对于社区大学毕业生来说，这种差异从一毕业就开始显现出来，并且不断扩大。

这种低就业率导致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困难重重。由于女性的就业人数相对较少，年轻女性缺乏职业榜样，也缺乏可以帮助她们就业的人际网络。另外，雇主缺乏雇佣女性员工的经验，如果他们认为女性员工不会将工作当作长久之计，可能就不愿意聘用女性员工。

“约旦女性新机遇”试点计划对两项备选政策——短期工资补贴和就业技能培训——进行了严格的评估。

短期工资补贴鼓励企业作出尝试，雇佣年轻的女大学毕业生，直接观察年轻女性的工作表现来消除成见。此项政策还会增强年轻女性找工作、接触雇主时的信心。在试点过程中，每张工资补贴券的金额都相当于 6 个月的最低工资。

就业技能培训可以提升毕业生在社区大学学到的技术能力，同时还教授寻找就业机会与成功就业的实用技能。雇主们常常会抱怨，大学应届毕业生缺乏沟通技巧及其他基本就业技能。因此，参与试点计划的学生接受团队建设、沟通、业务陈述、公文写作、客户服务、简历写作、面试和积极思考等方面的指导，课程总长度为 45 小时。

女性对此类政策的需求很大。尽管女性就业率低，但大多数应届毕业的女大学生都有工作的愿望：93%称有参加工作的计划；91%称婚后仍然有走出家门工作的愿望。在应邀参加培训课程的学员中，62%完成了全部课程，未婚女性参加的意愿更为强烈。刚刚开始参与课程的学员对此系列课程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称课程大大提升了她们开始找工作的信心。加入工资补贴计划后，三分之一的女性凭着那张补贴券找到了工作。

中期评价得到的初步成果显示，工资补贴券影响就业的效果显著：参与补贴和同时参与补贴与培训计划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55%~57%，而仅参与培训计划或两项计划均没有参与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 17%~19%。综观各个群体，政策对未婚女性的就业影响会更为明显。获得补贴或培训或二者兼有的大学毕业生的财务赋权程度（以女性拥有资金并自主掌控资金使用方式的比例来衡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后续调查将关注此类工资补贴券对就业能否产生长期影响，后续调查还将关注其他赋权措施以及观念转变状况。鉴于初步研究成果显示，已婚女性参与培训、利用工作补贴券、找到工作的比率较小，因此后续调查还会进一步关注婚姻与就业之间的联系。

资料来源：2012 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性员工的尝试成本。

许多此类政策的出台都是为应对低迷的经济形势，而非有意识地改善女性的经济机会，但是这些政策却为解决女性进入（回归）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的信息障碍带来了明显的成果。

一些早期经验来自于阿根廷的“就业促进计划”，该计划提供工资补贴券，并在提高就业率而非收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与男性相比，女性能够从该计划中获得更多的实惠。[49] 墨西哥的“PROBECAT 计划”提供短期职业培训。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在完成培训的一年内的就业率有所提高，不过该计划仅仅提高了男性的月收入。[50]

其他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在不同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效果还有待于更多可靠依据的验证。目前约旦正在开展的一项工作，对工资补贴与技能培训在提高女大学生就业率方面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化评价（见专栏 7.4）。初步成果显示，此类政策前景较为乐观。

第二套政策是旨在增加女性有酬就业机会和就业后晋升机会的志愿性或强制性扶持行动计划。公共部门可以在扶持行动中起到带头作用——无论是在其自身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还是其合同承包方面。随着受雇于公共部门的女性不断增多，以及女性在公共部门（与企业）的不断升迁，公共部门管理者在作出雇佣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也将发生改变。这也向潜在的私营雇主证明，女性可以在特定的部门或岗位上取得成功。公共部门也可以利用其财权要求承包商参与扶持活动，将员工与管理层中的女性比例要求列入承接政府合同的必要条件。

以往的扶持行动经验清楚地表明，志愿性计划的收效十分有限。要想取得实效，就需要采取强制性扶持行动，监控行动进展，并处罚不合作者。[51] 从美国等已经实施强制性扶持行动计划的国家所取得的经验来看，此类计划的重要作用是将有酬就业从男性重新分配到女性。但是关于此类政策经

济效率的争论仍在继续。从理论上讲，这种取舍非常明显。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比例限制可以减少对女性员工工作潜力的歧视，纠正人们的观念，从而提高效率。而且可以通过树立模范、消除成见，增强女性进行教育和其他投资的激励因素，从而长期地促进女性就业。但是如果在实践中选择和提拔了能力不足的女性，那么此类计划就会导致效率损失。从长远来看，实行性别比例限制会削弱女性对教育培训的投资，因为她们觉得少拿几个资格证也可以找到工作。因此，从长远来看，性格比例限制还会产生一种主观意识，即女性员工的成功不是因为个人资质而是依靠扶持行动。

尽管上述影响都有一定的实证依据，但在这方面美国拥有最全面的经验。[52] 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的扶持行动对效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小或根本没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有些负面影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第一，扶持行动政策应当是临时性的，这样才不会被人们视作应得的权益。第二，需要鼓励雇主在实行性别比例限制的同时也改进其招聘与甄选流程，并增加对员工在职培训的投资。

关注特定部门或职业的劳动市场政策可以解决性别主导的人际网络带来的信息障碍。此类措施包括提供某个特定岗位或职业的薪金与资质方面的信息，或者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还包括指定有经验的男性或女性员工作为同性（处于性别劣势）年轻员工的导师。

解决农民和企业家面临的信息障碍

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计划是解决农民与企业家面临的信息障碍问题的最常用办法。此类计划是从集体借贷演变而成的，如孟加拉国农村银行（Grameen Bank）及此后建立起来的其他同类银行，借贷的个人（往往缺乏抵押品）组成贷款小组以获取贷款。贷款会发放给个人，但债务偿还责任则落到了整个小组身上。小组规模可能有所不同（孟加拉国农村银行贷款的贷款小组通常由 5 名贷款人组成，而秘鲁的国际社会援助基金会（FINCA）的贷款小组通常由 10~50 名贷款人组成）。此类小额信贷计划的共同特征是债务由各小组成员共同承担，以及定期的小组会议，以帮助贷款人克服信息障碍。

> “如果能够针对女性在家制作的产品提供销售协助或信贷，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
> ——一名来自印度的城市女性

小额信贷计划的发展逐渐超出了集体借贷的范围，也找到了一些解决信息障碍的新方法。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Banco Sol）和印尼人民银行（Bank Rakyat Indonesia）向曾经参与集体借贷的稳定（通常较富裕的）客户提供数额更大的个人贷款。这种个人贷款并不依赖于互相监督和社会约束（与集体借贷不同），而是以取消贷款违约者未来信贷资格作为还贷动机。

小额信贷政策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帮助贷款者脱离（或跳过）小额信贷，并且从更大型的正规机构获得信贷。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商界女性计划”表明了应当如何实现这一步。国际金融公司意识到女性拥有信用记录和可抵押资产的可能性要低于男性，与非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合作向女性企业家的企业发放信贷。该公司还采取了多种干预措施，比如开发新的产品，如以设备或现金流作抵押的信贷，以及向金融机构员工提供培训与战略协助以帮助银行增加女性客户

专栏 7.5 拓宽女性与企业家融资渠道的创新手段

金融机构正逐渐意识到女性是创业者中的半边天，这意味着巨大而且尚未开发的市场机会 。本专栏将通过三个例子，说明创新型思维与灵活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帮助女性克服当前的信贷壁垒，如何帮助金融机构开发女性客户群体的。本文中所举的三个例子均强调培训、理财意识以及直接解决女性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流程。

利用培训与金融创新的力量，拓宽正规金融部门的渠道——Access Bank 和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的“商界女性计划”

尼日利亚的 Access Bank 和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在其本土银行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6 年到 2007 年，两家银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向具有吸引力的成长中市场部门扩张来提高市场占有率。尼日利亚与乌干达两国都有一批女性创办的活力很强、成长迅速的中小型企业，两家银行都迫切地希望占领这块市场，但却缺乏操作性经验。

尼日利亚 Access Bank 和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展合作，设计与实施了适合本国的商界女性计划。国际金融公司划定了女性企业家首次信贷额度，并在实施过程中提供咨询服务。此计划使 Access Bank 和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的员工能够向女性企业家提出更好的商业建议。两家银行还专门为女性客户提供了商业技巧的培训，这大大提高了女性使用银行信贷服务的信心。

从尼日利亚的情况看，Access Bank 的员工设计了替代性抵押品系统，包括珠宝首饰、设备，以及使用资产、债券、销售票据等以现金流为基础的抵押。

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也设计了更为符合女性企业家的新产品，如储蓄与信贷合作社贷款。此产品主要针对注册团体与机构，这些团体和机构的成员企业已走出创业初期，但由于缺乏传统抵押品而无法获贷，因而倾向于通过集体方式贷款。

2006 年到 2009 年间，Access Bank 和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向女性企业家发放贷款总额分别为 3 550 万美元和 1 610 万美元，同时将不良贷款率维持在 1.5%以下。两个银行的业务量也大大增加了（Access Bank 新开设储蓄账户逾 1 300 个，支票账户逾 1 700 个；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新增储蓄账户逾 1 800 个）。两家银行分别对 650 名和 368 名女性进行了商务管理技巧培训。

2011 年，Access Bank 将其业务模式复制到冈比亚和卢旺达，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其他商业银行也纷纷效仿。Access Bank 是西非地区首家被吸纳为全球妇女银行联盟成员的银行，还获得了《非洲银行家》评选的“2007 年最具创新精神银行奖”和全球妇女银行联盟颁发的“2008 年度最具创新精神银行奖”。乌干达发展金融公司紧跟其后，赢得了全球妇女银行联盟颁发的“2009 年度最具创新精神银行奖”。

通过租赁克服融资障碍，向正规金融部门融资进阶——坦桑尼亚的“Sero 租赁与融资”计划

坦桑尼亚（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习惯法中，大部分女性均不享有所有权。由于银行体系主要是建立在抵押的基础上，这导致女性实际上也被关在了贷款的门外。Sero 租赁与融资有限公司（Selfina）是一家女性的租赁与融资企业。该企业从 1997 年进入微租赁行业，女性在支付首付款并签订租约后即可使用设备。该公司面向 3 000 家中小型企业，目前违约率为零，偿付率 99%，平均贷款金额 500 美元。

国际金融公司为 Selfina 从坦桑尼亚进出口银行对接了 100 万美元的贷款，并支持该公司对女性客户进行理财素养、商业计划与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

的数量。初步经验显示，使用金融服务的女性企业家数量增加了，贷款数额也在增加，且还款率高于平均水平（见专栏 7.5）。

如果女性企业家和农民受到性别化人际网络的阻碍，那么就需要采取一套更广泛的政策。对于女性企业家来说，提供资金与培训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秘鲁的实践证明了培训的价值。秘鲁在提供信贷的同时也为女性企业家提供企业战略以及企业管理的培训。受过培训的女性更有可能将企业账户与家庭账户分开，在提高收入的同时降低长期的不确定性。[53] 虽然其他研究表明培训的作用可能十分有限，但至少在一种背景下融资与培训相结合的方法的效果要胜过单一措施 。[54] 农业也可以采取相似的政策，包括支持农民进入产品市场、取得投入与资金，以及提供推广服务。

提高正规制度的公平性

正规制度（法律、法规、服务机制等）也可能成为女性获取经济机会

的障碍。可以考虑通过两套政策来解决这些障碍：一是修正歧视性法律、法规；二是纠正服务提供机制中的性别偏见——这些都可能对女性员工、企业家或农民产生影响。

修正歧视性法律

法律上阻止女性获取经济机会的主要偏见来源于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财产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法律。

劳动法

以两性的就业实践为依据制订非歧视性法律只是迈出了基础的一步。除此之外，许多国家都应当将其政策重点重新放在审视兼职工作限制上（包括完全禁止兼职工作的规定）。对于那些因承担过多家务与照料家人职责而无法考虑全职工作的女性员工来说，此类限制构成了歧视。放宽此类限制，将有利于女性得到更多有酬就业的机会。以阿根廷为例，解除对正规部门兼职合同的限制，使大量有孩子的女性从非正规部门的兼职工作转入正规部门的兼职工作。[55] 这样看来，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程度居高不下，并不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造成的，而是由于对正规部门兼职合同的限制造成的。

有些国家选择了通过立法提高工作安排的灵活性，而非限制兼职工作。瑞士保证所有子女在 8 岁以下的父母都能够在同样的岗位上缩短工作时间而拿同样的薪水，因而大大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56] 这也大大降低了强化职场性别隔离的可能性。发达国家较高的女性兼职工作表明了灵活工作安排的必要性。

物权法

对于女性企业家和农民来说，决定婚内财产所有权与资源控制权的法律是尤其重要的，这其中包括家庭法（规定婚姻、离婚与继承的基本准则）中的许多方面以及土地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法改革以消除对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对待为主。在过去 15 年间，莱索托、纳米比亚和南非都废除了只承认丈夫为世俗婚姻中的一家之主的条款，提高了妻子订立契约、以自己名义注册资产以及管理共有财产的能力。[57] 埃塞俄比亚于 2000 年对其家庭法进行了改革，提高了女性的结婚年龄下限，配偶不再拥有禁止另一方外出工作的权力，[58] 并且要求在管理夫妻共有财产时必须双方同意。

以上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埃塞俄比亚通过第一个阶段的家庭法改革，使女性的经济活动从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转向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业，由兼职转向全职，由家庭内部转向家庭外部。[59] 修正继承法后，印度南部各州的女性也享有了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这增加了女性继承土地的可能性。[60]

婚内土地共有权的规定，提高了女性利用土地与获取经济机会的能力。但是由于在离婚时，女性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得到她们应有的那份土地，因此，即使在实行婚内共同所有权的情况下，仍需要实行强制性土地产权共同登记才可以更好地保证女性土地权益（此举的另一好处是，在丈夫不幸死亡时，妻子能获得更多的土地权益）。埃塞俄比亚的两个地区实施了向夫妻双方共同颁发土地所有证，并注明夫妻双方姓名。这一政策实施后，这两个区域内的所有 80%的土地所有证标明了女性姓名，而在只向户主颁发土地所有证且只注明一方姓名的地区，这一比例仅为 20%，前者是后者的 4 倍 [61]（下文中对能动性的讨论将讨论产权变化如何增强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解决服务提供中的性别偏见问题

在许多国家，服务提供中限制女性经济机会的主要性别偏见来源于政府的土地分配与登记方案以及农业推广的工作方式。此类偏见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来解决。

首先，应该要求服务提供者明确和额外地关注女性。印度的农业技术管理机构以奥里萨邦的女性为对象，与当地社区组织联手建立自助小组，提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自助小组使当地女性农业收入来源多元化。[62] 各邦（重新）分配土地等资源的时候，也同样应当遵从关注女性的原则。以户主为对象的再分配计划并不能很好地照顾女性的利益，因为大多数户主都是男性（见第 4 章）。各邦政府可以对已分配的土地发放共同所有证明，既可以在土地分配之时发放（如玻利维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也可以选择在产权登记时发放。[63] 此类计划可以使两性分配到相同份额的土地。然而，仅有法律还不够，政府还应当积极地行动，确保女性得到应得的土地。比如南非，在政府的努力下某一阶段的土地再分配的受益人中有 47%是女性。[64] 土地市场中的女性极少，为了让女性能够更多地进入这一市场，几家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组织若干女性群体租赁或购买土地。其中包括孟加拉国改善农村状况委员会和印度的德干发展协会。[65]

第二，可以增强女性在服务提供组织内部的权力，包括在设定优先活动时的权力。在农业推广方面，可以将女性安置在农业部的决策位置上。在埃塞俄比亚，地方土地委员会必须至少有一名女性委员。这一规定提高了女性在土地登记方面的参与度。[66]

第三，可以利用技术扩展面向女性的服务范围。肯尼亚农友服务热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肯尼亚最大的呼叫中心 Kencall 于 2009 年推出该项服务，旨在向小型农户提供免费建议。呼叫中心的话务员以多种方言提供关于虫害防治、禽畜饲养、农产品收获与市场销售、联系本地市场与融资等农业操作方面的建议。该项目采用需求驱动的模式，电话服务的内容与来电者信息都会存储到数据库，使运营者可以就询问频率最高或最为紧急的问题形成专业知识。虽然该服务对农业产量产生的影响还未得到评估，但使用热线咨询的 3 万多农民当中，近一半都是女性——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标准农业推广服务受益女性的比例。

第四，改善监督，有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数字可以说明情况：例如，接受农业推广机构服务的女性客户占女性农民总人数的比例。

第五，可以让接受服务的女性用户了解她们应获得的服务水平。还可以通过创造需求的集体要素来辅助这一措施——例如，支持女性农民组织或女性商业组织。

目前，上述措施的成效及最佳实施方案还缺乏统一的有说服力的依据，因此需要进一步努力，开发出更多的能经受实践检验并适应各类环境的项目。[67]

提高女性能动性的政策

第 4 章提到，即使国家越来越富裕，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能动性仍然受到制约。尤其是女性缺乏话语权。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社会经济领域（如司法界、企业界与商界），决策机构中都缺乏足够的女性代表。在很多情况下，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女性对家庭资源和家庭组建缺乏控制、家庭暴力频繁发生等问题便是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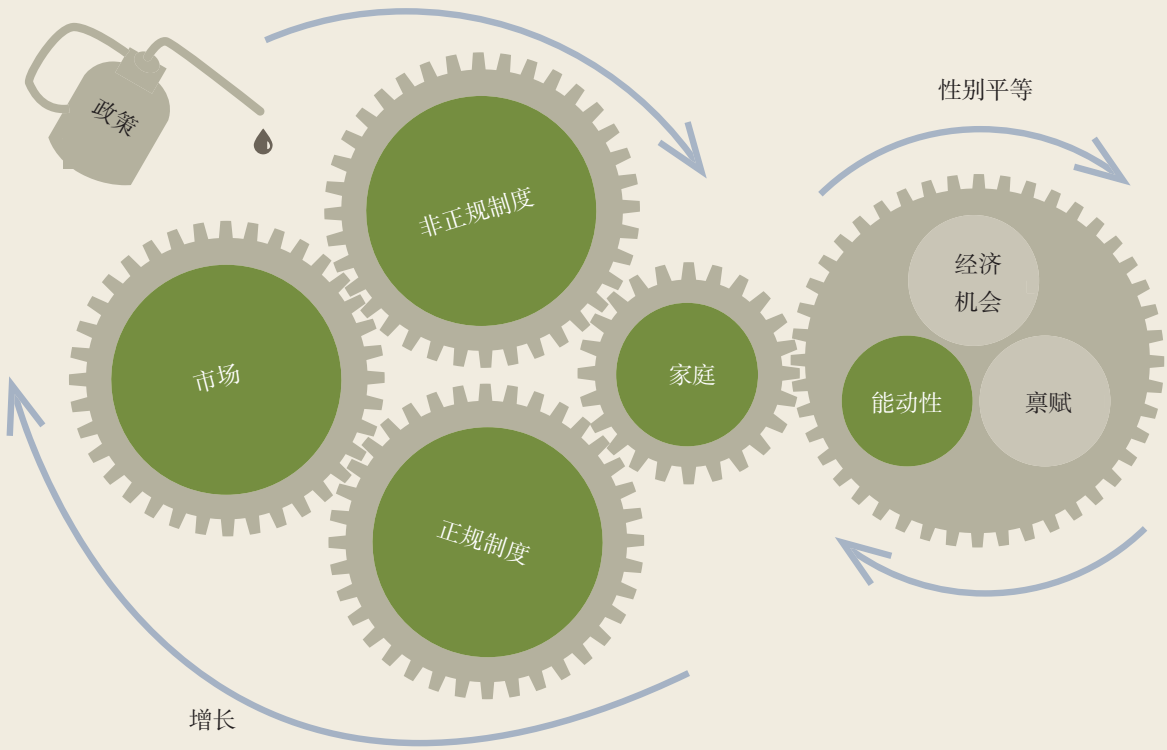
在社会层面上，女性话语权受到多重制约。将领导力视作男性活动的社会规范可能造成对女性领导力的广泛质疑，甚至使人认为不应让女性担任领导者。缺乏女性领导力的相关信息和女性领导者榜样都有可能使人们质疑女性领导力和产生偏见。政治界与其他职业领域的性别化人际网络也限制了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前景。正如照顾家人和家务劳动方面的社会规范限制了女性的经济机会，这些社会规范同样限制了女性可用于追求领导职位的时间。

女性在家庭内部较小的话语权反映了经济机会、社会风俗本质、法律框架和法律执行等综合因素对女性的影响。控制家庭资源的关键在于经济机会与法律框架——特别是家庭法、土地法与继承法中对家庭内部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对于家庭暴力问题，社会风俗以及法律的内容和实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于生育问题，社会风俗、谈判力与服务提供等都是关键因素。

因此，这些限制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话语权的因素反映了正规与非正规制度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所以需要针对这些决定因素制定政策。同经济活动一样，在任何具体环境下可能都需要实施综合性的干预（见图 7.3 中的绿色部分）。

下面我们将讨论直接针对上述某些制约因素的政策是如何增强女性在社会及家庭内部的话语权的。这些政策从两个方面补充了本章前一部分讨论的一些政策。第一，改善女性教育对于提高女性能动性至关重要——无论是有助于人们了解其权利的基本文

图 7.3　增强女性的社会话语权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化教育，还是提高其参与政治生活能力的高等教育。第二，增加女性经济机会的政策，包括消除照料家人与家务劳动方面的社会规范负面影响的政策，尤其是有助于增强女性对家庭资源控制力的政策可以促进女性的能动性。

增强女性的社会话语权

以提高女性在社会机构中的参与度为目标的政策，可以通过解决信息问题或转变认为女性领导力不如男性的观念来实现目标。施加压力让人们摒弃传统社会规范，以及改善（投票者与股东可获得的）信息，可能是最可行的办法。实践方面，设定政治代表与董事会成员中女性比例的举措有效，这已经得到了证实。

政治代表性

配额制是提高女性在正规政治中代表性的最常见方法，具有不同的形式。政党可以自愿承诺将一定人数的女性候选人列入参选人名单（政党自愿配额制）；也可以在女性本身就在候选人名单上的前提下将一部分候选人位置预留给女性（候选人配额制）；或者可以为女性预留出一定比例的立法席位，只有女性候选人才能参与竞选（预留席位）。在设定性别配额的国家中，61%的国家采用了政党自愿配额制（主要是西欧国家），38%采用了候选人配额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20%的国家采用了预留席位制（主要在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68]

至于哪种形式的配额制可以发挥最佳效果，这取决于一国的政治体制。例如，对于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而言，为女性保留一定席位的做法并不可行，而政党自愿配额只适用于领导能力与内部纪律性强的政党。此外，配额的设计及实施细节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以西班牙的参议员选举为例，选票上候选人名字都按字母排序。因此各政党均倾向于选择姓氏字母靠后的女性，因为她们的名字会出现在选票的靠后位置，因而赢得席位的可能性较小——这说明政策制定者需要更精心地制定政策，规定选票上女性代表姓名的位置。[69] 法国的一些政党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意遵守国家大选的女性配额规定，这充分说明了对违规行为采取有力惩戒措施的执行机制的重要性——可以参考哥斯达黎加大选和法国一些市级选举的做法，即规定大额罚金和驳回不符合配额规定的候选人名单。

此外，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政治代表配额时，头脑中必须对全局综合考虑。强制性配额会限制部分民主程序，因此，即使解决持续性性别不平等问题需要采取这样的干预措施，也必须权衡干预措施的利弊。印度地方政府采用了轮换配额制，即在不同选举中预留不同的席位组合。正如所有扶持行动政策一样，这种做法有助于事先明确目标或时间表。最后，还需要仔细思考预留席位的结构。为女性安排席位（即使不将这些席位与具体的选区挂钩）可能导致这些席位被视作“象征性”女性席位，从而使收效大打折扣。

配额制可以明显提高女性代表的比例。墨西哥和马其顿在实行候选人配额制后，议会中的女性代表比例分别从 16%提高到 22.6%和从 6.7%提高到 17.5%。摩洛哥和约旦在实施了席位预留制后，议会中的女性代表比例分别从 0.6%增加到 10.8%和从 1.3%增

“女性有权成为镇长。”

——来自利比里亚的一名成年男性

加到 5.5%。

配额制也可能产生其他效果。但由于各国在实施配额制来提高女性政治参与度之时也可能实行其他措施来推进性别平等，因此很难对配额制的影响进行单独评估。在此问题上，印度地方政府是个例外。印度对预留席位进行随机分配，因而对女性的政治话语权产生了若干可评估的成效。第一，由于制度规定某些职位必须由女性担任，当选的女性人数越来越多。第二，当进行轮换并取消原预留席位之后，当选女性的比例仍然高于那些没有实行席位预留制的社区。[70] 此外，男性对女性领导潜力的观念也发生了可喜的转变。[71] 因此，最初对女性代表配额制的强制实施使选民，特别是男性选民，更新了信息，克服了信息障碍——这是造成女性代表比例不足的根源之一。然而，巴基斯坦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配额制违反了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因而加重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是迫害。[72]

在许多地方，这种政治代表预留制也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在实行了女性席位预留制的地区，女性公民参与村级会议和得到当权者的建设性响应的可能性大大提高。[73] 在女性当选为地方政府领导后，政府的公共投资决策会更加符合女性偏好。[74] 其他方面的女性能动性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例如，在实行女性预留制的地区，针对女性犯罪的报案数量大大增加，相应地被逮捕犯罪者的数量也在增加。[75] 性别配额与其他类似的机制可以有效地增强女性在和平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中的话语权，使参与者从中受益（见专栏 7.6）。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只有提高各级政府的女性代表比例才能保证转变的持续性——无论是通过配额制还是其他手段。而维持女性代表比例的一项关键做法是帮助和指导女性党员、新涌现的女性候选人，以及新当选的女性提高能力，并建立起国内外的女性政治家网络。

第 4 章还强调，在诸如女性的生产者组织和非正式工会等组织性不强的机构中，女性代表成功地获得了更高的代表比例。而促进结社自由、鼓励此类团体参与决策的政策将有利于增强这种形式的女性话语权（将在第 8 章中进一步讨论）。促进女性在法律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其他级别政府机构的参与度至关重要。以哥伦比亚为例，该国法律规定所有政务人员（包括内阁成员）中必须有 30%是女性。

专栏 7.6　增强女性在和平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中的话语权

女性在和平进程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中的代表率极低。一项对 1992 年到 2010 年间 24 项和平进程的总结发现，合约签署者中女性代表率仅为 2.5%，谈判各方中女性代表率仅为 7.6%。另一项对和平谈判进程的总结显示，政府代表中仅有 7%为女性。

尽管增加女性在和平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中参与度的效果还缺少系统性证据，但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文献记录显示：近期，在若干冲突后局势中，给予女性更多话语权可能带来了积极效果。在布隆迪、危地马拉、苏丹（达富尔）、乌干达，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冲突后重建进程中并对决策作出贡献时，支持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为寡妇与流离失所家庭提供服务、提供卫生与教育服务等与性别相关问题被纳入政策议程的可能性增加了。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危地马拉与哥伦比亚），女性的积极参与将公共支出导向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女性在冲突中的经历（以及更大的脆弱性）也有可能影响她们对重建议程中优先事项的看法。利比亚、卢旺达的冲突后转型经验以及南非的后种族隔离经验表明，让民间团体参与议程并加强它们与政治领袖的联系，有助于使政策重点更符合女性的需求与关注点。

虽然各类增强女性在和平与冲突后重建进程中话语权措施的效果还需进一步评价，但经验显示两项机制值得考虑。第一，政治代表性方面，设定女性配额制有助于提高女性代表率，在进程启动之初尤其如此。第二，创建专门单位解决性别问题，可以保证女性关切事项能够得到应有重视，正如哥伦比亚民族和解和赔偿委员会的做法。

资料来源：Anderlini 2007，2010；Fisas 2008；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0；世界银行 2011。

经济代表性

一些政府对私有部门的公司董事会也设定了性别配额。[76] 与政治领域的性别配额相似，企业中的女性配额也旨在提高女性代表性，从而转变人们对于女性领导力的观念；打破人们对女性权力人物的性别成见，转变公众态度与社会规范。

挪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全面推行企业性别法定配额制的国家。这一规定实行后，该国公司董事会的女性代表率迅速上升。[77] 美国的一些研究作出了如下富有启发性的分析：董事会中女性代表率的提升将引发企业内部其他高层职务的女性比例提高的联动效应。一项研究显示，前一年董事会女性成员比率的提高与下一年其他高层位置中女性比率的提高呈现相关性，这也意味着这种效应会自上而下地从董事会向经理层扩散，而不是从经理层向董事会扩散。[78] 一项类似研究发现，女性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与女性高级经理人和高收入者的比例呈现正相关关系。[79]

提高董事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有助于改善企业业绩。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多元化程度与组织优势指标的改善相关。[80] 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程度与企业财务收益呈现正相关关系。[81]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采用能够准确测定董事会成员多元化对企业经营成果影响的方法。此外，两项获得严谨证据的研究却得到了相反的答案：挪威公司董事会女性配额制导致了企业在短期内财务表现恶化的问题。[82] 不过，一项挪威研究显示，这些损失是由于董事会新成员的年龄小、缺少高层管理经验造成的，而不是性别原因造成的。[83] 综合考虑，这个研究的成果表明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以充分理解公司董事会女性比率提高与公司表现之间的联系。

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女性在家庭内部较小的话语权反映了女性经济机会、社会规范本质、法律框架和法律执行的综合影响。前文已经讨论过一些增加女性经济机会的政策，本节将更多地讨论影响家庭的法律（及其执行）和社会规范。其中，法律与执法更直接地从属于公共行动，这是本节的重点。尽管法律变化本身不直接转变社会规范，但以往经验表明，废除或修正歧视性法律是提升女性话语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为确保变化的效果，还需要采取其他干预措施。

协调多重法律体系

在讨论具体的法律、法规之前，确保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转十分重要，对许多实行多重法律体系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习惯法和宗教法有时构成国家认可的正式法律框架；即使在不被官方认可的情况下，它们也仍然对女性获取与控制资产的能力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如果国家宪法中规定了非歧视性条款（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此类条款），那么第一步就要确保所有法的渊源都遵循这一原则。非歧视性原则必须成为所有法律、法规有效性的基准，特别是那些决定家庭内部资源控制权的法律。例如，肯尼亚近来废止了之前宪法赋予习惯法与继承法对非歧视原则的豁免权。

确保所有法律、法规都遵循非歧视原则也将提高公民质疑某些法律法规违宪的能力。由女性团体与其他利益攸关者联合发起的违宪质疑，已经促使尼泊尔和坦桑尼亚两国废止了偏向男性继承人的法律条款。问题的关键是应确保法律体系对违宪质疑作出相关规定，并改善女性使用司法系统的状况。

在调节多重法律体系方面不能忽视习惯法。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习惯法都是日常实际的存在，因此充分意识到习惯法的影响及习惯法转变的潜力是出于实用性与建设性的考虑。人们更熟悉习惯法，也更容易接触到习惯法。习惯法采用仲裁制而非抗辩制实行裁决。特别是在那些脆弱的冲突后国家中，由于正式法律系统不存在或者被摧毁，习惯法具有更强的合法性。伯兹瓦纳的习惯法与习惯法庭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一些女性成为了决策的宗族首领，从而打破了数个世纪的传统。应当鼓励通过宣传消除习惯法体系中的性别偏见，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其中，弘扬习惯法体系的价值观，如保护女性等。将正式系统与非正式系统联系起来，有助于改善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性别平等状况。

控制家庭资源

虽然改善经济机会可以增加女性资源、提高女性对资源的控制力，但是法律仍是确保女性获得更大控制权的直接手段。应当将修改家庭法中涉及婚姻、离婚的部分以及土地法中的歧视性条款作为优先事项。

有关婚内财产的法律

这一领域中主要的不平等问题涉及丈夫与妻子对共有财产的使用与处置权。尽管近年来开展了一些改革，但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国家，此类法律条文仍然存在。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47 个国家当中，有 15 个国家的法律仍然赋予丈夫更高的婚内财产控制权。智利也在继续实施赋予丈夫婚内财产控制权的法律。

但是进展也是可能的。埃塞俄比亚于 2000 年改革了家庭法，废止了丈夫限制妻子外出工作的权力，并且要求家庭财产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改革的第一阶段效果为：女性经济活动的重点开始向家庭之外的工作、全职工作以及要求具备更高技能的工作上转移。[84] 摩洛哥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此类法律进行了改革，并在 2004 年新颁布的《摩洛哥家庭法》，彻底删除了称丈夫为一家之主的字眼。

婚姻登记

对于那些没有进行合法婚姻登记、婚姻不受法律承认的女性该怎么办？为了使更多的女性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应当使民事登记程序保持简单，在当地为居民提供低成本的服务，比如卢旺达。或者可以从法律上承认传统婚姻或双方自愿的结合，并保护此类关系中女性的权益。以南非为例，一夫一妻制传统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与民事登记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一样，受相同物权体制的管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考虑到男女关系形成的种种情况，将证实婚姻关系的证据要求降到最低。而最低证据要求的起点可以是同居关系假定，如果男女形成同居关系，那么就可推定二人已经结成了传统婚姻关系，而这种假定可以允许竞争配偶进行反驳。这种登记制度是女性享受司法保护的一个重要步骤（参见下文）。

离婚法

涉及离婚后婚内财产处置权的以及夫妻双方寻求离婚权力的法律、法

> “这项法规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走出男人的家门后，女人可以分得财产，借此开始新生活。”
>
> ——一名来自坦桑尼亚的成年女性

规将有助于女性提高对婚内资源的控制力（通过谈判力）并保障她们离婚后的权益。在婚内财产分割方面，现行的婚内财产制度对于女性的资产积累能力及决策选择权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第 4 章所示，财产共有制要求离婚时将婚内财产平均分配，因而能够为女性提供更多保护。[85] 许多国家，特别是实行大陆法的国家，都实行了夫妻财产共有制。近年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家庭法改革使女性第一次可以选择实行夫妻财产共同所有。与夫妻财产共有的个人选择模式相比，将这项制度定为默认制度可以使更多的夫妻实行婚内财产共有。2001 年，土耳其就是这样做的。

在默认制度为单方财产支配制的情况下，在离婚立法中认可配偶对家庭财富的非货币贡献就十分重要。如果平均分配是离婚时婚内财产分配的底线，那么照料子女、从事无偿家务劳动，并通过其他方式为家庭创造福利的女性应当在离婚时得到补偿。如果在离婚时法律认可女性的非货币贡献，那么单方财产支配制在保障女性财产权方面就可以取得与共有财产制相同的效果。若要实行这一制度，关键在于立法应当明确规定补偿的内容——而不应当将公平起点的解释权留给法庭。肯尼亚的经验表明，前后矛盾的判例法可能会使案件审理的结果大相径庭。[86] 而且，由于家庭房产通常是最具价值的婚内财产，因此规定或假定房产联名登记的法律、法规可以防止女性在离婚时遭受资产损失。

继承法与寡妇

许多国家的继承法并不完善或存在歧视性条款，因而寡妇的财产所有权极易受到损害。例如，22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并未赋予寡妇分得一半财产的权利。由于立遗嘱的做法在低收入国家并不普遍，因此无遗嘱死亡的相关法律（即在死者未立遗嘱的情况下规定财产分配的法律）决定着财产分配。因此，女性的财产权往往会被削弱，从而将她们权益置于男性亲属或姻亲的决断之下，没有丝毫保障。另一个问题是，多重法律体系往往也会影响寡妇对财产的继承，特别是对土地的继承。在伯兹瓦纳、尼日利亚、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和多哥等国，习惯法高于成文法。赞比亚 90% 的土地都是按照习惯法分配的，并且将土地与房产区分开来，只传给男性继承人。

如有可能，应当修改具有歧视性的无遗嘱死亡法律，而且在个人选择立明遗嘱的情况下，法律应当确保寡妇的权益得到保护。但是将财产遗赠给谁的决策裁量权并不总是有利于寡妇或遗女。这个漏洞可以通过在法律中将寡妇与遗女规定为法定继承人的方式来解决。巴西的法律规定，即便死者留有遗嘱，寡妇与子女都有权按相等份额继承过世丈夫/父亲的一半财产。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法律规定不能将寡妇排除在遗嘱之外。[87] 惩罚剥夺寡妇土地者的法律有助于保护寡妇的财产。目前加纳、马拉维、乌干达、赞比亚等国已具备相关法律、法规，但法律的实施仍然面临障碍。保护寡妇财产的另一手段是建立法定婚姻财产共有制度，此项制度使寡妇自动享有半数的婚内共有财产，而丈夫只能处置剩余的一半财产。总体而言，在许多国家婚姻法的改革比继承法的改革进展更快，这意味着前者可以成为改革初期保障寡妇权益的重要切入点。

减少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家庭内部权力的强大社会规范和女性

在家庭中谈判力有限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要减少家庭暴力，除了不断完善法律框架和加强对暴力受害者的服务之外，还必须解决上述决定因素。

通过信息与谈判力改变传统和行为

尽管目前还缺乏对各类计划的严格评估，但一些改变社会规范与行为的计划已显现出良好的前景。这些计划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针对男性、女性及青年的教育与宣传活动。比如南非的“灵魂城市计划”，这是一项以转变社会规范、个人观念，以及社区为目标的多媒体计划。一些社会规范在该运动实施后发生了转变，如将亲密伙伴间的暴力视作私人隐私的社会观念等。[88] 另一个例子是南非的“阶梯计划”，该计划对两性进行单独培训，提高两性的沟通和相处技巧。一项严格的影响评估显示，该计划明显降低了男性对亲密伴侣实施暴力的几率。[89] 不过，对其他一些计划的影响评估则显示，提供信息收效甚微或没有成效，这表明，为弄清楚如何使计划取得实效，有待进一步开展工作。[90]

应当通过有关性别规范、权益、依法追索权及可获资源的教育，为青少年（例如在校青少年）提供教育与信息服务。以学校主导的计划，特别是包含多个组成部分的计划，应加强针对暴力的知识教育与保护行为，但此类计划对暴力发生率的影响还有待实证证明。[91]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减少约会暴力计划进行的严格评估发现，此类计划对预防与降低暴力发生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影响主要归功于社会规范与性别角色的转变，以及社区服务意识的提高。[92]

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可以减少家庭暴力，但有经验表明，应当谨慎推行此类计划。增加经济机会或加大对女性的转移支付力度（例如通过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可能会提高女性的谈判力，但也可能加剧家庭暴力（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直接针对这个影响因素的辅助性计划将有助于减少家庭暴力。拓宽和增加女性的退路，为女性提供了提高谈判力的长效手段，从而减少家庭暴力。一种方式是丰富女性的资产基础，特别是住所（让她们有地方可去）和土地所有权。印度喀拉拉邦的相关工作显示，女性的财产所有权与家庭暴力发生率的降低具有相关性。[93] 第二种方式是提高女性摆脱婚姻关系的能力。美国“单方面离婚”的相关法律使家庭暴力发生率降低了 30%左右。[94] 此外，还应当注意到离婚女性的子女抚养权与可获取的资源。

落实反对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东地区、北非地区、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切实贯彻反对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此类法律、法规可以实现多重目标，包括界定不同类型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规定执法与案件调查中各参与者的权限与职责，提高社会意识，体现政府承诺。已经颁布相关法律、法规的国家应当对其进行审核，确保法律条文明晰，具有可操作性。此外还可以开展多方面的改革，包括颁布相关法律、实施相关政策，以规范刑事诉讼程序与对受害者的服务（如禁令、庭审程序、被害人援助与伤情报告制度）。

> “以前男人们总是打我们，打完就算完。而现在我们可以向警察局报案。”
>
> ——一名来自南非的成年女性

有效应对家庭暴力

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的援助应

该迅速且全面——电话热线、应急避难所、法律救助、心理治疗、支援小组、创收计划以及儿童福利服务。[95] 综合上述服务，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家庭暴力，因为及时的响应对于认定家暴事实和保护受害者具有重要意义。以马来西亚为例，公立医院设有一站式的危机中心。当因家庭暴力受到伤害的女性前往急诊室就诊时，她可以立即得到医护人员的检查与诊治，之后还将被移交给女性组织的社工与志愿者，而后者会在必要时为她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为其协调进一步的援助。也应该在系统内的其他节点设置此类综合性的应对服务，特别是在警察局，因为那里可能是接触到受害者的第一站。

在没有实现综合性救助服务的地区，需要对警察、医护人员及其他服务提供者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如何为受害者提供援助，支持现有的服务与相关法律、法规。西班牙就将培训纳入了它的《反性别暴力综合保护措施法》。该法的实施包括宣传与传播运动、受害者热线、男性建议服务和法官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培训（内容包括家庭暴力意识、受害者处置、法律特点等）。警察与医务人员也会接受培训，而后者需在国家卫生系统内接受有关暴力受害者治疗的专项健康准则培训。

但是，对家庭暴力进行系统化刑事定罪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不是所有女性都希望其伴侣获刑（特别是在丈夫是家庭唯一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而且许多人排斥迫使他们接受惩罚性行为模式的系统。[96] 许多女性认为保护令更有帮助。以美国为例，数据显示，虽然违反保护令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种保护令仍然可以降低暴力行为的重复发生，并且提升女性的安全感。[97] 许多国家，如保加利亚，提供临时保护令和子女监护。[98] 一些国家简化了（地方层面的）临时禁止令的颁布流程，使各地能够更迅速地对危机局面作出响应。菲律宾的村干部（Panang Barangay）有权颁布有效期为 15 天的保护令，让女性及其子女可以在此期间前往法院寻求法院的命令。此外，警方也拥有发放临时禁止令的权力。[99]

> “他们不断地讲述着庇护所的故事，但这不过是烟雾弹。当我们这些农村女人可能被杀掉的时候，两所远在贝尔格莱德的庇护所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
> ——一名来自塞尔维亚的年轻女性

保障公民权利得到落实——改善女性获得司法公正的途径

除改善法律条文的内容外，还需要采取措施，既赋予女性落实自身权利的能力，又让司法体系更能反映女性需求。为此，需要在以下三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负责制定、落实与实施法律的机构应该增加女性代表，司法系统应该更好地反映女性客户与女性利益攸关者的声音。一些国家通过设定执行财产法的法官、警官与政府官员中的女性配额，使女性得到更充分的代表，但有证据显示，这些变化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女性地方法官的出现有助于提高她们的男性同仁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该采取性别敏感的方式。[100] 埃塞俄比亚要求地方土地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这大大提高了女性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及其在土地登记过程中的参与程度。[101] 在卢旺达，政府出资支持关于土地相关法律法规的政策讨论，并且让包括女性团体在内的民间团体参与讨论，这不

仅有利于完善政策，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个体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在巴基斯坦，女性律师助理展开咨询，将女性关切的问题融入政策报告中，塑造了话语，影响了政策决策者。[102]

除帮助女性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外，技术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女性意见在法律政策环境中得到体现。自 2008 年取得独立后，科索沃宪法起草委员会决定，允许农村女性参与宪法起草，但前提是她们能够在 48 小时内赶到宪法起草所在的城市。“妇女互助国际”组织通过手机动员了 250 名农村女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到宪法起草所在的城市，并向宪法起草委员会发表意见。因此，女性参与政治的相关条款，以及保障性别平等的其他措施被写入了该国宪法。[103]

第二，如果司法系统的各个部门能够具备更高的敏感度响应女性的特殊需求或明确服务目标女性群体，那么女性的权利就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在一些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拖延时间较长的国家，政府设立了特别法庭或快速法庭，如利比里亚针对强奸案件设立了特别法庭，尼泊尔为女性与儿童案件专设了快速法庭。此外，还应当提高服务提供者对相关法律的敏感度。印度尼西亚的“女性主导家庭计划（PEKKA）”下的“女性法律赋权计划”面向村级律师助理开展了家庭暴力及家庭法的相关培训。该计划还为法官、检察官、警察、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官员举办了地区论坛，提高他们对性别问题的意识。[104] 西班牙要求法官、地方治安官和其他执法人员参加有关性别平等、非歧视原则和针对女性暴力的特定培训。参加培训的法官们反馈，他们对暴力问题的观念有所改观，并为同事提供帮扶培训。如果女性文化水平对女性使用权利构成限制，那么可以将法律条文改写成更简单的语言或方言，伯兹瓦纳已经完成了此类改写工作。

专门服务女性目标群体还要求缩短女性与服务的距离，以解决女性在时间和流动性上的限制问题。例如，通过为女性提供社区律师助理和流动法律援助站，增加女性使用司法服务的途径。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创设了 188 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警察队伍，部署在各个城市与乡村地区，专门处理针对女性的犯罪，此举让女性可以更放心和便利地联系警察、汇报家庭暴力案件。[105] 巴西与秘鲁率先引入了由女性管理的警察局和专门针对女性的服务，大大增加了女性使用司法服务的次数。[106] 专门服务女性目标群体还应当考虑到成本因素，因为能够支付司法服务费用的女性比例较低——在贫困与性别不平等问题伴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印度尼西亚免除了贫困人群与边缘化人群的诉讼费用，从而增强了女性通过法庭解决问题的能力。[107]

第三，应当搜集并公布相关数据，比便让公众认识到女性在使用司法服务方面遇到的问题。目前许多国家仍然缺乏以下方面的综合数据：女性可获取的司法服务的类型和质量方面的数据、女性在使用司法服务时遇到的障碍方面的数据。更多的公共信息强化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同时也有助于找到司法系统的瓶颈所在，从而改善司法系统责任制、明确行动的优先领域、设计干预措施。

加强生育决策的女性话语权

对于世界上一部分地区而言，计划生育服务的稀缺仍然是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全部人口都无法获得计划生育服务；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获得足够服务的人口

仅分布在特定地理区域内——比如，农村地区比城镇地区更有可能面临服务短缺的问题。此外，一些特定人群（如贫困人群）在获取服务方面也可能受到限制。对于此类人群，改善计划生育服务的提供是当务之急。

然而，生育决策的控制权——子女数目与时间间隔——超出了生殖健康服务的范围。因此，另外两大政策领域对于加强女性的生育决策控制权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政策领域是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使其能够根据个人意愿决定生育的子女数量，并逐渐改变影响这种意愿的社会规范。第二个政策领域是提高被排斥群体的计划生育服务质量。

两性在家庭中的相对谈判力在生育决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如果男性继承的土地较多，那么夫妻生育子女的数量就会更吻合男性而非女性的意愿。[108] 前文已经讨论过一些增强女性谈判力的政策方案，包括积累女性资产与增加女性收入；拓展女性的退路选择；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拓展女性获取母婴保健服务的渠道。

> “教育与宣传可能是使更多男性和女性使用计划生育服务的最佳手段。”
>
> ——一名来自不丹的青年妇女

让男性了解避孕的好处与方法，有助于增强女性在自身生育决策中的话语权。将丈夫也纳入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可以使避孕率大大提高。孟加拉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109] 新生儿数量也因此有所减少。在中国，和只有妻子接受计划生育教育的家庭相比，夫妻双方共同接受计划生育教育的家庭具有较低的怀孕率与堕胎率。[110] 不过大环境十分重要。有时完全将丈夫排除在外，也会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从赞比亚的经验来看，只向女性而非夫妻双方提供免费的避孕服务代金券，大大提高了避孕服务的使用率，降低了意外怀孕的几率。而如果向夫妇双方发放避孕服务代金券，虽然能够提高避孕率，但却无法降低意外怀孕的几率。[111]

从更普遍的角度看，改变关于家庭规模的角色模范及其引起的人们的偏好变化可以大大降低生育率。例如，巴西的肥皂剧所描绘的家庭人口较少，而此类肥皂剧的风靡降低了生育率，特别是降低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女性的生育率。[112] 然而，至于哪项政府政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社会规范，还缺乏实证依据。不过一项对坦桑尼亚政府赞助的一部广播肥皂剧的评价表明，该节目鼓励了家庭与社会讨论避孕问题，并大大提高了避孕率。[113]

改善计划生育服务应该围绕以下三方面。首先，应当保证种类充足的避孕产品的供给、注册以及快速地完成对避孕产品的预审，此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到相应避孕产品的服务提供商的供货和仓储能力。可能还需要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因为大量库存的成本很高（比如，如果避孕用品没有售出或在售出前过期的话）。

第二，要做出明智的决定，客户就必须充分了解现有避孕产品的种类、副作用及其优劣势等。例如，埃及、洪都拉斯、马尔代夫和尼日尔的消费者中仅有一半了解避孕方法可能的副作用或问题。[114] 第三，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保护个人或夫妇隐私。这就需要对医疗服务人员开展计划生育的专项准则培训。前文中对赞比亚的讨论已经表明，与女性的交流方式不同（私下单独交流或与在丈夫在场

的情况下交流）所取得的效果也可能十分不同。

避免性别不平等在青少年中跨代延续

某些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代际复制会导致性别不平等陷阱的出现，这最有可能影响社会中的贫困人口与被排斥人口。前文已经提到解决某些问题的办法——比如，通过教育帮扶处于劣势的人群；增强女性的话语权及其在社会机构中的参与度；增强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下文将讨论解决青春期及成年早期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措施。青春期与成年早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所做的决策与选择最终会决定个人的技能、健康、经济机会和话语权。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不仅表明了尽早干预的重要性，也表明了禀赋、经济机会和能动性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在职培训计划不但可以改变就业前景，也可以推迟怀孕年龄——这决定了女性未来的人力资本和话语权。

改进教育与健康结果

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各个国家进行了严格的影响评估后，所得的证据表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在提高少女在校率方面十分有效。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等国的记录显示，此项措施对少女的中学入学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15] 近年来，非洲各国的实践也取得了相似的成果。马拉维针对女孩的小额现金转移支付提高了女孩的入学率，降低了女孩的辍学率。[116] 此外，尽管这些现金转移支付的目标是教育领域，但对其他领域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获得现金转移支付的女孩患艾滋病的几率是未获得现金转移支付的女孩的三分之一，[117] 而且心理也更加健康。[118]

一些其他措施也有助于提高少女的在校率。让女孩认识到上学的收益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马达加斯加向男孩、女孩及他们的父母提供小学毕业生收入状况的信息，这一举措使小学入学率提高了 3.5%。[119] 多米尼加共和国也采取了相似措施，向男孩提供教育回报的准确信息，此举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20] 奖学金为学业优异者提供资金奖励等措施为学生创造了激励，可能提高自我效能和考试成绩。[121]

除了鼓励少女继续上学之外，还需要制订相关政策或其他常规办法，帮助丧失上学机会的女孩迎头赶上，以便尽早积累人力资本——无论她们的失学是由于自身还是他人的错误决定所造成的。这种“二次机会”计划可以减少因早期教育成果不佳而引发的其他后期不良后果的风险（如收入较低和健康状况较差）。[122] 不仅如此，由于母亲的健康与教育水平与子女的健康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因而这些计划也可以减少性别不平等的代际继承。

教育领域的二次机会计划包括针对落后在校生的计划（例如，语言补习计划）以及为过渡或重返主流教育系统而设计的专项计划（例如同等学力计划和扫盲计划）。在为少女设计这些计划时，政策制定者需要锁定那些因缺少资金、家庭负担过重或早婚早孕而面临最大落后风险的女孩，而这些因素往往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

《200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青年的大量分析表明，必须确保此类计划按照相关人群的需求量身定做（且定位必须准确，因为它们的成本通常较高）。[123] 尽管本章中所述的计划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评估，但恰当的课程设

置以及适度的灵活性表现出了明显的重要性。较有前景的干预案例包括：墨西哥的同等学力计划，该计划允许学生在课程体系内进行选择（还包括了职业技能），确保校外青少年能够得到与其需求最为密切相关的训练；哥伦比亚也开展了相似的计划，在课程安排与学习进度方面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其他干预措施也尝试着将生存技能与职业培训融入到文化或算术课程中，提高对失学青少年需求的相关度。例如，“塞内加尔女性扫盲试点计划”将文化学习与各地所需的不同生存技能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健康教育、小规模贸易或果蔬加工等。[124]

提高入学率的计划（尽管通常不被视为“二次机会”计划），如向女孩提供现金转移支付的计划，不但可以大大降低辍学率，还有可能鼓励失学女孩重返校园。在马拉维，小额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在该计划实施前辍学女孩的再入学率提高了 2.5 倍。[125] 此外，该计划实施一年后，得到资助的女孩的结婚几率降低了 40%多，怀孕几率降低了 30%。[126] 这些成果表明，一些小额的激励可以极大地改善高危女孩的处境。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在设计现金转移支付方案时也应当考虑到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问题，以确保这些计划不会间接损害青少年女性的学业成绩。哥伦比亚的一项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虽然提高了一些男孩和女孩的中学出勤率与入学率，但却降低了计划参与者的兄弟姐妹们（未参与该计划）——特别是姐妹们——的出勤率，并增加了他们的工作时间。[127]

“上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学能让我们学会读书写字，并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上学，那么我们可能找不到好工作，而且抱憾终身。”

——一名来自阿富汗的年轻女性

拓展经济机会的获取渠道

年轻女性就业的过渡阶段是解决性别不平等代际复制的重要时期。目前已获得了一些证据，证明哪些措施能够发挥实效。如前文所述，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帮助女性顺利过渡，而近期的影响评估表明，可以采用两种手段改善此类计划的效果。第一，向年轻母亲提供额外补贴，帮助她们解决照料子女的费用问题，鼓励她们参与此类计划。阿根廷的“青年计划”（Programa Joven）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该计划面向 35 岁以下的低收入男性与女性。除向母亲提供额外补贴之外，该计划还为她们提供了培训、教材、学习材料、工作服和交通费用。该计划对年龄在 21 岁到 35 岁之间的女性与年龄在 21 岁以下的男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使前者的收入显著提高，就业率提高了 9~12 个百分点。[128]

第二，这些计划可以锁定劳动力市场上可能阻碍年轻女性的潜在信息问题。秘鲁的 ProJoven 计划为年轻人提供培训，内容包括课堂培训和带薪实习。由于该计划也试图通过培训女性从事传统的男性职业来解决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现象，因而它在转变性别角色方面具有“改革性”的潜力。从一系列指标来看，女性的表现优于男性——的确如此，18 个月后女性的劳动收入增长超过了 92%，而男性的劳动收入增长则不足 11%。在接受该计划资助的人群中，职业隔离的现象得到了缓解。[129] 哥伦比亚的“青年行动计划”（Jovenes in Action）展示了解决信息问题的另外一种可能方式：在课堂培训结束后，在实习过程中为

学员提供在职培训（此计划同样包括为母亲提供的额外补贴）。[130] 此项计划针对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的贫困失业人员，参与该计划的女性的收入增幅高于男性。该计划也增加了女性得到正式工作的可能性。分析表明，随着在职培训强度的增加，培训的效果也提高了。

上述实例仅展示了此类计划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潜力，至于哪些计划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国情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近年来肯尼亚的经验表明，让女性了解男性主导行业的教育回报率高于女性主导行业，可以提高贸易学校课程的女性入学率——此类课程培训女性进入男性主导的贸易领域。[132] 鉴于目前还需要取得更多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某项计划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国情条件，由公、私部门合作实施的“青春期少女倡议”计划正在评估若干干预措施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冲突后国家的实施效果。这些措施包含“硬性技能”，如职业培训，和“软性技能”，如生存技能培训与指导（详见概述部分专栏 7）。

帮助青少年作出明智的生育决策

青春期是许多青少年男女初次体验性生活的时期。女孩倾向于和比自己年长的男孩或男人开始性生活。年龄差距和性伴侣（在经常情况下）更加丰富的经验，削弱了女孩在做出是否采用避孕措施的决定时的话语权与谈判力。在许多情况下，女孩也得不到足够的生殖保健服务或者缺乏对自身权利的充分认识。由此导致的意外怀孕会带来一系列健康和经济方面的长期影响，如教育水平较低、就业推迟等。

帮助青少年降低上述风险并非易事。单独地推广避孕措施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的几率。同样地，单独地采取性教育干预措施也未能取得广泛的实效。不过，严格的评估发现，如果将这些措施与其他措施相结合，如技能培养，则能够有效地在各类环境下降低青少年的意外怀孕率，不过这些计划仍需要根据文化与社会背景作出适当的调整。[133] 例如，乌干达针对青春期少女开展了一项计划，将生殖教育、生存技能培训、生计训练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安全套使用率，降低了参与该项计划的青春期少女的生育率。[134] 有时单纯的经济赋权就可以产生显著的影响。一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青年就业培训计划的评价显示，这项将生存技能与学徒期相结合的培训计划大大降低了参与者的怀孕率。[135]

志向

青春期也是个人终身志向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规范与观念开始对男孩和女孩产生约束力。对于任何国家与文化，青春期是男孩发展空间得到扩展的时期，也是女孩发展空间可能缩小的时期，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贫困的女孩或者农村地区的女孩来说，对于她们而言地域上的距离与流动性的社会规范会形成了重要的束缚。因此，这一领域的干预措施应当着重培养生存技能，包括为青春期少女积累社会资本，让她们树立更好的志向，提高能动性，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率。

让公众了解女性领导者和掌权者楷模可以打破对女性角色的成见，减少性别规范的代际传播。一项对印度女性政治代表预留制的研究表明，经常接触女性领导者的少女，更有可能希望晚婚、少生孩子、并从事有高等教育背景要求的工作——而这些志向

都是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136] 增加年轻女孩的经济机会，可以改变她们自身及其所在社区的性别角色观念。德里推行了一项计划，将一些社区与高薪电话工作的雇主联系起来。实践表明，在这些社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越来越多的人们都期望他们的儿子能够得到大笔的嫁妆，并且认为女性婚前独自生活、婚前/后和产前/后工作是可以接受的事情。[137]

保护女儿的继承权同样可以增强女性的能动性。在柬埔寨、哥伦比亚和卢旺达，无遗嘱继承法规定女儿（和儿子）可以分得一份父母的土地。尽管立遗嘱可能有助于女儿得到更多财产，但在主导社会规范的影响下父母的偏好往往对女孩构成歧视。在墨西哥，尽管妻子与儿子被选定为财产继承人的可能性相当，而且母亲比父亲更有可能选择女儿作为唯一继承人，但女性仍然不会留给女儿相等比例的财产——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倾向于选择儿子作为唯一继承人。[138]

一项应对的政策措施是，明确界定立遗嘱者可控制的财产比例，并将其余比例的财产留给配偶与子女。卢旺达通过土地产权登记改革实现了这种政策变化，从而明显地增加了女儿（和儿子）继承的土地。[139] 在印度，这种法律改革不仅增加了女孩继承的土地，而且提高了女性的结婚年龄与教育水平。[140] 尽管印度的这些改革还并不足以完全消除继承模式中的男性偏好，但却有力地推动了下一代性别差异问题的解决。

制订“性别职能”政策：强调“性别主流化”

前文主要讨论了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解决各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本节将进一步拓宽讨论范围，讨论总体方针政策，解答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对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性别差异化影响进行系统性的考虑这一问题。考虑这些性别差异化的影响有两重原因，正好反映本报告的写作动机。第一，缺乏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甚至可能削弱不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政策的效果。第二，这些政策的效果很重要，因为许多政策的实施也有利于改善性别平等状况。此处将从战略层面上讨论“性别主流化”。

性别问题如何影响政策的效果？本报告通篇都在讨论性别不平等问题持续存在的领域。在这种顽固的表象下，是市场机制、正规/非正规制度，以及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反过来会影响男性与女性如何对不同的政策作出响应。忽视这些因素，意味着政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即使这些政策与性别问题根本没有关系。

以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为例。两性间的相对谈判力影响着家庭对政策的响应，这种谈判过程不仅会延伸到家庭之外的选择（例如，离婚法、劳动力市场机会），而且还会延伸到彼此间分享信息的多少。菲律宾对已婚夫妇进行的一项试验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当丈夫得到一笔相当于一天工资的钱时，他会根据妻子知情状况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妻子不知道这笔钱，那么他会选择把钱存起来；如果妻子知道这笔钱，那么他会选择把钱花掉；如果配偶间可以讨论这笔钱的用途，那么他会把钱放到妻子的账户中。[141]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案例也可以说明家庭关系的重要性。收获油棕榈时的性别角色分配为男性爬上树收获果实，女性则采集掉在树下的果实。在油棕榈产业意识到掉在树下的果实

中有 60%~70% 没有被采集之后，种植园主采取措施解决女性遇到的约束因素，如给女性发放特制网、根据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协调果实采集时间。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直到推行了 Mama Lus Frut 计划，女性得到了自己的收获记录卡，收获所得收入直接打入个人的银行账户中，上述情况才有了改观。在产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油棕榈收割的女性参与度也出现了大幅度提升。[142]

上述案例表明了为什么所有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考虑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顽固根源，理解哪些根本原因对于当前政策关系重大，并且弄明白怎样才能使政策更加有效。这种分析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明确采取什么行动以便同时改善性别平等状况。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应对性别差异化的市场失灵问题

你的无知可能伤害其他人：信息问题

如第 5 章所示，由于雇主和贷款方缺乏可靠的信息，女性要进入新行业和融资面临重重困难。前文已经讨论过一些利于信息流动的政策，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其他方面采取干预措施。以银行监管为例，政策干预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改善银行的风险管理。设立征信管理局，搜集个人贷款信誉度信息，供银行授信贷款决策使用，是一种常见的风险管理手段。由于女性大多依赖非正规借款与小额信贷，因此银行数据库中缺乏女性的数据，所以潜在的正规借贷部门就面临着信息问题。如果能够将女性小额信贷活动的信用记录收入相关数据库，这种信息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善银行监管政策，便可以同时改善性别平等状况。

在厄瓜多尔的“Proyecto Servir 项目”中，政府参与者、国际机构、小额信贷机构和私有征信管理局联手将小额信贷数据纳入了征信管理局的数据库。该项目的最初目标是两个地区的 27 家小额信贷机构的数据，但由于巨大的需求，该计划最终将全国 180 多家信贷机构的数据都纳入了数据库。这一干预措施不仅有助于小额信贷机构优化授信决策，还有助于小额信贷用户（多数为女性）得到正规部门的授信。

认识哪些人重要，认识多少人更重要：建立女性网络

由相当人数的同性个体组成的社交网络可以帮助新成员作出进入新行业或新职业的决策，并为之提供成功方法等方面的信息。但是由于此类网络也会排斥异性成员，从而导致性别不平等问题的长期存在。秘鲁的一个农村公路项目就曾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该项目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改善农村交通状况，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实现这一目标时，政策制定者也考虑到了性别平等问题，并将重点放在提高公路养护工作中的女性人员比例上。该项目明确地雇佣了一些公路养护领域的女性微型企业家。该政策最初设定了 10%的最低女性参与率限额，此举将女性参与率从最初的 4%提高到后来的 24%（即女性占微型企业家人数的 24%）。女性更多地参与了群体活动，女性将公路养护作为职业也逐渐被社会所接纳。

创造公平的环境

废除法律、法规的歧视性内容

在出于其他目的修正法律、法规的同时，寻找并修正法律条文中的歧视性内容，将有助于改善性别平等状况。以税收政策为例。在两性收入或薪水相同时，女性的税率却与男性不

同，这是对女性的显性歧视。摩洛哥的法律规定，子女的免税额被分配给丈夫使用，除非女性可以证明丈夫与子女在经济上依赖于她。[143] 因此男性的税收负担低于女性。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税收改革应尽可能使两性税率相等，以避免对女性工薪的惩罚性高税率。这样的改革也会提高性别平等程度。乌干达的法律规定，未用于经营的继承财产、个人财产和工作收入不必纳税。提高效率的税收改革应缩减或取消这种税收减免。鉴于男性所继承的财产远远多于女性，这样的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144]

让现有法律、法规更好地为女性服务：提高执法水平

赔偿机制对女性设置了更多限制——无论是企业内部的投诉机制，还是警察和法律服务。改善女性获得执法机制的服务将有利于在企业、国企和政府实施干预措施促进性别平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为交通部门调整计划的组成部分，国家铁路公司与工会联手，划拨出专项资金，向那些本应享有退休福利的员工的遗孀遗孤提供补偿。补偿金直接发给受益人；如果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受益人，补偿金将会被存入专项资金账户以备今后认领。这一措施得到公开推行，以避免在男性员工去世后，他们的遗孀和遗孤难以了解赔偿金或索取赔偿金的情况。

拓展服务获取渠道

女性使用服务的方式与男性不同，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方面，女性行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服务提供者对待女性客户的态度有所不同。因而政策应向客户服务导向转变，作出更多的根本性结构调整。电价问题即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生动的例子。近期一项研究表明，15 家拉丁美洲的电厂中，14 家的居民用电价格要高于商业用电价格。[145] 由于女性更有可能在家庭住所经营自己的生意，因此这种定价政策增加了女性经营的小型企业的成本。

重视传统

认可女性照料家人的责任

女性承担着照料家人的超额家庭责任。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政策——从改善基础设施到修改劳动法规——都具备影响这一现状的潜力。尽管影响可能并不明显，但其他政策也可以改变现状。越南在重组国有企业过程中所采取的遣散费计算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对于私有部门而言，公有部门的优势（产假时间更长、工作安排灵活）意味着被精简人员中女性的损失大于男性。因此如果仅仅根据工龄长短提供补偿，实际上会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146] 考虑到这一点，越南政府将按工龄长短计算的赔偿金结算与一次性大笔结算相结合。该项政策明显考虑了女性所承担的照料家人的责任，并将这一因素纳入失业人员补偿金计算的考虑范围。[147] 被解聘一年后，认为自己的生活比过去幸福或者同样幸福的女性要多于男性。[148]

考虑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

正如前文所述，夫妇并不总是（或经常）行动的单位。夫妇二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偏好，也可能不完全共享他们的收入。因此，归根究底，夫妻之间不同的谈判力决定着家庭决策的结果。从直接现金转移支付到改变创收机会状况的一系列政策都可能改变家庭成员间的谈判力。谈判力会怎样变化？这种变化会对政策设计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援救委员会针对布隆迪女性实施了一项农村储蓄与信贷计划，以加强女性对该计划所带给家庭的资源的控制力。该计划试行了一项

由六节课构成的课程，帮助课程参与者及其配偶分析家庭决策状况。从该课程的女性参与者的反馈来看，她们的决策自主权要优于那些参与小额信贷但没有参与此项课程的女性，前者遭受家庭暴力危害的概率也低于后者。

关于此类政策的思考与认识会不断进步。最初，许多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都是针对女性的，这部分是因为女性更可能从所得资助中拿出较大比例用于子女的培养。然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本身就使家庭内部的谈判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有时会使家庭暴力在短期内恶化。墨西哥就出现了这样的负面效应。[149] 虽然从长期来看，这种负面效应会消失或改变，但是许多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以解决家庭暴力及其他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如引入有利于减少家庭暴力的条件（巴西），向母亲及其家人宣传此类问题并培养解决问题的意识（哥伦比亚、秘鲁），或派遣专门的社工（智利）。[150]

缺乏有力的证据

要搞清楚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效，应当采取两类行动。第一，各项计划与项目应设计并落实有效的监控体系，抓住目前问题的性别层面及其行动的效果。这就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例如，不仅要从基线调查中取得按性别分类的数据，而且要抓住这些调查中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这对项目设计至关重要（例如，获取该项目服务时遇到的障碍）。随着项目的推进，按性别分类的受益人统计数据将有助于监控项目进程，找出实施进程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二，需要着重了解各项具体干预措施是否有效。评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评估解决不同的问题。一项设计周密合理的影响评估通常会利用对照组来衡量对项目受益者的影响，因此非常有效。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说，在经济机会方面，已经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所产生的效果进行过影响评估，但人们对加强女性社交网络建设的政策效果还知之甚少。再比如说，虽然人们已通过评估了解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对多种结果产生的影响，但此类计划对产妇死亡率产生的影响，还缺少严密的证据支持。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各地方政府推行政治代表预留制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此项制度对女性议会席位数量的影响以及对女性获取司法渠道的影响的证据尚不充足。

值得欣慰的是，与十年前相比，目前已经获得的事实依据的数量明显增加了，但需要做的工作也还很多。应当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将评估作为组成部分嵌入到项目内，预先纳入计划。此外还需要获得许多其他资源。尽管各个领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知识差异，但两大主题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应着重比较渐进式干预措施（即在现有性别规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干预措施）和改革式干预措施（即旨在转变性别角色的干预措施）的影响，特别是在同一政策领域（如职业教育）内两类政策的不同影响。第二，应考虑到潜伏于各种“老大难”性别差异问题之下的多重制约，应当重点关注对综合干预措施（如向企业家提供信贷与培训）而非单一干预措施的评估，借此理解在不同情况下哪些制约因素发挥了作用，哪类干预措施组合最为有效。这些证据能够让决策者将精力集中在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在减少性别不平等状况方面具有成效的干预措施上。

注释

1. 世界银行，2003b。
2. Waddington 等 2009。
3. Tadesse 等 2010。
4. Galiani，Gertler 和 Schargrodsky 2005。
5. Foster 和 Briceño-Garmendia 2010。
6. Foster 和 Briceño-Garmendia，2010。
7. 联合国 2011。
8. Bartlett 等 2005。
9. Bang 等 1999。
10. Ensor 等 2008。
11. 世界银行 2005a。
12. Bhushan，Keller 和 Schwartz 2002。
13. Björkman 和 Svensson 2009。
14. Cotlear 2006。
15. Lim 等 2010。“Janani Suraksha Yojana”项目对围产期胎儿和新生儿死亡率也有很大影响，每千例怀孕的围产期胎儿死亡数减少了 3.7 例，每千例活产的新生儿死亡数减少了 2.5 例。这项研究未能发现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不过，这可能是由于孕妇死亡本身是一个相对少见的情况，而研究样本数量不够大，只能发现非常重大的影响。
16. Witter 2011。同“Janani Suraksha Yojana”的项目研究一样，分析未能发现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17. Prata 等 2010。
18. Prata 等 2010。
19. Ibid。世界卫生组织等 2010。
20. Burde 和 Linden 2010。
21. Jacoby 和 Mansuri，2011。
22. 此处运用各个国家的时间利用状况调查得到的结果，对年龄在 18 岁到 65 岁之间、子女在 17 岁以下的所有已婚个体进行对比。
23. Attanasio 和 Vera-Hernandez 2004。
24. Berlinski 和 Galiani 2007；Berlinski，Galiani 和 McEwan 2009。
25. Paes de Barros 等（待出版）。
26. Havnes 和 Mogstad 2009。
27. Medrano 2009。
28. Cascio 2006。
29. Ibid。
30. Havnes 和 Mogstad（待出版）。
31. http：//www.mobilecreches.org.
32. 自就业女性协会学院，2007。
33. Cassirer 和 Addati 2007。
34. Schlosser 2007。
35. Cassirer 和 Addati 2007。
36. Gornick 和 Hegewisch 2010。
37. 各个国家各个年份的时间利用情况调查。
38. 本节分别利用了 Clancy 等（2011）的背景论文和 Köhlin 等（2011）为世界银行环境战略撰写的一篇论文。有关实证依据主要依赖于 Köhlin 等（2011）。
39. Dinkelman 2010；Grogan 和 Sadanand 2011。
40. 亚洲开发银行 2010；Barkat 等 2002。
41. Massé 2003。
42. Ilahi 和 Grimard 2000。
43. Koolwal 和 van de Walle 2010。
44. Zwane 等 2011。
45. 世界银行 2005b。
46. Khandker，Bakht 和 Koolwal 2006。
47.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3。
48. 此评论参见 Todd（2010）。
49. Galasso，Ravallion 和 Salvia 2001。
50. Revenga，Riboud 和 Tan 1994。
51. Holzer 和 Neumark 2000；Leonard 1989。
52. Holzer 和 Neumark 2000。
53. Frisancho，Karlan 和 Valdivia 2008。
54. de Mel，McKenzie 和 Woodruff 2011。
55. Bosch 和 Maloney 2010。
56. Bardasi 和 Gornick 2008。
57. 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施的上述改革及其他影响女性经济的法律改革的细节与分析，参见 Hallward-Driemeier（2011）。
58. 此项改革也使妻子丧失了不允许丈夫走出家门工作的能力。
59. Gajig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11。
60. Deininger，Goyal 和 Nagarajan 2010。
61. Deininger，Ali 和 Zevenbergen 2008。
62. Swanson 和 Rajalahti 2010。
63. Cotula 2002。
64. Ibid。
65. Agarwal 2003。
66. Kumar 和 Quisumbing 2010。
67. 参见 Meinzen-Dick 等（2010）对缺乏依据的讨论。
68. 配额项目得到的数据，http：//www.quota project.org。
69. Esteve-Volart 和 Bagues，2010。
70. Beaman 等（待出版）；Bhavnani 2009。
71. Beaman 等（待出版）。
72. Krook 2009, 78~79；Rudman 和 Fairchild 2004。
73. Ban 和 Rao 2009；Beaman 等（待出版）。
74. Chattopadhyay 和 Duflo 2004。
75. Iyer 等 2010。
76. 各国配额相关的法律涉及的实体类型（例如，上市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各有不同。例如，丹麦、荷兰、冰

岛、爱尔兰、以色列、南非和瑞士对国有企业实行了配额制，而挪威对上市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和城际企业设定了 40%的法定配额。各国实行的企业配额类型、配额目标与实施日期列表，可参见 Pande 和 Ford(2011)。

77. Pande 和 Ford 2011。

78. Matsa 和 Miller（待出版）。

79. Bilimoria 2006。

80. 麦肯锡 2007。

81. 对相关性研究的回顾，可参见 Pande 和 Ford（2011）。

82. Ahern 和 Dittmar 2011；Matsa 和 Miller 2011。来自美国、但严密性略逊一些的证据表明，平均来说，董事会成员性别多样化程度越高，其财务表现越差。

83. Ahern 和 Dittmar 2011。

84. Gajigo 和 Hallward-Driemeier 2011。

85. 此处指的是财产部分共同所有制，即婚后财产平均分配，婚前财产仍归婚前所有者所有。

86. 具体案例可参见 Echaria v Echaria（2007）KECA 1 中的案件，早年案例可参见 Kivuitu v Kivuitu（1991）和 Karanja v Karanja（1976）1 KLR 389。

87. Deere 和 León 2005。

88. Usdin 等 2005。

89. Jewkes 等 2008。

90. 举例可参见 Rodríguez 等（2006）。

91. Adi 等 2007；Finkelhor 2009；Mikton 和 Butchart 2009。

92. 包括“安全约会”计划，“第四个 R：青年关系技巧”计划和“青年关系项目”计划。Foshee 等 1998；Foshee 等 2000；Foshee 等 2004；Fos-hee 等 2005；Wolfe 等 2003；Wolfe 等 2009。

93. Agarwal 和 Panda 2007。

94. Stevenson 和 Wolfers 2006。

95. Morrison，Ellsberg 和 Bott 2007。

96. 实例可参见 Guedes，Bott 和 Cuca 2002；Larraín 1999；和 Parenzee 2001，载于 Bott，Morrison 和 Ellsberg 2005。

97. Carlson，Harris 和 Holden 1999；Holt 等 2003；Logan 和 Walker 2010；McFar-lane 等 2004；Spitzberg 2002。

98. Protection Against Domestic（民用的）Violence Act，State Gazette，No. 27，§1，2005。《家庭暴力防治法案》，国家第 27 号公报，§1，2005。

99. 律师集体女性权利倡议 2009。

100. 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地方法官的未发表研究。

101. Kumar 和 Quisumbing 2010。

102. Warraich 2010；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10。

103.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发展基金，2010。

104. Sumner，Zurstrassen 和 Lister 2011。

105. Natarajan 2005。

106. Jubb 和 Pasinato Izumino 2003。

107. Sumner，Zurstrassen 和 Lister 2011。

108. Rasul 2008。

109. Becker，1996；Green 等 1972；Terefe 和 Larson 1993。

110. Wang，Vittinghoff 和 Rong 1996.

111. Ashraf，Field 和 Lee 2010。

112. La Ferrara，Chong 和 Duryea 2008。

113. Rogers 等 1999。

114. 历年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

115. 有关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情况请参见 Rawlings 和 Rubio（2003）；有关哥伦比亚的情况请参见 Barrera-Osorio 等（2008）；有关厄瓜多尔的情况请参见 Schady 和 Araujo（2006）。

116. Baird 等 2009。

117. Baird，McIntosh 和 Özler 2010。

118. Baird，de Hoop 和 Özler 2011。

119. Nguyen 2008。

120. Jensen 2010b。

121. Angrist 和 Lavy 2009；Kremer，Miguel 和 Thornton 2009。

122. 世界银行 2006。

123. Ibid。

124. 世界银行 2004。

125. Baird，McIntosh 和 Özler 2011。

126. Baird 等 2009。

127. Barrera-Osorio 等 2008。

128. Aedo 和 Nu.ez 2004。

129. Ñopo，Robles 和 Saavedra 2007。

130. 其他计划也显示出这一特点。

131. Attanasio，Kugler 和 Meghir 2008。

132. Hjort 等 2010。

133. Bearinger 等 2007；Gilliam 2010。

134. Bandiera 等 2011。

135. Martinez 等 2011。

136. Beaman 等 2009。

137. Jensen 2010a。

138. Deere 和 León，2003。

139. Ali，Deininger 和 Goldstein 2011。

140. Deininger，Goyal 和 Nagarajan 2010；Roy 2011。

141. Ashraf，Field 和 Lee 2009。

142. 此例摘自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1，47。

143. Grown 和 Valodia 2010。此书对八个国家的显性和隐性税收歧视进行了综合讨论

与分析。

144. Ssewanyana 等 2010。

145. Komives 等 2005。

146. Rama 2002。

147. 大量裁员时期曾采用过这种措施，不过越南政府最终取消了一次性大笔结算的赔偿方式。

148. 世界银行 2003a，第 90 页。

149. Bobonis 和 Castro 2010。

150. Lindert 等2007。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di, Yaser, Amanda Killoran, Kulsum Janmohamed, and Sarah Stewart-Brown. 2007.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Mental Wellbeing in Children in Primary Education. Report 1: Universal Approaches Which Do Not Focus on Violence or Bully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London.

Aedo, Cristián, and Sergio Nuñez. 2004. "The Impact of Training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Case of Programa Joven." Working Paper 48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Agarwal, Bina. 2003. "Gender and Land Rights Revisited: Exploring New Prospects via the State, Family and Market."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3 (1–2): 184–224.

Agarwal, Bina, and Pradeep Panda. 2007. "Toward Freedom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glected Obviou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8 (3): 359–88.

Ahern, Kenneth R., and Amy K. Dittmar. 2011. "The Changing of the Boards: The Impact on Firm Valuation of Mandated Female Board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Anne Harbor, MI. Processed.

Ali, Daniel Ayalew, Klaus Deininger, and Markus Goldstein. 2011. "The Impacts of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Evidence from a Pilot Program in Rwand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Anderlini, Sanam Naraghi. 2007. *Women Building Peace. What They Do, Why It Matter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2010. "WDR Gender Background Paper."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Angrist, Joshua, and Victor Lavy. 2009. "The Effects of High Stakes High School Achievements Award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4): 1384–414.

Ashraf, Nava. 2009. "Spousal Control and Intra-Household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the Philippin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4): 1245–77.

Ashraf, Nava, Erica Field, and Jean Lee. 2010. "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Excess Fertility: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Zambia."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Processe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Asian Development Bank's Assistance for Rual Electrification in Bhutan: Does Electrific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Lif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Attanasio, Orazio, Adriana. Kugler, and Costas Meghir. 2008. "Training Disadvantaged Youth in Latin America: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Working Paper Series 1393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ttanasio, Orazio, and Marcos Vera-Hernandez. 2004. "Medium- and Long-Run Effects of Nutrition and Child Care: Evaluation of a Community Nursery Programme in Rural Colombia." Working Paper Series,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London.

Baird, Sarah, Ephraim Chirwa, Craig McIntosh, and Berk Özler. 2009. "The Short-term Impacts of a School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on the Sexual Behavior of Young Wome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ird, Sarah, Jacobus de Hoop, and Berk Özler. 2011. "Income Shocks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644, World Bank,Washington, DC.

Baird, Sarah, Craig McIntosh, and Berk Özler. 2010. "Cash or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a Cash Transfer Progra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n, Radu, and Vijayendra Rao. 2009. "Is Deliberation Equitable? Evidence from Transcripts of Village Meetings in South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492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ndiera, Oriana, Niklas Buehren, Robin Burguess, Markus Goldstein, Selim Gulesci, Imran Rasul, and Munshi Sulaiman. 2011.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Female Adolescents: Evidence from Ugand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es, Pittsburgh.

Bang, Abhay T., Rani A. Bang, Sanjay B. Baitule, M. Hanimi Reddy, and Mahesh D. Deshmukh. 1999. "Effect of Home-Based Neonatal Care and Management of Sepsis on Neonatal Mortality: Field Trial in Rural India." *Lancet* 354 (9194): 1955–61.

Bardasi, Elena, and Janet C. Gornick. 2008. "Working for Less? Women's Part-Time Wage Penalties

across Countries." *Feminist Economics* 14 (1): 37–72.

Barkat, Abul, S. H. Khan, M. Rahman, S. Zaman, A. Poddar, S. Halim, N. H. Ratna, M. Majid, A. K. M. Maksud, A. Karim, and S. Islam. 2002.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Study of the Rural Electrification Program in Bangladesh."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Dhaka.

Barrera-Osorio, Felipe, Marianne Bertrand, Leight Linden, and Francisco Perez-Calle. 2008.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Education: Design Features, Peer and Sibling Effect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Colomb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389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Bartlett, Linda A., Shairose Mawji, Sara Whitehead, Chadd Crouse, Suraya Dalil, Denisa Ionete, Peter Salama, and Afghan Maternal Study Team. 2005. "Where Giving Birth Is a Forecast of Death: Maternal Mortality in Four Districts of Afghanistan, 1999–2002." *Lancet* 365 (9462): 864–70.

Beaman, Lori, Raghabendra Chattopadhyay,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2009. "Powerful Women: Does Exposure Reduce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497–540.

Beaman, Lori,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Forthcoming. "Political Reservation and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Village Councils." In *India Policy Forum 2010.* Washington, DC, and New Delhi: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Bearinger, Linda H., Renee E. Sieving, Jane Ferguson, and Vinit Sharma. 2007. "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f Adolescents: Patterns, Prevention, and Potential." *Lancet* 369 (9568): 1220–31.

Becker, Gary S. 1996. "Couple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 Review of Couple Studie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7 (6): 291–306.

Berlinski, Samuel, and Sebastian Galiani. 2007. "The Effect of a Large Expansion of Pre-Primary School Facilities on Preschool Attendance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Labour Economics* 14 (3): 665–80.

Berlinski, Samuel, Sebastian Galiani, and Patrick J. McEwan. 2009. "Preschool and Maternal Labor Marke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9 (2): 313–44.

Bhavnani, Rikhil R. 2009. "Do Electoral Quotas Work after They Are Withdraw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Ind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1): 23–35.

Bhushan, Indu, Sheryl Keller, and Brad Schwartz. 2002. "Achieving the Twin Objectives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 Contracting Health Services in Cambodia." ERC Policy Brief Seri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Bilimoria, Diana. 200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Women Corporate Officers."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18 (1): 47–61.

Björkman, Martina, and Jacob Svensson. 2009. "Power to the Peopl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on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in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2): 735–69.

Bobonis, Gustavo J., and Roberto Castro. 2010. "The Role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Reducing Spousal Abuse in Mexico: Short-Term vs. Long-Term Effects."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Processed.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bor Market Dynamics Using Markov Processes: An Application to Informality." *Labour Economics* 17 (4): 621–31.

Bott, Sarah, Andrew Morrison, and Mary Ellsberg. 2005.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Middl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A Global Review and Analysi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61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urde, Dana, and Leigh L. Linden. 2010. "The Effect of Village-Based School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Processed.

Carlson, Matthew J., Susan D. Harris, and George W. Holden. 1999. "Protective Orders and Domestic Violence: Risk Factors for Re-Abus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4 (2): 205–26.

Cascio, Elizabeth. 2006. "Public Preschool and Matern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Kindergartens into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Working Paper Series 1217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Cassirer, Naomi, and Laura Addati. 2007. "Expanding Women'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formal Economy Workers and the Need for Childcar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Chattopadhyay, Raghabendra, and Esther Duflo. 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72 (5): 1409–43.

Clancy, Joy, Tanja Winther, Margaret N. Matinga, and Sheila Oparaocha. 2011. "Gender Equity in Access to and Benefits from Modern Energy and Improved Energy Technologie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otlear, Daniel, ed. 2006.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Peru: An Agenda for Improving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the Social Safety Net.*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otula, Lorenzo. 2002. "Gender and Law; Women's Rights in Agriculture." Legislative Study 76, Rev. 1,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Rome.

de Mel, Suresh, David McKenzie,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2011. "Business Training and Female Enterprise Start-up and Growth in Sri Lank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Deere, Carmen Diana, and Magdalena León. 2001. "Who Owns the Land? Gender and Land-Titling Programme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 (3): 440–67.

———. 2005. "Liberalism and Married Women's Property Rights in Nineteenth-Century Latin America."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 (4): 627–78.

Deininger, Klaus, Daniel Ayalew Ali, Holden Stein, and Jaap Zevenbergen. 2008. "Rural Land Certification in Ethiopia: Process, Initial Impact, and Implications for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6 (10): 1786–812.

Deininger, Klaus, and Hari Nagarajan. 2010. "Law Reform and Women's Access to Capital: Evidence from India's Hindu Succession Ac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Dinkelman, Taryn. 2010. "The Effects of Rural Electrification on Employment: New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272,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search Program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Ensor, Tim, Mardiati Nadjib, Zahid Quayyum, and Amila Megraini. 2008. "Public Funding for Community-Based Skilled Delivery Care in Indonesia: To What Extent Are the Poor Benefi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9 (4): 385–92.

Esteve-Volart, Berta, and Manuel F. Bagues. 2010. "Are Women Pawns in the Political Game? Evidence from Elections to the Spanish Senate."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30, Fundación de Estudios de Economía Aplicada, Madrid.

Finkelhor, David. 2009. "The Prevention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Future of Children* 19 (2): 169–94.

Fisas, Vincenc. 2008. "Annuario 2008 de Procesos de Paz." Icaria Editorial, Barcelona.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03. "Revisiting the 'Magic Box'." Case Studies in Local Appropi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FAO, Rome.

———. 201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0–11. Women in Agriculture: Closing the Gender Gap for Development." FAO, Rome.

Foshee, Vangie, A., Karl E. Bauman, Ximena B. Arriaga, Russell W. Helms, Gary G. Koch, and George F. Linder. 1998. "An Evaluation of Safe Dates, an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Prevention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8 (1): 45–50.

Foshee, Vangie A., Karl E. Bauman, Susan T. Ennett, George F. Linder, Thas Benefield, and Chirayath Suchindran. 2004. "Assessing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Safe Dates Program and a Booster in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 (4): 619–24.

Foshee, Vangie A., Karl E. Bauman, Susan T. Ennett, Chirayath Suchindran, Thas Benefield, and George F. Linder. 2005.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the Dating Violence Program 'Safe Dates' using Random Coefficient Regression Modeling." *Prevention Science* 6: 245–58.

Foshee, Vangie A., Karl E. Bauman, W. F. Greene, Gary G. Koch, George F. Linder, and James E. MacDougall. 2000. "The Safe Dates Program: 1-Year Follow Up Res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0 (10): 1619–22.

Foster, Vivien, and Cecilia Briceño-Garmendia, eds. 2011. *Africa's Infrastructure: A Time for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Agence Francaise de Développement and World Bank.

Frisancho, Verónica, Dean S. Karlan, and Martín Valdivia. 2008. "Business Training for Microfinance Clients: How It Matters and for Whom?" Working Paper 2008–11, Poverty and Economic Policy (PEP), Research Network, Lima, Peru.

Gajigo, Ousman, and Mary Hallward-Driemeier. 2011.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New Entrepreneurs in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alasso, Emanuela, Martin Ravallion, and Agustin Salvia. 2001. "Assis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orkfare to Work: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738,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Galiani, Sebastian, Paul Gertler, and Ernesto Schargrodsky. 2005. "Water for Life: The Impact of the Privatization of Water Services on Child Mort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1): 83–120.

Gilliam, Melissa L. 2010. "Interventions for Preventing Unintended Pregnancies among Adolescent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15 (1): 171–2.

Gornick, Janet C., and Ariane Hegewisch. 2010. "The Impact of 'Family Friendly Policies' on Women's Employment Outcomes and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oing Busines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Green, Lawrence, Harold C. Gustafson, William Griffiths, and David Y. Raukey. 1972. "The Dacca Family Planning Experiment: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Programs Directed at Males and at Fema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Grogan, Louise, and Asha Sadanand. 2011. "Electrification and Labour Supply in Poor Households." University of Guelph, Economics Department, Guelph, Ontario. Processed.

Grown, Caren, and Imraan Valodia, eds. 2010. *Taxation and Gender Equ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GSMA Development Fund. 2010. *Women and Mobile: A Global Opportunity: A Study on the Mobile Phone Gender Gap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London: GSMA and the Cherie Blair Foundation for Women.

Guedes, Alessandra, Sarah Bott, and Yvette Cuca. 2002. "Integrating Systematic Screening for Gender-based Violence into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Results of a Baseline Study by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Western Hemisphere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78: S57–63.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11. "Improving the Legal Investment Climate for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vnes, Tarjei, and Magne Mogstad. Forthcoming. "Money for Nothing? Universal Child Care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Hjort, Jonas, Michael Kremer, Isaac Mbiti, and Edward Miguel. 2010. "Vocational Education Vouchers and Labor Market Returns: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among Kenyan Youth." Harvard University and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Berkeley, CA. Processed.

Holt, Victoria, Mary A. Kernic, Marsha E. Wolf, and Frederick P. Rivara. 2003. "Do Protection Orders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Future Partner Violence and Injur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4 (1): 16–21.

Holzer, Harry J., and David Neumark. 2000. "Assessing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 (3): 483–568.

Ilahi, Nadeem, and Franque Grimard. 2000.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Private Costs: Water Supply and Time Allocation of Women in Rural Pakis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 (1): 45–75.

Iyer, Lakshmi, Anandi Mani, Prachi Mishra, and Petia Topalova. 2010.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India's Panchayati Ra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Jacoby, Hanan G., and Ghazala Mansuri. 2011. "Crossing Boundaries: Gender, Caste, and Schooling in Rural Pakista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71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Jensen, Robert. 2010a.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apit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India." Working Paper Series 1602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2010b.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 (2): 515–48.

Jewkes, Rachel, Mzikazi Nduna, Jonathan Levin, Nwabisa Jama, Kristin Dunkle, Adrian Puren, and Nata Duwury. 2008. "Impact of Stepping Stones on Incidence of HIV and HSV-2 and Sexual Behaviour in Rural South Africa: A Cluste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37: 383–98.

Jubb, Nadine, and Wânia Pasinato Izumino. 2003. "Women and Policing in Latin America: A Revised Background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Dallas, March 27.

Khandker, Shahidur R., Zaid Bakht, and Gayatri Koolwal. 2006. "The Poverty Impact of Rural Roads: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87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öhlin, Gunnar, Subhrendu K. Pattanayak, Erin O. Sills, and Christopher Wilfong. 2011. "Energy,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Interventions and Future Opti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Komives, Kristin, Vivien Foster, Jonathan Halpern, Quentin Wodon, and Roohi Abdullah. 2005. "Water, Electricity and the Poor: Who Benefits from Utility Subsid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oolwal, Gayatri, and Dominique van de Walle. 2010. "Access to Water, Women's Work and Child Outcom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53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Kremer, Michael, Edward Miguel, and Rebecca Thornton. 2009. "Incentives to Lear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 (3): 437–56.

Krook, Mona Lena. 2009. "The Diffusion of Electoral Reform: Gender Quotas in Glob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Lisbon, April 14.

Kumar, Neha, and Agnes R. Quisumbing. 2010. "Policy Reform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Ethiopia: Little by Little the Egg Begins to Walk." Institute for Food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La Ferrara, Eliana, Alberto Chong, and Suzanne Duryea. 2008.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Working Paper Series 63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Larraín, Soledad. 1999. "Curbing Domestic Violence: Two Decades of Actions." In *Too Close to Home: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 ed. Andrew R. Morrison and María Loreto Biehl.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Leonard, Jonathan S. 1989. "Women and Affirmative 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1): 61–75.

Lim, Stephen S., Lalit Dandona, Joseph A. Hoisington, Spencer L. James, Margaret C. Hogan, and Emmanuela Gakidou. 2010. "India's Janani Suraksha Yojana, A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 to Increase Births in Health Facilities: An Impact Evaluation." *Lancet* 375 (9730): 2009–23.

Lindert, Kathy, Anja Linder, Jason Hobbs, and Bénédicte de la Brière. 2007. "The Nuts and Bolts of Brazil's Bolsa Família Program: Implement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in a Decentralized Context."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70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Logan, T. K., and Robert T. Walker. 2010. "Civil Protective Order Effectiveness: Justice or Just a Piece of Paper?" *Violence and Victims* 25 (3): 332–48.

Martinez, Sebastian, and others. 2011. "Hard Skills or Soft Skill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Massé, René. 2003. *Energy, Poverty, and Gender: Impacts of Rural Electrification on Poverty and Gender in Sri Lank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tsa, David A., and Amalia R. Miller. 2011. "A Female Style in Corporate Leadership? Evidence from Quota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 an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Processed.

———. Forthcoming. "Chipping Away at the Glass Ceiling: Gender Spillovers in Corporate Lead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McFarlane, Judith, Ann Malecha, Julia Gist, Kathy Watson, Elizabeth Batten, Iva Hall, and Sheila Smith. 2004. "Protection Order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 18 Month Study of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4 (4): 613–8.

McKinsey & Company Inc. 2007. "Women Matter. Gender Diversity, A Corporate Performance Driver." McKinsey & Company Inc., London.

Medrano, Patricia. 2009. "Public Day Care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Chil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306, Universidad de Chile, Santiago de Chile.

Meinzen-Dick, Ruth, Agnes Quisumbing, Julia Behrman, Patricia Biermayr-Jenzano, Vicki Wilde, Marco Noordeloos, Catherine Ragasa, and Nienke Beintema. 2010. "Engenderi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0973,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Mikton, Christopher, and Alexander Butchart. 2009. "Child Maltreatment Preven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view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7 (5): 353–56

Morrison, Andrew, Mary Ellsberg, and Sarah Bott. 2007. "Address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vention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2 (1): 25–51.

Natarajan, Mangai. 2005. "Status of Women Police in Asia: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for Women and Policing* 17: 45–47.

Nguyen, Trang. 2008. "Information, Role Models and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Madagascar." Working Pap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Ñopo, Hugo, Miguel Robles, and Jaime Saavedra. 2007. "Occupational Training to Reduce Gender Segretation: The Impacts of ProJoven."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62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Paes de Barros, Ricardo, Pedro Olinto, Mirela De Carvalho, Trine Lunde, Norbert Schady, Samuel Santos, and Andrezza Rosalem. 2010. "Impact of Free Childcare on Women's Labor Marke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in Rio de Janeir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s Gender Action Plan (GAP) Workshop, Regional Study on Gender Issues in LAC, Washington, DC, June 14.

Pande, Rohini, and Deanna Ford. 2011. "Gender Quota and Female Leadership."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Parenzee, Penny. 2001. "While Women Wait . . . Monitoring the Domestic Violence Act." *Nedbank ISS Crime Index* 5 (3): 10–13.

Pathmanathan, Indra, Jerker Liljestrand, Jo M. Martins, Lalini C. Rajapaksa, Craig Lissner, Amalia de Silva, Swarna Selvaraju, and Prabha Joginder Singh. 2003. "Investing in Maternal Health Learning from Malaysia and Sri Lanka."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ata, Ndola, Paige Passano, Amita Sreenivas, and Caitlin Elisabeth Gerdts. 2010. "Maternal Mort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in Scaling-up Priority Interventions." *Women's Health* 6 (2): 311–27.

Rama, Martin. 2002. "The Gender Implications of Public Sector Downsizing: The Reform Program of Vietnam."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7 (2): 167–89.

Rasul, Imran. 2008. "Household Bargaining over Fert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6 (2): 215–41.

Rawlings, Laura B., and Gloria M. Rubio. 2003.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11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Revenga, Ana, Michelle Riboud, and Hong Tan. 1994. "The Impact of Mexico's Retraining Program on Employment and Wag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8 (2): 247–77.

Rodríguez, Jorge M., Edgar Muñoz, Andres Fandiño-Losada, and María I. Gutiérrez. 2006. "Evaluación de la Estrategia de Comunicación 'Mejor Hablemos' para Promover la Convivencia Pacifica en Cali, 1996-2000." *Revista de Salud Pública* 8 (3): 168–84.

Rogers, Everett M., Peter W. Vaughan, Ramadhan M. A. Swalehe, Nagesh Rao, Peer Svenkerud, and

Suruchi Sood. 1999. "Effects of an Entertainment-Education Radio Soap Opera on Family Planning Behavior in Tanzani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30 (3): 193–211.

Roy, Sanchari. 2011. "Empowering Women: Inheritance Rights and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University of Warwick, Warwick, U.K. Processed.

Rudman, Laurie A., and Kimberly Fairchild. 2004. "Reactions to Counterstereotypic Behavior: The Role of Backlash in Cultural Stereotype Mainte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2): 157–76.

Schady, Norbert, and Maria Caridad Araujo. 2006. "Cash Transfers, Conditions, School Enrollment, and Child Work: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 in Ecuad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39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chlosser, Analía. 2007. "Public Preschool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Arab Mother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Jerusalem. Processed.

SEWA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Academy. 2007. "Taking Care of Our Children: Ensuring Long Term Impact (Balwadi Study)." SEWA Academy Research Unit, Ahmedabad, India.

Spitzberg, Brian H. 2002. "The Tactical Topography of Stalking Victimization and Management."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3 (4): 261–88.

Ssewanyana, Sarah, Lawrence Bategeka, Madina Guloba, and Julius Kiiza. 2010. "Gender Equality and Taxation in Uganda." In *Tax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Taxes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ed. Caren Grown and Imraan Valo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tevenson, Betsey, and Justin Wolfers. 2006.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Divorce Laws and Family Distres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1): 267–88.

Sumner, Cate, Matthew Zurstrassen, and Leisha Lister. 2011. "Increasing Access to Justice for Women, the Poor and Thos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An Indonesian Case Study." Justice for the Poor Briefing Note 6(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wanson, Burton E., and Riikka Rajalahti. 2010.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Advisory Systems: Procedures for Assessing, Transforming and Evaluating Extension Systems."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5,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Tadesse, Dagnew, Assefa Desta, Aberra Geyid, Woldemariam Girma, Solomon Fisseha, and Oliver Schmoll. 2010. "Rapid Assessment of Drinking-Water Quality in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Country Report of the Pilo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2004–200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Geneva.

Terefe, Almas, and Charles P. Larson. 1993. "Modern Contraception Use in Ethiopia: Does Involving Husbands Make a Dif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3 (11): 1567–71.

Todd, Petra E. 2010.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Aimed at Improving Women's Employability and Quality of Work: A Critical Revie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Processed.

UN (United Nations). 2011.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Report, Addendum 2, Goal 5: Improve Maternal Health.* New York: UN.

UNIFEM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2010.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eace Negotiations: Connections Between Presence and Influence." UNIFEM, Washington, DC.

Usdin, Shereen, Esla Scheepers, Susan Goldstein, and Garth Japhet. 2005. "Achieving Social Change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A Report on the Impact Evaluation of Soul City's Fourth Ser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1 (11): 2434–45.

Waddington, Hugh, Birte Snilstveit, Howard White, and Lorna Fewtrell. 2009.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 to Combat Childhood Diarrhoe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Impact Evaluation 31E, Synthetic Review, New Delhi,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Wang, C. E., L. S. Vittinghoff, and Z. M. Rong. 1996. "Effects of Family Planning with Husband Participation on Pregnancy and Induced Abor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New York, NY,

Warraich, Sohail. 2010. "Shirkat Gah Women's Resource Centre, Lahore (Pakistan). Legal Consciousness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Trainings of Marriage Registrars." Background note for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2011–2012, New York.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FPA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World Bank. 2010. *Trends in Maternal Mortality: 1990 to 2008.*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HO, UNICEF, UNFPA, and World Bank.

Witter, Sophie. 2011. "Demand-Side Financing for Strengthening Delivery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An Evidence Synthesis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rocessed.

Wolfe, David A., Claire Crooks, Peter Jaffe, Debbie Chiodo, Ray Hughes, Wendy Ellis, Larry Stitt, and Allan Donner. 2009. "A School-Based Program to Prevent Adolescent Dating Violence: A Cluster Randomized Trial."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163 (8): 692–99.

Wolfe, David A., Christine Wekerle, Katreena Scott, Anna-Lee Straatman, Carolyn Grasley, and Deborah Reitzel-Jaffe. 2003. "Dating Violence Preven-

tion with At-risk Youth: A Controlled Outcome Evalu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1 (2): 279–91.

World Bank. 2003a. *Vietnam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Pover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3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4. *Senegal Pilot Female Literacy Project*. ICRR 27399. Vol 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5a. *Engender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Ensuring Gender Equality in ICT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5b. *Making Rural Roads Work for Both Men and Women: Promising Approaches to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Zwane, Alix Peterson, Jonathan Zinman, Eric Van Dusen, William Pariente, Clair Null, Edward Miguel, Michael Kremer, Dean S. Karlan, Richard Hornbeck, Xavier Giné, Esther Duflo, Florencia Devoto, Bruno Crepon, and Abhijit Vinayak Banerjee. 2011. "Being Surveyed Can Change Later Behavior and Related Parameter Est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PNAS)* 108 (5): 1821–26.

第 8 章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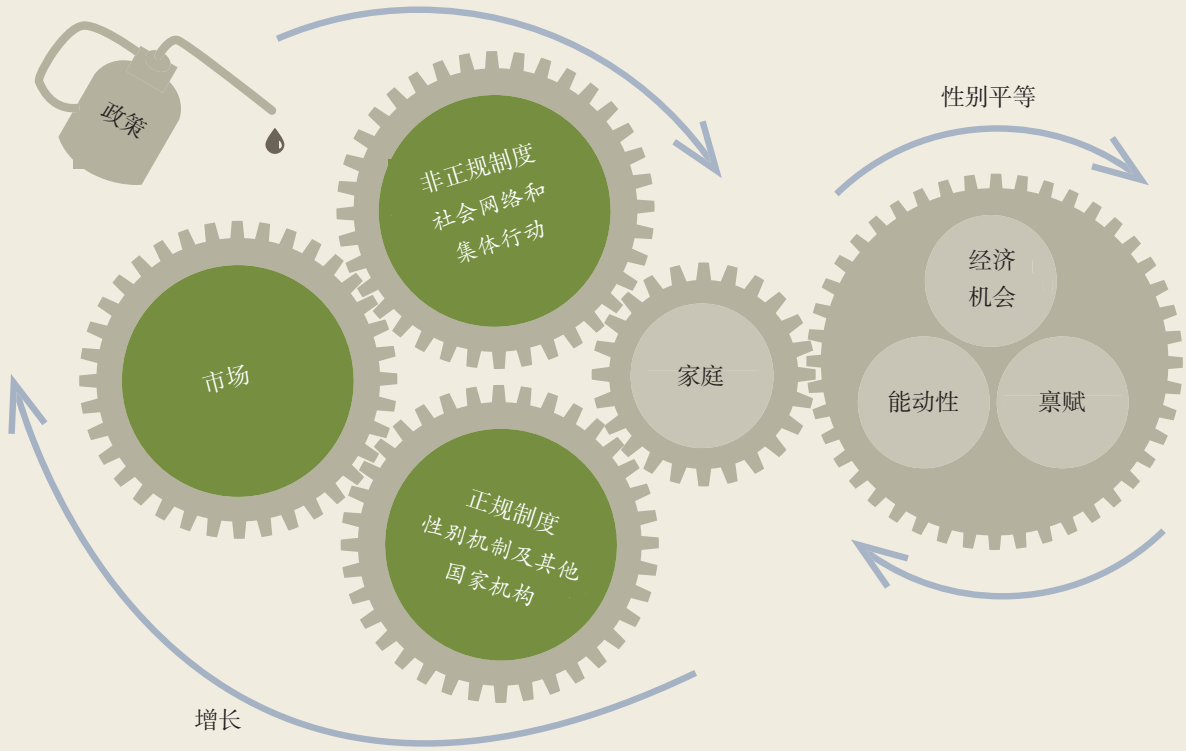
性别平等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性别平等的进程必须向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倾斜，在这种均衡状态中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助、更多的经济机会以及更多的发挥能动性的途径，同时这种新的均衡状态将成为主导制度。如今在大多数国家，女孩的受教育权及女性的选举权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以前却并非如此。家庭、市场、正规机构及非正规机构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是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而每一次的互动与交流又在一个持续的反馈循环中影响着家庭、市场、正规机构及非正规机构本身。第 7 章讨论了运用政策干预来纠正具体的市场失灵问题，以及形成性别差异的制度性约束因素或规范性约束因素。但是这些政策能否落实或生效，还取决于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国家的成功政策不一定要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是否在其他国家具有关联性及可复制性。[1] 因此，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必须与社会行为者及政治环境协调一致。来自其他国家的成功干预措施及经验必须适应国家的社会环境，并与之相协调。根据我们的概念框架，本章对社会行为者及其干预措施所发挥的作用描述如下：

- 非正规机构——通过集体行动
- 市场——通过公司行为
- 正规机构——通过评估、提倡、设计、贯彻落实或强制执行性别平等政策和法规的国家行动和国家架构（见图 8.1）

社交网络与民间社团的集体行动已经成为推进性别平等进程的一股强大力量。国家和非国家社会行为者竞先重塑环境的政治进程导致了政策改革。在短期和长期内，他们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决定了权力的动态变化，而权力动态决定与均衡和成本相关的政策改革。政策要求在既定的预算限制和财政政治成本限制下取得向竞争性优先事项分配资源的均衡。例如，改善偏远地区的孕产期保健和分娩服务可能与扩大针对更广大民众的医疗服务存在冲突。对某一既定改革的反对意见可能来自一个不愿承担（或者说负担不起）相应成本的社会行为者或是更垂青竞争性议程的社会行为者。考虑到社会行为者的多样性和分散性，就争取支持、反击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抵制而言，联盟发挥着不可替

图 8.1　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进程中，社会行为者及其互动决定了市场、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作用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代的作用。在智利，自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政权倒台后，尽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中间派和中间偏左翼政府在将近 15 年的时间中未能让离婚合法化。天主教会是在婚姻家庭法自由化问题上最顽固的一派。而在广泛的政党联盟的支持下，2004 年国会否决了 18 个议案，批准了第一部《离婚法》。

市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司——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已经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中，对于技能的需求不断增长，所以各大公司已经开始努力寻求扩大自身的人才库。多样的观点可以充实决策和激发创造力。性别平等已经成为客户和投资者都在寻求的一个理想特质。通过实行产品差异化和捕捉日益增长的女性市场份额的忠诚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吸引和留住女性人才和忠诚的女性客户需要企业进行组织上的变革。企业文化必须同时照顾到男性和女性对于工作及家庭的需求。职业指导和职位晋升对实现性别多样化的利益也非常重要。在这些领域我们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例如，在美国，尽管半数的法学院毕业生是女性，并且 90% 的法律事务所都开展了性别多样化方案，但只有 15% 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是女性。[2] 最后，国家行动是制定和执行先进的性别政策的核心力量。社会契约决定了国家对于市场、正式机构及社会规范进行监管和干预的形式、时机与合法性。在北欧国家，采取明确的政策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称之为“性别契约”。在菲律宾，2009 年的“女性宪法”明确提出了国

专栏 8.1 格鲁吉亚——在新社会中发展性别角色

1991 年格鲁吉亚获得独立后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家庭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来赚取收入。在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现实的过程中性别角色发生了转变。苏联解体后大量的公司和工业倒闭为格鲁吉亚带来了数以万计的失业者。很多女性变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她们比男人更早地意识到再也不会存在国家机关的就业岗位，她们也证明了自己在适应职业变换方面的灵活性。她们通常会选择低于自身条件的工作，成为非正规部门的非技术工人，例如街边小贩、往返土耳其的班车服务员、保姆或从事打扫房屋等工作。大多数的女性个体经营者从事小商品生意，她们已经决定通过从事低于自身条件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家庭，而与此同时，她们的丈夫及其他男性依然选择留守家中，拒绝接受与他们自身条件和教育背景不匹配的工作。同一层面的就业性别分割是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经济独立。对所谓 “女性部门”——教师、护士、医生——的需求保持稳定，但是对传统男性就业岗位的需求降低了。2007 年，89%的大学学术人员和 69%的医生都是女性。

工作的缺乏导致大量男性和女性移民。他们的汇款惠及了格鲁吉亚十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女性移民的人均汇款额比男性移民高 40 美元。

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活动中女性参与度的提升带来的是一代人价值观的转变。如今，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照顾小孩和家务工作中。大量事例表明很多男性开始休产假。这些性别角色和性别标准的转变并不是由政策干预引起的，推动力来自于急剧恶化的经济环境对传统劳动分工的挑战。

资料来源：Sumbadze 2011。

家的作用，即“提供必要的机制来加强以及保证女性权益的实现，批准并采用一些举措包括临时性的特殊措施，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涵盖大量的立法、行政、管理及其他监管工具、政策与实践，旨在加速促进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所有领域的平等参与权利。”[3]

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就设计、批准和执行国家政策进行谈判。“性别体制”是专门制定具体性别平等目标的国家机构。他们可以使一些机构参与进来评估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条件、创造新的知识、为性别改革提供操作支持并确保改革的执行。另外一些国家机构——比如司法体系——作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家庭适应新的现实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全球化、自然灾害以及冲突后重建均引起了政策变革的浪潮，冲击着所有这些社会行为体（见专栏 8.1）。社会行为体可以抓住这些新兴的机会，促进和实现性别平等的成果。改革的路径也很重要。政府通常跟随社会的意向进行改革。政策变革捕捉社会行为者的集体期望和意愿，带来了新的机会。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紧跟市场的变化发展与社会规范，经济一体化和联盟可以带来可持续的变革。但是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不足以战胜路径依赖性和僵化的制度，并将最终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包括“变革式”改革在内的大胆的政府行动才是改变社会的原动力，并使国家和社会达到更加公正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证政策贯彻实施的异质性，以产生可持续的行为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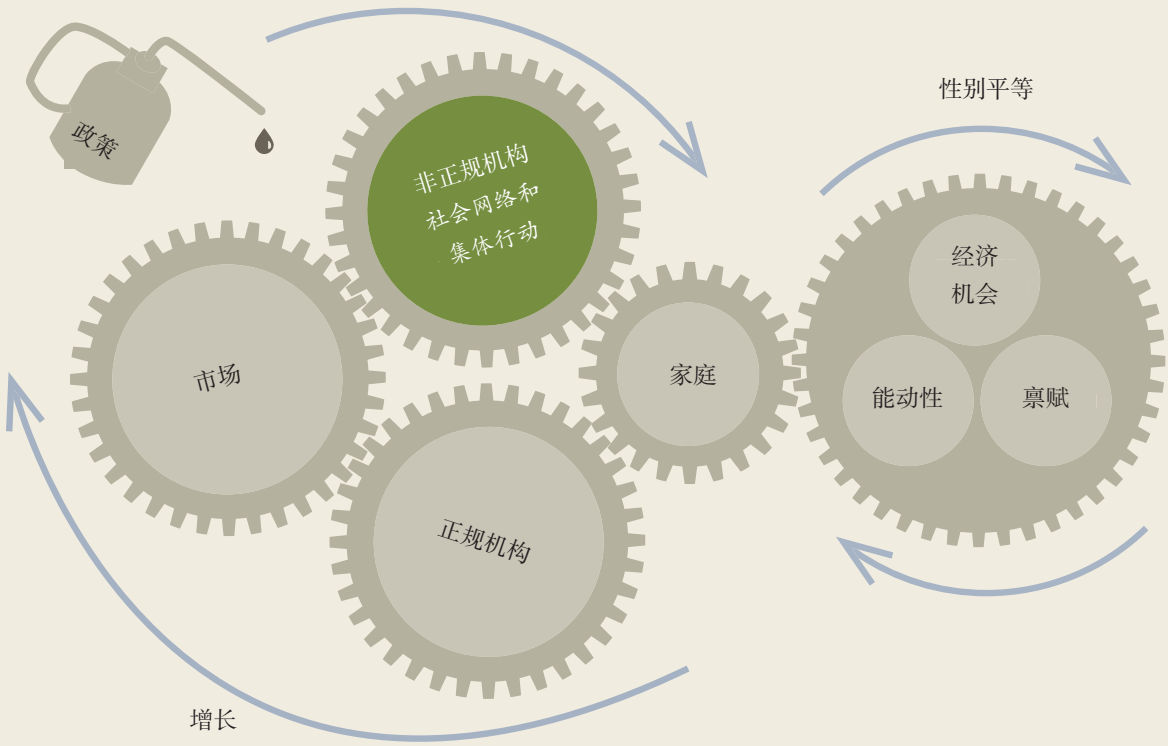
女性和男性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合作伙伴。有效的政府行动需要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行为体建立广泛的联盟来提倡和发动改革。同时也需要采用多平面性别镜头对成果和影响进行评估，为实施行动建立稳固的体制结构，寻求发动变革的机会，平衡变革的速度并规避反弹的风险。

非正规制度——作为变革推动力的社会网络

社会行为体可以通过拥护政策、设计干预措施和实施计划直接形成政策和塑造制度环境。个人可以通过投票和公众舆论影响政府政策。

同样，个人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和民间团体这样的集体组织形式来实现共同的政治社会理想。集体能动性可以影响社区和个人的成果。同时社会组织和合作社能够共同承担风险，共

图 8.2　社会网络能够引起公共舆论、调动支持力量并推动改革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同投入资本促进社区主导型发展、小额信贷、儿童保育及其他项目，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些社会网络和组织同时也能传递信息，例如通过分享科技创新的知识来提高农业生产力。[4]

参加社会网络和团体可以增强能力，并作为其他领域集体行动的跳板，例如，在地方政府中行使政治话语权。如果有更多的支持者接受了它的观点，那么社会运动将会愈演愈烈。就好像是协调机制一样，团体可以激发个人去采取行动，将消极的利益相关者转变成为社会行为体（见图 8.2）。[5] 女性工作者更愿意通过一些组织去挑战她们的雇主和整个国家，例如印度的自就业女性协会和性别平等教育项目（Mahila Samakhya）及孟加拉国的 Mahila Samakhya 组织和 Nijera Kori 组织。[6]

集体行动：人多力量大

在过去的 250 多年中，女权组织、政党、工会、基于信仰的组织、国家赞助的群众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都在为争取性别平等的权利而斗争。女性组织是反抗性别不平等的核心，是在本地、国家和国际间的生育权、机会均等的劳动法规及家庭法问题上发动变革的核心力量（见专栏 8.2）。[7] 全球化和新的通信技术已经为提高意识、建立网络、展开辩论和发动利益相关者反对不平等创造了新的机会。

改革通常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所以认识到政治现实以及认清在一个计划或政策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措施是建立联盟和达成共识的关键。社会行为体可以发动政治改革，也可以根据他们的利益和动机阻止、无视或

专栏 8.2 女权主义视角

长期以来妇女运动一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妇女运动呼吁性别平等，创造公共辩论空间，为变化和改革奠定了基础。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多重原因，女性行动起来成为政治活动者或社会代言人。例如，阿根廷“五月广场的妈妈”就是围绕一个非性别平等问题组织起来的组织，即母亲们要求在军事独裁时期失踪的孩子安全归来而形成的组织。

女权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妇女运动）指的是围绕因性别而引起的女性不平等和弱势问题而组成的团体。女权运动是改变社会条件的政治运动。弱势意识和拒绝普遍的社会秩序是它政治主张的核心思想。女权运动由若干个团体组成，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这些团体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各个团体在行动中有不同的优先考虑问题、身份及战略。所以作为一个运动，女权运动并不像其他运动一样，它没有一套固定的共同目标，不包含团结协作，不具有连续性。作为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开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第一次浪潮”始于美国和欧洲——试图改革那些将女性定位在从属地位的特别法律。关注女性的参政权，个人拥有财产权，女权主义还进入司法体系，鼓励女性在政治上赢得法律认可，挑战性别平等的法律障碍。第二次浪潮，激进女权主义，认识到法律平等不足以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激进女权主义围绕着“个人即政治”这一口号组织起来，这一新的议题旨在改变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心点是控制女性自己的身体——特别是生育——同工同酬主张和家庭暴力。强调服从但区别是明确表达了“交叉性”概念，及性、种族和阶级压迫的相互关系。

第三次浪潮，后女权主义，将关注的焦点从合法权利和群体认同转移到强调（并执行）一个新的平等概念，即忽略所有男女的根本差异。拒绝所有将女性团结成一个阶层或群体的可能因素，拒绝同化和泛化概念，后女权主义关注文化和个人权利。公共行动的视角和关注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国内国际的妇女运动已经得到巩固。1975 年联合国发布的女性十年的宣言及其召开的四次国际大会——墨西哥（1975）、哥本哈根（1980）、内罗毕（1985）和北京（1995），妇女运动走向联合，成为全球性妇女运动。这几次大会第一次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联合了起来，制定了全球行动的共同利益和战略。

国际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不断增长，世界各地每年新建立的组织超过 300 家。这些组织支持许多目标，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即促进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在既往成功的基础上并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这些女性组织的关注点、行动重点和行动方式每十年变化一次。

有两种力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辩论和联盟。联盟成功以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女性联合到一起，从而为国际国内妇女运动注入了力量。辩论承认运动内部存在的差异，给予了妇女运动生命。

资料来源：Andreasen 等 1991；Antrobus 2004；Basu 1995；Hooks 2000；Marx Ferree 和 Hess 2000；Paxton 和 Hughes 2007；Whelehan 1995。

反对改革。重塑他们的相对权力是他们可分配的、抵御（或阻止）与改革成果相关的政策定位及重要性或突出性的资源。他们的知名度、合法性、拥护者、社会地位、社交网络及获取信息渠道的能力决定了他们的影响范围和行动的有效性。

政治经济结构和动力可以使一项倡议成为精心设计的、能动员支持力量并具有可持续性的干预措施，也能使之成为脱离主要支持者的失败倡议。例如，通过议会投票将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给女性可以增加女性的话语权，但是特权阶级、少数民族及宗教利益团体会因此失去部分原已有限的影响力，因此这将被这些利益团体视为一种威胁（见专栏 8.3）。

从现状中受益的群体可能会抵制变革，他们认为变革会降低他们得到的回报。他们可以提高其他利益相关

> “十年前女性不参与这些事情；但现在女性获得了实职。人们举办社区会议，女性积极参与这些会议。十年前女性依附于男人。女性的参与使我们的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了。”
>
> ——利比里亚成年女性

者的交易成本，降低改革倡议的可行性，甚至逆转改革的进程。当他们认为成本过高时，潜在的输家就会阻碍改革的进程或改革的实施。例如，当一些男人感到政策变动对他们的经济或社会角色产生了威胁，他们就会猛烈抨击改革，并想方设法回到“老规矩”中。在印度，一些男性针对保护女性地位和财产立法的响应是，呼吁回归传统的均势状态。[8] 2005 年颁布的《保护女性免遭家庭暴力法》已经遭到了一些诸如“保护印度家庭”组织的强烈反对，1986 年的《嫁妆禁止法》遭到了“男性反对嫁妆法滥用”组织的强烈抵制。[9]

即使是这样，政治行动主义还是和社会组织携手并进，取得了重要的社会收益。在政治领域，宪法改革是近期女性动员的一个中心焦点问题。女性组织希望废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所有偏见（见专栏 8.4）。妇女国际运动在全球的兴起和女性在 151 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所取得的里程碑式成就之间存在着积极而重要的关系，这里，以女性组织的数量和关注女性的国际条约或公约的数量作为衡量国际妇女运动在全球兴起的标准。事例包括女性获得选举权、选举第一位女性议员以及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席位逐步从 10%增加到 20%、30%。[10]

集体行动已将“私人生活”带入公共领域，它指出法律承认的、宗教的或习惯性的家庭法中存在性别偏见。[11] 集体行动同时也减少了阻碍提高性别平等程度的社会规范。2005 年柬埔寨

专栏 8.3　利益角逐——特权阶级、少数民族、宗教政治与性别

印度自 2006 年就开始讨论有关将 33%的议会席位留给女性的宪法修正案。讨论得到了许多女性组织的支持，但最终还是未能通过。这是为什么呢？

在印度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中，少数民族政党和特权阶级政党建立联盟构成政府的核心。其中的一些政党反对低等阶级的男人被上层阶级女人取代这样的修正议案。他们认为目前的预留法案所预留的 33%的席位并没有专门提供给低等阶层女性的份额（也许是中等阶层）。这样一来，支持现有立法的政党和女性组织反对“配额套配额”的体制。从那时起在印度性别政治和特权政治就陷入了僵局。

相比之下，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垮台后，为确保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代表性，伊拉克成立了由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亚述基督徒等群体代表组成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女性在过渡政府中的政治参与降低到了极不重要的地位。美国官员强调“没有女性配额的计划。”当起草伊拉克宪法草案时，民族与宗教团体共同分享权力的想法被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分权化、联邦制和多数主义的规定。与此相反来自女性志愿者和妇女组织的赞成女性拥有议会配额的呼声加强了。草案的第 47 条款预期确立女性占国民大会席位的 25%。随后，新选举法规定选票名单上的前三位候选人中必须有一位是女性。

资料来源：Krook 和 O’Brien 2010；Menon 2009；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2005。

专栏 8.4　在公共机关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纳米比亚女性宣言网络

纳米比亚女性宣言网络成立于 1999 年，是由 30 多个团体组成的联盟，旨在扩大女性的政治参与。在 50/50 运动中，联盟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女性在议会候选人名单中占有 50%的配额，以“斑马”式风格构成名单，即以一个男性候选人一个女性候选人这样的形式交替出现。那一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要的政党）为女性候选人留出了 28%的席位，国民大会的女性代表比例跃升至 26%。今天，就女性代表在议会中的人数而言，纳米比亚居全世界第 42 位，78 位代表中有 19 位是女性。纳米比亚女性宣言网络联盟仍在继续推动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它的区域和地方的支持者在全国召开研讨会。女性宣言网络联盟还提倡将性别重点和性别预算方式纳入规划。

资料来源：Geisler 2004；Mensah-Williams 2010。

专栏 8.5 女性对于投票权的观点差异——以瑞士为案例

1971 年全民公决后，瑞士女性获得了在联邦选举中的投票权及竞选政治职位的权利。11 位（5.5%）女性甚至被选为议会议员。但是在之前的全民公决中，一些女性成为阻止这些权利通过的主要阻力。瑞士女性反对女性投票权联盟成立于 1959 年，该联盟反对女性参政，认为女性的责任应该在家中。瑞士德语区的女性遵循传统文化观念，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应该与孩子、教堂和厨房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联邦总统格楚德·哈尔迪曼（Gertrud Haldimann）说，“看看女性参政权对其他国家都做了什么：在每个地方，所谓的女性平等都造成了女性丧失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每一个地方，她们都遭受着与男人争夺地盘的折磨。女性的位置应该在家中，而不是在政治舞台上。制定政治决策，你必须阅读报纸，而女人要打扫房间、照顾孩子，她们没有时间去读报纸。”

1959 年的全民公决否决了女性的投票权和参政权。67%的投票者反对女性拥有投票权。在内阿彭策尔州超过 95%的投票者反对扩大选举权。

资料来源：《发言人评论报》，1959 年 10 月 25 日，第 12 页。

就阻止家庭暴力和保护受害者法进行的辩论中，草案被指责与红色高棉共产党相对抗。议员批评此草案说“为女性提供了过多的自由与权利，使得她们太快乐以至于她们不再尊重古柬埔寨的风俗……蛋糕不能比蛋糕盘还大。”[12] 柬埔寨妇女委员会是一个拥有 32 个非政府组织（NGOs）的联盟，该委员会始终坚持游说政府和女性事务部门，确保立法获得通过。

女性是一个异质性群体

女性间的差异性不仅仅体现在她们的禀赋及获得的机遇上，还体现在她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一般来说，她们对性、家庭以及理想的国家干预措施都具有不同的理解。[13] 一些女性的兴趣可能与另一些女性的兴趣正好相反。瑞士的女性反对普选制（见专栏 8.5）。美国女性在堕胎权、产假和平权行动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14] 在法国，一些女性为争取禁止面纱的使用而斗争——而另一些女性则为自己佩戴面纱的权利据理力争。切除女性外生殖器会给女性生理和心理上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关于此行为的传统和信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非洲女性强烈支持延续此传统。[15]

种族、宗教、性、民族及阶级身份与性别共存（或者说与性别“相互联系”，它们的交互作用产生了特殊影响）。结果，不同群体的女性，其需求、经历以及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理解也千差万别；反过来，这些差异影响了她们的政治偏好和对政策选择的理解。在巴西和英国，黑人女性抱怨说性别平等的主张无视她们的特别需求。[16] 另外一些女性群体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身份政治，使社会能听到她们具体的要求（见专栏 8.6）。

当这些相互作用没有被认识到或者被忽视时，这些相互作用会妨碍有效的合作和主张，阻碍实现共同的女性福利目标。从 20 世纪 70 年代“对女性的暴力”这一术语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到 1993 年第一个国际宣言《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宣言》正式生效，这一过程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联合国妇女大会的墨西哥会议（1975）和内罗毕会议（1985）对于明确提出反对性别暴力方案的完整框架问题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女性的主张与整治工作的优先考虑事务与途径存在分歧。只有当反对性别暴力的全球运动制定出承认差异性、提倡包容性的明确规范后，运动才能迎来一个转折点。通过包容边缘化群体和听取异议者意见的机构渠道的承诺，可以就反对性别暴力方案的框架达成共识。[17]

男性作为推进性别平等进程的同盟军

推进社会向更加平等的方向转变

专栏 8.6　巴西的家政工人

巴西的女性家政工人组织挑战社会对于女性的普遍化观点。家政工人占整个巴西劳动力人口的 7%，家政工人中 60%是黑人女性。家政工人面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这主要和她们的中等阶层或上等阶层的白人雇主有关，这些白人雇主从低成本的家政帮助中获得好处。法律规定家政工人应具有中等水平工资、带薪假期、产假和陪产假及失业保险金。但 28%的家政工人只拿到了相当于中等水平工资一半的收入，41%的家政工人拿到了相当于中等水平工资一半以上的收入。

在家政工人国家联盟（FENATRAD，成立于 1997 年）的支持下，一个宪法改革的议案正在讨论中，该议案旨在加大上述家政工人权利的执行力度，以及让家政工人享有和普通工人一样的权利，包括家庭补助、加班费和意外事故保险。这个议案遭到了雇主的强烈抵制。圣保罗州的雇主工会主席警告说联邦工会批准家政工人的权利将使劳动力成本无法维持。

2003 年，政府成立了一个与家政工人国家联盟谈判的永久性平台，推进一些诸如“公民家政工人”的计划，旨在增强家政工人的呼声。这个计划在巴西的 7 个城市举办教育和公共宣传活动，内容包括对女性的暴力、杜绝家庭童工、家政工人应享有住房、健康和社会保险的权利以及如何组织家政工人工会的指导。

资料来源：Goncalves 2010；Moreira Gomes 和 Martins Bertolin 2011。

需要男性的贡献和承诺。作为国家领导和政府部长，作为宗教和基于信仰的机构的领袖，作为法官，作为军队首领，作为雇主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村长，最后作为丈夫和父亲，男性具有并将持续拥有强大的力量，控制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男性的态度和行为对于讨论和制定性别相关的政策最为关键。[18]19 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儿童监护权和婚姻财产法改革时并未授予女性政治权利。这些早期的女性权利扩张得到了清一色男性的立法机关的通过，投票者均为男性。[19] 这些权利之所以能够被通过，是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人力资本需求的日益扩大，敦促父亲给予女儿这些权利。[20] 扩大女性选举权能在美国最终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妇女组织强有力的倡议。但是在运动早期，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却只是提高了引入选举权法案的可能性，而非让其通过。例如，美国怀俄明州 1890 年第一个颁布实施普选权，尽管怀俄明州并不存在强大的、有组织的选举权运动。西部各州能够首批接受扩大女性选举权法案部分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中产阶级男士的增加。另外一些原因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紧张的政治竞争——他们希望扩大可能会支持他们政策的投票者范围和受到邻州颁布实施选举权的影响。[21]

> “为了美好的未来，男人必须改变。”
>
> ——秘鲁成年女性

1995 年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力求“鼓励男性全面参与性别平等的运动”，包括教育领域、儿童社会化过程、照顾儿童、家务劳动、性健康以及对女性的暴力。男性组织已经聚集力量支持性别平等的组织。卢旺达男性资源中心就是典范之一，该非政府组织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倡导男人和男孩与性别暴力作斗争。男性参与联盟是非政府组织，作为联合国的合作伙伴，它的全球网络旨在敦促男性与男孩为提高性别平等的程度而努力。联盟拥有 400 多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分布在 70 多个国家，从小计划到大型宣传活动，无所不包。大

多数成员都是联合工作，或者与女性权利组织合作。[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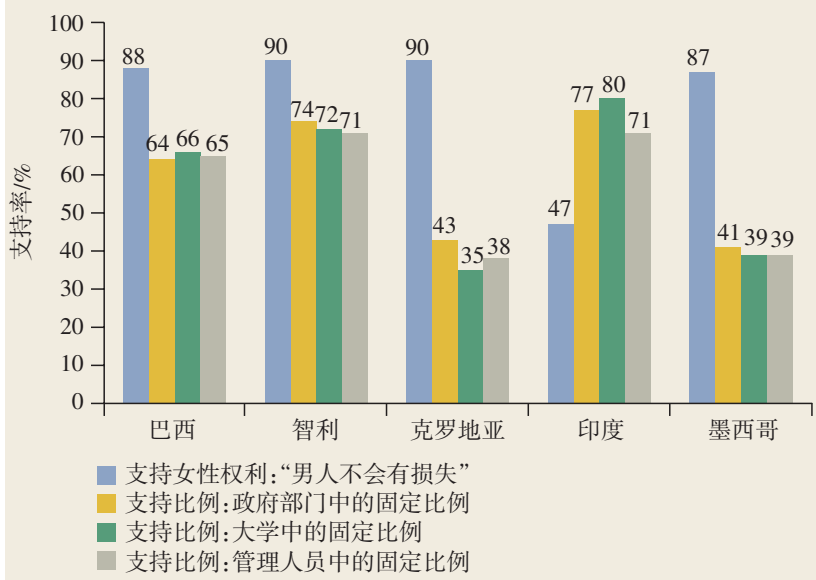
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即男性和女性必须联合起来突破危害极大的性别规范。正如两位研究者所说，

> 性别角色被所有的男性和女性构建与重构——也应受到所有男性和女性的质疑。女孩和成年女性助长了传统的有害的男性气质，正如男孩和男性助长了传统的受限的女性气质。当性别是相关联的这一概念被广泛认同时，才能够实现性别规范真正持久的转变，只授予女性权利而不充分发挥男性作用是目光短浅的行为，如果没有年轻女性的参与也几乎不可能改变男性气质的定义。[23]

将男性和男孩纳入其中的公共政策是个例外。性健康与生育健康倡议应当考虑女性的知识水平以及避孕套的使用率已经提高了，同时男性的知识也在增长。[24] 小额信贷项目不能忽视他们如何挑战男女性别规范与家庭规范。在孟加拉国农村进行的一个家庭调查发现，78%的女性表示因为她们在家所以被迫把钱交给男人，56%的女性表示她们的丈夫强迫她们不许外出工作。[25] 大多数呼吁男性支持性别平等的政策倡议力度都很小，而且缺少战略性的构想来扩大并激励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有一个例外是斯堪的纳维亚，陪产假的规定提倡改变性别规范，鼓励男性参与到照顾孩子中。虽然照顾孩子的责任大多还是落在女性身上，但是此项政策的接受程度相当高。2003 年，陪产假天数的 18%来自于瑞典的爸爸们。[26] 在巴西、智利和墨西哥，压倒多数的成年男性表示“提高女性权利并不会给男性带来损失”（印度例外）（见图 8.3）。争取在领导岗位、大学招生和公共机关的女性配额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甚至在印度，虽然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力度较弱，但是一些特定的政策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27]

男性的参与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性别平等是一项造福所有人的公益事业。在大众媒体上使用地方数据、研究成果和介绍来宣传，以及举行倡议活动能促进政策对话，让大众知道在两性关系、家庭以及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是惠及所有人的公共利益。让年轻人参与进来可以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公正形成持久的社会态度。[28]

图 8.3 全球范围内的男性支持女性的权利和有利于女性的政策



资料来源：Barker 等 2011。

扩大联盟

社会行为者能够通过建立联盟扩大变革需求的方式为改革创造政治空间。社会动员和提高社会认知度的努力能够扩大支持的范围和政策选择的范围。联盟可以改变既定的政策替代方案所带来的净政治回报。

围绕一个备受争议的政策改革的支持与反对的力量取决于该国的政治

背景极其所受的国际影响。在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政治家、民间团体、女性组织、工会和宗教团体公开讨论政策改革的利与弊。当然，当前的具体话题会产生作用。支持阵营和反对阵营的主体随政策是否涉及性别暴力、政治配额与照顾儿童相关的劳动法及生育健康而变化。当性别与种族、社会阶级或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时，就会形成错误的路线。性别暴力一般被认为是共识度最高的一个话题——不同意识形态和经济背景的男性与女性均认为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但是在每一领域中，不同的支持者都有不同的反响。由于税率和用人成本过高，高收入人群的男性和女性均反对政府补贴或企业补贴的产假和育儿假期。堕胎权的立法则招致了保守派宗教团体的反对。

哪一方将最终“胜出”取决于政治联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瑞典左翼政府在工会和女性组织的支持下支持产假和育儿假立法。但是在马里，现有的权力联盟不能改革家庭法，因此婚姻未能被视为婚姻世俗惯例、提高女性结婚最低年龄限制及扩大女性继承权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宗教团体一直在与这些努力展开正面交锋。尽管 2009 年 8 月议会批准了以上提案，但总统阿马杜·杜尔宣布，“在向多数国际机关、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法律专业人士进行广泛咨询后，我决定对家庭法进行第二次审议，确保社会的安定与和平，获得民众的支持与理解”[29]。针对性别平等的政策改革建议会被视为对社会秩序及政治联盟有益的事还是被视为对社会秩序及政治联盟的威胁因素，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在拉丁美洲，有宗教团体参与的政府联盟拒绝批准堕胎权的立法。因此，堕胎在马里被视为原则性问题，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引起丝毫的争议，中国允许堕胎，从而巩固计划生育政策。

释放信息的力量

政治支持源于信息、利益和观念。透明化和战略性沟通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了更有效的公开辩论，可以从多元的观点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探讨。

媒体曝光可以直接吸引利益相关者，并影响他们的个人观念。流行文化和信息宣传活动有利于改变社会准则、社会价值观或社会偏好（见专栏 8.7）。请看新媒体是如何在拉丁美洲宣传男子气概的。在一些政府机构的支持下，一档名叫 Reacciona Ecuador 的电视宣传活动对传统意义的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提出了质疑，将男子气概视为一种暴力形式。[30] 一个男人一边照顾幼童一边盯着电视摄像机说道，“我洗衣服、我熨衣服、我做饭……那又怎么样?”

媒体推广同时能够达到更广泛的教育目标。南非的灵魂城市学院运用广播、电视和报纸传播信息，促进人们对紧迫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艾滋病时代的爱情故事是一个系列的电视短片，共 10 部，分别拍摄于南非的 10 个城市，挑战人们去重新审视他们的性生活，讨论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准则。Umtshatho（婚姻）以南非东开普省一个小村庄为背景，Nomandla 在自己传统科萨族婚礼那天，发现她的未婚夫对她不忠，她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31] 在越南，人口传媒中心（PMC）使用广播来呼吁廉耻观与歧视问题。Khat Vong Song 是一部广播剧，主演 Suu 和她的长女 Mo. Suu 受到她丈夫 Tuat 语言上的及身体上的虐待。Tuat 是村里的族长，他已经有了 3 个女儿，

专栏 8.7 流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态度

在 18、19 世纪，结束奴隶制度的运动认识到持续的成功需要人们、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精英分子，在如何理解习俗这个问题上产生广泛的社会变化。到了今天，一些最早的游说公众的方法仍然适用，废奴主义者制作运动徽章，印刷新“皈依者”的宣言以及支持运动的公众人物和名人的名单，大批量生产宣传海报，制作社会剧。后来的妇女运动在争取参政权、同工同酬、生育健康权及反对家庭暴力等宣传活动中都沿用了以上的方法。人们认识到，主流的女权运动者的信念需要改变各地男女对以上话题的理解，反过来这就需要运用多种不同社会群体熟悉的沟通模式，例如诗歌、小说、为精英分子上演的戏剧或是普通市民看的街头表演和听的流行歌曲。举例来说，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普斯是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今墨西哥）的一位诗人，这位才女创作的 17 世纪的文学作品被美国及西班牙的许多精英分子（受过教育并买得起书的人）广泛阅读。她的作品被新西班牙第一家出版社出版，她抒情地描绘了对于女性自由的约束以及社会普遍价值观的虚伪，采用双重标准审视男人和女人：“谁的罪恶更深重，是她，为了赚钱而罪恶的她？还是他，为罪恶付出代价的他？”从 18 世纪 40 年代到 18 世纪 60 年代，分别由两位男作家创作的关于年轻女性的三部小说——让·雅克·卢梭的《丽莎》、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帕梅拉》——也具体呈现了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理解的彻底改变。在那时，小说是一种新的大众宣传模式，将读者带入情感与想象的新世界，展现了新的、发自内心的对于女性经历的描绘及其对破碎的社会“习俗”的响应。

这些小说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并迅速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对于 18 世纪中期的读者来说，这成为一个启示，男人可以以动人的、满怀同情心的笔触描绘活力四射的年轻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她们被社会准则的枷锁困于无爱的关系中，内心的欲望、才能与渴望都无法得到实现。但更为重要的启示是，这些女性鼓起勇气无视社会对她们的期望，公然反抗法律，离开不快乐的生活环境，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一个世纪后重返这个话题，乔治·艾略特和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也描绘了同样的主题。在性别政策改革被明确提出、发起游说运动和正式颁布前，首先要披露这种改革的可能性。更通俗一点说，先有了思想上的改变，才能付诸于言行。

资料来源：Hunt 2007；Hochschild 2005；Smith 和 Carroll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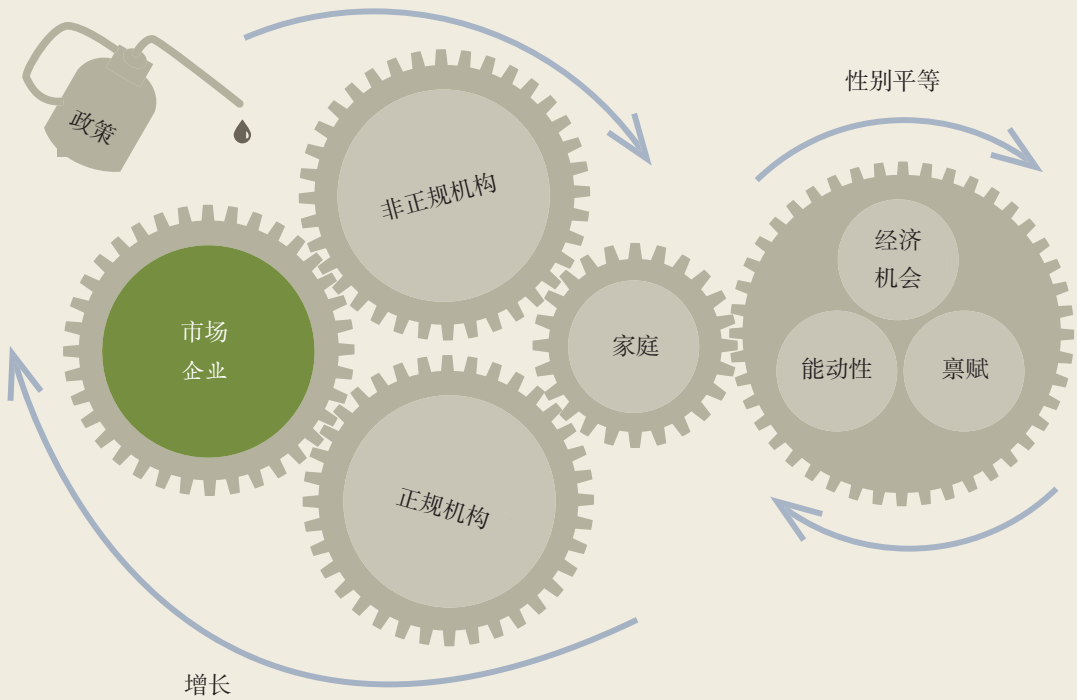
但他非常想要一个儿子。[32]

信息能够起到引发关注，形成公众舆论、建立同盟、号召行动的作用。1992 年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一篇名为《学校是如何欺骗女性学生的》报告引起了美国民众对教育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注意。报告及相关媒体阐述了学校是如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忽视和排斥女性学生。报告描述了教师是如何优先关注男性学生，而女性学生的成绩和尊严却陷入困境。这篇报告对于国家政策和公众舆论的影响是迅速而巨大的。1994 年美国颁布的《性别平等教育法》将女性学生定义为弱势群体，预留了联邦财政资助实施大范围干预举措来增强女性学生参与科学、建筑及数学课程的自信——从为女性学生组织科学训练营到课堂教学平等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性别平等教学材料到学术成绩测试增设新的写作部分，写作是女性学生擅长的领域，以此来提高女性学生在高风险测试中的成绩。美国的形势又在向反方向发生着变化。许多学者们认为学校对男孩的教育是失败的——特别是非裔美国男孩。男孩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文化水平较低、学习成绩较差、出勤率较低、辍学率高、复读率高、特殊教育入学率高、开除及留校察看处分率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低。然而，到目前为止，男孩在教育方面落后的表现却没有引起联邦政府像对女孩那样的响应。[33] 在 21 世纪的信息革命中，社会媒体——博客和社交网络（比如 Facebook 交友网）——已经为社会和政治参与打开了崭新的、日益流行的渠道。区别于其他媒体渠道，社会媒体是双向、互动的，人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搜集和共享信息（见第 6 章）。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了引起关注、社会动员、政治讨论和募集筹款的平台。“邀请”其他人参与进社交网络讨论区的机会已经提高了草根运动的可能性。[34] 例如，骚扰地图网站是一个埃及的非政府组织，搜集女性报告的性骚扰信息，并将它们加载到网络地图上。[35]

无性别歧视的市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美国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企业不愿雇佣女性。需求改变了一切。例如，马

图 8.4　经济考虑和政治经济考虑刺激公司提倡性别平等的政策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里兰州黑格斯敦的费雅嘉飞机场雇佣了 10 000 名工人。1945 年，劳动力中的女性比例从战争开始时的 20%激增到了 70%。在马里兰州，五分之四的国防工作由女性从事。[36] 在发展中国家，正式的带薪职位只占总就业人数很少的一部分，但是需求可以在这里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尼泊尔，战争导致男性流离失所并最终引发了叛乱，叛乱导致女性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37]

今天，不同的环境形成了劳动力的多样性。响应四大新兴趋势，私人部门接受了在工作场合性别平等的观念（见图 8.4）。这四大新兴趋势是，第一，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对于技能的需求很大（见第 6 章）。拥有丰富的人才库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第二，多样性被认为是优化决策和激发创新的途径。第三，女性代表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市场，她们有让产品和服务去迎合她们需求的渴望。第四，性别平等对于潜在的雇员、投资者和客户来说，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态度。

吸引和留住人才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希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女性占总人口的一半，而且在大多数国家里，女性大学生占据多数（见第 1 章）。

虽然在过去十年，女性劳动力大幅度增长，但仍然受到制约（见第 5 章）。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养育孩子的任务还是落在女性身上。养育孩子的责任为许多女性进入和留在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她们停止对目标的追求未必是因为隐形障碍，

专栏 8.8 提高性别多样化的四个成功经验

麦肯锡公司采访了数家以提高女性在劳动力、管理层和董事会中参与率而著称的公司。以下是四个促进性别多样化的成功经验。

通过性别多样化、知识和绩效指标提高透明度。主要的指标包括公司各业务部门、各管理层以及新员工中的女性比例；相似职能部门中男性员工与女性员工的薪酬水平和离职率；被提升的女性及有资格被提升的女性的比例。监测这些指标需要对组织内部将要消除的分歧的程度予以关注。

实行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举措。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兼职工作、灵活的工作时间）。灵活性不仅仅是只针对女性的政策。灵活性应当是企业经营模式发展的一部分，这要求企业调整自己的组织和文化。第二是职位的灵活性及停薪留职期间的支持。希望申请停薪留职的女性员工必须考虑防止给她的职业规划和薪酬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公司在员工休产假期间最好与其保持联系，在休假前及休假后进行一对一会议，确保员工很好地融入工作环境，并且在员工回归工作岗位的第一年要密切注意员工的加薪和奖金，以确保员工得到了公正的待遇。

改变人力资源管理过程。公司必须确保公司的招聘、评估过程以及公司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没有制约女性的职业发展。公司应当尽最大可能提供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来留住最好的人才。

帮助女性政府掌握主流社会准则并培育她们的理想。训练课程、建立网络以及指导计划能够非常有效地引起女性的关注，使她们能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企业环境作出响应。在公司建立女性网络为职业表现创造了机会，在企业组织中也提升了女性领导者的形象。

资料来源：麦肯锡公司 2007。

而是出于“母性障碍”。[38] 所以女性可以集中在部分特定的经济领域就业——例如教师或者公共部门职位——这些工作能够让她们兼顾工作及家庭的责任。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有更高的裁员率和流动率。[39] 公司迫切地希望吸引、雇佣和留住女性人才（见专栏 8.8），因为高人员流动率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分析者指出，更换人员的成本是离职人员工资的 0.25~2 倍（取决于是否所有成本都被确认）。[40] 例如，雇佣和培训一名新护士的成本估计约为离职护士工资的 1.3 倍。[41]

工作—生活的平衡方案力图满足人们对工作及养育子女的双重需求，以此鼓励员工留下及增强忠诚度。如第 7 章所述，兼职工作扩大了家庭休假的福利，为照顾小孩提供了补助，从而为工作的父母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英国的森宝利连锁超市制定政策来加强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包括兼职工作、灵活的合同、轮班工作制、延长产假和提高工资、陪产假、育婴假、照顾小孩可以停薪留职 5 年、因为个人发展或者有照顾小孩的责任可以特殊休假 1 年。[42]

信息科技使远程办公成为可能，使男性和女性可以轻松地在家里办公（见第 6 章）。远程办公是马来西亚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扩大女性劳动力参与的一项核心战略。2001 年科技部和环境部资助了一个名为“电子家庭主妇网络”的项目来推广在线销售家庭生产的商品。[43] T 中心是一个为远程办公的人提供服务并为雇主宣传在线工作机会的互联网门户网站。2002 年由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赞助成立，T 中心旨在“使女性、青年和退休工作者成为家庭、社区及国家的重要经济要素。”[44]

雇主也希望新妈妈们能够更轻松地融入到工作中。贝尔发斯特女王大学为了增加女性教授的数量，给予歇完产假恢复工作的女性一个学期的研究时间，而不是典型的课堂教学或行政方面的工作。[45] 肯尼亚的 Safaricom 公司是一家通讯服务提供商，在这家公司任职的妈妈们产前和产后的医疗开支全部由保险公司支付。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包括三个月的带薪产假。在母乳喂养期的妈妈可以在 7 个月内按需调整轮班时间，并且办公室内提供哺乳室和幼儿保育设施。[46]

德国的一项针对 1 001 家公司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显示，家庭友好型的企业收到的针对空缺职位的求职申请要比其他公司多 31%，留任员工的任

职时间比其他公司长 14%，育婴假后愿意回到原工作岗位的员工数比其他公司多 22%，缺勤率比其他公司少 8%。[47]

但是家庭友好型工作制度存在潜在的危险。第一，增加公司做一项业务的成本。因此，就地育婴措施和产假政策降低了企业雇佣女性的积极性。这样的工作制也强化了生产和在生产中性别角色的现存社会规范。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2007 年，灵活工作制在减少裁员方面节省了 1 300 万美元，但是选择灵活工作制的员工被认为不稳定也不可靠，减少了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晋升的机会。假设采用灵活工作制的员工缺少忠诚，那么男会计师意味着长久的忠诚度。[48] 希望可以利用家庭友好型待遇来更多地承担照顾孩子责任的父亲往往要比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文化更广泛地接受母亲养育孩子的角色。

多样化有助于改善决策

作为一种提高组织效率的途径，性别多样化实践已经获得了支持。诚然，工作人员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创造力和创新性，这是因为多个视角可以丰富商业决策。来自美国以盈利商业组织的国家样本数据显示，性别多样化与较高的销售收入、较多的顾客和较大的利润存在着相关性。[49] 但是多样化也与矛盾的增加和凝聚力的降低相关。多样化的团队或商业团队并不一定运作的更好或带来较大的满意程度。[50]

同样，关于性别多样化对公司董事会影响的国际范围内的论据也是好坏不一，这些论据根据公司绩效的不同指标衡量（见第 5 章）。不同的结果反映了不同的经济环境、惯例体制、公司类型和金融绩效。多样化也可能对以独特方式运作的另类公司董事会产生影响，致使难以总结董事会组成与公司整体绩效的关系。[51] 对 68 家西班牙公司而言，公司董事会中男性和女性的比率对公司价值具有重大影响 [52]，但是对 443 家丹麦公司而言，女性在董事会的席位和组织绩效之间不存在关系。[53]

多样化和绩效的关系是组织文化的体现。改变这种文化要求突破“象征主义”，在不同的组织层面实现关键性的工作人员多样化。在某些情况下，随着公司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公司必须与根深蒂固的敌视女性的组织环境斗争。管理层同样必须重视多样化。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必须灵活，从而使持不同意见者可以让步达成共识。为高绩效创造有力的环境可能要求转变态度、消除带有微妙的、公然的性别偏见色彩的行为。

埃及性别平等模式是一项证书计划，该计划提倡促进性别平等、改善女性在私营企业中平等就业机会的劳动实践。埃及性别平等模式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化，从而提高组织的效率和竞争力。目标之二是在工作场所提倡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从而使具有不同技能、不同视角和不同工作方式的男性和女性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满足员工的志愿需求而共同奋斗。目标之三是提高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忠诚度。目标之四是允许公众通过性别平等印章将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与工作场合的性别平等承诺相联系。公司通过自我诊断的工具分析自身关于性别平等的政策和实践并识别可能的性别偏见。能力建设机会包括为公司提供性别平等实际重要性的培训、人员招聘、培训和职业发展以及阻止性骚扰。审计由独立的机构操作，以决定一个公司是否实现了既定的性别

平等目标。成功的企业将获得一枚印章，承认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兑现了性别平等的承诺。

埃及 Arafa 控股公司是一家纺织服装公司，该公司参与了埃及性别平等模式，为女性提供激励，鼓励她们作为有价值的员工留在企业工作。已婚女性有时免于较长工作的时间，这样她们就可以满足家庭责任的要求。公司还为已婚夫妇提供住宿。公司为居住在较远地区的员工提供免费交通服务。公司还为妈妈们提供时间津贴，以便于她们在白天探望护理自己的孩子。[54]

女性的未来是挪威企业总会于 2003 年 3 月发起的一项性别平等倡议。作为针对企业主和重要企业说客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协助挪威企业总会成员识别能够胜任领导岗位的女性人才，从而为管理带来新的视角。公司识别管理职位和董事会职位潜在的候选人，并签署一项在两年内扩大性别多样化的约束性协议。女性的未来为那些有希望胜任管理岗位的候选人提供领导力和网络化计划服务。参与该计划的女性超过了 1 000 人，其中约 62%的女性促进了自己的事业。奥地利、日本和乌干达都具有类似的倡议。[55]

作为顾客和员工的女性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女性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市场群体，在购物者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女性在消费者购买中的比例，在美国约为 83%，在欧洲约为 70%。[56] 理解该目标群体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许多私营公司扩大了自己的女性劳动力队伍和管理队伍，从而为女性顾客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商业友好型环境。百思买是总部设在美国、具有 120 亿消费者的电子公司。“我们针对女性的目标并不为人所知”，百思买发言人宣称，“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我们希望提高市场占有率，我们需要确保百思买是女性理想的工作场所。”[57] 近年来，公司额外聘用了女性销售经理，降低了女性员工的流动率，并吸引了更多的女性顾客。

在培育中小企业（SMEs）、刺激地方发展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女性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东亚，35%的中小企业为女性所有，单是在印度尼西亚女性拥有的企业就有 500 000 多家。在肯尼亚，48%的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女性拥有，生产了 2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越南，2000 年至 2004 年期间，由女性领导的中小企业的数量的年增长率为 43%；而在摩洛哥，2000 年至 2007 年期间，由女性领导的中小企业的数量的年增长率为 8%。[58]

作为对女性良好信贷记录的响应，一些私营银行开始放松传统的信贷限制（见专栏 7.5）。成立于 2000 年的全球银行业女性联盟包括 25 个成员，其中包括马拉维的 NBS 银行，尼日利亚的 Access 银行、南非第一国民银行和坦桑尼亚的 Selfina 银行。作为一家提倡为女性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该联盟的目标是促进女性在企业界的成长，同时支持成员金融机构实现较好的商业结果。通过一个交流最佳实践和研究的协作性网络，成员提供资本获得、市场、教育和培训等服务，以提高女性企业成功的几率。[59]

性别平等有助于提升公司形象和底线

现在，性别平等被用于评估一个企业是否（在为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同时）承担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因

此，性别平等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机会平等或家庭友好型政策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带来在员工招聘、媒体利益、公众注意和顾客忠诚等方面的利益。

以性别敏感度和多样化为目标的金融激励措施非常重要。一些投资基金（如美国的 CalPERS 基金和欧洲的 Amazone 基金）将性别平等纳入自身的投资标准，一些评级机构（如 Core Rating，Innovest，Vigeo）制定了衡量性别多样化的标准。[60]

2001 年以来，柬埔寨更佳工厂项目使用国内国际标准监控、报告了 300 多家柬埔寨服装厂（劳动力主要是女性）的工作条件。根据一项贸易协议，美国给予柬埔寨优先进入美国市场的待遇，作为交换条件，柬埔寨要改善服装业的工作条件。在柬埔寨，参与该项目是获得出口许可证的条件，体现了制衣业和国际采购商的共同利益和美国、西欧消费者消费非血汗工厂产品的愿望的结合。柬埔寨更佳工厂项目由国际劳工组织管理，由美国劳工部、美国国际发展署、法国发展署、柬埔寨成衣制造商协会、柬埔寨皇家政府和国际采购商资助。[61]

斯里兰卡的服装协会论坛代表产值高达 35 亿美元的服装业分支机构，2006 年，为生产“带有爱心和关怀的衣服”，论坛发起了“没有内疚感的服装”项目。[62] 正如在柬埔寨那样，一个媒体运动力图将斯里兰卡主要雇佣女性的服装业描述为民族企业，以便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脱颖而出。例如，MAS 控股已经在 Thulhiriya 地区建立了一家技术发展水平工厂，炫耀国家的社会责任。[63] 但是工作条件变化很大。一些工厂要求一周工作六天，还有强制性加班或没有休息的连续倒班，一些工厂因工人迟到、说话或上厕所而实行罚款制度。这样的工厂更可能是较老的、较小的、不属于被纳入高收入国家轨道的公司所有的工厂。[64] 因此，当这些工厂没有融入社会化的地方环境，外部标准的效率就会受到限制。在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回报相对于遵从性成本的不确定性使得民族关注容易受到削弱。[65]

尽管如此，关于公司不当行为、歧视或性骚扰行为的生命可以降低公司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吸引力。2009 年 7 月，戴尔电脑公司同意支付 910 万美元，从而结束因其没有给予女性员工同等培训、薪酬或晋升机会而引发的集体诉讼。[66] 作为响应，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多样化和包容性实践，组建了旨在审核公司政策、行动计划和进展状况的全球多样化理事会。[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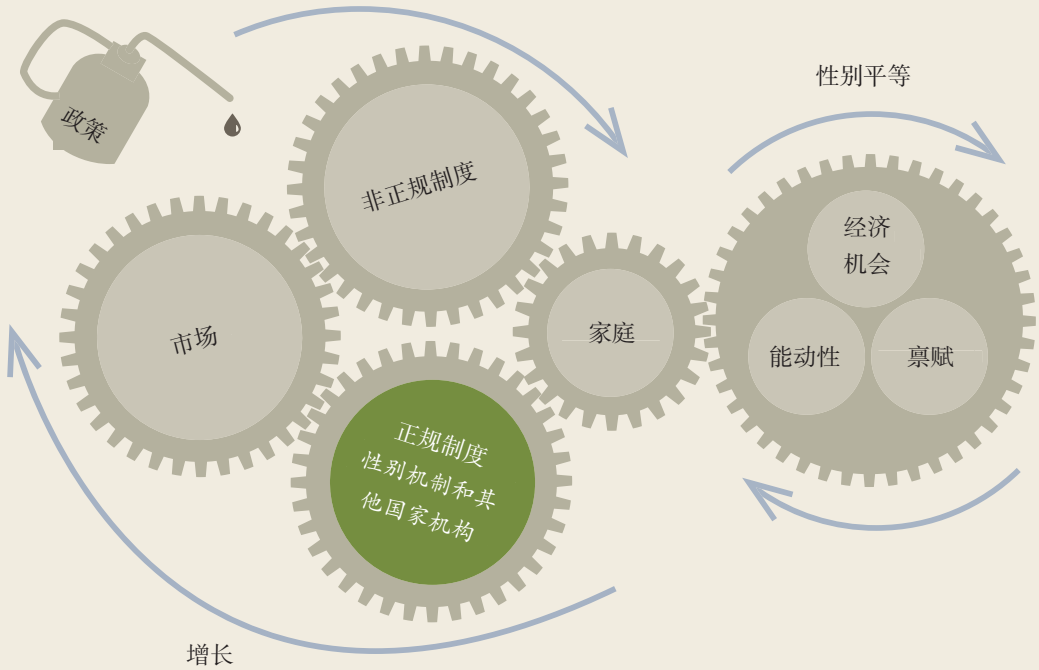
将性别问题纳入正规的制度和政策

尽管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常常催化国家行动，政府常常启动或提倡直接减少或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政策（见图 8.5）。

将性别纳入政策进程的第一步是理解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性别因素。因此，性别透镜应当是所有国家机构的特征。比如，这样的透镜可以揭示限制女性获得公正的法庭程序，或不允许评估政府关于两性政策影响的统计数据搜集体制（见第 9 章）。政府也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具体促进女性的权利，这类机构常常被称为性别机制。

推进性别平等并不总是要求大规模行动。当性别关注被纳入考虑范围后，性别中立型干预措施可能是更具策略性、更有效率的措施。例如，秘鲁的一项土地权属计划通过制定取缔

图 8.5 就制定和采纳性别进步性政策而言，国家行动是核心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专栏 8.9 秘鲁的土地权属：运用性别透镜的性别中立性计划

1992 年，秘鲁政府启动了专用土地资格项目（PETT，在西班牙），以加强土地租赁的安全性，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生产。项目没有采纳和实施任何具体的性别规章制度，因而被认为是性别中立性的。政府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没有公开歧视女性的行为，因而不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

但是农村女性文盲率较高，而且和男性相比，只会讲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较大。同居婚姻中的女性还容易受到排斥。缺失身份证明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身份证明是土地登记必须的文件。

由秘鲁弗洛拉·特里斯坦女性中心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全国女性农村网络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支持女性权利的意识运动，强化了政府的努力。1998 年，该组织就明确同居婚姻中女性的土地权利说服了专用土地资格项目的官员，认为她们应当被承认为共同所有者。该非政府组织起草了从性别视角出发的、被广泛推行的行政指导方针，并为专用土地资格项目的官员提供了性别敏感性培训。

专用土地资格项目改善土地所有权的分配。2004 年，在以男性为户主的家庭中，56%的土地属于联合所有，而没有接受专用土地资格项目赋权的对照组的这一比例均为 49%。更显著的是，采取联合所有权的家庭的比率从 2000 年的 13%增加至 2004 年的 43%。

资料来源：Deere 和 León 2003；Orge Fuentes 和 Wiig 2009。

女性面临限制的规定提高了联合所有权的比率（见专栏 8.9）。它也增加了母亲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降低了生育率。[68]

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结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性别机制及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地位和改善女性权利的正规国家机构激增，这是对女性组织要求、政府领导力国际共识及采取更果断的措施促进性别平等的响应。[69] 性别机制提供了性别分隔政策分析，支持国家机构设计和执行性别敏感性政策。评估所提出的关于女性和男性的政策行动的意义惠及所有人并降低了不平等程度。

性别机制种类多样，从正规的部委到行政委员会和议会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研究所再到办公室。这些机制可能根据正式的法令、行政命令或

专栏 8.10　实践中的性别机制

芬兰。芬兰男性和女性平等委员会是来自不同政党的政治候选人的执行委员会，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该委员会所有的资源很少，不过是 5~8 个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20 世纪 70 年代，该委员会主要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听取关于职业培训的辩论。20 世纪 80 年代，该委员会脱离总理办公室，被归置到社会事务与健康部，虽然远离了权力中心，但是却进入了社会事务决策的主要领地。委员会还接受了推进性别平等改革的行政责任。在新的安排下，委员会在娼妓、工作培训和政治代表席位等议题的辩论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995 年，在新机构的领导下，委员会促进了议会性别配额制度的形成。委员会的成功源自其依法对性别问题的责任、提案权力、靠近社会政策体制、明确的领导及议会对它的支持等因素。

西班牙。西班牙于 1983 年成立了女性研究院，该院一开始是隶属于文化部的管理办公室，后来被归置到社会事务部。该院一直拥有建议或实施行动处理歧视投诉的权力，也拥有设计、促进和评估 1988 年至 2006 年期间实施的四项国家性别平等规划的权力。但是由于该院缺少制定政策建议的法定权威并远离政治权力的中心，它履行这些职责的能力被削弱了。为提高该院的效率，2004 年，该院被归置到更广泛的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平等政策秘书长的旗下，2008 年又被划归到新成立的平等部。在 1986 年的堕胎立法辩论中和最近的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法律和两性平等的法律中，该院实现了性别主流化的极大成功。

智利。针对女性的国家服务机构，即国家妇女服务局强调部委中的性别主流化，其项目实施的执行力有限。现在，妇女服务局的主席与部长地位相当，而且是内阁成员，这样一种地位大大改善了它影响各部委跨领域政策对话的能力。而且，它具有独立的预算。但是，在它的全部 270 名工作人员中，签署永久性合同的只有 10%。它的这种人力资源结构及专业人才的匮乏限制了它的组织能力。而且随着政治部变动发生的重组进一步削弱了该局的能力，导致重要工作战线出现了断裂。

资料来源：McBride 和 Mazur 2011；世界银行，IADB 和 SERNAM 2007。

官僚准则建立。新形式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些性别“焦点”和“办公桌办公”以及波兰的“全权代表办公室”。

性别机制可能具有不同的使命。一些强调具体的性别平等政策，例如联合国北京行动平台制定的要点。其他则通过“性别主流化”将性别视角渗透到治理的各个领域。性别机制使用的方法包括促进政策的采纳和实施、进行评估、提供服务、强化意识和支持非政府组织。

没有那一种单一的组织形式可以永远比其他形式成功，无论该组织形式是法定的、集权的还是被他人慷慨资助的。一些国家设立了中央管理委员会，一些国家设立了部委或官僚办公室。一些国家三者兼有，还有一些国家设有一系列专项问题机构。和中央层面相比，区域和地方政府的机制可能更有效。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和权威的性别平等渠道相比，性别机制是国家内部应对性别平等问题更“现代”的窗口。因此，它们可能是力量薄弱的机制，人员不足、资源匮乏、影响政策决策的力量有限（见专栏 8.10）。

六大组织特征是国家制度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70]

- 使命明确和准确理解预期功能是基本要求。
- 组织结构必须与预期功能相匹配。例如，美国曾经力撑设立多个专项管理办公室的模式，以重点突出劳动（劳工部妇女署）或健康（健康和人类服务部母亲和儿童健康局）等具体的政策领域。
- 提出政策的行政当局和接近行政或中央管理机关以增加政策被采纳的可能性。
- 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具有和决策者和潜在同盟相关政治立场的、灵

专栏 8.11 乌干达离婚法中的法院和宪法挑战

2003 年，在乌干达宪法法院上，乌干达女性律师协会成功地挑战了带有歧视性的离婚法，该法被认定为违宪的法律。根据 1857 年的英国婚姻法（乌干达仍然适用该法律，但是英国早就改革了这一法律），丈夫可以以通奸为理由达到离婚目的，但是妻子必须证明严重的通奸（通奸再加上另一种冒犯行为，如乱伦、重婚、虐待或遗弃）才能达到离婚目的。法官认为这种不同的待遇反映了英国 20 世纪以前男性优于女性的观念，而这不可能和乌干达 1995 年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和性别间无歧视的概念相调和。

资料来源：乌干达女性律师协会和总检察长（2003 年宪法诉愿第 2 号）UGCC1。

活度较高的领导层。

- 金融资源自由裁量权是良好运行的基本要素（包括支持非政府组织在政策所不能及的领域内活动的预算）。
- 与民间社团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可以促进协调行动和主张。此外，这类伙伴关系可以增强代表女性的利益发言的合法性。

法律适用过程中渐进的性别平等

司法体系的职责在于以一种公正的、最终的、可能被执行的态度就任何持久性的纠纷做出权威性的判决。因此，如果以廉洁为准则运行的司法体系中的法院在工作的过程中没有性别偏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偏见，那么法院就可以成为社会变革强有力的代理人。

为什么司法体系如此重要？尽管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直接诉诸法庭的人口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司法体系的影响延伸到直接与司法体系接触的人口之外。持续地、明确地根据判决执行法律的法庭将对大多数公民和机构的未来行为产生影响。在法庭发布持续的、可预见的判决的社区中，社区成员一般会竭力避免法庭可能会惩罚或判决无效的行为。

司法体系本身也可能成为渐进的性别变革的推动力，或者可能成为国家发动变革的工具。国家动态和特征会对法庭如何促进变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变革产生影响：司法体系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法庭的合法性、法庭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明确承认性别平等作为可执行权利的法律的存在等均对司法体系的行动范围产生影响。

法庭通常具有解读宪法和法律的专有权（见专栏 8.11）。例如，博茨瓦纳的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这样解读国家宪法，即尽管宪法没有明确认定性别歧视是违宪的，但是宪法禁止这类性别歧视。[71] 在取缔具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法律条款和国家行动（例如尼泊尔不平等的继承权利）等方面也发挥了基本的作用。[72] 在巴林，女性不能使自己的孩子具有自己国籍的法律案件尚未裁决。此前的法庭行动导致政府搁置了用于嫁给外国公民的巴林女性所生育儿童的公共服务费用。[73]

在某些法律缺位的国家中，法院制定并下达指令和指导方针。印度最高法院，除根据宪法和国际条约宣布性骚扰是违法行为之外，还在议会通过立法之前制定了在所有工作场合和其他机构（无论公私）都要遵循的、可应用的指导方针。[74] 在另一个案例中，它制订了完善各种针对母婴死亡率的政府计划。[75]

特别法院（比如家庭法院或解决强奸、性侵犯问题的法院）或具体体制（留给宗教法院或习惯法院处理的家庭问题）可以影响结果，塑造权利的内容。这些替代性机制，连同司法体系中的性别机构，有助于形成适用法律的性别响应型环境。例如，如同第 4 章所述，即使在女性可以使用司法体系的地方，她们驾驭司法体系的

能力可能被性别规范和性别敏感性所削弱。受到性暴力侵害的女性可能保持缄默，拒绝公开作证，因此，允许在私室提供证词可能促使更多的性侵犯案件被起诉到法庭。

抓住机遇之窗

性别政策的机遇之窗有时候源自不可预测的环境，比如国家灾难。其他机遇之窗是由政治或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还有一些是在跨国机构的倡导下全球范围内的角色模仿引起的。

响应地方具体环境

封闭孤立的事件可能成为产生变革的催化剂。在尼加拉瓜，1998 年的飓风米奇为家庭暴力国家对话创造了条件。非政府组织 Puntos de Encuentro 在飓风米奇遗留的对团结的渴望的基础上，发动了一场运动，该运动的口号是“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一场男性可以阻挡的灾难”。[76]

政治转型可以为更广泛的改革提供空间。在西班牙，1975 年弗朗哥将军的死亡打开了社会领域巨变的大门。在弗朗哥统治期间，西班牙禁止采取避孕措施，禁止女性涉足经济活动、禁止女性拥有财产或女性外出旅行需要征得丈夫的允许。民主的实行允许主要法律法典迅速发生转变满足社会愿望。1975 年废除了婚姻许可。1978 年废止了通奸法和销售避孕套的禁令。1981 年离婚实现了合法化。1985 年，强奸、畸形胎儿或为拯救母亲的性命等特定情况下的流产随之实现了合法化。公共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反对一经要求就同意的流产。 此后，随着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西班牙就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大大缩减。[77]

然而转型可能带来颠覆风险。铁幕的终结意味着东欧女性丧失了一部分她们在共产主义时期已经取得的性别平等权益。20 世纪 80 年代，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约 90%。女性享受免费医疗、较长的产假和国家资助的儿童看护。她们也能从给予她们在政治体系内部分话语权的议会配额制度中受益。但是在俄罗斯联盟，女性在议会的席位从 1987 年的 35%降低到 1999 年的 10%，在斯洛伐克则从 30%降低到 13%。正规的职业招聘严重依赖女性。1992 年至 1994 年期间，立陶宛和波兰一半的日间看护中心关闭了。而保加利亚增加生育率的口号促使女性“回归家庭”。[78] 就这样，东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的政治秩序致使女性在禀赋、能动性和经济机会等方面的倒退。

即使没有发生社会、政治或经济变革，不同行动者间政治权力的相对变化也能为改革提供空间。在摩洛哥，经过女性群体长达十年多的努力，国王签署了新的家庭法案，响应公众支持，2004 年议会全体通过了该法案。[79] 立法将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至 18 岁，多配偶制受到约束，允许女性提起离婚诉讼，赋予了女性保留子女监护权的权利，并改善了继承权利。[80]

借跨国家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跨国网络促进了性别平等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如国际角色典型的传播（见第 6 章）。改革导向型政策制定者借鉴远近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经验。随着大众媒体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深入渗透促进了新观念的传播，一国之外的政策变化可以增强一国之内政策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

1930 年至 1990 年期间，为增加女性在政治机构的代表席位，约 20 个

专栏 8.12 斐济：家庭法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国际规范

斐济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并做出遵守公约的宪法承诺，这是斐济 2003 年采纳新的平等的家庭法的关键因素。

平等伙伴关系原则和对财产的无酬贡献没有得到认可，离婚很难实现，女性可能被排斥在家庭之外，离婚后的赡养费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执行。1995 年，斐济正式加入公约时开始了家庭法改革，但是 2000 年的民众骚乱中止了改革。当国家恢复安宁时，改革进程严重受阻。20 世纪 90 年代家庭法改革专员 Imrana Jalal 认为国家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和 2002 年对该公约的复审在克服反对因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已经生效的宪法明确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为支持者提供了法律支撑。

新的家庭法明确了几条具体的、符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规范的条款：金融和非金融贡献均被纳入财产分割的考虑范围；平均分配假设；根据具体情况强制执行离婚后任一方的赡养费支付。此外，2009 年，男性和女性的结婚年龄均被提高至 18 岁。

在 2010 年的审核中，消除歧视女性行为委员会对国家采纳与公约相一致的家庭法予以赞许，同时也指出，继承权依然是一个问题。

资料来源：Byrnes 和 Freeman 2011。

国家采用了配额制。20 世纪 90 年代，性别配额制扩展到 50 多个国家，而在 20 世纪前十年，又有 50 多个国家批准了配额制。[81] 1997 年 11 月，南非发展社区政府首脑采纳了性别和发展宣言，到 2005 年，女性在决策职位上的代表席位增加到了 30%。2005 年设定了 2015 年目标比例为 50%。[82]

相当一部分跨国网络的力量来自国际妇女组织、联合国、国家发展和合作机构。美洲妇女委员会设立于 1928 年，是讨论和制定美洲性别平等政策的官方论坛，是第一个保证认可女性人权的政府间机构。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女性群体的网络可以成为促进和监控改革的同盟军。这些组织在地方、区域和国家领域工作，深入实地考察，对地方情况了解很深，这些组织可以协助政府评估不同政策响应和游说在优先领域进行政策改革的性别差异化影响。国际发展伙伴也是进行政策创新形成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变革的思想库。国际发展伙伴声明支持性别平等，为应对性别不平等的有效方法提供资助，提供在具体领域实现性别主流化的途径，为增加性别和发展的意识提供培训（见第 9 章）。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和其他国际公约为界定性别平等的国际规范提供了包罗框架，即实行国际准则。《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促进磋商，提供了良好实践的典范并促进了技术协助的合作。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改革的渠道（见专栏 8.12），尽管某些公约并不总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来自消除歧视女性行为委员会的监督和定期监管为国家政府反思自身记录、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形成可能的行动选择提供了机会。

正如联合国人口大会、特别是 1994 年开罗大会一样，1975 年、1980 年、1985 年和 1995 年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也为改善女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赢得了国内和国际支持。

这些国际大会为国家政府和社会行为者提高关注度、产生意识、学习跨国经验、产生动力并施加压力推进国家的性别平等议程开辟了政治空间。[83] 批准与女性权利相关的公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是这类国际人权会议的中心话题（见图 8.6）[84]。

国家政府、非国家行动者和国际发展社区的协同作用非常明显。首先，通过界定性别平等目标的具体指标和期限，《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和世纪发展目标提供了双向问责制的框架。为实现精准目标，两者都联合民族政府和国际利益相关者采取了有时间限制的行动。其次，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伙伴对国际女性权利体制的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对双向责任

制框架具有支撑作用。例如，哥伦比亚地方女性群体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对女性权利的监管和提倡扩大了哥伦比亚宪法（1990 年通过）规定的生育健康保障范围，提高了避孕工具的可得性。[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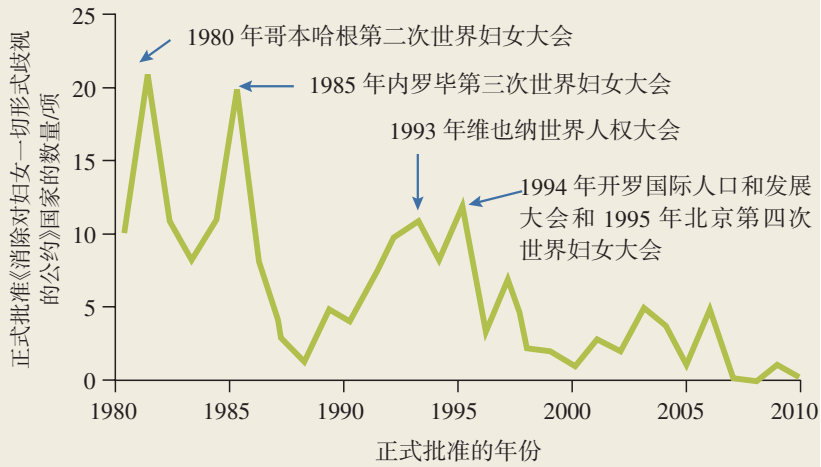
贸易和经济合作协议中的反歧视条款和最低标准是扩大性别改革范围的另一渠道。例如，1999 年 9 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签署了女性整合框架，建立了妇女整合咨询小组，以确保这些条款得到有效执行。[86]

就许多协议而言，不遵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的减少或面临制裁措施。违背北美劳动合作协议附属协议的劳动标准已经导致了跨国法律行动和社会动员。一家建立在墨西哥、美国所有的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女性员工就性骚扰向墨西哥当局提起了诉讼。在调查期间，其母公司美国全球联盟关闭了工厂、解雇了女性员工。随即，性骚扰诉讼案被提交至洛杉矶最高法院，要求根据墨西哥法律支付属于女性的解雇金。在以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支持组装工厂工人委员会的协助下，美国汽车工人联合寻求执行他们（她们）与克莱斯勒、福特、通用所签合同中不使用不公正劳工条件下制造的零件的条款。经过八个月的法律辩论和社区活动，诉讼在法庭外得到解决。[87]

改革之路

由于政策改革是一个适应性的复杂过程，扩大性别平等并没有唯一的路径可循。先进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遵循了不同的路径，公共行动也各不相同。政府通过改革家庭法和财产权、劳动力市场的反歧视性条款以及其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对广域领域内的性别平等化政策予以支持。一些政策对女孩教育和女性的工资就业予以补贴。其他对儿童照料的现金利益和新爸爸的产假条款等进行了尝试。国家不同，改革的顺序也不尽相同。改革的速度及其对性别成果和机遇的影响也是如此。即使在富裕国家中，即使这些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运动和改革，性别平等的目标依然是一项正在进步的工作。

图 8.6　扩大女性权利的进展是重大国际人权会议的中心议题



资料来源：Byrnes 和 Freeman 2011。

一系列的实验反映了在国家范围内和全球范围内对政策行动的持续性呼吁。领导力、民众运动、政策磋商和有效的执行管理是支持和促进更大的性别平等的基本要素，在看起来抵制改革（比如家庭暴力）的领域尤其是这样。

第 7 章已经介绍了两种政策改革的可能性路径，这里再考虑一下。性别政策可以是“增量”的，在流行的社会规范中实施，或响应新兴的社会需要或反映更广泛的制度和规范环境中的变革。作为一种选择，政府行动可以是“转型的”，努力减少现存性别动态的变化。在实践中，增量政策在本质上可以是转型的，而转型的政策可能而且常常失败或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

专栏 8.13 自下而上改革社会规范

在中国延续了 1 000 年的女性缠足是一种痛苦而危险的习俗，但是在 20 世纪，中国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结束了这一习俗。女性生殖器切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2 世纪（红海部族），但是在塞内加尔的部分地区，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这废弃了这一习俗。

这类习俗的顽固性可以归因于近亲结婚群体成员所持有的信仰。家庭会遵守主导性的社会规范，这是因为家庭不想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或不想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严重弱势地位。另一种因素是人们普遍认为习俗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对坦桑尼亚女性的访谈显示，许多女性从来没有想过不切割生殖器也是一种选择。同样，“当最早与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要让女性缠足时，中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习俗的现实感到震惊”。由于缠足和女性生殖器切割是通往婚姻之路的习俗，所以不遵守习俗的家庭可能不能实现繁衍后代的愿望，致使社区很难改变这种习俗。

那么，这些长期被遵循的习俗是如何迅速被抛弃的呢？

现代化似乎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相反，基层社会信仰发生了重组。19 世纪晚期，众多活动群体（反缠足协会和自然脚协会）在中国兴起。这些小组的策略是，盟誓加入团体的成员不让自己的女儿缠足或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与缠过足的女子结婚。这些群体以中国文化术语宣传缠足的劣势，慢慢地把国际社会不赞成这种习俗的观念传递到国民中。随着结束这种习俗的公共支持不断增长，20 世纪早期颁布的一项政治禁令，巩固了早期民众现代化和教育努力取得的成果。

Tostan 是设在塞内加尔的非政府组织，20 世纪 90 年代，支持了一项相似的模型，取缔了塞内加尔部分地区的女性生殖器切割习俗：

- 教育。采纳了为期 30 个月的创新型教育方案，该方案被称为社区赋权方案，包括人权、卫生健康、识字和项目管理等模块。
- 公共讨论。此后在小组背景中对模块进行了讨论。在这些会议上，女性和男性出于自己、家庭和社区的利益，讨论了他们（她们）的期望。对个体和社会需求的思索导致个体修正自身关于现存文化习俗的观念。
- 公共讨论和组织推广。根据新确立的理想，社区通过公共宣言或承诺敦促毗邻社区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协调废弃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习俗。

起初，Tostan 并没有宣布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习俗正确与否。废除该习俗是女性的决定。Malicounda Bambara（人口 3 000）的女性组织在同村居民中宣传提高该习俗对健康有害的意识。这些女性还跑到 Ngerin Bambara 传播这些观念。她们的努力持续增长，最终形成了迪阿布古宣言（Diabougou Declaration），来自 Thies 和 Fatick 地区 13 个社区的 50 名代表代表 8 000 位村民公开决定废除女性生殖器切割这一习俗。1999 年 1 月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律，切割女性生殖器是犯罪行为，可以被判处 1~5 年的徒刑。

相似的历史表明，社区行动导致广泛的个体自我反省，从而改变社会规范。

资料来源：Mackie 和 LeJeune 2009；美国国务院 2001；http：//www.tostan.org.

增量变化：响应新兴的社会需求

许多政策改革伴随着现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规范可能具有惊人的静态性，其顽强的生命力又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弹性。但是社会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孤立性或个体行为积累到临界物质所要求的量时，就会达到临界点，态度就可能迅速发生变化。[88]

政策改变是解决市场和正规非正规制度之间内在矛盾的工具。换句话说，政府行动响应新兴的或既有的社会需求。的确，让变化发生正是大多数社会运动和国际运动的目标，无论变化是通过政府明确的要求这一直接方式发生的还是通过寻求更广泛的社会理解这一间接方式发生的（见专栏 8.13）。

如果已经存在共识的基础，政策制定和确立受到质疑或遭遇政治阻力的可能性就较小。1906 年，《英国妇女评论》对投票权在芬兰的扩大作了如下报道：

> 奇迹发生了……无论从哪一方面，我们的胜利都是伟大的，而随着我们的提案在几乎没有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得到通过，我们的胜利更加伟大。我们女性的感谢中还夹杂着另一种感情，和以极大的热情和坚持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英国美国的女性相比，我们伟大的胜利来的有点儿太容易了。[89]

同样，赋予后殖民时代非洲女性投票权的行动几乎没有受到质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普选权已经扎根在非洲大地。具有性别色彩的公民概念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这是因为这种概念和盛行的话语权平等的观念格格不入。

韩国是出生时男性女性性别比例唯一发生逆转而上升的亚洲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尽管经济迅速增长、女性劳动力参与程度和教育程度都提高了，韩国的男孩偏好仍然顽固地存在。此前强化儒家传统的政策干预措施将资源导入到快速的发展中。1990 年家庭法改革支持男性在家庭中的领导地位和父系继承，离婚后孩子属于父亲的世系。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激发了社会中的规范变化，迅速导致了态度的转变。公民社会开始给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改变支持女性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边缘地位的法律。2005 年，最高法院裁决女性在婚后可以保留在娘家的成员资格，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照顾老辈的权利和义务。[90] 反过来，女儿价值和地位的这些变化逐渐削弱了男孩偏好。

当性别政策尾随社会暗示，社会期望和政策设计之间的结合通常会降低政策意图和结果之间的差异。突尼斯的几波政策改革增加了社会改革家庭法的压力和共识。后来改革继续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之前的努力带来了收益（见专栏 8.14）。

但是性别改革也可以激发改变公共舆论的强大阻力。1995 年 5 月，爱尔兰宣布将通过全民公决投票决定取缔宪法中关于离婚的规定时，69% 的选民说会投赞成票。然而到十一月举行投票时，一场反对离婚的一致性运动使公共支持降低到了 49%。“赞成”票最终仅仅以 0.6 个百分点的微小优势险胜。[91]

专栏 8.14　突尼斯：女性的话语权和权利

自 1956 年赢得独立以来，突尼斯发起了几次促进两性平等的改革浪潮。《突尼斯个人身份法改革》对婚姻（包括颁布禁止多配偶制的禁令）、离婚、监护权进行了改革，某种程度上也对继承权进行了改革。20 世纪 60 年代，突尼斯进一步推行改革，引入了工资平等、男孩和女孩的强制性教育和避孕工具的广泛提供。这些改革可以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国家为快速实现现代化而强制采取的措施。

20 世纪 70 年代，在前两波进展的基础上，女性运动开始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加快。女性团体随之兴起，通过强调女性的权利和问题，两性平等主义者的讨论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其中兴起的女性团体包括 Taher al Haddad 俱乐部，突尼斯女性研究与发展协会和突尼斯女性国家联盟等。

1993 年，新的法律保障了女性的额外权利，例如通过了国籍权（第一次，突尼斯女性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可以获得突尼斯国籍，无论孩子的父亲是突尼斯人与否）和保护女性免遭家庭暴力和工作场所歧视的权利。1977 年，政府制定了新的社会政策，对低收入工作女性、离婚女性及其孩子予以支持。

资料来源：Baliamount-Lutz 2011；Moghadam 2007。

> “尽管我们被多次告知女性生殖器官切割不好（我同意这一点），但是仍然认为女性生殖器官切割很好的观念依然存在。这就是有些女性偷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做生殖器官切割的原因所在。或者她们自己给依然年幼的孩子做切割。”
>
> ——坦桑尼亚成年女性

政策意图和行动也可以带来预期目标之外的溢出效应，形成新的社会态势和改革的进程。例如，离婚法保护一段结束的婚姻中各方的利益，明确财产分割、儿童监护和赡养费等。但是通过改变夫妻双方的谈判地位，离婚法也对已婚夫妻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在爱尔兰，离婚的合法化及其伴生的婚姻解体风险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和有宗教信仰的已婚女性相比，无宗教信仰的已婚女性的参与率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增加了 25%）。[92] 离婚的合法化也增加了已婚个体的储蓄。[93] 在智利，关于离婚的立法增加

了已婚夫妇对儿童的学校投资。[94]

渐进性、分阶段改革可以以一种阻力较小、溢出效应得到较好管理的方式带来变化。可以在公共社会态度提供了良好基础的地方开始政策行动。近期对孟加拉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家庭户主（大部分是男性）认为女儿和儿子应当享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尽管根据现行的法律条款，女儿继承的财产是男孩的一半。[95]

促进性别平等较大进展的转型变革

在某些情况下，为促进性别平等化，政府会提出一些社会政策方案或议程。这些努力可能是转型性的，也就是说，这些努力先于就盛行的社会规范达成的社会共识或出现的社会挑战。国家政策可以发出得体行为的信号，提供行为变化的动力，从而对奖励和成本的结构产生影响。这类政策可以来自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愿景和改革的强烈政治意愿。或者触及一些对大多数人口影响很小的问题。

转型变革通常寻求去推动“滞缓”领域的进展。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例。就提供公共儿童照料服务和给予较长的产假而言，这些国家走在前面。1995 年，瑞典为父亲保留了一个月的带薪产假，尽管母亲用于照料小孩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父亲的配额”还是不能转移给母亲（见专栏 8.15）。[96] 最近，德国也引入了一项类似的、不可转移的产假政策。父亲休产假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3.5%增加到 2009 年的 16%。所休产假超过为他们预留的两个月的父母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

在缺少能然条件的状况下引入转型改革（例如新的法律）可能减弱政策意图和结果，引发对改革持续性的质疑。行为变革的实现可能要求强有力的执行机制。逆转风险（尤其是当执行松懈时）会对新的平衡状态构成威胁。

例如，中国 1950 年《婚姻法》寻求消除包办婚姻、允许离婚、给予女性继承财产和监护儿女的权利。隶属于妇联的女性干部负责在村庄和家庭贯彻实施这些政策。但是该法遇到了

专栏 8.15 瑞典：鼓励参与式父亲角色

1970 年，当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美国的一个女性组织发表演讲时，令听众惊奇的是，他谈及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他演讲的题目是，“解放男性”，帕尔梅认为只有当女性和男性均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责任，实质性的变化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就养育儿女而言，男性应当享有和承担和女性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母亲产假向父母产假的转型促使瑞典男性积极地扮演自己的父亲角色。这种变革发生在 1974 年，意味着孩子出生带来的产假不再由母亲独享，父亲也可以使用产假。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产假从 1974 年的 6 个月延长到今天的 16 个月。

休产假父亲的比例缓慢增长，数量也不大。有人认为应对在父母之间强制分割这种权利。随之发生了父母是要可以“自由选择”的热烈争论。此后，无数的政府非政府运动鼓励父亲使用父母产假。

1995 年，为期一个月的“父亲配额”被采纳，借以鼓励父亲休产假和促进性别平等。也就是说，这一个月的父母产假再也不能转移给另一方。2002 年，“父亲配额”又增加了一个月。

2007 年，在父母产假的申请者中，爸爸的比例占 44%。在父亲产假引入之前的 1993 年出生的孩子中，约 49%的父亲没有使用一天父母产假。两年后，不使用父母产假的父亲比例只有 19%，而使用产假时间达到或超过 30 天的父亲的比例从 33%上升至 53%。

但是，鼓励父亲休产假依然任重道远。2007 年，父亲和母亲平等分配父母产假的的比例仅有 5%。2008 年 7 月，作为父母更加平等地分享产假的激励措施，瑞典引入了性别平等津贴。父母收入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在另一方（通常是父亲）休产假时回到全职岗位后将最多获得 300 克朗的减税待遇。

资料来源：Nyberg 2011。

来自男性和年长女性的强烈反对，这是因为该法致使他们丧失了对年轻女儿和儿媳的控制力。[97] 尽管《婚姻法》缩小了包办婚姻的范围，提高了结婚年龄，并将离婚的选择纳入家庭法，但是当它开始威胁到家庭体制并产生政治不满时，该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削弱了。[98]

推行政策改革是由国家及其坚持改革的能力及更广大社区接受改革的能力决定的。新的法律可能反映了流行的传统或社会规范。但是如果新的法律与地方态度或习俗相抵触，它们可能只能被忽略或得不到普及。因此，单纯的立法政策改革还不足以解决问题。金融、贯彻实施、公共意识运动和执行均需要对政策改革予以支持。2003 年，为增加女性在公司董事会的代表席位，挪威政府引入了自愿配额。在公司未能采取行动后，挪威实施了强制性配额。2006 年，挪威要求公共有限公司在两年内将公司董事会女性董事的比例提高至至少 40%。2009 年，受到影响的公司的董事会女性董事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两倍。[99] 严厉的制裁，包括强行解散不遵循该规则的公司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为避免受到性别代表席位规定的冲击，一些公司将其法律地位从公共有限公司转变为私人有限公司。[100] 转型改革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关系带来新的动力。政府可以立法创立新的权利、制定新的政策，其中一些政策是可被执行的，一些是象征性的。巴西选举名单女性配额的影响有限 [101]。阿富汗为女性预留的席位允许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102] 女性配额制促使政党及早投资培训新一代的女性干部。女性可以为政策领域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优先事项。事实上，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女性立法委员发起的与女性、家庭和儿童议题相关的立法议案超过了男性立法委员提交的数量。[103]

人们认为一个社会中 5%的人口（创新者）接受了某种新观念时，它就会“渗透”进去。而且通常来说，为达到 5%接受新观念的人口的水平，一半的人口必须“意识”到这些观点。当 20%的人口（早期实践者）支持新观念，新观念就成了“不可阻挡”的观念。转型改革来自系统的、地方性的创新者和早期实践者。[104]

注释

1. Bourguignon，Ferreira 和 Walzer 2007。
2. NAWL 和 NAWL 基金 2011。
3. 菲律宾众议院 2008。
4. Pandofelli，Meinzen-Dick 和 Dohrn 2008。
5. Ray 2003。
6. Kabeer 2005。
7. Lind 和 Bruzy 2008。
8. Gangopadhyay 2010。
9. Gupta 2009。
10. Paxton，Hughes 和 Green 2006。
11.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2005。
12. 如同 Frieson（2011）所引述的。
13. Young 1990。
14. Lind 和 Bruzy 2008。
15. Masho 和 Matthews 2009。
16. Lerner 1990。
17. Weldon 2006。
18. Farré 2011。
19. Doepke 和 Doepke 2009。
20. Fernández 2010。
21. Munshi，待出版。
22. http：//www.menengage.org。
23. Barker 和 Ricardo 2005，p. 13。
24. Greene，Robles 和 Maciej Pawlak 2011。
25. Pitt，Khandker 和 Cartwright 2006。
26. Morgan 2009。
27. Barker 等 2011。
28. 国家女性研究中心和普拉蒙多研究所 2010。
29. 正如 BBC 所引述的，http：//news.bbc.co.uk/2/hi/8223736.stm。
30. Porras Serrano 2011。
31. http：//www.soulcity.org.za。
32. http：//www.populationmedia.org/where/

vietnam/c% E1% BA% A1m-ba% E1% BB% B9-tune-in。

33. Kleinfeld 2009。

34. Gueorguieva 2008。

35. Belyea 2011。

36. http：//www.mpt.org/thewar/maryland/workforce.html。

37. Menon 和 Rodgers 2011。

38. 该术语由 Joan Williams（2000）创造，用于描述女性作为工作妈妈所面临的障碍。

39. 关于例证，见 Hom，Roberson 和 Ellis 2008。

40. Silva 和 Toledo 2006。

41. Jones 和 Gates 2007。

42. 国际劳工组织 2004。

43. Elias 2009。

44. http：//www.tcenter.com.my。

45.《时代》 2011 年度女性最佳雇主，http：// www.ri5.co.uk/resources/digitaleditions/Top50EmployersForWomen.htm。

46.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10。

47. Warth 2009。

48. Porter 2006。

49. Herring 2009。

50. Kochan 等 2002。

51. Rhode 和 Packet 2010。

52. Campbell 和 Minguez-Vera 2008。

53. Rose 2007。

54.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2010.

55. Maeland 2007；http：//www.nho.no。

56. 麦肯锡公司 2007。

57. 百思买寻求女性作为自己的顾客和管理人员，http：//www.startribune.com/business/45872412.html。

58. 世界万事达卡 2010。

59. Hallward-Driemeier 2011； http：//www.gbaforwomen.org。

60. 麦肯锡公司 2007。

61. http：//www.betterfactories.org/ILO/aboutBFC.aspx？z=2&c=1。

62. http：//www.garmentswithoutguilt.com/。

63.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1455047？story_id=E1_TTQVVDQS。

64. Middleton 和 Hancock 2009。

65. Ruwanpura 和 Wrigley 2010。

66. Hubley，et al. v. Dell Inc.，No. 1：08-cv-00804-JRN，美国得克萨斯。

67. http：//content.dell.com/us/en/corp/d/corpcomm/cr-diversity-mission.aspx。

68. Field 2007。

69. McBride 和 Mazur 2010。

70. McBride 和 Mazur 2011。

71.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检察长，AHRLR 99（BwCA 1992）。

72. Dhungana v Nepal，尼泊尔最高法院，Writ No. 3392 of 1993，1995 年 8 月 2 号。

73. Kelly 和 Breslin 2010。

74. Vishaka and Others v. State of Rajasthan，（1997）3 S.C.R. 404（印度）。

75. Laxmi Mandal v Deen Dayal Hospital，W.P.（C）Nos. 8853 of 2008（印度）。

76. http：//www.nicaraguasc.org.uk/archive/violence%20ag%20women/cvaw.htm。

77. Gunner，Kaya 和 Sánchez-Marcos 2011。

78. LaFont 2001。

79. Sadiqi 2008。

80. 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的歧视的委员会 2006。

81. Krook 2009。

82. Tripp 和 Kang 2008。

83. True 和 Mintrom 2001。

84. Wotipka 和 Ramírez 2007。

85. Simmons 2009。

86. Cagatay 2001。

87. Bayes 和 Kelly 2001；Fontana，Joekes 和 Masika 1998。

88. Young 2007。

89. 正如 Ramirez，Soysal 和 Shanahan 1997 所引述的那样。

90. Das Gupta，Chung 和 Shuzhuo 2009。

91. Burley 和 Regan 2002。

92. Bargain 和 Keane 2010。

93. González 和 Özcan 2008。

94. Heggeness 2010。

95. 麻省理工大学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2010。

96. Borchorst 和 Siim 2008。

97. Engel 1984。

98. Diamant 2000。

99. Matsa 和 Miller 2011。

100. Storvik 和 Teigen 2010。

101. Araújo 2010。

102. Krook 2009。

103. Schwindt-Bayer 2006。

104. Rogers 1983。

参考文献

The word *processed* describes informally reproduced works that may not be commonly available through libraries.

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at MIT. 2010. *Empowering Young Women: What Do We Know about Creating the Girl Effect?*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reasen, Tavo, Anette Borchorst, Drude Dahlerup, and Eva Lous, eds. 1991. *Moving 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omen's Movement.*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Antrobus, Peggy. 2004. *The Global Women's Movement: Origins, Issues and Strategies.* New York: Zed Books.

Araújo, Clara. 2010. "The Limits of Women's Quotas in Brazil." *IDS Bulletin* 41 (5): 17–24.

Baliamoune, E. Mina. 2011. "The Making of Gender Equality in Tuni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Bargain, Olivier, Libertad González, Claire Keane, and Berkay Özcan. 2010. "Female Labour Supply and Divorce: New Evidence from Ireland."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959,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Barker, Gary, Manuel Contreras, Brian Heilman, Ajay Singh, Ravi Verman, and Marcos Nascimento. 2011. "Evolving Men: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Survey (IMAGES)." Men and Gender Quality Policy Project Coordin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Instituto Promundo, Washington, DC.

Barker, Gary, and Christine Ricardo. 2005. "Young M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Implicaciones for HIV/AIDS, Conflict, and Violence." Social Development Papers 2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su, Amrita, and C. Elizabeth McGregory, eds. 1995.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Women's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Bayes, Jane H., and Rita Mae Kelly. 2001. "Political Spaces, Gender and NAFTA." In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ed. Rita Mae Kelly, Jane H. Bayes, Mary E. Hawkesworth, and Brigitte Young.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Belyea, Ashley. 2011. "Thinking Outside the Blog: Women's Voice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1) (Winter): 53–63.

Borchorst, Anette, and Birte Siim. 2008. "Woman-Friendly Policies and State Feminism: Theorizing Scandinavian Gender Equality." *Feminist Theory* 9 (2): 207–24.

Bourguignon, Francois, Francisco H. G. Ferreira, and Michael Walton. 2007. "Equity, Efficiency and Inequality Traps: A Research Agenda." *Economic Inequality* 5 (2): 235–56.

Burley, Jenny, and Francis Regan. 2002. "Divorce in Ireland: The Fear, the Floodgates and the Re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Family* 16 (2): 202–22.

Byrnes, Andrew, and Marsha A. Freeman. 2011. "The Impact of the CEDAW Conventions: Paths to Equalit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agatay, Nilufer. 2001. "Trade, Gender and Poverty."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ew Yor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Campbell, Kevin, and Antonio Mínguez-Vera. 2008. "Diversity in the Boardroom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3 (3): 435–51.

Das Gupta, Monica, Woojin Chung, and Li Shuzhuo. 2009. "Evidence for an Incipient Decline in Numbers of Missing Girls in China and Ind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 (2): 401–16.

Deere, Carmen Diana, and Magdalena León. 2001. "Who Owns the Land? Gender and Land-Titling Programme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 (3): 440–67.

Diamant, Neil T. 2000.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1950 Marriage Law: State Improvisation, Local Initiative and Rural Family Change." *China Quarterly* 161 (2000): 171–98.

Doepke, Michèle, and Matthias Doepke. 2009. "Women's Liberation: What's in It for Me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 (4): 1541–91.

Elias, Juanita. 2009. "Gendering Liberalisation and Labour Reform in Malaysia: Foster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Productive and Reproductive Econom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 (3): 469–83.

Engel, John W. 1984. "Marria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of a New La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6 (4): 955–61.

Farré, Lídia. 2011. "The Role of Men in Gender Equalit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Fernández, Raquel. 2010. "Women's Right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46,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Milan.

Ferree, Myra Marx, and Beth B. Hess. 2000. *Controversy and Coalition: The New Feminist Movement across Four Decades of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Field, Erica. 2007. "Entitled to Work: Urban Property Rights and Labor Supply in Peru."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4): 1561–602.

Fontana, Marzia, Susan Joekes, and Rachel Masika. 1998. *Global Trade Expansion and Liberalisation: Gender Issues and Impacts.* BRIDGE Report 4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U.K.

Frieson, Kate. 2011. "Cambodia Case Study: Evolution toward Gender Equalit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Gangopadhyay, Monalisa. 2010. "Hindutva Meets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n Hindu Urban Media Women." PhD thesis,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ami.

Geisler, Gisela. 2004. *Women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s in Southern Africa: Negotiating Autonomy, Incorpo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Vizcaya, Spain: Grafilur Artes Gráficas.

Goncalves, Terezinha. 2010. "Crossroads of Empowerment: The Organisation of Women Domestic Workers in Brazil." *IDS Bulletin* 41 (2): 62–9.

González, Libertad, and Berkay Özcan. 2008. "The Risk of Divorce and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3726,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Greene, Margaret E., Omar Robles, and Piotr M. Maciej Pawlak. 2011. "Masculinities,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Gueorguieva, Vassia. 2008. "Voters, MySpace and YouTube: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n the 2006 Election Cycle and Beyond."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6 (3): 288–300.
Gunner, Nezih, Ezgi Kaya, and Virginia Sánchez-Marcos. 2011. "Gender Gaps in Spain: Policies and Outcomes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Barcelona, Barcelona. Processed.
Gupta, Monobina. 2009. "Marching Together: Resisting Dowry in India." JAGORY, New Delhi.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11. "Improving the Legal Investment Climate for Women in Sub-Saharan Af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57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ancock, Peter. 2009. "Gender, Status and Empowerment: A Study among Women Who Work in a Sri Lankan's 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es* 25 (4): 393–420.
Heggeness, Misty L. 2010. "How does the Right to Divorce Affect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Households? The Case of Chile." Minnesota Popul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Processed.
Herring, Cedric. 2009. "Does Diversity Pay? Race, Gender, and the Business Case for Diversity." *Amerci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2): 208–24.
Hochschild, Adam. 2005. *Bury the Chains: Prophets and Rebels in the Fight to Free an Empire's Slav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om, Peter W., Loriann Roberson, and Aimee D. Ellis. 2008.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Who Quits: Revelations from Corporate America."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1): 1–34.
Hooks, Bell. 2000.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2d ed.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Hunt, Lynn. 2007. *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ICRW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and Instituto Promundo. 2010. "What Men Have to Do with It: Public Policie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CRW, Washington, DC.
ILO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04. "Gender Equality and Decent Work: Good Practices at the Workplace." ILO, Geneva.
Jones, Cheryl Bland, and Michael Gates. 2007.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Nurse Turnover: A Business Case for Nurse Retention." *OJIN: The Online Journal of Issues in Nursing* 12 (3), manuscript 4, September 30.
Kabeer, Naila. 2005.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Millenium Development Goal." *Gender and Development* 13 (1): 13–24.
Kelly, Sanja, and Julia Breslin, eds. 2010. *Women's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gress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Freedom House.
Kleinfeld, Judith. 2009. "The State of American Boyhood." *Gender Issues* 26 (2): 113–29.
Kochan, Thomas, Katerina Bezrukova, Robin Ely, Susan Jackson, Aparna Joshi, Karen Jehn, Jonathan Leonard, David Levine, and David Thomas. 2003. "The Effects of Diversity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Report of the Diversity Research Network."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42 (1): 3–21.
Krook, Mona Lena. 2009. "The Diffusion of Electoral Reform: Gender Quotas in Glob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Lisbon, April 14.
Krook, Mona Lena, and Diana Z. O'Brien. 2010. "The Politics of Group Representation: Quotas for Women and Minorities Worldwide." *Comparative Politics* 42 (3): 253–72.
LaFont, Suzanne. 2001.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Women in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4 (2): 203–20.
Lerner, Gerda. 1990. "Reconceptualizing Differences among Wome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 (3): 106–22.
Lind, Amy, and Stephanie Brzuzy, eds. 2008. *Battleground: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Mackie, Gerry, and John LeJeune. 2009. "Social Dynamics of Abandonment of Harmful Practices: A New Look at the Theory." Working Paper 2009–06,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Innocenti Research Centre, Florence.
Maeland, Kari. 2007. "Female Future: Mobilizing Talents: A Business Perspective." Norwegia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Oslo.
Masho, Saba W., and Lindsey Matthews. 2009. "Factors Determining whether Ethiopian Women Support Continuation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107 (3): 232–35.
MasterCard Worldwide. 2010. "Women-Owned SMEs in Asia/Pacific,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n Assessmen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MasterCard Worldwide Purchase, NY. http://www.masterintelligence.com/upload/251/178/MC84-WomenSME-S.pdf.
Matsa, David A., and Amalia R. Miller. 2011. "A Female Style in Corporate Leadership? Evidence from Quota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 and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Processed.
McBride, Dorothy E., and Amy G. Mazur. 2010. *The Politics of State Feminism: Innovation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Gender Machineries Worldwide."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McKinsey & Company Inc. 2007. "Women Matter. Gender Diversity, A Corporate Performance Driver." McKinsey & Company Inc., London.
Menon, Nivedita. 2009. "Sexuality, Caste, Governmentality: Contests over 'Gender' in India." *Feminist Review* 91 (1): 94–112.
Menon, Nidhiya, and Yana van der Meulen Rodger.

2011. "War and Women's Work: Evidence from the Conflict in Nepal." Brandeis University, Waltham, MA. Processed.

Mensah-Williams, Margaret. 2010. "The Evolving Status and Role of National Mechanisms for Gender Equality; Parliamentary Mechanisms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Stakeholde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54th session,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New York, March 1–2.

Moghadam, Valentine M. 2007. "Globalization, States, and Social Rights: Negotiating Women's 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he Magre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33: 77–104.

Moreira Gomes, Ana Virgínia, and Patrícia Tuma Martins Bertolin. 2010. "Regulatory Challenges of Domestic Work: The Case of Brazil." Working Paper Series 3, Labour Law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Laboratory, Montreal.

Morgan, Kimberly J. 2009. "Caring Time Policies in Western Europe: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7 (1): 37–55.

Munshi, Soumyanetra. Forthcoming. "Partisan Competition and Women's Suff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al Social Research.*

Nyberg, Anita. 2011. "Country Case Study of Swede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Orge Fuentes, Daniela, and Henrik Wiig. 2010. "Closing the Gender Land Gap: The Effects of Land-Titling for Women in Peru." Working Paper 120,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Oslo.

Pandolfelli, Lauren, Ruth Meinzen-Dick, and Stephan Dohrn. 2008. "Gender and Collective Action: Motivations,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 (1): 1–11.

Paxton, Pamela, and Melanie M. Hughes. 2007. *Women, Politics and Power: A Glob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Paxton, Pamela, Melanie M. Hughes, and Jennifer L. Green. 2006.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d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1893–2003."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 (6): 898–920.

Philippin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008. *An Act Providing for the Magna Carta of Women.* House Bill No. 164, introduced by representatives Juan Edgardo M. Angara, Mary Ann L. Susano, Monica Louise Prieto-Teodoro, Raul V. Del Mar, Amelita C. Villarosa, and Judy J. Syjuco.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nila.

Pitt, Mark M., Shahidur R. Khandker, and Jennifer Cartwright. 2006. "Empowering Women with Micro Finance: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4 (4): 791–831.

Porras Serrano, Maria Fernanda. 2011.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Good Practices in National Action Plans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Subregional Headquarters for the Caribbean." Ministry of Interior,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Quito.

Porter, Nicole Buonocore. 2006. "Re-Defining Superwoman: An Essay on Overcoming the 'Maternal Wall' in the Legal Workplace." *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and Policy* 13: 55–84.

Ramirez, Francisco O., Yasemin Soysal, and Suzanne Shanahan. 1997. "The Changing Logic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Cross-National Acquisition of Women's Suffrage Rights, 1890 to 199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5): 735–45.

Ray, Debraj. 2003. "Aspirations, Poverty, and Economic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Bank's Conference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June 22.

Rhode, Deborah L., and Amanda K. Packel. 2010. "Diversity on Corporate Boards: How Much Difference Does Difference Make?" Working Paper Series 89, Rock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Standord, CA.

Rogers, Everett M. 1962.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Rose, Caspar. 2007. "Does Female Board Representation Influence Firm Performance? The Danish Evide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5 (2): 404–13.

Ruwanpura, Kanchana N., and Neil Wrigley. 2010. "The Costs of Compliance? Views of Sri Lankan Apparel Manufacturers in Times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0: 1–9.

Sadiqi, Fatima. 2008.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Family Law in the Moroccan Feminist Mov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5 (3): 325–37.

Scharf, Stephanie, and Barbara M. Flom. 2010. *Report of the Fifth Annual National Survey on Retention and Promotion of Women in Law Firms.* Chicago, IL: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Lawyers and the NAWL Foundation.

Schwindt-Bayer, Leslie A. 2006. "Still Supermadres? Gender and the Policy Priorities of Latin American Legisla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 (3): 570–85.

Silva, José Ignacio, and Manuel E. Toledo. 2009. "Labor Turnover Costs and Behavior of Vacancies and Unemployment." *Macroeconomics Dynamics* 13 (S1): 76–96.

Simmons, Beth A. 2009. *Mobilizing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Law in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Hilda L., and Berenice A. Carroll, eds. 2000. *Women's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An Antholog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torvik, Aagoth, and Mari Teigen. 2010. "Women on Board: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Sumbadze, Nana. 2011. "Gender Equality: Georgia."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Tripp, Aili Mari, and Alice Kang. 2008. "The Global Impact of Quotas: On the Fast Track to Increased Female Legislative Represent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 (3): 338–61.

True, Jacqui, and Michael Mintrom. 2001.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Policy Diffusion: The Case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5 (1): 27–57.

UNCEDAW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2006.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18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ombined Third and Fourth Periodic Report of States Parties. Morocco." UNCEDAW, New York.

UNIFEM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2010. "Companies Leading the Way: Putting the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UNIFEM, New York.

UNRISD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5. "Women Mobilizing to Reshape Democracy." In *Gender Equality: Striving for Justice in an Unequal World,* ed. UNRIS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1. "Senegal: Report o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 or 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Warth, Lisa. 2009.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Corporate Secto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9/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Geneva.

Weldon, S. Laurel. 2006. "Inclusion, Solidar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Global Movement against Gender Viol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4 (1): 55–74.

Whelehan, Imelda. 1995. *Modern Feminist Thought: From the Second Wave to 'Post-Femi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Joan. 2000. *Unbending Gender: Why Family and Work Confli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IA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nd SERNAM (Servicio Nacional de la Mujer). 2006. "Chile Country Gender Assessment: Expanding Women's Work Choices to Enhance Chile's Economic Potential." World Bank and IADB, Washington, DC.

Wotipka, Christine Min, and Francisco O. Ramírez. 2007. "World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ed. Beth Simmon,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oung, H. Peyton. 2007. "Social Norms." Working Paper Series 307,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xford, U.K.

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第 9 章

9

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议程

国内行动对于减少性别不平等具有核心作用。任何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民、组织，以及国际组织所采取的全球性行动都无法替代公平有效的国内政策与制度的效果。但是全球性行动可以起到补充作用，它们可以加强国内政策的影响，并且最终关系到全球一体化加深在促进所有或部分女性的性别平等和生活改善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本章将讨论世界银行、国际合作伙伴、民间团体如何支持各国促进性别平等，并提出国际发展社区的全球行动议程，作为第 7 章所提国内公共议程的补充。

议程呼吁国际发展社区在五个领域采取行动。其中包括本报告提出的四大优先领域（缩小健康与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特别是严重弱势群体中的性别差异；拓宽女性获得经济机会的渠道；缩小话语权与能动性方面的性别差异；避免性别不平等的代际继承），以及第五大交叉领域，即有效运用数据与知识支撑以实证为基础的公共行动。本议程还在各个优先领域内提出了多项行动，这些领域是国际发展社区采取全球性行动理由最充分的领域，也是国际发展社区的比较优势所在。

全球议程的必要性与重点

制定全球行动议程的动因有三。第一，要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就需要将更多的资源从富裕国家引导到发展中国家（如提高人类禀赋平等性问题，或解决全球女性死亡率过高根源的问题）。第二，行动的效率有时取决于创造公共品，如创造新的全球性信息或知识。第三，如果某项政策带有国际性影响，那么多国多机构间的相互协作可以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在各国国家层面上为行动提供动力与压力。

根据上述标准，全球行动议程所包含的行动可以划分为三类：

- 提供资金支持。改善洁净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的供给需要大量投资（例如降低发展中国家女孩和母亲死亡率过高问题就需要大量投资），而这样的投资往往是单个国家政府尤其是相对贫穷国家政府力不能及的。国际发展社区可以以协调的方式通过特定行动计划或者融资机制为那些愿意并且有能力开展这些改革的国家提

供资金支持，以保证改革效果的最大化和重复工作的最小化。

- 推动创新与学习。虽然我们对哪些做法对推动性别平等有用、哪些没用已经了解了很多，但是由于缺乏数据或没有针对“老大难”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我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比如，时间利用模式性别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儿童早教社会规范就是如此。发展机构可以从关注结果、过程以及背景的角度，通过实验和评估来推动创新与学习，还可以促进对成功经验的推广。

- 建立和利用有效的伙伴关系。正如第 8 章所示，成功的改革通常要求建立可以采取境内行动或跨境行动的联盟或伙伴关系。围绕着资金问题，国际发展社区的成员间可以组成伙伴关系；为了进行实验和学习，可以与学界和智库建立伙伴关系；还可以更广泛地与私有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在全球化加深的当今世界，这些合作支持各国获取必需的资源与信息，成功地推动性别平等。

显然，上述三类行动的相对重要性因国家而异。表 9.1 提供了全球行动拟定议程概览。该表列出了每个优先领域的倡议所需的来自国际发展社区的新的或者额外的行动支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一些需要重新得到关注的倡议（均已用对号标明）。例如，增加获取洁净水的机会需要新的投资，以及重新定义现有服务提供模式，以便更好地将对健康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其中的所有倡议均与第 7 章提出的倡议是一致和相辅相成的，并且满足上述全球行动的标准。当然，一些重要行动也正在未以对号标明的领域中进行，例如，围绕艾滋病预防措施提供模式的创新，或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伙伴关系。在这些未以对号标明的领域，工作重点在于维系现有努力与伙伴关系，并兑现承诺。

最后，本报告框架与分析为政策和项目设计提供了四项一般性原则，这四项原则有助于提高所有优先领域

表 9.1　全球行动议程一览表

优 先 领 域	所需要的新/额外行动支持	全球发展社区的行动方向		
		提供资金支持	推动创新和学习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
缩小人类禀赋的性别差异	增加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		√
	扩大清洁用水覆盖面	√	√	
	扩大孕产妇保健服务覆盖面	√	√	√
	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的支持	√		√
增加女性的经济机会	扩大托儿服务和儿童早期教育覆盖面	√	√	
	投资农村女性		√	√
缩小在话语权和能动性方面的性别差异	增加对女性获取的司法援助的机会		√	
	改变对女性使用暴力的社会规范		√	√
防止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投资青少年男女		√	
支持以实证为基础的公共行动	创造新信息	√		√
	推动知识分享与学习		√	

资料来源：《2012 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组。

和行动范围内全球行动的影响与效率。这几项原则如下：

- 把综合性别状况诊断分析作为政策制定与方案设计的基础。性别差异长期存在有多种原因：可能有某项制度或政策“补救措施”很难实现或容易受阻；也可能市场、正规制度和家庭等多方面限制因素相互叠加，共同阻碍性别平等的推进；还可能因为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或社会规范只能缓慢演变。有效的政策设计需要充分了解上述哪些情形是症结所在，制约因素是什么和制约因素制约了哪些环节。为了切实发挥效果，这种诊断必须深入探讨发生在家庭、市场和正规制度中的情况，它们之间怎样互动，以及它们如何受社会规范的影响。
- 针对决定因素还是针对结果。在选择与设计政策时，必须明确针对造成现存性别差异的市场和制度约束因素，而不是仅仅关注政策结果本身。这些约束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超出了政策结果的领域。
- “提升”和战略性主流化。鉴于性别差异往往是由多种相互强化的市场与制度制约因素造成的，因此行之有效的政策行动需要进行跨部门协调干预或连续干预。许多情况下，干预措施可以采用一般政策的形式，但在其设计和实施中纳入性别相关的问题从而使其变得“性别智能化”。因此，为了实现效果的最大化，有必要将性别问题从具体部门产品和项目提升到国家和部门计划。这将利于性别问题的战略主流化。
-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正如不同国家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不同一样，不同国家的市场和制度的性质、结构和功能也都不同，这导致了家庭和个体行动的差异。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环境中会产生差异很大的结果。正如第 8 章中的讨论所示，改革的道路有许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必须与改革的社会因素和政治经济相适应。只有得到广泛支持的行动（无论是全球行动还是国内行动）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过高层的政治意愿与领导力则是改革的发动机。

采取哪些行动及如何行动

优先领域一：缩小人类禀赋的性别差异

● 增加极度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现状

教育方面的性别问题越来越集中在极度弱势群体当中：

→ 在越南，近 30%的 15 岁以上少数民族女性从未上过学——这一比例是越南多数民族女性的四倍，少数民族男性的三倍。

→ 在印度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中，男孩平均上过 6 年学，而女孩平均只上过 1 年学。

→ 2008 年，在贝宁、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尔、多哥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女孩小学毕业率是男孩小学毕业率的 75%或更低。

→ 在莱索托，教育方面的性别差异恰恰相反。15 岁到 19 岁之间的女孩中，70%上完 7 年级，而男孩的这一比例只有 40%。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3 章）

- 全球在缩小教育性别差异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与此同时，在处于贫困和社会边缘的人群中或是在经济机会匮乏的国家中，教育质量低下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教育可以增加两性的经济机会和生产率，并增强他们的话语权和能动

性。旨在提高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环境的努力必须关注极度弱势群体，无论他们是男是女，以确保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他们不被甩在后面。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提供资金资源**。要让目前失学的女孩重返校园就需要持续维系已有的资金承诺。某些地区的失学女孩和在校女孩情况相似，这意味着供给端的行动可能可以提高她们的入学率与毕业率。供给方行动的第一步是建设学校，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保证充足的教师人数，建立受教育层次高于其授课水平的教师队伍十分重要。此外还应当投入资金支持改革，以加强治理、公信力和信息流，确保学校和教师最高效率地提高学习水平、留住学生。对于已实施供给方行动的地区，家庭收入低、教育回报率低则可能是造成儿童失学的可能原因，至于失学的儿童是男孩还是女孩取决于儿童的其他经济机会。全球多个国家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需求方的干预措施可以成功提高入学率。例如，有条件现金转移为家庭在艰难处境下不让孩子辍学提供了激励。
-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全民教育快车道行动——加上国际合作伙伴和民间团体——形成了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强有力的行动框架。为实现教育千年发展目标而调集外部资源的努力应当得到重视。尽管失学女孩的困境仍然是国际性的优先问题，但目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男孩的中等教育入学率反而持续下降，而由于缺乏国际行动来扭转这一趋势，势必形成重大风险。因为辍学与学业表现不佳往往会增加从事危险行为、犯罪、暴力、不安全性行为的可能性（参见下文第 4 个优先领域）。

● **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洁净水、卫生设施、垃圾处理以及传病媒介控制**

现状

→ 每年，5 岁以下儿童急性腹泻发病率高达 15 亿人次，造成 200 万儿童死亡。

→ 减少传染病发生率可降低儿童死亡率——特别是女孩死亡率。1900 年到 1930 年间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洁净水和卫生设施运动终结了当今富裕国家女性死亡率过高的历史。这一时期，美国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实际上完全归功于这些运动。

→ 让用户获得洁净水的影响最大，因为主要污染都发生在水从源头到用户的输送过程中：净化水源地的水样本污染率为 12%，这一比例在家庭储水中上升为 41%，而在人们杯中的饮用水中达到了 51%。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3 章）

- 个人的解决方法最多只能减少传染病。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传染病患者会传染他人——也由于个人难以认知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公共投资。
- 此类投资将使儿童，特别是女童受益。提供洁净水、卫生设施、传病媒介控制、垃圾处理服务曾经是大多数国家公共卫生一揽子计划的标准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 30 年间，它们在公共卫生预算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现在正是转变这种趋势的时候。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提供资金资源**。需要设定一个简单的目标：让每家每户都用上洁净水，为儿童创造清洁的成长环境。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实质性的资金投入以建设和维护系统。需要资金的不仅仅是改善基础设施，还要建立问责制度，用于确保服务的延续性与可持续

性。仅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洁净水的年估算成本就高达 110 亿美元。尽管从投资上看这是个大数目，但是与回报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20 世纪初，美国的洁净水的收益成本比为 23:1。

● **促进创新与学习**。两大领域亟需重视。第一，水污染方面的系统性信息很少，而卫生设施方面的系统性信息则更是少之又少。搜集与传播此类数据可以帮助全球社会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监测政策的影响。第二，制药领域用于实时反映家庭用水水质的技术创新可以带来明智的决定。比如，被污染的水往往看似洁净，但是有种药片可以使被污染水变色，即使已经开发了更好的供水系统，这种药片和氯丸等使用点简易办法配合使用便可以立即改善水质。

● 扩大孕产妇保健服务覆盖面

现状

→ 每 1 名瑞典女性死于分娩时，有 1 000 名阿富汗女性、815 名索马里女性、495 名尼日利亚女性、122 名巴基斯坦女性死于分娩。

→ 正如富裕国家的历史经验一样，低收入国家中的女性死亡率过高与产妇死亡率相关。在阿富汗，每 11 名女性中就有 1 名死于分娩，不仅如此，更多女性还面临着分娩可能导致的严重生理功能障碍，如瘘和贫血的困扰。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3 章）

● 降低产妇死亡率可以提高女孩的教育水平，因为当存活率提高后，家庭会加大对女孩的资源投入。

● 降低产妇死亡率也会降低产妇发病率，从而提高女性在生活中的生产率和健康水平。随着分娩引起的终身残疾发病率的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会提高。根据有数据可考的国家的数据，1920 年到 1950 年间各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可以归功于产妇发病率的降低。

● 降低产妇死亡率是可能的：如果各国用心解决这一问题，产妇死亡率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降下来。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产妇可以在运作良好的、职员与外科医生训练有素的和可以正常供应医疗用品的正规机构分娩，那么许多死亡都是可以避免的。医疗服务机构需要对当地社区负责——但重要的医疗服务机构却出现“行动缺位”。加大资金投入有助于建立专门的妇幼保健设施网络。这些设施还可在向准妈妈们提供产前服务方面发挥作用。[1]

● **促进创新和学习**。在许多国家，人们不了解产妇死亡率的相关信息，对产妇发病率知之更少。由于数据系统不健全伴随着公共健康状况不佳问题，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投资建立更好的生命数据收录系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一步。新技术带来了新机会。例如，随着移动通信设备用户的增加，用户能够从世界各个角落向开放式的全球中央数据库报告产妇死亡病例。这些数据可以启动 “产妇审计”，使所有产妇死亡病例都能被记载与公布。关注每例死亡病例是土尔其和洪都拉斯等国降低产妇死亡率运动成功的关键。

●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对产妇死亡率的再度重视促使了一项双边、多边机构与私人基金之间的伙伴关系——“发展大挑战”。该伙伴关系是监督与建立公信度和知识共享的关键。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还包括南南知识交流计划，让那些短期间内产妇死亡率急剧降低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土耳其、洪都拉

斯等参与全球性平台分享成功经验。

● **加强对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支持**

现状

→ 1990 年到 2008 年间，在艾滋病盛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60 岁以下女性的超额死亡率增长了近 10倍。

→ 1980 年到 2008 年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的成人死亡率增长了 5 倍，接近卢旺达和柬埔寨种族灭绝大屠杀期间的死亡率。

→ 全球的巨大努力使治疗的效果和普及度得到改善。全世界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得到拯救。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3 章）

● 艾滋病的盛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造成的危害尤为严重。治疗的普及拯救了世界上许多感染艾滋病的生命。但是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提供资金支持。**加大资金投入、维持现有努力可以使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与支持到 2015 年时惠及所有人口。一项新的战略投资框架显示，到 2015 年投资规模需要从目前每年 160 亿美元提高到 220 亿美元。2015 年后，随着服务覆盖率达到目标水平，规模化效率的实现和新增感染病例数的下降，这项事业所需的资金将会开始减少。

●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目前通过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和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建立的伙伴关系就是国际协作的光辉典范，需要保持与推广。[2]

优先领域二：改善女性就业机会

● **增加托儿服务和普及儿童早期教育计划**

现状

→ 子女不及 6 岁的已婚女性每天将 14%~42%的闲暇时间用于照顾子女，而已婚男性的相应比例只有 1%~20%。

→ 由于成本过高、供给不足或二者兼有的原因，在有数据可考的 113 个国家中有 62 个国家的正规和非正规托儿服务的普及程度都相对有限或非常有限。而在大多数儿童照料较为普及的国家里，这种服务通常都是其他家族成员提供的非正规照料。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5 章）

● 在照顾家人（与家务）责任方面的性别差异意味着女性面临巨大的市场劳动引起的固定成本。她们也可能更看重灵活的工作安排，每天工作的时间也可能短于男性，而这样做的潜在风险是她们可能被安排从事质量较低、收入较低的工作。

● 能否获得（受补贴的）托儿服务意味着能否增加市场工作时间，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与能否取得正式工作相关。当无法获取托儿服务时，情况就会背道而驰。例如，在博茨瓦纳、危地马拉、墨西哥、越南等国，由于托儿服务缺乏，母亲们不得不到非正规领域就业。

● （受补贴的）托儿服务可以为实施少儿智力开发与营养方面的干预措施提供有效的平台，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家庭的环境下。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提供资金支持。**向目前无法接受优质托儿服务或依赖于非正式托儿方式的人群提供高质量的托儿服务需要进行额外投资——这通常是一些政府感兴趣但又力所不能及的投资。当成本而非供给是托儿服务的主要限制时，这笔资金可以直接用于提供服务或补贴现有服务。

● **推动创新与学习。**尽管大部分

成功的托儿服务提供模式都在城市（往往是中等收入）环境下得到了检验与评价；但是人们对什么模式适用于农村地区或者流动人口却了解甚少。国际发展社区可以支持这一领域的实验，将重点放在满足贫困人口需要的服务提供模式，因为贫困人口最可能采用非正规的托儿方式，这无论是对于儿童还是对于提供服务的人来说——通常他们的姐姐——都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还应当注意利用提供托儿服务的机会创造本地就业的可能性，不过必须确保从业者受过充分培训。成功的经验可以通过资金渠道推广普及。

● **投资农村女性**

现状

→ 女性占农村劳动力的 43%。

→ 在有数据可考的发展中国家中，仅有 10%~20%的土地所有者是女性，而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女性主导的家庭农场规模也相对较小。女性农民和农村企业家，特别是经营小型企业的女性，不能和男性一样得到（正规）贷款。

→ 女性农民并不比男性农民逊色，但是女性农民取得生产投入与技术的机会较少，这意味着女性农民的平均农业生产率比男性低 20%~30%。

→ 女性的手机拥有率比男性低 21%；这一比例在非洲是 23%，中东是 24%，南亚是 37%。发展中世界的人口中，近 500 万女性只能通过借用的方式使用手机。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5 章和第 6 章）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男性农民平均获取的生产性资源机会，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值提高 2.5 到 4 个百分点。
- 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可以减少获取信息所需的体力劳动或行程，降低现金转移支付成本，提高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能力，从而减少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所面临的时间与流动性约束。玻利维亚、埃及、印度、肯尼亚几国超过 40%的女性称，拥有手机增加了她们的就业机会与收入，这对女性企业家的影响尤其大。
- 将资金交给农村女性可以提高她们在家庭内外的权力，同时也可使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受益。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推动创新与学习**。极少有金融机构提供针对女性农民与女性企业家的产品。扩展服务与农民田间学校的覆盖率仍然很低，而且它们提供的信息与资源也并不总与女性农民密切相关。手机可以成为向农民提供信息与服务的有效平台，但手机使用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导致女性受益较为有限。国际发展社区可以支持三大领域的实验：正规信贷可得性、农业技术与知识可得性、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手机的可得性。其核心是要对能够有效适应当地女性需求的新业务与服务提供模式进行检验与评估。
-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国际发展社区可以与私人部门合作以确保农村女性服务创新的顺利增长；也可以与科研机构、民间团体与智库合作，充分评估这些模式的影响。

优先领域三：缩小话语权与能动性方面的性别差异

● **改善对女性的司法救助**

现状

→ 187 个国家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公约》，但女性的权利并未因此而有效实现，因为目前女性可用于要求保障权利和纠正歧视的

机制比较有限。

→ 在许多情况下，缺乏权利意识、直接成本过高、流动性约束等都会阻碍女性积极要求履行权利。

→ 在不同地区的 9 个国家中，仅有 10%的女性在身体遭受虐待后选择了上报或寻求服务支持。

→ 在印度尼西亚，离婚的平均成本为 220 美元，相当于贫困女性月收入的 10 倍。收费减免提高了女性对离婚的选择性。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4 章）

- 有效权利对女性很重要。改善女孩的法律地位可以提高女孩的价值，从而引发其他变化：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可能增加，女性结婚年龄可能推迟，子女生育年龄可能推迟。增强女性对收入和资产控制力的法律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而允许或使离婚更加容易的法律则可以提高女性的选择能力。
- 为了保障法律的效果，需要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并使女性更容易获取司法援助。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促进创新与学习**。要让女性更容易获取司法援助，就需要收集与发布获取和使用性别分类数据的信息；增加女性代表在法律制定、实施与执行等部门中的席位；提高对司法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认识，以便提高司法系统对女性需求的敏感度。国际发展社区可以在以下三个领域内支持创新措施的实施与评价以及有前景的现有行动的评价。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该将重点放在技术、特别是移动电话技术在促进数据和其他信息的传播及改善法律机构公信力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 转变有关家庭暴力的社会规范

现状

→ 全球的家庭暴力统计数据令人震惊：

- 在有或有过伴侣的女性中，每 10 人中就至少有 1 人曾遭到过来自亲密伴侣或生活中相识者的身体侵犯与性侵犯。
- 波兰的家庭暴力发生率看起来不高，仅有 3%，但这也意味着每天有 1 465 名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折磨。
- 15 岁至 49 岁的埃塞俄比亚女性中，1 400 万或 81%的女性认为因与丈夫产生分歧或烧糊食物或拒绝发生性关系而受到丈夫毒打是合理的。

→ 各国家庭暴力的普遍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别，与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但在性别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里，针对女性的暴力发生率更高。

→ 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可以降低人们对于暴力的认可程度，从而对女性起到保护作用。哥伦比亚、印度、南非与乌干达的暴力发生率较低，这与这几国的女性资产所有权有关。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4 章）

- 暴力与自由是对立的，暴力是一种极端的胁迫手段，它从定义上就是对能动性的否定。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或相识者暴力的风险远远大于遭受来自其他人暴力的风险。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亲密伴侣杀害、伤害，或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
- 暴力威胁可以影响到女性自由选择、发挥才能、抓住机遇的能力。
- 家庭暴力还影响到长期健康状况，对受虐女性子女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以及造成对暴力的认可态度的代际继承。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促进创新与学习**。国际发展社

区可以通过三种不同方式支持创新与学习。第一，国际发展社区可以对现有行动进行严格评估、以及投资改善现有数据质量。第二，国际发展社区可以帮助推广那些行之有效的创新方案。第三，国际发展社区可以帮助检验旨在改变与女性暴力相关的社会规范的新方法。两类计划在检验新方法上具有前景：（针对夫妻的）教育与意识提升运动，以及提高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的干预措施。这两类计划都需要较广的关注面，以解释一些更高层次的决定因素，如创造收入、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方面的社会规范，结婚、离婚和子女抚养权方面的法律框架。最后，缩短服务提供方（包括警察与司法机构、卫生与社会服务机构）与女性之间的距离以消除女性的时间与流动性限制，不仅可以帮助受害者，同时也有助于转变社会规范。除此之外，在众多事务中，实验的重点可以放在让女性更容易获取助理律师以及流动法律援助的服务方面，以便女性充分利用司法系统。

-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国际发展社区应当继续支持联合国制止侵害女性暴力行为的信托基金等行动。该行动向致力于防范侵害女性暴力行为的草根组织——包括那些偏远地区或边缘人群中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优先领域四：防止性别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 投资青少年男女

现状

→ 青少年男女的辍学人数与小学学龄儿童的辍学人数相近（前者为 7 000 万，后者为 6 900 万）；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却很有限。他们当中一部分没有小学毕业，大多数是中学的辍学生。少女怀孕、冒险行为以及谋生需要（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市场劳动），是造成大部分学生辍学的原因。

→ 每年约有 1 600 万 15~19 岁之间的少女成为母亲，其中 95%的新生儿都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新生儿占全球出生人数的 11%。

→ 年轻男性是暴力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与受害者。1982 年到 1990 年间，南非因谋杀丧生的人数占 16 岁到 30 岁间男性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谋杀成为这一年龄群体死亡的头号元凶。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3、4、5 章）

- 最棘手的性别结果是性别不平等的模式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复制和传递，从这点来看青少年阶段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性别规范与性别角色的约束力开始加强，高风险的社会行为与性行为发生率开始增加。此外，现有制度对青少年关注不足，无论是卫生系统还是劳动力市场他们都无法获取足够的服务，他们所控制的资产十分有限，融入网络的机会也较少。
- 在教育与技能愈发重要的当今世界，让青少年男女留在学校（远离麻烦）并且帮助他们顺利过渡到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对于改善性别结果还是对提高经济效率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推动创新与学习**。融入由具有相同价值观与理想的同龄人组成的网络，让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将有助于青少年男女的成长。国际发展社区可以资助为青少年创造“安全空间”——通过建立目标和预期相同的青年网络——和树立模范的实验。帮助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克服信息限制和初入市场的劳动者所面临的特殊限制的干预措施也对他们有利。

在这方面，为青年人制定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的实验，包括就业安置与学徒计划、工资补贴和培训等，具有非常不错的前景；第二次机会计划也能发挥这种作用。这三大领域的创新性办法已经得到了试行，其中的一些办法在青少年女孩倡议中得到了评价，并且可以被推广并适应不同的环境。

优先领域五：支持以实证为基础的公共行动

● **创造新信息**

现状

→ 65 项调查中，仅有 8 项（包括全国性家庭及劳动力调查和农村专项调查）涉及个人土地所有权信息；有关消费和生产性耐用品、牲畜及其他资产的所有权信息更为有限（大多数情况下，65 项调查中仅有 1 项包含这些信息）。有关家庭内部决策的信息也极少，只有专项调查（如人口与健康状况调查）才会问及上述问题，而且通常只询问女性。

→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关于出生、婚姻、离婚、死亡（及死因）和其他重大生命事件的统计数据的覆盖面与可靠性仍然是一大挑战。财产登记包括土地登记和不动产登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推进两性平等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性别数据的可得性。
- 社会状况和贫困发生率方面的性别分析往往依赖于对男性主导家庭和女性主导家庭的对比研究。但是，根据家庭主导成员差异衡量的性别差异建立在一条基本假设之上，即：家庭是无差别的单位，资源在家庭内部成员间平均分配，且家庭内部不存在不平等现象——而这条假设与事实依据恰恰相反。
- 对于家庭内部的情况，乐观地说是了解不足，悲观地说是毫无了解。然而，这种知识却是认识与解决本报告所明确指出的许多性别差异的关键。家庭中资源由谁控制、由谁把控，决策由谁做出，决策过程如何考虑或反映不同家庭成员的观点和利益，哪些因素影响家庭选择，这些信息有助于了解某些差异背后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并且为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知识。
- 生命事件与财产的准确记录是确保现有法律得到充分执行和填补重大知识缺口（如死亡原因）的核心。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提供资金支持。**国际发展社区可以为改善现有的调查及国家信息系统提供资金支持。创新调查模块，将资产（所有权、使用权、积累途径及等级情况（当与调查相关时））、家族企业（所有权与决策能力、雇佣家族成员情况）、时间利用状况和个人消费状况纳入其中。生活水平衡量研究、人口和健康调查，以及其他跨国调查平台可以作为明确的切入点。同时通过简化行政和登记流程、实现数据库管理信息化，以加大数据覆盖面和提高现有数据准确性，从而强化国家信息系统的工作也需要资金支持。还应当注重将性别数据搜集方面的一次性行动转变为持续性行动，从而为纵向趋势分析提供机会，并克服缺乏可靠与高质量信息的障碍。
- **建立和利用伙伴关系。**联合国妇女署是致力于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的联合国组织，它可以在此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国际发展社区应当继续支持这些领域中的现有行动，如世界银行统计能力建设计划，并协助建设高效的伙伴关系，推动信息、知识与经验的共享。

● **促进知识分享与学习**

现状

→ 关于低收入国家的研究比较有限，相关知识获取比较困难。

→ 对 1985 年到 2004 年全球 202 份顶级经济学期刊进行调查后发现，关于阿富汗的论文共发表 7 篇，关于乍得的论文共发表 1 篇，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论文共发表 2 篇，关于厄立特里亚的论文共发表 4 篇。而且这些论文的主题十分分散。

→ 搜集性别信息、拣选高质量工作、和获取行之有效的本地行动的相关信息等工作尚无系统化的方法可循。

为什么应当得到重视？简要回顾（第 7 章）

● 信息与知识是充分分析现有问题、明确相关约束条件、设计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的关键。

● 由于工作在方案设计与实施前沿的企业和组织不具备将知识“上传”到全球链条上的系统手段，导致每年有大量的知识遗失。

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促进创新与学习**。目前尚未建立性别问题的全球知识储备库。全球知识储备库可以作为性别问题的知识与信息来源，但这还不够。新的技术发展可以创造更为民主与开放的数据系统，使我们能够学习世界上最优秀的范例。这种全球知识储备库的一部分工作是将现有的性别信息从报告、研究与计划评价中系统地提取出来。这种有索引、可搜索的数据库将成为利益相关者和个人获取更多性别问题相关信息的“一站式商店”。用户反馈与评论将创造出一个互动平台，筛选出高质量的知识并指出全球在知识上的缺失之处。

全球知识储备库的第二个作用是运用新技术在公开的信息提交系统中使性别问题的相关知识民主化。即使在非常小的范围内，仍然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让有关新行动的信息实现“群体提供”，这与 Ushahidi（斯瓦希里语：目击者）系统十分相似——该系统允许用户群体通过手机提供有关危机的信息。允许前沿的工作者提供性别行动的信息与反馈可以增加性别行动的全球知识与认知，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反馈到国际社会，影响它对哪些做法有效而哪些做法无效的认识。全球知识储备库可以利用现有行动，如世界银行数据开放行动，但是它的建立与维护仍需要资金保障。

注释

1. 国际卫生系统金融创新高级特别工作组 2009。该特别工作组的技术工作 1 组认为，加强卫生系统是降低产妇死亡率的关键。其成本分析结论表明，为到 2015 年实现卫生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每年需要额外增加 360 亿~450 亿美元的成本。

2. Schwartländer 等。

参考文献

High Level Taskforce on 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Financing for Health Systems. 2009. “Constraints to Scaling Up and Costs.”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tnership, Working Group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Schwartländer, Bernhard, John Stover, Timothy Hallett, Rifat Atun, Carlos Avila, Eleanor Gouws, Michael Bartos, Peter D. Ghys, Marjorie Opuni, David Barr, Ramzi Alsallaq, Lori Bollinger, Marcelo de Freitas, Geoffrey Garnett, Charles Holmes, Ken Legins, Yogan Pillay, Anderson Eduardo Stanciole, Craig McClure, Gottfried Hirnschall, Marie Laga, and Nancy Pedian. 2011. “Towards an Improved Investment Approach for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HIV/AIDS.” *Lancet* 377 (9782): 2031–41.

文献注释

本报告广泛参考了世界银行自己的文件以及许多外部资料来源。背景文件和注释由以下人员提供：Ernesto Aguayo-Téllez，Richard Akresh，Stefania Albanesi，Rabia Ali，Diego Amador，Brindusa Anghel，Mina Baliamoune，Oriana Bandiera，Sushenjit Bandyopadhyay，Gary Barker，Kathleen Beegle，Julia A. Behrman，Cory Belden，Raquel Bernal，María Inés Berniell，Eric Bettinger，Mariano Bosch，Lynn Brown，Maurizio Bussolo，Andrew Byrnes，Laura Chioda，Rea Chiongson，Joy Clancy，Manuel Contreras，Maria Correia，Rita Costa，Andre Croppenstedt，David Cuberes，Jishnu Das，Nancy Daza，Alan de Brauw，Sara de la Rica，Damien de Walque，Stefan Dercon，Deval Desai，Quy-Toan Do，Juan J. Dolado，Cheryl Doss，Lídia Farré，Luca Flabbi，Deanna Ford，Marsha Freeman，Samuel Freije，Kate Frieson，John Giles，Markus Goldstein，Margaret E. Greene，Nezih Guner，Brian Heilman，Lori Heise，Karla Hoff，Naomi Therese Hossain，Alejandro Hoyos，Mala Htun，Jikun Huang，Gulnara Ibraeva，Vegard Iversen，Joyce Jacobsen，Riva Kantowitz，Harounan Kazianga，Gunnar Köhlin，Michael Kremer，Maurice Kugler，Neha Kumar，Gunnar Larson，Kenneth L. Leonard，Andrei Levchenko，Mattias Lundberg，William F. Maloney，Ghazala Mansuri，Teresa Marchiori，Margaret N. Matinga，Amy Mazur，Dorothy McBride，Keiko Mizuno，Anara Moldosheva，Urvashi Narain，Ambar Narayan，Ashwini Natraj，Anara Niyazova，Anita Nyberg，Hugo Ñopo，Keiichi Ogawa，Sheila Oparaocha，Mari Osawa，Caglar Ozden，Robert Palacios，Rohini Pande，Subhrendu K. Pattanayak，Piotr Pawlak，Eija Pehu，Ximena Peña，David Peters，Josefina Posadas，Agnes Quisumbing，Claudio Raddatz，Johanna Ramos，Nitya Rao，Michelle Rendall，Bob Rijkers，Omar Robles，Nina Rosas，Scott Rozelle，Mihoko Sakai，Virginia Sánchez Marcos，Carolina Sánchez-Páramo，Saskia Sassen，Mine Sato，Manisha Shah，Erin O. Sills，Emmanuel Skoufias，Marc-François Smitz，Nana Sumbadze，Marc Teignier-Baqué，Inge Tevden，Zafi ris Tzannatos，Tanu Priya Uteng，Limin Wang，Laurel Weldon，Henrik Wiig，Christopher Wilfong，Tanja Winther，Firman Witoelar Kartaadipoetra，Michael Woolcock，Kohei Yoshida，Takako Yuki 和 Linxiu Zhang。

本报告背景文件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网址为：http：//www. worldbank. org/wdr 2012，也可以从《世界发展报告》办公室索取。背景文件中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世界银行或本报告的观点。

“在世界范围内为界定 21 世纪性别而进行的与男女两性的谈话：对性别和经济选择的一项多国定性研究”的各国国家工作组的领导者分别为 Chona

Echavez 和 Pierre Fallavier（阿富汗）；Ugyen Lhamo（不丹）；Jean-François Kobiané（布基纳法索）；Magaly Pineda 和 Sergia Galvan（多米尼加共和国）；Priya Chattier（斐济）；Sanjeev Sasmal（印度）；Rizki Fillaili（印度尼西亚）；Gwendolyn Heaner（利比亚）；Dumitru Slonovschi（马尔代夫）；Patricia Zúrate（秘鲁）；Samia M. Al-Botmeh（西岸和加沙地带）；Marjorie Andrew 和 Almah Tararia（巴布亚新几内亚）；Greta Gober（波兰）；Hana Baronijan 和 Sasa Jovancevic（塞尔维亚）；Imraan Valodia 和 Kruschen Govender（南非）；Mohamed Braima（北苏丹）；Adalbertus Kamanzi（坦桑尼亚）；Hhuat Tha Hong（越南）；和 Ramzia Aleryani，Sabria Al-Thwar 和 Mai Abdulmalik（也门共和国）。Paula Barros 和 Rudy Herrera Marmol 以及由 Jane Henrici 和 Allison Helmuth 领导的女性政策研究所协助进行分析。Amanda Lubold 和 Charles Ragin 对定性比较分析作出了贡献。

世界银行内外许多人士向撰写团队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些有价值的意见、指导和贡献由以下人员提供：James Adams，Theodore Ahlers，Nilufar Ahmad，Ahmad Ahsan，Shamshad Akhtar，Aysegul Akin-Karasapan，Harold Alderman，Inger Andersen，Caroline Anstey，Tamar Manuelyan Atinc，Julie Babinard，Reena Badiani，Shaida Badiee，Cristian Baeza，Svetlana Bagaudinova，Radu Ban，Elena Bardasi，Julie Barmeier，Antonella Bassani，Kathleen Beegle，Isabel Beltran，Rui Benfi ca，Bhuvan Bhatnagar，Nina Bhatt，Benu Bidani，Christina Biebesheimer，Dan Biller，Regina Birner，Gustavo Bobonis，Vica Rosario Bogaerts，Eduard Bos，Maya Brahman，Milan Brahmbhatt，Mathieu Brossard，Judith Bruce，Helle Buchhave，Eduardo Bustillo，Mark Cackler，Shubha Chakravarty，Nadereh Chamlou，Meera Chatterjee，Laura Chioda，Yoonyoung Cho，Sadia Chowdhury，Luc Christiaensen，Shelley Clark，Rui Coutinho，Pamela Cox，Jose Cuesta Leiva，Facundo Cuevas，Maitreyi Das，Monica Das Gupta，Marieme Esther Dassanou，Ximena del Carpio，Gustavo Demarco，Asli Demirguc-Kunt，Jacqueline Devine，Quy-Toan Do，Doerte Doemeland，Jane Doogan，Nora Dudwick，Rosamund Ebdon，Adriana Eftimie，Cho Eiichiro，Koffi Ekouevi，Mary Ellsberg，Kene Ezemanari，Shahrokh Fardoust，Juan Feng，Patricia Fernandes，Deon Filmer，Nancy Folbre，Vivien Foster，Samuel Freije-Rodriguez，Caroline Freund，Jed Friedman，Elisa Gamberoni，John Garrison，Roberta Gatti，Varun Gauri，Hope Gerochi，Sudeshna Ghosh Banerjee，Marcelo Giugale，Anne-Marie Goetz，Pablo Gottret，Duncan Greene，Caren Grown，Rebekka E. Grun，Hans Jurgen Gruss，Kelly Hallman，Trina S. Haque，Lori Heise，Katherine Heller，Cesar Hidalgo，Karla Hoff，Vivian Hon，Fabrice Houdart，Alejandro Hoyos，Mala Htun，Elisabeth Huybens，Vegard Iversen，Diane Jacovella，Willem Janssen，Emmanuel Jimenez，Johannes Jutting，Abdalwahab Khatib，Stuti Khemani，Florian Kitt，Leora Klapper，Stephan Klasen，Renate Kloppinger-Todd，Jeni Klugman，Kalpana Kochhar，Florence Kondylis，Kees Kostermans，Apichoke Kotikula，Nandini Krishnan，Stephanie Kutner，Rachel Kyte，Somik Lall，Pete Lanjouw，Gunar Larson，Philippe H. Le Houerou，Marcus Lee，Xavier Legrain，Anne-Marie Leroy，Maureen Lewis，Audrey Liounis，Vanessa Almeida Lopes，Gladys Lopez-Acevedo，Thomas Losse-Muller，Inessa Love，Laszlo

Lovei, John Mackedon, Megumi Makisaka, Hazel Jean Malapit, Alexandre Marc, Michel Matera, Robin Mearns, Samia Melhm, Taye Mengistae, Nicholas Menzies, E. Richard Mills, Maxine Molyneaux, Andrew Morrison, Janine Moussa, Masud Mozammel, Mamta Murthi, Raj Nallari, Kumari Navaratne, Reema Nayar, Vikram Nehru, David Newhouse, Trang Nguyen, Carmen Niethammer, Akihiko Nishio, Sina Odugbemi, Waafas Ofosu-Amaah, Maria Beatriz Orlando, Julie Oyegun, Juan Caglar Ozden, Berk Ozler, Vincent Palmade, Kiran Pandey, Sheoli Pargal, Carlos Parra Osorio, Katherine Patrick, Eija Pehu, Josefi na Posadas, Carlos Felipe Prada, Giovanna Prennushi, Lant Pritchett, Monika Queisser, Agnes Quisumbing, Mohammad Zia M. Qureshi, Ismail Radwan, Martin Rama, Rita Ramalho, Aruna Rao, Biju Rao, Martin Ravallion, Hilde Refstie, Ritva Reinikka, Jose Guilherme Reis, Doug Rendall, David Rosenblatt, Jaime Saavedra, Sebastián Sáez, Amparita Santamaria, Cristina Santos, Paromita Sanyal, Jeea Saraswati, Sarosh Sattar, Claudia Sepulveda, Carlos Silva-Jauregui, Sevi Simavi, Nistha Sinha, Ines Smyth, Sari Söderström, Jennifer Solotaroff, Cornelia Staritz, Mattea Stein, Zoe Stephenson, Paula Suarez, Sonia Sultan, Kazushige Taniguchi, Marcela Tarazona, David Theis, Harsha Thirumurthy, Keiichi Tsunekawa, Zafi ris Tzannatos, Caroline van den Berg, Anna van der Wouden, Dominique Van De Walle, Linda Van Gelder, Axel van Trotsenburg, Marilou Uy, Paolo Verne, Joachim von Amsberg, Wendy Wakeman, Jan Walliser, Jill Watkins, Monica Weber-Fahr, Laurel Weldon, Debbie Wetzel, Alys Willman, Michael Woolcock, Tevfik Yaprak, Zouera Youssoufou 和 Hassan Zaman。

我们也从在本报告撰写过程中参与磋商会和研讨会的许多人士那里受益匪浅。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组织这些活动的人士，他们是：来自德国国际继续教育与发展协会—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 Ansohn Albrecht 和 Sebastian Herold，来自财政研究所的 Orazio Attanassio，来自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妇女委员会的 Belkys Mone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研究所的 Sylvia Chant，北美航空航天司令部的 Hege Sorreime 和 Per Bastoe，来自英国国际发展组织的 Liz Fabjer 和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Caren Grown。我们也希望向世界银行驻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联合国—纽约和越南办公室工作人员就举行磋商会而给予我们的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数据发展组的 Johan Mistiaen，Masako Hiraga 和 Sulekha Patel 与 Camilo José Pecha Garzón 和 Melissa Rodriguez 一起录入数据并协调数据。具体的数据录入工作由性别法律图书馆工作组的 Nayda Almodovar Reteguis，Yasmin Klaudia Bin Humam，Sarah Iqbal，Thibault Meilland，Rita Ramalho 和 Paula Tavare 提供。本报告地图由 Jeffrey Lecksell 准备。其他数据来自女性政策研究所和财政经济研究所（SWMENA 数据库）、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盖洛普调查。

尽管我们力图提供一份完整的感谢名单，但是也许会不慎遗漏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士。本报告工作组向任何由于疏忽而被遗漏的人士致歉并再次向所有对本报告有过贡献的人士表示感谢。

背景文件和注释

Aguayo-Téllez, Ernesto. 2011.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and FDI on Gender Inequ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kresh, Richard, Damien de Walque, and Harounan Kazianga. 2011. "Gender and Conditionality: Cash Transfers and Children's Schooling."

Albanesi, Stefania. 2011. "Maternal Health and Fertili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li, Rabia, Jishnu Das, Damien de Walque, Kenneth L. Leonard, Mattias Lundberg, and David Peters. 2011. "Patterns of Health Care Interactions in Seve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mador, Diego, Raquel Bernal, and Ximena Peña. 2011. "The Rise in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Colombia: Children, Education of Marital Status?"

Anghel, Brindusa, Sara de la Rica, and Juan J. Dolado. 2011. "The Effect of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on Women's Labor Market Outcom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Baliamoune, Mina. 2011. "The Making of Gender Equality in Tuni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Bandiera, Oriana and Ashwini Natraj. 2011. "Does Gender Inequality Hinder Growth? The Evidenc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Bandyopadhyay, Sushenjit, Urvashi Narain, and Limin Wang. 2011.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sparities."

Beegle, Kathleen, Markus Goldstein, and Nina Rosas. 2011. "A Review of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Assets."

Belden, Cory, Lynn Brown, Gunnar Larson, and Eija Pehu. 2011. "Gende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WDR 2012.

Berniell, María Inés, and Carolina Sánchez-Páramo. 2011. "Closing the Access Gap: Recent Advance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 2011. "Overview of Time Use Data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Time Use Patterns."

Bosch, Mariano, and William Maloney. 2011. "Sectoral Choice and Family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in Ghana, Mexico, Serbia, and Thailand."

Byrnes, Andrew, and Marsha Freeman. 2011. "The Impact of the CEDAW Convention: Paths to Equality."

Chioda, Laura. 2011. "Key Factors Explaining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ynamics."

Chiongson, Rea Abada, Deval Desai, Teresa Marchiori, and Michael Woolcock. 2011. "Role of Law and Justice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Clancy Joy, Tanja Winther, Margaret N. Matinga, and Sheila Oparaocha. 2011. "Gender Equity in Access to and Benefits from Modern Energy and Improved Energy Technologies." ETC/ENERGIA in association with Nord/Sør-konsulentene.

Costa, Rita, and Bob Rijkers. 2011. "Gender and Rural Non-Farm Entrepreneurship."

Croppenstedt, Andre, Markus Goldstein, and Nina Rosas. 2011. "Gender and Agriculture: Inefficiencies, Segregation and Low Productivity Traps."

C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Baqué. 2011.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de Brauw, Alan, Jikun Huang, Linxiu Zhang, and Scott Rozelle. 2011. "The 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 Walque, Damien, and Deon Filmer. 2011. "Trends and Socio-economic Gradients in Adult Mortality around the Developing World."

Dercon, Stefan. 2011. "Young Lives: Are The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Outcomes?"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port and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Do, Quy-Toan, Andrei Levchenko, and Claudio Raddatz. 2011. "Engendering Trade."
Doss, Cheryl. 2011.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port and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Farré, Lídia. 2011. "The Role of Men for Gender Equality."
Flabbi, Luca.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Career Choic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on a Sample of OECD Countrie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Freije, Samuel, and Maurizio Bussolo. 2011. "Gender, Crisis and Trade Openness in Dominican Republic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rieson, Kate. 2011. "Cambodia Case Study: Evolution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Giles, John, and Firman Witoelar Kartaadipoetra. 2011. "Indonesia: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Greene, Margaret E., Omar Robles, and Piotr Pawlak. 2011. "Masculinities,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Guner, Nezih, Ezgi Kaya, and Virginia Sánchez-Marcos. 2011. "Spain Country Case Study."
Heise, Lori. 2011.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 Ecological Approach."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port and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Hoff, Karla and Ghazala Mansuri. 2011. "Gender Inequality beyond the Law: Caus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Hossain, Naomi Therese. 2011. "Exports, Equity, and Empowerment: The Effects of Readymade Garment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Gender Equality in Bangladesh."
Hoyos, Alejandro, and Ambar Narayan. 2011. "Inequalities of Opportunities among Children: How Much Does Gender Matter?"
Htun, Mala, and Laurel Weldon. 2011. "Sex Equality in Family Law: Historical Legacies, Feminist Activism, and Religious Power in 70 Countries."
Ibraeva, Gulnara, Anara Moldosheva, and Anara Niyazova. 2011. "Kyrgyz Country Case Study."
Iversen, Vegard, and Nitya Rao. 2011. "India Country Case Study."
Jacobsen, Joyce. 2011.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Increasing Gender Equity with a Focus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Kantowitz, Riva. 2011. "Domestic Violence and Links to Other Forms of Violence."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Köhlin, Gunnar, Subhrendu K. Pattanayak, Erin O. Sills, and Christopher Wilfong. 2011. "Energy, Gender and Development: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Interventions and Future Opti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 Energy Strategy and for the WDR 2012.
Kugler, Maurice, Eric Bettinger, and Michael Kremer.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and Returns to Education."
McBride, Dorothy, and Amy Mazur. 2011. "Gender Machineries Worldwide."
Ñopo, Hugo, Nancy Daza, and Johanna Ramos. 2011. "Gender Earnings Gaps in the World."
Nyberg, Anita. 2011. "Sweden Country Case Study."
Osawa, Mari. 2011. "Gender-Equalit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Japan's Society and Economy Under Globalization."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Ozden, Caglar. 2011. "Migration: An International Overview of Migrant Stocks and Flows."
Pande, Rohini, and Deanna Ford. 2011. "Gender Quotas and Female Leadership."
Posadas, Josefina, and Marc Smitz. 2011. "Work Decisions for Men and Women: A Household Approach for Indonesia and Peru."
Quisumbing, Agnes, Neha Kumar, and Julia Behrman. 2011. "Do Shocks Affect Men's and Women's Assets Differentl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New Evidence for Bangladesh and Uganda."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World Ban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Rendall, Michelle. 2011. "Technic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It Decreased Gender Inequality?"
Sassen, Saskia. 2011.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ender."
Sato, Mine. 2011.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by Facilitating Women's Collective Problem-Solving Capacity Development: Japanese Experience with the Post-War Life Improvement Progra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ontemporary Developing Countries."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Skoufias, Emmanuel. 2011. "Gender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Smitz, François. 2011. "Input paper—Diversification of Activities by the Household."
Sumbadze, Nana. 2011. "Georgia Country Case Study."
Tevden, Inge. 2011. "Mozambique Country Case Study."
Tzannatos, Zafiris. 2011. "Dissecting the Increase in Female Relative to Male Pay Over Time: A Reduction in Discrimination or a Race to the Bottom?"
Uteng, Tanu Priya. 2011. "Gender and Mobi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Bank, Soci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011.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on Gender-Differentiated Access to Pension and other Insurance Mechanisms."
Wiig, Henrik. 2011. "Gender Experiments in Peru."
Yoshida, Kohei. 2011. "Gender Percep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indings from JICA-RI Value Surveys."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Yuki, Takako, Keiko Mizuno, Keiichi Ogawa, and Mihoko Sakai. 2011. "Promoting Gender Parity Lessons from Yemen: A JICA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 in Basic Education."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DR 2012.

部分指标

表 A1　教育参与率
表 A2　健康
表 A3　以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计算的就业率

部分世界发展指标

引言
按区域和收入划分的经济体，2012 财政年度
表 1　主要发展指标
表 2　贫困
表 3　千年发展指标：消除贫困、改善生活
表 4　经济活动
表 5　贸易、援助和金融
表 6　其他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
技术注释

表 A1 教育参与率

	相关年龄组总入学率/%											
	小学				中学				高等教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阿富汗	37	123	20	83	21	58	11	28	*3*	6	*1*	1
阿尔巴尼亚	101	121	103	117	92	72	85	73	7	..	7	..
阿尔及利亚	103	111	88	104	67	96	53	97	..	25	..	36
安哥拉	79	*141*	72	*114*	..	..	..	..	*1*	..	*0*	..
阿根廷	..	*117*	..	*116*	..	*80*	..	*91*	..	*55*	..	*84*
亚美尼亚	..	97	..	100	..	92	..	94	..	44	..	57
澳大利亚	107	107	107	106	*132*	135	*132*	130	35	71	42	94
奥地利	101	99	101	98	106	103	97	98	37	54	32	64
阿塞拜疆	111	96	110	95	87	98	88	101	28	19	19	19
孟加拉国	*78*	93	*66*	97	*24*	*40*	*12*	*45*	*7*	10	*1*	6
白俄罗斯	*96*	98[a]	*96*	100[a]	*96*	89[a]	*100*	91[a]	..	63	..	91
比利时	99	104	101	103	101	109	102	106	40	59	39	74
贝宁	80	129	41	114	..	..	..	..	4	..	1	..
玻利维亚	*110*	*108*	*102*	*107*	..	*82*	..	*80*	..	*42*	..	*3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108	..	110	..	90	..	92	..	32	..	42
巴西	*130*	*132*	*129*	*123*	..	*96*	..	*106*	11	*30*	12	*39*
保加利亚	95	102	93	101	98	89	98	86	30	46	33	61
布基纳法索	41	83[a]	26	75[a]	..	24[a]	..	19[a]	1	5	0	2
布隆迪	78	149	65	144	7	25	4	18	1	..	0	..
柬埔寨	*119*	120	*96*	113	..	*44*	..	*36*	*2*	*9*	*0*	*5*
喀麦隆	101	122	87	106	31	45	22	38	..	10	..	8
加拿大	105	*99*	103	*98*	101	*103*	101	*101*	85	..	105	..
中非共和国	80	107[a]	51	76[a]	16	16[a]	7	9[a]	3	3	0	1
乍得	70	105	31	74	*11*	34	*2*	14	..	3	..	1
智利	105	*109*	103	*104*	96	*89*	98	*92*	*29*	*54*	*25*	*56*
中国	132	111	121	115	46	76	35	81	..	24	..	25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103	..	105	..	81	..	83	*23*	56	*16*	58
哥伦比亚	105	120	107	120	48	90	57	99	14	36	15	38
刚果(金)	83	98	62	83	*29*	47	*14*	26	..	*8*	..	*3*
刚果(布)	125	123	115	116	*54*	..	*41*	..	8	11	2	2
哥斯达黎加	103	110	102	109	43	93	46	99	..	..	..	..
科特迪瓦	77	81	55	66	..	..	..	..	..	*11*	..	*6*
多米尼加共和国	*82*	95	*82*	95	*81*	94	*84*	97	*26*	43	*25*	55
克罗地亚	96	104	97	103	93	94	90	96	18	51	14	71
丹麦	98	98	98	99	109	117	110	120	34	63	39	92
捷克共和国	..	114	..	98	..	72	..	82	..	..	..	..
厄瓜多尔	*123*	*117*	*122*	*118*	*54*	*74*	*56*	*77*	..	*39*	..	*45*
埃及	96	103	80	99	77	68	61	66	15	..	9	..
萨尔瓦多	97	*117*	96	*113*	36	*63*	40	*64*	..	*23*	..	*26*
厄立特里亚	20	53	19	44	*12*	37	*11*	26	..	3[a]	..	1[a]
埃塞俄比亚	39	107	26	98	16	39	12	30	1	*5*	0	*2*
芬兰	99	98	99	97	106	106	127	112	46	82	52	101
法国	109	109	108	108	98	113	103	113	37	49	43	62
格鲁吉亚	97	108	97	108	96	*92*	94	*88*	38	23	35	28
德国	*98*	104	*99*	103	*101*	104	*99*	99	*40*	..	*30*	..
加纳	84	106	72	105	*42*	61	*28*	54	1	11	0	7
希腊	99	*101*	98	*101*	95	*104*	93	*99*	*25*	*87*	*26*	*95*
危地马拉	86	*117*	75	*110*	*26*	*58*	*23*	*55*	..	*18*	..	*18*
几内亚	48	97	23	83	16	46	5	27	2	*14*	0	*5*
海地	47	..	45	..	..	..	..	..	..	..	..	..
洪都拉斯	106	*116*	107	*116*	30	*57*	36	*72*	10	*15*	8	*22*
匈牙利	90	100	90	99	86	99	87	98	14	53	15	72
印度	105	*115*	80	*111*	*47*	*64*	*27*	*56*	8	*16*	4	*11*
印度尼西亚	119	123	116	119	50	80	42	79	*12*	24	*8*	2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14	103	103	102	61	85	46	81	8	35	3	38
伊拉克	115	*111*	97	*94*	*54*	*59*	*35*	*44*	*14*	..	*9*	..
爱尔兰	102	104	103	105	96	115	105	121	31	55	28	66
以色列	96	110	99	112	90	88	95	90	34	54	35	71
意大利	99	*104*	99	*103*	80	*101*	79	*100*	33	*56*	31	*79*
日本	100	102	100	102	96	101	98	101	36	62	23	55
约旦	107	*97*	106	*97*	80	*87*	83	*90*	22	*39*	24	*43*
哈萨克斯坦	..	109[a]	..	109[a]	*94*	100[a]	*96*	97[a]	..	32	..	47[a]
肯尼亚	100	114	97	111	..	62	..	56	..	5	..	3
韩国	108	105	109	103	93	99	90	95	51	117	25	82
吉尔吉斯共和国	*109*	95	*111*	95	99	84	101	85	*20*	44	*26*	58
老挝	111	*117*	88	*106*	*28*	*48*	*19*	*39*	*2*	*15*	*1*	*12*
黎巴嫩	*98*	104	*95*	102	*59*	78	*63*	87	*29*	48	*27*	57
利比里亚	..	*96*	..	*86*	..	..	..	..	..	..	..	..
利比亚	..	..	..	..	..	..	..	..	*17*	..	*14*	..
立陶宛	95	98	89	96	*86*	99	*83*	99	*39*	63	*27*	96
马达加斯加	105	162	102	158	*19*	32	*18*	31	4	4	3	3
马拉维	78	118	69	121	21	31	13	28	1	*1*	0	*0*
马来西亚	93	*95*	93	*94*	56	*66*	58	*71*	..	*32*	..	*41*
马里	36	105[a]	21	89[a]	10	49[a]	5	34[a]	1	9	0	3
毛里塔尼亚	56	101	43	108	18	*26*	9	*23*	5	5	1	2
墨西哥	115	117	112	116	54	87	53	93	*15*	28	*12*	28

（续）

	相关年龄组总入学率/%											
	小学				中学				高等教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1991	2009
摩尔多瓦	93	94	93	93	87	88	94	90	..	32	..	45
摩洛哥	76	112	52	103	41	*60*	30	*51*	14	14	8	12
莫桑比克	69	122[a]	51	110[a]	9	28[a]	5	23[a]	*1*	..	*0*	..
缅甸	108	117	103	115	23	53	22	54	*4*	*9*	*5*	*12*
尼泊尔	135	..	85	..	46	..	21	..	8	..	3	..
荷兰	101	108	104	106	124	122	115	120	43	58	36	65
新西兰	104	101	102	102	92	124	93	129	43	68	48	99
尼加拉瓜	88	*118*	93	*116*	*25*	*64*	*41*	*72*	8	..	7	..
尼日尔	33	73[a]	20	60[a]	10	16[a]	4	11[a]	*2*	2[a]	*0*	1[a]
尼日利亚	93	95	73	84	*28*	*34*	*21*	*27*	..	..	..	..
挪威	100	99	100	99	101	112	105	109	39	56	46	92
巴基斯坦	*62*	92	*32*	77	31	37	15	29	*4*	*6*	*2*	*5*
巴拿马	*109*	111	*104*	107	*59*	70	*63*	76	..	*36*	..	*55*
巴布亚新几内亚	70	..	60	..	14	..	9	..	..	..	..	..
巴拉圭	107	101	104	98	30	65	32	68	*9*	30	*8*	43
秘鲁	119	*109*	116	*109*	69	*89*	65	*89*	..	..	..	..
菲律宾	109	*111*	108	*109*	*70*	*79*	*72*	*86*	*21*	*26*	*30*	*32*
波兰	99	97	97	97	86	99	89	99	19	59	25	84
葡萄牙	122	114	116	111	62	105	71	109	20	56	26	67
罗马尼亚	88	100	89	99	93	94	92	93	10	58	9	77
俄罗斯联邦	109	*97*	109	*97*	*94*	*86*	*96*	*84*	47	*66*	58	*89*
卢旺达	79	150	78	151	20	27	16	26	*1*	6	*0*	4
沙特阿拉伯	..	101	..	97	..	104	..	90	11	29	10	36
塞内加尔	64	82	47	85	*20*	*34*	*10*	*27*	..	10	..	6
塞尔维亚	..	98	..	97	..	90	..	93	..	44	..	56
塞拉利昂	57	..	38	..	21	..	12	..	..	..	..	..
新加坡	..	..	..	..	..	..	..	..	..	..	..	..
斯洛伐克共和国	*101*	102	*100*	102	*86*	92	*90*	92	*16*	43	*16*	69
索马里	..	*42*	..	*23*	..	*11*	..	*5*	..	..	..	..
南非	110	103	108	99	64	92	75	96	14	..	11	..
西班牙	107	108	106	107	102	118	108	124	36	66	39	82
斯里兰卡	115	97	111	97	69	..	75	..	4	..	2	..
苏丹	53	78	41	70	22	40	18	36	*3*	..	*2*	..
瑞典	100	97	100	96	88	103	92	102	29	56	35	88
瑞士	90	104	91	103	101	98	95	94	35	51	19	52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106	125	96	120	56	75	41	74	22	..	14	..
塔吉克斯坦	92	*104*	90	*100*	..	*90*	..	*78*	..	28	..	12
坦桑尼亚	71	105	69	105	6	31	5	24	1	..	0	..
泰国	102	92	100	90	31	74[a]	31	80[a]	*18*	39[a]	*21*	51[a]
多哥	115	119	75	111	30	*54*	10	*28*	4	..	1	..
突尼斯	120	109	107	107	50	87	39	94	10	27	7	42
土耳其	102	*101*	95	*98*	59	*87*	37	*77*	17	*43*	9	*34*
土库曼斯坦	..	..	..	..	..	..	..	..	..	..	..	..
乌干达	75	121	64	122	*14*	30	*8*	25	2	5	1	4
乌克兰	107	97	107	98	92	95	96	93	..	72	..	9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16	106	113	105	63	95	73	96	4	22	14	41
英国	105	*106*	105	*106*	85	*98*	88	*100*	30	50	29	69
美国	105	98	103	99	91	93	92	94	66	72	82	101
乌拉圭	108	*115*	107	*112*	..	*82*	..	*94*	..	*48*	..	*83*
乌兹别克斯坦	112	93	110	91	..	104	..	103	..	11	..	8
委内瑞拉	109	105	108	102	50	79	62	86	*28*	*59*	*25*	*99*
越南	..	..	..	..	..	..	..	..	..	..	..	..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	79	..	79	..	84	..	90	..	40	..	52
也门共和国	..	*94*	..	*76*	..	..	..	..	*7*	*14*	*2*	*6*
赞比亚	..	113	..	112	..	53	..	44	*3*	..	*1*	..
津巴布韦	108	..	104	..	54	..	43	..	*8*	4	*4*	3
世界	**105w**	**109w**	**93w**	**105w**	**54w**	**69w**	**45w**	**67w**	**.. w**	**26w**	**.. w**	**28w**
低收入国家	81	108	67	101	30	42	22	36	..	8	..	5
中等收入国家	110	110	97	107	52	70	42	68	..	24	..	25
下中等收入国家	110	110	94	104	48	61	35	55	..	17	..	14
上中等收入国家	112	111	109	111	68	81	67	86	..	30	..	36
中低收入国家	105	110	91	106	49	65	38	63	..	21	..	22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23	111	115	112	46	74	37	78	..	24	..	26
欧洲和中亚	99	99	97	98	86	91	84	87	..	50	..	6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114	119	113	115	56	86	57	93	..	33	..	41
中东和北非	106	106	87	98	61	75	46	69	16	28	9	27
南亚	98	*113*	74	*107*	47	58	27	51	..	*13*	..	*9*
撒哈拉以南非洲	78	104	65	95	25	40	19	32	..	8	..	5
高收入国家	103	102	102	101	91	100	92	100	..	63	..	77

a. 2010 年数据.

表 A2 健康

	出生寿命预期 年				儿童死亡率 每千人				每出生 10 万活婴 产妇的死亡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国家估测值	模型估测值	
	1990	2009	1990	2009	1990	2004 – 09[a]	1990	2004 – 09[a]	2004 – 09[a]	1990	2008
阿富汗	41	44	41	44	..	..	..	..	..	1 700	1 400
阿尔巴尼亚	69	74	75	80	..	3	..	1	21	48	31
阿尔及利亚	66	71	68	74	..	..	..	..	..	250	120
安哥拉	40	46	44	50	..	..	..	..	..	1 000	610
阿根廷	68	72	75	79	..	..	..	..	40	72	70
亚美尼亚	65	71	71	77	..	8	..	3	27	51	29
澳大利亚	74	79	80	84	..	..	..	..	..	10	8
奥地利	72	77	79	83	..	..	..	..	..	10	5
阿塞拜疆	61	68	70	73	..	9	..	5	26	64	38
孟加拉国	53	66	55	68	..	16	..	20	348	870	340
白俄罗斯	66	65	76	76	..	..	..	..	3	37	15
比利时	73	78	79	84	..	..	..	..	..	7	5
贝宁	53	61	55	63	..	64	..	65	397	790	410
玻利维亚	57	64	61	68	*51*	18	*51*	20	310	510	18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2	73	74	78	..	..	..	..	3	18	9
巴西	63	69	70	76	*17*	..	*20*	..	75	120	58
保加利亚	68	70	75	77	..	..	..	..	6	24	13
布基纳法索	47	52	48	55	..	..	..	..	307	770	560
布隆迪	45	49	48	52	..	65	..	65	615	1 200	970
柬埔寨	53	60	57	63	..	20	..	20	461	690	290
喀麦隆	53	51	57	52	*64*	73	*75*	72	669	680	600
加拿大	74	79	81	84	..	..	..	..	..	6	12
中非共和国	47	46	52	49	..	74	..	82	543	880	850
乍得	49	48	53	50	..	96	..	101	1 099	1 300	1 200
智利	71	76	77	82	..	..	..	..	18	56	26
中国	67	72	70	75	..	..	..	..	34	110	38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75	80	80	86	..	..	..	..	..	..	..
哥伦比亚	64	70	72	77	11	4	6	3	76	140	85
刚果(金)	46	46	50	49	..	70	..	64	549	900	670
刚果(布)	57	53	61	55	..	49	..	43	781	460	580
哥斯达黎加	73	77	78	82	..	..	..	..	27	35	44
科特迪瓦	56	57	60	59	..	..	..	..	543	690	470
多米尼加共和国	69	73	76	80	..	1	..	1	13[b]	8	14
克罗地亚	68	74	75	80	..	..	..	..	6	15	8
丹麦	72	77	78	81	..	..	..	..	..	7	5
捷克共和国	65	70	70	76	*18*	6	*20*	4	159	220	100
厄瓜多尔	66	72	71	78	..	5	..	5	60	230	140
埃及	62	69	64	72	*38*	5	*46*	5	55	220	82
萨尔瓦多	61	67	71	76	..	..	..	..	59	200	110
厄立特里亚	46	58	50	62	..	..	..	..	..	930	280
埃塞俄比亚	45	54	48	57	..	56	..	56	673	990	470
芬兰	71	77	79	83	..	..	..	..	..	7	8
法国	73	78	81	85	..	..	..	..	..	13	8
格鲁吉亚	67	68	74	75	..	..	..	4	14	58	48
德国	72	77	79	83	..	..	..	..	..	13	7
加纳	56	56	58	58	*78*	38	*79*	28	451	630	350
希腊	75	78	80	83	..	..	..	..	..	6	2
危地马拉	59	67	65	74	..	..	..	..	133	140	110
几内亚	47	56	50	60	*122*	89	*112*	86	980	1 200	680
海地	54	60	56	63	..	33	..	36	630	670	300
洪都拉斯	64	70	69	75	..	8	..	9	..	210	110
匈牙利	65	70	74	78	..	..	..	..	17	23	13
印度	58	63	58	66	..	9	..	12	254	570	230
印度尼西亚	60	69	63	73	*36*	13	*35*	12	228	620	2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4	70	66	73	..	..	..	..	25	150	30
伊拉克	58	65	72	72	..	6	..	7	84	93	75
爱尔兰	72	77	77	82	..	..	..	..	..	6	3
以色列	75	80	78	84	..	..	..	..	..	12	7
意大利	74	79	80	84	..	..	..	..	..	10	5
日本	76	80	82	86	..	..	..	..	..	12	6
约旦	65	71	69	75	6	3	6	7	19	110	59
哈萨克斯坦	64	64	73	74	..	5	..	4	37	78	45
肯尼亚	58	54	62	55	*35*	27	*33*	25	488	380	530
韩国	67	77	76	84	..	..	..	..	..	18	18
吉尔吉斯共和国	64	62	73	72	..	8	..	4	55	77	81
老挝	53	64	56	67	..	..	..	..	405	1 200	580
黎巴嫩	66	70	71	74	..	..	..	..	..	52	26
利比里亚	47	57	50	60	..	62	..	64	994	1 100	990
利比亚	66	72	70	77	..	..	..	..	..	100	64
立陶宛	66	68	76	79	..	..	..	..	9	34	13
马达加斯加	50	59	52	62	*85*	30	*82*	31	498	710	440
马拉维	48	53	50	55	*126*	52	*114*	54	807	910	510
马来西亚	68	72	72	77	..	..	..	..	29	56	31
马里	43	48	43	50	..	117	..	114	464	1 200	830
毛里塔尼亚	54	55	57	59	..	53	..	44	686	780	550

（续）

	出生寿命预期 年				儿童死亡率 每千人				每出生 10 万活婴 产妇的死亡率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国家估测值	模型估测值	
	1990	2009	1990	2009	1990	2004－09[a]	1990	2004－09[a]	2004－09[a]	1990	2008
墨西哥	68	73	74	78	..	..	..	..	63	93	85
摩尔多瓦	64	65	71	72	..	7	..	4	38	62	32
摩洛哥	62	69	66	74	*21*	9	*24*	11	132	270	110
莫桑比克	42	47	45	49	..	..	..	..	..	1 000	550
缅甸	57	60	61	64	..	..	..	..	316	420	240
尼泊尔	54	66	54	68	..	21	..	18	281	870	380
荷兰	74	79	80	83	..	..	..	..	..	10	9
新西兰	73	78	78	82	..	..	..	..	..	18	14
尼加拉瓜	61	70	67	77	..	..	..	..	77	190	100
尼日尔	41	51	42	53	*212*	138	*232*	135	648	1 400	820
尼日利亚	43	48	46	49	118	91	102	93	545	1 100	840
挪威	73	79	80	83	..	..	..	..	..	9	7
巴基斯坦	60	67	61	67	*22*	14	*37*	22	276	490	260
巴拿马	70	73	75	79	..	..	..	..	60	86	71
巴布亚新几内亚	52	59	58	64	..	..	..	..	733	340	250
巴拉圭	66	70	70	74	10	..	12	..	118	130	95
秘鲁	63	71	68	76	*29*	13	*31*	4	..	250	98
菲律宾	63	70	68	74	..	10	..	9	162	180	94
波兰	67	72	76	80	..	..	..	..	5	17	6
葡萄牙	70	76	77	82	..	..	..	..	..	15	7
罗马尼亚	67	70	73	77	..	..	..	..	14	170	27
俄罗斯联邦	64	63	74	75	..	..	..	..	32[b]	74	39
卢旺达	31	49	35	52	*87*	69	*73*	55	750	1 100	540
沙特阿拉伯	66	73	70	74	..	3	..	4	14	41	24
塞内加尔	51	54	53	57	..	43	..	39	401	750	410
塞尔维亚	*69*	71	*74*	76	..	4	..	3	6	13	8
塞拉利昂	38	47	42	49	..	67	..	61	857	1 300	970
新加坡	72	79	77	84	..	..	..	..	..	6	9
斯洛伐克共和国	67	71	75	79	..	..	..	..	4	15	6
索马里	43	49	46	52	..	53	..	54	1 044	1 100	1 200
南非	58	50	65	53	..	..	..	..	..	230	410
西班牙	73	79	81	85	..	..	..	..	..	7	6
斯里兰卡	66	71	73	78	..	..	..	..	39	91	39
苏丹	51	57	54	60	62	38	63	30	1 107	830	750
瑞典	75	79	80	83	..	..	..	..	..	7	5
瑞士	74	80	81	84	..	..	..	..	..	8	10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66	73	70	76	..	5	..	3	..	120	46
塔吉克斯坦	60	64	66	70	..	18	..	13	38	120	64
坦桑尼亚	49	56	53	57	*63*	56	*57*	52	578	880	790
泰国	66	66	73	72	..	..	..	..	12	50	48
多哥	56	61	60	65	*75*	55	*90*	43	..	650	350
突尼斯	69	73	72	77	*19*	..	*19*	..	..	130	60
土耳其	62	70	67	75	..	6	..	6	29	68	23
土库曼斯坦	59	61	66	69	..	..	..	..	15	91	77
乌干达	46	53	50	54	*97*	75	*86*	62	435	670	430
乌克兰	66	64	75	75	..	4	..	1	16	49	2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71	77	75	79	..	..	..	..	..	28	10
英国	73	78	79	82	..	..	..	..	..	10	12
美国	72	76	79	81	..	..	..	..	13	12	24
乌拉圭	69	73	76	80	..	..	..	..	34	39	27
乌兹别克斯坦	64	65	70	71	..	11	..	7	21	53	30
委内瑞拉	68	71	74	77	..	..	..	..	61	84	68
越南	64	73	67	77	..	5	..	4	75	170	56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67	72	70	75	..	3	..	3	..	..	..
也门共和国	54	62	55	65	*41*	10	*47*	11	..	540	210
赞比亚	49	46	53	47	*30*	66	*33*	55	591	390	470
津巴布韦	57	45	64	46	..	21	..	21	555	390	790
世界	**63w**	**67w**	**67w**	**71w**	**.. w**	**.. w**	**.. w**	**.. w**		**400w**	**260w**
低收入国家	51	56	53	59	..	..	..	..		860	590
中等收入国家	62	67	66	71	..	..	..	..		350	210
下中等收入国家	58	63	61	67	..	..	..	..		540	300
上中等收入国家	66	70	70	75	..	..	..	..		110	60
中低收入国家	61	65	64	69	..	..	..	..		440	290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65	71	68	74	..	..	..	..		200	89
欧洲和中亚	64	66	73	75	..	..	..	..		69	3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65	71	72	77	..	..	..	..		140	86
中东和北非	63	69	66	73	..	..	..	..		210	88
南亚	58	63	58	66	..	9	..	13		610	290
撒哈拉以南非洲	48	51	52	54	..	..	..	..		870	650
高收入国家	72	77	79	83	..	..	..	..		15	15

a. 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b. 2010 年数据。

表 A3 以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计算的就业率

	以经济活动计算的就业率/%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议会中的女性	
	2006－09[a] 年的男性就业率	2006－09[a] 年的女性就业率	2006－09[a] 年的男性就业率	2006－09[a] 年的女性就业率	2006－09[a] 年的男性就业率	2006－09[a] 年的女性就业率	在总席位中所占百分比/%	
							1990	2010
阿富汗	..	..	..	..	..	..	4	*28*
阿尔巴尼亚	..	..	..	..	..	..	29	16
阿尔及利亚	..	..	..	..	..	..	2	8
安哥拉	..	0[b,c]	..	..	..	..	15	39
阿根廷	2[c]	..	33[c]	10[c]	65[c]	89[c]	6	39
亚美尼亚	39	49	25	8	35	43	36	9
澳大利亚	4	2	32	9	64	88	6	25
奥地利	5	5	37	11	58	83	12	28
阿塞拜疆	37	40	18	7	45	53	..	11
孟加拉国	..	..	..	..	..	..	10	19
白俄罗斯	15	9	33	24	37	64	..	35
比利时	2	1	35	10	63	88	9	39
贝宁	..	..	..	..	..	..	3	11
玻利维亚	34	38	28	9	38	52	9	2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	..	..	..	..	..	19
巴西	21	12	29	13	50	75	5	9
保加利亚	9	5	43	27	49	67	21	21
布基纳法索	..	..	..	..	..	..	..	15
布隆迪	..	..	..	..	..	..	..	32
柬埔寨	..	..	..	..	..	..	..	21
喀麦隆	..	..	..	..	..	..	14	14
加拿大	3[c]	1[c]	32[c]	10[c]	65[c]	89[c]	13	22
中非共和国	..	..	..	..	..	..	4	10
乍得	..	..	..	..	..	..	..	5
智利	15	6	31	11	54	83	..	14
中国	..	..	..	..	..	..	21	21
中国香港	0[b,c]	0[b,c]	19[c]	4[c]	80[c]	96[c]	..	..
哥伦比亚	27	6	22	16	51	78	5	*8*
刚果(金)	..	..	..	..	..	..	5	8
刚果(布)	..	..	..	..	..	..	14	7
哥斯达黎加	17	4	27	13	56	82	11	39
科特迪瓦	..	..	..	..	..	..	6	9
多米尼加共和国	13	15	39	16	47	68	..	24
克罗地亚	4	2	49	24	47	74	..	22
丹麦	4	1	29	10	66	89	31	38
捷克共和国	21	2	26	14	53	84	8	21
埃及	34	23	24	11	43	66	5	32
萨尔瓦多	28	46	27	6	44	49	4	2
厄瓜多尔	28	4	26	20	46	76	12	19
厄立特里亚	..	..	..	..	..	..	..	22
埃塞俄比亚	9[c]	10[c]	25[c]	20[c]	76[c]	64[c]	..	28
芬兰	6	3	37	10	56	87	32	40
法国	4	2	34	10	62	87	7	19
格鲁吉亚	51	57	17	4	33	39	..	7
德国	2	1	41	15	57	84	..	33
加纳	..	..	..	..	..	..	..	8
希腊	12	12	30	9	59	79	7	17
危地马拉	44	16	24	21	32	63	7	12
几内亚	..	..	..	..	..	..	..	*19*
海地	..	..	..	..	..	..	..	4
洪都拉斯	48	10	22	22	30	68	10	18
匈牙利	6	3	41	19	52	78	21	9
印度	..	..	..	..	..	..	5	11
印度尼西亚	40	39	21	15	39	46	12	1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9	31	33	27	47	42	2	3
伊拉克	17	51	22	4	61	46	11	25
爱尔兰	8	1	31	9	60	89	8	14
以色列	3	1	30	10	67	89	7	18
意大利	4	3	39	15	57	82	13	21
日本	4	4	35	17	60	78	1	11
约旦	3	2	21	10	75	88	0	6
哈萨克斯坦	31	29	26	12	43	59	..	18
肯尼亚	..	..	..	..	..	..	1	10
韩国	7	8	32	15	61	77	2	15
吉尔吉斯共和国	37	35	26	11	37	54	..	26
老挝	..	..	..	..	..	..	6	25
黎巴嫩	..	..	..	..	..	..	0	3
利比里亚	47	49	4	1	17	13	..	13
利比亚	..	..	..	..	..	..	..	8
立陶宛	12	7	37	18	51	75	..	19
马达加斯加	..	..	..	..	..	..	7	*8*
马拉维	..	..	..	..	..	..	10	21
马来西亚	17	9	32	23	51	68	5	10
马里	68	64	8	3	24	33	..	10
毛里塔尼亚	..	..	..	..	..	..	..	22

（续）

	以经济活动计算的就业率/%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议会中的女性	
	2006－09[a]年的男性就业率	2006－09[a]年的女性就业率	2006－09[a]年的男性就业率	2006－09[a]年的女性就业率	2006－09[a]年的男性就业率	2006－09[a]年的女性就业率	在总席位中所占百分比/%	
							1990	2010
墨西哥	19	4	30	18	50	77	12	26
摩尔多瓦	34	28	26	14	41	58	..	24
摩洛哥	34	59	24	15	42	25	0	11
莫桑比克	..	..	..	..	..	..	16	39
缅甸	..	..	..	..	..	..	..	..
尼泊尔	..	..	..	..	..	..	6	33
荷兰	3	2	25	7	63	85	21	41
新西兰	9	4	31	10	61	86	14	34
尼加拉瓜	42	8	21	19	37	72	15	21
尼日尔	..	..	..	..	..	..	5	*12*
尼日利亚	..	..	..	..	..	..	..	7
挪威	4	1	32	7	64	92	36	40
巴基斯坦	37	75	22	12	41	13	10	22
巴拿马	20	4	26	9	55	87	8	9
巴布亚新几内亚	..	..	..	..	..	..	0	1
巴拉圭	31	19	25	10	44	71	6	13
秘鲁	10[c]	6[c]	28[c]	13[c]	62[c]	82	6	28
菲律宾	42	24	18	10	40	66	9	21
波兰	13	13	43	17	44	70	14	20
葡萄牙	11	12	39	16	50	72	8	27
罗马尼亚	28	31	37	22	36	47	34	11
俄罗斯联邦	11	7	38	19	51	74	..	14
卢旺达	..	..	..	..	..	..	17	56
沙特阿拉伯	5	0[b]	23	2	72	98	..	0
塞内加尔	34	33	20	5	33	42	13	23
塞尔维亚	25	23	32	16	43	61	..	22
塞拉利昂	..	..	..	..	..	..	..	13
新加坡	2	1	26	17	73	83	5	23
斯洛伐克共和国	5	2	50	22	45	76	..	15
索马里	..	..	..	..	..	..	4	7
南非	6	4	35	13	59	83	3	45
西班牙	6	3	36	10	59	88	15	37
斯里兰卡	30[c]	37[c]	25[c]	25[c]	27[c]	27[c]	5	5
苏丹	..	..	..	..	..	..	..	26
瑞典	3	1	31	8	65	91	38	45
瑞士	4	2	30	10	61	81	14	29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18	26	32	8	50	66	9	12
塔吉克斯坦	..	..	..	..	..	..	..	19
坦桑尼亚	71	78	7	3	22	19	..	31
泰国	44	39	21	18	35	43	3	13
多哥	61	48	10	4	29	46	5	11
突尼斯	..	..	..	..	..	..	4	28
土耳其	17	38	29	15	54	47	1	9
土库曼斯坦	..	..	..	..	..	..	26	17
乌干达	..	..	..	..	..	..	12	32
乌克兰	..	..	..	..	..	..	..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	0[b]	28	7	66	92	0	23
英国	2	1	30	8	68	91	6	22
美国	2	1	30	9	68	90	7	17
乌拉圭	16[c]	5[c]	29[c]	13[c]	56[c]	83[c]	6	15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	..	22
委内瑞拉	13	2	31	11	57	87	10	*19*
越南	50	54	24	16	26	30	18	26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10	28	29	11	60	60	..	..
也门共和国	..	..	..	..	..	..	4	0
赞比亚	..	..	..	..	..	..	7	14
津巴布韦	..	..	..	..	..	..	11	15
世界	.. **w**	.. **w**	.. **w**	.. **w**	.. **w**	.. **w**	**13w**	**19w**
低收入国家	..	..	..	..	..	..	..	20
中等收入国家	..	..	..	..	..	..	13	17
下中等收入国家	..	..	..	..	..	..	11	15
中高收入国家	..	..	..	..	..	..	14	20
中低收入国家	..	..	..	..	..	..	13	18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	..	..	..	..	..	17	19
欧洲和中亚	16	15	35	18	49	66	..	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18	9	29	14	52	77	12	24
中东和北非	25	42	28	17	47	42	4	9
南亚	..	..	..	..	..	..	6	19
撒哈拉以南非洲	..	..	..	..	..	..	..	20
高收入国家	4	3	34	12	62	85	12	23

注：由于劳动者数量未按部门分类，按经济活动划分的就业数据加总后可能不等于100%。

a. 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数据。b. 低于0.5。c. 统计覆盖率有限。

表 A1. 教育参与率

毛入学率是不计年龄的总入学人数与按照官方标准相当于某个教育水平的年龄组群体人数的比例。（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小学教育（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1）指的是为学生提供完整基础教育的课程，包括读、写、算及对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美术和音乐等其他科目的基础理解。宗教教育亦可能包括在内。它有时被称作初等教育。（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中等教育指初中（ISCED 2）和高中（ISCED 3）课程。初中教育阶段继续了小学水平的基础课程，但教学通常更加聚焦于学科，每个学科领域中需要更专业的教师。在高中教育阶段，教学通常更多地以学科为轴线组织，教师通常需要更高级或更专业的资格。（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第三级教育指多种包含更高级教育内容的课程。第三级教育的第一阶段（ISCE5）是旨在为进入以下几个领域提供足够技能的理论性课程：旨在提供进入需要高技能的高级研究项目或职业的足够技能，或实用性、技术性、专业性的课程。第三级教育的第二阶段（ISCED6）指致力于高级和原创性研究或通向高级研究资格的课程。（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表 A2. 健康

出生预期寿命是指假定新生婴儿出生时的死亡率变化趋势终生不变而推算出的新生婴儿预期寿命。（来源：世界银行）

儿童死亡率指 1~5 岁的儿童死亡的千人死亡概率，即根据当前各年龄死亡率推算出的 1 岁儿童在 5 岁之前死亡的概率。（来源：宏观国际和世界银行）

孕产妇死亡率是每 10 万次生育中孕产妇因生育相关的原因而死亡的数量。

国家估算是基于国家调查、生命登记记录以及监测数据或来自社区和医院的记录做出的报告。（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模型估算是基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做出的估算。对于死亡原因有良好统计的国家，该数据用于直接估算孕产妇死亡率。对于缺乏完整登记数据但有其他类型数据的国家和缺乏全国性的经验数据的国家，孕产妇死亡率是利用国家水平的孕产妇死亡率数据和包括生育率、接生员数量和 GDP 等社会经济信息并借助使用现有的国家水平的模型，通过多水平回归模型计算得出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和世界银行）

表 A3. 以经济活动和政治参与计算的就业率

农业就业相当于 ISIC 修订版 2 中的分类 1，或 ISIC 修订版 3 中的分类 A 和 B，包括狩猎、林业、捕鱼。（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工业就业相当于 ISIC 修订版 2 中的分类 2~5，或 ISIC 修订版 3 中的分类 C-F，包括采矿采石（包括石油生产）、制造、建筑和公用事业（电力，燃气和水）。（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服务业就业相当于 ISIC 修订版 2 中的分类 6~9，或 ISIC 修订版 3 中的分类 G-P，包括批发零售、餐饮旅店、运输、仓储和通信；金融、保险、房产和商业服务；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议会中的女性指女性在一院制或下议院占据的议会席位百分比。（来源：各国议会联盟）

2012 年部分世界发展指标

本年度世界发展报告采用了 6 个表，提供了 132 个经济体最近一年可获得的可比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对某些发展指标而言，其年份还要早一些。另外，数据较缺乏或人口不到 300 万的 84 个经济体的基本指标由附表提供。

本报告的指标是从《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的 800 多个指标中选出来的。年度出版物《世界发展指标》全方位展示了世界发展的进程，其 6 大部分认可了以下一系列因素的贡献：千年发展目标和人力资本发展；环境可持续性；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私营部门发展和投资环境；以及对发展外部环境产生影响的全球交流。

作为世界发展指标的补充，独立出版的数据库为 240 个经济体和区域提供了 1 000 多个时间序列指标。在开放性数据网站上可以找到该数据库，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

数据来源和方法论

本报告提供的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数据来源如下：世界银行搜集的原始数据、成员国的统计出版物、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完整的数据来源，请参阅技术注释之后的“数据来源”）。尽管各国和各国际机构报告的大部分统计资料在统计口径、定义和分类等方面都使用了国际标准，但由于基本数据来源收集和汇编能力存在差异，数据的及时性和可信度也必然存在差异。对于一些互相冲突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审核，以确保提供最可靠的数据。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可得数据不足以客观解释实际发展水平或发展趋势，或者没有完全忠实于国际标准，此处不予提供这种数据。

今年提供的数据基本与《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一致。然而在得到新的数据后，本报告对数据进行了修正与更新。数据的差异也反映了对历史数据的修改以及处理方法上的改变。因而，历年的旧数据也可能在世界银行出版物中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建议读者勿对不同出版物或同一出版物的不同版本间的数据进行汇编。可以从开放性数据网站获取前后一致的时间序列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美元数据均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所得。技术注释已对各国货币数值折算所使用的不同方法进行了说明。

鉴于世界银行的首要工作在于为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成员国提供贷款和政策建议，这些表格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为便于比较，在可能的情况下，表格也提供了高收入国家的信息。有关高收入经济体的更多信息，读者可参阅各国统计出版物或经合组织与欧盟的出版物。

经济体分类和总计

大部分表格底部的概括性指标包括根据人均收入和地区进行划分的各类经济体。这里采用人均国民收入（GNI）对经济体进行如下分类：2010 年 1 005 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经济体；1 006~12 275 美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12 276 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进一步划分中等收入经济体，3 975 美元成为中低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分界线。由于每年都会根据人均收入对经济体进行重新划分，所以各收入组别的经济体构成每年也会发生变化。当组别变化以最近的估计值为依据时，必须在新收入分类的基础上重新计算过去所有时期的汇总数值，以维护时间序列的持续性。关于各组经济体的列表（包括人口不足 300 万的经济体），请参阅稍后经济体的划分表。

对经济体进行组别划分的概括性指标既可以是总数（如果总数包括对缺少数据及未报告数据国家的估计值，标以 t；如果只是简单加总，标以 s）、加权平均数（w）或中位数（m）。只要数据可得，主表未纳入的国家的数据（表 6 提供的数据）已通过概括性指标的方式提供；否则就假设这些国家会跟随报告国家的趋势。通过实现每一阶段的国家覆盖范围的标准化，提供了更具一致性的概括性指标。然而，如果缺乏的数据达到总数据的 1/3 或以上，则该组测算值报为不可得。“技术注释”中“统计方法”小节对概括性指标提供了更详细的解释。各表的技术注释中列举了计算概括性指标的权重。

术语和国家覆盖范围

“国家”一词并不指其政治上的独立性，而可能是指当局分别提交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任一地区。本报告提供了已于 2010 年成立的经济体的数量，并修改了其历史数据以反映当前的政治布局。所有表格都对例外情况加以说明。除非另有说明，有关中国的数据仅指大陆地区，未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中国台湾的数据。除非另有说明，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包括 1999 年以前东帝汶的数据。2006 年 6 月 3 日，黑山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但是，只要数据可得，就会分别提供这两国的数据。然而，一些关于塞尔维亚的指标仍然包括 2005 年以前的数据；这些数据在表中附有脚注。1999 年以后，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科索沃被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因此自 1999 年后塞尔维亚大多数指标的数据中都不包含科索沃的数据；凡有例外，均有说明。科索沃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成为世界银行成员国，在数据可得情况下其相关数据都列入表中。

技术注释

由于数据质量与国家间比较往往存在问题，因此我们鼓励读者查阅表格后的“技术注释”、“按区域和收入划分的经济体”列表以及表下注释。如欲获得更全面的数据，请参阅《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

符号

..表示数据不可获得，或者表示由于所示年份数据缺失而无法计算汇总。

0 或 0.0 表示零或不足所示单位的一半。

/表示日期，如 2003/04 中表示横跨两个日历年之间的时间段，通常是 12 个月，指的是作物年度、调查年度或财政年度。

$表示现值美元，除非另有说明。

>表示大于。

<表示小于。

读者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传真找到有关 2010 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更多信息。

咨询与在线订购方式：

http：//data .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电话 1-800-645-7247

传真：1-703-661-1501

邮购地址：The World Bank，P.O. Box 960，Herndon，VA 20172-0960，USA

按区域和收入划分的经济体，2012 财政年度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美属萨摩亚	UMC
柬埔寨	LIC
中国	UMC
斐济	LMC
印度尼西亚	LMC
基里巴斯	LMC
韩国	LIC
老挝	LMC
马来西亚	UMC
马绍尔群岛	LMC
密克罗尼西亚	LMC
蒙古	LMC
缅甸	LIC
帕劳	UMC
巴布亚新几内亚	LMC
菲律宾	LMC
萨摩亚	LMC
所罗门群岛	LMC
泰国	UMC
东帝汶	LMC
汤加	LMC
图瓦卢	LMC
瓦努阿图	LMC
越南	LMC

欧洲和中亚

阿尔巴尼亚	UMC
亚美尼亚	LMC
阿塞拜疆	UMC
白俄罗斯	UMC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UMC
保加利亚	UMC
格鲁吉亚	LMC
哈萨克斯坦	UMC
科索沃	LMC
吉尔吉斯共和国	LIC
拉脱维亚	UMC
立陶宛	UMC
马其顿	UMC
摩尔多瓦	LMC
黑山	UMC
罗马尼亚	UMC
俄罗斯联邦	UMC
塞尔维亚	UMC
塔吉克斯坦	LIC
土耳其	UMC
土库曼斯坦	LMC
乌克兰	LMC
乌兹别克斯坦	LM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	UMC
阿根廷	UMC
伯利兹	LMC
玻利维亚	LMC
巴西	UMC
智利	UMC
哥伦比亚	UMC
哥斯达黎加	UMC
古巴	UMC
多米尼克	UMC
多米尼加共和国	UMC
厄瓜多尔	UMC
萨尔瓦多	LMC
格林纳达	UMC
危地马拉	LMC
圭亚那	LMC
海地	LIC
洪都拉斯	LMC
牙买加	UMC
墨西哥	UMC
尼加拉瓜	LMC
巴拿马	UMC
巴拉圭	LMC
秘鲁	UMC
圣基茨和尼维斯	UMC
圣卢西亚	UMC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UMC
苏里南	UMC
乌拉圭	UMC
委内瑞拉	UMC

中东和北非

阿尔及利亚	UMC
吉布提	LMC
埃及	LMC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UMC
伊拉克	LMC
约旦	UMC
黎巴嫩	UMC
利比亚	UMC
摩洛哥	LMC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LMC
突尼斯	UMC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LMC
也门共和国	LMC

南亚

阿富汗	LIC
孟加拉国	LIC
不丹	LMC
印度	LMC
马尔代夫	UMC
尼泊尔	LIC
巴基斯坦	LMC
斯里兰卡	LMC

撒哈拉以南非洲

安哥拉	LMC
贝宁	LIC
博茨瓦纳	UMC
布基纳法索	LIC
布隆迪	LIC
喀麦隆	LMC
佛得角	LMC
中非共和国	LIC
乍得	LIC
科摩罗	LIC
刚果(金)	LIC
刚果(布)	LMC
科特迪瓦	LMC
厄立特里亚	LIC
埃塞俄比亚	LIC
加蓬	UMC
冈比亚	LIC
加纳	LMC
几内亚	LIC
几内亚比绍	LIC
肯尼亚	LIC
莱索托	LMC
利比里亚	LIC
马达加斯加	LIC
马拉维	LIC
马里	LIC
毛里塔尼亚	LMC
毛里求斯	UMC
马约特岛	UMC
莫桑比克	LIC
纳米比亚	UMC
尼日尔	LIC
尼日利亚	LMC
卢旺达	LIC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LMC
塞内加尔	LMC
塞舌尔	UMC
塞拉利昂	LIC
索马里	LIC
南非	UMC
苏丹	LMC
斯威士兰	LMC
坦桑尼亚	LIC
多哥	LIC
乌干达	LIC
赞比亚	LMC
津巴布韦	LIC

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卢森堡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美国

其他高收入国家

安道尔
阿鲁巴
巴哈马
巴林
巴巴多斯
百慕大
文莱
开曼群岛
海峡群岛
克罗地亚
库拉索
塞浦路斯
赤道几内亚
法罗群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
直布罗陀
格陵兰
关岛
中国香港
马恩岛
科威特
列支敦士登
中国澳门
马耳他
摩纳哥
新喀里多尼亚
北马里亚纳群岛
阿曼
波多黎各
卡塔尔
圣马力诺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荷属圣马丁岛
法属圣马丁岛
中国台湾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属维尔京群岛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本表对世界银行的所有成员经济体以及人口越过 30 000 以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类。根据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按 2010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来划分不同收入级别的国家和地区。这些级别为低收入(LIC)，1 005 美元以下；下中等收入(LMC)，1 006 ~ 3 975 美元；上中等收入(UMC)，3 976 ~ 12 275 美元；高收入，12 276 美元及以上。

表 1 主要发展指标

	人口			人口年龄构成/0～14 岁	国民总收入		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收入(GNI)[b]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百万	年均增长率/%	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		10 亿美元	人均美元	10 亿美元	人均美元		男性年龄	女性年龄	
	2010	2000－10	2009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09－10	2009	2009	2005－09
阿富汗	31	2.6	46	46	..	..[c]	..	..	..	44	44	..
阿尔巴尼亚	3	0.3	115	23	12.7	4 000	28.0	8 840	3.0	74	80	96
阿尔及利亚	35	1.5	15	27	157.9	4 460	288.0[d]	8 130[d]	1.5	71	74	73
安哥拉	19	2.9	15	45	75.2	3 960	103.1	5 430	－0.4	46	50	70
阿根廷	41	1.0	15	25	343.6	8 450	616.1	15 150	8.1	72	79	98
亚美尼亚	3	0.0	108	20	9.6	3 090	16.8	5 450	0.7	71	77	100
澳大利亚	22	1.5	3	19	*956.9*	*43 740*	*842.4*	*38 510*	..	79	84	..
奥地利	8	0.5	101	15	391.5	46 710	330.3	39 410	1.7	77	83	..
阿塞拜疆	9	1.0	106	24	46.0	5 180	81.9	9 220	3.8	68	73	100
孟加拉国	164	1.6	1 246	31	104.5	640	267.2	1 620	4.4	66	68	56
白俄罗斯	10	－0.4	48	15	58.2	6 030	135.2	14 020	7.8	65	76	100
比利时	11	0.6	356	17	493.5	45 420	411.2	37 840	1.4	78	84	..
贝宁	9	3.2	81	43	6.9	750	13.9	1 510	－0.1	61	63	42
玻利维亚	10	1.9	9	36	18.0	1 790	45.7	4 560	2.5	64	68	91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4	0.2	74	15	18.0	4 790	33.7	8 970	1.0	73	78	98
巴西	195	1.1	23	25	1 830.4	9 390	2 129.0	10 920	6.8	69	76	90
保加利亚	8	－0.6	70	14	47.2	6 240	99.9	13 210	0.5	70	77	98
布基纳法索	16	3.3	58	46	9.0	550	20.5	1 260	5.7	52	55	29
布隆迪	9	2.7	323	38	1.4	160	3.4	390	1.3	49	52	67
柬埔寨	14	1.3	79	33	10.7	760	28.9	2 040	5.5	60	63	78
喀麦隆	20	2.3	41	41	23.2	1 160	43.7	2 190	0.4	51	52	71
加拿大	34	1.0	4	16	*1 415.4*	*41 950*	*1 257.7*	*37 280*	1.8	79	84	..
中非共和国	5	1.8	7	40	2.1	460	3.4	760	1.4	46	49	55
乍得	12	3.1	9	46	6.9	600	13.6	1 180	1.6	48	50	34
智利	17	1.1	23	22	170.3	9 940	238.0	13 890	4.2	76	82	99
中国	1 338	0.6	143	20	5 700.0	4 260	10 132.3	7 570	9.7	72	75	94
中国香港	7	0.5	6 721	12	231.7	32 900	333.1	47 300	6.4	80	86	..
哥伦比亚	46	1.5	41	29	255.3	5 510	416.5	9 000	2.9	70	77	93
刚果民主共和国	68	2.9	29	46	12.0	180	21.2	310	4.4	46	49	67
刚果共和国	4	2.1	11	40	8.7	2 310	12.3	3 280	6.6	53	55	..
哥斯达黎加	5	1.7	90	25	30.5	6 580	50.5[d]	10 880[d]	2.1	77	82	96
科特迪瓦	22	2.2	66	40	23.0	1 070	35.5	1 650	0.6	57	59	55
克罗地亚	4	0.0	79	15	61.0	13 760	82.9	18 710	－1.1	73	80	99
捷克共和国	11	0.3	136	14	188.3	17 870	248.8	23 620	1.9	74	80	..
丹麦	6	0.4	130	18	328.3	58 980	223.4	40 140	1.4	77	81	..
多米尼加共和国	10	1.5	209	31	49.7	4 860	88.9[d]	8 700[d]	6.3	70	76	88
厄瓜多尔	14	1.1	55	31	62.1	4 510	127.8	9 270	2.5	72	78	84
埃及	84	1.9	83	32	197.9	2 340	499.3	5 910	3.3	69	72	66
萨尔瓦多	6	0.4	297	32	20.8	3 360	39.6[d]	6 390[d]	0.5	67	76	84
厄立特里亚	5	3.6	50	42	1.8	340	2.8[d]	540[d]	－0.7	58	62	67
埃塞俄比亚	85	2.6	83	43	32.4	380	85.4	1 010	7.3	54	57	30
芬兰	5	0.4	18	17	253.0	47 170	199.4	37 180	2.7	77	83	..
法国	65	0.7	118	18	2 749.8	42 390	2 234.2	34 440	1.0	78	85	..
格鲁吉亚	4[e]	0.1[e]	77[e]	17	12.0[e]	2 690[e]	22.1[e]	4 960[e]	5.4[e]	68	75	100
德国	82	－0.1	235	13	3 537.2	43 330	3 116.1	38 170	3.9	77	83	..
加纳	24	2.2	105	38	30.1	1 240	39.0	1 600	4.4	56	58	67
希腊	11	0.4	88	14	308.6	27 240	309.9	27 360	－4.9	78	83	97
危地马拉	14	2.5	131	42	39.3	2 740	66.2[d]	4 610[d]	0.1	67	74	74
几内亚	10	2.1	41	43	4.0	380	10.1	980	－0.6	56	60	39
海地	10	1.4	364	36	6.5	650	11.1[d]	1 110[d]	－4.3	60	63	49
洪都拉斯	8	2.0	67	37	14.3	1 880	28.4[d]	3 730[d]	0.6	70	75	84
匈牙利	10	－0.2	112	15	129.9	12 990	192.8	19 280	1.3	70	78	99
印度	1 171	1.4	389	31	1 566.6	1 340	4 170.9	3 560	8.3	63	66	63
印度尼西亚	233	1.2	127	27	599.1	2 580	1 000.7	4 300	4.9	69	73	9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4	1.4	45	24	*330.4*	*4 530*	*832.6*	*11 420*	..	70	73	85
伊拉克	32	2.5	72	41	74.9	2 320	107.3	3 320	－1.7	65	72	78
爱尔兰	4	1.6	65	21	182.5	40 990	145.7	32 740	－1.1	77	82	..
以色列	8	1.9	344	28	207.2	27 340	210.7	27 800	2.8	80	84	..
意大利	61	0.6	205	14	2 125.8	35 090	1 883.0	31 090	0.7	79	84	99
日本	127	0.0	350	13	5 369.1	42 150	4 432.1	34 790	5.3	80	86	..
约旦	6	2.4	67	34	26.5	4 350	35.1	5 770	0.7	71	75	92
哈萨克斯坦	16	0.9	6	24	121.4	7 440	173.1	10 610	4.4	64	74	100
肯尼亚	41	2.6	70	43	31.8	780	65.9	1 610	2.6	54	55	87
韩国	49	0.4	503	16	972.3	19 890	1 417.9	29 010	5.9	77	84	..
吉尔吉斯共和国	5	0.9	28	29	4.7	880	11.7	2 180	－2.2	62	72	99
老挝	6	1.7	27	37	6.5	1 010	14.8	2 300	6.5	64	67	73
黎巴嫩	4	1.2	413	25	38.4	9 020	60.3	14 170	6.2	70	74	90
利比里亚	4	3.7	41	42	0.8	190	1.4	330	1.7	57	60	59
利比亚	7	2.0	4	30	*77.1*	*12 020*	*104.8*[d]	*16 330*[d]	..	72	77	89
立陶宛	3	－0.5	53	15	37.8	11 400	59.4	17 880	2.0	68	79	100
马达加斯加	20	2.8	34	43	8.8	440	19.7	980	－1.1	59	62	64
马拉维	15	2.8	154	46	4.9	330	12.7	850	3.8	53	55	74
马来西亚	28	1.8	84	29	220.4	7 900	400.7	14 360	5.4	72	77	92
马里	15	3.1	12	44	9.1	600	15.6	1 020	1.4	48	50	26
毛里塔尼亚	3	2.6	3	39	3.6	1 060	6.7	2 000	2.7	55	59	57

（续）

	人口			人口年龄构成/0～14 岁	国民总收入		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总收入（GNI）[b]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百万	年均增长率/%	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		10 亿美元	人均美元	10 亿美元	人均美元		男性年龄	女性年龄	
	2010	2000－10	2009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09－10	2009	2009	2005－09
墨西哥	109	1.0	55	28	1 012.3	9 330	1 629.2	15 010	4.4	73	78	93
摩尔多瓦	4[f]	−0.2[f]	124[f]	17	6.5[f]	1 810[f]	11.9[f]	3 340[f]	7.0[f]	65	72	98
摩洛哥	32	1.2	72	28	94.1[g]	2 850[g]	150.1[g]	4 560[g]	2.0[g]	69	74	56
莫桑比克	23	2.5	29	44	10.3	440	21.5	920	4.9	47	49	55
缅甸	50	0.8	77	27	..	..[c]	..	..	..	60	64	92
尼泊尔	30	2.0	205	36	14.5	490	35.9	1 200	2.7	66	68	59
荷兰	17	0.4	490	18	826.5	49 720	707.9	42 590	1.2	79	83	..
新西兰	4	1.2	16	20	*125.4*	*29 050*	*121.0*	*28 050*	1.2	78	82	..
尼加拉瓜	6	1.3	48	35	6.3	1 080	15.2[d]	2 610[d]	3.1	70	77	78
尼日尔	16	3.7	12	50	5.7	360	11.1	700	4.7	51	53	29
尼日利亚	158	2.4	170	42	186.4	1 180	341.7	2 160	5.4	48	49	61
挪威	5	0.8	16	19	416.9	85 380	279.0	57 130	−0.7	79	83	..
巴基斯坦	173	2.3	220	37	182.5	1 050	482.3	2 780	2.1	67	67	56
巴拿马	4	1.7	46	29	24.5	6 990	45.4[d]	12 940[d]	5.8	73	79	94
巴布亚新几内亚	7	2.5	15	39	8.9	1 300	16.4[d]	2 390[d]	5.6	59	64	60
巴拉圭	6	1.9	16	34	19.0	2 940	35.1	5 430	13.3	70	74	95
秘鲁	29	1.3	23	30	139.0	4 710	263.7	8 940	7.6	71	76	90
菲律宾	94	1.9	308	33	192.2	2 050	368.0	3 930	5.8	70	74	95
波兰	38	−0.1	125	15	474.0	12 420	726.1	19 020	3.7	72	80	100
葡萄牙	11	0.4	116	15	232.6	21 860	262.9	24 710	1.2	76	82	95
罗马尼亚	21	−0.5	93	15	168.2	7 840	301.4	14 050	1.1	70	77	98
俄罗斯联邦	142	−0.3	9	15	1 404.2	9 910	2 720.5	19 190	4.1	63	75	100
卢旺达	10	2.6	405	42	5.5	540	12.2	1 180	4.6	49	52	71
沙特阿拉伯	26	2.3	13	32	*436.6*	*17 200*	*607.0*	*23 900*	..	73	74	86
塞内加尔	13	2.6	65	43	13.5	1 050	23.7	1 850	1.5	54	57	50
塞尔维亚	7	−0.3	83	18	42.4	5 820	81.9	11 230	2.2	71	76	..
塞拉利昂	6	3.2	80	43	2.0	340	4.8	830	2.4	47	49	41
新加坡	5	2.4	7 125	16	210.3	40 920	281.1	54 700	11.1	79	84	95
斯洛伐克共和国	5	0.1	113	15	88.1	16 220	125.6	23 140	0.3	71	79	..
索马里	9	2.4	15	45	..	..[c]	..	..	..	49	52	..
南非	50	1.3	41	30	304.6	6 100	513.8	10 280	1.5	50	53	89
西班牙	46	1.4	92	15	1 462.9	31 650	1 458.2	31 550	−0.7	79	85	98
斯里兰卡	20	0.9	324	24	46.7	2 290	103.8	5 070	7.2	71	78	91
苏丹	44	2.4	18	39	55.3	1 270	87.9	2 020	1.9	57	60	70
瑞典	9	0.6	23	16	469.0	49 930	372.0	39 600	4.5	79	83	..
瑞士	8	0.8	193	15	548.0	70 350	383.1	49 180	1.8	80	84	..
叙利亚	22	2.7	115	35	57.0	2 640	105.3	4 870	0.7	73	76	84
塔吉克斯坦	7	1.4	50	36	5.5	780	14.6	2 060	2.0	64	70	100
坦桑尼亚	45	2.8	49	45	23.4[h]	530[h]	62.1[h]	1 420[h]	3.9[h]	56	57	73
泰国	68	0.9	133	21	286.7	4 210	561.5	8 240	7.2	66	72	94
多哥	7	2.6	122	40	3.0	440	5.4	790	0.9	61	65	57
突尼斯	11	1.0	67	23	42.8	4 070	85.8	8 140	2.7	73	77	78
土耳其	76	1.3	97	26	719.4	9 500	1 104.1	14 580	7.7	70	75	91
土库曼斯坦	5	1.4	11	29	19.2	3 700	37.1[d]	7 160[d]	6.7	61	69	100
乌干达	34	3.2	166	49	16.6	490	41.5	1 230	1.8	53	54	73
乌克兰	46	−0.7	79	14	137.9	3 010	301.1	6 580	4.8	64	75	1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	3.7	55	19	..	..[i]	..	..	..	77	79	90
英国	62	0.6	256	17	2 399.3	38 540	2 276.9	36 580	0.6	78	82	..
美国	310	0.9	34	20	14 600.8	47 140	14 561.7	47 020	2.0	76	81	..
乌拉圭	3	0.2	19	23	35.6	10 590	46.6	13 890	8.1	73	80	98
乌兹别克斯坦	28	1.3	65	29	36.1	1 280	87.1[d]	3 090[d]	7.0	65	71	99
委内瑞拉	29	1.7	32	29	334.1	11 59 0	344.5	11 950	−3.4	71	77	95
越南	88	1.3	281	25	96.9	1 100	257.2	2 910	5.5	73	77	93
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	4	3.2	672	44	..	..[j]	..		..	72	75	95
也门共和国	24	2.9	45	43	*25.0*	*1 060*	*54.7*	*2 320*	..	62	65	62
赞比亚	13	2.4	17	46	13.8	1 070	17.7	1 370	5.9	46	47	71
津巴布韦	13	0.2	32	39	5.8	460	..	..	8.0	45	46	92
全世界	**6 855s**	**1.2w**	**52w**	**27w**	**62 364.1t**	**9 097w**	**75 803.5t**	**11 058w**	**3.0w**	**67w**	**71w**	**84w**
低收入国家	817	2.2	53	39	416.8	510	1 018.1	1 246	3.6	56	59	61
中等收入国家	4 915	1.2	60	27	18 503.1	3 764	33 326.1	6 780	6.5	67	71	83
下中等收入国家	2 467	1.6	107	32	4 090.2	1 658	9 128.1	3 701	5.7	63	67	71
上中等收入国家	2 449	0.7	42	22	14 410.0	5 884	24 254.3	9 904	7.0	70	75	93
中低收入国家	5 732	1.3	59	29	18 939.8	3 304	34 344.5	5 991	6.3	65	69	80
东亚和太平洋	1 957	0.8	123	22	7 223.3	3 691	12 961.6	6 623	8.8	71	74	94
欧洲和中亚	408	0.2	18	19	2 944.8	7 214	5 388.5	13 200	5.2	66	75	9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578	1.2	28	28	4 509.7	7 802	6 329.6	10 951	5.1	71	77	91
中东和北非	337	1.8	38	31	1 293.0	3 839	*2 598.0*	*7 851*	..	69	73	74
南亚	1 591	1.5	329	32	1 929.8	1 213	5 103.4	3 208	7.3	63	66	61
撒哈拉以南非洲	862	2.5	36	42	1 003.6	1 165	1 816.6	2 108	2.3	51	54	62
高收入国家	1 123	0.7	33	17	43 412.3	38 658	41 755.9	37 183	2.5	77	83	98

a. 采用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计算。b. PPP 即购买力平价，见技术注释。c. 估算为低收入（1 005 美元或更低）。d. 估算基于回归分析得出；其他数据来自基于 2005 年国际比较项目基线估算的推断。e. 不包括哈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数据。f. 不包括德涅斯特的数据。g. 包括原西属撒哈拉。h. 仅指坦桑尼亚大陆的数据。i. 估算为高收入国家（12 276 美元或更高）。j. 估算为下中等收入国家（收入为 1 006～3 975 美元）。

表 2 贫困

	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a]				低于国际贫困线人口[a]							
	调查年份[c]	国家/%	调查年份[c]	国家/%	调查年份[c]	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距贫困线缺口为 1.25 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的人口比重/%	调查年份[c]	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距贫困线缺口为 1.25 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的人口比重/%
阿富汗		..	2008[d]	36.0[e]	..	..	..	..	..	..		
阿尔巴尼亚	2005	18.5[e]	2008	12.4[e]	2005	<2	<0.5	7.9	2008	<2	<0.5	4.3
阿尔及利亚		..		..	1988	6.6	1.8	23.8	1995	6.8	1.4	23.6
安哥拉		..		..		..	..	..	2000[f]	54.3	29.9	70.2
阿根廷		..		..	2006[f,h]	2.8	0.6	8.0	2009[f,h]	<2	<0.5	<2
亚美尼亚	2008	23.5[e]	2009	26.5[e]	2003	10.6	1.9	43.5	2008	<2	<0.5	12.4
澳大利亚		..		..		..	..	..		..	..	..
奥地利		..		..		..	..	..		..	..	..
阿塞拜疆	2001	49.6[e]	2008	15.8[e]	2005	<2	<0.5	<2	2008	<2	<0.5	7.8
孟加拉国	2000	48.9	2005	40.0	2000[i]	57.8	17.3	85.4	2005[i]	49.6	13.1	81.3
白俄罗斯	2008	6.1	2009	5.4	2005	<2	<0.5	<2	2008	<2	<0.5	<2
比利时		..		..		..	..	..		..	..	..
贝宁		..	2003[d]	39.0		..	..	..	2003	47.3	15.7	75.3
玻利维亚	2006[g]	59.9	2007[g]	60.1	2005[h]	19.6	9.7	30.4	2007[h]	14.0	5.8	24.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004	17.7[e]	2007	14.0[e]	2004	<2	<0.5	<2	2007	<2	<0.5	<2
巴西	2008[g]	22.6	2009[g]	21.4	2008[h]	4.3	1.4	10.4	2009[h]	3.8	1.1	9.9
保加利亚	1997	36.0[e]	2001	12.8[e]	2003	<2	<0.5	2.4	2007	<2	<0.5	7.3
布基纳法索		..	2003[d]	46.4	1998	70.0	30.2	87.6	2003	56.5	20.3	81.2
布隆迪		..	2006[d]	66.9	1998	86.4	47.3	95.4	2006	81.3	36.4	93.5
柬埔寨	2004	34.7[e]	2007	30.1[e]	2004	40.2	11.3	68.2	2007	28.3	6.1	56.5
喀麦隆		..	2007[d]	39.9	2001	32.8	10.2	57.7	2007	9.6	1.2	30.8
加拿大		..		..		..	..	..		..	..	..
中非共和国		..	2008[d]	62.0	1993	82.8	57.0	90.8	2003	62.4	28.3	81.9
乍得		..	2003[d]	55.0		..	..	..	2003	61.9	25.6	83.3
智利	2006[g]	13.7	2009[g]	15.1	2006[h]	<2	<0.5	2.4	2009[h]	<2	<0.5	<2
中国		..		..	2002[j]	28.4	8.7	51.1	2005[j]	15.9	4.0	36.3
中国香港		..		..		..	..	..		..	..	..
哥伦比亚	2008[g]	46.0	2009[g]	45.5	2003[h]	15.4	6.1	26.3	2006[h]	16.0	5.7	27.9
刚果民主共和国		..	2005	71.3		..	..	..	2006	59.2	25.3	79.6
刚果共和国		..	2005	50.1		..	..	..	2005	54.1	22.8	74.4
哥斯达黎加	2008[g]	20.7	2009[g]	21.7	2005[h]	2.4	<0.5	8.6	2009[h]	<2	<0.5	4.8
科特迪瓦		..		..		..	..	..		..	..	..
克罗地亚	2002	11.2	2004	11.1	2005	<2	<0.5	<2	2008	<2	<0.5	<2
捷克共和国		..		..	1993[h]	<2	<0.5	<2	1996[h]	<2	<0.5	<2
丹麦		..		..		..	..	..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05[g]	53.5	2006[g]	49.4	2006[h]	4.0	0.7	13.5	2007[h]	4.3	0.9	13.6
厄瓜多尔	2008[g]	35.1	2009[g]	36.0	2007[h]	4.7	1.2	12.8	2009[h]	5.1	1.6	13.4
埃及	2005	19.6	2008	22.0	2000	<2	<0.5	19.4	2005	<2	<0.5	18.5
萨尔瓦多	2007[g,k]	34.6	2008[g,k]	40.0	2005[h]	11.0	4.8	20.5	2008[h]	5.1	1.1	15.2
厄立特里亚		..		..		..	..	..		..	..	..
埃塞俄比亚	2000	44.2	2005	38.9	2000	55.6	16.2	86.4	2005	39.0	9.6	77.6
芬兰		..		..		..	..	..		..	..	..
法国		..		..		..	..	..		..	..	..
格鲁吉亚		..	2007	23.6[e]	2005	13.4	4.4	30.4	2008	14.7	4.6	32.6
德国		..		..		..	..	..		..	..	..
加纳	1998	39.5	2006	28.5	1998	39.1	14.4	63.3	2006	30.0	10.5	53.6
希腊		..		..		..	..	..		..	..	..
危地马拉	2000[g]	56.2	2006[g]	51.0	2002[h]	16.9	6.5	29.8	2006[h]	12.7	3.8	25.7
几内亚		..	2007[d]	53.0	2003	70.1	32.2	87.2	2007	43.8	15.2	70.0
海地		..	2001[g]	77.0		..	..	..	2001[h]	54.9	28.2	72.2
洪都拉斯	2008[g,k]	59.6	2009[g,k]	58.8	2006[h]	18.2	8.2	29.7	2007[h]	23.2	11.3	35.6
匈牙利		..		..	2004	<2	<0.5	<2	2007	<2	<0.5	<2
印度	1994	36.0	2005	27.5	1994[j]	49.4	13.6	81.7	2005[j]	41.6	10.5	75.6
印度尼西亚	2009	14.2	2010	13.3	2005[j]	21.4	4.6	53.8	2009[j]	18.7	3.6	50.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		..	..	..		..	..	..
伊拉克		..	2007	22.9		..	..	..	2007	4.0	0.6	25.3
爱尔兰		..		..		..	..	..		..	..	..
以色列		..		..		..	..	..		..	..	..
意大利		..		..		..	..	..		..	..	..
日本		..		..		..	..	..		..	..	..
约旦	2002	14.2	2006	13.0	2003	<2	<0.5	11.0	2006	<2	<0.5	3.5
哈萨克斯坦	2001	17.6[e]	2002	15.4[e]	2003	3.1	<0.5	17.2	2007	<2	<0.5	<2
肯尼亚		..	2005[d]	45.9	1997	19.6	4.6	42.7	2005	19.7	6.1	39.9
韩国		..		..		..	..	..		..	..	..
吉尔吉斯共和国	2003	49.9[e]	2005	43.1[e]	2004	21.8	4.4	51.9	2007	<2	<0.5	29.4
老挝	2002	33.5[e]	2008	27.6[e]	2002	44.0	12.1	76.9	2008	33.9	9.0	66.0
黎巴嫩		..		..		..	..	..		..	..	..
利比里亚		..	2007	63.8[e]		..	..	..	2007	83.7	40.8	94.8
利比亚		..		..		..	..	..		..	..	..
立陶宛		..		..	2004	<2	<0.5	<2	2008	<2	<0.5	<2

（续）

	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a]				低于国际贫困线人口[a]							
	调查年份[c]	国家/%	调查年份[c]	国家/%	调查年份[c]	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距贫困线缺口为1.25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比重/%	调查年份[c]	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距贫困线缺口为1.25美元的人口比重/%	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比重/%
马达加斯加	2004	72.1	2005	68.7	2001	76.3	41.4	88.8	2005	67.8	26.5	89.6
马拉维	1998	54.1	2004	52.4	1998	83.1	46.0	93.5	2004	73.9	32.3	90.5
马来西亚	2007	3.6[e]	2009	3.8[e]	2004[h]	<2	<0.5	7.8	2009[h]	<2	<0.5	<2
马里		..	2006[d]	47.4	2001	61.2	25.8	82.0	2006	51.4	18.8	77.1
毛里塔尼亚		..	2000[d]	46.3	1996	23.4	7.1	48.3	2000	21.2	5.7	44.1
墨西哥	2006[g]	42.6	2008[g]	47.4	2006	<2	<0.5	4.8	2008	<2	<0.5	8.6
摩尔多瓦	2004	26.5[e]	2005	29.0[e]	2004	8.1	1.7	29.0	2008	<2	<0.5	12.5
摩洛哥		..	2001	15.3	2001	6.3	0.9	24.3	2007	2.5	0.5	14.0
莫桑比克	2003	54.1	2008	54.7	2003	74.7	35.4	90.0	2008	60.0	25.2	81.6
缅甸		..		..		..	..	..		..	..	..
尼泊尔	1996	41.8	2004	30.9	1996	68.4	26.7	88.1	2004	55.1	19.7	77.6
荷兰		..		..		..	..	..		..	..	..
新西兰		..		..		..	..	..		..	..	..
尼加拉瓜	2001[g]	45.8	2005[g]	46.2	2001[h]	19.4	6.7	37.5	2005[h]	15.8	5.2	31.9
尼日尔		..	2007[d]	59.5	2005	65.9	28.1	85.6	2007	43.1	11.9	75.9
尼日利亚		..	2004[d]	54.7	1996	68.5	32.1	86.4	2004	64.4	29.6	83.9
挪威		..		..		..	..	..		..	..	..
巴基斯坦	2005	23.9	2006	22.3	2005	22.6	4.4	60.3	2006	22.6	4.1	61.0
巴拿马	2003	36.8	2008	32.7	2006[h]	9.5	3.1	17.9	2009[h]	2.4	<0.5	9.5
巴布亚新几内亚		..		..		..	..	..	1996	35.8	12.3	57.4
巴拉圭	2008[g]	37.9	2009[g]	35.1	2007[h]	6.5	2.7	14.2	2008[h]	5.1	1.5	13.2
秘鲁	2008	36.2	2009	34.8	2006[h]	7.9	1.9	18.5	2009[h]	5.9	1.4	14.7
菲律宾	2006	26.4	2009	26.5	2003	22.0	5.5	43.8	2006	22.6	5.5	45.0
波兰	2001	15.6[e]	2002	16.6[e]	2005	<2	<0.5	<2	2008	<2	<0.5	<2
葡萄牙		..		..		..	..	..		..	..	..
罗马尼亚	2005	15.1[e]	2006	13.8[e]	2005	<2	<0.5	3.4	2008	<2	<0.5	<2
俄罗斯联邦	2005	11.9[e]	2006	11.1[e]	2005	<2	<0.5	<2	2008	<2	<0.5	<2
卢旺达		..	2006[d]	58.5	2000	76.6	38.2	90.3	2006	76.8	40.9	89.6
沙特阿拉伯		..		..		..	..	..		..	..	..
塞内加尔		..	2005[d]	50.8[e]	2001	44.2	14.3	71.3	2005	33.5	10.8	60.4
塞尔维亚	2006	9.0[e]	2007	6.6[e]		..	..	..	2008	<2	<0.5	<2
塞拉利昂		..	2003[d]	66.4	1990	62.8	44.8	75.0	2003	53.4	20.3	76.1
新加坡		..		..		..	..	..		..	..	..
斯洛伐克共和国		..		..	1992[h]	<2	<0.5	<2	1996[h]	<2	<0.5	<2
索马里		..		..		..	..	..		..	..	..
南非	2000	38.0	2005	23.0	1995	21.4	5.2	39.9	2000	26.2	8.2	42.9
西班牙		..		..		..	..	..		..	..	..
斯里兰卡	2002	22.7	2007	15.2	2002	14.0	2.6	39.7	2007	7.0	1.0	29.1
苏丹		..		..		..	..	..		..	..	..
瑞典		..		..		..	..	..		..	..	..
瑞士		..		..		..	..	..		..	..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		..	..	..	2004	<2	<0.5	16.9
塔吉克斯坦	2007	53.1[e]	2009	47.2[e]	2003	36.3	10.3	68.8	2004	21.5	5.1	50.9
坦桑尼亚	2000	35.6	2007	33.4	2000	88.5	46.8	96.6	2007	67.9	28.1	87.9
泰国	2008	9.0	2009	8.1	2004	<2	<0.5	11.5	2009	12.8	2.4	26.5
多哥		..	2006	61.7		..	..	..	2006	38.7	11.4	69.3
突尼斯		..		..	1995	6.5	1.3	20.4	2000	2.6	<0.5	12.8
土耳其	2008	17.1	2009	18.1		..	..	..		..	..	..
土库曼斯坦		..		..	1993[h]	63.5	25.8	85.7	1998	24.8	7.0	49.7
乌干达	2005	31.1	2009	24.5	2005	51.5	19.1	75.6	2009	37.7	12.1	64.5
乌克兰	2004	14.0[e]	2005	7.9[e]	2005	<2	<0.5	<2	2008	<2	<0.5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		..	..	..		..	..	..
英国		..		..		..	..	..		..	..	..
美国		..		..		..	..	..		..	..	..
乌拉圭	2007[g]	26.0	2008[g]	20.5	2006[h]	<2	<0.5	4.2	2009[h]	<2	<0.5	<2
乌兹别克斯坦		..		..	2002	42.3	12.4	75.6	2003	46.3	15.0	76.7
委内瑞拉	2008[g]	32.6	2009[g]	29.0	2005[h]	10.0	4.5	19.8	2006[h]	3.5	1.1	10.2
越南	2006	16.0	2008	14.5	2006	21.5	4.6	48.4	2008	13.1	2.3	38.4
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	2007	31.2	2009	21.9		..	..	..		..	..	..
也门共和国	1998	40.1	2005	34.8	1998	12.9	3.0	36.4	2005	17.5	4.2	46.6
赞比亚	2004	58.4	2006	59.3	2003	64.6	27.1	85.2	2004	64.3	32.8	81.5
津巴布韦		..	2003[d]	72.0		..	..	..		..	..	..

a. 除非另有说明，指基于家庭调查数据估算的人均消费。b. 除非另有说明，指基于家庭调查数据估算的名义消费人均值和分布。c. 指底层家庭调查数据的采集年份。在数据采集期间跨越了两个年度的情况下，指大部分数据得到了采集和报告的年份。d. 估算基于早年可获取的调查数据，但与此处最近年份的报告不具有可比性。这些可以通过 data. worldbank. org 在线获取。e. 世界银行估算。f. 只覆盖城镇地区。g. 基于家庭调查数据估算的人均收入。h. 从家庭调查数据估算的人均收入均值和分布数据。i. 通过空间消费价格指数数据调整后。j. 城乡估算值的加权平均值。k. 以家庭比例测算。

表 3 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困、改善生活

	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			普及初等小学教育状况	促进性别平等	降低儿童死亡率	改进孕产妇健康	抗击艾滋病和其他疾病		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发展建立全球性的合作关系
	最贫困的 20% 人口占国民消费或收入的比例/%	弱势群体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5 岁以下儿童面临营养不良状况的比例/%	初等教育完成率/%	中小学中女生和男生的入学比例/%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人)	每 10 万婴儿活着出生的产妇死亡率	艾滋病毒在 15 ~ 49 岁人群中的普及率/%	结核发病率(每 10 万人)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吨	改善后的卫生设施获取渠道与人口的比例/%	每 100 人中的网络用户数量[a]
	1995 – 2009[b]	2009	2004 – 09[b]	2009	2009	2009	2008	2009	2009	2007	2008	2009
阿富汗	9.0[c]	..	32.9	..	62	199	1 400	..	189	0.0	37	3.4
阿尔巴尼亚	8.1[c]	..	6.6	90	100	15	31	..	15	1.4	98	41.2
阿尔及利亚	6.9[c]	..	3.7	91	98	32	120	0.1	59	4.1	95	13.5
安哥拉	2.0[c,d]	..	..	..	..	161	610	2.0	298	1.4	57	3.3
阿根廷	4.1[d,e]	20[f]	2.3	*105*	*105*	14	70	0.5	28	4.6	90	30.4
亚美尼亚	8.8[c]	*38*	4.2	*98*	103	22	29	0.1	73	1.6	90	6.8
澳大利亚	..	9	..	..	98	5	8	0.1	6	17.7	100	72.0
奥地利	8.6[e]	9	..	97	97	4	5	0.3	11	8.3	100	73.5
阿塞拜疆	8.0[c]	*55*	8.4	92	102	34	38	0.1	110	3.7	45	42.0
孟加拉国	9.4[c]	.	41.3	61	*108*	52	340	<0.1	225	0.3	53	0.4
白俄罗斯	9.2[c]	..	1.3	*96*	102[h]	12	15	0.3	39	6.9	93	45.9
比利时	8.5[e]	10	..	87	98	5	5	0.2	9	9.7	100	75.2
贝宁	6.9[c]	..	20.2	62	..	118	410	1.2	93	0.5	12	2.2
玻利维亚	2.8[e]	*57*	4.5	*99*	*99*	51	180	0.2	140	1.4	25	11.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7[c]	..	1.6	..	102	14	9	..	50	7.7	95	37.7
巴西	3.3[e]	25	2.2	..	*103*	21	58	..	45	1.9	80	39.2
保加利亚	5.0[c]	9	1.6	94	97	10	13	0.1	41	6.8	100	44.8
布基纳法索	7.0[c]	..	26.0	47[h]	88[h]	166	560	1.2	215	0.1	11	1.1
布隆迪	9.0[c]	..	..	52	93	166	970	3.3	348	0.0	46	0.8
柬埔寨	6.6[c]	..	28.8	*79*	*90*	88	290	0.5	442	0.3	29	0.5
喀麦隆	5.6[c]	..	16.6	73	86	154	600	5.3	182	0.3	47	3.8
加拿大	7.2[e]	..	..	..	*99*	6	12	0.2	5	16.9	100	77.7
中非共和国	5.2[c]	..	..	40[h]	69[h]	171	850	4.7	327	0.1	34	0.5
乍得	6.3[c]	..	33.9	33	64	209	1 200	3.4	283	0.0	9	1.7
智利	4.1[e]	25	0.5	*95*	*99*	9	26	0.4	11	4.3	96	34.0
中国	5.7[e]	..	4.5	..	105	19	38	0.1[g]	96	5.0	55	28.8
中国香港	5.3[e]	7[f]	..	93	102	..	..	..	82	5.8	..	61.4
哥伦比亚	2.5[e]	48	5.1	115	105	19	85	0.5	35	1.4	74	45.5
刚果民主共和国	5.5[c]	..	28.2	56	77	199	670	..	372	0.0	23	0.6
刚果共和国	5.0[c]	..	11.8	74	..	128	580	3.4	382	0.4	30	6.7
哥斯达黎加	4.2[e]	*20*	..	96	102	11	44	0.3	10	1.8	95	34.5
科特迪瓦	5.6[c]	..	16.7	46	..	119	470	3.4	399	0.3	23	4.6
克罗地亚	8.1[c]	17	1.0	97	102	5	14	<0.1	25	5.6	99	50.4
捷克共和国	10.2[e]	13	..	99	101	4	8	<0.1	9	12.1	98	63.7
丹麦	8.3[e]	5	..	97	102	4	5	0.2	7	9.1	100	85.9
多米尼加共和国	4.4[e]	*42*	3.4	90	97	32	100	0.9	70	2.1	83	26.8
厄瓜多尔	4.2[e]	42[f]	6.2	*106*	*102*	24	140	0.4	68	2.2	92	15.1
埃及	9.0[c]	*27*	6.8	96	96	21	82	<0.1	19	2.3	94	20.0
萨尔瓦多	4.3[e]	*37*	..	*89*	*98*	17	110	0.8	30	1.1	87	14.4
厄立特里亚	..	..	..	48	77	55	280	0.8	99	0.1	14	4.9
埃塞俄比亚	9.3[c]	..	34.6	55	88	104	470	..	359	0.1	12	0.5
芬兰	9.6[e]	10	..	97	102	3	8	0.1	9	12.1	100	83.9
法国	7.2[e]	*7*	..	..	100	4	8	0.4	6	6.0	100	71.3
格鲁吉亚	5.3[c]	*63*	2.3	107	*96*	29	48	0.1	107	1.4	95	30.5
德国	8.5[e]	*7*	1.1	104	96	4	7	0.1	5	9.6	100	79.5
加纳	5.2[c]	..	14.3	83	95	69	350	1.8	201	0.4	13	5.4
希腊	6.7[e]	27	..	*101*	*97*	3	2	0.1	5	8.8	98	44.1
危地马拉	3.4[e]	..	..	80	*94*	40	110	0.8	62	1.0	81	16.3
几内亚	6.4[c]	..	20.8	62	77	142	680	1.3	318	0.1	19	0.9
海地	2.5[e]	..	18.9	..	..	87	300	1.9	238	0.2	17	10.0
洪都拉斯	2.0[e]	*50*	8.6	*90*	*107*	30	110	0.8	58	1.2	71	9.8
匈牙利	8.4[c]	7	..	95	99	6	13	<0.1	16	5.6	100	61.6
印度	8.1[c]	..	43.5	*95*	*92*	66	230	0.3	168	1.4	31	5.3
印度尼西亚	7.6[c]	64	17.5[h]	109	98	39	240	0.2	189	1.8	52	8.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4[c]	*42*	..	101	97	31	30	0.2	19	7.0	..	38.3
伊拉克	..	..	7.1	*64*	*81*	44	75	..	64	3.3	73	1.0
爱尔兰	7.4[e]	12	..	..	103	4	3	0.2	9	10.2	99	68.4
以色列	5.7[e]	*7*	..	102	102	4	7	0.2	5	9.3	100	49.7
意大利	6.5[e]	18	..	*104*	*99*	4	5	0.3	6	7.7	..	48.5
日本	..	10	..	102	100	3	6	<0.1	21	9.8	100	77.7
约旦	7.2[c]	10	1.9	*99*	*102*	25	59	..	6	3.8	98	29.3
哈萨克斯坦	8.7[c]	*32*	4.9	108[h]	99[h]	29	45	0.1	163	14.7	97	33.4
肯尼亚	4.7[c]	..	16.4	..	95	84	530	6.3	305	0.3	31	10.0
韩国	7.9[e]	24	..	101	97	5	18	<0.1	90	10.4	100	80.9
吉尔吉斯共和国	8.8[c]	..	2.7	94	101	37	81	0.3	159	1.2	93	41.2
老挝	7.6[c]	..	31.6	*75*	*87*	59	580	0.2	89	0.3	53	4.7
黎巴嫩	..	*28*	4.2	85	104	12	26	0.1	15	3.2	..	23.7
利比里亚	6.4[e]	*80*	20.4	*58*	..	112	990	1.5	288	0.2	17	0.5
利比亚	..	..	5.6	..	..	19	64	..	40	9.3	97	5.5
立陶宛	6.6[c]	10	..	96	99	6	13	0.1	71	4.5	..	58.8
马达加斯加	6.2[c]	..	36.8	79	97	58	440	0.2	261	0.1	11	1.6
马拉维	7.0[c]	..	15.5	59	100	110	510	11.0	304	0.1	56	4.7
马来西亚	4.5[e]	22	..	*97*	*103*	6	31	0.5	83	7.3	96	57.6
马里	6.5[c]	..	27.9	64[h]	80[h]	191	830	1.0	324	0.0	36	1.9
毛里塔尼亚	6.2[c]	..	16.7	*64*	*103*	117	550	0.7	330	0.6	26	2.3

（续）

	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			普及初等小学教育状况	促进性别平等	降低儿童死亡率	改进孕产妇健康	抗击艾滋病和其他疾病		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发展建立全球性的合作关系
	最贫困的20%人口占国民消费或收入的比例/%	弱势群体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5岁以下儿童面临营养不良状况的比例/%	初等教育完成率/%	中小学中女生和男生的入学比例/%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人)	每10万婴儿活着出生的产妇死亡率	艾滋病毒在15～49岁人群中的普及率/%	结核发病率(每10万人)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公吨	改善后的卫生设施获取渠道与人口的比例/%	每100人中的网络用户数量[a]
	1995－2009[b]	2009	2004－09[b]	2009	2009	2009	2008	2009	2009	2007	2008	2009
墨西哥	3.9[e]	30	3.4	104	102	17	85	0.3	17	4.5	85	26.5
摩尔多瓦	6.8[e]	29	3.2	93	101	17	32	0.4	178	1.3	79	35.9
摩洛哥	6.5[e]	51	9.9	80	*88*	38	110	0.1	92	1.5	69	32.2
莫桑比克	5.2[e]	..	..	61[h]	89[h]	142	550	11.5	409	0.1	17	2.7
缅甸	..	..	..	99	100	71	240	0.6	404	0.3	81	0.2
尼泊尔	6.1[e]	..	38.8	..	..	48	380	0.4	163	0.1	31	2.1
荷兰	7.6[e]	10	..	..	99	4	9	0.2	8	10.6	100	90.0
新西兰	6.4[e]	11	..	..	102	6	14	0.1	8	7.7	..	83.4
尼加拉瓜	3.8[e]	*45*	4.3	*75*	*102*	26	100	0.2	44	0.8	52	3.5
尼日尔	8.3[e]	..	39.9	41[h]	78[h]	160	820	0.8	181	0.1	9	0.8
尼日利亚	5.1[e]	..	26.7	*79*	*85*	138	840	3.6	295	0.6	32	28.4
挪威	9.6[e]	6	..	100	99	3	7	0.1	6	9.1	100	91.8
巴基斯坦	9.0[e]	*63*	..	61	82	87	260	0.1	231	1.0	45	12.0
巴拿马	3.6[e]	*27*	..	102	101	23	71	0.9	48	2.2	69	27.8
巴布亚新几内亚	4.5[e]	..	18.1	..	..	68	250	0.9	250	0.5	45	1.9
巴拉圭	3.8[e]	45	..	93	100	23	95	0.3	47	0.7	70	15.8
秘鲁	3.9[e]	*40*[f]	5.4	*101*	*99*	21	98	0.4	113	1.5	68	27.7
菲律宾	5.6[e]	*44*[f]	..	*94*	*102*	33	94	<0.1	280	0.8	76	6.5
波兰	7.6[e]	19	..	95	100	7	6	0.1	24	8.3	90	58.8
葡萄牙	5.8[e]	18	..	..	101	4	7	0.6	30	5.5	100	48.6
罗马尼亚	8.1[e]	31	..	96	99	12	27	0.1	125	4.4	72	36.2
俄罗斯联邦	6.0[e]	*6*	..	*95*	*98*	12	39	1.0	106	10.8	87	42.1
卢旺达	4.2[e]	..	18.0	*54*	100	111	540	2.9	376	0.1	54	4.5
沙特阿拉伯	..	..	5.3	88	91	21	24	..	18	16.6	..	38.6
塞内加尔	6.2[e]	..	14.5	57	*95*	93	410	0.9	282	0.5	51	7.4
塞尔维亚	9.1[e]	28	1.8	96	101	7	8	0.1	21	..	92	56.1
塞拉利昂	6.1[e]	..	21.3	*88*	..	192	970	1.6	644	0.2	13	0.3
新加坡	5.0[e]	10	..	..	..	3	9	0.1	36	11.8	100	73.3
斯洛伐克共和国	8.8[e]	12	..	97	101	7	6	<0.1	9	6.8	100	75.0
索马里	..	..	32.8	..	*53*	180	1 200	0.7	285	0.1	23	1.2
南非	3.1[e]	10	..	93	99	62	410	17.8	971	9.0	77	9.0
西班牙	7.0[e]	11	..	103	102	4	6	0.4	17	8.0	100	61.2
斯里兰卡	6.9[e]	40[f]	21.6	97	..	15	39	<0.1	66	0.6	91	8.7
苏丹	..	..	31.7	57	89	108	750	1.1	119	0.3	34	9.9
瑞典	9.1[e]	*7*	..	95	99	3	5	0.1	6	5.4	100	90.3
瑞士	7.6[e]	9	..	96	98	4	10	0.4	5	5.0	100	70.9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7.7[e]	*38*	10.0	112	97	16	46	..	21	3.5	96	18.7
塔吉克斯坦	9.3[e]	..	14.9	*98*	*91*	61	64	0.2	202	1.1	94	10.1
坦桑尼亚	6.8[e]	..	16.7	102	96	108	790	5.6	183	0.1	24	1.5
泰国	3.9[e]	53	7.0	..	103	14	48	1.3	137	4.1	96	25.8
多哥	5.4[e]	..	22.3	61	*75*	98	350	3.2	446	0.2	12	5.4
突尼斯	5.9[e]	..	3.3	90	103	21	60	<0.1	24	2.3	85	33.5
土耳其	5.7[e]	34	3.5	*93*	*93*	20	23	<0.1	29	4.0	90	35.3
土库曼斯坦	6.0[e]	..	..	..	..	45	77	..	67	9.2	98	1.6
乌干达	5.8[e]	..	16.4	73	99	128	430	6.5	293	0.1	48	9.8
乌克兰	9.4[e]	..	..	95	99	15	26	1.1	101	6.8	95	33.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1*	..	99	100	7	10	..	4	31.0	97	82.2
英国	6.1[e]	11	..	..	*101*	6	12	0.2	12	8.8	100	83.2
美国	5.4[e]	..	1.3	96	101	8	24	0.6	4	19.3	100	78.1
乌拉圭	5.6[e]	*25*[f]	6.0	*106*	*104*	13	27	0.5	22	1.9	100	55.5
乌兹别克斯坦	7.1[e]	..	4.4	92	99	36	30	0.1	128	4.3	100	16.9
委内瑞拉	4.9[e]	31	3.7	95	102	18	68	..	33	6.0	..	31.2
越南	7.3[e]	..	20.2	..	..	24	56	0.4	200	1.3	75	27.5
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	..	27	2.2	82	104	30	..	..	19	0.6	89	8.8
也门共和国	7.2[e]	..	..	*61*	..	66	210	..	54	1.0	52	1.8
赞比亚	3.6[e]	..	14.9	87	96	141	470	13.5	433	0.2	49	6.3
津巴布韦	4.6[e]	..	14.0	..	..	90	790	14.3	742	0.8	44	11.4
全世界		**..w**	**21.3w**	**88w**	**96w**	**61w**	**260w**	**0.8w**	**137w**	**4.6w,i**	**61w**	**27.1**
低收入国家		..	27.7	65	91	119	590	2.6	296	0.3	36	2.6
中等收入国家		..	20.8	92	97	52	210	0.7	139	3.3	56	20.7
下中等收入国家		..	24.0	88	93	71	300	0.7	179	1.5	46	10.3
上中等收入国家		..	..	98	103	21	60	0.7	99	5.0	68	31.1
中低收入国家		..	22.4	87	96	66	290	0.9	161	2.9	54	18.2
东亚和太平洋		..	8.8	97	103	26	89	0.2	136	4.0	59	24.1
欧洲和中亚		18	..	95	97	21	34	0.6	89	7.2	89	36.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0	3.8	102	102	23	86	0.5	45	2.7	79	31.5
中东和北非		37	6.8	88	93	33	88	0.1	39	3.7	84	21.5
南亚		..	42.5	86	92	71	290	0.3	180	1.2	36	5.5
撒哈拉以南非洲		..	24.7	67	89	130	650	5.5	342	0.8	31	8.8
高收入国家		..	..	97	100	7	15	0.3	14	12.5	100	72.3

a. 数据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发展报告数据库。第三方使用这些数据时请注明引自国际电信联盟。b. 这是近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c. 指一定人口比例的支持份额，以人均支出排名。d. 城镇数据。e. 指一定人口比例的支持份额，以人均支出排名。f. 数据覆盖面有限。g. 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数据。i. 2010 年数据。k. 包括未分配给特定国家的排放量。

表 4 经济活动

	国内生产总值		农业生产率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差额	GDP 平均隐含平减指数
	百万美元	年均增长率/%	每个农业工人的农业增加值，以 2 000 美元计算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在 GDP 中的比重/%	在 GDP 中的比重/%	在 GDP 中的比重/%	在 GDP 中的比重/%	年均增长率/%
	2010	2000－10	1990－92	2005－07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0－10
阿富汗	*11 757*	..	..	..	*29*	*26*	*45*	*88*	*9*	*25*	*－32*	*8. 3*
阿尔巴尼亚	11 786	5. 4	837	1 663	21	20	60	87	10	29	－26	3. 3
阿尔及利亚	159 426	3. 8	1 823	2 232	12	55	34	41	14	41	4	8. 3
安哥拉	84 391	12. 9	176	222	10	59	31	..	..	15	6	36. 1
阿根廷	368 712	5. 6	6 919	11 192	8	32	61	59	15	21	5	13. 0
亚美尼亚	9 265	9. 1	1 607[a]	4 510	21	35	45	82	11	32	－25	0. 5
澳大利亚	*924 843*	*3. 3*	*20 676*	*30 830*	*3*	*29*	*68*	*57*	*17*	*28*	*－2*	*4. 0*
奥地利	376 162	1. 9	13 607	20 508	2	29	69	54	20	21	5	1. 7
阿塞拜疆	51 092	17. 1	1 000[a]	1 198	8	60	32	37	14	22	28	9. 5
孟加拉国	100 076	5. 9	255	387	19	29	53	77	5	24	－7	5. 4
白俄罗斯	54 713	8. 2	2 042[a]	4 007	10	42	48	57	17	38	－11	21. 4
比利时	467 472	1. 6	..	38 913	1	22	78	52	25	20	3	2. 1
贝宁	6 633	4. 0	429	661	..	..	..	..	..	25	－14	3. 3
玻利维亚	19 786	4. 1	703	732	14	36	50	66	15	17	3	6. 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6 888	4. 6	..	10 352	8	28	64	80	23	22	－25	3. 9
巴西	2 087 890	3. 7	1 611	3 310	6	25	69	62	22	17	0	8. 0
保加利亚	47 714	4. 8	4 396	8 204	6	30	64	66	16	26	－8	5. 9
布基纳法索	8 820	5. 5	126	182	*33*	*22*	*44*	*75*	*22*	*18*	*－15*	2. 7
布隆迪	1 611	3. 2	117	70	..	..	..	*91*	*29*	*16*	*－36*	10. 7
柬埔寨	11 343	8. 5	..	366	35	23	42	74	8	21	－3	5. 1
喀麦隆	22 394	3. 2	409	703	*19*	*31*	*50*	*72*	*9*	*18*	－4	2. 1
加拿大	1 574 052	2. 0	28 542	46 233	*2*	*32*	*67*	59	22	21	－2	2. 5
中非共和国	2 013	1. 0	322	404	56	15	29	93	5	11	－8	2. 8
乍得	7 588	9. 0	209	..	*14*	*49*	*38*	79	16	34	－28	5. 4
智利	203 443	4. 0	3 618	6 145	3	43	54	59	14	19	8	6. 2
中国	5 878 629	10. 8	269	459	10	46	43	35	13	48	4	4. 4
中国香港	224 458	4. 6	..	..	0	7	93	62	9	21	7	－1. 1
哥伦比亚	288 189	4. 5	3 123	2 781	7	34	58	64	16	22	－2	5. 9
刚果民主共和国	13 145	5. 3	209	162	43	24	33	75	8	29	－12	26. 6
刚果共和国	11 898	4. 3	..	..	5	71	24	42	12	25	21	7. 4
哥斯达黎加	34 564	4. 8	3 158	5 132	7	27	66	62	17	20	1	9. 9
科特迪瓦	22 780	1. 1	652	875	25	25	50	72	9	11	8	3. 2
克罗地亚	60 852	3. 2	5 546[a]	11 701	7	27	66	57	20	27	－3	3. 9
捷克共和国	192 152	3. 8	..	5 945	2	37	60	51	22	22	6	2. 0
丹麦	310 405	0. 9	15 190	36 627	1	23	77	49	30	17	4	2. 3
多米尼加共和国	51 577	5. 6	2 055	3 829	6	32	61	85	8	15	－8	12. 6
厄瓜多尔	58 910	4. 8	1 801	1 879	7	26	67	66	11	35	－12	8. 0
埃及	218 912	5. 3	1 826	2 758	14	37	49	76	11	19	－7	8. 5
萨尔瓦多	21 796	2. 3	1 774	2 389	12	27	60	92	10	13	－15	3. 5
厄立特里亚	2 117	0. 2	..	118	15	22	63	86	*33*	*11*	－16	16. 7
埃塞俄比亚	29 717	8. 8	..	187	51	11	38	88	8	*22*	－18	11. 5
芬兰	238 801	2. 2	17 520	34 349	3	28	69	54	25	18	2	1. 2
法国	2 560 002	1. 3	22 126	47 910	2	19	79	58	25	19	－2	1. 9
格鲁吉亚[b]	11 667	6. 9	2 359[a]	1 871	10	21	69	83	24	12	－19	6. 9
德国	3 309 669	1. 0	13 863	27 598	1	26	73	59	20	16	5	1. 0
加纳	31 306	5. 9	..	388	32	19	49	82	10	20	－11	26. 2
希腊	304 865	2. 9	7 668	8 980	3	18	79	75	19	16	－11	3. 0
危地马拉	41 190	3. 6	2 304	2 736	12	28	59	87	10	13	－10	5. 5
几内亚	4 511	2. 9	156	311	17	52	31	76	8	21	－5	16. 2
海地	6 710	0. 6	..	..	..	..	..	*92*	*9*	27	－30	14. 2
洪都拉斯	15 400	4. 6	1 227	1 841	12	27	60	80	19	20	－19	6. 3
匈牙利	130 419	1. 9	3 943	8 136	*4*	*29*	*66*	*67*	*9*	*22*	*1*	5. 2
印度	1 729 010	8. 0	359	459	18	27	55	56	12	36	－4	5. 9
印度尼西亚	706 558	5. 3	519	657	15	48	33	57	10	31	3	11.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31 015*	*5. 4*	2 042	2 931	*10*	*44*	*45*	*45*	*11*	*33*	*11*	*16. 4*
伊拉克	82 150	0. 4	..	..	..	..	..	..	..	..	..	11. 1
爱尔兰	203 892	3. 0	..	12 247	1	32	67	51	19	14	15	1. 5
以色列	217 334	3. 6	..	..	..	..	..	57	24	16	2	1. 4
意大利	2 051 412	0. 3	11 714	26 843	2	25	73	60	22	19	0	2. 4
日本	5 497 813	0. 9	20 350	41 492	*1*	*28*	*71*	59	20	21	0	－1. 1
约旦	27 574	6. 7	2 348	2 443	3	32	65	83	24	15	－21	6. 5
哈萨克斯坦	142 987	8. 3	1 781[a]	1 730	6	40	53	50	12	30	8	14. 9
肯尼亚	31 409	4. 3	379	367	23	15	62	76	16	21	－13	6. 1
韩国	1 014 483	4. 1	5 804	14 501	3	36	61	54	16	26	4	2. 3
吉尔吉斯共和国	4 616	4. 4	684[a]	1 018	*29*	*19*	*51*	86	22	22	－30	8. 6
老挝	7 491	7. 1	382	495	34	27	39	43	5	28	－13	8. 7
黎巴嫩	39 155	4. 9	..	31 477	5	17	78	79	15	30	－24	3. 1
利比里亚	986	0. 9	..	..	*61*	*17*	*22*	*202*	*19*	*20*	*－142*	10. 3
利比亚	*62 360*	*5. 4*	..	..	*2*	*78*	*20*	*23*	*9*	*28*	*40*	*17. 9*
立陶宛	36 306	5. 3	..	4 683	3	27	70	69	22	11	－1	3. 9
马达加斯加	8 721	3. 4	210	182	29	16	55	79	12	33	－24	10. 9
马拉维	5 106	5. 2	86	133	31	16	53	62	21	25	－8	15. 8
马来西亚	237 804	5. 0	3 984	5 807	10	44	46	50	14	14	22	3. 8
马里	9 251	5. 2	405	515	*37*	*24*	*39*	*77*	*10*	*22*	*－9*	4. 5
毛里塔尼亚	3 636	4. 4	671	392	21	35	45	72	21	25	－18	10. 7

（续）

	国内生产总值		农业生产率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差额	GDP 平均隐含平减指数
	百万美元	年均增长率/%	每个农业工人的农业增加值，以 2 000 美元计算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在 GDP 中的比重/%	在 GDP 中的比重/%	在 GDP 中的比重/%	在 GDP 中的比重/%	年均增长率/%
	2010	2000－10	1990－92	2005－07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0－10
墨西哥	1 039 662	2. 2	2 274	3 025	4	34	61	68	12	22	－1	7. 4
摩尔多瓦[c]	5 809	5. 2	1 349[a]	1 301	10	13	77	87	22	27	－36	10. 7
摩洛哥[d]	91 196	4. 9	1 788	2 306	16	29	55	57	18	36	－11	2. 1
莫桑比克	9 586	7. 8	117	174	31	24	45	85	13	20	－18	8. 2
缅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尼泊尔	15 701	3. 8	245	241	33	15	52	81	11	29	－21	7. 2
荷兰	783 413	1. 6	24 752	40 365	2	24	74	46	28	18	7	2. 0
新西兰	126 679	2. 6	19 148	26 315	*6*	*25*	*69*	60	20	18	2	2. 7
尼加拉瓜	6 551	3. 1	. .	2 334	19	29	52	91	12	23	－26	8. 2
尼日尔	5 549	4. 2	242	. .	. .	. .	. .	. .	. .	. .	. .	3. 3
尼日利亚	193 669	6. 7	. .	. .	*33*	*41*	*27*	. .	. .	. .	9	13. 7
挪威	414 462	1. 8	19 077	37 855	1	40	58	43	22	20	15	4. 5
巴基斯坦	174 799	5. 1	765	890	22	24	54	80	8	19	－8	9. 2
巴拿马	26 777	7. 0	2 341	3 996	6	18	76	47	11	25	16	2. 3
巴布亚新几内亚	9 480	3. 8	555	643	36	45	20	69	11	20	1	6. 2
巴拉圭	18 475	3. 8	1 648	2 136	19	21	59	78	12	16	－5	9. 6
秘鲁	153 845	6. 1	879	1 390	8	35	57	63	10	23	4	3. 3
菲律宾	199 589	4. 9	839	1 078	13	32	55	75	10	17	－1	4. 7
波兰	468 585	4. 3	1 605	2 629	4	30	66	61	19	20	0	2. 7
葡萄牙	228 538	0. 7	4 789	6 203	2	23	75	67	21	20	－8	2. 5
罗马尼亚	161 624	5. 0	2 129	6 179	7	26	67	61	15	31	－7	14. 7
俄罗斯联邦	1 479 819	5. 4	1 917[a]	2 607	5	33	62	53	20	19	7	15. 1
卢旺达	5 628	7. 6	193	. .	34	14	52	81	15	22	－17	10. 4
沙特阿拉伯	*375 766*	*3. 8*	8 476	17 419	3	60	37	38	25	26	11	*7. 6*
塞内加尔	12 954	4. 2	251	223	17	22	62	83	9	28	－20	2. 7
塞尔维亚	39 128	4. 6	. .	. .	13	28	59	73	20	25	－17	15. 1
塞拉利昂	1 905	8. 8	. .	. .	52	23	25	84	14	15	－13	9. 6
新加坡	222 699	6. 6	22 695	50 828	. .	*26*	*74*	*43*	*10*	*29*	*18*	1. 1
斯洛伐克共和国	89 034	5. 2	. .	8 149	3	35	63	47	20	38	－4	3. 3
索马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非	363 704	3. 9	2 149	3 149	3	31	66	60	21	20	－1	7. 2
西班牙	1 407 405	2. 4	9 583	18 603	3	26	71	57	21	24	－2	3. 4
斯里兰卡	49 552	5. 6	697	823	13	30	58	64	18	24	－6	10. 6
苏丹	62 046	6. 7	526	844	30	26	44	67	14	25	－6	10. 6
瑞典	458 004	2. 2	23 318	43 543	2	25	73	48	28	17	7	1. 7
瑞士	523 772	1. 9	19 369	23 373	1	27	72	58	11	20	11	1. 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59 103	4. 9	2 778	4 479	21	34	45	73	13	16	－2	7. 4
塔吉克斯坦	5 640	8. 6	370[a]	501	22	24	54	93	28	22	－43	19. 7
坦桑尼亚[e]	23 057	7. 1	219	271	29	24	47	62	20	30	－12	7. 4
泰国	318 847	4. 5	480	653	11	43	45	55	13	21	11	3. 2
多哥	3 153	2. 7	345	394	. .	. .	. .	. .	*9*	. .	*－20*	2. 4
突尼斯	44 291	4. 8	2 975	3 424	7	27	66	67	12	24	－3	4. 2
土耳其	735 264	4. 7	2 198	3 223	9	26	65	72	15	15	－1	14. 1
土库曼斯坦	21 074	13. 1	1 272[a]	2 087	12	54	34	53	11	12	32	13. 0
乌干达	17 011	7. 7	186	210	25	26	50	76	12	24	－11	5. 9
乌克兰	137 929	4. 8	1 232[a]	2 010	8	29	62	65	19	17	－2	16. 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30 252	7. 0	10 414	29 465	*2*	*61*	*38*	*46*	*10*	*20*	*23*	*10. 2*
英国	2 246 079	1. 6	23 020	27 715	1	21	78	65	23	14	－2	2. 7
美国	14 582 400	1. 9	19 714	44 041	*1*	*21*	*77*	71	17	14	－3	2. 5
乌拉圭	40 265	3. 9	5 720	8 535	10	26	64	68	13	18	1	8. 1
乌兹别克斯坦	38 982	7. 1	1 427[a]	2 231	20	33	47	56	18	26	0	24. 0
委内瑞拉	387 852	4. 5	4 584	7 386	. .	. .	. .	64	13	25	－2	25. 2
越南	103 572	7. 5	229	335	21	40	39	66	6	38	－10	8. 7
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	. .	*－0. 9*	. .	. .	. .	. .	. .	. .	. .	. .	. .	*3. 4*
也门共和国	*26 365*	3. 9	412	. .	. .	. .	. .	. .	. .	. .	. .	*13. 0*
赞比亚	16 193	5. 6	189	227	22	34	44	61	13	22	3	15. 9
津巴布韦	7 474	－6. 0	245	202	18	29	53	113	13	2	－28	5. 1
全世界	**63 048 802t**	**2. 8w**	**809w**	**1 029w**	***3w***	***27w***	***70w***	**62w**	**19w**	**19w**	**0w**	
低收入国家	413 913	5. 5	233	269	26	24	50	79	10	24	－13	
中等收入国家	19 561 744	6. 4	501	730	10	35	55	57	15	28	1	
下中等收入国家	4 312 196	6. 3	485	637	17	31	51	64	12	28	－4	
上中等收入国家	15 246 704	6. 5	512	797	7	36	57	55	15	28	2	
中低收入国家	19 997 455	6. 4	471	664	10	35	55	57	15	28	1	
东亚和太平洋	7 579 386	9. 4	318	504	11	45	43	42	13	40	5	
欧洲和中亚	3 055 026	5. 4	2 061	2 738	7	30	62	62	18	19	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 969 416	3. 8	2 216	3 246	6	31	63	64	16	20	0	
中东和北非	*1 068 481*	*4. 7*	1 846	2 824	*11*	*43*	*46*	*55*	*13*	*28*	*5*	
南亚	2 088 236	7. 4	372	479	18	27	55	61	11	33	－5	
撒哈拉以南非洲	1 097 899	5. 0	299	316	13	30	57	67	18	21	－4	
高收入国家	43 002 153	1. 8	13 796	23 626	*1*	*25*	*73*	63	20	17	0	

a. 缺少全部三年的数据。
b. 不包括哈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数据。c. 不包括德涅斯特的数据。d. 包括原西属撒哈拉。e. 仅为坦桑尼亚大陆的数据。

表 5 贸易、援助和金融

	商品贸易		制成品出口	高技术出口	经常账户余额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官方发展净援助	外债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 GDP 的百分比/%	净移民数千人
	出口 百万美元	进口 百万美元	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例/%	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例/%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人均美元	总额/百万美元	现值(占 GNI 的百分比)/%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5-10[c]
阿富汗	560	3 970	18	..	..	185	204	2 328	5	2	1 000
阿尔巴尼亚	1 088	4 548	70	1	−1 875	978	113	4 719	31	68	−75
阿尔及利亚	45 194	39 294	2	1	..	2 847	9	5 345	3	−9	−140
安哥拉	40 080	17 000	..	..	−7 572	2 205	13	16 715	24	29	80
阿根廷	55 668	38 780	33	9	8 632	3 902	3	120 183	41	28	30
亚美尼亚	698	3 304	33	4	−1 369	777	171	4 935	36	20	−75
澳大利亚	154 234	165 471	19	13	*−47 786*	22 572	..	..	..	144	500
奥地利	137 672	143 382	81	11	10 995	8 714	..	..	..	141	160
阿塞拜疆	21 097	6 514	3	1	10 178	473	26	4 865	10	23	−50
孟加拉国	15 084	21 833	88	1	3 345	674	8	23 820	17	60	−570
白俄罗斯	21 283	28 563	48	3	−6 389	1 884	10	17 158	30	34	0
比利时	369 854	351 945	77[d]	10	3 522	−38 860	..	..	..	119	200
贝宁	1 000	2 040	..	..	−536	93	76	1 073	12[e]	19	50
玻利维亚	4 848	4 410	6	5	813	423	74	5 745	16[e]	50	−10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3 929	8 773	61	3	−1 175	235	110	9 583	45	58	−10
巴西	152 995	133 669	39	14	−24 302	25 949	2	276 932	17	97	−229
保加利亚	16 455	23 330	53	8	−4 751	4 595	..	40 582	85	70	−50
布基纳法索	850	2 083	12	1	*−1 709*	171	69	1 835	17[e]	15	−65
布隆迪	64	402	21	12	−164	0	66	518	13[e]	36	323
柬埔寨	4 200	6 200	*96*	*0*	−866	530	49	4 364	38	19	−5
喀麦隆	3 000	4 250	..	..	−1 137	340	33	2 941	4[e]	7	−19
加拿大	316 713	329 904	50	18	−38 380	19 898	..	..	..	*178*	1 050
中非共和国	120	300	..	..	..	42	54	396	12[e]	17	5
乍得	2 800	1 950	..	..	..	462	50	1 743	22[e]	8	−75
智利	53 735	42 427	11	4	4 217	12 7022	5	71 646	43	100	30
中国	1 201 534	1 005 688	94	31	297 142	78 193	1	428 442	9	145	−1 731[f]
中国香港	329 422[g]	352 241	79[g]	31	17 418	52 395	..	..	..	168	113
哥伦比亚	32 853	32 898	28	5	−5 001	7 207	23	52 223	20	37	−120
刚果民主共和国	3 100	3 600	..	..	..	951	36	12 183	24[e]	7	−100
刚果共和国	5 600	2 900	..	..	*−2 181*	2 083	77	5 041	20[e]	−16	−50
哥斯达黎加	8 788	11 395	47	41	−537	1 347	24	8 070	27	54	30
科特迪瓦	8 900	6 050	15	12	1 670	381	112	11 701	46[e]	23	−145
克罗地亚	10 474	21 203	66	11	−3 314	2 951	38	..	..	76	10
捷克共和国	113 437	105 179	87	16	−2 147	2 666	..	..	..	62	226
丹麦	93 344	82 947	65	18	11 222	2 905	..	..	..	223	30
多米尼加共和国	5 463	12 283	70	5	−2 159	2 067	12	11 003	22	41	−140
厄瓜多尔	13 799	15 093	9	4	−268	316	15	12 930	23	21	−350
埃及	23 062	44 946	*37*	*1*	−3 349	6 712	11	33 257	16	75	−340
萨尔瓦多	3 797	7 255	72	5	−373	431	45	11 384	49	45	−280
厄立特里亚	15	540	..	..	..	0	29	1 019	34e	113	55
埃塞俄比亚	1 596	7 963	9	4	−2 191	221	46	5 025	12e	37	−300
芬兰	62 798	60 753	77	18	6 814	60	..	..	..	99	55
法国	484 725	559 817	79	23	−51 857	59 989	..	..	..	130	500
格鲁吉亚	1 135	4 378	55	3	−1 210	658	213	4 231	28	33	−250
德国	1 126 383	938 295	82	16	165 471	39 153	..	..	..	132	550
加纳	5 500	8 140	19	1	−1 198	1 685	66	5 720	27[e]	28	−51
希腊	20 093	59 858	54	11	−35 913	2 419	..	..	..	114	150
危地马拉	7 214	11 531	43	5	8	600	27	13 801	33	37	−200
几内亚	1 010	1 400	*32*	*0*	−403	50	21	2 926	44[e]	..	−300
海地	576	2 050	..	..	−232	38	112	1 244	15[e]	26	−140
洪都拉斯	5 196	7 788	35	1	−449	500	61	3 675	13[e]	54	−100
匈牙利	83 778	78 175	82	26	−699	2 783	..	..	..	80	75
印度	162 613	249 590	67	9	−26 626	34 577	2	237 692	17	69	−1 000
印度尼西亚	119 481	91 749	41	13	10 743	4 877	5	157 517	30	37	−73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8 113	50 375	..	..	..	3 016	1	13 435	4	37	−500
伊拉克	39 500	37 000	0	*0*	*27 133*	1 070	89	..	..	−16	−577
爱尔兰	114 587	62 507	86	25	−6 488	25 233	..	..	..	225	200
以色列	47 935	49 278	94	23	7 592	3 894	..	..	..	78	85
意大利	405 777	412 721	83	8	−66 199	28 976	..	..	..	142	1 650
日本	580 719	551 960	88	20	142 194	11 834	..	..	..	323	150
约旦	6 366	14 075	73	1	−1 251	2 382	128	6 615	27	99	250
哈萨克斯坦	43 196	28 409	14	30	−4 248	13 619	19	109 873	96	55	−100
肯尼亚	4 421	10 207	37	*5*	−1 661	141	45	8 005	19	45	−189
韩国	363 534	323 085	90	32	42 668	1 506	..	..	..	112	−30
吉尔吉斯共和国	1 439	3 037	34	5	−102	189	59	2 900	36[e]	*14*	−75
老挝	940	1 260	..	..	9	319	66	5 539	78	10	−75
黎巴嫩	4 187	16 574	72	7	−7 555	4 804	152	24 864	80	163	−13
利比里亚	150	552	..	..	−277	218	128	1 660	316[e]	149	248
利比亚	35 600	10 150	..	..	9 381	1 711	6	..	..	−66	20
立陶宛	16 452	18 234	55	10	1 646	230	..	31 717	72	70	−100
马达加斯加	1 140	3 250	57	2	..	543	23	2 213	17[e]	12	−5
马拉维	920	1 700	9	3	..	60	51	1 093	16[e]	32	−20
马来西亚	157 433	123 832	70	47	31 801	1 387	5	66 390	31	137	130
马里	2 100	2 644	*22*	*3*	*−1 066*	109	76	2 667	14[e]	11	−202
毛里塔尼亚	1 370	1 430	*0*	..	..	−38	87	2 029	83[e]	..	10
墨西哥	229 637	241 515	76	22	−6 228	14 462	2	192 008	18	44	−2 430

（续）

	商品贸易		制成品出口	高技术出口	经常账户余额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官方发展净援助	外债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	净移民数千人
	出口百万美元	进口百万美元	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例/%	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例/%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人均美元	总额/百万美元	现值（占GNI的百分比）/%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9	2005-10[c]
摩尔多瓦	1 288	3 278	23	5	−465	128	68	3 457	55	41	−172
摩洛哥	13 863	32 892	65	7	−4 971	1 970	28	23 752	23	100	−425
莫桑比克	2 147	3 764	12	10	−1 171	881	88	4 168	18[e]	22	−20
缅甸	6 710	4 316	..	..	..	323	7	8 186	..	..	−500
尼泊尔	813	4 392	67	0	−10	38	29	3 683	23	68	−100
荷兰	498 330	445 496	56	24	36 581	33 287	..	..	..	224	100
新西兰	24 932	25 545	23	10	−3 624	−1 259	..	..	..	154	50
尼加拉瓜	1 391	3 477	10	6	−841	434	135	4 420	36[e]	67	−200
尼日尔	900	1 500	7	*8*	*−651*	739	31	991	13[e]	13	−28
尼日利亚	52 500	39 000	4	3	21 659	5 787	11	7 846	4	37	−300
挪威	120 880	69 292	20	20	50 122	11 271	..	..	..	..	135
巴基斯坦	17 680	31 710	76	2	−3 583	2 387	16	53 710	24	48	−1 416
巴拿马	948	7 801	10	0	−44	1 773	19	12 418	54	84	11
巴布亚新几内亚	4 328	3 200	..	..	−672	423	61	1 555	18	39	0
巴拉圭	3 167	6 940	11	11	86	205	23	4 323	26	25	−40
秘鲁	26 885	21 706	16	3	247	4 760	15	29 593	23	19	−625
菲律宾	38 436	45 878	86	66	8 552	1 948	3	62 911	35	*47*	−900
波兰	134 466	146 626	80	*5*	−9 598	13 796	..	..	..	61	−120
葡萄牙	43 358	69 844	72	4	−23 952	2 808	..	..	..	195	200
罗马尼亚	40 633	54 247	79	10	−7 298	6 310	..	117 511	53	53	−200
俄罗斯联邦	303 388	191 803	17	9	49 365	36 751	..	381 339	26	34	250
卢旺达	193	1 227	19	31	−379	119	93	747	8[e]	..	15
沙特阿拉伯	192 296	95 567	8	0	22 765	10 499	*−5*	..	..	1	150
塞内加尔	2 180	4 713	41	14	*−1 884*	208	81	3 503	20[e]	27	−100
塞尔维亚	8 345	15 582	*66*	..	−2 412	1 921	83	33 402	71	46	0
塞拉利昂	231	520	..	..	−193	74	77	444	20[e]	11	60
新加坡	269 832[g]	245 785	74[g]	49	32 628	16 809	..	..	..	91	500
斯洛伐克共和国	55 980	55 301	87	5	−2 810	−31	..	..	..	*54*	20
索马里	..	..	..	..	..	108	72	2 973	..	..	−250
南非	62 603	73 172	47[h]	6	−11 327	5 354	22	42 101	15	184	700
西班牙	218 511	287 567	73	5	−80 375	6 451	..	..	..	228	1 750
斯里兰卡	7 345	10 207	67	1	−215	404	35	17 208	35	40	−300
苏丹	7 834	9 691	0	34	−3 908	2 682	54	20 139	73[e]	20	135
瑞典	131 243	119 839	76	17	31 460	11 538	..	..	..	145	150
瑞士	172 850	155 706	90	25	38 972	27 588	..	..	..	191	10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0 400	16 300	*33*	2	*66*	1 434	12	5 236	9	44	800
塔吉克斯坦	1 009	2 569	..	..	−180	16	59	2 514	39	27	−200
坦桑尼亚	3 096	6 347	25	4	−1 816	415	67	7 325	13[e]	18	−300
泰国	152 498	133 801	75	26	21 861	4 976	−1	58 755	22	137	300
多哥	800	1 500	62	*0*	*−222*	50	75	1 640	50[e]	27	−5
突尼斯	14 445	19 096	75	6	−1 234	1 595	45	21 709	54	68	−20
土耳其	102 129	140 921	80	2	−14 410	8 403	18	251 372	35	63	−44
土库曼斯坦	6 595	6 750	..	..	..	1 355	8	576	3	..	−25
乌干达	2 478	4 310	*27*	1	−451	604	55	2 490	8[e]	11	−135
乌克兰	39 703	45 436	63	3	−1 732	4 816	15	93 153	62	89	−8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75 000	140 000	*4*	*3*	..	..	..	..	..	115	343
英国	352 491	481 707	72	23	−37 050	72 924	..	..	..	229	948
美国	1 056 043	1 605 296	67	23	−378 435	134 710	..	..	..	232	5 052
乌拉圭	5 386	6 907	26	5	215	1 262	15	12 159	37	28	−50
乌兹别克斯坦	10 735	9 023	..	..	..	750	7	4 109	12	..	−400
委内瑞拉	57 595	40 597	3	4	8 561	−3 105	2	54 503	19	*20*	40
越南	57 096	69 949	55	5	−6 274	7 600	43	28 674	27	123	−200
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	..	..	..	..	535	52	748	..	..	..	−10
也门共和国	5 594	8 500	2	0	−2 565	129	21	6 356	17	19	−135
赞比亚	4 312	3 793	8	2	−406	699	98	3 049	10[e]	19	−85
津巴布韦	2 269	2 900	34	1	..	60	59	5 015	..	..	−700
全世界	**12 491 383t**	**12 592 947t**	**70w**	**20w**	**..**	**1 163 758s**	**19w**	**..s**	**..**	**169 w**	**..[i]s**
低收入国家	63 864	112 493	*56*	*3*		8 168	45	119 100	..	38	−2 536
中等收入国家	3 740 618	3 544 565	59	20		351 327	11	3 426 014	..	89	−13 415
下中等收入国家	724 117	865 722	48	13		92 846	17	904 779	..	57	−7 916
上中等收入国家	3 016 877	2 678 489	61	21		258 481	5	2 521 235	..	98	−5 499
中低收入国家	3 804 486	3 656 996	59	20		359 495	22	3 545 114	..	89	−15 951
东亚和太平洋	1 747 540	1 493 538	80	32		101 428	5	825 602	..	134	−3 781
欧洲和中亚	657 956	636 419	37	9		86 161	20	1 126 252	..	48	−1 68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677 205	668 496	51	13		76 629	16	912 980	..	67	−5 214
中东和北非	276 399	289 612	..	*2*		27 766	41	141 321	..	41	−1 089
南亚	204 760	323 199	68	8		38 414	9	339 983	..	66	−2 376
撒哈拉以南非洲	242 566	253 161	31	6		29 096	53	198 976	..	79	−1 810
高收入国家	8 689 059	8 942 776	73	19		804 263	0	..	..	203	15 895

a. 区域接受援助总量中包括表中未列出的经济体的数据。世界和各收入组别的援助总量包括未按国家和区域分配的援助。b. 分子为2009年数据，分母为2007年到2009年数据的三年平均值。c. 五年期的总和。d. 包括卢森堡。e. 数据来源于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f. 包括中国台湾。g. 包括再出口。h. 进出口总量数据仅指南非。出口商品份额数据指南非关税同盟（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i. 由联合国计算的世界总量为零，但由于本表中总量计算采用的是世界银行定义，因此区域和各收入级别国家总值并不为零。

表 6 其他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

	人口			人口年龄构成/0～14 岁人口比例/%	国民总收入(GNI)[a]		按 PPP 衡量的国民总收入(GNI)[b]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的/%
	千人	年均增长率/%	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		百万美元	人均美元	百万美元	人均美元		男性年龄	女性年龄	
	2010	2000－10	2009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09－10	2009	2009	2005－09
美属萨摩亚	68	1.7	336	..	..	..[e]	..	..	..	..	..	..
安道尔	87	2.2[d]	181	..	*3 447*	*41 130*	..	..	*1.6*	..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89	1.4	199	..	939	10 610	1 362[e]	*15 380*[e]	－10.4	..	..	99
阿鲁巴	107	1.7	592	19	..	..[f]	..	..	..	72	78	98
巴哈马群岛	346	1.3	34	25	*6 973*	*20 410*	8 318[e]	*24 340*[e]	－0.3	71	77	..
巴林	807	2.2	1 041	26	*19 714*	*25 420*	*26 005*	*33 530*	*4.1*	75	78	91
巴巴多斯	257	0.2	595	17	*3 454*	13 500	*5 137*[e]	*20 080*[e]	－5.5	75	80	..
伯利兹	345	3.2	15	35	1 288	3 740	2 059[e]	5 970[e]	－1.4	75	79	..
百慕大	65	0.4	1 288	..	..	..[f]	..	..	*－8.4*	76	82	..
不丹	708	2.3	18	30	1 361	1 920	3 596	5 070	5.8	65	68	53
博茨瓦纳	1 978	1.4	3	33	13 633	6 890	27 508	13 910	5.7	55	55	84
文莱	407	2.0	76	26	*12 461*	*31 180*	*19 488*	*48 760*	*－3.6*	75	80	95
佛得角	513	1.6	125	35	1 620	3 160	1 879	3 670	4.0	69	74	85
开曼群岛	56	3.3	229	..	..	..[f]	..	..	..	..	..	99
海峡群岛	150	0.2	789	15	*10 241*	*68 600*	..	..	5.7	77	82	..
科摩罗	675	2.2	354	38	550	820	796	1 180	－0.3	64	68	74
古巴	11 204	0.1	105	17	*62 204*	*5 550*	..	..	4.3	77	81	100
库拉索岛	143	0.6	321	..	..	..[f]	..	..	..	..	..	..
塞浦路斯	880	1.1	94	17	*24 383*[g]	*30 460*[g]	*24 142*[g]	*30 160*[g]	*－1.9*[g]	77	82	98
吉布提	879	1.9	37	36	*1 105*	*1 280*	*2 130*	*2 460*	3.2	54	57	..
多米尼加	74	0.4	98	..	367	4 960	635[e]	8 580[e]	1.1	..	..	..
赤道几内亚	693	2.7	24	41	10 182	14 680	16 511	23 810	－1.5	49	52	93
爱沙尼亚	1 340	－1.2	32	15	19 247	14 360	26 136	19 500	1.8	70	80	100
法罗群岛	49	0.6	35	..	..	..[f]	..	..	..	77	*82*	..
斐济	854	0.6	46	31	3 085	3 610	3 833	4 490	－0.5	67	71	..
法属玻利尼西亚	272	1.4	74	26	..	..[f]	..	..	..	72	77	..
加蓬	1 501	2.0	6	36	11 655	7 760	19 804	13 190	3.8	60	62	88
冈比亚	1 751	3.0	171	42	770	440	2 229	1 270	2.3	55	58	46
直布罗陀	31	0.7	3 105	..	..	..[f]	..	..	..	..	..	..
格陵兰	56	－0.1	0[h]	..	*1 466*	*26 150*	..	..	－5.0	66	70	..
格林纳达	104	0.3	306	27	580	5 560	789[e]	7 560[e]	－1.5	74	77	..
关岛	180	1.5	329	27	..	..[f]	..	..	..	73	78	..
几内亚比绍	1 647	2.3	57	43	890	540	1 782	1 080	1.2	47	50	52
圭亚那	761	0.1	4	29	2 491	3 270	2 689[e]	3 530[e]	4.5	65	71	..
冰岛	318	1.3	3	20	10 787	33 870	9 116	28 630	－3.3	80	83	..
马恩岛	80	0.5	141	..	*3 972*	*49 300*	..	..	7.4	..	..	..
牙买加	2 712	0.5	249	29	12 892	4 750	20 139[e]	7 430[e]	－1.0	69	75	86
基里巴斯	100	1.7	121	..	200	2 010	349[e]	3 510[e]	0.3	..	..	..
韩国	23 991	0.5	199	21	..	..[i]	..	..	..	65	70	100
科索沃	1 815	0.7	166	..	5 981	3 300	..	..	3.4	68	72	..
科威特	2 863	2.7	157	23	*116 970*	43 920	*142 827*	*53 630*	*1.9*	76	80	94
拉脱维亚	2 243	－0.6	36	14	26 056	11 620	36 682	16 360	0.2	68	78	100
莱索托	2 084	1.0	68	39	2 248	1 080	3 986	1 910	2.4	45	46	90
列支敦士登	36	1.0	224	..	*4 903*	*136 540*	..	..	－1.9	81	85	..
卢森堡	507	1.5	192	18	40 281	79 510	32 346	63 850	1.7	78	83	..
中国澳门	548	2.2	19 213	12	*21 261*	*39 520*	*30 729*	*57 120*	*－0.9*	79	83	93
马其顿	2 061	0.3	82	18	9 319	4 520	*22 320*	10 830	0.5	72	77	97
马尔代夫	314	1.4	1 031	27	1 340	4 270	1 721	5 480	3.3	70	74	98
马耳他	418	0.7	1 297	15	*7 616*	*18 350*	9 573	*23 070*	*－2.8*	78	82	92
马绍尔群岛	62	2.0	339	..	187	2 990	..	..	－1.7	..	..	..
毛里求斯	1 282	0.8	628	22	9 925	7 740	17 519	13 670	3.5	69	76	88
马约特	202	2.3[j]	531	38	..	..[e]	..	..	..	72	80	..
密克罗尼西亚	111	0.4	158	37	300	2 700	380[e]	3 420[e]	0.1	68	70	..
摩纳哥	33	0.3	16 406	..	*6 479*	*197 460*	..	..	*－0.9*	..	..	..
蒙古	2 701	1.2	2	26	5 106	1 890	10 001	3 700	5.0	64	70	97
黑山共和国	626	－0.5	46	19	4 183	6 690	7 950	12 710	0.9	72	77	..
纳米比亚	2 212	1.9	3	36	10 286	4 650	14 559	6 580	2.9	61	62	89
荷属安的列斯	254	1.7	14	25	..	..[f]	..	..	..	72	81	96
新喀里多尼亚	88	2.5	189	..	..	..[f]	..	..	..	..	..	..
北马里亚纳群岛	2 905	1.9	9	31	*49 840*	*17 890*	*67 992*	*24 410*	*10.4*	75	78	87
阿曼	21	0.7	44	..	133	6 460	221[e]	10 760[e]	0.4	..	..	..
帕劳	3 980	0.4	447	20	..	..[f]	..	..	..	75	83	90
波多黎各	1 508	8.9	122	16	..	..[f]	..	..	*－1.3*	75	77	95
卡塔尔	179	0.1	63	39	524	2 930	769[e]	4 300[e]	0.9	69	75	99
萨摩亚	32	0.8[d]	524	..	*1 572*	*50 670*	..	..	*0.4*	80	86	..

（续）

	人口			人口年龄构成/0～14 岁人口比例/%	国民总收入（GNI）[a]		按 PPP 衡量的国民总收入（GNI）[b]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成人识字率占 15 岁及 15 岁以上人口的/%
	千人	年均增长率/%	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		百万美元	人均美元	百万美元	人均美元		男性年龄	女性年龄	
	2010	2000－10	2009	2010	2010	2010	2010	2010	2009－10	2009	2009	2005－09
圣马力诺	165	1.7	170	40	199	1 200	315	1 910	2.8	64	68	89
圣多美普林西比	89	0.9	191	..	845	9 490	1 821[e]	20 470[e]	5.0	68	79	92
塞舌尔	38	2.2	1 113	..	..	..[f]	..	..	..	..	..	..
斯洛文尼亚	2 065	0.4	101	14	49 276	23 860	55 704	26 970	0.1	76	82	100
所罗门群岛	536	2.5	19	39	552	1 030	1 183[e]	2 210[e]	4.5	66	68	..
圣基茨和尼维斯	50	1.2	191	..	499	9 980	658[e]	13 170[e]	－3.2	..	..	..
圣卢西亚	174	1.1	282	26	865	4 970	1 482[e]	8 520[e]	－3.3	..	..	..
法属圣马丁	30	0.6	556	..	..	..[f]	..	..	..	..	..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瑞斯	109	0.1	280	27	530	4 850	903[e]	8 260[e]	－6.8	70	74	..
苏里南	524	1.2	3	29	*3 076*	*5 920*	*3 955*[e]	*7 610*[e]	*2.2*	66	73	95
斯威士兰	1 202	1.1	69	39	3 119	2 600	5 872	4 890	－0.3	47	46	87
东帝汶	1 124	3.0	74	45	2 493	2 220	4 016[e]	3 570[e]	5.1	61	63	51
汤加	104	0.6	144	37	353	3 380	483[e]	4 630[e]	－0.6	69	75	9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344	0.4	261	21	20 664	15 380	32 243[e]	24 000[e]	－0.3	66	73	99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33	5.6	35	..	..	..[f]	..	..	..	..	..	..
图瓦卢	10	0.4	327	..	36	3 700	..	..	0.0	..	..	..
瓦努阿图	240	2.6	19	38	662	2 760	1 066[e]	4 450[e]	0.5	69	73	82
美属维京群岛	110	0.1	314	21	..	..[f]	..	..	..	76	83	..

a. 采用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进行计算。b. PPP 即购买力平价；见技术注释。c. 据估算为中高收入（3 976～12 275 美元）。d. 数据为 2004—2010 年。e. 估算基于回归分析得出；其他数据来自基于 2005 年国际比较项目基线估算的推断。f. 据估算为高收入（12 276 美元或更高）。g. 塞浦路斯共和国控制区域的数据。h. 小于 0.5。i. 据估算为中低收入（1 005 美元或以下）。j. 2002—2010 年数据。

技术注释

技术注释讨论本报告所选用指标的资料来源和编撰方法，这些指标包括在今年的“世界发展指标”中。具体指标的注释根据指标在表中的顺序编排。

资料来源

本报告中部分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数据选自《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融合了该年报告截至日期后的修订数据。此外，表 1 和表 6 包括了最新公布的 2010 年人口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估算数值。

世界银行出版物《世界发展指标》中的统计数据有多种资料来源。发展中国家外债数据资料是由发展中国家成员国通过“债务人报告制度”直接向世界银行汇报的。其他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提交给世界银行的国别报告。为提高及时性和一致性，《世界发展指标》同时使用了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估算数。大多数国家的国民账户估算值可以通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从成员国政府那里取得。在某些情况下，为保证与国际通用的定义与概念协调一致，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了调整。从各国取得的绝大多数社会数据来源于日常行政管理的档案、特别调查或定期普查。

有关更详细的数据注释，请参见《2011 年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虽然我们在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仍难以保证其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因此，在解释这些数据时必须小心谨慎。影响数据可得性、可比性和可靠性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体系仍然薄弱；国与国之间统计方法、统计口径、做法和定义的差异很大；跨国和跨时期比较涉及一些复杂的技术性和概念性总量，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得到明确解决等等。由于特殊情况，或者由于一些经济体正在经历着一些问题（比如冲突导致的问题），影响了数据的收集和报告，所以报告中的数据覆盖范围也许并不全面。因此，虽然认为这些数据最具权威性，但它们只能被视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趋势标志和主要差别的表征，而不是这些差别的准确计量。世界银行不同版本的出版物提供的数据可能有所不同，这是各国更新数据并对历史数据进行修订的结果，也是统计方法改变的结果。因此，本报告建议读者不要对不同版本的数据序列进行比较。如果读者需要前后一致的时间序列数据，请登录开放性数据网站，网址是：http：//data.worldbank.org。

比率和增长率

为方便参阅，各表列示的通常是一些比率或增长值，而不是简单的基数值。读者可以从开放性数据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中获取这些数据的原始数据值。除非另有说明，增长率都是根据最小平方回归法计算的（参阅下文中“统计方法”一节）。由于该方法考虑了一定时期内可以得到的全部数据，该方法产生的增长率所反映的一般趋势不会过于受异常数值的影响。为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在计算增长率时使用了不变价格的经济指标。斜体数据是一年或一个时期的数据，而不是栏首特指年份或时期的数据——对经济指标而言，特定时期指所标时间的前后两年；社会指标则指前后三年，这是因为社会指标的收集一般都是不定期进行的，而且短期内的变化也不会太大。

不变价格序列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用该国或地区进行生产经营的个人和经营所创造出来的增加值来测算的。因此，测算实际的增长要求用不变价格来测算 GDP 及其组成要素。世界银行收集用各国货币计值的不变价格国民账户序列，并以该国的原始基年来记录。为获得可比的不变价格数据序列，以共同的基准年份（本版的世界发展指数是以 2000 年为基准年），按产业起源重新测定 GDP 和增加值。这一计算过程导致重新测定后的 GDP 值和 GDP 各组成部分加总值之间的偏差增大了。鉴于这些偏差的划归会加大各国增长率的扭曲，这些偏差被置于一边，不作划归。

汇总数值

大多数表格最后列出了不同地区和收入组别国家的汇总数值，这些数值在按级别表示时只是简单的加总计算值。总增长率和比率通常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计

算。社会指标的汇总数值根据人口或人口组别加权得出，但婴儿死亡率则是根据出生婴儿数加权计算得出的。欲知更多的信息，请参阅具体指标的注释。

对于涵括多年的汇总数值，则是以前后一致的经济体组别划分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这样，汇总数据的构成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当某一个特定年份得到的国别数据占整个组别的至少 2/3 时，这种计算方法才能以 2000 年为基年编制出该国别组的测算值。只要符合标准，即可认为数据缺失经济体的各项指标与提供了估计数据的经济体相同。读者应当记住，汇总数值旨在为每一个统计项目提供代表性的总量，因此，根据国家组别指标而回溯推断出斜体国家的情况是毫无意义的。此外，这种估算过程也可能导致总计数和次级组别汇总数据之间的差异。

表 1　主要发展指标

人口的定义基于事实，即一国人口包括所有居民，无论其法律地位或公民权状况；但不在避难国永久居住的难民除外，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原籍所有国的人口。表中数据显示的是年度中期估算值。

人口年均增长率即一个时期内人口指数的变化（参见下面的“统计方法”部分）。

人口密度即年度中期人口与土地面积的比值。土地面积是指一个国家除内陆水域和沿海水域外的总面积。该指标用最近可以获得的土地面积的数据计算。

0~14 岁人口年龄构成是指 0~14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国民总收入（GNI）是对国民收入最广义的测算，它测算的是居民所拥有的来自国内和国外资源的全部增加值。国民总收入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加上源自国外的初级收入净额。数据运用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将本国货币换算成现值美元。该方法使用 3 年汇率平均数以消除汇率的短期波动（参见后面“统计方法”部分关于“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的进一步讨论）。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即国民总收入与年度中期人口的比值，并通过“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换算成现值美元。为便于分析，世界银行使用按美元计价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国家和地区进行划分并以此确定借贷资格。

按 PPP 衡量的国民总收入是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换算因子将国民总收入转换成国际美元，因为名义汇率并不总是反映各国间的价格水平差异，此表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国民总收入与人均国民总收入估算值转换为国际美元。使用购买力平价指数可以对各国实际支出水平进行标准化的比较，这与使用传统的价格指数可以对一段时间内的实际价值进行比较一样。这里使用的购买力平价换算因子取自 2005 年“国际比较项目”对 146 个国家所进行的价格调查。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取自 2005 年完成的最新一轮调查。对本调查不包括的国家的估计数，可以使用可得数据并利用统计模型推导出来。欲知更多有关 2005 年“国际比较项目”的信息，请登录 http：//www.worldbank.org/data/icp。

按 PPP 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按 PPP 计算的 GNI 与年度中期人口的比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增长率是基于按照不变价格测算的 GDP。GDP 增长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广义尺度。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估算以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即测算出一段时间内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总量，以一组被认可的基年价格对它们进行估值，并减去以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中间投入的成本。详情请参阅“统计方法”一节中的最小平方增长率部分。

出生时预期寿命指假定婴儿出生时的死亡格局在他一生中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婴儿可能生存的年数。指标中分别提供了男性与女性的数据。

成人识字率是指 15 岁及 15 岁以上的识字者与 15 岁及 15 岁以上总人口的比值；识字者指那些能够理解和读写有关日常生活的简单陈述句的人。在实践中，这一指标难以量度。以上述定义来测算识字率，需要在假定一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人口普查或者抽样调查测算。许多国家用自己报告的数据来估计识字人口数。一些国家利用教育程度作为中介变量，但适用的入学率的程度或教育完成率的水平却不尽相同。由于数据收集的定义和方法因国而异，所以应当谨慎使用这些数据。

表 2　贫困

世界银行与各国机构、其他发展机构以及包括贫困人群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团体开展紧密合作，在世界银行积极推行项目的国家，定期进行贫困状况评估。贫困状况评估汇报贫困覆盖率与导致贫困的根

源，并提出减贫的相关策略。自 1992 年起，世界银行已经完成了 200 次左右的贫困状况评估，这也是表2 中运用国家贫困线得到贫困状况估计值的主要数据来源。作为减贫战略的一部分，各国也会开展类似的评估并完成贫困状况评估报告。

同时，世界银行还运用国际贫困线对贫困状况进行估算，以监控全球减贫事业的进展。世界银行于 1990 年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第一次全球贫困状况估算，并发布在《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22 个国家的贫困状况（使用家庭调查数据）（Ravallion，Datt 和 van de Walle，1991 年）。此后家庭收入与支出实地调查覆盖的国家数目出现了很大的增长。

国际贫困线与国家贫困线

国家贫困线用于对与各国特定经济社会国情相吻合的贫困状况进行估算，其目的并不是进行贫困率的国际比较。国家贫困线的划定反映了该国对脱离贫困的消费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理解。人们理解中的贫困与非贫困之间的界线会随着一国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因此并不能够作为统一的指标来比较各国的贫困率。然而，国家贫困状况估算显然是制定各国减贫政策并监督目标达成结果的合理指标。

贫困测量的国际比较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的贫困定义标准导致很难实现跨国比较的一致性。当采用普遍的贫困标准时，国家贫困线在富裕国家的购买力要比在贫穷国家的购买力高。国际贫困线力图使贫困线的实际价值在各国之间保持不变，跨时间的比较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不去考虑各国平均收入水平如何。

自《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布之后，世界银行就致力于根据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贫困定义制定并应用统一的标准衡量极度贫困。调整货币购买力差异后即可用同一尺度衡量不同国家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选用了以 1985 年国际价格计算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每天生活费用 1 美元的标准，这是因为每天生活费用 1 美元是当时低收入国家普遍采纳的贫困线。此后，每天生活费用为 1 美元的贫困线修订为以 1993 年国际价格计算的每天生活费用为 1.08 美元。最近，国际贫困线运用 2005 年国际比较方案得到的新购买力平价数据以及覆盖范围扩大后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所得数据进行修正。新的极端贫困线设定为以 2005 年国际价格计算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每天生活费用 1.25 美元，这是人均消费排名最为贫困的 15 个国家的贫困线的均值。新设定的贫困线对极端贫困采用了相同的标准——即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贫困线，同时运用发展中国家生活费用的最新数据进行了修正。

调查数据的质量与可得性

根据实地调查搜集样本家庭的收入或消费数据可以得到贫困状况估计值。出于对贫困估计有效性的考虑，调查必须具有国家代表性，且包含足量信息，从而能够全面地估计出家庭总消费或收入（包括自营性生产的消费或收入），这样才可能对人均消费或收入形成一个合理的加权分布。在过去 20 年间，开展实地调查的国家数目以及调查频率出现了相当大幅度的提升。数据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世界银行贫困监测数据库目前包含了覆盖 115 个发展中国家的 600 项调查。调查访谈涉及 120 万家随机样本家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 96%。

运用调查数据的计量问题

除调查数据的频率与时效性之外，衡量家庭生活标准时还存在着其他数据问题。选择收入还是选择消费作为福利指标，就是其一。一般来说，准确衡量收入的难度较大，而且消费与生活水平的概念更为接近。同时，可能出现收入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而生活水平不变的现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消费数据均可获得：报告中最新的估计值采用消费数据的国家约有三分之二。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是类似数据，严格来说可能并不具有可比性，这是因为设定的消费品数目不同，受访者回忆其支出的时间长度不同，人口调查员的素质与培训不同等。某些调查中，选择性的无应答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也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各国的非市场产品消费的相对重要性存在差异。所有实物消费（包括自营性产品消费，这在欠发达的农业经济体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的当地市场价值都应包含在总消费支出内，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来源于自营农场产品的实物消费的估算值目前已经作为常规数据包含在调查当中。估算得出的非市场商品生产所得利润则应当计入收当中，不过有

时却被忽略（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调查中这类问题比较重要）。目前大多数调查都包含自营生产的消费或收入估值，但估值方法不尽相同。

定义

调查年份是指基本数据收集的年份。

位于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指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国家估计数基于对家庭调查中次级分组进行人口加权而得到的估计数。

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和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的人口是指以 2005 年国际价格计算每天生活水平低于 1.25 美元和低于 2 美元的人口百分比。以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个别国家的贫困率与早期版本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报告的贫困率不具有可比性。

贫困缺口是指不足贫困线（非贫困家庭计为 0 差距）的平均差距，用相当于贫困线的百分比表示。这一指标反映了贫困的深度与广泛程度。

表 3　千年发展目标：消除贫困，改善生活

最贫困的 20%人口占国民消费或收入的比例指的是最贫困的 20%人口占国家消费或收入的比重。此项指标为分布性指标。在平均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或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贫困率越高。数据来源于各国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调查。由于基础家庭调查在数据搜集方法与类型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得到的分布数据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已通过自身努力，使数据尽可能地具有可比性。在可能的情况下会优先采用消费数据，而非收入数据。

弱势就业人数是指不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以及自营性工作人员总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不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以及自营性工作人员总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可从就业状态相关信息中得出。每个就业状态组都对应着不同程度的经济风险，而不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以及自营性工作人员则是最为脆弱的群体，因此也最有可能陷入贫困。他们最不可能得到正式的工作安排，遇到经济波动时最不可能得到社会安全保护网络的保护，而且往往无法积累足够的储蓄应对经济波动。

儿童营养不良状况是指体重低于国际参照人群组该年龄（即 0~59 个月）体重中位值负 2 个标准偏差的 5 岁以下儿童所占的百分比。表格展示了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2006 年公布的儿童成长标准的数据。

初等教育完成率指完成小学最后一年教育（或毕业）学生的百分比。它是升入小学最后一级的学生总数（无论年龄），用升入最后小学一级的学生数量占适龄人口的比例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各国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界定的小学周期的局限性，需为小学教育最后一年辍学的学生做调整。因此，该比率应被视为实际小学完成率的上层估计的中介变量。

中小学中女生和男生的入学比例指在小学和中学中入学女生总人数与入学男生总人数之比。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指如果按照目前特定年龄的死亡率，新生儿在 5 岁以前的死亡率。这一概率以在每千人中所占的比率来表示。死亡率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人口动态登记系统以及基于抽样调查或普查得到的直接或间接估计数。为了使各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估计值更具有可比性，从而确保不同机构间估计值的一致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开发并采用了一种统计方法，通过利用可得的所有信息协调数据间的差异。该方法采用加权最小平方法，将死亡率与参照时期的相关性拟合得到回归曲线。

产妇死亡率指的是每十万活产婴儿中，由在孕期和分娩期间相关原因造成死亡的女性人数。数据为模型估计值，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做法。对于人口动态登记系统中死因信息明确的国家来说，所得数据直接计入报告，而对于数据来源于（1）死因信息不确定或不明确的人口动态登记系统或（2）家庭调查的国家来说，报告中的产妇死亡率会考虑到统计漏查或分类有误的因素并进行调整。对于那些不具备实证数据的国家（此类国家比例为 35%）来说，产妇死亡率可运用社会经济数据（包括人口出生率、助产人员和 GDP）根据回归模型估算得出。

艾滋病毒感染率是指 15~49 岁人口感染艾滋病毒的百分比。成人艾滋病毒普及率反映了各国人口中艾滋病毒感染程度。然而，国家艾滋病毒感染率低可能存在误导性。在艾滋病潜伏严重的地区，艾滋病毒通常只集中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中，继而蔓延开来威胁到更广泛的人群。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区，大多

数新感染人群为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更容易受到感染。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基于监察、基于群体的调查和特别研究对艾滋病毒感染率进行估计。

结核发病率指的是新增结核（肺结核、涂阳肺结核、肺外结核）患者估计数目。结核是发展中国家成人群体因单一感染源致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收入国家的结核病再度出现往往是因为移民中有结核患者。表中结核发病率覆盖范围的估测值即采用如下方法得出的数值：采用案例报告与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80 名流行病学专家委员会估测的病例之间的比例对报告案例进行调整。

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指矿物燃料燃烧和水泥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包括固定、液体、气体燃料和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排放量，再除以年中人口数（世界银行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改善后的卫生设施的获取渠道是指拥有足够、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人类、动物和昆虫与排泄物接触的排泄物处理设施（私有或共用设施，但不属于公共设施）的人口比例。这些设施不一定必须具备污水处理净化措施。从简单而有防护装置的坑式厕所，到有排污装置的抽水马桶，都属于改善后的设施。要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建造这些设施并使之得到妥善的维护。

网络用户指的是能够接触到万维网的人。

表 4 经济活力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居住在一国的所有生产者在经济中的总增加值，加上所有税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增加值中的所有补贴的总值。计算中没有扣除制造资产的折旧值或自然资源的损耗和退化值。增加值是一个部门的所有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值。产业增加值的起始值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次修订版确定。世界银行按惯例使用的美元及官方的平均汇率来自IMF 当年公布的数字。如果根据判断官方汇率极大地偏离了外国货币和贸易产品交易时使用的汇率，可使用替代换算因子进行换算。

GDP 年均增长率按当地货币不变价格的 GDP 数据计算。

农业生产率指以 2000 年不变美元得出的农业增加值与农业生产工人数量的比率。农业生产率以每单位产出的增加值来衡量。农业增加值包括林业、渔业。因此应谨慎解释土地生产力。

增加值指用所有的产值减去中间投入以后的产业净值。产业增加值的起始值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次修订版确定。

农业增加值指符合 ISIC 第 1~5 类的行业，包括林业、渔业。

工业增加值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水利和天然气（ISIC 第 10~45 类的行业）。

服务业增加值指 ISIC 第 50~99 类的行业。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指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包括家庭购买的耐用品（如小汽车、洗衣机、家用电脑）。它不包括住房的购买，但包括自有住房的推算租金。它也包括为取得政府有关的许可证和执照而支出的有关费用。这里家庭消费支出还包括对来自非营利机构为家庭提供服务上的支出，尽管这方面的支出只在个别家庭有所报告。在具体操作中，家庭消费支出也可能包括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在使用中的统计差异。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包括所有政府用于商品和服务采购的所有经常性支出（包括工资支出）。它还包括用于国防和安全的大部分支出，但不包括作为政府资本形成部分的军事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指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支出加上存货和贵重制品的净变化值，固定资产包括土地的改进（如围墙、沟渠、排水系统等）；工厂、机器和购置的设备，以及建筑物、公路、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包括商业和工业用建筑、办公楼、学校、医院和私人住宅。存货是指公司在生产和销售“运行过程”由于暂时的和未预想的经济波动而发生的货物储存。根据 1993 年 SNA 的规定，贵重复制品净获得值也是资本形成总额的组成部分。

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指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减去其进口得出的差额。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包括一国居民之间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涉及所有权变动的一切交易，包括一般商品，需要加工和维修的货品、非货币性的黄金和服务等。

GDP 隐含平减指数反映了所有最终需求项，包括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国际贸易，以及主要构成因素——私人最终消费等方面的价格变化，用现价

GDP 对不变价格 GDP 的比率来计算。GDP 平减指数也可以由帕氏（Paasche）价格指数直接得到，在帕氏价格指数中，是报告期的产出数量。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账户指标由世界银行访问和常驻代表团从各国统计组织和中央银行处获取。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则来自 OECD 数据库。

表 5　贸易、援助与金融

商品出口指以美元计的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以离岸价格（FOB）计的货物价值。

商品进口指按美元计的从世界其他地区购买的以到岸价格（CIF）计算的货物价值（货物成本包括保险费和运输费）。商品贸易的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年度报告。

制成品出口由贸易标准产业分类（SITC）第 5 节（化学品）、第 6 节（基本制成品）、第 7 节（机械和运输设备）和第 8 节（杂项制成品）中所包括的商品组成，但不包括第 68 条款的商品。

高技术出口是指研发供应量高的产品。包括航空航天器、计算机、药品、科学仪器及电子机械等高技术产品。

经常账户余额是商品和服务出口净值、净收入和经常性转移支付净值之和。

外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其所属经济体之外，为获得对一个企业经营的持续管理权益（10%以上有股票权的股份）而进行的投资净流入量。它是国际收支账户中列示的股权资本量、收益的再投资、其他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之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平衡数据为主，以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运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各国官方来源数据进行的估算数据为补充。

官方发展援助净额来自经合组织高收入成员国，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些重要的捐助国也并非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成员。发展援助委员会对官方发展援助设有三项标准：它由官方部门执行；它以推动经济发展或提高福利为主要宗旨；该援助按特惠条件提供，贷款的赠款成分占 25%以上。

官方发展援助（ODA）由符合发展援助委员会关于 ODA 的定义、提供给 DAC 受援国名单上的国家和地区的赠款、贷款、和偿还款项净额组成。与过去的受援国名单相比，新的 DAC 受援国名单是基于更为客观的需求标准排列的，包括所有中低收入国家，但不包括 G8 或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包括已确定加入欧盟日期的国家）。

外债总额是对非居民所拥有的、且应以外币、货物或服务偿还的债务。它是公共的、公共提供和私人无提供的长期债务、所使用的国际货币基金信贷，以及短期债务之和。短期债务包括原偿还期为一年和一年以下的所有债务以及长期债务的利息拖欠额。

外债现值是短期外债，加上公共的、公共担保的以及私人无担保的长期外债，以及现存贷款有效期间内债务还本付息总额的贴现值之和。

外债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世界银行从已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成员国那里根据债务人报告制度所提交的报告，其他信息源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基金和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年度性出版物《全球发展金融》发布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汇总表。

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包括在总量基础上向不同部门发放的所有信贷，但不包括向中央政府的信贷，因为它是净值。银行部门包括货币当局、货币存款银行以及其他可得到数据的银行机构（包括那些不接受可转让的存款，但因定期和储蓄存款而负债的机构）。其他银行机构的例子有储蓄和抵押贷款机构，以及建筑和贷款协会等。数据来源于 IMF 的《国际金融统计》。

净移民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移民总数，即移民入境人数减去移民出境人数，计算同时包括本国和非本国居民。表中显示的数据为 5 年的估计值，来自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08 年修订版》。

表 6　其他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

参见表 1 的技术注释。

统计方法

本节描述最小平方增长率、指数（终点）增长率的计算，以及以美元表示的计算 GNI 和人均 GNI 换算因子的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

最小平方增长率

无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长时间内的数据序列以保

证数据计算的可行性，都使用了最小平方增长率方法。如果一个时期半数以上的观测数据缺失的话，则不予计算增长率。

最小平方增长率 r 是这样估算的：对相关期间内该变量的对数年度值趋势线做线性回归，回归议程采取以下形式：

$$\ln X_t = a + bt$$

这相当于复合增长率议程的对数转换形式：

$$X_t = X_o(1+r)^t$$

在这个方程中，X 是变量，t 是时间，$a=\ln X_a$ 和 $b=\ln(1+r)$ 是待估参数。如果 b^* 是 b 的最小平方估计值，平均增长率 r 就是 $[\exp(b^*)-1]$，乘以 100 以表示为百分比。

计算出的增长率是一个平均比率，是整个时期可获得的观察数的样本值。它未必能使任何两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相匹配。

指数增长率

对于特定人口统计数据来讲，特别是劳动力和人口数量，两个时点之间的增长率按以下方程计算：

$$r = \ln(p_n/p_1)/n$$

这里的 p_n 和 p_1 是期间的最终和最初观察值，n 是期间的，ln 是自然对数符号。这种增长率是以这两个时点间的连续指数增长模型为基础的，没有考虑这一数据序列中的中间值。还需要注意的是，指数增长率并不与用一年的间隔期内所测算出来的年变化率相一致，年变化率表示为

$$(p_n - p_{n-1})/p_{n-1}$$

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法

世界银行在计算以美元计算的 GNI 和人均 GNI 时，为了某些操作上的考虑，使用了阿特拉斯换算因子。使用阿特拉斯换算因子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汇率波动对各国投入的跨国比较中的影响。阿特拉斯任何年份的换算因子是一国当年和前两年的汇率（或替代换算因子）的平均数，对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调整。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异进行了调整。一国的通货膨胀率是根据该国 GDP 平减指数的变化来测算的。

代表国际通货膨胀率趋势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使用特别提款权（SDR）减缩指数的变化测算的（特别提款权或 SDRS，是 IMF 的计账单位）。SDR 减缩指数是由按 SDR 计值的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的 GDP 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权数代表一个 SDR 单位中所包含的各国货币的数量。由于 SDR 的构成和每种货币的相对汇率都在发生变化，上述权数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SDR 减缩指数首先以 SDR 计值计算出来，然后用 SDR–美元的阿特拉斯换算因子来折算成美元计值。阿特拉斯换算因子用于各国 GNI 的计算，得出的以美元表示的 GNI 年中人口数，即得到人均 GNI。

当一段时期内的官方汇率视为不可信或不能够代表有效汇率时，阿特拉斯公式（如下式）使用了另外一种汇率的估测法。

下面的公式描述了 t 年的阿特拉斯换算因子计算方法：

$$e_t^* = \frac{1}{3}\left[e_{t-2}\left\{\frac{p_t}{p_{t-2}}\Big/\frac{p_t^{S\$}}{p_{t-2}^{S\$}}\right\} + e_{t-1}\left\{\frac{p_t}{p_{t-1}}\Big/\frac{p_t^{S\$}}{p_{t-1}^{S\$}}\right\} + e_t\right]$$

以及计算 t 年以美元表示的人均 GNI 的方法：

$$Y_t^{\$} = (Y_t/N_t)/e_t^*$$

这里，e_t^* 是 t 年的阿特拉斯换算因子（本国货币对美元），e_t 是 t 年的年均汇率（本国货币对美元）；$p_t^{S\$}$ 是 t 年用美元计算的人均阿特拉斯 GNI 值；$Y_t^{\$}$ 是 t 年的本期 GNI（以本国货币表示）；N_t 是指 t 年的年中人口数。

替代换算因子

世界银行系统地评价了作为换算因子的官方汇率的适宜性。当官方汇率由于与国内外货币交易和产品贸易中实际使用的汇率存在极大的差额而被判定为越轨时，就使用替代换算因子；这仅是在少数国家出现的情况（见《2010 年世界发展指标》的“基本数据文献”表）。替代换算因子也被用于阿特拉斯方法中，并作为单一年份的换算因子而被用于“部分世界发展指标”的其他地方。